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

第一卷



胡耀邦

目 录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	1—7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8—21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22—29
（一九四一年五月）	
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30—32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33—44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	45—63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64—76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77—85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动员会上的讲话	86—93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94—95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96—107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	108—123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124—129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130—133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134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135—140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141—144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45—150
（一九五 年五月十六日）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	151—160
（一九五 年六月六日）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161—171
（一九五 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172—183
（一九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184—188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关于西南地区的土改情况和经验	189—192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	193—197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198—200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201—208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办好学校 培养干部.....	209—211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212—256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257—260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261—269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270—274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祝词	275—279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	280—282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283—284
（一九六 年三月二十五日）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285—290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	291—292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293—296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97—317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	318—321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322—327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328—333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立足现实，瞻望前途.....	334—337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建设一个成熟的有战斗力的党	338—348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注释	349—384

动员新兵及新兵政治工作^{*}

(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二日)

—

当前的战局,是处于暂时的局部的失利的境况,决不是抗日自卫战争的最后失败。战争的最后胜败,要在持久抗战中去解决。

今天的战争,要求我们充分运用半年抗战的宝贵经验。不仅应研究战略战术,而且还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没有疑问的,中华民族的儿女,是要站在最前线与日寇拼命的,他们是能够以自己的血肉,换取民族的解放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动员新兵的工作,没有任何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历史上“好子不当兵”的传统观念我们还未能给以有力的克服;其次,是由于过去对民众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甚至在抗战爆发后,这一重大的工作,依然表现着异常的

* 本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前线》周刊第三、四期(合刊)。邓小平同志作此文时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调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不够 ;第三 ,是由于我们今天征调壮丁的方式 ,还不无强迫的错误 ,这种错误的继续 ,造成了动员新兵的极大困难 ,且使入伍者缺乏坚定的意志与作战的勇气 ,甚至还可造成民众与政府、军队的对立 ,给日寇、汉奸以活动的口实与机会 ;最后 ,也由于对抗日军人家属的困难 ,没有切实实行政府所颁布的优待办法 ,给以最低限度的解决 ,使前线战士能够抛开家庭的顾虑而安心作战 ,并以这样的影响提高民众加入军队的决心和勇气。

假如我们冷静地回顾几个月来征调兵员的经验 ,我们当可看到在某些地区 ,正因为有了上述的缺点和错误 ,致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 ,以最高的民族仇恨 ,奔赴抗日的前线 ,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这种结果 ,将使民众不能充分了解政府积蓄与扩大国防力量 ,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方针之重要 ,反会在部分人民中增加对于政府的不满情绪。这种结果 ,将使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前线官兵的艰苦奋斗与国与家的关系 ,而热烈地拥护和慰劳军队 ,实现大革命^[1]时代军民一致的优良传统 ,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反会增加部分民众厌恶军队不愿当兵的观念。日寇、汉奸、托派^[2]之辈 ,则更利用这些缺点和错误 ,来进行其挑拨煽惑的阴谋 ,企图造成民变 ,以威胁和扰乱抗日的后方。这些严重的现象 ,即使是在一个两个村庄发生出来 ,即使在一极小部分民众中表现出来 ,已经足够引起我们的最高警惕了 !

不错 ,这一时期的征调工作 ,已有其相当的成绩 ,前线军队一般地得到了相当的补充 ,但这决不能成为一种根据 ,认为我们还可以继续那些不好的征调方式。它纵然可以供给一时

的补充,但绝不能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只有纠正那些不妥当的方式,才能保证今后动员任务的实现。

二

我们指出由于征调方式的不当,而可能产生的不好结果与影响,其意义不在于消极的批评,而在于如何去纠正,采取好的动员方式,使前线能够得到源源不绝的补充,益能组织足够数量的新军队。

必须了解,全国民众对日寇的侵略是深恶痛绝的,只要我们能采取较好的方式,去诱导他们,鼓动他们,必定能够很快地打破部分民众中的不健康的心理,必定能够鼓起他们最大的决心与勇气,自动地奔上前线,鼓励自己的夫、子、兄、弟上前线,为光荣的民族解放事业而战斗。这从某些区域进行动员工作收到显著成绩的例子中,可以充分地证明出来。

这些动员较好的区域,给我们显示出了一些可贵的经验。

在那里,进行了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运用了各种宣传的武器——戏剧、歌曲、壁报、群众大会、小的飞行演讲、个别谈话等等方法,向群众说明目前形势和生路,揭露敌人的残暴。经过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很快地激发起来,自动加入军队的踊跃,是远远超过强征的效果。

在那里,进行了团结抗日积极分子与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分子(不是投机想升官发财的那些人)的工作,经过他们去进行招募,常常收效极大。

在那里,进行了抗日军人家属中的工作,召集了各军军人

的家属开会,有可能时甚至举行会餐,向他们宣传解释各种抗日的问题,说明他们的光荣,给以光荣牌匾,并征询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的困难,已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当地政府或民众团体提出意见,求得部分的解决。这些工作的结果,给了一切人民以抗日军人家属光荣的榜样,创造了不少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子、哥哥送弟弟参加军队的新模范。

在那里,动员了政府和民众团体,来协同地进行这一工作,推动了这些组织进行宣传、慰劳与欢迎新兵上前线的工作。

在那里,驻扎的军队,首先起到了模范的作用。军队本身有了模范的纪律,与民众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举行军民联欢晚会,请民众吃饭(常是以连队为单位每家请一人代表)。这些工作给了民众以最切实的影响,使他们从经验中改变了惧怕军队的心理和“好子不当兵”的观念,给了政府与军队招募新兵以便利。

在那里,军队中已动员了自己的战士去进行招募工作。只要保证自己的战士不会扰民,态度和蔼,所收成绩常常是可观的。

最后,在那里,有些地区是处在敌人的后方侧翼,或者处在时常被敌侵扰的范围内,他们充分地运用了组织游击队的方式,动员敌人后方我接敌区域的群众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这些游击队本身的壮大与战斗力的增强,还逐渐成为正规的劲旅,实际上扩大了国防的力量;甚至在可能的时机,在不妨害与削弱游击战争的开展之条件下,还可动员一些游击部队加入正规的军队。这一方式的运用,在今天不少领土变为敌人

后方的条件下特别重要,既是增强国防军队的一种良好手段,在持久抗战的战略上更有极伟大的意义。

我们热望全国一切军队能够得到适时的补充与扩大。在全国的征兵制还没有可能实施以前,我们盼望政府和军队都能运用这些经验。固然这些经验仍然是不充分的,但是只要我们毅然地抛弃强征的手段,而着眼于宣传、教育、组织、影响等等动员民众的方式,新的经验将不断地创造出来,动员的收获也必然日益丰富起来。

三

动员新兵的责任,在于一方面保证动员计划的完成,一方面还要从政治上,保证这些新战士具有高度的热情和自动性而开赴前线,这对于军队战斗力的提高,有非常重大的意义。这一工作依靠于动员机关和军队本身协同地完成。

用不良方式征调新兵,巩固部队与提高战斗力的工作自然是极困难的,急需接收新兵的部队,以坚强的政治工作,去弥补征调时的缺点。即是用好的动员方式征调新兵,也不能丝毫忽视这一工作。

必须认识,新战士在昨天还是一个老百姓,家庭的观念是浓厚的,部队的活是不习惯的,军事技术是不懂得的。为着巩固新战士,使他们很快地习惯部队生活,很快地成为熟练的战士,我们必须进行许多切实而艰苦的工作。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观点,以为完全用长官的严厉统制办法,就可以达到上述目的。固然,军队的严格的纪律与合理

的统御是必需的,但是不够的,还要求政治工作的配合。我们不仅要武装战士的手足,尤其重要的是武装战士的头脑。完全采用压制的办法,其结果,纵然可以在表面上收到一些效果,也绝不是巩固的,更不会发扬战士的自动性,从战士自己的觉悟中发生出无比的战斗威力,尤其不能在任何困难环境中还会保持一致以支持艰苦的斗争。

政治工作,在巩固新战士与提高其战斗力上,是应该而且能够发挥其极大作用的。

在接收新兵的时候,必须协同征募机关,举行隆重的慰劳与欢送;在开赴前线的途中,尽可能组织沿途群众的欢迎与欢送;并在接收部队举行热烈的欢迎。

新战士到达部队之后,应首先了解征募时的情形,战士的情绪,以及可能发生的问题,针对这些,进行及时的解释,特别是立即加强抗日的教育,提高新战士的觉悟。

在部队中,应动员老战士,提倡友爱的精神,发动老战士帮助新战士学习军事和政治,反对老兵欺侮新兵的现象。同时,注意新战士的伙食及衣物的供给,尽可能减少新战士的困难与苦痛,使新战士的精神感到愉快。这是巩固部队的重要因素。

提倡合理的统御,采取更多的教育说服方式,推动新战士自觉地遵守纪律,努力学习。

提倡战士写信回家,告诉自己在部队的愉快生活,宣传家属抗日救国。允许战士家属到营地看望,并给家属以很好的安慰和招待。

做好这些工作,不仅可以补足动员时的弱点,且可生长将

来动员的新的力量。我们希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 ,能以最大的努力去进行 ,我们还希望军事长官也能给政治工作以赞助。

新兵动员方式的改善 ,与部队政治工作的加强 ,将配合着战略战术的进步 ,锻炼出最大数量的有优良技术的有最高战斗力量的国防军队 ,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党与抗日民主政权^{*}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

一 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

三三制^[3]的抗日民主政权原则,为我党中央所提出的真实政策,已取得广大群众的拥护,尤应为全党同志所奉行。因为这种政权表现为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反动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所以这不仅是今天敌后抗战的最好政权形式,而且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

^{*} 本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三十五期。

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

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即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第三,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于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从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由此可见,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的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二 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

假如说中国是一个半封建的缺乏民主的国家,则反映到党内的是:共产党员一般缺乏民主的习惯,缺乏民主政治斗争的常识与锻炼。

假如说西欧共产党带有若干社会民主党的不良传统,则中国党或多或少带有一些国民党的不良传统。某些同志的“以党治国”的观念,就是国民党恶劣传统反映到我们党内的具体表现。

党提出三三制的政策之后,在我们晋冀豫区,曾遭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抵抗,这也是忽视民主和“以党治国”的观念在作怪。最近虽有不少转变,但彻底纠正这种错误观念,还需要一个教育与斗争的过程。

几年来,“以党治国”的思想曾经统治了某些区域,甚至有些区域的领导同志还长期存在着这种顽固的思想。它所造成的恶果也不小,主要表现为:

第一,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优势,以为党员包办就是绝对优势,不了解真正的优势要表现在群众拥护上。把优势建筑在权力上是靠不住的。“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4]时,宋哲元^[5]用了自己的权力——军队、监狱、警察、大刀、水龙去对付革命的学生,试问我们能说当时的优势是在宋哲元手上吗?这当然是说不通的。过去我们有些高唱优势的同志,认为共产党员占多数了,天下是我们的了,因而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许多过左的错误由之而生,中间分子对我不满,进步分子非常不安,

群众对党的舆论也不好。除了阿 Q 主义者,谁能说党已经有了优势!

第二,这些同志误解了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解释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干涉政府工作,随便改变上级政府法令;不经过行政手续,随便调动在政权中工作的干部;有些地方没有党的通知,政府法令行不通,形成政权系统中的混乱现象。甚有把“党权高于一切”发展成为“党员高于一切”者,党员可以为非作歹,党员犯法可以宽恕。其结果怎样呢?结果非党干部称党为“最高当局”(这是最严酷的讽刺,不幸竟有人闻之沾沾自喜!),有的消极不敢讲话,有的脱离我们以至反对我们,进步分子则反为我忧虑。结果群众认为政府是不中用的,一切要决定于共产党。于是耍钱的是共产党,耍粮的是共产党,政府一切法令都是共产党的法令,政府一切错误都是共产党的错误,政府没有威信,党也脱离了群众。这实在是最大的蠢笨。结果党的各级指导机关日趋麻木,不细心地去研究政策,忙于事务上的干涉政权,放松了政治领导。结果党员“因党而骄”,在政权中工作的党员自高自大,盛气凌人,自以为是,看不起非党员,自己可以不守法,不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甚有少数党员自成一帮,消极怠工,贪污腐化,互相包庇。于是投机分子混入党内,从各方面来破坏党。几年来,我们在这方面是吃了不少亏的。

第三,这些同志尚简单避复杂,主要是他们自己不相信自己主张正确,怕见人,怕通不过,以为一切问题只要党员占多数,一举手万事皆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麻痹党腐化党的使党脱离群众的最好办法。首先是关起门来决定复杂的政策问

题,必然发生错误;其次是把非党干部、把群众看成任人摆弄的傀儡,必然脱离群众,引起群众的反对;再次是党和党员都会因此麻痹,失掉对于新事物的知觉,而逐渐腐朽。民主政治的好处,正在于它能够及时反映各阶级各方面的意见,使我们能够正确地细心地去考虑问题决定问题;它能够使我们从群众的表现中去测验我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否为群众所了解所拥护;它能够使我们对事物感觉灵敏,随时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它能够使我们党得到群众的监督,克服党员堕落腐化的危险,及时发现投机分子以及破坏分子而清洗出党;它能在民主政治斗争中提高党员的斗争能力,使党更加接近群众,锻炼党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总之,“以党治国”的国民党遗毒,是麻痹党、腐化党、破坏党、使党脱离群众的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反对国民党以党治国的一党专政,我们尤要反对国民党的遗毒传播到我们党内来。

三 党对政权是采取 指导与监督政策

然则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是什么呢?是指导与监督政策。这就是说,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是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这是与“以党治国”完全相反的政策。

指导与监督政策的具体运用是:

第一,党要细心地研究政策,正确地决定政策,并经过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中的党团^[6],使党决定的政策成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针。党的指导机关只有命令政府中党团和党员的权力,只有于必要时用党的名义向政府提出建议的权力,绝对没有命令政府的权力。

第二,今天在华北的抗日民主政权中,基本上保证了党的领导与优势,党的政策一般能够保证贯彻于政府的法令中,这个特点,必须认识。因此各级党部必须研究上级政府,特别是一个战略区的高级政府(如本区的联办^[7])的法令指示,并根据这些法令指示去指导同级政府党团的工作。党的责任是研究上级政令运用于本区本县的具体步骤和方式方法,及时检查执行程度,以保证上级政令之实现。所以党的各级委员会应把政府的领导,放在自己经常的议事日程中。如果发现上级政令有不妥处,或有不适合于本区本县之处,也只能经过党团提到政府讨论,由政府向上级呈报理由,党也应该把这些问题迅速反映到上级党部,设法改正。但党没有任何权力去命令政权工作同志不执行上级政令,或者自己来一套。过去某些地区,政府法令没有党的同等内容的通知,等于具文;某些党的领导同志根本不愿意研究上级政府的法令指示,甚至把上级政令故意置之高阁,单凭自己的聪明去指导同级政府工作,这等于胡行乱为!这等于叫政权工作同志犯法!必须切实纠正。上级政令中既然贯彻了党的政策,所以研究政府法令就是研究党的具体政策,不应该再等待上级党部的指示。不研究抗日民主政权的法令指示,就没有资格去指导同级政权。

第三,党要切实保证三三制。在各级参议会、行政委员会

的选举中,在各级政府行政人员的配备选拔中,必须切实经过党的指导作用,以保证三三制的比例。自流主义的选举,无计划的选拔,都不能得到应有的成果。在村选及区级干部配备中,尤须注意及此,且应切实保证村区长的人选,掌握在党员和进步分子(也可吸收一部分有正义感且能执行上级政府法令的中间分子)手中。

第四,既然三三制的实质是民主问题,党要教育与责成政权中的党团和共产党员,首先自己具有充分的民主精神,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蔼的态度,积极的工作,刻苦的作风,和政治家的风度。他们在政权工作中,要能够坚持党的政治立场,要能够团结非党干部,要能够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非党干部积极负责地工作,反对“因党而骄”。党要实现对政权指导与监督的作用,首先就要从切实指导与监督自己的党团和党员做起。

第五,既然三三制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的专政,有各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有各个不同的政见不同的立场,也就必然有政治上的争论。只要是真正地发展民主,民主政治斗争也必将大大地开展起来。民主政治斗争之开展,正是好现象,因为它可以真正表露各阶级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暴露某些党派的实质,使群众认清其面貌。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民主政治斗争的,因为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只有那种不相信党的主张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只有那种投机分子、官僚腐化分子、贪污分子,才惧怕民主政治斗争,惧怕把党的面貌放在群众面前。所以,党要有意识地去发展民主政治的斗争,首先要纠正某些同志中的武断不民主的错误,要使非党干部敢

于讲话,讲所欲言,敢于工作,不对我疑惧。做到这一步,那不仅民主政治开展有了内容,而且政府威信和工作效率都会大大提高起来。

第六,党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政权,使大家懂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不同于过去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全体人民对于抗日民主政权都应采取绝对拥护的态度。在人民中,要养成遵守抗日民主政权法令的习惯。在政权中工作的同志,要遵守政权的纪律和秩序,反对混乱现象,反对不尊重上级政权的行为。地方党、群众团体和军队的责任,是要扶植与帮助提高政权的威信,党和群众团体绝对没有捕人杀人等权力,不能对政府采取干涉的行为,军队不许把政府当作支差机关。也有这样的情形,个别地区的某些政府,不能保证接受党的领导,制定一些错误的法令,做一些违反人民利益违背统战原则的事情。现在有些区村政权就是这样。在实行民选之后,这种现象还有可能发生。在这样情形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拥护而不是反对这个抗日民主政权,但是反对它的某一项错误的法令,反对某一个坏的行政人员。而且解决这样问题的办法也要适当。有的可采取政权内部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在群众中作公开斗争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局部改组的方式,有的可采取公民罢免重新选举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有的可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总以能教育群众、纠正错误、保证党的领导为原则。在解决这些问题时,绝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当的方式,即使他是一个反革命,也必须经过民主斗争或合法手续,才能加以逮捕与处理,否则有害无益。

第七,党的指导机关要定期讨论政策,讨论法令,检查党团工作,要有专门同志管理政府党团和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党对党团的指导也应放在政治原则上,给党团以灵活运用的余地,不可涉及细微,这样才能培养党团的能力。党对政府工作同志的理论学习、个人操守和党性锻炼,必须注意,遇有错误,及时纠正。但在公开场合,必须注意培养这些同志的威信。

四 党团的运用

为了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为了统一党员在政府中的步调,在县以上的民意机关或行政机关中均应组织党团,由同级党部指定几个负责干部组成,人数以不超过七人为好,在同级党的指导与管理下(上下级党团不发生关系),执行下列任务:

第一,受领党给予的训令、命令和指示,把党的政策,党的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取得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的同意,把党的主张变成政府的主张,并使之见诸实行。

第二,善于在政治原则下,团结共事的非党干部,让他们充分理解、乐于接受、赞助和执行我们的政策主张,大大发挥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并经过他们去达到团结各阶级各抗日党派,团结大多数之目的。

第三,利用一切机会扩大党的影响,解释与阐明党的主张,高度地发挥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提高其威信,真正做到政民一致,以加强反对日寇汉奸政权的斗争。同时,不放松一切机会反对一切破坏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行为。

第四,指导在政府中工作的党员,统一党的行动。定期向

同级党部报告党团的工作,并将自己在政权工作中的经验,发生的问题,党的政策主张在群众中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反应等等,迅速反映到党的指导机关,帮助党加强对政权的指导。

为着实现上述任务,党团同志的工作方式,必须注意下列问题:

甲、要民主。各种重要问题都要经过政府正式会议讨论,一般问题也要尽量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取得大家的同意。比如当县长的同志,切不可大权在握,一切武断独断,要多找一些人商量,各科的事要经过各科去办,大胆地信任非党干部去做各种工作,而加以必要的指导和检查。

乙、要能团结人。每个党员都要接近非党员,在政治上去影响他们帮助他们,同他们一块工作,一块学习,一块讨论问题,避免过去党员与非党员格格不入的现象。特别对于中间分子士绅名流,尤为重要,过去我们同志对进步分子都团结不好,对他们更差了。我们同志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不要锋芒毕露,自以为是政治家,而要善于根据不同对象去进行政治解释工作。感情的联络也是必要的,因为这对政治上的接近是有帮助的。

丙、要坚持政治立场。遇到违反统战原则的意见或反对我党的行为,我们绝不能随声附和,也不应取缄默态度,而应根据不同对象进行解释或者出而反对。这里在方式上要讲究,一般采取诚恳的解释方法,只有对方是顽固分子或另有阴谋的人,才应加以有力的反对,并且要吸收非党干部一齐去反对。如果只是党员说话,非党员旁观,那也无异于说明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在我们提出一个意见或者一个提案时,应征求一些非

党员,不仅进步分子而且中间分子,同我们联名提出。这种方法不单可以密切与非党员的关系,而且可以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要吸收非党干部参加政策法令研究,也可以请他们起草文件,但在起草前,一定要好好讨论,确定原则后再起草,否则起草后要不得,加以全部否决,也会影响到非党干部的情绪。再者所谓坚持政治立场,并非遇事固执己见。须知我们要坚持的是政治原则,不是一切细小的技术问题,细小的技术问题如与总的方向无大损害(即使有些毛病),都是允许让步的。而且还要了解,我们自己常有考虑不周之处,非党干部常有许多正确意见,所以我们应倾听和虚心地接受他们的意见。

丁、不可经常地以党的名义提出意见,尤其不能够每个党员都代表党。只有大的事件大的问题,才用党的名义提出主张。只有党正式决定的代表才有权代表党说话,提提案,或其他党派接头。党的代表的一切言论行动更要特别慎重,他所发表的文章、演说、提案等都必须经过党委员会的审查与批准,即使来不及也应经过党团的正式讨论,事后还要报告党委员会追认。一般同志,如果他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可以一个党员的面貌进行活动;如果他是一个秘密党员,可以进步分子的面貌进行活动。

戊、为了保证党的行动一致,党团内部必须有严格的纪律。首先,对同级党委负完全责任,并接受党委的严格监督。其次,党团内部要有民主的讨论,但一经决定必须一致行动,不能有个人的自由。党团对其他负责党员(如参议会中党团对所有参议员中的党员)有指导之责,党团的决议应通知他们,他们亦必须服从党团的决议。为了求得意志统一起见,党团可召

集专门会议传达党团决定(或党委决定),进行讨论,这样更能保证行动的一致。党团对于普通党员则不必发生关系,如有意见可经过政府机关支部去解决。

己、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要反对把党团变成第二政权的错误。

庚、一切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成为工作中的模范,这是保证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之一。

五 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

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

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政府机关支部的特殊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要通过组织本机关工作人员的读书会、研究会、救亡室(民革室、救国堂)^[8]、座谈会、学术演讲会等方式,来实现这个任务。

第二,党员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团结与推动非党员积极负责地工作。对于不接近群众,喜欢出风头,自逞英雄,“因党而骄”等现象,必须在支部中不断地进行教育,不断地进行批评

斗争。

第三,党员在政权中要奉公守法,遵守纪律。如果发生党员有犯法舞弊等行为,除了行政上应依法惩治外,党内还应给以处分。

第四,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但支部要在群众中了解群众的问题、群众的意见和舆论,以及党员非党员的表现,及时通知党团和报告党委注意。支部有权检查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部门的工作。

第五,支部直属于由党委指定的部门管理,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党团的决议凡涉及应动员全支部党员执行时,应通知支部,支部亦必须执行。同时支部对党团、党团对支部均有互相建议之权。为工作上的便利,党团应有一同志与支部发生经常关系,以求密切地配合一致。

第六,支部的组织是绝对秘密的,不得以支部名义进行活动。

第七,支部定期向上级党部做报告,并接受其指示。

六 加强民主教育

随着民主政治的开展,民主教育比任何时候还要迫切,无论在党内或在群众中,过去这点都是极其不够的。

实际的政治斗争,是党员和群众的最好锻炼。我们除在学校中、民革室中、训练班中,应注意民主政治的教育外,对每一个民主运动都要精细地布置,不可丝毫草率,要使之完全符合民主政治的要求,真正动员起广大民众来参加,动员起全党来

领导。如此,才会使运动本身收到效果,也才能教育党教育群众。

最近北方局向联办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9],已经联办通过。这是一个重大的民主运动。今年的村选,明年的县选,全边区大选,都一步步地临到我们面前。而在我们各种工作中,哪一件事里面都有民主问题。我党要善于在一切工作中,一切运动中,大大发扬大众的民主主义作风,与一切不民主的现象作斗争。有了民主主义作风,才有广大的群众运动;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10]的党。

我们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保证党对政权的领导,我们更要在民主政治斗争中,使党成为群众的党!

一二九师文化工作的 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一九四一年五月)

我讲三个问题。

一、文化工作服从于政治任务。

无论哪一种势力或哪一种派别的文化工作 ,都是服从其政治任务的。

今天的中国 ,不管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 ,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势力 ,即抗战民主派 ,日寇、汉奸、亲日派 ,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这三种势力的斗争 ,也尖锐地表现在文化领域。各种势力的文化工作都是与其政治任务密切联系着的 ,所谓超政治的文化是不存在的。

(一)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派的政治目的是要把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其文化工作方针是施行奴化政策 ,以奴化活动和奴化教育来腐蚀我们的民族意识 ,消灭民族爱国思想 ,摧残民族气节。他们毁灭中国的文化机关 ,焚毁中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全师模范宣传队初赛会上的报告要点。报告原文刊载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六日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出版的《抗日战场》第二十六期。

国的民族典籍,屠杀与监禁爱国的文化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建立汉奸文化机关,豢养一批汉奸文人,鼓吹东洋文化,灌输“中日亲善”、“共存共荣”、“东亚新秩序”^[11]等奴化思想,培养奴化人才。他们提倡旧文化、旧道德、旧制度,提倡复古、迷信、盲从、落后,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等,以实施其诲淫诲盗、毒化奴化政策。他们还制造谣诼流言,散布失败情绪,推行怀柔政策,破坏我抗战法令,妄图摧毁我抗日根据地。

敌人文化侵略的方法是多样的,其特点是善于迎合落后群众与农民的心理,善于以数量掩盖其质量上的(即政治上的)基本弱点,善于不厌其烦地重复宣传某几个中心口号,善于利用时机,抓住某些具体问题来进行欺骗宣传。我们应足够估计其危险性和毒辣性,与敌展开激烈的思想战是今天的严重任务。

(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共顽固派,在政治上具有抗日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在文化上鼓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反共顽固派对外奴颜婢膝,投降妥协,对内搞封建主义。他们提倡旧思想、旧制度、旧道德,主张尊孔、复古,保存“国粹”,读经救国。压制新文化运动,摧残新文化事业,封闭进步书店,禁售进步书籍报刊,压制抗日言论,镇压与取缔人民的反帝运动。宣传反共,排除异己,反对进步,鼓励倒退。组织封建迷信团体,破坏抗日军队、抗日政府和抗日根据地。颂扬独裁政治,反对民主政治,宣传“安分守纪”、“严守国法”,使人民任其宰割。

这种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旧文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政策起了帮助的作用,对民族前途危害至大,我们是坚决反对

的。

(三)抗战民主派,在政治上主张团结抗战到底,彻底解放中华民族,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在文化上主张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解放的文化。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呢?洛甫^[12]同志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

“民族的,即抗日第一,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

“民主的,即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反压迫人民自由的思想习惯与制度,主张民主自由、民主政治、民主生活与民主作风的文化;

“科学的,即反对武断、迷信、愚昧、无知,拥护科学真理,把真理当作自己实践的指南,提倡真能把握真理的科学与科学的思想,养成科学的生活与科学的工作方法的文化;

“大众的,即反对拥护少数特权者压迫剥削大多数人、愚弄欺骗大多数人、使大多数人永远陷于黑暗与痛苦的贵族的特权者的文化,而主张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大众的、平民的文化,主张文化为大众所有,主张文化普及于大众而又提高大众。”^[13]

我们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传播者与实行者。我们坚决反对殖民地文化,反对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而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的服务。

二、本师文化工作的方针、任务及其努力方向。

部队的文化工作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政治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总政治部颁布的《政治工作条例

(草案)》^[14]中指出的：“在抗日战争中，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求得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团结友军，瓦解敌军，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同时也是文化工作的方针和任务。其具体内容应该是：

(一)加强对敌的文化斗争，展开激烈的思想战。要经常地了解与研究敌人，及时地不懈地驳斥敌人，开展我们的政治攻势。

(二)加强民族的爱国的宣传教育。无论对本军、友军，根据地 and 敌占区的人民，以及伪军，都需要灌输以民族的爱的思想，提高其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随时给敌人的奴化政策以有效的打击。更要激励民族气节，反对动摇变节，提高对敌斗争的勇气，树立必胜信念。

(三)积极会同地方党组织、政权机关、群众团体及地方文化机关，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解释抗战法令，推行民主政治；向敌占区人民宣传根据地的一切善政和进步设施。

(四)提倡科学，宣扬真理，反对愚昧无知、迷信落后，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这不管对人民群众或部队，都是同等重要的。尤其需要加强部队的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使科学为指战员所掌握，创造现代化的正规兵团。

(五)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要帮助地方文化教育工作的推行；要启发指战员对文化宣传工作的热忱，使其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宣传教育部门应协同统战部门，进行文化统一战线工作。

(六)必须用一切办法和尽一切可能供给友军以文化食粮

即书报和宣传品,考究输送的技巧。设法组织互相参观互相观摩,融洽与友军的感情,扩大交朋友工作。

(七)大大地加强对外宣传工作。要通过文艺作品、报告文学、新闻通讯、摄影、绘画等,把我们真实的战斗生活反映到国际上去,流传到华侨中去,传播到大后方去。

抗战以来,由于部队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使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向上提高了一步,也为文化艺术工作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但是,在进行中尚有不足的地方,这是在工作发展中所难免的。发现缺点是改进的开端。这些缺点表现为:

(一)“既少作高深的研究,又未深入群众底层”,《新华日报》华北版^[15]五月三日社论中的这两句话,正是我们文化工作缺点之写照。我们文化工作在高深的研究上是很不够的,但在深入底层,为大众所接受所把握这方面,又何尝够了呢?这具体表现在对人民群众的文化宣传工作的薄弱,以及连队救亡室^[8]工作和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这是每个文化工作者都应注意的。我们要求把普及与深造结合起来。

(二)宣传内容不善于迅速地反映和宣传某一个紧急任务,不善于很及时地批驳敌人。比如演戏,一般是反映过去的事,这就不能使我们的文化宣传工作与当前形势配合起来,成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为了及时,虽然我们有的作品在某些地方难免有些粗糙,但在宣传效果上来说是有意义的。

(三)某些作品缺乏丰满的现实内容和生动的艺术性,缺乏强烈的政治性,有的甚至与政治原则还有抵触之处,起了不好的作用。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

遽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采用旧形式反映新内容的方法也是必要的,因旧形式在民间具有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深为群众所喜爱,且其本身亦有可利用的价值。但采用旧形式必须以表现现实内容为主,方法则应是批判的有选择的利用。

(四)对文化工作者的创造性发挥得不够,同时对后起的文化工作者的培养工作也做得不够,致使今天部队有文化干部荒的现象,使连队文化宣传工作受到影响。

(五)对外宣传工作显得极微弱,“打哑巴仗”的现象严重存在,经常用各种方法对外宣传我们的战斗生活大为不够。我们虽设有随军记者,但由于大部分记者兼管编辑,以致影响了新闻采访工作。政治机关对此项工作具体指导不够,也是对外宣传工作削弱的一个原因。今后随军记者、旅的文艺组及政治机关,应加紧弥补对外宣传工作的缺陷,全师同志都应一致为加强这项工作而努力。

造成这些缺点的原因主要是:各级政治机关对文化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特点认识得不够,对文化工作的指导做得不充分。某些地方对文化工作者的工作条件注意得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吸收知识分子的工作也做得不够。文化工作者不够群众化,尚缺乏部队工作和群众工作的经验,致使文化工作被限制于狭隘的范围中,不能为大众所掌握。

今后部队文化工作应该怎样做,我没有很好地研究,只提几点意见:

(一)要同一切轻视文化工作的倾向作斗争,并应克服文

化工作不大众化的现象。要经常鼓励文化工作者的工作热忱,大大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文化运动普及到连队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真正做到大众化。

(二)要造就大批的青年文化工作者,同时要提高原有文化工作者的素养。加强他们在文艺方面的修养和政治学习,给以必需的可能的工作条件,帮助他们渗透到现实的底层里去,更充分地发挥其才干,使他们能够真正担负起部队文化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三)文化工作者要不断增强自己在政治、文艺方面的修养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以提高自己,充实自己。应深切了解:只有提高政治素养,才能提高对文化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丰满的现实性之艺术品,才能有高度的艺术价值。作品要反映部队和根据地的现实,适合于现实的需要,就要既提高创作水准,又深入大众。提高自己,向大众普及文化,需要政治与文化的密切结合。

(四)文化工作者要具有虚心学习、认真探讨的态度。要将自己的作品就教于大众,倾听大众的意见。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想学到一些东西,就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互相探讨是集思广益的好办法,一个作品经过大家研究和讨论,是会更臻完善、收效更大和不易发生毛病的。能接受别人意见,才能使自己进步。我们现有的文化工作者,一般说工作还仅仅入门,只有虚心学习,将来才会有伟大的成就。

三、关于宣传队工作。

宣传队是部队文化工作的基本队伍。努力提高自己的努力

追求深造,努力做文化普及工作,都是万分必要的。要使宣传员成为文化教育的得力干部,使宣传队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锋队。

宣传队是培养干部的学校。不仅要培养文化工作的干部,还要培养政治工作的干部。在调动或提升宣传队的干部时,领导机关要照顾到宣传队的工作,切忌调之一空。宣传队的负责同志也要舍得让干部出去发展。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着眼。

今后,宣传队在政治机关的宣传教育部门领导下要完成以下任务:

(一)组织部队的文化娱乐工作,帮助政治机关检查连队政治工作,帮助宣传教育部门检查连队宣教工作。要面向连队,深入连队,了解连队,加强实际工作的锻炼。

(二)要进行战时宣传鼓动工作,在任何情况下都应不间断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

(三)要推动并帮助连队不间断地进行对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要与地方文化工作者、小学教员等取得密切联系,建立广泛的文化统一战线,推动与帮助地方的文化运动。

(五)要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文化水准,提高工作技能,不断增进新的知识。

庆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

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党,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的伯承^[16]同志不但具备了这些品质,而且把他的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在三十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记了个人的生死荣辱和健康,没有一天停止过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担任着最艰苦最危险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万难,完成自己的任务。他为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负伤达九处之多。他除了国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为党的事业而努力,简直忘记了一切。在整个革命过程中,他树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我同伯承同志认识,是在一九三一年,那时我们都在江西中央苏区^[17]。后来都参加了长征^[18]。而我们共事,是在抗战以后。五年来,我们生活在一块,工作在一块。我们之间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关系是非常协调的。我们偶然也有争论,但从来没有哪个固执己见,哪个意见比较对,就一致地做去。我们每每听到某些同志对上下、对同级发生意气之争,遇事总以为自己对,人家不对,总想压倒别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

* 本文刊载于《新华日报》华北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特刊》。

雄,充“山大王”,结果弄出错误,害党误事。假如这些同志一切从国家、人民和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荣誉地位出发,那又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断地以这样的精神去说服与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对于自己的使命,是兢兢业业以求实现的。过去的事情不用谈它,单以最近五年来说,奉命坚持敌后抗战,遵行三民主义^[19]、抗战建国纲领^[20]和党的政策,未尝逾越一步。他对于上级命令和指示,从未粗枝大叶,总是读了又读,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适应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而加以实现,在实行中,且时时注意着检查,务使贯彻到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导同志的口语。

伯承同志热爱我们的同胞,每闻敌人奸掳烧杀的罪行,必愤慨形于颜色;听到敌人拉壮丁,便马上写出保护壮丁的指示;听到敌人抢粮食,马上就考虑保护民食的办法;听到敌人烧房子,马上提倡挖窑洞,解决人民居住问题;听到了有同志不关心群众的利益,便马上打电话或电报加以责备。还是不久前的事情吧,他看到村外的道路被水冲坏了,行人把麦地变成了道路,他便马上督促把路修好,麦地得到了保全。这类的事情,在他身上是太多了。他不仅率领着自己的部队,从大小数千次的血战中,来保护我们国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体现着共产党员热爱国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热爱自己的同志,对干部总是循循善诱,谆谆教诲,期其进步。他同同志谈话的时间很多,甚至发现同志写了一个错字,也要帮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转变和发展的干

部 ,何止千万。

伯承同志是勤读不厌的模范。他不特重视理论的研究 ,尤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他常常指导同志向下层向群众去学习 ,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 ,这些不过是其中的一枝一叶。他的模范作用 ,他的道德修养 ,他的伟大贡献 ,是不可能短文中一一加以介绍的。

假如有人问 ,伯承同志有无缺点呢 ?我想只有一个 ,就是他除了读书工作之外 ,没有一点娱乐的生活。他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 ,他不会下棋打球 ,闲时只有散散步 ,谈谈天。他常常批评自己 ,对于时间太“ 势利 ”了。难道这真是他的缺点吗 ?这只能说是同志们对他的健康的关怀罢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寿辰的时候 ,我祝福他健康 ,祝福我们共同努力的事业胜利 !

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们的对敌斗争

五年来,我们同敌人在华北进行一天比一天尖锐、严重的斗争,大致可以分作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敌人前进,实行正面进攻,在华北兵力较少,经验缺乏,更对我党我军估计不足,给了我们从对敌斗争中创立抗日根据地以非常优良的条件。此期我们充分利用了敌人的弱点,打开了局面。当华北中央大军南撤的时候,我党我军即提出了“坚持华北抗战,八路军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基本口号,确定了坚持敌后斗争的基本方针。这一阶段的对敌斗争,是环绕在打开局面,创造根据地与求得大发展的任务之上。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一九三七年我们先以一部在同蒲路北段作战,如在阳明堡火烧飞机^[21],随即全部沿正太线^[22]作战,如七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第一部分的第二、四两节,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五期。

亘村、黄崖底、广阳战斗^[23],都是在敌侧背配合正面友军防御作战;只有在太原失守之后,才是本师单独作战,如在正太路粉碎敌人六路围攻^[24]。一九三八年进行了三次反“扫荡”作战,其中尤以敌人调兵会攻徐州之前九路围攻^[25]晋东南之被粉碎为最激烈,我大部分力量使用于邯长大道的伏击作战^[26],打退了黎涉沿线敌人,光复了长治地区,伸向道清路^[27]活动,扩大了我们的影响,形成了晋东南根据地的局面;同时于一九三七年末,即对冀南派出东进小支队,作侦察式的活动,一九三八年春夏正式进入冀南,形成了冀南根据地的局面;当徐州、武汉会战^[28]之际,我们组织了平汉线津浦线的破击作战,尤以在平汉线的十余次大破击,给了正面的国军以很大的助力。

在政治上,我们的“坚持华北抗战”的方针,打击了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方针。我们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爪牙,打坍了晋东南、冀南广大地区的维持会^[29]及为敌利用的封建组织,如会门^[30]、自卫团、联庄会^[31]等,建立了广大地区的抗日政府;消灭了六七万皇协军^[32]及伪化了的土匪会门等封建武装,普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发展了正规军数倍;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抗日宣传和民族教育,激发了人民的抗日积极性,打击了敌人“招回流亡,恢复治安”的欺骗人民的诡计;游击队不断地在铁路两侧的活动,相当程度上打击了敌人的护路计划。

在经济上,我们尚无何种设施,亦未引起注意;敌人则有相当成就,但在广大乡村被我控制的条件之下,敌人未能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我们军事政治斗争的结果 ,把敌人束缚于点线之内。这是我们的大发展时期。

第二阶段 ,敌人回师华北 ,实行“治安肃正”计划^[33] ,华北斗争局面开始严重。此期我们的方针是“巩固华北 ,发展华中”^[34]。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

在军事上 ,我们进行了十次反“扫荡”作战。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区进行了敌人打通邯长公路及我们收复邯长大道的斗争 ;一九四 年则由我们主动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破击交通线斗争 ,以打击敌人的“囚笼政策”^[35] ,其最大者为冀南全年的破击交通线斗争 ,五月白晋战役^[36] ,特别是由八月二十日开始直至年底的百团大战^[37] ,破坏了敌人进攻重庆、昆明、西安的计划。一九四 年全年之激烈战争的结果 ,敌我双方均有相当的削弱 ,敌人伤亡较我更大(九与七之比)。

在政治上 ,根据地日趋巩固。一九三九年我党我军仍有相当发展 ,群众有相当发动 ,抗日政权初具规模。而一九四 年夏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7]的成立 ,在统一本战略区强化根据地建设上 ,特别在对敌斗争上 ,有其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阶段 ,我们几乎有一半时间处在寇奸夹击的困难局面当中 ,一方面顽固派进行蛮横的破坏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另一方面敌人则抓住机会挑拨国共关系 ,积极配合顽固派向我们进攻。一九三九年冀南、太行、太岳处在非常严重的局面。直至一九四 年初 ,由于我党政策的正确 ,北方局和朱德、彭德怀英明的直接领导 ,人民的拥护 ,以及军事斗争的胜利 ,才打开了局面 ,既巩固了根据地 ,又巩固了国内的团结 ,打击了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诡计。

在经济上,一九三九年我们仍然是忽视的,民生凋敝,军队供给极端困难,在敌占区只有需索而无工作,故征集资财亦无成绩,这是我们(主要是太行区)最穷困时期。一九四〇年我们才开始注意经济问题,在根据地注意生产和节约民力,在敌占区反对“把敌占区变为殖民地”的观点(结果又形成了完全不到敌占区工作的偏向),根据地民众才缓过气来。同时,一九三九年发行了冀南钞票^[38],加强了经济斗争力量,军需才有了保障。但在此期间对敌经济斗争的成效,则甚为微弱。

在反特务斗争上,我们只作了些防御工作,故敌人的特务政策仍有相当成就。

此一阶段,在巩固根据地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成绩,但忽视了敌占区工作,虽曾屡次提出纠正,转变很少。一九三九年在敌占区的需索政策,给了敌占区人民以很坏的影响,大大损害了我们的政治声望;一九四〇年的不到敌占区,没有挽救这个损失,这恰恰给了敌人以巩固占领区、扩大占领区的很大便利。而一九四〇年讨逆战争^[39]后的冀南,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政变^[40]前后的晋东南,都产生了政策上“左”的错误,既损害了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又帮助了敌人扩大其社会基础。一九四〇年四月黎城会议^[41],克服了混乱,强调了巩固根据地的建党、建军、建政三大方针,有其明显的成绩,基本上是成功的。但在部分问题上亦有其片面性的缺点和错误,如对根据地的群众工作及敌占区工作重视不够,对游击战争的分量估计不够,过分强调了正规军,编并地方武装,结果更便利了敌人的前进和造成了我们的退缩。这一阶段斗争的结果,我们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开始建设根据地。但

敌人亦有其相当的成就,这是与我们忽视了敌占区的政治工作和一些政策错误有关的。

第三阶段,敌人实行“治安强化”运动^[42],我们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双方都走向深入,斗争进入空前尖锐化的阶段。其在本区的表现为:

在军事上,我们进行了十九次大的反“扫荡”作战和五百一十五次反小“扫荡”与袭扰,两年作战达七千九百七十六次之多;我们于一九四一年初即强调了军区建设工作,纠正了对地方武装的编并与放任的错误,县区基干队建立与逐渐健全了,不少正规兵团地方化了。人民武装主要是民兵的建设,打下了群众性游击战争的基础,两年来有了相当的规模和战斗能力,开始起了很大的作用。游击集团的组成上亦有进步。这些都大大地增强了保护根据地的力量。一九四一年开始注意向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但各地对此了解较差,收效不大。一九四二年成立武装工作队,认真地注意了面向敌占区面向交通线,提出与加强格子网^[43]内的斗争,特别是北方局、军分会^[44]提出反蚕食斗争之后,收效很大。所以一九四二年五月以前,根据地还始终是退缩的,五月以后则完全改观。抗日政府的负担面在太行区有了相当的扩大;冀南则在根据地变质^[45]的条件下,顺利地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太岳亦有不少成绩,并开辟了岳南和中条山的局面。惟在某些区域,向敌占区发展的注意力仍嫌不够。

在政治上,一九四一年底北方局指示了一套明确的政策,一九四一年成立了临时参议会^[9]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46],抗日根据地各方面的建设有了显著的进步;惟一九四一年对

于发动与组织群众的工作,仍在忽视之列,所以民主建设等工作,还是架在云端之上而无确实的成就。对敌占区和敌占优势的游击区,北方局提出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开始某些地区不懂得这个政策的进攻性,反变成了主动的退缩,帮助了敌人的蚕食,纠正后获得了不少的成功,冀南对伪军的工作成绩尤大。在反对敌人的蚕食斗争,反对敌人的特务政策,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等方面,一九四一年没有多大成绩,一九四二年则各地都有大的进步。我们采取了“敌进我进”的方针,创立了少数格子网内的隐蔽游击根据地,无论太行、太岳和冀南,在这方面都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在经济上,我们在一九四一年即已提出加强对敌经济斗争,因在摸索之中,未获多少成就,冀钞对伪钞比值甚低,物价高涨即其一例。一九四二年则一改旧观,太行区不仅在根据地建设上有不少成绩,而且在对敌占区经济斗争上,也创造出一些经验,获得了初步的较大的胜利。不过冀南、太岳在经济斗争上仍然无力,敌人收获亦大,应加注意。此问题将有专门报告,勿庸多述。

在反特务斗争上,一九四一年前,对敌人破坏根据地千奇百怪的特务活动警惕不够,直至黎城离卦道暴动^[47]、柴关暴动^[48]的惊人事件发生后,才略有注意,但对敌人之毒辣性一般均认识不够深刻,虽群众运动发展之后有些进步,但至今仍是我们应该大声疾呼的事情。

在文化宣传上,我们曾于一九四一年进行了对敌三次政治攻势,在敌占区作了广泛的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在打击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振奋人民抗日情绪上,起了不小作用。一

九四二年继续进行了三次政治攻势,配合以游击活动,在某些地方曾结合敌占区民众反对捕壮丁、反对配给的斗争,而以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一次为最成功。这是因为过去几次政治攻势,一般只作了一些宣传工作,而反第五次“治安强化”的攻势则主动地抓住了反对敌人抢夺粮食斗争这个中心,组织了真正的一元化斗争,多支的小武装部队作了有力的行动,再配合以恰当的反汉奸、反维持、反特务的斗争和宣传鼓动工作,故成绩甚大。但必须指出:过去的政治攻势,也可以说五年来,我们都一般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照目前情形看来,在太平洋战争^[49]爆发之后,经过了几次政治攻势和一九四二年的敌占区工作的前进,敌占区的状况与过去大大不同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大大地扩大了,人民都认识日本必败了,这就打下了我们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基础。可是过去我们是不可容许地忽视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今后则是我们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总起来看,在敌人五次“治安强化”的阶段中,前三次都未引起我们的警觉,麻痹的结果,敌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两次特别是第五次,我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敌人虽仍有其相当成就,但未取得更大的效果,而我们则获得了很大的胜利。

以上就是我们对敌斗争的概述。

小 结

在五年来敌我斗争及其所引起的变化中,我们看到了些什么呢?

一、敌我双方都有强的指导能力,都有政治上的锐敏性。我们善于总结经验,研究敌人,提出对策。敌人也善于研究我们,接受经验,不断改进其方针政策。所以敌我斗争不仅是军事力量的竞赛,而且是全副本领的斗争;不仅斗力,更主要是斗智。今天敌我双方都进入有计划有组织的斗争阶段,这说明了今后的斗争将更加巧妙而尖锐。我们在此复杂斗争中,下层干部能力甚嫌不够,今后应切实注意加强下层,提高下级对敌斗争的能力。

二、在对敌斗争中,要掌握住持久战与敌强我弱的特点。所以我们的原则应是削弱敌人,保存自己,隐蔽积蓄力量,准备反攻。过去我们对此原则认识不够,常常发生暴露自己的错误,每次暴露的结果,都遭到敌人的报复或破坏,吃亏很大。今后在一切方面都要注意不暴露,善于隐蔽地从各方面积蓄力量,要使敌人看不起我们,要善于采取一切方式去麻痹敌人。惟有如此,才能积蓄起力量,也才能打到敌人的痛处。敌人也很注意隐蔽问题,如敌一一师团的文件即曾提出“不震荡敌人,不刺激敌人,突然的跃进”的策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而收到了效果(如每次“扫荡”、蚕食前的准备),故我们一方面要隐蔽自己,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敌人。

三、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人民即使反对敌人而对我中立,也只是便利了敌人。所以我们要正确的政策,不仅根据地的政策要正确,尤应在敌占区、游击区要有一套明确的政策,否则发生错误,易为敌所乘,而敌人则恰恰善于利用我们的弱点以弥补其在中日矛盾中的基本弱点。经验证明:过去有一时期因为我们政策错误,

敌占区人民对我采取中立乃至反对态度,给了敌人以很大发展。经验又证明:敌占区工作不开展,根据地也要退缩;游击区不能坚持,不仅根据地要退缩,而且失却了向敌占区前进的有利阵地。经验还证明:在敌占区、游击区采取简单生硬的办法,是必然失败的,而必须照顾那里的环境,一切为保护人民利益打算,提出恰当的对敌斗争方法,才会得到人民拥护,也才能取得胜利。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

四、无论在根据地或敌占区、游击区,一切政策、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必须紧紧掌握住扩大中日矛盾的原则。这正打到敌人的痛处。现在敌占区开始起了有利于我的巨大变化,其基本表现就是人民抗日情绪大大增长,敌伪矛盾发展。我们应好好抓住这个基本特点去发展工作,掌握中日矛盾的实质,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一切抗日人民对敌斗争。经验证明:在敌占区不应该去扩大中国人自己的阶级矛盾,基本是团结一切中国人对敌。能如此我们便能开展敌占区工作,反之我们便不能在敌占区立足。经验又证明:团结中国人对敌,也包含有斗争。斗争的内容,主要是反对那些不明大义、破坏团结、帮助敌人、自私自利的个别分子,而斗争方式也应是和平的、政治的。只有对于那种死心事故、为人民所痛恨的汉奸、特务分子,才采取坚决打击的方式。在根据地亦应切实注意巩固团结问题,比如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50]的执行,是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打下统一战线的坚实基础,发挥其更伟大的抗日力量,这是完全必需的;但是在发动群众中,必须

把它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这仍是今后应该注意的。坚持根据地,需要广大的基本群众的发动,同样地也需要各阶层的团结,忽视了任何一面,都将发生错误而有利于敌人。

五、建设根据地(包括武装、政权、群众和党的建设)与对敌斗争,具有不可分离的联系性。经验证明:没有根据地,就不能坚持对敌斗争;没有对敌斗争,企图关门建设根据地,也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存在。今后要更加加强爱护根据地的观念,努力建设根据地,进行顽强的保护根据地的斗争;同样要在敌占区组织强有力的斗争,以保护根据地。

六、敌我斗争形势是敌进我进。敌人一定要向我们前进,所以我们也一定要向敌人前进,才能破坏或阻滞敌人的前进,巩固我们的阵地。敌进我进的结果,华北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地增加,敌占区的游击性也将不断地增加。在此犬牙交错的复杂斗争中,要求我们细心地了解敌人,善于发现敌人的规律,善于利用缝隙钻敌人的空子,以争取主动。敌人“扫荡”这一区域时,其他区域即应利用空隙展开对敌斗争,被“扫荡”区域亦应组织腹地坚持与外线活动相配合的反“扫荡”斗争,以取得主动。“敌进我进”的斗争,也表现于隐蔽斗争上,敌人伸入根据地的特务活动,和我伸入敌占区、伪军伪组织内隐蔽积蓄力量的斗争,也将是日益发展日益激烈的。总之,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应是今后非常注意的问题。

七、我们作战的指导原则,是基本的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于我们过去对这个原则认识不够,强调了正规军的建设,而在相当期间对地方武装与人民武装的建设重视不够,对地方武装发生了编并和放任两方面的错误,所以

影响对敌斗争甚大。这也是对战争的长期性和敌强我弱的特点了解不够所致。今后(在反攻之前)根据地的游击性将不断增大,运动战在平原已无可能,在山地也可能缩到很小限度,所以应发展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这方面一九四二年已获相当成绩,此后还应加强其指导。对于武装的爱护和党员干部的军事化,亦应切实注意。

八、敌人对我实行“总力战”^[51],我们对敌亦提出了“一元化”的斗争。过去经验证明:一元化实行得好的地方,对敌斗争才有力量;如果内部磨擦,互相埋怨,结果只会放松或放任对敌斗争,遭受很大的损失。今后应根据中央对敌后根据地统一组织机构的决定^[52],认真实行一元化,从组织上保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敌占区的领导与各种工作的密切结合。领导要统一,步调要一致,以加强对敌斗争。

九、过去我们同志一般有坚持敌后抗战与取得胜利的明确观念,而尚未树立起巩固战后在华北阵地的明确观念。这从几年来忽视敌占区工作,可以证明。而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就着眼到打入伪军伪组织长期埋伏准备战后的问题,故先我取得先机,已有不小成就;我们则在战略上大大失算,需要从今后的努力来补救。我们同志对于我们在敌后斗争的一举一动都可以影响全国这种政治意义认识不够,所以往往缺乏全局观念,在言论行动上,政策决定上,都还有不慎重的地方,对中央的方针,还缺乏深刻的了解。这些就是中央指摘的闹独立性、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我们的责任,显然不仅是争取抗战胜利,而且是以建设根据地、坚持敌后对敌斗争去示范全国、影响全国,争取战后团结建国。我们一切政策行动都应不仅照顾

到根据地本身,而且要照顾到对全国的影响。这个观念应在干部中特别在领导干部中树立起来。

十、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方局和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对于敌后坚持的原则,历来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指示。我们基本上执行了这些方针和指示,所以我们有几年来的成绩。但一到我们对中央和上级指示了解不够的时候,就要发生错误,如对游击战争的认识不够,对敌占区工作的忽视,影响很大,损失不小。这教训我们:每一个干部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于党中央和上级的指示,必须精细地研究,并使之适用于自己的工作环境。这将成为今后克服严重困难,取得抗战胜利与战后建国的重要保障。

敌占区的组织工作 与政策运用^{*}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是“打入”工作,是在敌占区建立党和群众组织的基础,是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发展革命工作,是革命两面政策的正确运用。

没有组织工作,就不能在敌占区、伪军伪组织的内部去积蓄力量,去起发酵作用,去打下我们的组织基础。过去,党曾屡次提出这个问题,但在实际工作上,我们不但远远不及国民党努力,严格说来,简直还没有真正开始。

过去,我们某些部门也曾做了一些尝试,个别的是收到效果的,但大多数是失败的。我们曾抽调一部分干部派到敌占区,企图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去,但因为派出的干部多与当地的工作对象缺乏一定的联系,始终得不出一个结果来。我们一般不善于从广大的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内部去物色打入人才,不善于争取敌占区的知识分子、开明进步人士去实现打入工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报告第三部分的要点。报告原文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五期。

作,不善于争取伪军伪组织内部的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变为我们的打入干部,不了解只有他们才与敌占区或伪军伪组织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他们才具备打入工作的现实条件。实际上这样的机会过去是不少的,问题是我们轻易地放过了。在伪军伪组织中,有一些是可以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个别的已经成为革命两面派。试问,我们除了对他们作些宣传,发生联系,取得情报之外,又做了多少工作,使其进步,成为打入生根的组织力量呢?甚至有某些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们自己工作的混乱,不守秘密,而遭受敌人的破坏,这更是痛心的事。由于主观主义的作法、关门主义的狭隘作风和相当满足于现状的观点,使我们的敌占区工作始终停留在宣传阶段,所谓组织工作至今还只是口号。反观国民党,从抗战开始,它就着眼于在敌占区积蓄力量,着眼于战后优势,努力争取伪军伪组织,派人打入、长期埋伏,在敌占区建立它的党和特务组织,依靠封建势力为基础,以掌握各种封建组织乃至帮会、土匪,其成绩是不可轻视的。我们对此,能不警惕!

时间不容许我们再稽延了。为反攻及战后作准备,要求我们加紧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以紧张的缜密的工作,打下反攻和战后的基础。

今天我们在敌占区虽仍处于劣势,但是敌占区一年来的变化具备着空前有利于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条件:敌占区人民同日寇的矛盾空前增长,今后还会日益加剧,人民抗日情绪增长,大大地扩大了我们进行组织工作的社会基础;我党我军及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的威信大大提高,而且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已有不少的进行组织工作的线索;伪军伪组织人员

一般是华北人,有身家顾虑,且已逐渐相信华北是与八路军共产党不能分离的;国民党威信在逐渐下降(这是它的特务政策和在敌后破坏抗日工作的结果),其组织基础也有了部分削弱。

但是我们也有困难:敌人的特务方法高明,对伪军伪组织的掌握将会特别加强,对敌占区的控制政策将会加紧;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和借刀杀人政策,必将是我们日常工作中接触到的障碍;我们本身缺乏在敌占区进行组织工作的经验,关门主义宗派主义的狭隘作风影响到工作的开展,特别是干部掌握政策的能力还差,缺乏秘密工作的经验和常识。

我们要利用有利的环境,尤其要注意克服困难,主要是克服自己方面的困难,并从工作中创造许多宝贵的经验。

现在说几个具体问题。

一、打入工作。

打入工作是组织工作的第一个问题,是开门见山的问题,不能打入就谈不到一切。

打入的对象是很广泛的,打入到敌占区群众中去,打入到敌占城市中去,打入到伪军伪组织中去,打入到黑团、帮会、土匪中去,打入到一切组织中去,而伪军应该是目前打入的主要对象。

打入工作的任务是:长期埋伏,进行隐蔽的、巧妙的、谨慎的宣传组织工作,积蓄力量,提高自己和革命者、抗日分子的地位,以待时机,配合反攻,适应革命的需要。因此必须善于掌握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善于进行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至于供给情报,应该是次要的,只能在不妨碍其基本任务

与秘密条件下才可以去做,或只供给带紧急性的特殊重要性的情报。尤其不可要求他们购买物资或向他们需索,以免易于暴露。

打入者的人选应是多方面的,或由根据地物色派去,或由敌占区物色人员,特别是知识分子和进步的士绅名流,或由现有伪军伪组织的关系中争取转变为革命两面派分子,而以后两者为主。打入的干部应多,尤要注意派精干人选透入其内部去发展组织。只要我们能够从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去找干部,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从根据地找出一批干部来派到敌占区去工作也是必要的,但派出者必须是与敌占区有关系有打入条件的同志,否则作用不大。同时,我们必须抽调一些有敌占区工作经验或条件的同志加强敌占区工作部门,担负训练联络等工作。

对打入人员的训练是很重要的,训练时间要短,内容要简单,任务要明确而不复杂。训练要采取座谈讨论的方法,启发他们尽量提出问题,然后给以明确的解答,切忌党八股^[53]的灌输的方式,有的则只能采取个别谈话的方法。

派出之后,必须保持经常的联系(但不是随便来往),帮助其解决打入的困难,如活动费的可能帮助,方法上的指导等,此时要预防其遇难而退的心理,鼓励其打入的决心。打入之后,尤要加强政治联络工作,随时帮助其解决工作中的困难,使其了解政治形势,勿使迷失方向而趋堕落腐化。

打入工作是一个巨大的耐心的组织工作,过去经验是很少的,必须在今后努力中,创造经验,积累经验,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二、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

革命两面政策的问题,一九四一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在敌我交锋的斗争中,经常要发生区域的变化,敌占区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也可能变为游击区乃至敌占区,所以我们在指导上,不仅要着眼于有利时的进攻,而且要着眼于不利时的退却,但是无论进攻或退却,都应该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这样才能巩固与坚持阵地,否则必然引起混乱。

其次,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也是不正确的。因此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着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

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 ,配合反攻或反正。

第三 ,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 ,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 ,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 ,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 ,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 ,同样 ,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 ,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这里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两面派的特点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 ,而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 ,保护人民利益 ,准备反攻 ,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 ,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应以这样的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 ,谁是两面派 ,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我们许多同志不懂得这种区别 ,所以以利用两面派为满足 ,而忽视了革命两面派的建立。因此必须确定 ,革命两面政策以及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 ,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 ,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 ,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 ,否则 ,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 ,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以上三项是谈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问题 ,下面谈它的运用问题。在运用上又要分别两种不同的范围 :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 ;一是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 ,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先说革命两面政策在伪军、上层伪政权中及半伪化的封建组织封建武装中的运用 :

第一,充分利用与掌握日伪矛盾及伪军伪组织内部的矛盾,是其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应主动地扩大日伪矛盾,抓住每一个矛盾的缝隙,乘机发展自己的工作。

第二,广泛开展交朋友工作,取得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的信任,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增加自己的活动条件。但在交朋友中要注意适合自己的身份,不可因此引起他人的嫉妒和猜疑。

第三,利用自己的地位,以非常隐蔽和巧妙的方法,进行宣传组织工作,但不可操之过急。组织形式应是多种多样不拘名义的,最好是用灰色的或敌人不注意的名称,组织不宜大,以众多的独立的小组为适宜。

第四,采用各种方法,利用各种机会,争取同事、下级特别是上级成为两面派,乃至革命两面派。

第五,随时注意在隐蔽的方式下,照顾中国人特别是革命抗日分子的利益。

第六,对死心踏地的汉奸及借刀杀人分子,应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消灭。对特务分子,在其没有危害我们时,应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各地经验证明,我们对此问题处理不郑重是要吃亏的。

第七,只作紧急关头的或重要的情报供给。

第八,任何时候都要注意秘密工作,善于隐蔽自己的面目。在环境于己不利时,或能够增强自己地位时,甚至把革命的一面缩小到最低限度,也是允许的。总之,一切要从长期隐蔽、以待时机的利益着想。

第九,活动的重点应该放在伪军方面。在其他方面的活

动,也应力求逐渐发展到伪军方面。

第十,革命两面派的活动,是一个残酷的斗争,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复杂的,既要防备敌特的耳目,又要防备国特的破坏,所以我们的活动应该是大胆的而又非常谨慎的。一切不夸张、不蛮干、不暴露,脚踏实地去做,就一定能够收到效果。

再说革命两面政策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的运用。这样的地区的乡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第一,它必须是全乡全村一致对敌的。为此,必须有很好的统战工作以团结各阶层;尤其必须坚决肃清死心踏地的汉奸。团结全村一致对敌的工作,不能认为是简单的问题,而是要经过斗争才能达到的。这里,一个最基本的环节,就是看能否把大多数人民群众发动起来实行对敌斗争,大多数群众发动起来了,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第二,它必须有武装斗争的配合。不仅应有外面的公开的武装的配合,而且还应有本村的小型隐蔽的武装的配合。没有外面武装斗争的配合,就不容易欺骗敌人;没有本村的武装,常使配合不及时,而且这也正是发展广泛群众游击战争所需要的。各地经验证明,游击战争成了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武装的掌握是争取村中优势的重大问题,要力求掌握在我们和革命分子的手中。这种武装的组织必须是短小精悍的,绝对秘密的,其活动一般只应限于夜间,使敌人认为这是八路军游击队干的。

第三,它的各种组织形式,表面上不能不是伪组织的一套,但其实质则必须是抗日的。在政权方面,应建立统一战线的类似民主政权的村民代表会,一切实权不操于村长而操于

代表会。必须认识,惟有这样的政权,才能保证村民一致对敌,才不致为敌利用,才能照顾与保护人民的利益。不能设想地主阶级统治的政权能够实行革命两面政策,最多只能是应付敌人又应付我们的两面派(当然程度上各有不同),更说不上保护人民的利益。至于群众团体,除了原有工作基础的村庄还可保持其原有组织形式外,一般应力求单纯,组织统一的抗日救国会。

第四,它必须由一村的一致发展到几村乃至一个区域的一致,才更便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否则,少数村庄过于突出,易遭破坏。

具备了这些条件,才配称为实行革命两面政策的村庄,它不仅可以顺利地进行对敌斗争,而且可以真正地保持我们的优势。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但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对两面派的工作,过去许多两面派对抗日作了不少的帮助,而且两面派是最广泛的,也是争取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基础。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

由此可见,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脚踏实地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三、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与创造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

敌占区(当我武装能进入作经常活动时,则已变为游击区)应以非法斗争为主。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是武装斗争,是游击战争的开展。

敌占区中日矛盾的发展,有利于两面派的争取和革命两面派的建立,更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开展,甚至隐蔽的小块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造。今后我们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敌占区的游击战争,开辟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这不仅从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和战后着眼,而且是坚持山地根据地和平原游击战争的重要环节之一,是熬时间争取胜利的重要手段。

尽管敌占区存在着开展游击战争的良好条件,但在敌占区建立小块游击根据地仍然是一个艰难的创造,如果以为随便可以干起来那只是一种幻想。有的地区的经验认为,要达到建立隐蔽根据地的目的,应该是稳扎稳打,应该经过政治攻势首先从政治上造成成熟的条件,是很有理由的。开始时,应切实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派遣小的游击部队伸入作跳跃式的进出游击,并物色与当地有联系的干部进入或随游击部队工作,进行群众的和社会的准备,以模范的纪律和明确的政策去扩大影响,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争取两面派和建立革命两面派,利用中日矛盾去提高各阶层对敌斗争的热情与勇气,利用一切可能建立本地的隐蔽武装。完成了这样的准备工作,我们便有可能派出或由本地生长出小型游击队,坚持当地的经常的游击战争。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必须由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

击队(不管是派出的或是由本身生长的)与当地群众小型武装相结合,缺乏哪一方面都会显得没有力量。没有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武装,就不能起欺骗敌人、迷惑敌人的作用,没有本地的群众武装,也会使基干游击队“裸体跳舞”而终于不能存在。

在敌占区坚持活动的武装,不管是基干的或群众的,它的活动都必须采取隐蔽的方式。基干部分采取时隐时现的方式最为有利,而群众部分则应完全是夜间活动,且须假借八路军的名义出现。

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减轻人民(特别是本区本村人民)对敌的经济和劳役负担,特别是保护壮丁粮食不被敌人捉去抢去,打乱敌人的统治秩序,阻止敌伪对人民的摧残,维系人心,打击敌伪的特务奸细活动,并在十分有把握不暴露自己的条件下,打击小股敌伪,以达成在敌占区坚持斗争和积蓄力量的目的。敌占区游击战争必须与革命两面政策相结合,而成为执行革命两面政策的主要依靠。游击武装在活动中要考虑的两个问题:第一是照顾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可以招致敌人摧残人民的事,都应谨慎从事。第二是处处力求隐蔽,不夸张、不暴露、不大吹大擂,使敌人捉摸不住而麻痹起来。

敌占区隐蔽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坚持,不只是发动群众与坚持游击战争,而且必须与争取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争取封建武装(自卫团^[31]、会门^[30]、土匪等)的工作相配合,在中国人一致团结对敌的方针下去进行这些工作。对于敌人不可过于刺激,一切从长期坚持着眼,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是非常不利的。总之,那里必须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切不可忽

视合法的一面而走入盲动,要防止胜利冲昏头脑的蛮干行为。

此外,不仅在我们的周围,而且要在附近的敌占区灾荒区域,开始组织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这是从战略着眼的重要步骤。

四、尽一切努力保护中国人的利益。

我们的游击队武工队工作人员在敌占区的活动,必须以保护中国人利益为前提,这是保存国力与积蓄力量的问题,是在敌占区发展革命工作的起点。如果我们在敌占区的活动不能与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那末我们不仅不能建立隐蔽游击根据地和发展革命两面派,而且将没有我们立脚的余地。革命两面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筑在保护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去发展革命抗日力量的。

在敌占区保护人民利益,包括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团结各阶层对敌,减轻人民对敌的负担;一是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后者应约束于共同对敌的范围之内。

在敌占区及敌占优势的游击区,不可能避免对敌负担,而只能是减少对敌负担。对敌负担是多方面的,如人力物力的被掠夺,敌伪人员的敲诈,村款的大量负担与严重的贪污浪费等等,所以要从各方面去减少人民的负担。

减少对敌负担是一个复杂的斗争,有非法斗争,也有合法斗争,这是革命两面政策的具体运用。采用武装斗争的配合,伪装八路军劫回民夫、壮丁和被敌伪掠夺的金钱资材等方法,过去收效很大。其最显著者为反对敌人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42]中的粮食斗争,这次斗争完全粉碎了敌人的灌仓计划^[54]。我们的武装活动给了人民以很好的借口去欺骗敌人

保护自己,至少也达到延缓时间或少负担的目的。这是属于非法的斗争。

合法斗争方式也是必须采用的。虽然在敌人的统治下合法斗争的范围是很小的,但只要它能够多少于人民有利,也就必须充分利用。即使采用合法方式毫无结果,也可暴露敌人的凶恶面貌,给人民以政治经验,逐渐走入非法斗争乃至武装斗争的阶段。经验证明,合法斗争的巧妙运用,也可以收到一定程度的效果。必须指出,过去在保护敌占区人民利益方面,我们做的工作还非常之少,甚至某些地方还存在着只要同时对敌负担就以为满足的观点,这是非常有害的。特别是对保护壮丁的斗争,显得非常无力与办法很少,应引起今后的严重注意。

在对敌负担和日常生活中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除了敌人完全统治的我们毫无工作基础的地区(这样的区域正在缩小),凡是我们游击战争特别是政权力量能够经常达到的区域(这样的区域正在扩大),都应该提出与解决这个问题,只是在不同区域不同工作基础的条件下,要有程度上的差别和方法上的不同而已。

要教育党员和干部善于从当地群众日常生活中去发现问题,寻求机会解决问题。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方法很多,比如,在对敌负担中坚持合理负担^[50]原则;利用人民拥护抗日政府的热情,宣传政府法令,鼓励实行法令;村游击小组保护全村的利益,提出减租减息^[50];不放松对每一个租佃关系、债务关系和主雇关系乃至一般的民事案件加以调解等等。又比如,当敌占区人民向抗日政府提起民事诉讼时,应乐于接受,

秉公办理,以调解方式为主,而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秉公办理的实质,就于基本群众有利。农村中这类问题是很多的,我们很可以按照实际情形,帮助基本群众解除很多痛苦。当然,在要求上不宜太高。不能一区一村地去做,可以一家一家地去做。减租减息,不能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可以少减一些。只要于基本群众有一点利益,都要积极地去。同时,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必须与团结对敌的利益求得一致。

在敌占区或敌占优势的游击区,无论对敌斗争或解决阶级关系问题,都必须着眼于当地群众的发动,使每一个要求都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而给以应有的配合和援助,并且要随时注意组织群众、建立秘密党的工作。惟有这样,才能锻炼群众,发挥伟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注意群众的教育,特别是使群众从自己的经验中相信我们主张的正确。任何脱离群众、不问群众态度如何的干法,必然要失败的。

五、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

宽大政策与镇压政策的运用,应求恰当。我们不仅要防止乱干的复活,始终反对乱杀暗杀造成社会混乱的行为,而且应防止另一偏向,即放纵与听任汉奸破坏分子的活跃。

我们镇压的对象,主要是那些死心塌地的汉奸特务和对抗战危害很大而为群众最痛恨的破坏分子、借刀杀人分子和坚决反动的叛徒。对于那些胁从分子、次要分子,应采取争取的方针,给以回头的机会。经验都证明,只有真正痛击那些坚决反动的敌人的爪牙,才能争取那些动摇的分子。有些地方对于应该杀的汉奸破坏分子不敢杀,是不正确的。我们只是反对乱杀暗杀,而不是应该杀的也不杀,这是要弄清楚的。

对于伪军伪组织,我们在政治上必须采取反对的立场,至于对具体的对象,要分别情况采取打击或争取的方针,而以瓦解其组织,减弱其反动性,以孤立日寇,利于革命抗日工作为目的。

六、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配合与联系。

这也是一个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与联系问题,是在敌占区、游击区和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工作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了解什么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什么是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所谓合法与非法,都是对敌人来讲的。合法斗争就是敌人允许的斗争,非法斗争就是敌人不允许的斗争;合法形式就是敌人允许的形式,非法形式就是敌人不允许的形式。合法斗争与合法形式是相关联的,没有合法的形式就没有合法的斗争。敌人并不允许我们有什么斗争,只是这种斗争是用合法形式表现,而为合法形式所隐蔽,才得到了敌人一程度的许可。非法斗争则是用非法形式出现的,是敌人不许可的。合法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如请愿、告状、利用伪组织活动等等,都是敌人今天一般还许可的。非法斗争的形式也是多样的,如示威游行、抗缴粮款、拒绝维持、组织革命团体,乃至暴动、反正、武装斗争等等,而以武装斗争为非法斗争的最高形式,这些都是敌人不许可的。

在敌人统治下,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可能呢?事实回答是有一定限度的可能的,各地群众曾进行了不少这样的斗争。群众有没有进行合法斗争的勇气呢?事实回答是有的。在新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由于敌人为使人民就范开始采取高压政

策,而人民又没有在敌人统治条件下对付敌人的经验,所以一般表现不出什么合法斗争。但是经过了一些时间,群众往往摸索出一些对付敌人的办法,因此便产生了在某种情况下也可以和敌伪斗争的经验和心理。

既然在敌人统治下合法斗争的可能是很小的,而且效果不会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必须以非法斗争为主。但是,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抛弃任何一点合法斗争的可能,因为它不仅多少可以使人民少受一些损失,而且可以帮助非法斗争的发展。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应该是密切配合的,合法斗争可以掩护非法斗争,非法斗争也可以帮助合法斗争,而且必须注意以非法斗争去掩护合法斗争,非法斗争不能暴露合法斗争。所以我们不是抛弃任何一种斗争的问题,而是讲求两者如何配合与联系的问题。

如何配合与联系呢?

首先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这两者都是可以独立进行的,如过去敌占区往往没有任何非法形式的斗争,也可以独立地进行一些合法的斗争,但是惟有互相配合,才能收到大的效果。

其次谈合法组织与非法组织。这是组织形式问题,是充分利用合法形式来掩护非法组织的建立、存在与发展的问題。我们的革命两面政策,就是利用合法形式来达到建立、发展非法的抗日革命组织与进行非法斗争的目的。我们打入到伪军上层伪组织中,就是要利用敌人的组织形式和敌人给予的地位来发展革命工作和革命组织,并且还可以从了解敌人中,来保护革命组织。所以用各种方法钻进敌人的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打入的革命分子可以而且应该利用我党、我军和抗日政府的行动和主张,抓住机会进行革命工作。如我们发布了对敌军的主张,就应该运用巧妙的和不暴露的方式透露给工作的对象;如我们打了胜仗,就可以乘机散布失败情绪,甚至为对方着想,提出“还是要与人家勾搭一下才行”,以达到建立两面派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目的。

再次谈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公开工作的目的,是为着建立秘密工作。没有公开工作的掩护,秘密工作是很难建立的,有了公开工作的掩护,才更保护了我们工作的秘密性。

再次谈公开武装与隐蔽武装。它们也是互相帮助互相配合的,有了公开武装才能掩护隐蔽武装的存在,有了隐蔽武装才能掩护公开武装的活动与坚持。

以上这些,都说明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密切联系着、配合着、互相帮助着的。因此,当我们布置合法斗争时,一定要想到非法斗争的配合,布置非法斗争时,也要想到合法斗争的配合。所谓联系与配合,不是把合法与非法、公开与秘密混淆起来,或由一个人去兼任两种工作,这样的结果没有不暴露而遭失败的。必须着重指出,我们虽然不允许抛弃合法与公开的一面,甚至有一点公开合法的可能都要尽量利用,但是我们的目的,却是发展非法与秘密的一面,这才合乎我们积蓄革命力量、削弱敌人力量的要求,忽视了这一点,就会陷入合法主义的错误。同时,在进行合法斗争时,我们一方面要领导群众争取斗争的胜利,一方面必须充分暴露敌人的狰狞面貌。在斗争胜利后要指出这种胜利是有限度的,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斗争的结果,是抗日军队政权帮助

的结果,以免在群众中增加对敌的幻想。如果合法斗争失败了,更应抓紧机会鼓励群众对敌斗争的情绪。在合法斗争中,我们还应充分了解敌人,掌握敌人内部的矛盾。过去有些同志把敌人看成非常一致的整体,完全是主观的错误的想法。

估计到敌后斗争的犬牙交错此起彼落的特点,决定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具有很大的变动性。尽管我们主观上要扩大非法的一面,但客观条件常常与我们的愿望相反。有时某些地区变成了我们的隐蔽根据地,于是扩大了非法斗争的一面;有时则因为敌人的摧残,又大大缩小了非法斗争的可能。这样的变动性,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采取稳重的方针,不暴露自己,不过于刺激敌人,随时都有坚强的秘密工作的准备。这样,即使环境恶劣,我们也能作有秩序的退却,而不致吃大亏。

七、把政治攻势经常化。

所谓政治攻势经常化,就是除了大的重要事件和带全局性的问题之外,一般不进行带全区性的政治攻势,而是根据各分区特别是各县的具体要求,去经常地布置一个分区、一个县乃至一个小的区域的政治攻势。惟有这样的政治攻势,才更能抓住中心,与当时当地的具体斗争要求相结合,也才能真正地打到敌人的痛处,并与人民的利益更密切地结合一致。

过去政治攻势积累了许多经验,都应很好采用。同时应指出,过去政治攻势更多的是作了广泛的宣传工作,对于敌占区的组织工作,尚未提到议事日程之上。过去在敌占区宣传鼓动,给今后组织工作奠定了基础,这是重大成绩,今后的政治攻势,不仅仍应强化宣传鼓动,而且必须提高到组织阶段,成

为敌占区组织工作的重要武器。

为此,我们在政治攻势中,必须有计划地去团结敌占区开明进步人士特别是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形成抗日组织,或动员他们秘密地到根据地参观;必须注意秘密党的建立,谨慎地发展党员;必须加强争取两面派及帮助两面派成为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必须注意帮助当地人民对敌进行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保护人民的利益,从斗争中锻炼群众的抗日勇气;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必须建立群众的隐蔽的游击小组或其他形式的抗日武装,建立隐蔽的小型游击根据地,这正是我们今后政治攻势的重要目标。

武工队仍然是今后对敌开展政治攻势的骨干,必须加强其力量,在组成中应有与当地人民息息相关的队员,这样才能使政治攻势经常化。因此必须提高边地游击队(县区基干队)的军事政治质量,使之成为能够担负进行政治攻势的力量。同时为了加强组织工作,必须在政治攻势一元化的斗争中,加强党特别是抗日民主政府在敌占区活动的比重。

八、在敌占区建立党。

这里只提出这个任务,而不谈如何建立的方法,这方面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是很丰富的。几年来我们完全忽视了这个基本的工作,现在不能再马虎下去了。

敌占区秘密党的任务,是从各方面去隐蔽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在组织上要力求隐蔽精干,在活动范围上要力求广泛。我们的党员要钻进一切敌伪组织和地方封建团体中去进行自己的活动,纠正过去闭门训练、自视清高等关门主义(实际是一种等待主义)的倾向。

根据地建设*与群众运动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一、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在讨论中有同志提到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问题,这个问题在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55]中已经回答了。一个革命根据地除了必须具备的地理、敌情、时机等条件外,其本身必须具备着革命的武装、政权、群众组织和党等四种力量。彭德怀同志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这四种力量又是互相配合的,任何一部分不得力都会影响到其他部分,互相配合不好也会使根据地受到损害。

有人会问:根据地的创立是先有武装还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呢?这是一种机械的提法。实际上,有的地方是先有党和群众运动,实行农民暴动,自己创造武装和政权,形成根据地,然后又用这个武装和政权的力量去扩大根据地,创造新的根据地。有的地方则是先有了革命武装,以武装力量打开局面,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结论第三部分的第一节,刊载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的《战斗》增刊第十九期。

建立党、政权和群众组织,形成根据地。但是,不管哪个在先,只有在上述四种革命力量形成起来的时候,才有革命根据地。

有人会问:这四种革命力量哪种更重要,哪种是中心环节呢?我以为这同样是机械的提法。实际上,这四种力量既然是缺一不可的,所以是同等重要的。假设一定要定个先后的话,则应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战争的特点,将武装放在第一位。但必须懂得,只有武装,没有党、政权和群众力量,武装斗争便不能支持而会走向失败,历史上有些区域由于单纯军事观点而失败的例子,证明了这点。只有群众运动或坚强的政权工作,而没有坚强的足够的武装,或军事路线发生错误,也会使根据地失败,党政工作群众工作垮台,第五次反“围剿”^[56]失败后退出中央苏区^[17]的例子,证明了这点。没有坚强的政权工作,财经建设、除奸司法等工作无成绩,不仅不能建立根据地的秩序,而且要影响到军需民食,这样也会影响到根据地的巩固与坚持,太行区一九三九年的例子可以证明这点。最后,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和党的组织基础,没有党的一元化的领导,党的领导不贯彻于武装、政权、群众组织等各系统中,党的领导发生错误,都要影响到根据地的建设、巩固与坚持,许多例子证明了这点。所以说,哪种力量最重要最中心的提法是不对的。但是,是否我们应该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同等地去注意这些工作呢?不是的。党的指导要依据于当时当地的情形,提出当时注意的中心。如政权工作薄弱就加强政权工作,群众工作薄弱就加强群众工作。当然,在加强这一工作时,要有其他几种力量的配合。例如,在华北的开辟阶段,与历史上的前例又有其不同特点,首先抓住以强大的八路军的力量

打开局面为中心,接着把中心放在建立政权,自上而下地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建设财政经济,建立社会秩序。这样就抓住了规律性,因而获得了伟大成绩。又如在巩固阶段,我们应以执行土地政策、发动群众为中心,并建设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执行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够,在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注意群众工作不够。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有人会问: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在没有党的地方,革命队伍的责任是建立党与发展党。根据地的党的责任是要善于掌握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根据不同条件去决定自己注意的中心方向,在解决这一中心工作时要求得其他工作的配合。武装力量的责任是保卫根据地,保卫革命政权,保卫人民利益,建立党而又服从党的政治领导,建立革命政权而又服从政府的革命法令,参加群众工作,发动群众,而又为群众所帮助、所监督。政权的责任是服从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的领导,扶植群众运动和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巩固统一战线,爱护军队和解决军队的供给、补充。群众团体的责任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独立地去进行发动、组织与教育群众的工作,把群众的认识提高到政治斗争武装斗争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觉自为的阶级力量,去与地主资产阶级实行统一战线而又巩固统一战线,诱导群众执行政府的革命法令,号召群众参加与拥护革命军队并把自己武装起来加入民兵。这就是这几种力量的配合与联系。有了武装就有了一切,或有了群众就有了一切的说法,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是对的,否则是有毛病

的。

还要着重说到的是 ,我们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 ,还要看统一战线巩固的程度 ,这也是一个决定条件 ,也应引起我们注意。

以上就是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有人还会问 :我们过去是否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呢 ?肯定地回答 ,一般是掌握住的 ,所以才有这几年坚持与建设根据地的伟大成绩。否认这一点 ,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坚持 ,根据地能日趋巩固。但是 ,我们有无缺点和错误呢 ?我们的回答是 ,有的 ,如一个时间内武装政策中的偏向 ,相当一个时期内对群众工作的忽视 ,几种力量的联系与配合还很不够。假如没有这些偏向 ,我们的工作会做得更好 ,根据地会更巩固些。有人说我们根据地还不巩固 ,当然是不正确的。

中央、北方局历来就有建设根据地的明确方针 ,我们的偏向或错误 ,就是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研究不够、执行不够的结果 ,这正是我们的历史教训。

今后在残酷斗争中 ,我们必须正确掌握根据地建设的规律 ,提高根据地的巩固程度 ,并以最大努力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地 ,则抗日与民主政治的建设乃至反攻将无所依托 ,切不要忘记历史上没有根据地时候的痛苦。

二、群众运动的规律。

群众运动有其自身的规律 ,党在指导群众运动中 ,必须掌握住这种规律。过去由于我们对中央、北方局的指示执行不够 ,所以今天的群众工作没有获得应有的成绩。

什么是我们指导根据地群众运动应掌握的规律呢 ?第一

是发动群众,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第二是在发动群众之后,立即注意整理与健全群众组织生活;第三是在发动与组织群众中注意群众的政治教育,在发动与组织任务完成之后,应将重心转入教育群众,把群众运动提高到民主政治和武装斗争的阶段,使群众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力量,去参加统一战线,去参加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以巩固既得的政治经济权利;第四是把群众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不了解这些发展的规律,不懂得诱导群众运动逐渐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就会使运动脱节,就不能逐步地提高群众到自为阶级的阶段,也就不能保卫其既得的利益。

有人说,过去我们应该划定一个阶段来集中力量发动群众,没有这样做是个损失,是个缺点。这种说法是很对的。但是也有人说,过去没有划定一个阶段来发动群众,就是没有掌握住根据地建设的规律性和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这种说法是不能同意的。应否划定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的方法问题,而不是规律性问题,不能设想任何地区任何时间都能划定一个阶段来做群众工作。例如中共六届六中全会^[57]提出巩固华北,以进一步深入群众工作为中心,但并未指出要划出一个阶段来做;又如华中群众工作做得很好,但一九四一年还未提出划出一个阶段问题,这不等于中央或华中局没有掌握住群众运动的规律性。而且认识是个发展的过程,只有在今天来看过去,才知道我们如果在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两年划出一个阶段来做,是最好的办法,没有这样做,是一个很大的缺点。特别要指出,过去我们对群众运动指导的主要错误,不是没有划出阶段的问题,而是没有在巩固阶段以执行减租减息^[50]、雇工增

资^[58]等土地政策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

有人说,过去我们放过了相当的时机,没有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这是对的。但不能说,过去我们没有发动群众。我们不仅有抗战初期广大而深入的抗日发动,反磨擦斗争中热烈的群众运动,而且有今天冀南的中国人团结的群众运动,这些发展的政治意义是丝毫不可轻视的。就是在减租减息发动群众上,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特别对去年下半年的成绩,要有足够的估计,只是各地成绩大小不同,如太行比太岳、冀南要略好些。

接受历史教训,是为了今后的工作,但不是把历史上可能做的,机械地搬到今天来运用,而要看今天的具体条件,来决定如何去做。今天太行、太岳还可以划定一个时间来发动群众,但在冀南根据地变质^[45]后的广大游击根据地(除少数基本根据地),就没有这个可能了。冀南今天是密切结合对敌斗争去适当照顾基本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以对敌斗争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而不是以减租减息、雇工增资为中心去发动群众的问题了。就是在太行、太岳区也要注意到今天敌后残酷复杂的斗争的特点,对封建地主不能机械地去划分打的阶段和拉的阶段,而应是又打又拉,打中有拉,拉中有打的正确运用,打的时间要求缩短,不宜过长。这是新条件对我们的要求。

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教育群众的工作是困难的,是需要时间的,不能要求过急。但认为“一年做不好有二年,二年做不好有三年”,也是不好的。太岳、太行区一般应在今年内克服不平衡,完成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的任务。冀南应大胆地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但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中,而不是在执行土地

政策中去发动组织群众。土地问题在冀南无疑是应居于次要地位的,就是在太行、太岳,也要约束于统一战线之内。所以在冀南单独提出削弱封建的口号,是值得考虑的。

冀南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以为:第一,广大群众自觉地积极地参加对敌斗争,不仅先进部分,而且落后部分都参加了斗争;第二,在对敌斗争中,基本群众参加了人民武装(公开或隐蔽的),并掌握了这些武装;第三,在村政权中,基本群众自觉地参加,真正实现了“三三制”^[3];第四,在对敌斗争中适当争得基本群众自身的利益,并巩固了与地主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共同对敌;第五,有了群众自己的组织,或在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取得了基本群众的优势;第六,群众相信党和八路军,懂得只有跟着我党我军走,才能得到自己的解放。

有人说,似乎这样的标准要求冀南不成问题了。这是空洞乐观的估计,实际上还差得很远。没有正确的政治领导,没有艰苦严密而有贯彻力的组织和教育工作,这样的要求是不能完全达到的。

三、发动群众与巩固统一战线。

这是一个如何把群众斗争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的问题,是照顾到既能发动群众又能巩固各阶层团结的问题。这里只说几点认识上的问题。

(一)把打的阶段与拉的阶段结合起来,实行打中有拉,拉中有打,打得要恰当,拉得要及时。当然在各个县、区还有划分打与拉的阶段的必要,但打的阶段不宜过于拖长。在打的时候,应更多采取说理方式,争取开明分子来影响其他地主实行

减租减息,即使他们假开明,也有好处,也应鼓励;只有对个别顽固分子,才经过一番孤立工作之后,实行斗争的方式。在拉的时候,要防止地主的反攻,特别要教育群众自动地去团结地主。

(二)是削弱封建,而不是消灭封建。我们的方针是既要改善群众的生活,也要使地主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过去有个别地方执行减租清债等法令时,有些过分的地方,应该纠正。政府的法令是一般的原则,在执行中必须依据上述方针,加以恰当的执行,尤应纠正算很久以前的老帐的办法。

(三)削弱封建不只是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思想上。在政治上打垮地主阶级的统治,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治,其本身就是削弱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地位,但绝不能解释为消灭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地主阶级只要它是抗日的,不反对民主政治的,它就有参加“三三制”民主政权的权利。所以我们在政治上,不仅要保障群众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还要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在群众运动中不能提倡侮辱地主人格的行为,如打人、唾口水等。尤其在党的领导上,应防止这些现象成为风气,因为这些做法,会失掉社会同情,有碍团结地主抗日,也妨碍争取落后群众卷入斗争。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一个严重的斗争。过去的经验证明,地主阶级,特别是大地主,非常重视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减租减息他们还比较容易接受些,一触及到政权问题,就要遇到他们的严重反抗。所以没有群众自觉地参加政治斗争,要想削弱封建阶级的政治地位,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地主抗日,只靠方式上的讲究是非常不够的,主

要应使之能够生活,能够保有一定的经济地位,保障其合法的财权,否则即使我们态度很好,即使选他当了代表和参议员,都会无济于事。这点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应加以注意。

(五)群众“左”可怕不可怕的问题。只有当我党能够及时掌握与恰当纠正“左”的现象时,“左”才是不可怕的,如果让“左”的东西发展到破裂统一战线的地步,那就是值得可怕的。我们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就说明了党的指导的作用。

(六)对富农应采取削弱其封建部分、奖励其资本主义部分的方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主要在政策法规上要照顾这两个方面。同时在斗争中,不能把富农与地主一样看待。过去斗争的对象,富农占的比例不小,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今天各地已经发生了某些过分的现象,应注意作适当的纠正。

(七)群众运动要求深入,但亦应注意其规模。例如,应该讲究这一区域对另一区域斗争的声援,这一群众团体对另一群众团体斗争的声援,召开必需的一定范围的群众会、群众干部会、代表大会等等,都是很重要的。这样,既可以使群众斗争的经验教训普及,可以影响落后区,争取运动的平衡,又可以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和自信心,还可以培养群众的领袖。

四、党与群众团体。

所谓群众团体的独立性,是在组织意义上讲的,在政治上必须保障其在党的政治领导之下。党对群众团体,应加强其政治领导,不应在组织上去包办。群众团体的工作,应由群众团

体自己去讨论和执行。党对群众团体的政治领导,也不能直接下政治命令,而是经过党团^[6]去实现。过去各地对群众团体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一般是包办与放松政治领导两个毛病都有的,今后应加纠正。同时,在提出群众团体的组织独立性时,又要防止群众团体脱离党的政治领导的倾向,防止党团脱离党的领导的闹独立性的倾向。

今后的群众运动,应做到由群众团体特别是农会去出面领导,党务工作干部、军事工作干部去从事群众运动时,可以群众团体面目出现,或经过群众团体的介绍。只有这样,才能培养起群众自身的组织观念,培养群众团体的威信,也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群众的领袖。

同时,党对群众运动的指导必须加强,要派遣很好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干部到群众团体去作负责工作,特别要注意提高下层群众团体的工作能力。对于各种群众团体,不可能加以平均的注意,今天应特别加强党对农会工作的领导,首先健全农会的组织和生活。

各救国会组织在区以上仍采取救国联合会的形式,不必变动,但在村一般应分开组织。上级救联人数尽量减少,把干部充实到下层去。

群众团体的经费,应逐渐做到自给,政府给以足够的津贴。今后群众团体的经济开支,可以自己负责,不必由政府审核。

党应用最大努力去培养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要知道群众领袖是最值得珍贵的,没有他们是不能支持最困难的斗争的。

五、政府在群众运动中的地位。

政府对于群众运动应是扶植的态度,所以不应对群众运动采取旁观或漠不关心的官僚主义态度。但是群众运动应该是群众自觉自动的运动,所以政府也不要采取干涉或代替包办的态度。

敌后抗日民主政府,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在我党政治领导之下的政权,它的施政纲领和法令,是符合于党的政策的,是既照顾了工人、农民又照顾了地主、资本家的,所以是有利于基本群众的。我们在群众运动中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50]等有利于基本群众的事情,就是在执行政府的法令;而政府在公布了这些法令之后,还必须保障其实现,所以把群众运动和政府态度对立起来是不对的。党和群众团体在指导群众运动中,政府在扶植群众运动中,都是保证这些法令的实现,都是要把群众运动约束于政府法令之内,亦即是约束于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所以群众团体和政府对于群众运动的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各自的岗位上有其不同的态度和作法。

政府对群众运动的正确态度是什么呢?

(一)当某一地区还没有实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法令时,应派人下乡解释政府法令,督促实行,并坚决表示不准不实行的态度。

(二)当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实行减租减息等斗争时,政府人员应尊重这种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尊重群众自觉自动的阶级觉悟,不应采取自上而下的干预或包办群众斗争,不应利用政府权力,采取行政手段去过早结束群众斗争。这种干预、包办的方法在表面上可以使群众容易得到利益,但是妨害了

群众的自觉性,使群众不会相信自己的伟大力量,更不能提高群众的觉悟达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这是有害的方式。

(三)在群众斗争中,政府人员的工作是加强政府法令的解释工作,这实际上就帮助了群众运动。

(四)当群众与地主发生争执时,政府采取坚持法令秉公办理的态度,这也实际上帮助了基本群众。

(五)当群众运动中发生过左行动时,政府人员首先应通知党或群众团体加以说服纠正,或商定互相配合加以纠正,切忌简单地采取行政方式处理。但当这种“左”的行动影响太大,特别是为反动派利用,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时,政府就应出面干涉制止,制止后仍须对群众进行充分的解说工作。

(六)在群众运动中,政府人员应对地主士绅进行工作,主要是解释政府法令,劝说他们遵行。不能在地主面前去打击或批评群众团体及其干部,以致增高地主气焰。如群众团体或干部有失理处,可以加以解释,同时指出地主的不合理。

(七)政府人员在群众面前应处处尊重群众领袖,帮助培养对群众领袖的信仰。同时,党及群众团体在群众运动中,亦应提高抗日民主政府的威信,如在群众中损害了政府的威信,是非常有害的。

军队参加群众运动还是很重要的。过去取消民运部门,是因为当时对地方工作成绩估计过高,加上军队干部有些工作方式生硬,影响到有些地区要求军队不要打乱了地方工作的步调,今天看来这是不妥当的。今后军队不仅要派干部以群众团体(主要是农会)的面目,或由群众团体介绍,去参加地方工作,而且军队还应参加群众斗争。这不仅可以帮助群众运动,

更主要的对军队本身是很好的活的教育。当然在参加时,不一定要抬着机关枪和大炮。军队派到乡村工作的干部,必须统一于当地党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群众团体的工作计划之下步调一致地工作。

六、村级工作。

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村,我们必须注意村级工作的领导。关于村级工作的一般原则,彭德怀同志的小册子中都提出了。村级工作是很复杂的,各级党必须继续研究与解决村的工作问题。

我们在简政中,把行政村扩大,固然增加了工作上的一些困难,但不如此会增加人民很多负担,所以不必改变,而要注意于讲究在大村条件下,如何进行领导工作的方式。

太行区的经济建设^{*}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

敌后抗战是一个极复杂、极艰难的斗争,我们已经胜利地渡过了整整的六年,并且已经奠定了继续坚持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以八路军这样羸劣的武器,四年来没有得到一个铜板一颗子弹的接济,而能战胜各种困难,与强大的敌人进行短兵相接的斗争,这不能不是一个奇迹。究竟它的秘诀在什么地方呢?如人所共知的,我们有一个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依据这个原则,从无数的战斗中,才创立、保卫与巩固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才箝制了日寇在华总兵力的一半,减轻了大后方正面作战的负担。如人所共知的,我们同敌人进行了严重的政治、文化和反特务的斗争,大大地发扬了根据地和敌占区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坚定了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然而,还有如人所共知的,就是我们在敌后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战线的斗争,而且获得了不小的胜利。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经济战线的胜利,我们才有可能坚持敌后抗战六年之久,并且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敌后的经济战线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战线。敌

^{*} 本文刊载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延安《解放日报》。

人对我们的经济进攻,是与军事、政治、特务的进攻密切结合着的,是极其残暴的。在敌占区,敌人实行了无穷尽的人力、物力的掠夺。人民的负担超过了全部收入的二倍到三倍,粮食、金钱没有了,还不得不以家具折价缴纳负担。而人力的掠夺尤为惊人,大批壮丁被捉走服役,支差难以数计。据敌酋宣布:“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因此,形成了敌占区连年的歉收和今年严重的灾荒。而敌人又利用这个灾荒挑拨人民到根据地抢粮,企图形成抗日根据地与敌占区中国人之间的严重对立。对抗日根据地,敌人实行了一面封锁一面掠夺的政策,封锁我们的必需物资,吸收我们的有用物资(如粮食),不断地对边地蚕食和在每次“扫荡”时大肆抢掠摧毁——杀人、捉壮丁、烧房子、毁农具、抢耕畜、烧粮食、损毁青苗。敌人极尽残暴之能事,其目的则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在敌人这样的摧残之下,人民创伤极其深重,如不采取有效办法,一旦人民元气耗尽,一旦军需民食没有保证,敌后抗战的坚持是不能设想的。太行区就在这样的警惕下,加强了对于经济战线的注意。

敌后的经济战线,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没有对敌斗争,谈不上根据地建设,没有根据地建设,更谈不上对敌斗争。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都是照顾了这两方面而订出的。抗战初期,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的经济建设方向,六年来我们就在这个方向下进行我们的建设的工作。经过了无数曲折,遇到过不少的困难,到现在,我们

才摸索出了一条道路,这条道路使我们不仅保障了抗战的需要,保护了人民的利益,打击了敌人的掠夺计划,而且为反攻和战后建设做了不少的准备。

那末究竟我们做了些什么,并且获得了什么经验和教训呢?

首先,我们确定了发展生产是经济建设的基础,也是打破敌人封锁、建设自给自足经济的基础,而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则是生产的重心。经验告诉我们: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战时粮食普遍缺乏。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我们有了粮食,不但军民食用无缺,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同时只有农业的生产,才能给手工业以原料,使手工业发展有了基础;而手工业的发展,正可以推动农业的生产,正可以抵制敌货的大量倾销,实现自给自足的经济。

发展生产,不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需要正确的政策和精细的组织工作。我们的减租减息^[50]和交租交息的政策,给发展生产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凡是减了租息的地方,广大劳动人民的抗战热情和生产积极性都大大增强了。而在减租减息之外,政府还规定必须交租交息。以减租减息交租交息政策稳定各阶层的关系,加强各阶层的团结,号召各阶层人民努力生产积蓄,由自给自足向着丰衣足食的道路前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还颁布了重要法令,规定“存粮存款不负担”,“雇工工资一半不负担”,“羊群不负担”,“负担照抗战后平年应产粮计算,多收产粮归人民自己”等等,并奖励劳动英雄和

“吴满有运动”^[59]的参加者,这就是在限制封建剥削下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方针。这也正是孙中山先生给我们指示出的道路。我们的工商业政策,给了发展农业和手工业以很大的便利,政府规定的工业负担是最轻的,因而手工业,特别是家庭纺织业,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较大工业的建设,则因为游击战争的环境的限制,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生产的组织与领导方面,抗日民主政府与群众团体曾经尽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军队也积极地参加了这个战线,给人民以不少的鼓舞和帮助。农业生产是贯穿于全年而又富于季节性的事情,严格说来,无所谓农闲时间。犁地、选种、下种、选苗、锄草、夏收、秋收,还要适时地积肥、施肥(第二年的肥料头一年六月就要开始准备)——我们在春耕、秋耕、夏收、秋收的时候,都做了巨大的工作。我们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反对懒汉,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改良种子,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发动儿童拾粪,号召妇女参加生产,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以及发动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事业,所有这些,无一不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情,无不尽力提倡与实行。正因为我们注意了生产的组织与领导,人民许多困难被克服了,“增加生产、改善生活、准备反攻”的口号,响遍了太行山的每个角落,获得了生产战线上年复一年的胜利。我们的军队,除了自己生产解决一部分军费之外,每到农忙时候,漫山遍野,都是穿着军服的人,同老百姓在一块劳作。而且恰恰在这样的季节,正是敌人向根据地进行带摧毁性的蚕食和“扫荡”的时候。所以军队不但要帮助人民生产,还要同民兵

一块保护人民的耕种收割,这正是军民能够打成一片的理由,也正是我们军队之所以被称为人民子弟兵的理由。

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但就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香烟、肥皂和奢侈品,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来源虽并不困难,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

去冬今春,太行区的旱灾面积占根据地的五分之一,而敌占区流入的灾民还有很大的数目。这是几年来最困难的关头。我们组织了巨大的救灾工作和春耕运动,现在大致已经渡过了难关。只要雨水不缺,人民很快就可缓过气来。我们救灾的办法,除了部分的社会互济之外,基本上是靠生产。政府拿出了大批款子,贷给灾民。有的是纺织贷款,如武安一县就贷款组织了两万多妇女参加纺织生产。她们每天劳动所得,可以维持一个半到两个人的生活,妇女地位大大提高了。有的是水利贷款,今年修渠贷款即达四五万元,工人全系灾民,每人每天三斤小米的工资,可以节余一部分养家。我们曾从产粮的敌占区获得粮食来低价(相当市价的一半或三分之二)卖给灾民,而运输这些粮食的都是灾民,可以得到运输工资养家。合作社也到处发展起来了。在敌占区的灾民,是流离失所与大批的死亡;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灾民比往年要苦一些,但在政府有计划有组织的救济之下,仍然充满了对敌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活力。我们的军队和政民干部,在灾荒严重的区域,成了生产的主力军,专员、县长、司令员、政治委员都亲率干部战士去帮助

灾民种地,更给了灾民以很大鼓舞。现在下种间苗已经完毕,只要雨水及时,不致形成连续性的灾荒。大批来自敌占区的灾民,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帮助,解决了他们居住、粮食、农具、种子等困难,开出来的荒地,青苗已经长成了。

在组织和领导人民生产的事业上,我们也并非万事如意的。主观主义和粗枝大叶的毛病,妨碍了不少工作的进步。在抗战初期,曾有支差过多、浪费民力的现象,这个毛病很快就得到了克服。政府规定只有专员公署和军分区以上的机关才有支差的权力,在农忙时禁止支差,军队应自己背粮驮炭。这是一个很大的善政。以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些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如过多的群众会议、干部会议,乃至人民武装过多的放哨和操练,都妨碍了农民的耕作。因此,曾具体规定了会议、下操的时间,取消平时的岗哨。我们的干部对生产的事情了解太少,常从主观的愿望去决定问题。比如在春耕时,才提出儿童拾粪的口号,才注意到选种等工作,这是何等的荒谬!又如对发展手工业的领导,很多还是空洞的号召,忽视了群众问题的具体解决。合作运动也还不能令人满意。这些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与纠正。

其次,说到我们的负担政策。我们实行的是钱多多出,钱少少出的原则,是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的配合,既照顾人民的负担能力,又照顾抗战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使负担办法适合于奖励发展生产的需要。上面所说的“存粮存款不负担”等法令,都是为着这个目的:减轻人民的负担。我们除了一贯地提倡节约、反对浪费和严惩贪污(贪污五百元以上的处死刑)之外,还实行了连续两次的精兵简政,一九四三年度公粮比一

九四二年度减少了百分之十六到十七,这是实际的效果。历史上最大的病政之一,是村款的浩大。我们很早就实行了以县为单位统筹统支的办法,规定村无派款权,改革了这个病政。边区临时参议会^[9]通过的统一累进税^[60]办法,将于今年在太行区实行,这更确实照顾了各阶层的利益,负担面有了扩大,完全符合中共中央规定负担人数达到总人数百分之八十的政策。统一累进税实行以后,不仅可以进一步奠定财政的基础,而且必然提高各阶层的生产热忱。

再次,我们的税收贸易政策,是采取“对外管理对内自由”的原则。争取出入口平衡是我们努力的目标。为了便利对敌斗争,我们把税收和贸易两个部门,置于工商管理局的单一领导之下,用严格的税制来保护根据地的经济,并使对敌斗争容易得到胜利。我们禁绝了一切奢侈品,限制了非必需品的输入,同时组织根据地非必需品和多余物品如药材、草帽等等的输出,以换取外来的物资。为此,我们组织了带群众性的缉私工作,给缉私者以较高的奖励,严惩舞弊营私。组织商人参加对敌经济斗争,甚为重要。所以,对敌占区贸易不能采取政府统制一切的办法,而是管理的办法。对内尤不能垄断,而应采取贸易自由的办法。对于商人的投机行为,则利用公营商店及合作社的力量,加以压抑。实行这种办法的结果,大大加强了对敌斗争的力量,增加了税收,繁荣了市场,保障了人民的需要。太行、太岳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候,为他区所不及。今年灾荒的克服,我们实行的粮食调剂和棉布交易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我们的同志也曾发生过错误,比如一个时期曾打断对外的交易,开始时对商人作用的认识不够,以及

对内的合作社统制思想,都停滞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还有,在对外贸易中,组织了过多物资的输出,忽视了掌握物资以与敌人斗争的重要,也一度使我们吃了很大的亏。而工商管理部门,热心于贸易投机,忽视了生产合作事业的发展,忽视了一点一滴地去开发输出的物资(如发动人民挖药材,收买猪鬃等),都是很大的毛病。这些,是我们纠正过了或正在纠正的错误。

我们的货币政策,也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保护法币^[61]。我们鉴于敌人大发伪钞,掌握法币,大量掠夺人民物资的危险,所以发行了冀南钞票^[38],作为本战略区的地方本币。实行的结果,打击了敌人利用法币的阴谋,缩小了伪钞的市场,强化了对敌经济斗争的阵容,给了根据地经济建设以有力的保障。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本币的信用是很巩固的。我们不断地对敌占区进行政治攻势以及适时地利用物资,给了伪钞以相当的打击。但是不能因此对伪钞作出过低的估计,过分地估计了它的动摇程度,而作出冒险的或失当的处置。

最后,在敌占区和游击区,我们采取了减轻人民对敌负担、保护人民的利益的方针,作为一切敌占区政策的出发点。敌人掠夺粮食,我们就帮助人民采取武装的以及各式各样的方法打击敌人的抢粮计划;敌人要抓丁,我们就组织壮丁逃跑,并与人民共同打散集合的壮丁。诸如此类的斗争,几年来没有一天停止过。没有这样短兵相接的尖锐斗争,敌占区同胞的惨状不知变成如何的程度了。

这些就是太行区经济建设的简略介绍。从这里,我们得到了些什么经验呢?我们的经验是:第一,敌后的一切离不开对敌的尖锐斗争,我们每一点经济建设的果实,都是用血换来的。第二,没有正确的政策,就谈不上经济建设,而这些政策的订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第三,任何一个经济建设的事业,没有广大人民自愿地积极地参加,都是得不到结果的。第四,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帮助他们积累经验,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

今后斗争更加残酷,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战争、生产、教育,是敌后的三大任务^[62]。我们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生产正所以保障战争的胜利,教育则为战争、生产而服务,把三者密切地结合起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所以,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

在北方局党校整风 动员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日)

同志们：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去年提出的整风^[63]号召，在全国，尤其在陕甘宁边区，收到了很大的效果。这次整风在党的历史上是空前的，不仅对于我们中国党的建设有其伟大的意义，就是对于世界各国党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大家知道，整风的目的是要以无产阶级的马列主义的思想，去克服存在于我们同志中的非无产阶级的非马列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全党思想更加统一，意志更加集中，全体同志更能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一心一德地去完成中国革命的事业。自然，我们的整风运动要从每个同志自己着手。党是由许多个人集合组织起来的，个人把思想作风整好了，就可以使他担负的工作得到改进，因而党的力量也就增强了；如果我们所有的同志都把歪风去掉，那我们党不知要增加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第八期开学时作的整风动员讲话，刊载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四日北方局、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直属机关学委会出版的《整风周报》第二期。

多大的力量 整风运动是我们建党的百年大计 ,每个同志都要自觉地参加。

但是 ,整风的意义是否真为所有同志所了解呢 我以为直到现在 ,大家的了解还是非常不深刻的 ,不但一般同志 ,就是领导同志了解也很不够。否则就无法解释 :为什么经过了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的整风还没有整起来。因此 ,当着本期党校开学和太行区全体机关部队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 ,再来说一说整风的重要性 ,不是没有意义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提出整风号召呢 ?我以为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了党的二十一年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 ,特别是研究了党的现状之后 ,提出来的使党进一步布尔什维克^[10]化的方针 ,使党在思想上更好地武装起来、一致起来 ,顺利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方针。

现在 ,我们党有二十二年多的历史了 ,其间经过了三次大的革命战争^[64] ,我党始终站在最前线 ,为着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奋斗 ,我党始终引导着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向前迈进。但是我们也有好几次挫折和失败的教训 ,而每次的挫折或失败 ,都是学风、党风、文风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所形成的恶果。例如 ,第一次大革命^[1]是我党积蓄了力量干出的一个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可是被大革命后期不长时间的陈独秀机会主义^[65]领导断送了。又如党在克服陈独秀机会主义之后所积蓄起来的力量 ,又在李立三同志冒险主义^[66]的领导之下 ,遭受了很大的挫折。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67]统治时间更长 ,给予我党的损害也更大 ,苏区红军和白区党的基础 ,都在这种三风不正占统治地位的领导之下 ,大部

弄垮了。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当着党的领导正确的时候,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运动一定是发展的;当着三风不正占了党的统治地位的时候,就会把我们长期艰苦创造起来的基础弄垮,就会使革命遭到挫折和失败。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53]的统治时间愈长,给予党和革命的损害也就愈大。这是一方面的教训。

还有另一方面的教训,就是我党自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68]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这种事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确,在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我们回忆起过去机会主义领导下的惨痛教训,每个同志都会感觉到这九年是很幸福的,同时也会更加感到三风不正对我们的毒害了。凡是研究了一下党史的人,一定会深感整风的重要的。

现在我们有了这样好的党中央,有了这样英明的领袖毛泽东同志,这对于我们党是太重要了。但这是不是说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呢?没有的。有了中央正确的领导,还必须有忠实执行中央指示的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如果我们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还充满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些歪风,中央的正确领导是无法实现的。而这些歪风,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恰恰在我们干部中和各级党的组织中还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曾给了我们工作以不小的损害。毛泽东同志号召

整风当然不是无的放矢,而正是针对着我们的弱点提出来的,是一针见血的指示。我们大家可以好好回忆一下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自己的思想意识,就会懂得这一点。拿太行、太岳、冀南这几个区域来说吧,几年来我们的工作,在中央的领导之下,是有成绩的,但是由于我们同志,特别是我们这些负责的同志还有不少的歪风,给予工作的损害也是令人痛心的。比如我们在大发展时期^[69],拉夫式地发展党的组织,直到现在还损害着党的巩固和战斗力的增强,我们同志中的宗派主义,把大批的乡村知识分子排斥到国民党方面去了,在“三三制”^[3]政权中始终不善于团结非党人士,不善于扩大巩固统一战线;长期的“左”的财经政策,“左”右摇摆(基本是“左”)的锄奸政策,形式主义的生产领导,简单生硬的工作方式等等,无时无地不发现许多的歪风。这些歪风给了我们很多损害,有些坏影响现在还未肃清,有的将来还要自食其恶果。凡是反省了一下自己工作的人,一定会懂得我们不整风是不行的。

至于说到我们自己,一定要承认:不仅普通的党员,而且有不少相当负责的干部,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的问题。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许多同志的思想意识中都存在着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过去我们同志对自己往往是估计过高的,党的组织对干部的了解也是不深刻的。整风经验证明:认识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人们常常是夸大自己好的一面,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原谅的,还往往把弱点看成优点。所以必须在集体的整风中,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才能发现自己的弱点,重新认识自己,改造自己。各地整风的材料

证明:有些同志虽然为革命奋斗了多少年,最近经过了深刻的反省和别人帮助之后,才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无产阶级战士,还没有最后地确立自己的革命人生观,或者是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完全入党,一只脚踏进了党门,还有一只脚是站在门外的。这样的同志,经不得起大风浪呢?假如不改造,当然是很困难的。可惜这样的同志是很不少的,甚至有不少作了地委委员的干部,思想上的毛病还是很大的。老实说,现在不是自己有无毛病的问题,而是毛病多少、严重程度如何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主观主义等歪风在今天不占统治地位,这是对全党来说的,我们自己就不应原谅自己,以为自己只有残余的歪风,不值得那样严重地重视与警惕,事实上对许多同志说来,就不只是残余,有的还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占了自己思想的统治地位。这些歪风在各个区域的表现程度也是不同的,有的区域少一点,有的多一些,有的还是歪风占了统治地位,致使那个区域遭到失败(如山东的湖西地区^[70])。总之,不管哪个区域,哪个同志,毛病都是有的,只是多少的问题。我们应细心来考察自己,认识自己,这是改造自己、健全自己的基础。

彭德怀^[71]同志说:没有自身参加整风的人,是不会认识整风的重要的。的确,上期党校的经验也证明了这点。许多同志对于整风的认识,都是随着整风的逐步深入而逐步深刻起来的,直到他获得了认识自己、改造自己的效果时,才从切身体验中认识到整风力量的伟大。

以上是说的整风的重要性。

整风既然这样重要,为什么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还没有整

起来呢？我以为主要的是在领导上对整风的认识还很不够，所以抓得不紧，办法想得不多。客观上有无困难呢？当然有的，如战争环境、工作繁忙等等，但绝不是主要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整风的重要，就会想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

在这次党校开学的同时，全太行区开始整风运动。我们一定要克服过去的毛病，认真地贯彻下去，完成整风运动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不致像过去一样半途而废，首先是领导问题。领导上一定要抓得很紧，每个负责干部要亲身参加整风，认真突破一点，积累经验，以指导其他。同时，这次还采取了一些具体办法，如每个部门、每个机关，只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大多数干部集中整风，这种办法比过去半日整风半日工作的办法要好，容易行得通，大家精神也能贯注些。照现状看来，只要不半途松弛，一定会做出成绩的。

领导上对整风是更注意了，但更重要的是每个同志要具有正确的整风态度。因此，根据上期党校的经验，向参加本期整风的同志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第一，每个同志都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思想作风整好。首先好好地认识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思想意识有无毛病，毛病在什么地方，然后才会决心改造自己。过去有些同志到党校，目的只是想听听报告，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要知道整风主要靠自己下苦功夫。要自己抱有高度的革命热情和对党负责的精神，才会胸怀坦白，才会有“脱裤子”的精神，也才会把思想作风整好。没有这种决心的人，或者只是企图“秘密”地改正错误，不肯露出“尾巴”的人，是绝对整不好的。上期党校有些同志就吃了这个亏，于党于个人都是无益有害的。

第二,每个同志还要具有帮助别人整风的勇气,这是我们对党、对同志应有的态度。我们不但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还要有批评的精神,要反对那种庸俗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态度。上期党校的整风经验证明:冀南区有些同志毛病不少,但是由于他们有坦率的自我批评和批评的精神,所以收到很好的成绩;太行区有些同志就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收效不如冀南同志大。当然,我们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治病救人;对于别人的批评尤应虚心采纳,作为自己反省的参考,即使是别人对自己的一点感想,也是可贵的。

第三,整风要与检查工作联系,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的方法。这里所说的检查工作,不是专门的总结工作,那是要在整风完成之后才能做的。现在整风中联系检查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更容易打通自己的思想。上期有些同志在开始时,专力于泛泛地检查工作,结果变成了躲风的幌子,这种毛病也是要预防的。

第四,整风中思想上是会感到有压力的。当着一个同志把真理与个人利害对立起来的时候,没有胸怀坦白“脱裤子”精神的时候,特别在别人的帮助与批评之下,自己总是畏首畏尾的时候,一定会苦闷的。这时,我们就要好好地帮助他,使他认识整风不是对人而是对事,在真理面前屈服是可贵的精神,绝不是耻辱。要鼓励他把心中的一切讲出来,以便大家帮助。就是对于那种“两条心”的失足分子,也应好好地鼓励他向党坦白,使他懂得对党说了,党是一定对他宽大的。过去的整风经验证明:当着一个同志经过一番内心的斗争和别人帮助,最后讲出了一切之后,他的精神会马上愉快起来,自己整风更会积

极,帮助别人也更会努力。对于这种同志,我们应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欢迎。

第五,要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对同志、对自己、对上级都应抱有这种态度。在整风期间,如果对北方局、对分局、对区党委有什么意见,都应该坦率提出。虽然在工作岗位上,有上下级之分,但不应顾忌这种区别,无论上级对下级,下级对上级,都要坦白直率,互相帮助。我们整风的小组长、学委^[72]负责人,都要从整风的积极分子中去选择,而不拘泥于平时工作岗位的高低。

同志们,在党校本期开学的时候,我只提供这几点简单的意见作为大家的参考。同志们离开工作岗位,专门进行整风,机会是很难得的,时间虽很紧,只要我们有改造自己、改造工作的决心,就一定能够收到很大的效果。几个月之后,我们对自己的认识,对工作的态度,都会面目一新,党的事业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

创建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我军已胜利完成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之跃进任务,敌人追击计划完全失败。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

(二)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

(三)应向全军说明,我们有完全胜利的把握。首先是有陈谢兵团^[73]在伏牛山、豫西、豫南广大地区及山东大军^[74]在陇海路南北的互为配合。其次是我当面敌人只有二十三个旅,兵力分散,战斗意志薄弱,此次尾我失败,战略上愈显被动。再次是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

* 这是邓小平同志起草的以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名义向所属部队发出的指示,八月二十日又以刘伯承、邓小平名义上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阅后批示,转发彭德怀同志、东北局和华东局。

够克服的。

(四)应向全区群众说明,我们是鄂豫皖子弟兵的大回家,他们的子弟在华北胜利了,壮大队伍了,说明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条件,说明我们决不再走。我们的口号是与鄂豫皖人民并存亡,解放中原,使鄂豫皖人民获得解放。

(五)在军事上,我们在最初一个月内,不求打大仗,而是占领城镇,肃清土顽,争取打些小胜仗(一两个团一次的歼灭战)。同时,特别注意引导大家熟悉地形,习惯生活,学习山地战,为大歼灭战准备条件。但必须了解,如果我们不在半年内歼灭十个旅以上的敌人,就无法使群众相信我们不会再走而敢于起来斗争,我们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因此,任何时候,全军都必须有高度的战斗意志和战斗的准备。

(六)充分发动群众及其游击战争,同我们一块斗争,是实现我们战略任务的决定条件。而我军严格三大纪律八项注意^[75],严整军风纪,是树立良好影响,使群众敢于接近的先决条件。各级必须专门检查实现,万勿忽视。

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 与今后的政策策略^{*}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这次我到豫陕鄂区来,看到情况很好,这是这里的党政军各同志努力的结果,也是从去年七月起全国性反攻的结果。大家希望我谈一谈最近的形势,我想,就拿我们豫陕鄂区根据地的雏形已经具备这个事实,也大体上可以说明问题了。九个月来,全国战局有了新的发展,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转入反攻。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我们击破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计划,使之由进攻转为防御,由外线转到内线,而我们则由防御转为进攻,由内线转到外线,改变了战略形势。

我们几个野战军^[76]出来以后,是吃了苦头的,特别是大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和后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

别山的部队遇到了好多困难。豫陕鄂的部队情况好一些,但总没有在太岳内线那样舒服。鉴于这种情况,或许有人要问:我们的反攻是不是早了一点呢?迟一点好不好呢?事实证明,反攻是恰当其时的,迟了就要犯错误。因为蒋介石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是要把战争扭在解放区打,这是他从长期反人民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如果有同志参加过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77],就会懂得这一点。那时不管在中央苏区^[17],还是鄂豫皖苏区或湘鄂西苏区,都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作战。敌人的方针就是要扭在苏区边沿和苏区里面打,尽情地消耗我苏区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陷于枯竭,即使取得军事上若干胜利,也不能持久。在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56]时,要是按照毛主席的方针,由内线转到外线,将敌人拖出苏区之外去打就好了,那样苏区还是能够保持,红军也不致被迫长征^[18]。可惜“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这样做,中了蒋介石的计。这次蒋介石又想用这个办法对付我们,扭在解放区打,来削弱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使我们不能持久,封锁我们不能出来,好使他保持三万万人口的后方完整而不受损失,来供应他作战。这个如意算盘是高明的,但是还有更高明的毛主席,他从确定自卫战争的方针时起早就看清这一点。他告诉我们,开始必须在内线打,打到一定时候,也就是削弱敌人到相当程度之后,就要打到外线,到蒋管区去打。这样就可以击破蒋介石反革命的毒辣的战略方针。因为在战争初期,我们的装备还不够优良,作战经验还不丰富,内线便于消灭敌人,便于组织和发展我们的力量,便于积累经验,所以先在内线打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取得了胜利的。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七年六月,我们全国各个战

场在第一年的自卫战争中,消灭了一百一十二万敌人。我们把分散的游击部队组成了野战军,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这时时机成熟了,就应该转到外线,否则就要吃亏。拿冀鲁豫来说,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农民的鸡、猪、牲口看见的不多了,村里的树也少了,试问,扭在解放区打,我们受得了吗?如果我们只想在内线作战要舒服一些,就中了敌人的毒计。

现在我们出来九个月了,收获是很大的。有些同志往往不了解这一点。拿我们那边几个纵队来说,在第一年打了很多胜仗,去年七月份二十三天消灭敌人九个半旅,可是一到大别山,前后才歼敌四个旅,因此就有个别的人怀疑是否局面变坏了。其实只要好好地算算帐,就会懂得的。首先,从战略上我们由防御转为进攻,前进了一千里,占领了四千五百万人口的区域,经过奋斗已能控制的有二千万人口的地区,其他二千五百万人口的地区散布着我们的游击战争。在这里,敌人搞不到兵,搞不到粮食。这就是说,在敌人控制的三万万人口里面,去掉了将近六分之一。其次,看看消灭敌人的数目。据最近宣布的战果,全国战场自一九四六年七月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共歼敌将近二百一十万人,三月份至少歼敌十几万人。这就是说,反攻以后九个月的战绩就已经达到第一年的数目,我们吃了苦头,但是换得了更大的胜利,对敌人的打击更沉重了。从中原三支野战军来看,在鄂豫皖,大别山的几个纵队是有削弱,减员约百分之十五,但江汉发展了百分之百,桐柏发展了百分之五十,豫陕鄂这边发展了百分之百,豫皖苏也是发展的。所以,从总体上说,力量比过去大了。

同志们对大别山一定感到是个谜,原先我们占领了二十

多个县城,后来一个也没有了,野战军主力也从大别山转到淮北去了,这能不能说是胜利呢?我说,这也是胜利了。大家知道,中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正当敌人的大门,其中大别山是大门边。我们反攻以后,它代替了敌人重点进攻的山东和陕北,是敌人兵力集中最多的战场。中原形势决定于两个山,一个是大别山,一个是伏牛山,敌人最关切的还是大别山,它比伏牛山更重要,中原要大定就要把大别山控制起来。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大别山,敌人必争,我也必争,这是艰苦斗争的过程。我们在大别山已经建立了两个军区,有一千二百万人口,普遍地完成了开展游击战争的布置,留下的军队散布在每个角落,县、区武装政权都组织起来,我们已经站住了脚,敌人无论如何打不走我们了。事实说明,我们就是游击姿态,也站住了脚。于是,我们野战军才逐步抽出来作宽大机动作战。而前一个时期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大别山的斗争已前进了一步,前进到当地的人民和部队已经能够坚持大别山的斗争了。现在,中原吸引了蒋介石南线的一半以上的兵力,保证了其他地区的胜利展开。虽在全国范围吃苦头最多,付出了代价,但换取了战略上的主动,取得了全局的胜利。所以,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评论战局的时候,第一讲到中原,对中原的成绩估计得很大。

我们有些共产党员,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太少,看见自己头上有一小块云,就认为天下都是云,凭直觉来看问题,凭自己脑袋上面有没有乌云来判断革命胜利或失败,这样,遇到困

难就不会看到光明和胜利,就没有不悲观失望的。我们的力量是发展的,胜利不小,不过外线作战确实不如内线作战痛快、舒服。革命就是不能那样舒服,往后还要更艰苦,越接近胜利斗争越艰苦。谁都希望革命快些胜利,可是,问你敢不敢胜利,问题就来了。不一定希望胜利的人就敢于胜利。要胜利就要吃苦。北方的很多部队不习惯南方生活,就怕过长江。但是,敢于胜利,就要过长江。敌人还统治着几万万人口的地区,只有打过长江去,打到敌人的心脏,才能取得全国的胜利。怕过江的人最懦弱,屈服于困难的人就是革命不坚决的人。真正的英雄,就是要克服困难,准备吃苦,准备勇敢坚决地打过长江。地方工作的同志也是一样。这是路线问题,是革命坚决不坚决的问题。所有中原的同志,都负担着艰苦的任务,全国都在望着我们,我们应该更好地来努力。

同志们一定要问,多久才能胜利呢?任弼时同志的报告^[78]指出,如果我们不犯错误,三五年一定胜利,大家听了又惊又喜。喜的是胜利确定了,惊的是还得三五年,实在挨不过。要晓得三五年并不算长,而且还要力争才能取得胜利。因为我们中国有四万万五千万人口,全世界才二十万万人口,我们的胜利就是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只有二十几年,还不满三十岁,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能成功,真是很幸福很好的了。

说到三五年内就要胜利的条件是不犯错误,在哪些问题上不要犯错误呢?正如中央提出的,有五个问题,在任何一个问题上犯了原则的错误就要失败。

一、战争问题。上面已经说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精心

领导下,二十一个月的自卫战争打得很好,我们的军事力量继续在发展,再过一段时间数量上就可以同国民党军队平衡,现在质量上已经高过他们。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骄傲,特别是打胜仗的部队,更要兢兢业业。敌人有了失败的经验,更狡猾了。我们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要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战斗力。只要能够保持每月歼敌八个旅,十万人,一年总共达到第一年的标准即九十七个旅,一百一十二万人,敌人非失败不可。今后,我们要更加机动灵活,精细地寻求战机。我们的胜利决定在“脚”,发现战机,就要敢于奔袭敌人。要敢于走路,或者脱离敌人,或者远道去打击敌人。

二、土改问题。在全国土地会议^[79]以前,党内有些同志思想上忽视土改,有的甚至有很大抵触,这是非常危险的。什么叫做革命?革命就要反帝反封建,而帝国主义的支柱是封建主义。不反对封建主义,不进行土改,就不能支持长期战争,革命也不会成功。就是把南京占领,不进行土改,封建主义的统治基础还在,也是不行的。所以反对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根本任务。土地会议以后,这种严重的倾向性的问题在全国范围大体上克服了。土地改革不仅是喊几个拥护的口号,它牵涉很多政策问题,需要很好解决。拿新区来说,个别地区土改有成绩,但总是做得不大好的。

三、整党问题。我们党内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不纯的情况是严重的,它会使党丧失战斗力,不能完成革命的任务。因此,为着克服这些现象,非整党不可。如果不整,党确实要腐朽。凡是经过整党的,不论抵抗土改,贪污胜利果实,或背着山头包袱的人,绝大部分都能挽救过来。但整党要整得对,要教育同

志、团结内部,要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毛主席说,只要没有丧失起码的共产党员资格的人,都要挽救,都有办法挽救。像土改要有正确政策一样,整党也要有正确方法。全党同志都应该接受整党,谁也不能强调特殊。大家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缺点和错误,只是轻重大小不同,因此,人人都要反省,来一个自觉运动。不能自觉的,别人来帮助。确实不能挽救的,要洗刷出去。这是整党的严肃性。中国革命的队伍大得很,任务又多,共产党员担负的责任很重。党领导得好不好,中央的路线政策执行得如何,要看共产党员合不合标准。毛主席指示正确,我们如果搞自由主义,处处违反,还是要失败的。经过整党,我们的意志统一了,中央的路线政策能够贯彻执行了,战斗力增强了,人民解放事业才能成功。

四、工商业政策问题。在苏维埃后期^[80],敌人的封锁很严重,盐卖到一块钱一钱。但我们的政策也有错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我们进到中原时,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自食其果。很多同志把原因推到战争身上,说工商业者关门是被敌人抢劫了,很少有人觉得是自己搞糟了。真实的原因找不出来,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大别山的锅厂,以及与锅厂有联系的煤窑、小摊贩等,能养活三万人,锅厂一停工,这三万人就立刻无法生活了。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倒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

看这不是打倒了资本家,而是打掉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家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

五、杀人问题。如果乱杀人,一定要失败。我们到大别山以后,部队很苦,纪律不好,老百姓当时对我们提出两个问题,一是你们可以搞得好些吗?二是你们还肃不肃反?过去张国焘^[81]就犯了乱杀人的错误。这次,岳西有一个地主出身的工作员,在一个乡杀了很多,影响到附近几个乡的工作都垮了。有些被杀的所谓狗腿子,十有八九是穷人。杀人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群众讨论杀人问题时,一面举着手,一面低着头,散了会没走到家就失悔。说明错杀了人必定要脱离群众。

总起来说,在土地会议以前,右的情况很严重。今天,从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倾向是“左”,也有右的倾向,但不是主要的。右的倾向,表现在有的人搞土改不积极,一看见中央提出要讲政策策略,就以为有根据了,说慢慢来吧,我也讲些策略。有的人对整党熟视无睹,强调我这里特殊,我有我的山头,你就不能照顾一下?整党是严肃的事情,不能拿什么山头、过去的熟人或私人关系来原谅,搞那些封建的东西。争取教育是整党的方针,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任何犯错误的人,必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今天的整党中,不论是思想、成份不纯,贪污腐化,作风不好,违反纪律,对战争厌倦,怕过长江吃苦头等等,

都要从思想上好好整一整。最近,恐美病似乎有发展。有的人说,给蒋介石几万万美元和枪炮,我们已经知道没有多大用处了,现在就是怕美国出兵,怕美国的原子弹。很多同志不相信毛主席讲的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82],以为美国出兵凶得很,我们非失败不可。这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是要不得的。特别是作为共产党员,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的革命纲领、革命任务,我们为什么要怕帝国主义?不要说美国出兵不是那样容易,就是出兵,我要反问:你还革命不革命?还要不要反帝这个纲领?还够不够得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具有优良品质的共产党员,应该回答:和他干,干到底!就要有这个气魄。鲁迅先生常常骂的奴才相,共产党员是不能有的。我们要敢于藐视美帝国主义,鄙视那些怕外国人的奴才相,要发扬正气。美国出兵是世界问题,他叫喊出兵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从思想上树立明确的观念,他出兵也一样能被打败,我们一样能胜利。我们要敢于胜利,一切右的思想情绪都得加以克服。

“左”的倾向,表现在土改中划阶级“左”,把地主富农同样对待,侵犯中农,对中农采取拒绝态度;新区工作中犯急性病,打击面宽,工商业政策“左”。这个“左”由来已久,抗战八年,工商业政策就有“左”,对中央的有关指示、六届六中全会决议^[83]未能认真研究执行,结果是打击了我们自己。现在如果不克服“左”的偏向,就不能把土改搞好,也不能把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好。

这些问题,都涉及政策和策略。我们要用心研究毛主席的《新区土改要点》^[84],任弼时同志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基本上可以解决新区土改问题。毛主席提出的策略原则是:利用矛

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85]。这十六个字,通俗易懂。什么叫多数?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加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这是基本力量,这才叫多数。我们要经常拿百分之九十来做标准,看看是否代表了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利益,是否得到他们的拥护。前一阶段土改中一般是把百分之二十的中农丢开了,而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里面实际上又只是贫农团专政。所谓贫雇农路线,是错误的。正确的路线应该是依靠贫雇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封建制度。什么叫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这是在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里面运用的,就是在某一时间内,集中力量,打击一部分,中立一部分。《新区土改要点》指出,打击地主,中立富农,对大、中、小地主区别对待,总的打击面不得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是为了扫除群众运动的障碍。如果大、中、小地主不分,甚至打到富农和中农头上,就像作战一样,是自己给自己筑起障碍。策略的意义,在于排除障碍,使得我们可以大踏步前进。这不是为地主打算,而是更容易团结和领导群众,把事情办好。我们的同志普遍缺乏这种策略思想,甚至拒绝这种思想,打击面很大,弄得障碍重重。大别山就发生这种情况,把小地主、富农“逼上梁山”,拿起梭镖和我们干,群众也受到摧残。最近我们一提出纠正,土顽把枪放下来了。贫农们都说,你们早这样就好了。所以大别山的同志容易了解这种策略思想,因为他们受到的“报应”又猛又快。豫陕鄂这边会不会体会得那样深刻?没有吃亏的,也应该懂得。总之,不要多树敌,应该中立的中立,应该麻痹的麻痹,凡是今天不反对我们的,对我们都有利。如果说这是迁就地主,不搞土改,那就错了。我们是坚定不移地搞土改的,我们

这样做只能使土改进行得更快,否则就叫欲速则不达。

再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但是一个商号倒闭了,或者我们把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帐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我们要组织自己的经济,供应战争的需要。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供给标准如果和华北一样,是完全超过现实可能的,应该依据新区的条件,有个适当的限度。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很正当的办法,光靠印票子不行。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帮助,问题就可以解决。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的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运动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同时,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活上面。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

我们常常说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 ,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全党同志都要学好党的政策和策略 ,这样 ,我们才会无比的强大 ,谁也不能战胜我们。

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

鉴于我们以往在新区所犯的急性病的错误,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在对敌斗争与确立根据地的事业上,造成了许多困难,所以全区都应根据五月二十五日中央关于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86],重新地全盘考虑我们的工作方针和策略步骤。中原全区四千五百万人口,我们业已基本上控制的区域约二千万人口,游击区约一千万人口,还没有到过我们部队的崭新区约一千五百万人口。而在控制区和游击区的三千万人口中,实行了分田的不超过四百万人口,其余的地方大都只分了浮财。因此,在极大部分的区域,包括没有真正分配土地的控制区及一切游击区和崭新区,都应根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共中央中原局起草的关于执行中央土改与整党工作指示的指示。上报中央后,毛泽东同志于六月二十八日代中央复电,完全同意中原局这个指示,并增写了两段文字。中央将这个文件转发给各中央局、分局、前委。邓小平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

据中央指示,“充分利用抗日时期的经验,实行减租减息^[50]和酌量调剂种子食粮的社会政策和合理负担^[50]的财政政策,以便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帮助人民解放军消灭一切国民党武装力量和打击政治上最反动的恶霸分子。在这类地区,既不要分土地,也不要分浮财,因为这些都是在新区和接敌区的条件之下,不利于联合或中立一切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完成消灭国民党反动力量这一基本任务的”。就是在那些已经分了土地的地方,因为问题很多,也应根据这个方针,从现有的实际情况出发,专门研究,订出办法,分别地实行调整。

二

在执行中央这一方针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某些干部的抵触,因此必须使干部从过去所犯“左”倾急性病的严重教训中来认识中央这一指示的全部正确性。我们过去的重要教训是:

子、我们制订的方针和计划,不是从新区的客观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我们到新区不调查不研究,简单地抱着半年完成土改的意愿,不管敌情是否许可,不管群众的和干部的准备程度,忽视了群众工作的艰苦性,把少数勇敢分子的行动误认为是大多数群众的行动,把大军进入后群众一时的热劲,误认为是多数农民已经有了分配土地的觉悟和要求,因而不是有步骤有分别地去领导群众,取得胜利,而是轻率地决定实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而且是有害的。以

大别山为例,有几十万人的地区分配了土地,国民党军结合地富势力很快组织起反攻,集中力量首先打击这些区域或其他工作较好的区域。而这些区域又都是一些突出的孤岛,也便于敌人的打击,所以很快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全部塌台,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领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和地富威胁下,秘密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联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分得很坏很少的土地;或者是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和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地富的土地。这种情况各地区都差不多,大都是由于当地群众并未真正发动起来和组织起来,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真实要求,而由外来干部用行政命令、包办代替的方法实行分配的结果。经验证明,当我们在军事上还没有取得面的控制,国民党和地富武装力量还没有在当地被肃清,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分配土地的要求和组织起来,本地的正派的区村干部还没有大批涌现出来,而外来干部又尚未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的时候,就马上实行土地改革,不仅是主观主义的,而且是冒险主义的。

丑、我们从领导机关到干部,一般地没有正确政策和策略的思想。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历次指示之后,虽然比较好些,有些地区业已开始获得良好反映,但一般体会并不深刻,甚至还有抵触的。由于我们反攻后对中原战局过于乐观,对新区地富力量仍然强大认识不足,以为枪杆加土地改革可以解决一切,所以在政策和策略上普遍犯了严重的“左”的错误。事实上,在

新区存在着广泛的反蒋统一战线的力量。在地富中,特别在知识分子中,并不是没有开明士绅和左翼分子,如安徽有反对国民党桂系^[87]的力量,河南有反对国民党汤恩伯^[88]的力量,我军刚到时,一般中小地主都没有跑等等。但是由于我们打倒一切和一次解决问题的“左”倾幼稚病的思想,忘记了毛主席“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85]的策略原则指示,忘记了抗日时期的宝贵经验,或在过早实行土改上,或在筹粮筹款的负担政策(即打土豪的政策)上,或在工商政策(消灭地富的资本部分)上,或在打人、捉人、杀人问题上,把一批可能联合或中立的社会力量,迅速地赶到国民党方面去并且拿起武器来同我们对立。其结果打击面大,树敌多,不是孤立了敌人,而是孤立了自己。

寅、我们普遍实行了走马点火、分浮财的政策。事实上分得最多的只是一部分勇敢分子,大多数基本群众并未得到或很少得到利益。这种办法虽然也起到一时刺激群众热情的作用,但不能解决群众多大问题,而且地富还利用了分散财产制造群众之间许多纠纷。尤其因为社会财富的过早分散和大量浪费,使军队供给很快发生困难(特别是粮食),很快地把负担全部加在农民身上,引起农民的不满。我们在错划阶级、分浮财、杀人等问题上,都曾打到中农,而尤以在军粮供应上损害中农利益最大,甚至还损害到贫农的利益。此外,我们曾经普遍地采用了粮食折菜金的办法,影响也很大。几月来,从分浮财和粮食折菜金两项中所浪费的粮食,其数目之大,实难估计。如不纠正这两件事,就可以弄翻群众,搞垮根据地。

卯、全区军队和地方无例外地违背了中央的工商业政策,

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任意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的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和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已经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的现象极其普遍。这样轻率地打乱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结果,使很大数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的谋生的道路。这是一个有关广大人民生计的严重的社会问题,还是我们今后在补救上最感棘手的问题。

辰、经验证明,杀人过多不但不能镇压住反革命的活动,反而因此更加增强了敌人的团结和抵抗,引起社会秩序的紊乱与群众的不安和不满,这就更便利了反革命的活动。对土蒋只采取军事打击而忽视政治上的瓦解,一般都是失败的。经验证明,应以政治瓦解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在军事上,又应集中力量,首先打击最反动的部分,中立那些不积极反动的部分。凡是用这种策略的都获得成功。

巳、一般同志到新区后,苦于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急于建设一个后方,安置伤员和机关,也促成了急性病的发展。经验证明,在抗战初期我们实行了广泛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在敌情最严重的区域,也能在大多数人民(包括地富的抗日分子)同情和拥护下安置伤员,建立兵工。而在南下后,因为实行了“左”的政策,打击面很大,树敌很多,反使后方常常受到袭击。敌情最严重、政策最“左”的地方,更是无法获得后方。

午、政权在新区人民中具有传统的威信,是一个极大的组

织力量,而我们却忽略了政权的特殊作用,或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经验证明,人民要求秩序,惧怕混乱,群众普遍要求建立政府,要求安民;而我们则一切经由群众直接解决,筹粮、筹款、收税不用政府,杀人不经过法庭的审判,都引起人民的怀疑与恐惧。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符合于大多数人民要求的,但在新政权毫无准备的时候,我们也失之过于性急,不懂得暂时地有领导地利用旧政府来维持秩序,解决军需,造成了严重的混乱。不成问题的,这些旧政府是不会真心为我们办事的,所以必须尽早地建立新政权去代替旧政权。但在新政权还未建立起来的过渡时期,只要旧政府能够起到维持社会秩序,防止混乱,而又能解决一部分军需的作用,我们对人民都有极大的好处。

未、历来的经验证明,展开充分的宣传活动,扩大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宣传,揭露敌人的欺骗和罪恶,首先在群众中建立和占领思想阵地,这对新区战胜敌人与发动群众关系极为重大,而我们则相当普遍地忽视了宣传工作。比如我们在大别山,不是加强宣传队、剧团、文化工作的组织和领导,而是把这些机构的干部分散去进行土改工作,以致失去或减少了他们的作用。在宣传内容上,一般地只注意土改宣传,而忽视了党的各方面正确政策的宣传。“左”的口号、“左”的词句掩盖了或减弱了党的正确口号和主张的力量。

申、我们对于城市乡村的公共建筑物、工厂、作坊、学校、文化事业、教堂、庙宇,乃至地富的房屋、家具、树木等等,作了相当普遍的严重的破坏,且以军队最为严重,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众说:“共产党军事好,政治不好!”我们许多领导同

志,至今还没有真正觉悟到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破坏性是反动的罪恶的行为,对于人民的利益和党的政治影响都是难以估计的损失。

酉、他如我们许多外来干部作风很坏,对本地干部的作用认识不够,没有一心一意地去发现正派的积极分子,大量地培养他们成为区村干部,反而提升了一批流氓坏人来当干部,也是我们脱离群众的重要原因。

戌、使我们犯错误的重要根源之一,是我们在进入新区之先,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我们一般地对于新区的复杂情况既不知道,进入之后又不研究,凭着老经验(而又忽视了最重要的抗日时期的经验)老作风(而又抛弃了许多有用的好作风),盲目地乱干,这种恶劣的经验主义,使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害。

亥、由于无后方作战和在“左”的错误下自己所造成的困难,特别在斗争紧张的地区,一部分干部的右倾情绪也在滋长。有的人看不见反攻后的辉煌胜利,而迷失了方向;有的人缺乏坚定的战斗意志,而抱着苟且偷安得过且过的心理;有的人对政策对工作采取漠不关心的消极应付态度;有的人甚至对我们向中原进军的绝对正确性表示怀疑,或者认为是过早的举动;有的人对敌人的所谓总体战和特务活动丧失警惕;有的部分对群众利益毫不关心,而尽情地耗费人力和物力;有的部分对新起的武装的许多严重现象,以及由于收编土蒋土匪而引起的群众不满,采取忽视优容的态度;有的领导机关对于党内严重存在的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所有这些都曾给了我们以不小的损害,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才

能使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完全一致,避免工作损失,更有效地获得胜利。

上述错误的检讨,目的在于清醒我们的头脑,使今后不再重复这些错误;对已经弄“左”了的地方,懂得教育干部,说服群众,研究妥善办法,迅速获得纠正和补救。

三

必须着重指出,所有上述这些错误和缺点,都不能掩盖了我们大举进攻后在全中原区的伟大胜利和伟大成就。我们业已有了两千万人口的控制区,一千万人口的游击区;大量歼灭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军;不但如此,由于我们的进军吸引了大量敌人到中原方面,这样就从根本上破坏了敌人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企图彻底摧毁解放区的反革命计划,而将战争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域,不但保存了原有解放区的基本区域,而且使我各路友军在山东,在苏北,在豫北,在晋南,在西北,在东北等地顺利地歼灭了大量敌人,恢复了广大失地,使全局都转入了攻势,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89]。我们的军队虽在个别部队有减员,而在整个来说,则有不少的增加。我们对全国新区工作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就战略形势来说,我们是主动的,在继续歼敌的条件下,我们将更加获得优势,中原全区的解放为时已经不远。这是在执行毛主席和中央的正确战略方针下,全体同志艰苦奋斗所获得的辉煌胜利。这对错误和缺点来说,恰恰是我们最主要的一面,而且就是这些错误和偏向,及因此而造成的若干混乱现象,也是可以纠正可以补救

的。事实上,最近几个月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业已大体上获得了纠正或者正在纠正着,并且已经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便是很好的证明。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工作的成绩,忘记了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据以前进步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并因此损害我们对于胜利的信心,那就是完全不对的,那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90〕

四

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并根据下列的方针和策略步骤进行和调整各方面工作。

子、在控制区,凡是没有分土地的地方,即应停止分配土地的宣传,进行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宣传,立即着手调查研究,创造典型,积累经验,以便在各区党委范围内,制定统一简明的减租减息及合理负担的法令和进行步骤,并据此训练干部,教育群众,准备秋后直到明春,形成一个广泛的双减群众运动。凡是分过土地的地方,则应区别真分还是假分,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还是只在一些孤立据点分了的,问题多的还是问题较少的,而规定出不同的处理办法。一般的原则是,真分的一般应该确定地权财权,不再变动;假分的应该说服群众自愿

改为租佃关系,实行减租减息;一大片地区分了的,而又是环境许可群众要求的,则领导群众继续完成分地工作,同时正确地划分阶级和补救缺点;只在孤立据点分了的,则按情况根据大多数农民意见,不再变动,或说服群众改为减租减息。有问题的则按问题性质,协同群众商量解决办法。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应只根据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意见,而应根据农民群众大多数(包括中农)的意见,并且可以吸收在家地富参加讨论发表意见。

丑、在游击区,应在以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对敌斗争为主的方针下,坚决进行反抓丁、反掠夺、反保甲特务统治的斗争,保护基本群众及各阶层的利益,并按照环境及群众要求,适当地实行双减政策,即一般地在地富同意下实行双减,或者比控制区减的少一些,或者先从地富自愿的减起,都是可以的。在负担政策上,则应确实照顾基本群众的利益。在分配整个负担数目的时候,不可使游击区比控制区还重,而在两面负担的地区,还应酌量减轻。到游击区抓一把的倾向必须克服与严行制止。在游击区应该采取比较隐蔽的斗争方式和组织形式,力求各阶层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党军及土蒋,集中力量打击少数的反动特务分子,切不可过于突出,使群众受到本可避免的摧残。凡是敌人控制力较大的地方,还应采取武工队的斗争形式,实行革命两面政策,以反对国民党正在普遍实行的所谓“总体战”〔91〕。

寅、在崭新区,我们进入之后,应该采取更为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政策,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和地方上最反动的分子,以便于我们消灭敌人,站稳脚跟。在策略步骤上切不可

操之过急。首先要求不要搞滥,然后根据地区的巩固程度,群众的觉悟和组织状况,逐步地实行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改革。因此在政治上要善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争取或联合其较好的部分,中立其动摇的部分,孤立和打击其最反动的部分。切不可打倒一切,帮助敌人团结,把自己孤立起来。在社会政策上,不打土豪,不分浮财,不作经济上的没收,只对个别业已判处死刑的最反革命的分子的本人财产实行政治的没收,并分给群众。而在执行双减政策时,也应经过宣传组织、政府颁布正式法令等步骤,不可毫无准备地贸然进行。在实行适当调剂种子吃粮的政策时,不可采取开仓济贫的办法,亦不可强迫地富拿出粮食救济贫民,而应提倡低利或无利借贷的社会互助办法,或者采取由政府从没收或征收的公粮中抽出一部分举办生产贷粮或临时救济的办法。在新区的最大困难,是军队的供应问题。除了在部队进入之前应作必要的准备之外,可以实行征借粮食和派款的办法,并尽可能地使之合理,亦即是实行合理负担的财政政策。在开始时,我们还应懂得利用旧政权机构来筹办军需(但须同时宣布我们的合理负担办法),避免由我们军队直接去筹,形成混乱。城镇的税收应该保持,可以暂时利用原有的税收机构,而逐渐地加以改造;暂时采用原有的税制,而逐渐地取消几种不合理的苛捐杂税。凡是能够巩固或占领较久的城市,都实行合理的税收政策。只有对某些较富的只能占领几天的城市,才可以由区党委、纵委以上领导机关掌握,经过商会进行一次临时的捐款,其数目不可太大,且应召集商人代表开会,征得同意,千万不得勉强。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军队在新区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必须

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75],严格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保护学校医院及一切公共建筑和财产的政策,禁止对任何东西的破坏和浪费。同时要对农业社会主义的反动性和破坏性作坚决的斗争。

卯、党的领导及各项政策应该充分地通过政权和群众团体去实现。在控制区,应配备大批得力干部到政府各部门中去,而首先要加强的是财经部门(包括财、粮、工商、银行、税收),以便保障军需民生,避免浪费和混乱,及在工作步骤上取得主动。同时注意建立人民法庭,以便接收审理案件,维持社会秩序,避免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的现象。我们的政权性质,依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性质,抛弃中央的“三三制”^[3]政策是错误的。因此,在区村政权仍应绝对掌握于农民(包括中农)的手中,但在县以上政府,目前可根据实际情况,酌量聘请一些进步的工商业人士,及在地方上比较正派的、有正义感的、有相当声望的、赞成反美反蒋、赞成民主和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等项基本纲领和政策而又没有逃跑的开明绅士,当参议、咨议,或吸收参加一定的工作。但是聘请参议、咨议时,必须有合格的人选,而且要经过区党委的审查和批准,切不可滥竽充数,流于形式,甚或用人不当,脱离群众。在游击区,则在武工队的统一组织下,采取县区游击政权的形式,在乡村则保留旧的形式而逐渐加以改造,充实其民主的内容。在不能不应付敌人的地方,可以建立革命的两面政权。在崭新区,除了灵活运用上述原则外,在初期还应善于利用旧的政府,维持秩序,解决军需。

辰、控制区应当普遍建立包括中农在内的农民协会。有贫农团者,扩大成为农协;无贫农团者,不再组织贫农团;有贫农团、农协两种组织者,合并为农协一种组织。农协是乡村最主要的群众组织,必须大量地吸收农民自愿入会,扩大组织基础,防止为少数人垄断自私使之变成一个狭隘宗派团体的现象。农协的领导成分,一般适用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中农占三分之一的原则,并须防止流氓、坏人篡夺领导,使正派忠诚的劳动农民当权。除了农协,在农村还应逐渐建立青年的、文化的、妇女的、儿童的组织,以团结和教育一切群众。在城市则应首先注意建立工会和团结知识青年的组织。在游击区和崭新区则应建立小而精干的秘密的或半公开的群众组织和情报组织,名称不必一律,组织不必统一。局面打开之后,再建立工、农、青、妇各种组织。在已有初步工作基础的地方,即应开始建立精干的党的支部。

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纠正相当普遍存在的轻视城市、放弃城市工作领导的错误倾向。过去城市乡村的工厂、作坊、商店和副业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党和政府要用很大力量组织各种专门机构(吸收工商业主、技师和工人参加),研究办法,使之迅速恢复生产。凡是没收错了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军队和政府机关保存的,应无条件地全部退还;如果已分给群众,则应说服群众归还,或由政府用其他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发还。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

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同时,为了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工商业,政府银行应根据实际情况,举办工商贷款,而集中力量于首先恢复和发展那些对人民生计和军需有密切关系的部分。

午、在执行上述方针政策的时候,必须向群众作充分的宣传和解释,不要惧怕在群众面前进行自我批评。应当向群众适当指明,过去某些“左”的办法,特别是乱打人杀人、破坏工商业、侵犯中农利益、对地富扫地出门、流氓坏人当权等等,都是违反了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政策,于人民不利的,所以必须纠正。应当说明,土地改革是我党始终要贯彻的方针,因为只有土改才能使农民获得比较彻底的解放,我们暂时改为双减,是因为土改条件尚不成熟,双减政策在目前对人民比较有利的原故。说明群众组织起来,正派农民当权,到极大多数农民都真正要求分配土地的时候再来分地,方才会办得公道,不出毛病。在处理具体问题的时候,必须坚决保护群众已经得到的果实,击退可能发生的地富反攻。应当确定,只有对中农被侵犯的财产,才作坚决的适当补偿。对地富的工商部分,也须设法予以退还。至于地富的其他财产,则不应退还;但在分了土地的地方,必须保证地富分得同等的一份土地、房屋和生产工具。争取地富回家的工作,应当广泛进行,但应采取严肃的立场和态度,表明这是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他们回来后,必须向政府登记,声明遵守政府一切法令,不作任何破坏和帮助国民党的特务行为。同时还应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地富特务的反攻和破坏。

未、对地方土蒋、土匪,实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

功者受奖的政策。采取以政治瓦解为主,配合以积极的军事打击的办法,达到完全消灭的目的。应当动员各种力量,劝说官兵回家,政府对于回家的一律宽大处理,不杀不辱,只进行一定的登记手续。对于火线上的俘虏,应采取对国民党正规军一样的俘虏政策,绝对禁止杀戮,并应利用他们去进行瓦解和争取的工作。对于必须处决的首恶分子,应当经过法庭判决予以枪毙,不得采用乱棍打死等非法的丧失社会同情的处死办法。

申、各地地方武装已有相当发展,即应有计划地进行整理和巩固。特别注意加强干部,加强阶级教育,建立党的组织,细心地清洗坏分子和特务分子,严格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同时在巩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在已有的人民武装中,问题更多,亦应采取有效办法,依靠农协进行整理和巩固,严防特务地富掌握。凡是有可靠的农协的村庄,都应将人民武装置于农协的领导之下,并经过农协逐渐地掌握全村的民枪。

酉、强化宣传教育,无论在军队在地方都是刻不容缓的工作。部队的宣传文艺组织即应恢复和加强。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应加强宣教工作的领导,使之完全符合于党的方针和政策。乱写标语乱做宣传的坏现象,应该制止。

戌、培养本地干部是联系群众深入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外来干部的责任。各地必须注意从斗争中,选拔大批的正派劳动的积极分子和贫苦知识分子(包括中农出身的),经过训练,提升为区村干部。党应经常检查这一工作的执行程度。对于地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亦应大量吸收,或送华北学习,或送本地军政学校予以改造,或经过教育后分到外区外乡工作。

亥、军队是在新区进行地方工作的重要力量。少奇同志

说,如果军队不执行党的政策,就等于党的政策在党的主要部分没有保障。所以军队的党和干部,应该警惕自己,认识责任之重大,加强政策学习,爱惜民力、物力,保证成为执行党的全部正确政策的模范。

五

中央指示全党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克服领导机关的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现象在中原区更为严重。由于反攻后处于比较紧张和分散的情况,各个区域的工作不能不带着较多的独立性。但因此而发展了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对党的政策和策略相当普遍地缺乏严肃的负责的态度,工作的松散、迟缓和效能之低,领导机关的放松领导和放任各种错误倾向的自由主义,都达到相当惊人程度。因此,应在各级党的组织和干部中详细讨论中央指示,实行正确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纠正错误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中原的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在完全战胜敌人,保障几十万大军供给等等方面,困难还是很多的,亟需全区同志认真执行中央正确的政策策略和领导方法,及时纠正错误,增强工作效能,才能不断地克服困难,达成解放中原全区的任务。

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 几点意见^{*}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根据一年新区工作的经验,提出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

第一,关于出动前的准备。应包括思想、组织、政策、军事和经济等等方面的准备。我们南进时就是缺乏准备,所以吃了很大的亏。在思想上,农民远离家乡,北方人到南方,都是极大的问题。而到新区(南方)后,又确实遇到许多困难,如吃大米,走山路,走小路,蚊虫多,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打山地战等等,都会影响到干部战士的情绪。所以出征前要向干部战士说清楚,反复说明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划清思想界限,反能巩固士气和信心。十纵就因为作了深入的动员,南进后部队一直是巩固的,情绪一直是好的。在组织上,要有足够数目的干部随军行动,这些干部都须经过任务、政策和作风的训练。在军事上,要有适合于山地战的组织和装备以及山地战术的训练。

* 这是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综合报告的后一部分。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规定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

在经济上,要使部队进入新区后不致马上发生供给困难而破坏政策和纪律。而新区的各项主要政策,尤须在干部中施行教育。

第二,关于展开。进入新区之后,首先的任务是打胜仗,占地盘。两者分不开,但是有矛盾。要占地盘,不能不分散一部兵力乃至削弱一部主力,减少野战力量。但不占地盘就没有后方,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发动群众,就无法供应军需,就不能使敌分散,也就不好打仗,故分遣适当兵力,展开占地盘是非常重要的。中原曾不顾削弱主力兵团抽出很大兵力展开,建设军区、分区和县基干队,今天证明是成功的。对于展开,也应尽可能做到预有准备,大别山因无准备,花了近两个月时间才展开完毕,江汉、桐柏两区吸取了大别山的经验,预先配好分区、地委、专署及县级党政军的一套机构和部队,故十天半月就大体完成了展开的任务。今后到新区,最好事先区分野战军和军区,每个军区为一单位,配齐军区、分区、县等三级党政军机构(包括部队),组成临时支队,一路展开,收效必快。而展开的部队除由野战军抽拨一部外,如有可能,最好能从老区抽调一批地方武装和民兵充任,以免过于削弱野战力量。

第三,关于作战。这要看当时当地的敌情而定,但对在新区作战的困难应有足够的估计。在进入初期,特别要掌握住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我军主力不可轻率作战,因为如果受挫,极易陷于被动,小则大批减员,大则被迫离开。最好采取宽大机动,寻歼弱敌,既可因胜利而巩固信心,又可逐渐熟悉地形及其作战条件而使上下增加把握。一俟敌情地形熟悉,军区及地方工作铺开,伤兵有地方放,再进行一些较大规模的歼灭

战,比较稳当。但这不是说在初期有把握的大歼灭战也不打,更不是说要采取避战的方针,如果这样也会把士气弄得很坏,当然是错误的。特别在困难时候,尤应鼓励部队坚决作战,把敌人气焰压下去,才能巩固自己的士气,大别山去年九月间就有这个经验。作战的另一重要问题是分遣与集中的运用问题。我们区分野战与军区两套的办法,以野战军集中打大仗,以军区部队分遣占地盘,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和打小仗,这就解决了一个主要的分遣与集中的问题。敌人对我,在我大军压境时,采取放弃一切次要城市据点,免被歼灭的办法,接着调集军队,其兵力大于我时,则实行围攻,无胜利把握时,则实行盯梢,使我无喘息余地。所以我野战军也要善于分遣、集结(在山地就食也有时不能不分遣),分遣以分散敌人,造成敌之弱点,而后适时集结歼其一部。其要点则在明了分遣是为的集中歼敌,故分遣时要计算到比较利于集中的条件。我们常常也可以主力监视敌人,而以一部出敌不意,寻求良好战机,如襄樊作战^[92]即其一例。军区部队的运用,也有分遣、集结问题。在展开时,我们多数地区是采取比较彻底的分散掩护地方工作的办法。而桐柏三分区则从两个团中分散小部掩护地方工作,集中一个多团积极歼击反动武装,结果胜利最多,士气民气最好,发展最大。这种方式比较妥善,即在初期应以集中力量消灭敌之军事力量为原则。到新区(山地)的装备特别是轻炮的预为准备和调剂,也属必要。

第四,关于供应。这是在新区首先接触的最大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在毫无工作基础的条件下供应大军,无论内战或抗战时期均无此种经验。在中原曾采用打土豪分浮财用粮食折菜

金的办法,造成极大的浪费和混乱,证明不能再用。今后不打土豪,许多东西要拿钱买,例如没有布条打草鞋,没有废纸用作办公等等,开支势必浩大,如无妥善办法,不可避免地要形成混乱。必要的办法是:(1)带一部分现洋,以半年为期,每月以每人两元计算,可解决菜金、黄烟及草鞋。(2)准备一种军用流通券,随军发行,随军兑换。其缺点是币价无法固定,小商人吃亏,好处是可以应急,在困难时不致过于混乱。发行办法则应作精密研究,票纸印刷避免粗糙。(3)维持城市税收,照旧章程驻一天收一天税,同时适当地向商会筹款。(4)乡村派款。(5)粮食在不能实行合理负担^[50]以前采取征借办法,可以利用保甲征借。但保甲对我必取应付态度,故我应有比较健全的粮食机关随军工作。一俟局面打开,即应实行公粮制度。(6)缴获粮款全部归公,可以解决一些问题。(7)因此,随军的行政机构必须健全,可用战地行政委员会名称,全盘负责管理征借粮食,税收,筹款,接管城市,接收和处置缴获品,必要的没收,银行兑换所诸事宜,军队的供给部门亦归其管辖。战地行政委员会在纵队设分会,旅、团设办事处。必须准备大批干部做这项工作,新区局面打开之后,这批干部即成为财经建设的骨干。

第五,关于社会政策。中央五月二十五日指示^[86]的原则,中原局六月六日指示^[93]规定的执行办法,及以开封为范例的城市政策^[94],是合用的。只要我们不“左”,慢慢地来,就不会出大毛病,就既能团结大多数反对美蒋,又能减少军队的困难。在新区必须经过一个军事时期然后才能进入巩固时期(这是大体的划分)。在军事时期,我们的策略步骤,对群众主

要是政治解放,解除其切身痛苦,对敌人是政治打击,必要的没收也只能是政治的没收,斗争对象集中于最反动的部分。此时期应特别发挥政权的作用和加强宣传工作。政权随军的就是战地行政委员会,展开的就是各级临时的人民政府,一切事情用政权出面比由军队直接出面要好。我们到大别山时,人民对我们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因为人民最怕紊乱,怕无政府,要求有秩序。“不搞滥”的本身,就是团结大多数的大政策。广泛使用一切宣传武器(宣传队,剧团,部队指战员的宣传,政府出布告,开大会,开座谈会,演讲会,画展等等),宣传我们的主张和政策,驳斥敌人的造谣和欺骗,可以占领思想阵地,安定民心,造成新区的新气象。可以广招徕,扩大新兵,招收一些知识青年加入我们的队伍。可以初步地建立小型秘密的群众组织和吸收个别的秘密党员或建立秘密党的小组。我们在抗战初期就是这样做的,收效极大。我们在大别山没有这样做,吃亏很大。一俟军事局面打开,就大体上进入巩固的阶段,工作重心即可放在实行合理负担及有步骤有准备地进行双减^[95],建立税收制度,组织农协,建设党,广泛办训练班等工作上面。

第六,关于武装。每到新区,务必以最大力量建立地方武装,这是我军扩大与补充的可靠来源,也是巩固占领区的重要力量。中原政策搞“左”了,但还能建立或扩大地方武装十二万人左右,如不搞“左”,数目必更大。但在建立时应不惜本钱抽调干部及若干部队以作骨干。民兵在群众未发动以前,则不宜建立。此外,部队到新区一定有一批无衣无食的失业贫民要参加军队,故应强调个别扩军的工作,多年以来,我们对这个工

作都很生疏了。

第七,关于干部。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中原现有干部,计华北调来的一万一千,华东调来的六千,军队抽出者万余,共约近三万,不过这批干部以村级为最多,质量不算高,如全用现职区以上干部,当可大大减少。同时我们总感到干部补充甚不及时,影响工作甚巨,特别是财经干部太少,更感苦恼。按中原区需用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一万万人口的区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同时蒋区干部学生大批回乡,等候大军进入,也是一个大来源。

以上只是提出我军进入新区的几个问题,作为参考。

京沪杭战役^[96]实施纲要^{*}

(一九四九年三月三十一日)

甲、蒋军集结于上海至安庆段之兵力,计有二十四个军七十二个师,共约四十四万人左右。其中直接担任江防者,计十八个军四十九个师;控制于浙赣线上杭、金、衢、徽地区者计有六个军二十三个师。可作机动使用者,大约有四个到五个军。

乙、我第二、第三两野战军全部,以歼灭上述全部或大部蒋军,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目的,决于四月十五日十八时,以全线渡江作战,开始进行本战役^[97]。

丙、判断于我渡江成功之后,可能产生的敌军变化是:

(一)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

(二)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

* 这个纲要是邓小平同志为总前委起草的,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四月三日中央军委批复同意。

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得割断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在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

(三)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

(四)在情况不利于撤退的时候,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

(五)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丁、我军的作战纲领:

(一)战役第一阶段,达成渡江任务,并依据下一阶段之要求,实行战役的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和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

(二)战役的准备,应以能够应付丙项第一、第二两种情况为出发点,要计算到我东线兵团渡江成功之后,可能遇到严重的战斗,故西线兵团应给以及时有力之支援。

(三)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西线之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除留必需兵力协同二野歼灭当面之敌外,主力应与东线三野之第八、第十两兵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

(四)如敌实行第一方案,则应集结三野四个兵团的主力甚至全力于京沪线上的决战方面,而以二野之一个兵团进至衢州及其以北以西地区,截断浙赣线,二野主力应沿江东下担任攻占芜湖及准备攻取南京之任务;如敌实行第二方案,则可改以二野主力出浙赣线,余同第一方案。

(五)如敌实行第三方案,则以二野一部接替南京警备,主力解决浙赣线上之敌,三野全力负责解决沪、杭、无锡地带之敌。

(六)如敌实行第四方案,则以二野解决南京,三野解决沪、杭。在步骤上,宜将上海放在最后解决较为有利。

(七)如敌完全混乱,则依实际情况临机处置。

戊、战役第一阶段——渡江作战的部署：

(一)由粟裕^[98]、张震^[99]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第八、第十两兵团之主力,共六个军及三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第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100]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第七、第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二)由谭震林^[101]同志指挥三野第七、第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

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芜湖之敌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第八、第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并协同第八、第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

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三)二野由枞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迅速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浙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替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102]。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部署,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四)各部队于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友邻兵团渡江,各部队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己、总前委^[103]使用华东局电台,与两个野战军及三野四个兵团联络。三野各兵团,凡有关作战事宜的电报,除发给粟、张外,应同时发给总前委。

庚、有关作战的战术、技术、通信联络、后勤工作诸事宜,由两野战军自行命令规定之。

辛、这是战役的基本纲要,所有规定执行事宜,及随着战役发展之各项处置,随时由总前委以单个命令规定之。

打破帝国主义封锁之道^{*}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帝国主义的各种花样直到封锁 ,其目的在于迫我就范 ,我们的斗争也在于迫使帝国主义就范。我们绝不会就帝国主义之范 ,而一个多月的经验看出 ,帝国主义就我之范亦非易事。这一时期双方斗争实际上都是试探的性质 ,直到英美摊出封锁的牌。封锁 ,在目前说来 ,虽增加我们不少困难 ,但对我仍属有利 ,即使不封锁 ,我们许多困难也是不能解决的。但封锁太久了 ,对我则是极不利的。打破封锁之道 ,毛主席强调从军事上迅速占领两广云贵川康青宁诸省 ,尽量求得早日占领沿海各岛及台湾。同时我们提出的外交政策的一面倒^[104] ,愈早表现于行动则对我愈有利(毛主席说 ,这样是主动的倒 ,免得将来被动的倒) ;内部政策强调认真的从自力更生打算 ,不但叫 ,而且认真着手做(毛主席说 ,更主要的从长远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着眼来提出这个问题) ,毛主席说这两条很好 ,与中央精神一致。我们这样做 ,即占领全国、一面倒和自力更生 ,不但可以立于坚固的基础之上 ,而且才有可能迫使帝国主义就我之范。

* 这是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共中央华东局诸同志的一封信的一部分。信中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邓小平同志的口头指示。

从渡江到占领上海^{*}

(一九四九年八月四日)

这次从上海到北平,应该向各位作一个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要讲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以及到上海后的情况和工作。

渡江作战是从四月二十日夜里发起的。因为反动的南京政府拒绝了人民的八项和平条件^[105],人民解放军一部,即由刘伯承^[16]同志领导的第二野战军和由陈毅^[106]同志领导的第三野战军,奉命渡江作战。在漫长的一千多里的战线上,所有部队都无例外地顺利地完成了渡江任务。我们发动战斗以前,曾经给过反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最后考虑的时间。当他们不愿接受人民的极其宽大的和平条件的时候,我们只有给他们再一次的教训和打击。我们发起渡江作战后遇到的抵抗可以说很小。在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国民党军队摆在湖口至上海段的有四十五万人(包括宜昌至湖口段的共有七十万人)。四十五万人不能阻挡人民解放军渡江。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遭遇到大的抵抗。我们采取宽正面的渡江方法,分了几十个点渡江,绝大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向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代表所作的报告的前一部分。

部分都没有遭遇到强大的抵抗。假若有人问,你们渡江花了多少时间?我们肯定地回答,先头船只最快的一刻钟。我们从四月二十日夜开始,二十四小时内大体上三十万人全部过了江。队伍一过江,敌人就混乱了,他们的想法只有一个,就是如何逃出我们的包围。他们一齐向南溃退,人民解放军立即实行宽正面的追击。在这过程中,南京在四月二十三日占领。到五月初,半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追击。从渡江到追击最远的地方,即福建的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前进一千五百里。在这么短的时间要走这么多里路,并且还遇到小的战斗和下雨,能有这种惊人成绩,是靠指战员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这种英勇精神过去表现在战场上,这次主要表现在脚上。敌人在这样的追击下,没有可能整理队伍。甚至我们的第一梯队已过去五六百里,第二第三梯队还要消灭被第一梯队甩在后面的敌人。五月初完成追击,占领杭州、温州、蒋介石的故乡奉化、宁波,一直到闽北、赣东北这条线。此后,部队就准备进攻上海。上海有二十万敌人,并且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经过一个星期的战斗,我们在五月二十七日占领了上海。这次作战中央命名为“京沪杭战役”。从渡江到占领上海,总计用了一个月零七天,消灭敌人四十余万。我方伤亡二万五千人,其中在占领上海时伤亡一万七千人,在渡江时遭敌机轰炸等共伤亡八千人。我们曾有一个兵团俘虏了敌人六万,自己损失一千一百人,比较起来我们的代价花得很少。

我们为什么能突破长江,迅速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并把我们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原因是,除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毛泽东主席领导正确外,第一,我们军事准备充分,

指战员英勇。在渡江前,蒋介石集团以为我们给他们宽大是表示人民的软弱,以为长江天险不可突破,他们就押这个宝。但是,人民解放军已经有了必胜信心。这信心不单是建立在政治的信念上,而且是建立在实际的准备上。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明白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劳作才完成的。渡江使用的船有一万只左右,所以我百万大军能够渡过长江。再就是我们的人是北方人,北方人怕水。曹操吃亏就在这个地方。为了在水中不发晕,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我们在巢湖北部做了多方面的准备,白天夜晚进行演习。在水中习惯了,有把握了,又考虑到船在江心中弹怎么办?许多战士想出了用草圈作救生圈的办法。草圈比橡皮圈好,橡皮圈一打就破了,草圈不怕打。虽然实际过江时没有用着,这准备是“浪费”了。最后我们在内河演习。我们认为长江并不比黄河厉害。这些信心都是建筑在实际的军事准备上,更不用谈我们的政治信念了。从实际体验中,我们知道了渡江

并不困难。

第二,群众支援,地下党和游击队之配合。有的游击区我们过去有过工作,有些地方过去没有过,但人民都一致支援我们。掘渠翻坝有一半是人民的劳作。在渡江准备的过程里,我们集结主要兵力在芜湖至安庆这个地方,所需粮食一亿五千万斤,其中百分之八十是沿江的人民拿出来的。他们把家里的粮食尽量拿出来,并且表示只要渡江,饿着肚子也不要紧。为解决烧柴困难,人民甚至无怨言地拆房子给我们当柴烧。其他的战勤工作都很繁重,如修路,运粮,找船工。船工一半来自民间,一半是临时训练的战士。江南地下党、游击队配合了渡江作战。我们曾开过江去一支部队,埋伏了十天,敌人还不知道。

第三,敌人的脆弱。我们对敌人估计太高,实际上敌人的抵抗是脆弱的。这从渡江后的追击上可以知道。我们能迅速渡江完成京沪杭作战的任务,原因就在这里。

渡江作战无疑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胜利表示了敌人在长江以南的一支最大的最有组织的力量的覆灭。经过了东北的辽沈战役^[107]、华东的淮海战役^[108]、华北的平津战役^[109],国民党反动派剩下的最大的军队就是放在长江以南这一战线上,他们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有组织的军队了。渡江歼灭了敌人四十多万,就表示国民党再没有有力的抵抗了。这胜利在政治上表示了反动的南京政府的灭亡。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将再不会遭遇到更严重的抵抗了,肃清残余敌人的时间不远了,最后解放全国的时间也不远了。

军事占领后,各城市均先后进行了接管工作。从渡江作战到我离开上海,约三个月的时间,接收工作大体告一段落。一

般说来工作做得还好。所以顺利的原因：第一，中共中央有一套明确的政策，使各城市接收人员有所遵循，并有先解放地区的经验，如长春、沈阳、北平、天津、济南、潍坊、石家庄、郑州、开封、徐州等的经验教训，对解放江南有很大的帮助，使我们少走了许多弯路。第二，各界人民支持。渡江后我们看到，人民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十分厌恶，对共产党各种政策表示热烈欢迎，尤其是工人、学生表现了高度的革命的积极性。如果没有工人、学生高度的热心和积极性，我们会遇到许多困难。不仅是工人、学生，还有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都采取了与我们合作的态度。如南京的工商界、文化界、科学界，自愿帮助接收上海，参加部队等。第三，大势所趋，谁都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再也扶不起来了，即便对国民党曾有幻想的人，都觉得要重新考虑自己的事情了。谁都觉得人民的胜利是肯定的了。尽管还有台湾及蒋介石所吹嘘的二万万人口，但国民党四十多万军队瓦解了，军事组织混乱了。这是大势所趋。许多人都必须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这表现在国民党的旧机构的工作人员绝大部分不走。因为他们不走，把机关、学院、科学研究机构保护得较好，甚至在渡江以前许多人就为保护机构做了很多事情，使接收工作减少了很多困难。这种情形，各城市大致相同。帝国主义、反动派由于大势所趋，人民拥护我们，反对他们，在强大的人民力量面前不得不低下头来。司徒雷登^[110]也只能如此，不敢以对国民党之态度来对人民政府，不敢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人民的态度来对我解放区的人民。即便其态度是含有阴谋的，但在形式上还是把表面的凶焰收起来了。第四，主观方面的努力工作。如前面所说，我们在主观上为渡江接收

事先做了准备工作,包括政治的组织的准备。我们从华东调来的两万多干部都或多或少地经过了政策的教育。进入一个地区后,遵循了毛主席“四面八方”的政策^[111],与各方联系,开了许多会议。虽不完全周到,特别是上海情况复杂,但是主观上是遵循着这个方向来与各界人士通力合作的。在上海,陈毅同志几乎每天参加一个会,甚至两个会,来说明我们的态度和政策,要求通力合作。像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工作,更增加了各方面的支持。这是接管工作做得好的原因之一。

贵州新区工作的策略^{*}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你们六日电对贵州工作的初步意见,一般可用,惟须注意下列各点:

(一)你们在策略上提出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不可树敌过多,防止过左等等,这是很对的。但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112]的方针,因为贵州多年以来,就在中央系统统治之下,这样的口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现在的所谓中央系中的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的分子,减少革命阻力,以便于我们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和发动群众。所以,你们应三番五次地告诉各级干部,在进入新区后,一开始就要注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中立一切可能中立的人,分化敌人营垒中一切可能分化的人,这个策略应包括中央系在内。应明白宣布,凡愿意悔过者均予以自新之路。我们第一步的主要打击对象,是那些继续反对我们的分子,这是因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为二野前委起草的给五兵团杨勇、苏振华、徐运北同志的电报,并报中共中央。中央认为这份关于贵州新区工作策略问题的电报是很值得注意的,于十一月十九日转发各中央局。

为他们不愿改过而且继续反动作恶的原故。你们到贵阳后,还应物色一些左翼分子、中间分子乃至个别的不积极反对我们并表示愿意靠近我们的右翼分子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接管时可用研究组、顾问组等形式去容纳他们。有些具有代表性的表现比较好的中上层人物,还可吸收一些参加各部门的接管委员会当委员。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在事实上同他们合作,遇事同他们商量,倾听他们的意见,采纳其较好的意见,并积极地耐烦地向他们做工作,解释我党政策及共同纲领^[113],帮助他们改造和进步。我们这样做,一定会发生良好的影响,很快同贵州各方面联系起来,对于各种困难问题的解决,一定比较容易些,至少阻力要少些。你们到贵阳后,还应了解地方系(如王家烈^[114]等)、中央系(态度较好的人)、工商界、教育界、少数民族中各代表人物的态度,准备吸收一些人参加省政府,省政府的委员及各厅正副处长,要准备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给非党人士,其他各专区各县都应准备这样做,省政府的初步名单请你们于一个月内提出交我们审查后再请中央政府批准。执行这一政策的主要障碍是干部思想中的关门主义,因此要对党内干部作反反复复的教育,才能保证其执行。中央及毛主席对统一战线问题有明确详尽的指示,已请宋任穷^[115]同志向你们传达。

(二)我们最近与川东各负责同志研究重庆市及川东工作时,认为市的和县的各界代表会议^[116]以早开为好。我们一进入城市就有许多困难问题摆在面前,如货币问题、物价问题、工资问题等等,在乡村首先就有很大的借粮问题和货币问题、治安问题等等。迅速召开代表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不但

比在党内解决好,而且也比座谈会的方式好。请你们也研究这个问题,并提出你们的意见。

(三)在处理杂色武装问题时,要依据不同对象,权衡利弊,审慎处理。我们的目的是达到全部的改编和掌握,但这要有策略、有步骤、有方法,才能做到。在解决某一部分武装问题时还要考虑到对其他部分的影响,不要贪小便宜,不要因小失大,而要从全盘考虑问题。你们所提各项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在执行的步骤和方法上要防止过急的毛病。对少数民族武装,尤其要防止这点。

(四)中央明确规定,所有接收的国民党机构的全部人员,包括军队官兵、政府员工和工厂职工,全部收容起来,一个也不要遣散。执行这一政策的好处很多,宋任穷同志将向你们传达说明,不赘。你们对旧员工规定先发短期的维持费是好的,其具体数目应在到达后与旧员工共同讨论决定,不要简单地由我们党内去决定,这点很重要。此外,你们规定“工人生活维持费一般不低于旧职员,对公教人员待遇按高于旧职员低于职工的标准发生活费”是不妥当的。你们不宜人为地规定工人待遇比旧职员高,尤不可在目前条件下,去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带有危险性的办法。工资问题极其复杂,务必慎重处理,我们将湖南省委最近在长沙的经验发给你们,望好好研究。对重庆,在开始短期内,我们拟按工人职员的原有底薪分三级发生活维持费。每级数目到后才能决定,你们亦可考虑这个办法,但每级数目的规定必须报告中央局^[117]批准才能施行。

(五)新区问题极复杂,应从各方发现与研究,望多请示报

告,以便取得我们的帮助。你们对下级亦应要求他们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在西南区新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五 年五月十六日)

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开会是一种领导方法,是必需的,但到会的人总是少数,即使做个大报告,也只有几百人听。个别谈话也是一种领导方法,但只能是“个别”。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所以用笔领导是领导的主要方法,这是毛主席告诉我们的。凡不会写的要学会写,能写而不精的要慢慢地精。

拿笔有多种。党和政府写决议、指示、计划,发电报,这是很重要的,但指示、电报只能传达到一定范围的干部。任何政策如果只同干部见面,不同群众见面,是不能发生效果的。拿笔杆子中,作用最广泛的是写文章登在报纸上和出小册子,再就是写好稿子到广播电台去广播。出报纸、办广播、出刊物和小册子,而又能做到密切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中心任务,这在贯彻实现领导意图上,就比其他方法更有效、更广泛,作用大得多。

“笔杆子太重”,不会写,怎么办?要同各地区领导同志谈通,说明拿笔杆的重要、新闻工作的重要,不懂得用笔杆子,这

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写文章也不是很困难,主要是要意思好。领导同志具备这个条件:了解情况比较多,看问题比较全面、正确。技术方面的问题是次要的,自己努力,别人帮助,慢慢就会提高。领导同志不愿意写文章,新闻工作同志要主动去做工作。他不愿写,总有一个理由,“不会写,写不了”,或者“没有功夫”,那就主动找他,“你讲我写”,或者找接近领导而又能写的同志来写。但首先还是要领导同志亲自写,新闻工作同志主动帮助,有计划地组织稿件。这样就可以逐步解决领导机关、领导同志运用报纸、领导报纸的问题。办好报纸有三个条件:结合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条离开了领导也搞不好,报纸就没有力量,容易变成“有闻必录”。所以办好报纸的前提在领导。

要办好地方报纸。《新华日报》^[118]最近有进步。我们的报纸要登中央发的一般消息,但作为地方报纸,新华社总社的广播稿不一定全用,要适当选择、改编、压缩、提炼,要考虑对象,能不能看那么多,看了懂不懂。有的小报就比大报办得更结合实际,更切合群众需要,更通俗活泼。当然,需要办大报的地方(大城市)必须办大报,但不是都要办大报。

报纸要结合实际,结合当时当地的中心任务。新华社总社发来的稿件应该重视,但比较好编。领导同志和办报同志的主要精力要放在当地新闻上,要大量刊登本区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报社要时时和领导取得联系,根据本地当前任务的变化,随时调整自己的报道方针。不久前《新华日报》写了一篇专论,讲的是剿匪中的情况,内容主要是批评。正确不正确?也正确。合不合时宜?不合时宜。正确与否要考虑到时间、地点、

条件等因素来判断。在剿匪已经有了成绩,部队又很艰苦很努力的情况下,主要去批评就不合时宜了。放在一个月以前刚刚合时宜。这说明我们的同志对剿匪的实际情况了解不够。现在报纸的影响比过去大了,有些不正确的东西在报上一表扬,就糟了。前几年很多干部不看报,现在不同了,报纸有威信,看到报纸讲什么就要照着去做。很多地方看到报纸批评了的做法,就秘密地改,这就是报纸的作用。社会上很多人看报,看共产党什么态度,人民政府政策如何,要从报上找自己需要的东西,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因为干部群众都重视报纸,我们就要很慎重。

西南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什么?从全区说,一是剿匪,二是完成征粮、税收、公债^[119]任务,三是领导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四是调整工商业、救济失业人员。为了实现这些任务,要召开人民代表会或农民代表会。下一步是今冬明春的减租,也是从全西南提出的。

这些任务完成得怎样?剿匪方面,四川剿匪有很多好经验,报纸要报道,但又不能让土匪完全了解我们的战术。报纸要宣传剿匪政策,宽大与镇压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什么叫胁从不问?不问”是说不问罪,也就是不治罪。有的问都不问一下就放了,这就错了。总要教育教育,坦白一下,群众取保,才能释放啊。总的说,剿匪见效。贵州、云南的情况又各有不同。报纸必须抓住每个地方的特点,这就是指导性。

征收公粮,一般开始时都是轰轰烈烈,但后来很难收上来。万县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比较恰当,要好好介绍、表扬,这

就是实现领导。报纸要用评论、社论加上一连串的报道来领导交公粮。

领导生产,整个情况不算坏。毛主席指示新区要保持原有的生产水平,不使降低,老区还要“长一寸”^[120],这就不容易。当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但是开荒不要鼓励,开荒要砍树,现在四川最大的问题是树林少。有的地方报告,他们从佃富农那里调剂了一部分土地给贫农,据说是自愿的。这样的事报纸不能写社论表扬,不能写消息传播。生产中主要一条方针是不要乱动。凡是无把握的事要慎重一些,先研究一番,或者写个东西,说这个好,但也存在哪些危险性,使群众从另一方面再考虑,这也就是领导。

调整工商业,主要是城市。我们的政策是调节劳资,两利兼顾,否则对整个国民经济不利。我们要扶助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鼓励私人生产的积极性。资方要改善管理,降低成本。最近报上登了些私营纱厂解决困难的报道,应该登,用私营企业的榜样来实现对私营企业的领导。我们扶植进步的、有前途的私营企业,没有前途的要指导转产。调整工商业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资、二劳、三公,一切都要引导到发展生产力。共产党就是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否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一件纱卖五百万元^[121],这里要九百万元,谁来买?不能把关税壁垒搬到三峡来,再来个封建割据。据说有的工商业家对我们的政策有抵触,但他又确实在改,那就好,改好了会感到我们的政策对他是有帮助的。我们正处在大改革之中,破坏是难免的。管理非常不合理的要垮,投机的也要垮。香烛纸钱等迷信品的生产是没有前途的。有些东西的

生产现在要减少,但十年之后还会有发展,如化妆品。我们要引导工商业向健全的方向发展。物价稳定对工商业有好处,最近一些贷款也是在这个基础上才贷出的。对贷款要进行指导,指定用途。如贷给民生公司二十多亿,指定买煤、修船,这样也解决了煤矿业和机器业的一些问题。钱贷出去以后要检查,使之用到适当的地方,否则就造成无政府状态。有些东西生产超过市场需要太多,销不出去就有了问题,要指导转产。

失业主要在大城市。据说重庆有五万人(全市工人二十五万),贵阳一万人(全市工人三万),成都两万人。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

解决以上这些问题,主要是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这是联系群众最好、最主要的办法。在干部中要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也好,哪怕是艰苦奋斗的命令主义也好,都在反对之列。

中央要公布土地法^[122],要无例外地领导各阶层人民学习,因为都牵涉到。学得好,为明年土改^[123]作准备,也为今年减租^[50]作准备。报纸要组织学习、讨论,使党内党外都知道。“十目所视,十手所指”^[124],大家都学习了,了解了,就不容许干部乱干了,对整个领导有好处。

上面说的这些问题,都是报纸要实现领导的任务。在突出的方面要集中力量,有的时候用整版来登,用一个月时间,发表一连串的评论、社论来宣传和贯彻。这样人们就注意了。有没有力量,不仅是质,也有量的问题。质是要准确性,量也要加大,各方面围绕于此,才有力量。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华日报》最近做得好一些。过去

报喜不报忧,现在也报忧了,这就可以医治自满和麻痹。报纸最有力量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过去表扬了几个报,主要因为他们实现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弄得很清楚,应该做的和不应该做的弄得很明确。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什么叫生动活泼?不在文字长短,而是要写出生动的过程,而且有结果。我们有的批评往往只是把问题摆出来了,没有下文。描写过程也不能冗长。批评与自我批评要大大发扬,我们还很不够。领导上,党委和政府,要全力支持通讯员写批评稿,现在敢说话的人太少,要鼓励说话。对有些与事实不符的批评,必要时也要提醒和说明。

从领导来看,办报是大家办报,从新闻工作者自己来看,也是大家办报。报纸真的同实际、同群众联系好了,报纸办好了,对领导是最大的帮助。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党和政府听不到的,报纸能听到,它能摸到社会的脉搏。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把读者来信加以综合研究,常常就能看出来。

任何一个任务不是一家报纸所能完成的。各家报纸接触面不同,要各方面努力,才能把党和政府的声音普遍传播到各阶层群众中去。

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 不良倾向^{*}

(一九五 年六月六日)

今天我讲讲整风^[125]问题。这是个全党的问题。五月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在今年内进行一次整风,这是我们党的第三次整风。

大家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进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整风运动^[63],那次整风主要是克服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目的是把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思想之下,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领导群众,打败日本侵略者。那次整风为七大^[126]作了充分的准备。七大把毛泽东思想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使我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并在这个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以后又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的蒋介石,才有了全国的胜利。没有那次整风,今天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整风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即三查三整^[127]。这次整风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战争非常艰苦,又处在接近胜利的关头,正需要我们更加密切地联系群众以争取胜利,而党内存在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重庆市第二次代表会议上的报告。

着成分不纯作风不纯的现象,一部分同志有消极失望的情绪和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这些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前进。经过三查三整,克服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团结了全党,进一步联系了群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

当然,在这两次整风中,都有一些缺点,但是不能因为有些缺点,而掩盖了主要是成绩的一面。这两次整风对党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

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第三次整风。这次整风是处在工作任务更加繁忙的时候。我们面临三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这次整风要吸取前两次的优点,避免前两次的缺点。

这次整风主要是查思想、查作风,看我们的同志对党的革命事业抱什么态度,在各种运动中是否执行了党的政策,是否联系了群众,工作是否做得那样好,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目的是经过整风,克服思想上政策上的混乱现象,达到思想上的统一,政策上的统一,使工作在已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

那末,目前我们党内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中央指出,主要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其中更主要的是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之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必须指出,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检查我们党和党员的工作,不能只以“努力”二字来衡量。努力,表示想把事情办好,这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起码的品质,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看努力的结果。有两种努力,一种是执行了政策,联系了群众,做好了

工作,完成了任务;另一种是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成不了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我们要区别这两种努力,提倡正确的努力,不赞成那种不正确的努力。党内犯官僚主义错误的同志,有些也是很努力的,所以有个新名词叫“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从遵义会议^[68]以来,我们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但是路线正确并不等于解决了一切问题,还要看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是否正确执行这个路线。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如果下面不很好执行,那有什么用呢?所以说,尽管绝大多数同志是努力的,但并不就是一切情况都好,一切都胜利,还要检查一下是怎样努力的。

拿川东的征粮来说,就有这种情况。有些县完成得很好,有些县则完成得很差,而同志们都是很努力的。检查一下,完成任务的往往比未完成任务的在执行政策上偏差要小一些,工作做得入情入理一些,在方法上又善于开好各界代表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善于依靠农民群众,善于团结农村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善于运用保甲长并使他们在农民群众的监督之下进行工作。也就是说,我们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少一些。这就说明,努力加上方法正确,才能完成任务。这里面包括政策与作风两个问题,而总的是联系群众的问题。

重庆的工厂企业也是这样,凡是正确执行政策和工作作风好的,就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如南桐煤矿,干部并不多,但是工作做得好,原因就是实际从实际出发,联系群众。在上级还未提出废除把头制^[128]时,他们已经发现这个制度不合理,而且改革了。又如码头,干部也不多,而且工作复杂难做,但是他们

做得比较好,因为他们能够走群众路线,先摸清情况,然后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又如兵工厂,由于生产尚未恢复,开始只发生活维持费,工资较低,工人普遍不满意。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简单下个命令,出个通告;二是开代表会,说服工人。他们采取了后一种办法,由工人推选代表,开了几天会,刘司令员^[16]也去讲了话,结果,包括原来准备向工业部作斗争的代表在内,全体举手赞成不增加工资。究竟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好,还是依靠群众、说服群众好,事实作了最好的回答。

我们到西南的干部很少,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在这种情况下,依靠什么办法来做好工作?唯一正确的办法是走群众路线。但是,我们常常见到有些同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看自己执行政策上和思想作风上有没有问题,而是埋怨上级给的任务重,干部少,群众条件不好。重庆码头和南桐煤矿的工作经验,对于这种错误的说法无疑是一个严肃的批评。

有的同志还一遇到困难就怪到新参加工作的干部身上。这是不应该的。由军队和老区来的三万干部,到新区做地方工作,是新干部的老师,你怎么教,他就怎么学,而且学会了之后很难改变。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这三万人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所以,这次整风是非常必要的,整风的对象也主要放在这三万人身上,最主要的是克服严重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特别是命令主义。

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毛主席指出的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官僚主义、命

令主义与毛主席的教导恰恰相反。沾染这种作风的人,不可能实行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不可能联系群众,不可能进行自我批评,也不可能完成任务,其结果一定是损害党的工作,损害党的信誉。

还有两个错误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

统一战线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毛主席在《共产党人 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一个是统一战线问题,一个是武装斗争问题,一个是党的建设问题。在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问题上发生错误,都会使革命遭受失败。这就是说,如果仗打得好,党也很团结,但统一战线搞不好,革命也要失败。中国革命之所以胜利,是三个问题都解决得好。但是,是否在革命战争胜利后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呢?不能够的。过去需要统一战线,今后同样需要,不仅需要,而且还要进一步巩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失败。在最近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又强调了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党内真正懂得统一战线问题的人还不多。有的同志虽然不反对统一战线,但是遇到具体问题还是怀疑。如对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上,有些党内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这些倾向都大大妨碍了党的任务的贯彻执行。

统一战线是马列主义战略策略原则的具体运用,它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即使是中立一时、将来还可能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也要使其中立。这样就能把可以争取的人都争取过来,缩小敌人的圈子,以便打倒主要的敌人。有些同

志在工作中往往存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变成狭隘的宗派,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些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有的同志以老资格自居,认为反正你不是共产党员,不让人家有职有权,非要人家服从自己不可。有的同志认为战争胜利了,不要别人也行了。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如果在共产党员中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将受到很大的损失。道理很简单,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的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同非党人士合作会遇到一些麻烦,他们也会有不正确的思想认识问题,这要慢慢地帮助他们。中央规定,凡是党员与非党员合作不好,首先是党员负责,不管你有理无理。不这样,统一战线就不能巩固,就会使自己孤立起来,就会做不好工作,就会增加对革命的抵抗力,这对人民的事业非常不利。当一个共产党员,就要自觉服从党的路线和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好工作,并经常准备吃亏和遇到麻烦,工作做坏了,还要受批评,而且终生都应该如此。

在统一战线中保持党的领导,这是很对的,但是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呢?首先,要坚决地执行由我党提出的为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113]和中央人民政府发布的每一项法令、文告。其次,要善于团结党外人士去

实现共同纲领和执行法令。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熟悉共同纲领和政府法令,不懂得运用这些武器去团结和教育人民同敌人作斗争,那末不仅说不上什么领导,而且还会做出违反共同纲领和政策的事情,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使自己完全居于无理和被动的地位。今天的不幸情况,恰恰是有些共产党员不学习不运用共同纲领。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背得烂熟,在讨论工作和政策时,能够引经据典,充分说理。而我们的一些共产党员却往往瞠目不知所对,有的甚至最后拿出蛮不讲理的本事来。试问,这还说得上的领导吗?第三,共产党员除了应成为执行共同纲领和遵守法纪的模范之外,还需要具有纯正的作风,就是要有不怕麻烦、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要有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计其他的工作态度。有些同志以为天下是我们打下的,一切要服从我们。这是非常错误的。实际上群众不一定会服从你。领导不是自封的,要看群众承认不承认,批准不批准。领导作风恶劣,群众就不会服从;领导犯了错误,群众就不批准。或者有人说,我革命时间长,本领大。但群众不跟你走,你就一事无成。

我们党内有这样两种人。一种人老是拿共产党员的牌子和革命多少年的资格去压别人,硬要党外人士服从自己,说话态度生硬,架子摆得很大,以为这就是“领导”。其实只能令人讨厌,脱离群众,使自己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地步。另外一种人,虽然本事不大,但是能够同党外人士虚心合作,遇事共同商议,共同决定,工作勤勤恳恳,结果事情办得很好,也得到人家的尊重。所以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既坚持共同纲领,又态度坦白诚恳和具有说

服力,这样就是批评别人,别人也愿意接受,这才算是好的领导。朱总司令说:我们同党外人士比,是拿全党的整体来比,拿个人比,不一定个个比党外人士强。不要看不起党外人士,我们的经验他们很快就可学会。如果我们不进步,许多青年会很快地走到我们前面。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前进,就是尊重别人,虚心学习。老同志之所以可贵,不只是在于他们有功劳有经验,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不自满不骄傲,能够同群众一块,不疲倦地继续前进。如果骄傲自满起来,不前进,脱离群众,那就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就会前功尽弃,变成妨碍别人前进、妨碍事业发展的庸人。

现在各级政府正在进行人事安排,今后会有许多党外人士当部长、科长,如果有些党员同志当副职,一定要接受人家的领导。这同党的领导并不矛盾。只要党员正确地执行政策,就体现了党的领导。即使党员是正职,党外人士是副职,也要遇事商量,真正做到党外人士有职有权。

对旧工作人员也要诚恳地给予帮助,不要口口声声称人家“旧人员”。要尊重他们,使情感融洽起来,这样才有利于帮助他们进步和改造。

再讲一讲蜕化腐朽思想。这个倾向正在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很多。无论城市农村,贪污腐化现象都很严重。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欺骗的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

志。

以上就是我们这次整风要加以克服的不良作风和不良倾向。产生这些倾向的根源,是这些同志认为革命胜利了,可以睡觉了,可以骄傲了,应该享福了,不必努力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从革命战争来说,我们是取得了基本的胜利,但是敌人还很多。就目前说,土匪为患还很严重,封建势力原封未动,征粮收税任务的完成都还差得很远。我们的任务非常艰巨,困难还很多,有哪一点值得骄傲呢?苏联革命成功以后很长时期还是非常困难、非常艰苦的。现在我们也只能实行供给制^[129]。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

这些倾向还表现了我们党的组织生活太差,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特别是在领导同志中间。最近我们接到好几个同志的匿名信,揭发了一些问题。这些写信的同志是好的,但他们用匿名信的方式,这也反映了一些部队和地方党内生活不民主、不健康,党员的正气还抬不起头来。

这些倾向能不能克服呢?任何一个革命阶段,总有一些渣滓要沉下来的。但我们绝大多数同志的本质是好的。沾染不良作风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转变思想,纠正错误,继续前进的。这次整风要避免过去的缺点,着重启发诱导,通过检查半年来的工作,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要根据“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着重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只有个别品质极坏的,如严重的贪污腐化及有意识地破坏、抵制党的政策的人,才给予纪律处分。希望每个同志积极参加整风,以便迎接今冬明春的减租和明冬后春的土改运动。

我们要在整风的基础上把党公开。中央局准备发一个指示,无论城市、乡村、工厂、机关,党都要公开。公开的好处很多,老区都有经验。有的同志怕把表现不好的党员公开出来。丑媳妇总要见公婆的嘛,让群众来监督批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严格党的支部生活极端重要,没有支部生活就没有战斗力。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政府的监察委员会要建立和加强起来,这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监督党员遵纪守法的重要武器。

要把学习搞好,认真建立学习制度。要加强对学习的领导。市委、直属党委要研究这个问题。过去所以发生许多毛病,就是因为有些同志不重视学习,陷于事务主义的泥坑,不能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学习可以使我們向前看,可以澄清各种混乱的思想。除了整风以外,我们所以采取这些措施,目的在于克服缺点,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关于西南少数民族问题^{*}

(一九五 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一个小学生。同志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我要多,又是专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今天主要是把西南的情况,同少数民族的问题联系起来讲一讲。

少数民族问题,在西南来说是很重要的。我们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地区,一个是西北,一个是西南。恐怕西南比西北还多,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西南的国境线从西藏到云南、广西,有几千公里,在这么长的边境上,居住的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问题解决得不好,国防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好。因此从西南的情况来说,单就国防问题考虑,也应该把少数民族工作摆在很高的位置。

西南的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现在还不清楚。据云南近来的报告,全省上报的民族名称有七十多种^[130]。贵州的苗族,据说有一百多种,实际上有些不是苗族。例如侗族,过去一般都认为是苗族,实际上语言、历史都不同,他们自己也反对这么说。从这一情况就可看出,我们对少数民族问题不仅没有入门,连皮毛还没有摸着。当然经过三两年工作之后,对各个民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欢迎赴西南地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大会上的讲话。

族有可能摸清楚。历史上弄不清楚的问题,我们可能弄清楚。

在中国的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的隔阂是很深的。由于我们过去的以及这半年的工作,使这种情况逐渐地在改变,但不是说我们今天已经消除了隔阂。少数民族要经过一个长时间,通过事实,才能解除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他们同汉族的隔阂。我们要做长期的工作,达到消除这种隔阂的目的。要使他们相信,在政治上,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真正平等的;在经济上,他们的生活会得到改善;在文化上,也会得到提高。所谓文化,主要是指他们本民族的文化。如果我们不在这三方面取得成效,这种历史的隔阂、历史的裂痕就不可能消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只有在消除民族隔阂的基础上,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才能真正形成中华民族美好的大家庭。我们是有条件消除民族隔阂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实行的是大民族主义的政策,只能加深民族隔阂,而今天我们政协共同纲领^[113]所规定的民族政策,一定能够消除这种隔阂,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

我想讲点西康^[131]藏族的情况。过去藏族与汉族的隔阂很深,但是我们进军西南,特别是宣布了解放西藏的方针,提出十项条件^[132]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他们的情况怎样呢?过去西康的反动统治把他们搞苦了。我们进去以后,首先宣布了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同时我们军队的优良作风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例如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75],尊重藏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住喇嘛寺等,这样就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他们说,我们的军队太好了,老百姓的房子,就是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这是实

行正确政策的结果。历史上的统治者,何尝没有宣布过好的政策,可是他们只说不做。我们的政策只要确定了,是真正要实行的。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所以这个政策的影响很大,其力量不可低估。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

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我们党曾经做过一些工作,产生过好的影响。长征^[18]时,红军经过的地方,如云南、贵州,散布了一些革命的种子,就是在西康,也有一些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为了自己的生存,做了一些犯纪律的事,那时饿了,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藏族人士也很坦白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

经过这些历史上的工作,加上今天的工作,我们完全可以解决几千年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把各民族团结好。在世界上,马列主义是能够解决民族问题的。在中国,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也是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只要我们真正按照共同纲领去做,只要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就会把事情办好。只要一抛弃大民族主义,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不能首先要求少数民族取消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出现了。

我们进军西南以来,有这么一个概括的认识:西南的民族

问题复杂,西南民族问题必须解决好。这牵涉到各方面的工作,但我们对情况又了解得很少,因此强调要采取非常稳当的态度,从一开始就把民族关系搞好。强调解除各民族对人民解放军的顾虑,解除民族之间的隔阂。对少数民族的许多事宜,不盲动,不要轻率地跑去进行改革,不要轻率地提出主张,宣传民族政策也不要轻率。在实际行动中严格执行纪律,不侵犯他们一丝一毫的利益,包括征集公粮也要照顾他们的实际困难,首先保证决不能超过历史上的负担,只能少于历史上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少数民族里面,正是由于过去与汉族的隔阂很深,情况复杂,所以不能由外面的力量去发动少数民族内部的所谓阶级斗争,不应由外部的力量去制造阶级斗争,不能由外力去搞什么改革。所有少数民族内部的改革,都要由少数民族内部的力量来进行。改革是需要的,不搞改革,少数民族的贫困就不能消灭,不消灭贫困,就不能消灭落后,但是这个改革必须等到少数民族内部的条件具备了以后才能进行。

现在我们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消除隔阂。只要不出乱子,能够开始消除隔阂,搞好团结,就是工作做得好,就是成绩。如果我们患急性病,像在汉族区域一样,总想很快地拿到粮食,很快地把群众组织起来,使工作见效,那就非出乱子不可。过去其他地区出了些乱子,其中极重要的原因就是患急性病。这教育了我们的许多同志,不能患急性病,来一点“慢性病”没有关系。“慢性病”不会犯错误,急性病就要犯错误,别的事情既不能患急性病又不能患慢性病,这件事情不要怕患“慢性病”。当然我们还是要做工作,不能因为怕患急性病就睡起觉来,要稳步地做,摸准情况前进。团结的基础巩固一

步,工作也就前进一步。我们有些同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患急性病,因此领导上要经常防止急性病。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做工作,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准出乱子,不能把事情搞坏。一百个干部有九十九个做得好,有一个干部出乱子,也可以把事情搞坏。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要少而精,不在数量而在质量。他们要懂得民族政策,真正想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不准一个人出乱子。必须保证这一点。这个时期西南在民族问题上还没有出什么乱子,原因就是工作稳当,这就叫成绩。

那末,到现在工作做得够不够呢?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做工作,否则就要出乱子。举例来说,共同纲领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纲领宣布了,少数民族很高兴,在高兴的同时,就要问什么时候实行,如何实行。他们要求兑现。如果半年不兑现,一年还不兑现,他们就会不相信我们的政策。这个政治上的问题,不解决不行。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遇到过这个问题,比如在内蒙古,这方面是有经验的^[133],在陕甘宁边区的北面,也有些经验^[134]。而在广大的新区,还没有经验,对许多干部来说还是个新问题。但是现在必须开步走,因为少数民族的要求是迫切的。在西康,有的代表人士甚至还想在实行区域自治时用“波巴政府”^[35]这个名字。现在这件事还没有谈好,不过一定要有一个他们满意的名字才行。西康有许多地名是汉人取的,我们叫惯了,不等于他们习惯。这还是一个名称问题,其他问题就更复杂了。比如康东过去划有县,有一二十年的历史了^[136],现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还保存不保存县呢?从发展

前途看,保存县有好处,而且已经是习惯了的,但是他们赞成不赞成呢?有一个原则,他们不赞成就得取消,另外划。还有,在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时候,少数民族内部问题如何解决,有的过去打冤家,你打过来,我打过去。这主要是过去推行大汉民族主义的反动统治阶级挑起来的,是大民族主义统治弱小民族的手段,但是他们内部也有很多利害关系。我们应该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使他们团结起来,不要再打冤家。又比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我们派不派干部?派是必要的,但一定要少而精,要派真正能帮助他们的干部,至于用什么名义,这要跟他们商量。我们的同志去工作,是一件苦差事,思想要搞通,要有一些愿意做这个工作的同志去那里工作。这一系列问题,牵涉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

今天我们在西南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首先开步走的应是康东,因为各种条件比较具备。第一,藏族同胞集中;第二,历史上有工作基础;第三,我们进军到那个地方后,同藏族同胞建立了良好关系;第四,那里还有个进步组织叫东藏民主青年同盟^[137],有一百多人。有这些条件,就能马上去做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可以直接影响西藏。其他地方也要积极创造条件去做,不能只停留在口号上。有些地方也可以先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138]。比如大小凉山是彝族聚居区,应该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现在条件不够,这样的地区暂时只适宜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这对他们更有好处。云南、贵州也是适合于成立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还可以在联合政府下面,实行小区域自治,比如一个民族聚居乡。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

权利。

从经济上看,现在不开步走也不行了。比如西康,这方面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现在我们只进去三四千人,一下就借了七十万斤粮。一些进步的上层人士帮忙很大,不但把粮食借给我们,而且价钱公道。但是老是这样不行,少数民族群众负担不起。再如市场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这些经济问题也遇到了,如果不解决,就会动摇政治的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不把经济搞好,那个自治就是空的。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毛主席对西藏问题就确定了两条,第一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二是进军西藏“不吃地方”。这两条搞好了,才能解决西藏问题,才能团结起来巩固国防。这两条对所有少数民族地区都是适用的。政治要以经济做基础,基础不坚固还行吗?如果我们只给人家一个民族区域自治的空头支票,而把人家的粮食吃光,这是不行的。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在汉族地区实行的各方面的政策,包括经济政策,不能照搬到少数民族地区去,要区分哪些能用,哪些修改了才能用,哪些不能用。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研究出另外一套政策,诚心诚意地为少数民族服务。比如贵州的少数民族,大多住在山上,如果我们能够给他们解决吃盐的问题,那就一定能够得到他们的拥护。又如西康现在还不通汽车,怎样在经济上同内地沟通,从内地进什么货,他们的东西怎么运出来,价格如何,怎样使他们有利可得,这些都要妥善处置。我们在贸易上实行等价交换,但是有时还要有意识地准备赔钱。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很重要的一环是贸易,经济工作应

当以贸易工作为中心。要帮助少数民族把自己的贸易活动组织起来,这不是我们能够包办的。贸易中要免除层层中间剥削,使他们少吃亏。这样经济就活了,他们的生活也就会好起来。目前的关键就是首先要使他们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地从农、工、牧、商等方面发展。

在文化方面,也有许多工作要做。要尽快提高少数民族的文化水平。应在少数民族地区举办一些教育事业,动员一些人到那里去办学校。现在最好先办一些训练班,着重宣传民族政策。办学校最困难的是没有教员。我们不是没有经费,不是其他问题,就是没有人教课。西南人才缺乏,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迅速创办民族学院,吸收一些青年进民族学院深造。同文化教育相联系的还有卫生问题。少数民族地区卫生工作也很重要,那里迫切需要医药。在当前来说,文化工作首先要以卫生工作为中心,卫生工作作用很大。

所有这些事情,政治的也好,经济的也好,文化的也好,现在都要开始去做。所有这一切工作,都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要同少数民族商量。他们赞成就做,赞成一部分就做一部分,赞成大部分就做大部分,全部赞成就全部做。一定要他们赞成,要大多数人赞成,特别是上层分子赞成,上层分子不赞成就不做,上层分子赞成才算数。为什么?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进步力量在那里面很少,影响很小。将来这个力量发展起来,会起很大的影响,现在不起决定影响。现在一切事情都要经过他们上层,要对上层分子多做工作,多商量问题,搞好团结,一步一

步引导和帮助他们前进。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我们有些同志往往采取激进的办法,以为不通过上层分子能搞得更好。事实上不是搞得更好,而是搞得更坏,不是搞得更快,而是搞得更慢,因为阻力大。对上层分子的工作做好了,推动他们进步了,同我们的合作搞好了,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推进工作,就要顺当得多。有的同志思想有顾虑,以为这样做会丧失阶级立场,不懂得在那里阶级立场表现得不同。什么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就是现在不要发动阶级斗争,做到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团结,这就叫正确的阶级立场。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依靠上层,而是通过他们慢慢影响各方面的工作。

附带说一说,有一些特殊问题,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解决。比如我们在少数民族地区确定不搞减租^[50],不搞土改^[123],但是贵州苗族人要求减租,要求土改,而且比汉人还迫切。究其原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贵州苗族中地主很少,他们绝大部分种汉人的地,而且是山坡地。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如果不允许他们实行减租、土改,那就是大汉族主义,就是不直接照顾他们的利益。但是这样的要求,可能苗族上层少数地主分子不赞成。所以我们特别作了规定,凡是种的土地是汉人地主的,就实行减租、土改,而种的土地是苗族地主的,就不实行减租、土改,由他们本民族慢慢地采取协商的办法去解决。这就是说,减租、土改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是完全不提,有些地区还应该进行,但必须有一个条件,就是他们有这个要求,而且不是少数人要求,而是大多数人要求,不是我们从外面给他们做决定,而是由他们自己做决定。又如,在少数民族地区,怎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怎样成立联合政府,要考虑方式方法问题。

可以采用召开各类代表会议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内地收效很大。通过代表会议征求意见,商量研究,可以避免主观地决定问题。有时我们是一番好意,就是做出的决定不正确。但即使决定正确,如果没有通过他们,也会遭到反对。只要通过他们,即使有的决定还有缺点,他们也是会拥护的。

最后谈谈工作态度问题。我们的工作方法就是刚才谈的,一切事情和他们商量,用开代表会议的方式解决问题。我们的工作态度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最近我们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方面,也要老老实实。我们要主动向他们说清楚,正是因为风俗习惯不同,容易引起误会,容易犯忌讳,可能得罪了人还不知道。有些生活习惯我们很想学,但是一下学不会,也勉强不得,请他们原谅。这就叫老老实实。这样容易得到同情。我们做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应该采取这种态度。

中央民族访问团^[139]这次到西南来,必定对我们帮助很大。你们在少数民族方面研究、了解的东西比我们多得多。特别是你们下去以后,亲身接触具体情况,会发现许多问题。我们很希望同志们研究各种问题,多提意见,哪怕是一个片面的意见,也比没有意见好。现在我们就是苦于没有意见。同志们在这方面不要客气,有什么感觉就跟当地同志说。下面有些同志可能主观性强些,你们可能碰一鼻子灰,或者对你们提出的问题不重视,或者对问题见解不同,而且很可能他们的见解是错误的。遇到这样的事,你们不要生气,可以给我们写信,或者给省里的同志写信,总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假如你们有些意见不对,我们也告诉你们。这样,依靠同志们的工作,我相信可以

解决西南最复杂的又是最重大的问题——民族团结问题,至少可以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在西南局城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提纲

(一九五 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这次西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其目的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在今后以更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同时着重解决城市工作最中心的而又是今天最薄弱的工厂管理、工会工作和在工人阶级中建党这些重大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段君毅、蔡树藩、张霖之、于江震^[140]四同志分别作了报告,我完全同意这些报告的内容。

我要讲一下城市工作中的一般性的问题。

一、城市工作的情况。

西南一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按照新区发展的规律,在工作步骤上,随着城市的接管,我们工作的注意力以农村为重点,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与党的二中全会^[141]“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的方针是不相违背的。在明年,紧接着减租^[50]退押^[142]运动,我们将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123]。因此,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还要将指导重点放在农村,但同时必须以较多的注意力加强对于城市工作的领导。

由于领导上集中力量于农村,过去一年城市工作的成绩

不如农村那样显著,但也有了不少的收获。

初期的城市接收工作是做得比较顺利比较好的。在建立革命秩序,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恢复或维持工业生产,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改造旧人员,开展时事学习运动,恢复或维持学校教育,组织工人、学生,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116]和开展统一战线等方面,都收到了一定的成绩,也有了一些经验。我们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是努力的。

但是,在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的许多重大问题上,我们还只有一些零碎的经验,还没有系统的经验。从中央局起,我们还没有系统地研究城市工作的经验,并加以普及和提高,特别是工厂管理和学校教育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我们的经验更差。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西南城市和较大镇子的人口近一千万,同时农村在经过减租退押和土改之后,更加要求城市的领导。如果我们不加强城市工作,“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143],如果城市前进的速度落后于农村,就有城乡脱节的危险,我们就会犯大错误。

二、城市工作做什么?依靠谁?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示说:“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

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144〕“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145〕

这个指示规定了城市工作同志的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用全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而我们城市工作今天最薄弱的环节,则正是最中心的生产管理问题。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加以努力。因为不搞好生产事业,特别是不搞好工厂管理,就不可能把消费城市变为生产城市,把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

城市工作大体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

第一,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恢复和发展生产,学会对于工厂、矿山、交通、市政等近代工业的管理。

第二,组织、教育青年学生和团结文化教育界,管好学校教育,动员知识分子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势力的斗争。城市是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城市革命斗争的重要力量。

第三,在经济战线上,从贸易、金融、财政等方面,加强市场管理,完成税收任务,稳定金融物价和疏畅城乡交流。

第四,加强公安工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匪特的斗争,巩固革命秩序。同时要加强清除帝国主义、国民党残余影响的思想斗争,及配合农村的反封建斗争。

第五,加强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工作,城市中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资产阶级,在这一方面要做更多的工作。用代表会议的方法去组织、团结和教育市民,参加城市的管理和建设工作。

所有这些方面都应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146〕

依靠谁来做好这些工作呢?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如何依靠呢?

第一,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工人阶级的作用,不依靠工人就无法搞好工业生产,就不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所以要反对党员和干部中那些轻视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对那些认为“工人对革命没有贡献”、“工人生活太好”、“工人落后”、“工人不好管”等等错误的观点。

第二,必须把工人的最大多数组织到工会中去,并依靠工会去教育工人,启发其阶级觉悟,发挥其生产积极性。忽视工会工作,就谈不上依靠工人阶级。

第三,用高度的热忱去关怀工人阶级的各方面,从政治上、文化上、生活和物质福利上去关心他们,不要忽略有利于工人的“小事”。要反对有些同志那种利用工人的错误观点,他

们在困难时依靠,顺利时就不依靠;需要时依靠,不需要时就不依靠;口头上依靠,思想上并不依靠。他们要求工人的多,给工人的少。甚至有个别地方还在虐待工人,因而有的工人说:“国民党时候我们是牛和马,现在是马和牛。”这些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第四,依靠工人阶级必须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必须贯彻到各部门中去。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工会和工厂的事情。我们的青年团、妇联、合作社、文化团体等等都必须把工人工作放在重要的地位。

三、工厂管理问题。

关于国营厂矿管理,此问题段君毅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我们很早以前就提出了“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口号,这是管好工厂的关键。我们不少的军事代表、工作组乃至工会干部,至今还不懂得这个口号。他们不去启发工人和职员的积极性,甚至对工人职员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有些同志还喜欢对于自己不懂的技术问题或管理问题,使用“最后决定权”。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经过整风之后虽然好了一些,但至今仍然是干部中的最大的毛病。不继续反对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做到依靠工人团结职员去搞好生产。

经验证明:不依靠工人,就不可能团结职员;一般职员总是在工人起来之后,才逐渐向我靠拢的,而且要工人在生产方面有了一些成绩的时候,才会开始心悦诚服地积极起来。

中央指示我们:要管好厂矿,必须实行“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所谓管理民主化,必须具体体现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之中,尤其是具体体现到工会、工厂管理委员会、职

工代表会这三种组织形式中,否则就谈不上什么民主化,就没有民主的内容。现在许多工厂管理委员会是形式的。工会或者不起作用,或者被工人称为“军事代表的尾巴”。职工代表会一般只在困难时开,很少环绕生产任务和职工福利这些问题去开,尤其很少定期召开,即使开了这些会议的,也多半是由军事代表等训话一番。这种情况必须纠正。

所谓经营企业化,也只有在管理民主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工业部确定从合理化建议及订立集体合同两件事情做起是正确的。经过了这些步骤,启发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才有可能计算成本。当着一个工厂连成本都无法计算的时候,就谈不上上了轨道,也谈不上经营企业化。

组织生产竞赛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具备了有生产计划、有原料、有销路、群众有了一些发动这些条件的部门才去实行。从西南情况来说,条件多不具备,故暂时尚不宜普遍地实行。

为了管好现有的厂矿,还必须:第一,尽可能地从机关中抽出一些得力干部放在厂矿中去。第二,领导上注意选择几个点,进行典型试验,积累经验,指导其他。西南较重要的公私厂矿只有一百九十二个,用这个方法一定可以做出成绩来。第三,在地委、县委集中力量于农村斗争,而且能力不够的情况下,较重要的厂矿不能委托他们去管理,而应由省委、区党委、市委直接管理。因此,各省、区、市党委应设工业部或指定一负责同志专管工业。同时在厂矿区设立企业党委及工会办事处(如綦江江津区),有三个干部就够了。有了专人负责,事情就办通了。

除了做好国营企业的工作外,各省、区、市对于地方工业

的指导必须加强。目前由于国家财力的限制,办很多大工厂不可能,但小型工业的发展是可能的,我们对此应采取积极的态度。各地可根据本区(一定从本区内着眼)的条件(原料、销路等),或由地方拨款,或组织私人资本,或组织机关生产,举办一些可办的小型工业,好好地经营这些事业。至于原有的某些小厂,既无原料,又无销路,则应转变生产方针或考虑停业。

我们有些厂,现在还是处于维持状态,必须想办法打开出路,将生产力用之于有用的方向。

对于私营企业,过去的方针是正确的,今后仍应在依靠工人、团结职员、搞好生产的基础上,用劳资协商方式,推动其进一步的改革。

四、工会工作。

蔡树藩同志的报告都说到了。

西南工人,包括一部分手工业工人在内,据估计有一百六十万。现在组织到工会中的约三十万,仅占百分之十九到二十。各产业系统较好,约组织了工人的百分之六十五到七十。可是起作用的、真正联系工人群众的工会组织是不多的。

在工会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和形式主义。关门主义的根源是不相信工人。形式主义则表现在工会生活不民主,不面向生产,不重视工人的福利,因而得不到工人的信任。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但为数很少。

当前工会的工作:第一,必须进一步地组织工人到工会中来。首先应集中力量在工厂、矿山、交通、市政和商店中去发展工会会员。

第二,必须坚决地吸引本地本厂的工人积极分子到工会

各级领导机关中来,以加强工会与工人群众的联系,改变工会脱离群众的现状。有些工会领导机关,职员比重过大的情况也应改变。

第三,建立工会的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工会一经初步整理,就应开代表大会或会员大会,选举工会领导机关。工会必须充分听取工人的意见和建议,并作认真而妥善的处理。

第四,必须加强工人中的文化教育工作。就长远来说,工人教育应以文化技术为主;就目前情况来说,仍应着重政治教育,同时注意文化技术教育。

第五,必须重视工人的劳保和福利。今后仍应防止提出过高的要求,但更重要的是纠正一些同志忽视工人福利的思想。同时要纠正福利工作中的恩赐(即不经过工会和工人的讨论)观点。

五、城市建党问题。

现在各地的普遍倾向,是忽略了城市的建党工作,把谨慎发展党的组织,变成了不注意发展党的组织。

城市发展党员主要在工人中,而我们党内有不少人是看不起工人的(这与他们出身于农民、小资产阶级有关)。重庆前一时期请求入党的工人百余,经过两三个月的审查,只批准了六个,以后由市委组织部直接进行,才发展了一部分工人党员。

于江震同志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恰当的,在今后半年内,在重要厂矿的三十万工人中,吸收百分之七即约两万工人入党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除厂矿外,在学校、机关及其他系统中,也应作个别的吸收,条件则应更严格些。

西南一律实行公开建党的方针,凡未公开的党的组织应即公开。建党的步骤是先慢后快,慎重地个别吸收,既要反对关门倾向,又要反对拉夫主义。一开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严肃党的组织和生活。

必须重视发展团的组织,现在要纠正的偏向也是关门主义。

六、关于资产阶级。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

我们对待资产阶级的态度是又团结又斗争,斗争是为了达到团结的目的。在现阶段,必须“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一脚踢开资产阶级的思想是错误的、危险的。在西南解放初期,确有此种“左”的倾向。但在五月开始调整工商业后,又产生了一种不敢对资产阶级作必要的斗争的右的倾向。

我们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主要在税收、劳资和公私等三方面。同时,农村减租退押分土地也关连着他们。一般资产阶级对劳资总是讲一利,对公私也不讲兼顾的,对税收总是叫重的。而我们则必须认真地实行“两利”、“兼顾”的政策,税不应多收但也不能少收的政策。

在四五月间,私营企业确实困难,我们实行了坚决调整的方针。如果那时不那样做,就会形成大批的关厂停业,于工人阶级、于国计民生都极不利。所以这个方针(中央确定的方针)是正确的,认为这个方针错误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今后仍应继续实行这个方针。在税收方面,坚持不多收也不少收的政策。凡属不合理者,应主动调整;凡属合理者,必须坚决征收,并与逃漏现象作斗争,以保证税收任务的完成。在公私问题上,坚持兼顾的政策,必须在加工订货、市场价格等方面,促使资方进一步地改革其腐朽的机构。同时在西南还应适当加强国营工商业,以增强国营经济的领导力量。在劳资问题上,过去我们说服工人适当减低工资,以渡过难关,这是完全必要的。七月以后,工商情况开始好转,即不应再去降低工人生活,而应从改革私营企业腐朽机构、努力发展生产中去达到工厂的收支平衡。在资方尚无利可图的厂矿,仍应说服工人不作过高的要求;但在资方有利可图的厂矿,就应该适当地恢复一些工资或一些福利。

除在各方面掌握住正确的政策之外,我们必须多向资产阶级做些工作。经验证明:多做一分工作就多一分效果。不愿去接触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毛病,应加纠正。工商业联合会的工作应该加强。

对工商界的退押,应作审慎的考虑。一般可采取在半年以内的时间分期退还的原则。

七、加强公安工作。

目前社会秩序是稳定的,但敌人还没有完全摧垮,还经常出现新花样,给我们以措手不及,使我们遭受很大的危害。南岸某仓库一包炸药,就使我们损失了大量的资财,所以不能丝毫松懈和麻痹。

城市公安工作,应将重点放在经济保卫方面,特别是重要厂矿、重要车间、重要仓库的保卫,看守重要部门的武装必须

是可靠的。

我们在城市镇压反革命^[147]的毛病,也是“宽大无边”,很长时间,我们对工厂、学校的反革命分子不敢动手,捉来的不办,又放回去了。这大大打击了群众反特斗争的积极性。重庆解放初期,工人还敢于检举特务分子,后来看我们不办,就再不报告了。最近我们一次逮捕反革命分子百余人,工人积极性又高起来了,这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就要脱离群众。

要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斗争,要加强反特的教育,及时公布特务的罪行,揭露其谣言,提高群众的警觉性,这是反特斗争的基础。

八、其他工作。

城市工作很多,不能一一谈到。

学校教育工作必须加强,我们的宣传部门要在最近召开的会议中加以研究和讨论。这个问题不是短期所能解决,但必须开始去解决这个问题。

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制度应好好贯彻。一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联系群众、解决问题、巩固统一战线的最好的形式。各地应总结经验,使之开得更好些,发挥的作用更大些。

九、统一领导问题。

城市问题复杂,多有时间性,而且往往一个问题牵涉许多部门,所以要求城市工作具有很大的集中性,要统一到市委的领导下去进行。我们有些部门是实行两重乃至三重领导的,这样的部门,除某些特殊问题外,一般的问题均应通过市委去进行。否则头绪很多,没有主要负责的机关,也没有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往往一件事情很长时间不能解决。这种官僚主义,就

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没有专人负责而来的。以后凡是涉及几个部门的事情,必须召集在一块,商定方针步骤,一致执行;重大一点的问题必须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或委员会,指定主要负责的人员,以专责守。经验证明,这种方法是好的。

集中力量,创造典型,积累经验,然后普及的领导方法,用之于城市各项工作中,都是灵验的。我们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忘记了这个工作方法,以致走了许多弯路,应引起注意。

十、干部问题。

眼睛不要望着上面派来或别区调来干部,要坚决地从群众中放手提拔。我们已有一年的工作时间,已经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从他们中间选拔一批干部是可能的。也只有如此,才能进一步地联系群众,使工作生根。我们的干部特别要注意从工人中去选拔。如果我们把工会工作做好了,干部来源的困难就容易解决些了。

十一、报告制度。

为了研究城市工作,并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规定在一九五一年内,各省(区)辖市委及重要的企业党委,应将两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同时送西南局一份。

全党重视做统一战线工作^{*}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统一战线工作 ,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多次提出、明确指示要加强的。我们革命的胜利是和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的 ,没有统一战线 ,仗不会打得那样好 ,即使打胜了 ,工作也不会做得那样好。但是我们的干部并不是都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所以 ,党中央、毛主席又重新提出来 ,中央专门发了指示^[148]。根据这个指示 ,我们开了这次统战工作会议。中央的指示规定得很具体 ,有些问题我就不说了 ,今天主要谈谈思想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说 ,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加强 ,为什么要加强 ? 首先就要把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原则性弄清楚。我们共产党有一条 ,就是要把工作做好 ,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打仗也是这样 ,先要解决为什么打的问题以及联合谁打击谁的问题。目前重视统战工作的同志还是少数 ,多数同志没有真正认识它的重要性和原则性。我们西南的许多干部做了统战工作 ,也是有成绩的 ,但不少同志做统战工作并不是自觉的 ,而是被动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

去年二三月后,到处闹土匪,物价波动,我们的部队和地方的干部,到处找开明士绅、工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要求人家支持剿匪、征粮,这也是做了统战工作。土匪一肃清,公粮一征完,这种工作就不去做了,或者做得不多了。为什么要团结更多的人一块来剿匪、来征粮呢?这里反映了一个事实,在困难的时候需要他们一起来做工作,说明这些人是不可少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就是争取了一切可能争取的朋友,孤立了敌人。

我们有的部队同志把胜利只看作是枪杆子打出来的,这是不全面的。从历史来看,党中央、毛主席对统战工作一直很重视,做得很精心。我们的胜利,一方面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另一方面也和统战工作分不开。长征^[18]到达陕北时,红一方面军只有六千人,加上陕北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一共只有一万几千人,被十多万敌人包围,非常困难。党把一些最好的干部派去做统战工作,加上其他方面的工作,在“双十二”事变^[149]后形成了抗日救国的新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部队到达华北、华中后,人人感到需要有统战工作,因为我们有了朋友就可以站住脚跟。那时甚至对一个碉堡的伪军,都拼命地去做统战工作。在解放战争中,我们聚精会神地从政策等各个方面去做工作,争取了各民主党派。蒋介石也争取他们,但我们胜利了。我们由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各民主党派的支持,理直气壮,士气很高,才打胜了。抗美援朝^[150]开始的时候,有些人,包括一些民主人士、工商界和知识界人士,有疑虑。后来由于加强了工作,各界都赞成、拥护,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151],资产阶级也出来游行,这样就长了自己的志

气,灭了敌人的威风。我们有的同志不了解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的意义,以为照例是官样文章,但是各阶层的人民很重视。这个宣言表明了抗美援朝是举国一致的。如果不要统一战线,内部不团结,能够抗美援朝吗?在历史上,统一战线是决定革命胜利的三大因素^[152]之一。没有统一战线工作,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办不好的。

在我们党内还有这样的思想,认为做事情只要抓住工农就行了。这种想法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具体来说只有一半对。工农确实是我们依靠的基本群众,但是,只做工农群众的工作解决不了全部问题。例如,处理公私关系不做私方的工作,处理劳资关系不做资方的工作,行吗?再如,在减租^[50]退押^[142]中,我们动员一些民主人士、开明士绅下乡(如去川北、川西等),往往僵局容易打破,任务容易完成。而不这样做的地方,运动的进展就比较慢,发生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假如没有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人回城写文章介绍农村的情况,城里的人一定以为农村“漆黑一团”、“无法无天”,那我们就会孤立。我们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作用认识不够,不懂得各民主党派都是有代表性的,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就喜欢听他们的话,相信他们,看他们的宣言比看我们的够味。这些同志不是从整个社会存在着各个不同的阶层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来看问题,因此,往往忽视了统一战线。这种单纯依靠工农,不注意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人士的思想,是关门主义的一个重要根源。

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是两年的事,土改^[123]一完成统战工作就勾消了。毛主席说要在统战工作方面培养专家,而

我们有的同志说统战工作只有两年,没有出路。实际上,统战工作是我们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一部分,是要贯彻到底的。这不是为了安定人心,而是真的。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统一战线加强对民主人士、民主党派的教育,团结他们一道走进社会主义社会。在实现社会主义以后,资产阶级没有了,但社会上还有不同的阶层存在,这里面绝大部分是我们的朋友,还有极少数破坏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只要有敌人,有朋友,就得团结朋友,孤立和打击敌人,就还得有统战工作。因此,统战工作一直要做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后。

还有的同志觉得,统一战线的作用只是分化敌人。这也是不对的。固然,统战工作有其策略性,但更主要的是它的战略性,就是要广泛地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社会各阶层人民。凡是可以团结、可以争取使其中立的,都要加以团结、加以争取,这也就是孤立了敌人。有些同志不重视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就在于他们误认为统战工作只是分化敌对营垒,而不了解统一战线有两面,一面是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朋友,这是主要的;另一面才是分化敌人,使敌人营垒中一部分人转到人民方面来。这些同志没有看到统战工作的这两面,所以不重视团结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阶层人民,没有远大的眼光。

还有的同志虽然赞成统一战线工作,但以为这是统战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不能主动地经常地注意做好统战工作。例如,重庆镇压反革命时,有些民主人士恐慌起来,这是由于党内的同志没有事先做好他们的工作,使得我们被动了一下。

现在,把统战工作看成吃喝应付的人是少了,但是还有嫌麻烦的思想,对党外人士的工作做得不够精细。

以上情况说明,中央提出要多做宣传统一战线的工作,使重视统战工作的党内同志由少数变成多数,确实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加强统一战线是我党长期的工作,并涉及各个方面,不仅仅是统战部门的事。各个部门都有统战工作。例如,工业部门的工程师、职员不都是共产党员,政权机关中也有党外干部,还有大量的非党文化人士、教师、医师、技术人员等等,对他们都要很好地团结、教育,同他们一道走到社会主义。统战工作是全党各部门的工作,如果不使每个干部、每个党员都懂得这一点,这项工作是做不好的。

关于西南地区的 土改情况和经验^{*}

(一九五一年五月九日)

三四两月全区斗争最为紧张,农村退押^[142]、惩治违法地主和第一期土改^[123],镇压反革命^[147],抗美援朝^[150]三大运动进入高潮。同时,中央局在三月下半月开了统战工作会议,四月下半月开了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两个会议的总结另有专门报告,不在这里叙述。

西南的“淮海战役”,即清匪反霸减租^[50]退押运动,去年七月着手准备,十一月全面展开,到今年四月中旬为止,已在二百零八个县、七个市郊,六千六百六十余万人口,即占全区人口百分之八十三的地区,宣告胜利结束。只有云南大部,贵州二十个县,川西、西康^[131]的少数民族地区,尚未进行或不应进行,云南二百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这个运动规模较大,斗争异常剧烈。预计全区可得减租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的果实七十七亿斤米,已经到手的约六十五亿斤米(实际上要

^{*} 这是邓小平同志写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综合报告的节录。毛泽东同志在五月十六日转发各地的批语中指出,“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在报告里面,毛泽东同志还附注了自己的意见。

多),其中又以川东可得二十五亿斤已得约二十二亿斤为最多,川西可得十五亿斤已得十二亿斤次之。全区农民协会会员已发展到二千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二十八,人民武装已发展到二百二十四万余人,占人口百分之三。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大批农民积极分子。特别在运动后期,明确了发动贫雇农方针,从退押和惩治不法地主中,适当满足了贫雇农的经济要求,并随着运动的深入,在贫雇农积极动员起来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了农会领导成分和农村政权。这样才奠定了分配土地的可靠基础。总起来看,农民是真正翻身了,农村出现了崭新的气象,下乡的民主人士一致认为这是历史奇迹,异口同声地说城市落后了。

在“淮海战役”的基础上,我们又在今年二、三、四月进行而且完成了第一期分配土地的工作。第一期土改范围为十八个县又十二个区和一百五十八个乡及重庆、万县、南充三个市郊区,共一千三百五十一万余人口的地区。各地土改都是结合复查反霸退押,惩治不法地主,发动贫雇农,进一步改造农会领导和镇压反革命等内容进行的。(所有这些都很好,都值得庆贺,一切尚未做到这一步的地方,都应这样做。毛注。)地主顽强抵抗,放火、放毒,杀积极分子,搞暴动等等事件比过去多得多,斗争异常激烈。那种认为经过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就可以和平土改的想法,已为事实所粉碎。

经验证明,土改必须在贫雇农发动起来的基础上去进行,才不致煮夹生饭。我们决定,必须从退押特别是从惩治不法地主的斗争中,一方面进一步搞垮封建,一方面使贫雇农得到适当的经济利益,从而发动贫雇农,改造农会领导成分。这个决

定是很正确的。各地这样做了。不少地区贫雇农获得了每人一百斤米左右的果实,有的地方相当于中农所得的果实,多数乡村贫雇农取得了农会的主要领导地位。所以,凡属完成了土改的地方,农村基础更加强固,煮夹生饭的比重不大。在以后进行土改的地方,都必须体会这个经验,坚持复查减租退押,惩治不法地主,适当满足贫雇农要求,改造农会和乡村政权的领导成分这个明确的方针。

经验证明,不镇压反革命,封建势力不会低头,贫雇农不敢起来,退押、土改也不会这样顺利完成。(所有这些是正确的,各地都应这样做。毛注。)关于镇反问题已作了几次报告,最近情形,周兴^[153]同志到京面陈。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做得很对,但在镇反和惩治不法地主两个问题上,有些地方发生了控制不严的毛病。运动愈到后期,愈是轰轰烈烈,下面同志脑筋愈热,领导机关愈要注意控制,这是我们及各省区党委应有的教训。上述两个运动的后期,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不按章程办事的无政府无纪律的风气,又在抬头,(请中南、华东各省严密注意这些教训,坚决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绝对不容许此种坏作风抬头。毛注。)我们已告各地注意克服。

此外,(一)抗美援朝运动,四月份已普及到农村,签名者已达三千三百万余人,参加“五一”示威者二千一百九十余万人,还在继续开展中。(二)第一期扩兵九万只在川东(五万)、川北(四万)两区进行,反映很顺利,费力很小。(三)全区干部从五月起进入整风,总结前一段经验(包括镇反),准备第二期土改和布置今后镇反,方法仍是肯定成绩,发扬优点,纠正缺点,并注意纠正无政府无纪律倾向。(请你们考虑可否仿照西

南办法在六七两月来一次整风,在冬季再来一次整风,不要等候冬季作一次整。毛注。)(四)注意春耕生产的领导。各地同志反映群众真正起来了,领导思想往往落于群众觉悟程度之后。许多同志总以为抗美援朝妨碍工作,是一个额外的负担,而群众一搞起来就有声有色,大大帮助了实际运动,扩兵这样容易,也出乎意料之外。(还有两件事是出于许多同志意料之外的。一件是不敢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不敢邀请党外人士参加审判委员会和我们共同审判反革命。结果恰好相反,愈是打破了关门主义的地方,情况就愈好。这是对于人民和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一个例子。又一件是不敢邀民主人士、工商业者、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分批地大量地看土改,看杀反革命。叫他们去看,也只让他们看好的,不敢让他们看坏的,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结果又相反,凡去看了的,回来都是好话,都有进步。华东局规定好坏都让人看,结果很好。这是对于党外广大人士的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又一个例子。毛注。)现在比较担心的问题是今春雨水太多,秧苗腐烂很多,可能影响春耕。今年小春比去年差,各省都有一些地方发生严重的灾荒。我们担心各地对这些问题注意不够,忽视了争取今年丰收的中心任务,招致严重的后果。我们正注意对这一方面的指导。(此事我也很忧虑,务请你们密切指导,争取丰收。毛注。)

财政工作的六条方针^{*}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

关于今后财政工作的方针 ,我现在分六条来讲。

第一 ,归口。为什么提出这个方针 ,这是鉴于过去的预算 ,特别是一九五三年的预算有危险性 ,而更大的危险性是财政部代替各部门决定政策 ,这是不懂得数字中有政策 ,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归口就包括政策问题 ,数目字内包括轻重缓急 ,哪个项目该办 ,哪个项目不该办 ,这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财政部代替各部作决定 ,有人说是“有财无政”。“政”是有的 ,但是错了。过去财政部管得多 ,反而挨了骂。挨骂有两方面 :一方面是袖筒里谈交易 ,不给钱挨骂 ,给了钱也挨骂 ;另一方面是预算不采取归口的办法 ,控制不住 ,干预过多 ,因而财政部成了被斗争的焦点。归口以后 ,就易于控制 ,预算就容易确定。所以预算要归口 ,不能有不归口的预算项目。归口不等于财政部不管 ,财政部有干预的权利 ,要提出意见。财政部提意见 ,是从全局出发 ,考虑有钱没有钱 ,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预算不能由各部自行决定 ,但必须以各部门为主 ,共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当时邓小平同志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

同商量。各级、各部门对归口是赞成的,现在有一些还没有归口,归口以后,工作就主动了。

第二,包干。以后是否永远包干?不一定。有些是长期的,有些则不一定。但至少一九五四年必须包干,一九五五年也有不少还要继续包干。包干的目的是主要是控制预算。包干的提出,是鉴于一九五三年预算在二月十二日通过,三月底总预备费就花光了,八月即失掉收支平衡,出现二十一万多亿元^[121]的赤字。因此,今后为了控制预算,才实行包干。包干分两种:一是中央各口的包干,主要是归大口。财委是一大口,其中农林水归四办,交通归三办,财金贸归二办,工业归一办^[154]。总的预算投资多少,由财委、计委审核。各项事业的轻重缓急与投资的分配,由各口去考虑。二是地方的包干,主要是大区^[155]包干。包干之后,由地方去调剂。现在规定三级财政,实际上是两级财政,只包到中央和大区两级,包到省有困难,将来还是要变的。有人问:包了开支,是否还包收入?当然包。一九五四年预算指示中已规定,总收入不应减少,并争取超过;总支出不应突破,并力求节约。可见收入也包干了。这样收支都由大家包起来,才能保证预算的巩固性。大家都负起责任,就不致于突破预算。包干的好处很多,所以一九五四年预算指示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出后,两个月来变动不大,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

第三,自留预备费,结余留用不上缴。这点最麻烦,有的同志及苏联专家都不同意。其实,没有这一条,大家不可能有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归口和包干;有了这一条,大家才能有勇气和胆量实行归口、包干,地方才有力量应付意外开支。这次规

定周转金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四,预备费为预算的百分之三至五,这就是摊了牌,摆在桌子上,大家来过日子,不要再在袖筒里办事,不要突破总预算。结余不上缴,但基建结余在外。

第四,精减行政人员,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如果不控制,是很危险的。理由不必解释。

第五,动用总预备费须经中央批准。这样,大家提出要求时就会更慎重一些了。这个批准权不应在财政部,而应在中央政治局。过去国家总预备费有相当一部分是买烧饼油条用掉了,如一九五三年就是如此。现在有了这一条规定,就可以防止这种现象发生。有了这一条的好处,是让大家知道要动用总预备费不容易。总预备费是留着解决大问题的,不是用来买烧饼油条的。

第六,加强财政监察。毛主席在中央的会议上特别提出这一点,这是以后财政工作的关键。财政上的浪费是很大的。毛主席说:“有些项目节约百分之十,数字就了不起了。”如国家预算节省百分之十,就是二十多万亿元。因此,要加强财政监察。

为什么要提出六条方针?概括地说是因为:

第一,六条方针有一个重大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今天国家财政是不稳固的,经不起重大考验的。我们要认识这种形势,要兢兢业业地改变这种形势。财政如何稳固,大家要研究,要谈清楚。过去的财政就是不稳固的。一九五一年全国刚解放,金融不稳定,财政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150],要打仗,财政也不可能稳固;一九五二年财政情况比较好;一九五三年过

早地花光了总预备费,只好“搜刮”地方及中央各部门四十多万亿元,如无大问题,万事大吉,如出现大问题,即束手无策。立国的政策应放在有力量应付外侮和应付万一。“刮光”了地方上的底子,如出现像抗美援朝这样的战争,或发生严重灾荒,或须紧急兴建一个大工程,或有了新的技术发明要采用,就没有后备力量了。那时就只有加税和减少人头费,就要弄得大家哇哇叫。再一个办法,就是减少必要的开支,把国家工业化的投资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费也刮掉,这样影响就更大,就会动摇根本。财政后备力量基础的巩固,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上。为了发展经济,保证物价稳定,工商企业须有固定的流动资金,银行须有足够的银行基金,而这些过去是没有的或者不足的,且各大区各级都已没有底子,各方面搞得很枯竭。我们要花几年功夫才能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这就要把后备力量放在各方面,要在各方面打底子。怎样打底子,尚须研究,要看力量,逐年补一点,慢慢就补足了。如商业、银行要考虑有多少资金才够用,每年补一些,补足后就放心了,没有顾虑了。如果我们给够了,才能理直气壮地检查他们,现在检查他们,他们还有理由说是因为没有补足。对于中央与地方的企业,也要逐步补充其后备力量。如果花几年功夫补充了这些力量,我们就能应付万一,就不会陷入困境。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不光是要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自留预备费,不是请大家浪费,而是为了打基础。第一步希望财政部做到在预备费外还有十万亿元,连同大区和省市的在内,希望共有二十万亿元底子,才可以应付万一。这一点,中央尚未讨论,是我个人的意见,不是定论。这样,若有意外事件,地方上

的底子可以拿上来,因为谁都爱国,拿上来也是愉快的。

第二,有了后备力量,国家财政才能集中力量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56]就是要建立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财政要保证这一点。如果财政不稳固,是不能保证的。实行归口包干后,剩下的预备费才能用到重大的事情上去,避免把钱用到买烧饼油条上去,才能保护住国家的总预备费,站稳脚跟,保证工业建设。

第三,为了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的基础上,保证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必须节减一切可以节减的开支,克服浪费。但如果没有六条方针,就不可能办到,即不可能发扬积极性,让大家来办财政。今天的问题复杂得很,仅靠几个章程、几个法令、几个办法办事是不行的,要因地制宜。只有大家管财政,大家热心财政,事情才好办。节约也要有积极性,如果没有地方的积极性,就不可能节约,就要发生浪费。

实行六条方针有这样一些作用,至少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当然,将来可能有变化,但这是将来的事,今天必须这样做。

地方财政工作要有全局观念^{*}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完成了任务。大家是照顾全局和从实际出发,才把会议开好的。照顾全局,从实际出发,这两个观点缺一不可。过去财政部就是因为没有把这两个观点结合起来,致使工作中出了一些问题,各方面意见很多。

会议开始时,我的讲话是讲财政部的工作检查,所以着重指出财政部的缺点和应该怎样做工作。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地方财政工作应该怎样做。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党历来是重视战略的,部队的战士、伙夫都关心战略,只要把战略形势讲清楚,问题就好办了。毛主席的话说得很对。例如粮食的征购,只要把战略问题和全局问题摆开来,就可以得到解决。但是,过去我们遇到一些问题,常常没有从大的方面出发,没有把战略问题交代清楚,这是过去财政部的工作出了一些问题的原因。所以这次要把道理讲一讲。我们的一切工作都会涉及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大道理与小道理必须弄清楚。全体和局部缺一不可,全体是由局部组成的,如果只有全体,没有局部,则全体也就不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财政厅局长会议上所作总结的一部分。

成其为全体了。另一方面,全体和局部、中央和地方、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以什么为主导呢?如果把局部、地方、因地制宜作主导,那就要犯原则错误。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因此,在中央工作的同志要经常照顾局部和地方,要因地制宜,注意到地方工作有什么困难。财政部的部长、司局长、处长应经常照顾局部,凡是地方提出的困难问题,只要是可能解决的,应热心帮助解决,如是不能解决的,也要讲清道理。在地方来讲,则应照顾全体、中央和集中统一,以中央为主体。这是因为地方是在中央领导下的地方,局部是在全体中的局部,因地制宜是在集中统一下的因地制宜,如果两者之间发生矛盾,地方应服从中央,局部应服从全体,因地制宜应服从集中统一。不如此,就会发生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多多少少是有的,地方主义也曾经发生过,山头主义也存在过(当然也是历史上形成的),这些都是由于缺乏集中统一和全局观点所造成的。过去由于中央有些工作部门缺乏照顾局部、照顾地方,所以去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前,有一个时期各地区对中央有许多意见,这些意见是应该有的。但也要注意另一方面,防止发生局部不照顾全体和中央的现象,当然现在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可是两者的关系必须说清楚、弄正确。

财政工作的全局观点是什么呢?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156]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

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如何保证呢？一是增加收入，二是节约支出。收入方面凡应收者都应收足，支出方面凡能节约者都应节约。从控制支出来讲，国家机关经费（包括行政费与军费），毛主席规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末期不能超过国家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三十，社会文教费也要适当控制，以集中力量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个改造的实现。所以，我们要尽量地把财力用到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去，要经过两三个五年计划，使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掌握开支上，我们就要拿这个道理去说服人，凡属能解决的应给以解决，凡属不解决也能过日子的，即可不解决。我们国家虽然地大物博，但生产比较落后，财力有限，这就要求财政工作人员要善于节约，善于把钱用到主要方面去。我们只要在总路线的照耀下看问题，就能很容易地体会到全体的利益和集中统一的意义，就会善于以地方服从中央，以局部利益服从全体利益。这样也就会热心于节约，而不热心于百废俱兴。所以，财政部门要看到大事，要有战略观念。

骄傲自满是团结的大敌^{*}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报告对三中全会〔157〕以来中央政治局工作的估计是恰当的。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所提出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158〕,并完全同意少奇同志对这个草案的解释,这个解释是明确的详尽的。

我认为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明确地规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156〕的时候,在全党范围内提出这样一个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是完全适时的和完全必要的。这个决议之所以是适时的和必要的,不只是因为整个过渡时期的革命内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更为深刻、更为广泛,斗争也极其复杂、极其尖锐,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已被打倒和即将被消灭的阶级一定会千方百计地来破坏,所以需要党以更加坚强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全会于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作了发言。会议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所作的报告,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的成绩,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同志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团结和更强的战斗力来保障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 ;而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 ,由于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获得了巨大的胜利 ,于是在我们党内 ,尤其是在我们党的高级干部中 ,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这种骄傲自满情绪如果不及时提醒 ,必然要使我们丧失敌情观念 ,必然要破坏我们党的团结 ,那我们就要丧失斗志 ,经不住敌人的任何袭击 ,从而使我们的伟大事业遭到失败。

这个决议草案 ,正如少奇同志的报告所说 ,不是无的放矢 ,而是有所指的 ,是根据具体事实、指了具体对象的。所谓具体事实、具体对象 ,能不能解释为只是针对个别的人呢 ?不能这样来认识。我以为它主要是指在现阶段党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必须防止和克服的一种倾向 ;不能解释为这个决议只是针对个别的人 ,对于我们、对于我自己无关 ,因而可以疏于检查和防范。

这个决议草案是很全面的 ,它分析了全部的形势 ,内部和外部的形势 ,提出了有效的办法。现在 ,我只就决议草案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 ,就是上面所说的骄傲问题来讲一讲我的认识。

我认为骄傲情绪在党内 ,主要是在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中 ,正在滋长着 ,如果不注意克服 ,就会发展到一种可怕的危险的地步。决议草案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革命胜利后 ,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 ,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 ,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 ,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 ,自以为天下第一 ,只能听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 ,对

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有意地或无意地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草案又清楚地告诉我们:骄傲一定会使党的团结受到损害,使革命事业受到损害。对于个人来说,对于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它是一种腐蚀剂,它可以引导个人主义发展,把一个满腔热忱的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丧失掉,而堕落到最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

就一般意义讲,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应该这样认识:骄傲会对自己在革命中的作用和贡献做出不正确的估价。一个人不管负什么责任,在革命事业中只不过是一个螺丝钉。我们所获得的成绩绝不能看作是一个人的,而是多数同志努力的结果,上有中央和上级,下有广大的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有同级,还有左邻右舍。我们绝不能贪天之功,将上级的正确领导,其他同志、其他各方面的努力,统统算在自己的身上。而骄傲的人总觉得自己了不起,因而常常觉得党和别人对他重视不够,对他没有什么温暖,反而觉得那些拉拉扯扯、吹吹拍拍的人对他很好,对他有温暖,而这种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骄傲会把自己所领导的工作或地区摆在一种不恰当的错误的地位。比如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如果他在中央某一个部门工作,往往会忽视地方的情况,不重视地方工作同志的意见,甚至随使用中央的帽子往下压;如果他在地方工作,往往会对全局照顾不够,对中央各部门的情况照顾不够,遇事总以为理在地方,甚至觉得上头的约束对他很不舒服,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事实上,像我们这样的人,不管做任何工作,能够说没有缺点没有错误吗?所以,把自己估计得不恰当,不愿意

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遇到检查和批评就很不舒服,这是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相符合的,这是与党的原则完全不相符合的。骄傲的人往往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做得好,不大看得见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工作也做得好。遇到表扬多一点的时候,就有一点飘飘然。在对待与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的关系上,多注意自己方面的困难,忽视对方的困难,不大注意照顾别人,甚至连一点亏也不能吃。在同志之间,看自己的长处多,对自己的短处看不见,或者看得很少,对别人的短处看得很多,长处看不到。对一些非原则问题,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也斤斤计较,相持不下,不善于让步,不善于等待。

骄傲,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骄傲,不能不使党的团结和党的工作受到损害。革命胜利以后,有些现象我认为是很不健康的。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多年来行之有效的我们党赖以取得胜利的那些党的原则,例如对错误和缺点采取严肃的态度,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团结目的的原则;与人为善的态度和治病救人的原则;照顾别的人、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照顾少数的原则等等,在革命胜利以后,却很少讲了,而与这些原则相违背的一些现象反而在滋长着。

我们常常闻到这样一些味道,例如有的人把某些人或者把他自己夸大到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称的地步,不愿意受检查,不愿意受批评,自以为是,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空气稀薄,不注意集体领导,不注意团结,对犯错误的同志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不大照顾别的部门、别的地区等等。尤其严重的是,有些同志不注意维护中央的威信,对中央

领导同志的批评有些已经发展到党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毛泽东同志提倡对党的任何负责同志(毛泽东同志经常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必须根据党的原则在一定场合下进行,或者向他本人提出。这样的批评是应该的,不可少的。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过去经常讲到这一点,他们是欢迎别人批评的。但是不能允许这样的言论发展到党的组织所不能允许的程度。

我们常常遇到,某些同志对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不正确的言论,常常是不经过组织、不合乎组织原则的。全国财经会议以来,对少奇同志的言论较多,有些是很不适当的。我认为少奇同志在这次会议上的自我批评是实事求是的,是恰当的。而我所听到的一些传说,就不大像是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或者是夸大其词的,有的简直是一些流言蜚语,无稽之谈。比如今天少奇同志在自我批评里讲到的对资产阶级的问題,就与我所听到的那些流言不同。对资产阶级问題,虽然我没有见到一九四九年初少奇同志在天津讲话^[159]的原文,但是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

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而我们所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富农党员的问题^[160],不过是早一点或迟一点发指示的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又比如对于工人阶级半工人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161],在提法上当然是不妥当的,可是这里并没有涉及党的性质问题,但是我听到的流言就不是这样的。我说有些流言是超过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限度的,不但从组织方面来说不应该,而且有些变成了无稽之谈或随意夸大,这种现象是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能够把维护中央的威信和维护中央几个主要负责同志的威信分开吗?能不能这样说,维护中央的威信与中央几个主要领导同志无关,例如与少奇同志无关,是否能够这样解释呢?对于这些对主要负责同志的超越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引起我们的反对和制止,我们的嗅觉不敏锐,对于这些言论抵制不够,这难道与我们自己的思想情况和骄气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吗?我以为我们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引以为教训的。

以上是就一般性质的骄傲而言。如果我们沾染了骄气,我们就不能前进,我们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我们在工作当中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如果这种骄傲不及时改正,让其发展下去,我们就经不起敌对阶级和敌对思想的任何袭击。并且还须指出,骄傲还可以发展到另外一种结果,如同少奇同志的报告中所说的,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

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更加警惕吗?

我认为四中全会和全会的决议,对某些犯有严重错误的同志是很重要的,是给了这些同志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是对这些同志最直接的帮助。我还认为全会的决议是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最有力的保证,是对我们全党同志,主要是对我们高级干部的最大的帮助。它是一副消毒剂,它启发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提高了我们的警惕性,使我们党更加巩固,战斗力更加强大。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首先是高级干部,应该针对决议草案中所提到的这些倾向,在思想上清理一下。比如我这个人,虽然过去也经历了一点风波,但是近二十年来是一帆风顺的,这一点必须加以警惕。我们必须清醒地估计一下,究竟对党对人民有多大的贡献。我们曾经单枪匹马地干出过任何一件事情来没有?难道我们能够设想自己是那样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点和错误吗?拿我来说,缺点是很多的,错误也是常常要犯的。远的不说,到中央来了以后,分散主义我是有份的,这一个时期我所解决的问题,无论对事对人决不是都那样妥当的。至于过去,无论在华北,在中原,在西南,工作中都是有缺点错误的。不能设想,像我们这样的马列主义的水平在工作中会没有错误没有缺点。我们要把这个决议当做一面镜子来照我们自己。在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时候,全党高级干部都来照照镜子、洗洗脸是很必要的。毛泽东同志曾说过:在七大以后为什么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全国的胜利呢?主要是在七大以前,经过整风阶段,我们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形成了高度的统一,形成

了坚强的团结,形成了集中统一的党中央的领导。因为这样,就使我们全党的所有共产党员和所有干部,以百倍的信心和饱满的士气,奔赴前线。这是取得全国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无疑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一定会起到同样的作用,它将使党更加团结和一致,使我们能够克服许多错误的东西,使我们具有更高的信心,更旺盛的士气,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伟大的历史任务。

办好学校 ,培养干部^{*}

(一九五四年七月九日)

现在我们是搞建设 ,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我们干部的状况是 ,一方面不够用 ,另一方面又有浪费。要充分发挥现有干部的作用 ,同时要培养大批各方面的建设人才。政务院许多部门的领导人 ,他们注意抓生产 ,抓基本建设 ,这是对的 ,但是对培养干部重视不够 ,这主要表现在对自己所管的学校注意得很差。殊不知办好学校 ,培养干部 ,才是最基本的建设。现在 ,有的部门已有几十万员工 ,几十所学校 ,他们不去办好这些学校 ,却总希望从外面调人。应该主要靠自己培养干部。我们的中等专业学校普遍办得不好 ,真正办得好的很少 ,要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些业务部门的领导人 ,认为让他管生产是重视他 ,让他管学校是把他降格了。这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 ,是办好学校的主要障碍 ,应该纠正。

教学纪律必须整顿。苏联学校中的纪律是严得很的 ,我们派去的学生 ,如果不好好学习 ,就被送回来。这种严格的要求 ,我们要学习。对于学校中的个别坏学生是要开除的 ,学校要有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政务院第二百二十一次政务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发言的节录。

“开除学籍”这个武器,没有这个武器不行。开除几个坏学生,就可以教育和挽救一批学生。有的学生被开除以后,倒可能变好了。我们党内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同志背上有包袱,以为对他的错误没有办法,及至将他开除党籍,他倒变好了,有的人后来又入了党。当然不能滥用这个武器,实际上,给了学校这个武器,多数人警惕起来,反倒可以少开除几个学生。学校的纪律问题,好多年了没有得到解决。过去只是纠缠在口头上,现在要认真去做,纪律不好就要整顿。提议高等教育部和文委^[162]研究一下北京学校的纪律问题。选几个典型,处理几个,写篇社论,在报纸上登一下,展开批评,教育学生,教育学校。

关于教师待遇问题。现在要普遍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是很困难的,但是真正有本领的教授、副教授,高级工程师,高级医生,以及其他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工资待遇,应该提高。这样的人不会很多,全国也就是万把人。前几年,全国的工资提高了很多,但有些平均主义。建筑工人,挑土工人,其他普通工人,提高了不少,有的提高了一二倍,而有本事的专门人才提高得不多。将来工资的差距要拉大些,真正有本领的人,对国家贡献很大的人,工资应该更高一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学校长是否比高明的教授薪金一定要高?我看不一定。我记得毛主席曾说过,为什么全国就没有比我当主席的薪水更高的呢?过去我们想请各行各业开个名单,提高一些人的工资,说了好久,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实现。看来,有些共产党员的头脑里平均主义思想还不少,到处有抵触,结果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了了之。这次我建议文委在自己管理的范围

内提出一个名单,科学家可以选一二百人,不讲名望,就是选那些贡献突出的,真正有本事的。大学教授也可以选一二百人。还要订出章程来,这样就可以推动那些思想不通的人。中小学教员中间,工资也应该有很高的,他付出的劳动多,贡献大嘛。我们不能讲平均主义。请郭老^[163]下个命令,提出个名单,二百人左右,先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周总理过去在政务会议上也讲过,但是没有行得通。这次必须像考试那样,限期交卷,否则就是不热心这个工作。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六日)

同志们：

从我们党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6]以来,已经过去十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都已经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团结了全国人民,在不过三年多一点的时间里,打败了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在不过三年的时间里,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和一系列的民主改革的任务;从一九五三年起,党和人民政府又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有这些一个接连一个的光辉的胜利,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政治领导的正确性;同时也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组织路线和七大以后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的正确性。关于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各个方面和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党在目前的任务,刘少奇同志已经作了详细的报告。现在,我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在这个报告里所要讲的,是关于我们党的章程由于党的情况的变化所需要作的修改。

—

现在提请大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是经过各地党的组织的讨论和多次修改而成的。这个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但是,在具体内容上却有了很多的改变,其中包含一些带有原则性的改变。

在第七次大会召开的时候,我国的人民革命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得到胜利。那时候,日本侵略者还占领着我国大部分城市和交通线,蒋介石政府还统治着大部分的后方地区。党所领导的各个解放区,还受着敌人的分割。当时党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这些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解放区的农村里;在国民党统治区和在敌占区的党员,都处在秘密状态。

现在,我们的国家的状况完全不同了。我国的人民革命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已经在一九四九年获得了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实现了空前未有的国家统一。现在,除了个别边疆地区以外,我们不但已经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而且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同时,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所有这些,使得我国的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农民已经由个体农民转变为合作化的农民;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处在消灭的过

程中。

党的状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党员的数目,比第七次大会的时候增加了八倍,比一九四九年全国胜利的时候,也差不多增加了两倍,而且多数党员都在各级国家机关、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中担负了一定的工作。这些情况,要求我们十分注意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和对于党员的教育工作。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过去七年,一般说来,我们党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我们国家在各方面的进步是很显著的,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is 努力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七年的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来说,不是比过去减少而是比过去增加了。而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发展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我们党内也不是比前几年减少而是比前几年增加了。

执政党的地位,还很容易在共产党员身上滋长着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有一些党员,稍稍有点工作成绩,就自以为了不起,就看不起别人,看不起群众,看不起党外人士,似乎当了共产党员,就比非党群众高出一头,有的人还喜欢以领导者自居,喜欢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遇事不愿意同群众商量。这实际上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倾向,也是一种最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针对着这种情况,党必须经常注意进行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经常警戒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为此,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当的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

我们需要实行党的内部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所提倡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64〕。

很显然的,上面所说这些国家和党的状况的巨大变化,对于我们党的要求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对于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更高而不是更低了。我们向大会提出的党章草案,就是根据这些新的情况和新的要求而对原有党章作了适当的修改。

此外,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我们党无论在联系人民群众、组织人民群众和团结党外民主力量方面,在领导国家工作和经济工作方面,在发展和巩固党自身、领导一切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团结一致、积极工作方面,都积累了许多新的经验。这些经验,也适当地反映到党章草案中去了。

关于修改党章所根据的条件,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一些。

二

党章草案的总纲,同原有的总纲比较起来,有了很大的修改,特别是在政治方面。这是很容易了解的。党章的总纲,是我们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和组织纲领。我国的政治情况既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在目前时期的政治纲领,当然也要有根本的改变。关于总纲的政治部分,在大家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以后,我以为可以不再作什么说明了。对于党章草案的总纲,需要首先着重说明的,是其中说到的我们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在我们党的工作中,并不是新的问题。在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特别是党章的总纲中,就是贯串着群众路线的精神的。毛泽东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关于党的作风的部分,刘少奇同志在第七次大会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关于党章的总纲部分,对于群众路线问题都作了精辟的解释。现在所以仍然需要加以着重说明,是因为:第一,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虽然第七次大会已经对于这个问题作了说明,但是,现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而且实践证明,有许多同志并没有贯彻执行这一路线,这说明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教育,还决不能认为是充分的。第二,从第七次大会到现在的十一年间,党的实际斗争的经验,给了这一路线以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在党章草案中,这一路线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反映。党章草案的

总纲,着重地指出了党必须不断地发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并且指出了这个任务由于党成了执政的党而有更加重大的意义。

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呢?简单地说来,它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它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它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它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起草的党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的话来说,就是“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165〕。

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具有极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工人阶级必须依靠本阶级的群众力量和全体劳动人民的群众力量,才能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解放自己,同时解放全体劳动人民。人民群众的觉悟性、积极性、创造性愈是发展,工人阶级的事业就愈是发展。因此,同资产阶级的政

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共产党——这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先进分子的集合体,它对于人民群众的伟大的领导作用,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

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末,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实践证明,许多人并非在主观上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但是他们仍然把工作做坏了,使群众受到重大的损失。这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先进分子,是领导者,比群众懂得多,因而遇事不向群众学习,不同群众商量,因而他们出的主意,经常在群众中行不通;但是,他们又不从错误和失败中取得教训,以为错误和失败,只是由于群众落后和其他临时因素的影响,因而滥用党的威信,继续一意孤行,这就使他们的错误和失败愈来愈严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这种主观主义者给我们党的损失,给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损失,是不可胜数的。主观主义者不懂得,只有首先善于做群众的学生的人,才有可能做群众的先生,并且只有继续做学生,才能继续做先生。一个党和它的党员,只有认真地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

众的智慧,才能指出正确的方向,领导群众前进。我们不是尾巴主义者,当然懂得,群众的意见一定不会都是正确的和成熟的。我们所谓总结和集中,并不是群众意见的简单堆积,这里必须要有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但是,离开群众经验和群众意见的调查研究,那末,任何天才的领导者也不可能进行正确的领导。整理、分析、批判和概括也是会犯错误的,但是不断地同群众商量,不断地研究群众的实践,这就使党有可能少犯错误,并且及时地发现和纠正错误,而不致使得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因此,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保持谦虚和谨慎的态度。骄傲,专横,鲁莽,自作聪明,不同群众商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威信而坚持错误,是同党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

回顾一下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所走的道路吧:我们党在解放战争中,在土地改革和肃清反革命的斗争中,在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斗争中,在发展工业、农业和其他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斗争中,我们党所得到的巨大胜利,哪一项不是执行群众路线的结果?例如说,为什么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战斗员能够战胜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占优势的国民党军呢?难道主要地不是由于他们坚持为人民服务的立场,用自我牺牲的精神,树立了模范的军民关系,在部队内部建立了能够充分发扬下级官兵积极性的同志式的关系,并且依靠群众,总结每次战争的经验,从战术到战略都不断地得到进步的原故吗?战士替居民挑水,官长替士兵盖被子,在火线上开“诸葛亮会”,保护俘虏的健康和自尊心,

不搜俘虏的腰包,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但是,一系列的伟大胜利,正是同这些小事分不开的。例如说,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结果吗?他们这样迅速地 and 自愿地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166],难道不是我们党从群众本身的经验出发,大量地帮助农民从组织季节性的互助组起,进而组织常年互助组,进而组织初级合作社,又进而组织高级合作社,使农民从实践中确信了合作化的优越性的结果吗?例如说,我们国家的肃反运动^[167]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巨大的成绩,而又能够少犯错误,难道不是我们采取了专门机关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正确方针的结果吗?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充分地发动了群众,在几万万只眼睛的透视之下,才使得大量的反革命分子没有藏身之所,而不得不低头认罪、接受改造和重新做人吗?例如说,在全国解放以后,不到两三年的时间,我们就改变了旧社会那种极端腐败的社会风气,树立了具有优良道德品质的新的社会风气,难道没有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和群众之间的相互教育、相互劝导和相互帮助,能够收到这样的效果吗?试问,我们在大规模的消灭鸦片烟毒的运动中的胜利,在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生产建设和其他各种工作中的胜利,哪一件不是因为这个运动或者这件工作的

本身,确实反映了广大群众的要求,并且变成了广大群众自觉自愿的行动的结果呢?

在说到我们党由于实行群众路线而得到巨大的胜利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认为我们的工作在这一方面都是光明的。恰恰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全党记住:如果正确地实行群众路线,使我们得到成功,那末,违背群众路线,就一定要使我们的工作遭受损失,使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如同前面已经说过的,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在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许多工作人员中,正在滋长着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的倾向。不少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不重视调查研究,不了解工作中的真实情况。他们往往不是从客观的实际条件和人民群众的具体实践出发,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而是从不确切的情况出发,从想象和愿望出发,主观主义地来考虑和决定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作出的决议、指示虽然很多,但有的不完全正确,有的甚至完全错误。他们在执行中央和上级的指示的时候,往往不采取同下级同志和群众商量的办法,不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而只是机械地盲目地搬运。他们往往满足于表面上的成绩,而不注意工作的实际效果,或者只看到工作中好的方面,看不到工作中坏的方面,或者只追求数量,不讲求质量。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心中无数,常常“左”右摇摆,有时表现为右倾保守,思想落后于实际,有时又表现为急躁冒进,贪多求快,超过

实际的可能。

不少机关的负责同志,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处理文电和不必要的过多的开会上面,很少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和研究他们的经验,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事务主义和文牍主义的泥坑。不少领导同志,喜欢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建立庞大的机关,由于机构臃肿,层次重叠,不能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正确地及时地反映上来,也不能把自己的决议和指示正确地迅速地贯彻下去,在自己和群众之间,设置了许多人为的障碍。不少负责同志,对于工作中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不是亲自动手来处理,而是层层下放,然后,又层层上报,结果不是处理有错误,就是处理不及时,使工作受到许多损失。更严重的是有些领导同志,不愿意接近群众,不关心群众的痛痒,对于群众要求迫切解决的问题,不是积极地去解决,而是抱着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淡态度。

官僚主义也表现在有一些干部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他们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只能听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甚至有些品质恶劣的人,还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我们党内还有一种人,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关系颠倒过来,完全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人民中间滥用权力,做种种违法乱纪的坏事。这是一种很恶劣的反人民的作风,这是旧时代统治阶级作风在我们队伍中的反映。诚然,这样的干部为数很少,但是,他们的危害却很大。

官僚主义倾向还有一种比较大量的表现,就是命令主义。不少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作出决议、指示以前,既不同群众商量,在执行决议、指示的时候,对群众又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

方法,而是企图一切依靠命令行事。犯这种错误的同志,他们在主观愿望上也许是想把工作做好,但是,在实际上却是把工作做得很坏。这种命令主义的错误,在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但是,下面的命令主义错误,往往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分不开的。

上述这些现象的存在,说明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还远没有在我们党内得到完全贯彻执行。我们必须向这些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现象进行经常的斗争。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官僚主义是过去人类历史上长时期剥削阶级统治的遗留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深远的影响。因此,贯彻群众路线,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

党章草案在总纲部分和有关的条文中,都提出了这个任务。当然,仅仅依靠这些规定,并不能自动地解决问题。我们还必须采取一系列具体的措施。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

第二,必须有系统地改善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方法,使领导工作人员有足够的时间深入群众,善于运用典型调查的方法,研究群众的情况、经验和意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坐办公室、处理文件、在领导机关内部开会上面。应该缩小领导机关,减少领导机关的层次,尽可能地把多余的工作人员腾出来派到下层去,使留在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亲自处理实际工作,防止领导机关官僚化的危险。

第三,必须健全党的和国家的民主生活,使党的和政府的下级组织,有充分的便利和保证,可以及时地无所顾忌地批评

上级机关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使党和国家的各种会议,特别是各级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成为充分反映群众意见、开展批评和争论的讲坛。

第四,必须加强党的和国家的监察工作,及时发现和纠正各种官僚主义现象,对于违法乱纪和其他严重地损害群众利益的分子,及时地给以应得的处分。

第五,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必须运用过去整党工作的经验,采取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

在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密切同党外人士的合作,广泛地吸收党外人士参加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在我们党内还有不少的同志,甚至还有一些负相当领导责任的同志,仍然犯着不愿意或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的毛病。这实质上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宗派主义倾向,必须克服这种倾向,才能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得到贯彻实行。必须使这些同志了解,我们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长期的,这一个方针是早已确定了的。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我们党就实行了同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同各个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十多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合作对于我们党的事业,是有益而无害的。同我们合作的民主人士中,有许多人最初在政治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在合作的过程中,他们的立场,逐渐在不同程度上向社会主义方面变化了,并且将继续向这个方面变化。当然,这种合

作中间是有斗争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这些党外的民主人士,能够对于我们党提供一种单靠党员所不容易提供的监督,能够发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我们所没有发现的错误和缺点,能够对于我们的工作作出有益的帮助。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在他们的立场和我们的立场比以前更加接近以后,他们可以给我们的帮助只有越来越多。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继续扩大同党外人士的合作,使他们在我们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国家各方面的事务中,发生更大的作用。

关于我们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的意义,关于我们党在工作中继续贯彻群众路线方面的任务,我所要说的就是这些。

三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是党的根本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在党章草案的总纲和第二章中,对于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比较充分的规定。这些规定,是我们党组织生活的多年来经验积累的结果。

党是依靠全体党员和全党的各个组织,来联系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为了从人民群众中收集他们的意见和经验,为了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把它变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主张,并且组织人民群众加以执行,一般地都必须经过党员的努力,经过党的下级组织的努力。因此,正确地解决党的组织和党员的关系

系,党的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的关系,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关系,在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是曾经出现过偏向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时候,上下级关系中的偏向是过度集中。在那个时期,下级组织对于上级领导机关实际上几乎没有发言权。当时的上级领导者不但没有兴趣听取下级的情况和意见,而且要给那些根据实际情况向他们提出合理的不同意见的人们以种种打击。这种错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党中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以后,也就在基本上被克服了。

从一九三五年以来,我们党的上下级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一般是正常的。中央在处理全国性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总是尽可能征询和听取各地方和各部门的同志们的意见,对于不同的意见,一般也可以进行自由的反复的讨论。大家知道,中央有许多重要的指示,是先用草案的形式发给地方,要求各地在讨论和试行中加以修正,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多以后,才根据各地的意见修正发布的。对于中央已经发布的指示,如果地方组织由于具体情况确实不能照样执行,中央也同意地方组织按照实际情况加以变通。不但在抗日战争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最初几年中,中央都给予地方独立处理问题的广泛权力,而事实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在各地方和各部门,上下级关系一般也是执行了同样的原则。地方和下级对于中央和上级的领导,一般是尊重的,因此,党的政策基本上在全党能够得到贯彻实行。

但是,在这个时期,党内也曾经存在过另一种偏向,就是

分散主义的偏向。我们党内时常出现这样一种干部,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爱好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喜欢党的领导和监督,不尊重中央和上级的决定,甚至在处理一些应当由中央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的时候,也事前既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请示,事后又不向中央和上级机关报告,违背党的政策和纪律,危害党的统一。党中央对于这种偏向,进行了不断的坚决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的决定,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建立请示报告制度、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指示,一九四八年中央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都主要是针对着克服这种分散主义倾向而发出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168],更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彻底地摧毁了这种分散主义的错误。从那时以来,分散主义的偏向,就只在个别的范围内还有它的残余了。

在目前,党的上下级关系中的缺点,从总的方面说来,主要地还是对于发扬下级组织的积极性创造性注意不足。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不但表现在经济工作、文化工作和其他国家行政工作中,也表现在党的工作中。上级机关所作的硬性的规定太多,而不少的规定,并不是对于下级组织的情况和经验作了充分研究的结果,以致往往使下级组织在执行的时候发生困难。许多上级组织还不善于深入下层,倾听下级组织和群众的意见,同下级组织经过互相商量去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还习惯于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或者到下面去包办代替。此外,有些上级的领导人员还喜欢摆架子,耍威风,只是教训人,批评人,而不能向下级请教,不能听下级的批评,不能对下级

作自我批评。这种情况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也不是个别的。如果不注意并且改变这种情况,那末,在这些地方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根据以上所说的多方面经验,党章草案关于民主集中制中的上下级关系问题,增加了下列的规定:

第一,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增加了下列的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经常听取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的意见,研究他们的经验,及时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党的下级组织必须定期向上级组织报告工作。下级组织的工作中应当由上级组织决定的问题,必须及时向上级请求指示。”

第二,关于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职权范围问题,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职权应当有适当的划分。凡属全国性质的问题和需要在全国范围内作统一决定的问题,应当由中央组织处理,以利于党的集中统一;凡属地方性质的问题和需要由地方决定的问题,应当由地方组织处理,以利于因地制宜。上级地方组织和下级地方组织的职权,也应当根据同一原则作适当的划分。”

第三,关于政策问题的讨论和决议的执行,增加了这样的条文:“关于党的政策问题,在党的领导机关没有作出决议以前,党的下级组织和党的委员会的成员,都可以在党的组织内和党的会议上自由地切实地进行讨论,并且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党的领导机关一经作出决议,他们就必须服从。下级组织如果认为上级组织的决议不符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应当向上级组织请求改变这个决议;但是如果上级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来的决议,下级组织就必须

无条件地加以执行。”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另一个基本问题,是各级党组织中的集体领导问题。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关于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和反对个人崇拜的重要意义,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作了有力的阐明,这些阐明不仅对于苏联共产党,而且对于全世界其他各国共产党,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在我们党内,从长时期以来,由党的集体而不由个人决定重大的问题,已经形成一个传统。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现象虽然在党内经常发生,但是这种现象一经发现,就受到党中央的批判和纠正。中央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对于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尤其起了重大的作用。我认为,把这个决定在这里重新介绍一下,对于全党仍然是有意义的。这个决定写道:

“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今后从中央局至地委,从前委至旅委以及军区(军分会或领导小组)、政府党组、民众团体党组、通

讯社和报社党组,都必须建立健全的党委会议制度,一切重要问题(当然不是无关重要的小问题或者已经会议讨论解决只待执行的问题)均须交委员会讨论,由到会委员充分发表意见,做出明确决定,然后分别执行。地委、旅委以下的党委亦应如此。高级领导机关的部(例如宣传部、组织部)、委(例如工委、妇委、青委)、校(例如党校)、室(例如研究室),亦应有领导分子的集体会议。当然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之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意见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决定流于形式或不能做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常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军队在作战时和情况需要时,首长有临机处置之权。”〔169〕

这个决定在全党实行了,并且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它的效力。

当然,集体领导的制度在这个决定之前早就存在了。这个决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总结了党内认真实行集体领导的成功的经验,促使那些把集体领导变为有名无实的组织纠正自己的错误,并且扩大了实行集体领导的范围。

像这个决定所说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里面,长期以来就实行着党委的集体领导制,或者说得完全些,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期战争的经验,证明这个制度对于部队工作是有利的,它并没有妨碍部队的军事指挥。根据最近几年的经验,中央已经决定在一切企业中同样实

行党委集体领导的制度,也就是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170]等等。

但是,党的集体领导的制度,在实践中还是有许多缺点。有少数党组织的负责人,仍然有个人包办的行为。这些负责人,或者很少召集必要的正式的会议,或者往往也召集党组织的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只是形式主义的。他们既没有使会议的参加者对于所要决定的问题,在会议以前具有思想上的准备,在会议上,又没有造成便于展开讨论的气氛,实际上形成强迫通过。这种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必须坚决加以反对。一切提到会议上的问题,都必须经过讨论,允许提出异议。如果在讨论中发现重大的意见分歧,而这种分歧并不属于需要立即解决的紧急问题,就应该适当地延长讨论,并且进行个人商谈,以便求得大多数的真正同意,而不应该仓促地进行表决,或者生硬地作出结论。同样,在党组织进行选举的时候,候选人的名单也应该在选举人中间进行必要的酝酿和讨论。只有这样,党内的民主生活才能获得真实的保证。

中央一九四八年九月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另一方面的缺点,现在在许多组织中也还存在,这就是会议次数过多,时间过长。过多过长的会议,不但使党的专职工作人员缺少深入群众和进行具体领导的时间,助长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而且妨碍许多党员和群众的劳动和休息。这种缺点的产生,是由于缺乏对会议的规划、准备和领导,同时也由于滥用会议的方式,把许多不需要提到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提到会议上来了。这种缺点也必须坚决地克服。

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一,是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定期召集和充分发挥作用。党的第八次大会同第七次大会隔了十一年多,当然是迟了。地方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除了一部分单位已经严格执行了党章的规定以外,多数的单位还是比党章规定的开得少。这是我们党的民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缺点。

党内民主没有因为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开得不经常而受到严重的影响,这是因为,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的这些年份里,无论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都召集了大量的干部会议,这些会议按照充分民主的精神,讨论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在很大的程度上起了党的代表会议以至代表大会的作用。例如,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以来,就召集过多次全国范围的会议,这就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的七届二中全会;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的扩大的七届三中全会;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三日至八月十三日的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至十三日的全国粮食会议;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的扩大的七届四中全会;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的全国代表会议;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这些会议的,一般都有百多人、几百人到一千多人。这些会议,实际上都起了全国代

表会议的作用,都在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基础上,解决了党的政策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当然,无论如何,召集这些会议在法律上究竟不能代替召集代表大会,不能弥补不经常召集代表大会的缺憾。

为了彻底克服这个缺点,把党的民主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党中央委员会在党章草案中,决定采取一项根本的改革,就是把党的全国的、省一级的和县一级的代表大会,都改作常任制,多少类似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那样。党章草案规定全国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省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县一级的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二年。这三级代表大会一律每年开会一次,因此,原有的党的各级代表会议制度就不需要了。党的代表大会的常任制,大大减少了代表选举工作的负担,代表大会在任期届满以前,可以随时召集。由于每年开会,代表大会的会议也就可以开得简便一些。代表大会常任制的最大好处,是使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党的充分有效的最高决策机关和最高监督机关,它的效果,是几年开会一次和每次重新选举代表的原有制度所难达到的。按照新的制度,党的最重要的决定,都可以经过代表大会讨论。党的中央、省、县委员会每年必须向它报告工作,听取它的批评,答复它的询问。代表由于是常任的,要向选举他们的选举单位负责,就便于经常地集中下级组织的、党员群众的和人民群众的意见和经验,他们在代表大会会议上,就有了更大的代表性,而且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也可以按照适当的方式,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因此,我们相信,这种改革,必然可以使党内民主得到重大的发展。

必须着重地指出,党是一个战斗的组织,没有集中统一的

指挥,是不可能取得任何战斗胜利的,一切发展党内民主的措施都不是为了削弱党的必需的集中,而是为了给它以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基础,这是我们大家都充分明了的。我们主张改进各级代表大会的制度,是为了使各级党的委员会更便于集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工作作得更正确有效。我们主张改进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是为了使中央和上级的领导更符合于实际,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必须集中的工作,对于地方和下级更可以加强检查和指导。我们主张巩固集体领导,这并不是为了降低个人的作用,相反,个人的作用,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得到正确的发挥,而集体领导,也必须同个人负责相结合。没有个人分工负责,我们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复杂的工作,就将陷入无人负责的灾难中。在任何一个组织中,不仅需要分工负责,而且需要有人负总责。没有小组长,一个小组也不能行动,这难道不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吗?

在这里,我想谈一下领袖对于党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同样,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没有否认领袖人物对于政党的作用。按照列宁的著名的说法,领袖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171]的人们,毫无疑问,他们的这种威信、影响和经验乃是党、阶级和人民的宝贵的财富。对于这一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是感到特别亲切的。当然这种领袖是在群众斗争中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而不能是自封的。同过去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不

是在党之上,而是在党之中。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我们党从来认为,任何政党和任何个人在自己的活动中,都不会没有缺点和错误,这一点,现在已经写在我们的党章草案的总纲里去了。因为这样,我们党也厌弃对于个人的神化。当人民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前夕,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企业的名字,这对于制止歌功颂德,起了很有益的作用。党中央历来也反对向领导者发致敬电和报捷电,反对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夸大领导者的作用。当然,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

四

在党章草案的总纲中有一部分是说明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建设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正如党章草案的总纲所说:“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是党的力

量的所在。经常注意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是每一个党员的神圣职责。”

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为什么能够得到胜利呢?首先,当然由于我们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它代表着人民的利益。但是,仅仅有正确的主张还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而取得胜利。我们党同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团结了起来。但是,如果我们党自身不是团结的,我们怎样能去团结人民呢?

在我国的人民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又依靠什么战胜巨大的困难和重重的障碍,迅速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迅速地恢复了和发展了国民经济,迅速地进行了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党不是团结的,我们就决不可能领导人民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这样复杂的任务。

我们党已经在国家工作和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起着领导作用。很明显,我们党的状况对于国家的生活,已经比以前任何时候具有更广泛更直接的影响。巩固我们党的团结,维护我们党的统一,这不但是我们党的利益,也是全国人民的利益。

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指出这一点,在今天党已经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时候,特别重要。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机关的工作,或者是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所应有的界限。这是说,第一,在国家机关工作中的党员,首先是由担任负责工作的党员所组成的党组,必须服从党的统一

领导。第二,党必须经常讨论和决定在国家工作中的各种方针政策问题和重要的组织问题,国家机关中的党组必须负责在同党外人士完满合作的条件下,实现党所作出的这些决定。第三,党必须认真地有系统地研究国家机关工作的情况和问题,以便对于国家工作提出正确的、切实的和具体的主张,或者根据实践及时地修正自己的主张,并且对于国家机关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有某些在国家机关中工作的同志,借口自己工作的特殊性而不尊重党的领导,企图把自己工作的部门造成一个独立国,这是必须克服的一种危险倾向。同时,也有些党的机关,对国家机关的行政工作作不正确的干涉,或者并不调查研究,满足于笼统的一般化的领导或者感想式的领导,这种倾向也必须加以纠正。

这里所说的党同国家机关工作的关系,一般地也适用于党同各种人民团体的关系。但是,人民团体内部的民主生活,要比国家机关广泛得多,党在领导人民团体内的党组的时候,必须注意到这种特点。

党为了加强自己队伍的团结和统一,为了正确地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曾经同在这一问题上的各种错误的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党曾经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在社会上还保有强大的影响,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时期中深刻化,这些情况,不会不在党的生活中有相当的反映。因此,党的团结和统一,也不能离开不同程度的党内斗争。

像大家所知道的,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期间,最严重的党内斗争就是反对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斗

争^[172]。关于这一斗争,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召集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曾经作过详细的报告和讨论。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基本特点,就在于进行毫无原则的广泛的阴谋活动,企图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联盟企图把持某些地区和某些工作部门,作为反对中央和进行篡夺活动的“资本”,并且为着同一目的,在各个地区中和人民解放军中,进行反对中央的煽动。他们的阴谋活动,完全违反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敌人。正因为这样,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七届四中全会和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以后所采取的有关措施,表示了完全一致的同意。

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大大地加强了,全党同志的觉悟和党的组织的战斗力,是大大地提高了。党的和人民的敌人,在这一斗争中什么也没有得着。

党中央决定开除高岗和饶漱石的党籍,因为他们的行为,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有极端严重的危害,并且他们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前后的长时期中,在党再三向他们敲了警钟以后,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表示。党中央在一九五三年夏季召集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同年九十月间召集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都着重地要求全党加强团结,反对破坏团结的行为,但是,这些醉心于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家完全置若罔闻。

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指出:“对于那种与党对抗,坚持不改正错误,甚至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分裂活动和其他危害活动的分子”,党“必须进行无情的斗争,给予严格的制裁,直至

在必要时将他们驱逐出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党的团结,才能维护革命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

但是,这只是党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的方针的一个方面。七届四中全会决议指出:“每个同志都可能有缺点或错误,每个同志都需要别人帮助,而党的团结正是为了发展这种同志式的互相帮助。对于党员的缺点或错误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方针。”接着,这一决议说:“对于那种具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犯有在性质上比较不重要的错误的同志,或者对于那种虽然具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缺点、犯有严重或比较严重的错误,但在受到批评教育以后,仍能把党的利益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愿意改正并实行改正的同志,应当采取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他们的缺点或错误必须按照情况进行严肃的批评或必要的斗争;但是这种批评或斗争应当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达到团结的目的,不应当不给他们改正的机会,更不应当故意将他们的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因为这种态度就不是从团结出发,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就不利于党。”

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在对待党内错误问题上的上述方针,已经写到党章草案的总纲里了。

大家知道,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以来,对于党内犯错误的党员,就一直采取着这种分别对待的方针,而实践证明,采取这种方针是正确的,有利于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党中央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纠正同志的错误是为了取得教训,改进工作,教育同志,也就是说,“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而不是为了把犯错误的同志“整死”,整得他实际上不能在党内继续工作。因此,对待这些同志,应该着重实事求是地分析错误的实质和根源,应该着重使这些同志提高思想上的觉悟,并且也使其他同志以至全党都得到必要的教训,而不应该着重组织上的处分,不应该依靠简单地“扣帽子”和简单地实行惩办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尤其不应该加重惩办的程度,扩大惩办的范围,造成党内的紧张状态和恐惧情绪,使党的力量受到损失。在“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统治党的时期,就曾经犯过这种把党内斗争绝对化的错误。他们在党内实行过火斗争和惩办主义(所谓“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是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党的民主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妨碍了党的事业的发展。现在,这种错误地对待同志的缺点和错误的情况,虽然在党的生活中已经不占统治地位,但是在一部分组织中还是存在的,还必须注意加以纠正。

在另一方面,目前党内也有另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包庇姑息态度,不给以应有的处分,而且也不进行思想斗争。这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倾向,这也是必须坚决反对的。

为了保持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和统一,为了及时地帮助同志克服缺点,纠正错误,必须大大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对于发展批评有决定的意义。在过去几年中,党中央曾经多次组织全党范围的“整风”形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中央领导同志在召集下级同志开会或者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主动地要求他们对于中央的工作提出批评,

耐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并且对于批评中所指出的缺点和错误,迅速采取必要的实际措施,使党内的由下而上的批评,得到了很大的鼓励。对于压制批评的现象,党中央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处分了一些专横地压制下级批评的领导人员。但是,必须承认,至今还是有不少党组织的负责人,不少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党员负责人,并没有采取鼓励和支持由下而上的批评的态度,有一部分人甚至对于批评者采取可耻的打击报复的办法。这个事实,也是官僚主义病菌正在侵袭我们党的严重信号之一。每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为消灭这种恶劣的现象而斗争。

五

现在,我想对于党章草案中关于党员的规定作一些说明。关于党员的规定,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通过的党章比较起来,有不少重要的修改。这是因为,党的情况和党员的情况,同第七次大会的时候,有了很大的不同。这些修改,提高了对于党员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党员的权利。

党的情况所发生的最重大的变化,是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导地位。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已经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内实现,党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也已经得到了基本上的胜利,党在目前的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工业强国。党的组织,无论在数量上或是在党员成分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根据党中央组织部的统计,截至一

九五六年六月底止,全党共有党员一千零七十三万四千三百八十四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一点七四。其中,工人党员一百五十万二千八百一十四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四;农民党员七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五十九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九点一;知识分子党员一百二十五万五千九百二十三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其他成分党员五十五万八千一百八十八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点二。妇女党员约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

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重,党在人民中间的威信的增长,这一切,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斗争;那末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为了这个目的,党章草案,对于党员的条件作了一些新的规定。

党章草案首先要求,党员必须是从事劳动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切光荣都是劳动的产物,不劳动而剥削他人的劳动,对于人民群众说来,乃是最大的耻辱。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发展,依靠剥削他人劳动为生的现象,在我国正在走向消灭。但是,剥削分子、剥削行为、变相的剥削行为和剥削思想,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还是存在着的。

我们必须不让这种分子,这种行为和这种思想,侵入到党的队伍里来,并且必须使每一个党员在劳动和剥削之间,坚决地划清界限。

党章草案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比原有条文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

党章草案把“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列为党员的义务,这个规定的理由,是十分明显的。党的团结和统一是党的生命,不能设想党需要一个不爱护党的生命的党员。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积极地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因为这是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的具体保证。

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地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有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反党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一部分有功劳有职位的党员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是不受约束的,这是他们的“特权”。并且有一部分党的组织,也正是默认了他们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任何抱有这种想法或者支持这种想法的人,就是帮助党的敌人腐蚀我们的党。任何以“老爷”自居的人,都以为党是少不了他们的,事实上恰恰相反,我们党不但不需要,而且不允许有任何在遵守党员义务方面与众不同的老爷。一个人只有不因为自己的功劳和职位而骄傲,不用来作为“特殊化”的资本,反而更加谦虚和谨慎,更加提高自己的以身作则的责任心,他的功劳和职位,才是值得尊敬的。否则,他的骄傲和放肆,必然会把自己淹死。党决不能姑息这样的人,而脱离

广大的群众。

党章草案规定,每一个党员有义务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并且努力加以克服和纠正;有义务向党的领导机关直到党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章草案的这个规定,无疑地将要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积极性,帮助党内批评的开展,促进党的工作中缺点和错误的揭露和消除。

党章草案规定,党员必须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这对于党的生活有重大的原则意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是我们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任何对党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行为,都只能对党造成损害。而归根结底,对于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的人自己,也只能造成损害。

党章草案还规定,党员必须时刻警惕敌人的阴谋活动,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

关于党员义务的这些新规定,表示党对于党员的要求是更为严格了。

关于党员义务的规定,需要在党员中和准备入党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广泛的深入的教育。如果党员不遵守党员所应尽的义务,党的组织必须迅速地给予批评和教育。许多党员特别是新党员,违背了他们的义务,确是由于不了解什么是他们所应尽的义务,或者虽然看过党章的条文,实际上却没有懂得它们的意义。因此,当党员初次违背自己的义务的时候,及时地给予批评和教育,常常可以帮助他们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或者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轻易地给予纪律处分,是不正确的。

但是,为了使党员严格地遵守自己的义务,不能仅仅依靠教育。党章草案规定:如果党员严重地违背这些义务,破坏党的统一,违犯国家法律,违背党的决议,危害党的利益和欺骗党,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

所有申请入党的人,必须个别地履行入党手续。党章草案规定:申请入党的人必须有正式党员二人介绍,经过支部大会的通过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的批准,并且经过一年的预备期,才能成为正式党员。

党章草案用“预备期”来代替沿用已久的“候补期”,用“预备党员”来代替“候补党员”,是因为“预备”的含义比“候补”更为确切。这是一位党外人士的建议,我们接受了这个建议。

在讨论草案的过程中,有不少同志问:既然要提高党员的标准,为什么把原来的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的办法改变了呢?现在取消了这些分别的规定,是不是会妨碍党的纯洁性呢?

取消原有的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因为原有的社会成分的区别已经或正在失去原有的意义了。在第七次大会以前和以后的相当时期内,对于不同的社会成分规定不同的入党手续,是必要的,起了良好作用的。但是,在最近时期,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苦力和雇农已经不存在了;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革命士兵由于征兵制度的实行,已经不成为单一社会成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地改变着;城市贫民和自由职业者差不多已

经失掉成为社会阶层的条件。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革命士兵,又有大批的革命士兵变为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把这些社会成分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而且即使要分,又怎么分得清呢?

至于其他社会成分,那末,前面已经说过,只有从事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的人才能入党,只有具备了入党条件的人才能入党,因此,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实践证明: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主要的问题是加强对于吸收新党员工作的管理,是要求支部大会和上一级党的委员会对于申请入党的人和预备期满的预备党员进行认真的审查,是使预备党员在预备期真正受到考察和教育,是对于还不完全合乎条件的党员及时地进行教育,并且对于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加以清洗,而不是在规定某些人的入党介绍人的多少,介绍人党龄的长短,和作预备党员时间的长短。

我们党现有的党员数目,比在第七次大会时期,已经增加了八倍。这些党员是怎样被接收入党的呢?他们是不是合乎党员的条件呢?根据几次整党的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的党员都是按照党章所规定的程序入党的,而且是合于党员条件的。党的组织基本上是在群众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经过斗争考验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被接收入党,这就是党员的质量的主要保证。但是,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仍然发生过多次的错误。在解放战争期间,某些解放区在农村中曾经组织所谓“参党运动”,或者采取所谓“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办法来接

收党员。在全国解放前后的两年内,党的组织的发展过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区,这种发展几乎是没有领导、没有计划的,甚至有些地区,在群众还没有发动的条件下,就忙于大量征收党员,建立支部,因而使党的组织一度产生了严重不纯的现象。在另一方面,在接收党员的工作中,也有过关门主义的错误,例如,某一个时期曾经没有着重在产业工人中发展党员,另一个时期又曾经忽视在革命的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在某些农村中曾经不注意吸收青年积极分子和妇女积极分子入党,等等。

无论如何,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目前我们党的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中,十分之九是在第七次大会以后入党的。过去无数的经验证明,不少党员在组织上虽然入了党,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者没有完全入党。党的各级组织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加强对于广大的新党员的教育,切实地组织和指导他们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对于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对于党的历史和党的政策的学习,并且加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使他们在思想上也具备着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的条件。

党的队伍是迅速扩大了。但是,在有一部分群众中,在有些企业、机关和学校中,有些农村中,有些民族中,党员的数量还是很小的。而新的积极分子总是在不断地生长,不断地要求参加我们的战斗的行列。因此,党在今后时期,除了要努力提高党员的质量以外,还需要继续有计划地接受要求入党而又完全合于党员条件的人入党。党还应当特别加强妇女群众的工作,注意吸收妇女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党在努力提高党员标准的时候,还必须注意保护和扩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党章草案在党员权利方面,也增加了一些主要的新的内容。

草案把在工作中充分发挥创造性,作为党员的一项权利规定下来,是有原则意义的。这个规定,不但可以大大激发广大党员在党的纪律所允许的范围内,在工作中充分集中群众智慧,运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地、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且可以使许多惯于墨守成规、惯于不尊重党员群众创造性的领导人员,学会改变自己的作风,从而促进党内民主的高涨。

草案规定,在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或者鉴定性的决议的时候,党员有权要求亲自参加。这样,可以使得党组织有机会听到党员本人的陈述,避免根据一种不确实的或者不全面的反映来作出决定。这种办法,在党内一般是采用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党组织没有这样作,这些党组织常常毫无理由地在对党员作出处分的决定以后才通知党员。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形下面,党组织作决定的时候,不可能让党员亲自参加,但是,这应该看作一种例外。而且就是这样,党员仍然有权在事先提出亲自参加的要求,并且在事后,如果他不同意党组织的决定,仍然有权提出自己的申诉。

草案规定,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有权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大家知道,党是思想一致的组织,党员的思想一致是党的团结和统一的基础。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党员对于党组织的一切决议的认识都不能有任何出入。不,这是不可能的。党所要求的一致,是在党的一切基本原则

问题上的思想一致和一切实际问题上的行动一致。在各种日常工作问题上,党员们的意见有某些不一致,不但是许可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各种实际问题,党必须按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国的各个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去行动。在这里,党要求那些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在实际行动中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就在这种条件下,这些党员也仍然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并且仍然有权向所属的党组织和高级的党组织提出自己的意见,党组织不应该用纪律迫使他们放弃这些意见。这对于党不但没有害处,而且可以有某种益处。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末,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

草案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的权利,对于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的权利,对于党员向党的任何一级组织直到中央委员会提出声明、申诉和控诉的权利,都比原有的条文规定得更为完满了。

草案特别规定:侵害党员的权利,就是违反党的纪律,应当给予纪律处分。这是对于党员权利的有力的保障。

关于党内的奖励和处分,党章草案作了以下的重要的修改:第一,取消了关于奖励的规定。第二,取消了关于对组织的处分的规定。第三,简化了关于对党员的处分的规定。

实际生活证明:把劝告作为一种处分是不适宜的,把警告

分作当面和当众两种也有许多不便。对于党组织的处分,实际上完全可以用对于党员的处分来代替。

有一部分同志问道:为什么要取消党内的奖励呢?这同样是实际生活教给我们的。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虽然规定了奖励的条文,但是,在过去十一年的执行过程中,证明并不是必要的。这当然不是说,党没有注意到许多优秀的党员在工作中的出色的成就。党介绍了他们的事迹和经验,党按照他们的品格和能力,选拔他们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这些都是党对于他们的奖励。但是,取消奖励的规定,还有更重要的理由。从根本上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为奖励而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工作。当我们的工作是正确的努力的,因而我们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的时候,这对于共产党员说来,就是最高的奖励。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谈一谈党的干部问题。的确,如果我们向每一个普通的党员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那末,我们就需要向党的干部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党的各级组织中的骨干,受到了党和人民更多的信任,因此,他们对于党和人民,显然也比普通党员负有更高的责任。根据粗略的统计,全党有相当于县委委员一级以上的干部三十多万人,这三十多万人的工作的好坏,对于党的事业有决定的影响。他们应当首先学会永远不脱离群众,永远不自满和不害怕困难,勇于接受自下而上的批评,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并且用自己的榜样去耐心地教育他们所领导的工作人员。

党的干部的力量,从第七次大会以来,特别是从一九四九年以来,有了巨大的增长,这是用不着解释的。但是,今天到处

都还是感觉到干部的不足。这个事实,说明了党的提拔干部的工作,仍然有重大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是,至今仍然有相当多的同志用“资格”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有丰富经验的老党员——这无疑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这一部分财富,那我们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因为,革命的事业总是不断发展的,需要的干部总是不断增加的,而老党员的数目又总会是不断减少的,既然这样,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放手地使用经过选择的新干部,除了对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害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

为了适应党和人民的事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大量地培养和提拔新的干部,帮助他们熟悉工作,帮助他们同老干部建立团结一致、互相学习的同志关系。党必须特别注意培养精通生产技术和各种专门业务知识的干部,因为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力量。党必须在各个地方注意培养熟悉当地情况、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本地干部。在少数民族地区,党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培养本民族的干部。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的最大的来源之一。

党的干部的管理工作,在近几年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开始实行了分级分部的管理,使干部的管理工作同政治和业务的检查监督工作,互相结合了起来。党应当沿着这个方向,把干部管理的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使全党任何部门、任何职位的干部都受着党的认真的监督和具体的帮助,使党的干部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而这也就是全体党员的质量不断地得到提高的主要条件。

六

党章草案对于党的组织机构,除了把县一级以上的各级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取消了原有的各级代表会议以外,还作了若干新的规定,就是关于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监察机关、党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的规定。这些规定,只需要比较简单的说明。

在党的中央组织中,草案规定,中央委员会除选举中央政治局以外,还选举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由它继续担任原有的在党的多年经验中证明为必要和适当的中央书记处的作用;同时,选举中央书记处,使它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党和国家的工作的繁重,原有的中央机构已经不够适应需要了,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增设中央机构的必要。此外,中央委员会还认为需要增设几个副主席和一个总书记,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副主席。

在党的地方组织中,草案规定了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党组织的制度。鉴于地方组织领导机关的工作日趋繁复,规定在这些组织的党委员会下面,都设立常务委员会和书记处。为了减少上下级的层次,规定地方委员会作为省、自治区委员会的代表机关,区委员会作为直辖市、市、县、自治县委员会的代表机关。事实上,有些省已经撤销了一些地方委员会和农村中的区委员会的组织。

党的基层组织,最小的可以只有三个党员,而最大的却可

以有上万个党员,因此,它的组织形式,需要有很大的伸缩性。党章草案把党的基层组织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员超过一百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基层党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总支部或者支部。第二类是党员超过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总支部委员会,下面设立若干个支部。第三类是党员不足五十人的基层组织,这一类组织可以成立支部委员会。此外,草案中还规定了某些必要的变通办法。今后,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还可能有个别单位不能完全适用上述三类形式,这可以由相当的党委作为特殊问题,变通地加以处理。

对于基层组织的任务,草案也根据目前的情况,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草案规定,企业、农村、学校和部队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领导和监督本单位行政机构和群众组织的工作。草案指出:机关中的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对于机关中的每一个党员的思想情况进行监督,及时地把机关工作的缺点,通知本机关的行政负责人和报告党的上级组织。这些任务,是目前很多党的基层组织还没有作到的。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基本纽带,经常检查和改进基层组织的工作,是党的领导机关的重要政治任务。但是,无论在城市和农村中,许多领导机关,往往只忙于指使基层组织执行一项又一项的任务,却很少去检查一下究竟这些基层组织是在怎样地在那里工作着,很少给基层组织中的党员以具体的教育和帮助。一切直接领导基层组织的党委员会,应当根据党章,在基层组织中普遍地进行教育,并且得出改进对于基层组织的领导的必要的结论。

党的各级监察机关的建立和健全,对于反对党内不良倾向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虽然还是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以后才在原有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基础上陆续成立,但是已经证明了它们的工作是有成效的。党章草案规定了党的监察机关的任务和监察委员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党的监察委员会应当不限于受理案件,而且要积极地检查党员遵守党的章程、党的纪律、共产主义道德和国家法律、法令的状况。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保证各级监察机关有足够的干部力量,并且经常对于它的工作给以坚强的支持。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表明,它是党的可靠的后备军和有力的助手。当青年团在一九四九年恢复它的组织的时候,它的名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那时以来,青年团的团员已经发展到两千万人,在各个战线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积极活动。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和青年群众中共产主义教育事业的进展,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已经决定向即将召开的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建议,把它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党中央认为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党章草案指明了党同青年团的关系,要求各级党组织密切地关怀青年团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领导青年团用共产主义精神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全体团员,注意保持青年团同广大青年群众的密切的联系,并且经常注意青年团领导骨干的选拔。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事业的继承者。因此,我们相信,各级党组织一定不会在执行这些任务的时候,吝惜自己的精力。

*

*

*

我在上面,已经把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党章草案,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对于我们党目前的状况和任务,是适合的。

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章草案在由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以后,将成为进一步提高党的质量、扩大党内民主、发扬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改善党的组织工作、加强党的团结统一和战斗力的有力武器。

像我在前面所已经说过的,党章草案同第七次大会所通过的党章,并没有根本原则上的不同,而且应当说,草案的基本精神,正是第七次大会所规定的关于党的工作的各项原理的逻辑发展。关于党的群众路线,关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关于党的团结和统一,关于提高党员的标准和保障党员的权利,所有这些,在党的第七次大会上都曾经进行深刻的讨论,作出正确的指示。由于这样,我们党从第七次大会以来,在组织工作上同在政治斗争上一样,是生气勃勃的,是蒸蒸日上的。党的组织工作,保证了党的政治任务的胜利的完成。在从第七次大会到第八次大会的十一年岁月中,我们党的组织力量是迅速地壮大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大大地扩大和加强了,党的生活日见活跃,党的队伍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更加团结一致,因而党的事业也就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得到更伟大的成就。

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发生过错误,也遭遇过危险,也存在着缺点和困难。但是,所有这些,都没有也不能使我们的党有什么惊慌。相反,我们党始终具有无限的信心和勇气,去纠正

错误,战胜危险,克服缺点和困难,争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我们党的胜利,首先和最主要地要归功于人民群众对于我们的信任和支持,要归功于全体党员的艰苦奋斗。我们要永远纪念和感谢为党的事业而牺牲了生命的先烈。

我们党的胜利,也要归功于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者,特别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

现在,我们党正面临着新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彻底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积极准备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使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商业,实现巨大的高涨,使我国的科学文化事业和人民生活状况达到新的水平。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我们一定要为维护世界和平积极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了迎接这些伟大的任务,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努力来更加巩固我们党,更加巩固我们党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联系。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和发展起来、在实践中不断地改进自己的组织和工作、不断地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一定能够团结一致,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

马列主义要与中国的 实际情况相结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朋友们提出 :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是什么 ?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是适合于中国的 ?

关于这个问题 ,如果朋友们愿意详细了解的话 ,可以看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73]通过的党章 ,党章中总纲和党员两个部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 ,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 ,只有两句话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他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中国在过去民主革命没有完成的时候 ,首先要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民主革命完成以后 ,现在要建设社会主义 ,将来再由社会主义发展到共产主义。这样就能把中国人民引导到完全脱离剥削和压迫的社会 ,建设共产主义的幸福生活。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和任务。当然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 ,有一千一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国际青年代表团时对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百万党员,还不是全部或大多数都已达到这样的标准。党的任务是要一步一步地提高党员的觉悟,使他们在思想上行动上成为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把这—个任务作为自己的经常任务。中国共产党内农民出身的党员很多,建党不久就有大量农民入党。他们入党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是为了得到土地,可以说还是民主革命的要求,并不是当初就有社会主义的要求。比如说,对农业合作化,也是经过教育和锻炼才逐步有这种要求,现在大部分农民都明确了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合作化。所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不是一下就能达到的。一个共产党员,第一,他是普通人,第二,他是普通人中的先进分子。但是也有比普通人还要落后的共产党员。

关于谁来决定国际古典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中哪些适用于中国。十一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6]确定了这样的原则,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此来指导我国的革命,指导我国的建设。这个原则是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过去革命中失败和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并在第七、第八两次党代表大会上加以肯定的。当然,这只是一个原则,原则的运用还会遇到许多具体问题。一个国家的问题是多方面的,不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如何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各个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讨论决定,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由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问题决定好了,还需要党员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解决。首先要几万、几十万骨干懂得这条原则,这条原则才会得到实行。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看来,普遍真理有这样一条,就是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将来还要实现共产主义。能不能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不能。如果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不实现社会主义,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就不要存在了。但是,中国怎样才能比较快地消灭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呢?这就必须研究本国的特点。离开本国的特点去硬搬外国的东西,这条普遍真理就不能实现。各位朋友在各地都听到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介绍,这就是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问题。普遍真理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离开了这条普遍真理就谈不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那就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而不是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今天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走的道路,是列宁所想过的,但是列宁没有能实现。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用了和平改造的办法。实践证明,这样做的结果,我们的生产不仅没有受到破坏,而且得到了发展,既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教育了资产阶级。这是比较好的办法。如果普遍真理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或者结合得不好,那末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这个问题。

在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个问题上,我们党过去吃过许多亏,以后就一直抓住反对主观主义这一条。反对主观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经验主义。教条主

义,就是只知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来运用,它使我国的革命遭受过失败和挫折。经验主义,就是只看到一些具体实践,只看到一国一地一时的经验,没有看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两者我们都反对。

我还想向朋友们讲一点,根据我们的经验,普遍真理与具体实际,二者结合很不容易。中国共产党也经常犯错误。但是我们注意和研究犯错误的原因,及时改正。毛主席说,人要经常洗脸,房子要经常打扫,党也是这样,要经常改正错误。我自己也常常犯错误。每个人都是这样。毛主席还常常说,他也经常犯错误。不过我们都知道他的错误比我们少。任何人都会犯错误,绝对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我们前一个阶段做的事情是干革命。从去年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起,革命的任务也就基本上完成了。今后的任务是什么呢?革命的任务还有一部分,但是不多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73]提出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调动一切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而奋斗。这就是我们今后很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知道要多少年才能完成。搞建设这件事情比我们过去熟悉的搞革命那件事情来说要困难一些,至少不比搞革命容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全党还是小学生,我们的本领差得很。搞革命不能说我们没有本事,我们把革命干成功了,搞建设我们还说不上有多大的本事。

不能否认,过去几年我们在各方面的成绩,包括建设方面的成绩,都是伟大的。我们国家发展得确实很快,气象一新。西安,我是一九五二年底来过的,那时和现在就不能比,现在好多现代化的工业企业建立起来了。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是这样。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去年一年我们做了很多事情,有些事情是搞多了搞急了。因为搞多了搞急了,使得我们今天甚至明天还会有些被动。但是总的来说,去年一年的成绩是最突出的。去年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建设也发展得很快,农业遇到了那样严重的灾荒,由于实现了合作化,顺利地渡过了灾荒。总之,过去几年我们各方面的成绩是很大的,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

但是,切不可过分夸张自己的成就,切不可把我们的事情说得太美满了。说得太美满,看得太简单,这一点反映到了我们的宣传工作上,就是把我们的国家描绘得如何漂亮,好像现在什么困难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享福了。有些干部脑子里想的是,我革命这么多年,国家现在也建设起来了,应该满足我的要求了。实际上我们的困难很多,我们面临的问题比过去更加复杂。要看到,尽管我们的成绩很大,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很快,在工业建设方面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建设了不少企业,但是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落后的国家。要把这么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先进的工业国家,需要长期的刻苦的努力。这就是说,需要有勤俭建国的本领。因为你穷嘛!如果在贫穷的基础上不懂得勤俭建国,这个国是建不好的。我们党,我们中国人民,过去在阶级斗争中的本领是不错的,否则怎么能把革命干成功了呢?从整个来说,阶级斗争这门科学,我们党、我们的干部是学会了。但在改造自然方面,这门科学对我们党来说,对我们干部来说,或者是不懂,或者是懂得太少了。当然我们也还有一些人才,但这些人才是很少的,很不够用的,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还是很低的。从过去几年的建设来看,证明我们的知识很少,还没

有学会勤俭建国的本领。毛主席说,我们过去干革命是花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才学会的,并且其中犯过大错误。所谓二十几年,即从一九二一年建党起,到一九四五年的七大^[126]。当然就我们党的中央来说,如何革命的问题,遵义会议^[68]就解决了。从一九二一年到七大共二十四年,这个期间我们党犯了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174],特别是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差不多把我们的革命力量搞光了,革命根据地有百分之九十垮了,受了很大的损失,花了很大的代价。毛主席说,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是不是可以不要花二十几年的时间而花更短一点的时间学会,并且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这个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搞,在建设问题上也会栽大跟头,犯大错误。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问题上犯大错误,栽大跟头,并不是没有先例的,以为在建设问题上不会栽跟头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如果不好好学习,不总结经验,我们也会在建设问题上栽跟头。

我们要在比较短一点的时间内学会建设,而且在这中间不犯大错误,不栽大跟头,可能不可能呢?应该说是可能的。因为我们国家搞建设的条件是好的,比起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困难要少一些。首先,国际形势给了我们一个有利的环境。其次,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我们这几年搞得比较快,原因之一就是苏联的经验,有苏联的帮助。当然不是说苏联在帮助我们的过程中,每一件事情都是对的,没有缺点。但总的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不可能有这样大的成绩。我们要继续学习苏联,还要会学。学习苏联好的东西对我们用处很大,借鉴苏联错误的东西,对我们也有很大的益处。我们要善于接

受苏联的经验教训,这样就可以少受损失。当然我们也要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经验,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有先进的东西我们也要学。但首先是学习苏联,因为现在只有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我们,美国对我们搞禁运嘛!

同时,我们自己也有了一些建设的经验。我们搞建设已有七年多一点时间,有的地方如东北还搞得更早。这几年的经验也很重要,不要小看。这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真正总结起来,对我们来说,益处更大。这几年的建设,大量的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的错误。我们既要接受成功的经验,也要接受犯错误的教训;既要善于学习国际的经验,也要善于学习自己的经验。

我们国际国内的条件是好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善于利用这个形势,能不能花很少的钱办更多的事,能不能不断地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避免犯大错误。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过去的革命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现在的建设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也在于党的领导。也就是说,关键在于党是不是善于学习,学习得好就可以避免犯大错误,就可以少花一点钱办很多的事;关键在于党能否依靠群众,不断地克服自己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革命当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在建设中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也会使我们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会使我们不能达到勤俭建国的目的,会使我们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搞好建设。

过去几年,我们的建设成绩是很大的,各党各派和全国人

民的工作都是有成绩的,我们共产党员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这是主要的,是首先要看到的,不看到这一点我们会丧失信心。但同时也要看到,建设中暴露出的严重缺点,特别是最近一两年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主要是教条主义倾向,是值得引起我们严重注意的。比如在我们同志的头脑中,对建设总是贪新贪大,这种脱离实际的形式主义的思想使我们吃了亏。新的大的东西要不要呢?肯定要,而且新的大的是我们建设的骨干,像鞍钢及西安一些大的企业就是骨干企业。不搞新的,没有这样的骨干企业,更高级的技术问题就解决不了,今后还要搞一些大的新的企业。但是不能什么都是大的新的,尤其不能认为凡是新的就好,凡是大的就好。不一定。讲到形式问题,形式也要,凡是能够注意的就应该注意,但不能陷入形式主义,不能因为讲形式而浪费国家的资金,不能因为讲形式使工作不利。

现在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央搞的大企业,浪费现象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会搞的话,完全可以节约很多资金,用比较少的钱,同样建设这样新这样大的企业,同样有这样高的技术水平。我们有些企业规模很大,占地很多,每一个工厂,都有一个很大的厂前区,一个办公大楼。没有这些是否可以呢?是否简陋一点也能指挥生产呢?很多钱是花得不适当的。有一些中央企业起了带头作用,气魄大,牌子大,公子少爷的味道足,把一些地方工业带坏了。比如原来是省上的一个煤矿,成本低,交给中央的煤炭管理局后,成本就高了。在地方上还算一算帐,归了中央管理,帐也不算了,认为反正亏本不碍事,国家贴得起。苏联并不是这样的,美国、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也不

是这样的,甚至国民党也是不敢这样搞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多得很,但是办企业比我们好。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很多都是艰苦奋斗出来的,他们办企业比我们高明。上次我到这里来,听说有十三个公私合营厂,他们厂房是旧的,职工宿舍是旧的,厂长住的也很简单,我建议市委组织国营企业的同志去看一看。我向省委同志建议,最好去上海看一看,那里有些企业确实是艰苦奋斗出来的,搞得既经济又实用,参观后可以改变一下观念,那里可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效法的宝贵经验。大企业,首先是中央企业,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脑子发热,一脑袋的贪新贪大,追求堂而皇之的形式,脱离中国的现实。要提倡因陋就简,经济节约,艰苦奋斗。我看真正讲节约的应当是社会主义。我在兰州见到一个工厂,设备极简陋,厂长的办公室很朴素,一切都很简单,但是生产出来的产品并不差。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企业都要这样办,但是用这样的精神办企业,是值得学习的。

城市规划中的问题也不少。规划是必需的,不规划是不妥当的,问题是怎样规划。规划也有指导思想问题,规划得不好会造成大的浪费。据说现在西安市城市规划的图纸上已摆得满满的,实际上里边空的地方很多,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填起来。我看到一些纱厂和二机部的一些厂子,每一座厂房相隔很远,厂内占地很大,建设要花很多的钱。

在“骨头”和“肉”^{〔175〕}的关系问题中,对解决“肉”的问题也是求新求大。过去我们在城市规划中对“肉”重视不够,应该办商店、理发馆等服务性行业,没有注意办,这是事实。现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妥当,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应

当着重指出,过去在这方面花的钱并不少,就是用得不适当,今后我们要花更少的钱解决更多的问题。在中央来说,对于“肉”的问题注意得不够,恐怕在地方来说,对于钱用得不适当的问题应该引起注意。这次我看了很多地方,有的花钱多没有解决问题。如果不客气地说,我们在兰州的印象比在西安好。在兰州我看到很多简易的东西,戏院还可以放电影,座位也不错,这样的戏院盖起来只花十万元,有的花钱更少就解决问题。事实上,那些大的漂亮的少盖一个,就可以盖很多个小的简易的,分布也会更匀称一些。我们国家大,搞一点富丽堂皇的东西,以表示我们的新气象,我不完全反对,但是不应该搞得太多。现在已经感到搞多了,今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了。我们如果本着这样的精神,今后搞一些简陋的东西,“肉”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可以把钱用到最急需的方面去,如修下水道等。西安的电影院戏院并不少,但是在工业区一个也没有,要看戏的人找不到戏院,有戏院的地方没有多少人去看戏,这个布局显然是不适当的。西安的城隍庙,有很多简易的商店,工业区为什么不多搞几个城隍庙呢?现在不是说交通困难吗,如果我们的城市建设布局适当,在人多的地方多建一些简易的商店、理发馆等,交通就不会那么紧张了。有群众的地方就要修学校,少建一些大型的校舍,就可以多建一些简易的学校。总之,这些都是关系到城市规划的指导思想问题,也是处理“骨头”和“肉”的关系的指导思想问题。

我们在建设方面的指导思想应该是：

一、面对国家的现实。我们不要脱离国家的现实。什么叫教条主义呢？教条主义就是脱离自己的现实。经验本来是好

东西,如果不善于学习,就会变成坏东西。苏联的许多经验是好的,但是如果采取教条主义的方法去学习就坏了。我们的国家很穷,很困难,任何时候不要忽略这个问题。不是讲增产节约吗?就是因为我们穷。我们要面对国家的现实,在建设当中考虑经济、实用、美观。这个问题周恩来总理在一九五三年就讲过。有些同志讲美,美当然是好的,大家都是愿意美的,但是应该在经济实用的条件下,在可能的情况下照顾美观,实在不大美也就算了,等到将来富裕了再来讲美,今天主要讲经济讲实用。

二、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考虑问题常常忽略了群众的需要。现在有各种观点,追求这个化那个化,连共产主义化也有了,就是缺乏群众观点,容易解决的问题不去解决,宁肯把更多的钱用在不适当的地方。对于花很少的钱就可以解决群众需要的问题,甚至有些不花钱也能解决的问题,却注意得不够。我们的建设工作应该面对群众,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修建学校如此,修建文化娱乐场所如此,解决“骨头”和“肉”的关系问题也是如此。

应当说我们党领导建设事业过去是做得好的,近几年来有些削弱,在花钱方面没有面对国家的现实,也没有面对群众的需要。我们的宣传也总是讲我们国家多么漂亮,多么阔气。有些青年学生、青年工人闹事,就是因为总觉得国家给他们的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国家对不起他们。干部也有这种情绪,在城里工作后,就不愿意下乡了。我们本来很穷,但却装潢得很富裕。所以我建议西安有意识地搞一些简陋的东西放在高楼大厦周围,可能对于教育青年有所帮助。总之,我们

搞建设 ,不要脱离实际 ,不要脱离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从现在来看过去 ,第一条 ,我们的成绩是伟大的 ,今后要搞得更好一点。第二条 ,缺点也是难免的 ,我们不是消极的批评 ,不要灰心。错误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要说错误的责任首先在中央。我们花钱要买到经验 ,经验这个东西很贵 ,今后还要花钱买经验 ,要力争花很少的钱买更多的经验。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

(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173]强调了这个问题。毛主席最近特别强调要有一套章程,就是为了监督。毛主席说,要唱对台戏,唱对台戏比单干好。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因为我们如果关起门来办事,凭老资格,自以为这样就够了,对群众、对党外人士的意见不虚心去听,就很容易使自己闭塞起来,考虑问题产生片面性,这样非犯错误不可。所以毛主席在革命胜利之后再三强调这个问题,这是看得很深很远的。

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要求党的生活严一些,团的生活也严一些,也就是说,党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团对团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

员的监督要严格一些。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要扩大他们对共产党的监督,对共产党员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我们的消息就会灵通一些,我们的脑子就不会僵死起来,看问题就会少一些片面性。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

在群众方面,要扩大各方面的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要开好。开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政协,很有益处。最近全国政协开得很好,畅所欲言,有好多好意见。厂矿企业的管理方面,要扩大民主。最近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强调了这个问题。要搞职工代表大会,加强它的作用,这就是要求我们在厂矿企业里扩大群众的监督。在这方面,八大决议中只讲了一面,强调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这次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里还加了一条,即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既有自上而下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又有自下而上的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厂矿企业的领导同志,有群众监督比之没有群众监督要好一些,会谨慎一些。实行群众监督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会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听说相当一部分厂矿企业的行政领导者对这一点想不通。他们总觉得:不受监督,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比较方便。正因为相当多的领导同志思想不通,看起来监督就更加重要了,不搞群众监督就更危险了。就是农村办合作社,也要扩大民主,实行民主办社。农村干部的命令主义是同上级领导的缺乏民主作风分不开的。计划搞得那样死,怎能不强迫命令呢?在山西,

农民对我们的意见是：“你们管得太多了”。我们到晋南，当地领导机关规定八月初五棉花打顶尖，不够尺寸不准打顶尖，干部拿上尺子到地里量着打顶尖，照办了的每亩收棉四十斤，没照办的每亩收棉五十斤。这叫什么先进经验？这也是滥用党的威信。农民对我们无可奈何，反正是党的号召，做就是了。这种情况，偶尔发生群众还可以原谅，长此下去那还行。在学校，也要扩大民主生活。教职员工会、学生会，要发挥作用，教职员、学生的意见要能充分表达。学校的负责人，要善于吸收教职员的意见，善于吸收学生的意见。发扬民主不会妨碍统一领导。我们的军队不是最讲集中吗？我们过去打仗也靠军队的民主生活，这对我们统一指挥有什么妨碍呢？对领导管理有什么妨碍呢？只有加强上下团结，事情才更好办嘛。实际上群众参与的事情，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搞错了，他们也能忍受，很少埋怨；相反，实行命令主义，搞对了群众也不满意。所以，扩大各方面的民主生活，扩大群众的监督，很重要。

各党派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176]和思想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177]这十六个字，毛主席讲了，我不准备多讲。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党内不少人思想不通，不了解它的好处。这十六个字的方针对我们国家有深远的影响，对我们党有极大的好处，对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我们不注意，不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要僵死起来，马克思主义要衰退，只有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种意见表达出来，进行争辩，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辩证唯物主义。这一点，斯大林犯过错误，就是搞得太死了，搞得太单纯了。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在一个时期衰退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也是这样,有监督比没有监督好,一部分人出主意不如大家出主意。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所以,对这十六字方针应当想通。

现在有的地方不是讲闹事吗?有些人不是讲大民主^[178]吗?有些青年总觉得大民主解决问题。我们是不赞成搞大民主的。大民主是可以避免的,这就要有小民主。如果没有小民主,那就一定要来大民主。群众有气就要出,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有说话的地方,有申诉的地方。群众的意见,不外是几种情况。有合理的,合理的就接受,就去做,不做不对,不做就是官僚主义。有一部分基本合理,合理的部分就做,办不到的要解释。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要去做工作,进行说服。总之,要让群众能经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政协会议上,职工代表大会上,学生代表大会上,或者在各种场合,使他们有意见就能提,有气就能出。有小民主就不会来大民主。群众把气出了,问题尽可能解决了,怎么还会有大民主呢?怎么还会有罢工罢课呢?大民主我们并不提倡,搞大民主并不好。匈牙利搞大民主^[179],要几年才能恢复元气,吃亏的还是人民。波兰搞大民主^[180]也需要相当一个时期才能恢复元气。所以,大民主不要希望搞,没有什么值得效法的地方。但是,严重的官僚主义者总是会有的,所以有时闹事也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不要紧,遇到这种情况要沉住气,要善于面对群众,依靠群众,耐心地去工作,这样问题就可以

解决。

如果像刚才说的那样去做,我们的党是能够领导的,是不会被打倒的,因为我们同群众在一起,不是用宗派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对待党外人士,不是用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不是用主观主义的态度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党过去能领导好,今后还是能领导好。共产党有没有资格领导,这决定于我们党自己。人家承认不承认是另外一回事,不承认也不要紧。如果你合格,人家不承认也合格;如果不合格,人家承认了也还是不合格。归根到底在于我们自己。现在,共产党能不能领导学校,能不能领导科学?现在本事还不大嘛!照毛主席的话,就是又能领导,又不能领导。政治领导,宪法上规定了,看起来还可以,但不是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行。如果共产党用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人,再说共产党能领导也领导不起来。用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思想去领导,就会领导得起来,团结得起来。至于哪一个部门的科学,当然是不懂的了。不懂,就团结大家来搞嘛。总之,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

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学会建设,学会管理经济,把我们国家由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的工业国。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亲爱的代表同志们：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从一九四九年成立以来，到这次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已经八年了。这八年当中，青年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我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积极参加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青年团在自己的工作中，表现得不愧为祖国的优秀儿女的旗帜，不愧为党在各个战线上的有力的助手。现在，我们的祖国，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青年运动也将随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的一项标志，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将要在现在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用共产主义青年团来作为我们这支青年先进队伍的名称，不只是给全体青年团员带来了巨大的光荣，而且也在中国

青年的肩上放上了更为繁重的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用共产主义的精神教育青年一代,团结全体青年积极参加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以便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为将来实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同志们,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这个任务绝不比过去的革命任务来得容易和轻松一些。必须了解,我们国家原来的经济落后,广大人民的生活还是贫苦的,而帝国主义还在包围着我们,我们的困难还是很多的。我们如果不能把全国人民都团结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最充分地发挥起来,克勤克俭,艰苦奋斗,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在这个艰巨的任务面前,我们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一定要以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同党一起站在这个伟大斗争的最前列,密切联系全体人民群众和青年群众,在不同的岗位上进行长时期的艰苦的奋斗。

同志们,为了创造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没有极艰苦的劳动,是不可能的。我们要参加劳动,特别要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的体力劳动,因为体力劳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最大多数人民都要担负的光荣义务。轻视体力劳动的剥削阶级思想的残余,是我们的新社会前进的障碍物。我们的青年团员要不愧成为共产主义的先进战士,就一定要向轻视劳动、特别是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斗争,而且要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带动广大青年群众投身到体力劳动的战线上去。我们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战线上一支值得人民信任的突击力量。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这里向工农业生产战线上的全体青年男女表示敬意。他们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急先

锋,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创造者。我们希望他们用更大的努力增产节约,希望他们更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积极准备参加建设祖国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青年,也应该经过一段时间的体力劳动,这对于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是必要的。青年团的干部如果没有必要脱离生产,就应该不脱离生产,如果是必须脱离生产的,也应该抽出一部分时间参加体力劳动,这对于联系群众和锻炼自己,都有很大的利益。

为了在党的领导下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全体团员,就需要不断地努力学习。我们要结合建设祖国的实践,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克服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其他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我们要努力学习各种劳动的本领,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青年团员必须带动广大青年,尊敬年长的一代,从他们那里学会各种有用的本领。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助手,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还必须学会怎样把最广大青年群众团结起来一道前进。我们不只是要善于团结先进的青年,而且还要善于把一切爱国的青年、包括还不赞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爱国青年,都团结起来,共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共产主义青年团应该克服自己队伍中任何脱离群众的宗派主义的倾向,努力使自己成为中国全体爱国青年的知心朋友和核心力量。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特别提倡谦虚,反对骄傲自大,就要要求每一个青年团员努力去帮助别人,而不要怕自己吃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同志们,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虽然是十分艰巨的,但是,中国共产党深信,青年团员和中国全体青年必然能够克服自己道路上的各种困难,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光荣任务。这是因为,中国青年不仅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爱国人士的关怀,而且有自己的光荣的革命传统。在过去长期的革命斗争和近年来的建设工作中,中国青年已经有了良好的表现。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不怕吃苦,热爱劳动,遵守纪律。我们共产主义青年团员不仅要把这个光荣传统继承下来,而且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它大大地加以发扬。应该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的顺利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一代,是朝气蓬勃的,但是也有弱点。这就是他们中间不少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容易,往往害怕困难,不愿吃苦耐劳,或者在改善物质条件方面提出过高过急的要求。但是,这不能责备青年,而在于党和团对他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充分。只要我们在今后进一步改善对青年的思想工作,把国家的真实情况和达到美好的将来的必由之路清楚地告诉他们,在全体青年中间发扬艰苦奋斗的正气,反对自私自利的歪风,并且努力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错误,那末,我们就一定能够帮助广大的青年自觉地克服自己的弱点,勇敢地、愉快地迎接自己的战斗任务。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181]。在这个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青年团员的模范行动和创造精神将起重大的作用。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史上写下青年们的光辉的一页,我们就一定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戒骄戒躁,克勤克

俭,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用艰苦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要学习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经验,我们要学习世界各国人民的长处。我们要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要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团结在一起。

用艰苦的劳动建设我们的祖国!

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科学和文化!

全中国的青年大团结万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青年大团结万岁!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

(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这次会议应集中讨论中小学问题。总的估计是,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的情况很好,勤工俭学劲头很大,职业中学发展很快。这些都是前几年所没有的好现象,现在应该注意总结经验,适当地调整 and 解决已经出现的新问题。

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两者不能偏废。只普及不提高,科学文化不能很快进步;只提高不普及,也不能适应国家各方面的需要。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所有劳动者也都需要文化。教育普及了,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了,发明创造就会多起来。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

现在看来,普及问题比较容易解决,比较难的是如何提高。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职业中学的教学质量问题。职业中学的一部分毕业生应该能够升入高等专科学校学习。职业中学如果只有现在这几门课,是不可能提高的。现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各类学校,都不能降低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涉及一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的讲话。

个学生人数的问题。学校应该挖掘教学潜力,多招学生,但是不要因此而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人数多,又能保证质量的,才是好学校。由此联系到勤工俭学,也要注意这个问题。《工作方法六十条》对勤工俭学的提法很慎重,认为开展勤工俭学是有范围的,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一律都搞。除了对中等技术学校和技工学校提出要做到自给或者半自给、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以外,对其他学校都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只要求学生参加劳动。职业中学搞半工半读是肯定的,城市中还应该发展一批职业中学,这类学校很多可以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一般学校要给学生参加劳动的机会。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生参加劳动,一是必须,二要适当,三看可能。普通中学可以根据现有的条件搞一些小农场、小作坊,学生轮流参加生产,或者到农村参加义务劳动。学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天,主要是使娃娃们养成劳动习惯,加强集体观念。劳动有了收入,也可以拿来帮助贫苦学生,但是不能把劳动搞成社会职业,不要以赚钱为目的,一提倡赚钱,就容易计较个人利益。城市中学的学生年龄小,又没有好多门路,不可能实行半工半读。个别中学如果有条件能够做到半自给或者自给的,也可以搞,但是不要影响学生的学习。总之,学校要保证提高教学质量,否则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成都会议已经确定,教育经费整个不减,分到各省的也不减少。各省再想想办法,争取拿这么多钱办更多的事,但要保证原有的教学质量。必要的教学器材不能减少。经费使用不宜过紧。我们节约经费有个原则,不能因为节约经费而影响教学质量。如果教学质量降低了,过几年就能看出来,那时大学

招生就要发生困难。

师资问题要注意。正规大学、中学现有的师资质量不能降低。至于近几年大量发展起来的学校,现在不要强调其师资是否合格,办起来就是好事,以后慢慢调整和提高。当然,这么多职业中学办起来了,牵涉到以后高等学校如何办的问题。有的国家中小学质量差,吃了亏。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有一批学生基础课学得好,否则将来要吃大亏。

在宣传上,还是毛主席的话,心要热,头要冷。现在主要不是抓指标,而是抓措施。只要措施是积极的,就不是机会主义。河南提出一年做到普及小学教育,也以提两年为好,即使两年实现不了也不要紧,慢一点也不是不光荣,不是机会主义。不要所有的省都照河南那样办。只要心热,措施积极,迟一两年完成也可以。

教育部以后要把中小学教育的相当一部分交给地方去办,各省能办多少,由省里根据实际情况去安排,教育部可以不管。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中小学教材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自己关起门来搞。教材、教育制度,教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样做,就能够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182],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天津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你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胡耀邦^[183]同志对青年团过去几年的工作概括的那几点,也好,赞成。我在中央书记处开会的时候讲过,这几年,总的来说不是路线错误。我们有不少成绩,但是也有大量的缺点,而且教训应该看得严重一点,深刻一点,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毛病、责任不是你们担,耀邦同志讲,你们有份,比如刮“共产风”^[184],你们有份。但是,这几年,各级团组织总是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工作。党也一样,你们也一样,是努力的嘛。这些错误,这些缺点,主要不是团的问题。你们检查这一点也好,全党的教训,青年团也吸取嘛,有份无份都要知道嘛。

这次会议,你们进一步讨论团怎样做工作,有些问题这次也搞清楚了。现在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青年团本身领导方面的问题。根据这几年做的和现在肯定的,团的工作无非两部分:一是参加全党全国范围内的各种工作,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努力奋斗;一是属于青年团本身的特殊性质的工作,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接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青年团应该有自己的系统领导。对于系统领导这一点,应该说过去讲得不够明确,这一次把它讲明确好。当然,所谓系统领导,比如团中央发一个指示,各级团委在具体执行中,还要跟同级党委商量,同级党委根据当地的条件,什么时候做,如何做,统一加以安排。这样,就把团的系统领导和党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了。

系统领导的作法不能完全像过去那样。比如青年团单独来一个号召,在全国搞一个什么运动,有没有?可能有。过去有些号召是必要的,我们并不否定团对全国青年可以有单独的号召。问题是这种形式怎么用法,什么时候用,在什么问题上用,哪些用法对,哪些用法不对。不但青年团有这个问题,党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党向全国号召搞丰产方,于是青年团就搞个青年丰产方,妇联就搞个妇女丰产方,结果都搞得不好。这个经验,大家都知道。这当然不只是你们青年团的事,你们也是根据党的号召。这几年,这样的事情不少。比如青年团号召青年种树,这总是不错的,问题是由团单独地搞,又没有好好地领导,成活率很低,这个教训要吸取。青年报发表社论,提出号召,不要搞一般号召,而是扎扎实实地告诉青年怎么做法。这样的号召,可能会产生好的效果。这种属于号召青年应该努力奋斗的事情还有的是。比如青年的学习,团总是要管的。学习不要像过去那样强迫受训,那种方法要改变,那个效果不好。总之,这些问题要总结一下,不能否定青年有特殊的要求,特殊的问题。既然不能否定,团就有事情干,就应该有自己系统的工作。属于全国范围的,团中央同党中央商量。属于全省范围的,团省委同党省委商量。无非得到他的支持,得到他的

同意。他同意,他支持你,你去干,可以干得更好。他不同意的事情,你干也干不好。这个经验你们总应该有的。

那末,要青年团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是要做更多的事情,还是做少一些事情?是做更多的事情。是要起更多的作用,还是起少一些作用?是起更多的作用。是要做更多人的工作,还是做少一些人的工作?是做更多人的工作。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在各个岗位的工作中,成年和青年一块搞,大量的人一块搞,你们青年团在里头起模范作用,这就是做了更多的事情,起了更多的作用,做了更多人的工作。你们起了模范作用,影响就不同了,首先影响青年,其次影响成年。

这样的工作当然没有那么热闹。这个热闹问题很值得研究。今天在座的大概也有人在太行山呆过,也有人在冀鲁豫呆过。过去冀鲁豫的工作比太行热闹得多,太行的工作不够热闹,但是精雕细刻。当然,那个时候太行的工作再加点热闹就好了,但是归根到底它是细致的工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结果得益处大,兵就不跑。当然,完全否定热闹的形式,也是不对的。但是只满足于那个形式,缺乏深入的工作,细致的工作,是搞不好的。我们的事业总是要求精雕细刻,没有一样事情不是一点一滴的成绩积累起来的。难道我们的事业就是几个发明创造的人搞出来的?他们有他们的功绩,他们的功绩比一般人来说要大,一个人甚至要起很多人的作用。但是,归根到底,事情总是所有的人一点一滴地搞成的,这是最根本的。

我们党对于群众路线历来的解释,正如毛主席讲的,无非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这就是正确

地反映群众的意见,然后正确地领导群众。党的正确的路线、政策是从群众中来的,是反映群众的要求的,是合乎群众的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是能够为群众所接受、能够动员起群众的,同时又是反过来领导群众的,这就叫群众路线。群众路线要采取各种形式,其中包括热闹的形式。我们现在并不取消热闹的形式。比如最近我们在商业系统里面就要搞个反对“走后门”运动。现在小偷、小流氓在青年里面也多起来了,不搞点运动不行呀。对于“走后门”这个问题的处理要从严,不是从宽。我们的社会风气,应该说,一九五九年以前是很好的,外国人赞扬,我们也引以自豪。这两年我们再看一看,有好多情况就不那么好。这说明,一旦搞得不好,歪风邪气就会钻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在某一个时候要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热闹的形式,有这样热闹的形式,才能把一个歪风打下去,才能把一件事情办好。在全国范围有这样的問題,在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也有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的群众路线,不是满足于那个热热闹闹,主要的是要做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做人的工作。这是一点一滴的工作,这样的工作积累起来,才有我们伟大的成绩。所以,我们要搞得深入一些。我们党的历史,我们党的传统,有热闹的形式,但是归根到底,我们是实事求是地做深入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过去在农村做的工作那样好?就是因为做得很深入。我们甚至做一件事情可以不登报也能搞好。禁鸦片烟,不登报,完成了;土地改革^[123]和镇压反革命^[147],不登报,完成了。这就是靠家喻户晓。所谓家喻户晓,就是一种又是热闹的事情,又是极端细致的事情。所以,我们主要是做细致的工作,深入的工作。做人的工作也好,做各行各业、各

方面的工作也好,种庄稼也好,搞工业生产也好,办学校也好,都要做细致的工作。我们要把大量的工作放到群众中去,同他们一块生活,一块活动,一块说笑话,一块下棋,然后去做工作。一不要党气,二不要团气。这就难了。所以,我们做细致的工作,不是比过去更容易。最容易的工作是开大会,发个一般号召,敲锣打鼓,搞得热热闹闹,那个工作究竟见多少效?

我们要把主要精力放到经常工作方面。那末,还要不要发挥青年突击作用?青年突击作用还是存在的。可不可以提?可以提。当然,是不是经常那么提,也不必。比如一个工厂,为了完成一件“急、难、新”的事情,组织一个青年突击班,带头突击,我也赞成。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否定这一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发挥青年作用的有效形式。在农业方面,为了解决某一个困难的问题,组织个青年突击组去攻关,好不好?好。这是好的形式,不是坏的形式,还是可以运用的。问题是怎么个做法,不是什么事都要普遍那么搞,而是真正按照需要去搞。

现在青年团的事情相当多,因为社会上的事情相当多。我们这几年假如说有经验,有这样一条,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社会渣滓的影响,总要钻出来。现在我们说起话来好像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样子,因为群众吃得不好,穿得不好,住得不好。过去我们好多话说过火了,说满了,说大了,有的运动搞“左”了。有这个问题。党也如此,团也如此。懂得这一点,我们倒要理直气壮地好好地做工作。比如刚才说的流氓多起来了,商店“走后门”,这里面还不是有青年?公共场所,北京车站那么乱,那里边也有青年人,甚至有少年。现在的风气很值得注意。我们说调整,也要把这个调整好,把作风和思想调整一

下。各个地方要好好调查,仔细研究这个问题。所谓群众路线,包括调查研究。社会风气不好,也是个同群众有关的问题,大量的群众不满意,有一部分群众陷到里面去了。归根到底,我们要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多做点工作,多搞点调查研究。我们有解放后的前十年的经验,那十年,我们的风气相当正。而且那个时候确实有群众监督,是广泛的群众运动,是深入细致的工作。儿童有礼貌,关心集体事业,关心公共秩序,看到不对头的地方就批评。这种好风气,要把它恢复起来。现在提倡做这个工作没有人听,慢慢总有人听。要引导人们向兴旺的道路走。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人穷志不要短,越到困难的时候,越要有志气。在青年里面应该广泛地宣传这些思想。

现在摆在党和青年团面前的工作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工作不是比过去更好做了,而是更难做了。至少这个阶段是如此。在气象一新、大家都满意、大家高高兴兴的情况下,工作好做;在现在不是那么兴旺的情况下,工作难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多做工作,越要做得深入细致。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这几年来,我们对技术干部关心不够,对他们的使用有问题。有许多新生力量,能力未得到很好发挥。好多大学毕业生,工作了几年还当见习技术员,为什么不能大胆提拔当工程师?留学生回来后,使用得又怎样?我们再没有钱,也要把这批人提上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把年轻人提起来,放到重要岗位,管的业务宽了,见识就广了,就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要重视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年轻人。世界上的科学家,成名的很多是在三十岁左右。现在再不重视培养提拔年轻人就晚了,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不行了。

解放十多年来,我们培养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多少?大学毕业的有多少?一个设计院,一个企业,有多少人该提升?各部要根据所属单位的情况,提拔一大批工程师。冶金部系统可以增加几千个工程师,铁道部也可以这样做,包括提拔工人当中的优秀分子。研究院中也可以设工程师。今冬明春要进行这项工作。

这次提拔工程师,不是个别的,有多少提多少。我看全国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听取冶金工业七年规划汇报时的讲话。

能够提拔几万个工程师。要经过精选、评议。提拔的条件主要是根据专业技术水平,政治条件是不反对共产党,忠于祖国。共产党员专业技术不合格的也不能提。有的人可以破格提成工程师,不一定都要经过见习技术员、技术员再提为工程师。新提的工程师一切待遇都按照工程师的标准,无非一个人增加几十元工资。

我们现在主要的问题是浪费专业技术力量。绝大多数工厂的技术干部都有窝工现象。有些单位让他们去搞与专业技术无关的行政工作,还有的长期下放劳动或打杂。以后,对大学毕业生的使用,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专长。

各级、各行,各大厂或者是部委,可考虑建立考核委员会。一定要掌管到他那个单位,列入名册的有多少专业技术人员,是些什么情况。大学毕业生工作两年考核一次。这就是说,不要漏掉了人才。解决这个问题光靠人事部门不行。专业技术水平一定要由专家来考核鉴定。要经常帮助专业技术人员进修,给他们提供自学条件,这也要定个制度出来。看来学位不搞不行,可以先搞一个方案。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在群众工作方面 ,我们党的几次会议上 ,讲过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是我们党长期的很好的传统。我们的工作向来是很深入的 ,过去在农村也好 ,全国胜利之后也好 ,各种工作都是做到家的。不是吹牛皮 ,一些外国党也真正相信我们的群众路线。我们过去做了许多事 ,有的并不登报 ,不登报不等于不普遍深入地宣传 ,如整顿社会治安、社会风气 ,都做到家喻户晓。这是依靠党的领导 ,依靠各个群众组织的经常工作去做的。

这几年 ,经常的细致的工作忽略了。这是党的领导方面的问题 ,党没有专门党的工作 ,团没有专门团的工作 ,工会没有专门工会的工作 ,妇女也没有专门妇女的工作了 ,要有就是三八队、青年队、娃娃队 ,大家都去搞一般工作 ,丢掉了我们各行各业应该经常死死抓住不放的事情。最近中央要开个空前的大会 ,近七千人 ,研究党的工作。现在党的工作大大削弱 ,反映到党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也可以看出来。这几年有没有群众路

^{*} 这是邓小平同志接见参加全国省、市、自治区妇联主任会议全体同志时讲话的一部分。

线呢？不能说没有，但至少相当多的群众运动不是群众自愿的，是违反群众路线的。我们不回避这些问题。过去搞了一些蠢事，也是好事，使我们更加体会到党的传统经验是很宝贵的，更深刻地体会到要把它恢复起来，好好地做深入细致的一点一滴的工作。过去传统的作风、做法，凡是好的东西都要恢复起来。不是巩固这几年大喊大叫的东西，而是巩固原来长期积累下来的好经验、好作风、好做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主要是讲经济方面，但群众工作也有这个问题。哪些事情不妥当，哪些提法不妥当，不要隐讳，实事求是总结起来就妥当了。

妇女工作的经常工作是什么？就是妇联要特别负责做的特殊工作。勤俭持家就是这样的工作。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一定要联起来，只提一个不够。有了强盛的国，家才会富起来。首先是勤俭建国，其次是家要管好。现在搞十年计划，这个口号十年不变，坚持到底，因为我们国家的物质基础就是这么个状况。这就是妇联的特殊工作。当然男同志也要勤俭持家，但宣传以妇联为主，你们向男同志宣传，大姐向大哥宣传。勤俭建国、勤俭持家应经常提倡，是长期要做的工作^{〔185〕}。

家庭和睦也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要处理好的，一是夫妻关系，二是婆媳关系，三是妯娌关系，四是父母子女关系等等。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妇女工作中的经常工作。这样的问题，就是妇女的特殊问题，就是妇联的特殊工作。子女的教育，父亲也有责任，但总是母亲担得更多。婚姻问题常常要从妇女这个角度反映，一般说妇女总是处于原告地位。她们关心这些问题，这不也是特殊问题吗？至于妇女卫生、疾病防治、娃娃接生、喂奶

等,这些都是妇女的特殊问题。我们的传统是,无论哪项工作,包括妇女工作在内,都要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深入工作,充分根据群众的要求,提出具体办法,领导群众去解决问题。

强调经常工作并不一概拒绝突击运动这种形式。如三反^[186]、五反^[187]、镇反^[147]、土改^[123]等,都是突击运动。又如现在要解决水害问题,也要搞突击。妇女工作某个时候、某项事情采取一下突击的形式不是不可以,但经常工作是基础。群众运动只是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不是一年到头全运动,不是一律的这里运动什么那里也运动什么。不能照搬,只能实事求是。如果一年到头运动就没有劲了,就变成浮夸、形式主义了,实际上违反了群众意志,脱离了群众。因此,归根到底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大量的日常工作是基础,突击运动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才最可靠,没有长期的群众工作基础不行。三年解放战争打胜了,这是在长期的群众工作的基础上集中了一切力量才实现的。如渡黄河,群众把门板都贡献出来,光冀鲁豫的门板还不够,连冀南的门板也下下来了。那时群众吃得很差,还是拿出粮食供给人民解放军。这没有长期工作的基础是不行的。国民党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共产党长期联系群众办好事,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解放战争是人民战争,依靠人民才能做到这一点。

现在党的工作、群众工作要着重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这次会议提出,把基层组织建立起来,提得好,还要提得够一些。工作总是离不开基层。还要开妇代会、工作会议,一年定期搞一搞,总结一下经验,讨论一些问题。经常工作的制度要恢复,没有制度工作搞不起来。经常做些什么工作,你们不提,党委

就排不上议程。党委觉得需要时会抓你们,如计划用粮,但对特殊问题就不一定知道,要靠妇联提出来。总之,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包括整顿组织,健全组织。建立和健全基层组织,就要有基层干部。我赞成你们的意见,大多数的公社设专职妇女干部,人数少的公社可以兼职,兼要真正的兼,总要配备一个女同志,主要做妇女工作。三年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算你们最大的成绩。这项工作要老老实实在地做。至于提这样口号,那样口号,这样方针,那样方针,只有有了基层工作,有了经常工作,才有希望落实。否则只发号召写指示,发下去就会像石头掉在大海里,影子都看不见。现在各行各业都在建立自己的经常工作,当然还是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党委不支持就搞不成,但你们管你们这一行,该解决的事情就解决。只要你们经常提出问题,提出主张,提出办法,做出成绩,党委怎能不支持。

你们这次会议讨论了形势没有?妇女工作一定要管本行,议大事。管事要管本行,议事要议大事,要把眼界搞开阔些。这不单是指做妇女工作的干部,妇女群众也要关心政治。经常工作中有政治,有思想,勤俭建国就是大事,这里就有思想。只看到一个家,不看到国,那怎么行。妇女干部要看世界,农村妇女也要看世界。开各种会议,要谈形势,听了报告,要发表点议论,养成风气。这叫务虚,这个虚,实际上是实,思想认识会反映到实际中去,反映到工作劲头上去。一定要议论大事,不要搞得狭窄得很。在培养妇女干部方面,要注意这个问题。以后订个章程,包括县在内,开妇联会,要议大事。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一次意义十分重大的会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188〕}，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特别是近四年的经验，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十年的奋斗目标。毛泽东同志的讲话^{〔189〕}，特别是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对于我们党，对于今后加强党的领导，对于各方面完成任务，是有深远意义的。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

现在，我讲一讲党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报告的三大部分中，有一大部分是讲党的问题的。我还想讲一点意见。

我们党是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且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这个党，照我们历来的说法，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是名副其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党一定要在国际上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旗帜，高举革命的旗帜，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同时，我们也历来高举着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党在国际方面能否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归根到底，首先决定于能否把我们国内的工作搞好。要搞好国内建设，搞好国内

各方面的工作,又首先决定于我们党的领导。

我们党能不能在国际上担负起不可逃避的责任呢?我们党能不能在国内领导好各方面的工作呢?我想,我们全党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说,是能够的。

我觉得,我们党有这么五个优点,有五好。

第一,有好的指导思想。这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这个思想,从历史上证明了是好的。中国的革命,不是由别的思想引导到胜利的,而是由毛泽东思想引导到胜利的。革命胜利以后,也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才获得了这样伟大的成就,并且继续胜利地前进着。

第二,有好的党中央。这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从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68]以来,二十七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的党中央是一个好的党中央。有的同志可能会说,党中央不是也有缺点和错误吗?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不是说,中央对近几年来我们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负主要责任吗?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我们认为,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央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我说我们中央好,从这次会议也可以看得出来。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的中央,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认真地总结经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扬成绩,修正错误。这样做,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我们党是合乎这个标准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集中讲了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问题,特别是讲了许多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和自我批

评,总结经验。这样做是不容易的。正因为我们敢于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对就对,错就错,是就是,非就非,所以说,我们党是合乎列宁所说的标准的,我们的中央是好的中央。

第三,有大批好的骨干,包括大批新的积极分子。现在,我们的党员中,有百分之七十几到八十是全国解放以后入党的。但是,这些党员,都是在实际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我们的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

特别要指出的是,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我们有好的骨干。现在,县以上的主要骨干,军队团以上的主要骨干,大多数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地委一级干部大都是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县委书记多半是抗日战争中期入党的,当然也有一批新的。这些骨干,是经过风浪的,是很可宝贵的。现在,我们的干部又有了十二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包括正面的经验和反面的经验。正面的经验是很重要的,反面的经验也是很重要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讲到,我们有了反面的经验,就增加了“免疫力”。我们的干部,经过历次革命斗争的锻炼,又有了十二年建设经验,是我们党的好的骨干。

第四,有好的传统、好的作风。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概括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当然也包括批评)的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我们党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当然,应该说,这个传统从马克思起就有了的。我们党历来是有理想,有志气,不怕“鬼”的。尽管这几年我们有一些想法和做

法不切实际,也不要因为批判了这些东西,就丧失了理想,丧失了志气,就怕起“鬼”来了。好像我们在工作中有了那么一些缺点,犯了那么一些错误,就看到绳子都是蛇了。现在有各种“鬼”,可能有这样一种丧失信心的“鬼”。全党要防止这种“鬼”。我们还是要有理想,有志气,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是可以克服缺点,改正错误,把事情搞好的。

我们还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特别是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的,是我们的党规党法。应该说,除了像前面所说的犯错误的时期以外,多少年来,我们是努力这样做的。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许多领导同志,历来都强调谦虚谨慎。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73]上,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着重讲了这个问题。

我们党的好传统当然不止这些,我只是举例来说的。

我们党有这些好的传统,所以我们党历来是团结的,统一的,有战斗力的。

第五,有好的人民,人民对我们党有最大的信赖。我们党是一个密切联系群众的党。这也是我们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国家的人民是有高度的政治觉悟的人民。毛泽东同志多次讲过这么一个例子:在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他不问今天锅里有没有米煮,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向南走向北走是当时最重要的战略问题^[190]。这说明我们军队里的

战士都是关心战略的。

我们的人民懂得顾大局。他们有理想,不会丧失信心。大家知道,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时候,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在解放战争的时候,人民为了支援军队,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了。这些年来,只要我们真正依靠人民,跟人民讲清道理,人民,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爱国民主人士也好,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都是相信跟着党走是对的。

当然,必须指出,这几年来,我们一些同志滥用了人民对党的信任,滥用了党的威信,群众是不满意的。但是,当我们犯这样的错误的时候,群众还是这样想:共产党不见了。当我们改正错误的时候,人民群众就说:共产党回来了。这样的人民,是很好的人民。我们不依靠人民,不走群众路线,是毫无道理的。

上面所讲的,是对我们党的一个总的估计。再说一遍,我们党有五好:有好的指导思想,有好的中央,有大批好的骨干,有好的传统,有好的信赖党的人民。这样的党,既然能够领导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既然能够把国内工作搞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负起自己应负的责任。

应该指出,最近几年,我们党的领导,党的工作,是有严重缺点的。特别重要的是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削弱,严重的削弱;有些地方好些。就全党来说,有相当程度的削弱。我们宁肯把这个问题估计得重一点,使全党有所警惕。因为这几年许多同志忙于具体工作,不大谈党的问题,不大注意党的建设,所以强调指出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

为什么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了削弱呢 原因是多种的 ,我认为首先是 ,我们不少同志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 ,体会不够。这几年来 ,我们不大注意调查研究 ,因而所提的一些任务往往不是实事求是的 ,所提的一些口号 ,也有许多不是切合实际的。指标过高 ,要求过急 ,还有一些不适当的“大办” ,这就使得我们的许多好传统受到了冲击。而许多好的传统的削弱 ,又反过来加重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其次 ,在这几年的党内斗争中发生了一些偏差。无论反“左”的 ,反右的 ,都有这种情况。这次会议讨论中 ,同志们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在几次运动中 ,确实发生了一些偏差 ,伤害了一大批党内外干部。当然 ,对于那些蜕化变质的分子 ,是应当斗争并且给予处分的。我们所讲的是伤害了一部分不应当伤害的干部。由于这些偏差的影响 ,我们党的许多好的传统受到了削弱。例如 ,实事求是 ,说老实话 ,本来是我们党的传统 ,但是 ,由于没有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运动中斗争过火等种种原因 ,这几年在我们党内滋长了一种不如实反映情况 ,不讲老实话 ,怕讲老实话的坏风气。有意弄虚作假 ,是不好的 ,怕讲老实话 ,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同于弄虚作假 ,但也是不好的。

近几年来 ,我们不少同志对党的优良传统坚持不够 ,特别是对于实事求是的传统、群众路线的传统、民主集中制的传统这三个方面的忽视和损伤 ,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这是值得全党严重注意的。

现在 ,我们必须把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 ,加强起来 ,发扬起来。今天的问题 ,并不是要建立什么新章程的问题 ,章程早就有了。我在前面说过 ,从遵义会议以后 ,我们党建立了一

套党的生活制度,树立了一套好的传统作风。我们要把这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认真地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要做到这一些,应该说并不很困难。在座的同志,绝大多数对于这些好制度、好传统是熟悉的。大家应该回忆一下,检查检查,把那些好的制度、好的传统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到会的同志做到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到会的同志差不多都是全国各地各部门的“班长”、“副班长”,对全党的工作有重大的影响。

坚持党的优良的传统作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我们党是一个执政党。执政党的特点,已经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讲清楚了。我们党成为执政党,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是,执政党也不是很容易当的。执了政,党的责任就加重了,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加重了。我们要负担什么责任呢?在过去我们无非是闹革命,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党执了政,掌了权,就要担负起把国家引导到社会主义道路去和进行建设的艰巨任务。

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同志们不要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没有问题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到,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里也讲到,如果搞得不好,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干部可以变质,个人也可以变质。

我们执了政,拿了权,更要谨慎。第一,我们要权,无产阶级要权,不能让权被资产阶级拿到手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权,不能让权被机会主义者拿到手上。第二,我们拿到这个权以后,就要谨慎。不要以为有了权就好办事,有了权就可以为

所欲为,那样就非弄坏事情不可。

我们进了城,执了政,是做官呢,还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呢?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过去多次讲过的。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做官,一种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如果不是做官,而是当人民的勤务员,那就要以普通劳动者的面貌出现,要平等待人,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但是,进了城,执了政,做官的条件是具备的,这就最容易沾染官气。事实上,我们许多同志确实已经沾染了不少官气。所以,我们每天每时都要注意执政党的特点。认识了这个特点,我们就能更加注意坚持党的优良传统。这样,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气,就可以避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就可以使我们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将来发展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去,就可以使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

坚持党的优良传统,除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联系群众、及时纠正错误等等以外,必须注意健全党的生活。这是坚持党的优良传统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在这一方面,我想谈四个问题:第一个是民主集中制的问题,第二个是建立经常工作的问题,第三个是培养和选择干部的问题,第四个是学习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在讲话里已经讲得很明白。毛泽东同志把民主集中制提到很高的原则高度来讲,讲到要社会主义还是要资本主义、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事实确是这样,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要复辟。从领导方法来说,只有从群

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没有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既不能实行真正的从群众中来,也不能实行真正的到群众中去。不实行民主集中制,不但脱离人民群众,脱离党员群众,而且上级脱离下级,甚至在同级里也势必造成少数人或个人脱离多数,少数人或个人专断的局面。

目前,我们党的生活是有严重缺陷的。当然,造成严重缺陷的原因有多种。这几年指标过高,要求过急,既助长了分散主义,又助长了命令主义,党的民主集中制也就有了相当大的削弱。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更集中,但在实际上,分散主义的现象却是很严重的。另外有许多事情,形式上似乎比过去民主,但在实际上,命令主义、少数人或个人独断专横的现象却是十分严重的。这次会议提出,要加强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这是很必要很适时的。

这几年,工作中的分散主义是相当厉害的。同志们可以细想一想,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五个统一究竟怎样呢?究竟是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更集中,胜利以后前几年更集中,还是这几年更集中呢?应该指出,这几年,形式上比过去集中得多,但在五个统一方面,却不如过去了!这就是说,分散主义发展了。

同分散主义同时并存的是,命令主义也发展了,党内民主削弱了。没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从而也就不可能有认识的统一,行动的统一。我们强调加强集中统一和反对分散主义,更应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应该误解,以为强调集中统一,就可以抛弃民主集中制的那个民主。为了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就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民主这一方面。

有了这一方面,集中就有了基础,就可以真正集中统一起来。毛泽东同志在大会上的讲话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今后订计划,一定要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今后规定任务,一定不要过重,也不要过死。同志们在讨论中担心,以后中央规定的任务会不会过重。我们在这里许一个愿,中央努力做到不过重,也过死。过去几年中,中央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计划指标如果切合实际,并且留有余地,那就不会发生过重、过死的问题了。今后订计划,一方面要有统一的计划,另一方面,在统一的计划内,要给下面留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使下面能够结合当地的具体实际去安排,特别是在因地制宜方面,在发挥地方积极性方面,都要做得更好。

我们今后制定具体政策和解决问题,在强调集中统一的时候,更应该运用毛泽东同志提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要经过调查研究,把下面的意见集中起来,然后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政策,制定一个切合实际的计划,再到群众中去贯彻实行,并且在实践中加以检验。解决具体问题,也应该如此。

总之,在我们党内和国家内,必须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91]。这种局面首先要从党内造成。(刘少奇:什么叫争上游呢?首先,就是要力争造成这种局面的上游。有了这种局面,生产建设也就会搞得多一点,好一点。)我们国家也要造成这样一种局面。但是,如果党内不造成,国家也造不成。我们党

一定要造成这样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我们党是统一的,团结的,有战斗力的党。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统一;没有集中统一,党就没有战斗力。我们党要永远保持集中统一。这样的党,才真正有战斗力。但是,只有在民主基础上,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才能够建立这样一个统一的党,有纪律的党,有战斗力的党。

当然,在这些方面,这几年有些损伤。现在我们重新提出来,有错误的就改,没有坚持的好传统,就恢复起来,发扬起来。这些传统对我们并不是生疏的。在讨论中,有很多同志都怀念过去我们的党内生活。既然怀念,就说明大家还记得,那就恢复起来吧。

今后,一定要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发扬起来。一定要按照传统,按照党章的规定,建立党员与党的正确关系。党员对党,对工作,对问题,对领导人,都有权按组织原则,在党的范围内,提出批评和意见,并且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党章规定,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在党的会议上或在党的报刊上,党员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只是不准两条:第一,不准不执行党的决议。党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可以提出意见;如果认为决议中有不正确的地方,也可以要求修改。但是,党章规定,党员必须执行党的决议,虽然在执行中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不执行,那就是违反党的纪律。第二,不准搞派别活动。(毛泽东:不准搞暗藏的派别活动。有一部分人,他公开发表不同的意见,是不是许可呢?)这是党章上许可的。在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以前,都可以公开地发表自己的意

见 ;在作出决定以后 ,就必须坚决执行。但是 ,在执行过程中 ,也还可以提意见。至于理论上、学术上的问题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不论什么时候都可以自由讨论的。这几年来 ,有许多事情是违反党内民主的原则的 ,应该纠正。

有同志担心 ,毛泽东同志讲了话 ,刘少奇同志作了报告 ,“三不” ,不抓辫子 ,不戴帽子 ,不打棍子 ,哪晓得隔了几年之后会不会变呢 ?这种想法 ,是这几年的实际状况的一种反映 ,是可以理解的。但是 ,尽管可以原谅 ,也还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应该相信我们党的传统。当然 ,有的同志要看一看 ,是可以的。我们不是说允许保留意见吗 ?现在有的同志还是只写匿名信。写匿名信可以叫做“半勇敢” 。我们最近收到一些匿名信 ,其中说的都是很好的意见。为什么要匿名呢 ?既然是共产党员 ,为什么不可以公开地郑重地发表自己的意见 ,由半勇敢变为全勇敢呢 ?我们大家要带头。只要我们带头 ,就可以把这个风气转过来 ,就可以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恢复起来 ,发扬起来。如果现在还是东怕西怕 ,还是怕讲心里话 ,我们党的老传统就恢复不起来。特别是我们在座的“班长”、“副班长” ,更应该带头恢复老传统。这些老传统 ,中央提倡 ,毛泽东同志提倡 ,我们党历来就有章程 ,只是这几年有了损伤 ,是应该和能够迅速恢复起来的 ,不正常的现象是应该和能够迅速纠正过来的。当然 ,一定要说清楚 ,要做到这点 ,党内一定要有充分的民主。

要把我们党的老传统真正地恢复起来和发扬起来 ,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态度是很重要的。各级领导同志要善于倾听反面意见 ,倾听不同意见 ;要听老实人的话 ,要听老实话。这也是我们的传统。毛泽东同志 ,刘少奇同志 ,历来是这样提倡的。

中央多少年来都是这样提倡的。在这次会议的讨论中,很多同志说,过去发表意见比较随便,同志间也容易交心。那就照样恢复起来吧。但是,这里一定要我们党的各级主要领导同志注意到这个问题。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人,特别是“班长”、“副班长”,要服从和团结多数,尊重少数。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过去不晓得讲过多少次,这次会上又讲了这个问题。做领导人的,总要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事情才好办,绝不能一个人讲了就算数。对少数人要尊重,少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是错误的。即使是错误的,他们的意见也不会是孤立的,只有重视这些意见,才能很好地去加以纠正,帮助同志们改正错误。

还有,领导人的度量要大一点。要能容人,要能听得进反面意见,要能用平等态度待人,要能更谦虚谨慎,等等。

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威信建立在什么地方呢?建立在思想、工作、言论的正确上,建立在民主作风上,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上。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都做得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

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

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我们一些领导同志,同伙夫、勤杂人员等同志们编在一个党小组里,那是起不了多少监督作用的。当然,根据党章规定,人人要过支部生活。我想,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就是把领导人的主要的小组生活,放到党委会去,或者放到书记处去,或者放到常委会去。在党委会里面,应该有那么一段时间交交心,真正造成一个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刘少奇:可以有这么个建议,各级党的委员会一个月之内要有一次党内生活会。委员会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一定一个月,三个月有一次也很好了。(刘少奇:一季有一次,一年四次也好,开党内生活会。这么一个建议,行不行?每一个委员会,省委也好,地委也好,县委也好,一季开一次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过党的生活。)(毛泽东:检查工作,总结经验,交换意见。)谈谈心,相互批评批评,有意见就讲。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这样做,对于同级里面讨论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作出决定,也是很重要的。

在党委内部生活中,应该注意集体领导,分工负责。这里边“班长”的作用很重要。我们党,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都特别强调树立核心;后来,核心大体上树立了,就特别强调如何当好“班长”。这就是说,一定要树立核心。不建立核心,处于涣散的状况,这个党委的工作是做不好的。这次会上“将军”,大概多半是“将”“班长”的“军”。这并不是不重

视“班长”。相反,正是重视“班长”。这就是说,“班长”要当好。现在没有适当“班长”的,还要培养“班长”,或者由上级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班长”。有了“班长”,大家就要帮助他当好。当“班长”是很不容易的,常常遇到很为难的事情。不要以为当“班长”很舒服。我知道,好多“班长”也是叫苦的。“班长”的事情很多,谁也不能说样样事情就处理得那么周到。看来,有一些事情,不原谅也是不行的。而“班长”本人,既然知道不容易当,那就要照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所讲的,要学会“弹钢琴”〔192〕。这是不容易学会的。我们恐怕是永远要学的。哪一天都得要讲“要学会”,不能说“都会了”。(毛泽东:会了,又可以不会的。)遇到新的事情又不会了,遇到新的问题又不会了,遇到新的对象又不会了,到了新的地区又不会了,可不容易学会哩。哪一天都要学会“弹钢琴”,学会当乐队指挥。“班长”不勇于负责是不行的。有一些问题,“班长”不负责出面处理也是不行的。有些事情,你不出面处理,推到哪里去呢?

这里,是不是可以把问题大体上分两种性质:一种叫日常性质的问题;一种叫重大的问题,或者是政策性质的、重大性质的问题。日常的问题,总是要分工负责点头的。第一书记不点头是不行的呀。如果每一件事情都开委员会讨论,开书记处会议讨论,这样开会要开死人的呀。总是或者由第一书记,或者由第二书记,或者由其他书记,分工负责,该点头的还是要点头才行。但是,重大的问题,就必须分别情况,提到委员会,提到常委会,或者提到书记处,加以讨论,大家取得共同的意见,作出共同的决定。(毛泽东:如果意见不一致,就少数服从多数。)

总之,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也是我们传统的制度。坚持这个传统的制度,并且使它更加完善起来,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凡是违反这个制度的,都要纠正过来。

再说一次,这次会议,毛泽东同志强调提出这个问题,意义很重大。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这次会议,刘少奇同志报告、毛泽东同志讲话,提出这个问题。至少在会议当中,我们做到了初步通气,这就比较好。当然,也有不少的同志睡不着觉,有的不只两天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就是好现象,这就可以通通气。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带个头,通气也是带个头,把民主集中制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提出,对中央、对省,提出批评和意见,出出气,也是为了通气,也是为了恢复和坚持民主集中制。

我在这里总的交代一下,在这次会议上,各个小组批评省委的,或者批评地委、县委的,有不少事情应该由中央来负责。这个问题,在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已经讲了。中央有中央的帐,主要应该由中央负责的,还是应该由中央负责。当然,也有省委的帐,地委、县委的帐,省委、地委、县委自己应该负责的,自己在自己的那个帐本里边去写。但是,有不少是应该由中央负责的。比如,由于高指标所形成的一套连锁反应,(毛泽东:几个大运动。)几个“大办”^[193]、大运动所出现的这些问题,中央负主要责任。当然,这不是说,在执行当中,省委没有自己的责任,地委、县委没有自己的责任了。

这次会议以后怎么办?中央也谈过这个问题。中央认为,

在这次会议以后,不要普遍地在全国范围内,各省、各地区、各县都来一个“出气”大会。是不是个别的要搞一搞呢?也可能要。(毛泽东:个别的地方,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县,个别的地区,或者个别的省,个别的部门,个别的单位,可能有这个需要。这个问题,由上一级掌握,不要统统来,不要都搞。(毛泽东:从正面去做。)在一般地区,从正面讲民主集中制。当然,在会议当中,过去几年搞得不好的领导同志进行自我批评是必要的。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精神办,就是说,检讨一次不够就检讨几次,讲得人家不愿意听了,就可以不再讲。要争取主动。这也是一个正面的方法。总之,不要统统都来一个“出气”大会。但是,在省一级,在省的委员会或者常委会或者书记处,这样的范围内,在地、县、部门、单位这一级的委员会内部,要开这么一个会议,交交心,检查一下。(毛泽东:有气的让他们出。)有多少出多少。(毛泽东:出错了不怪人家。出得对,你应该接受;出错了,你怪人家也不好。)出气,并不是每一个气都出得对的,出错了也不要紧。一方面,不要要求自己出错了的气也要人家同意;另一方面,也不要要求人家的每一个气都出得对。此外,各级领导同志还可以找几个有不同意见的人,或者对自己有意见或者对工作有意见的人,谈谈心,检查一下党委的内部生活和领导方法。用这样一些正面的方法,把我们的老章程老传统恢复起来。

关于民主集中制,就讲这些。

第二个问题,建立经常工作。一切工作的成绩,都是由一点一滴的细致工作积累起来的。刘少奇同志的报告里讲了这个问题。群众运动是实行群众路线的一种形式。群众运动搞

得好不好,也是要看我们经常的工作基础搞得好不好。我们禁鸦片烟运动,土改运动,那样大的规模,都不登报,搞得那么细致,搞得那么好,都是在深入细致的工作基础上搞好的。没有深入细致的工作,是不能搞得那么好的。这几年,我们搞了许多大运动,差不多是把大运动当作我们群众路线的唯一的,形式,天天运动,这是不好的。结果,很多经常工作,各部门、各系统、各单位的经常工作,被不断的运动和“分片包干”的方法挤掉了。这个“分片包干”的工作方法,是同那种专搞运动的方法有关,是不好的。应该吸取这几年的教训。

例如,过去我们城市里的街道工作是做得很好的。确实,在团结好人、改造坏人、树立好的社会风气、贯彻执行各项任务中,街道工作起了很好的作用。妇女工作、青年工作、工会工作、党委工作,都做得很细致的。但是近几年来,这些工作都有了很大的削弱。这里只是举例。各方面工作都有这样的情况,不必多解释了。

总之,要建立经常工作。党、群众组织、军队、企业、机关,都要把经常工作建立起来,要把经常的组织工作、经常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起来。有了经常的细致的工作,了解问题就可以比较深入,这对调查研究也有帮助。

党委要加强支部和小组的经常工作。现在的支部生活很不健全。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不多讲,但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各级党委组织部门要认真地注意这个问题。党员一定要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在这里面检查工作,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习。这是党章所规定的,要认真执行。

第三个问题,培养和选择干部,特别是培养和选择各级的

领导核心。这是很重要的问题。培养和选择干部,也应该作为各级党委的经常工作。我们要建立经常的干部工作。这几年,我们的重要教训是,干部状况不稳定。一批一批地变动,就不是好现象,看到这样的现象,就要引起警惕。要经常注意干部的情况,干部的好坏长短应该从他的长期工作中去鉴别,而不要只从某一运动或某一短时期的表现去鉴别。

过去,我们党历来对于干部问题的处理是很慎重的。因此,我们党是很团结的,上下通气的,全党一致的。但是,这几年确实不通气了,特别是几个大运动,有相当数量的干部是处理得不适当的。由于处理不慎重,损伤了一部分干部。对于这几年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干部,应该按照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的指示^[194]中所提出的原则来处理。在处理的时候,区别三种情况:一种是搞得对的,既然是对的,就不应该改。一种是部分错的,那就部分改,或者叫部分平反,就是把过头了的那一部分取消。一种是完全错了的,那就要完全平反。总之,要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甄别、平反的工作,不要搞运动,要指定专门机关、专门人搞。比如,可以由监察委员会来搞。如果因为问题比较多,人不够,可以再加一些人。党委要指定适当的领导同志来主持这件事。现在,我们工作很忙,任务很紧,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也不能把力量统统用到甄别、平反工作上面。而这样的事情,是很细致的工作,要花时间的,所以,要指定专人来搞。最好是谁搞错的由谁来平反,这对于团结比较有利。

第四个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问题的道理,不必多讲。这几年的教训是,我们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思想,体会不够。我们有许多错误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我们还是要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学习理论的空气,(毛泽东:不重视学习理论,天天搞事务,一定要迷失方向。)学习实际的空气,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党风,我们党的一个好的传统作风。

关于健全我们党的内部生活,提出这么四个问题。当然,还有其他很多问题,这里只提出这么四个问题。

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困难。我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虽然现在低指标,但是完成低指标也是很艰苦,很不容易的。特别是今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来,要把我们的工、农、商、学、兵、政、党七个方面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的工作是很多的,很繁重的,党的领导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的领导是很重要的。

这次会议提出了加强党的领导,提出了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而集中统一,最重要的是思想的统一。有了思想的统一,才有行动的统一。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对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讲话,我们全党要统一认识。然后,我们在工作上,在行动上,才能够统一起来。

总之,我们的方针确定之后,就要一条心,向前看,继续总结各地方、各部门、各单位经验。对于党和国家的政策和任务,必须千方百计,克服困难,去贯彻执行。决定了就要执行,要一致执行,这是一条纪律,也是我们党的传统。

我们这一代,特别是在座的同志们,差不多都是各级的主

要负责同志,责任重大。我们这一代,一定要坚持我们党的好的传统,树立好的榜样,当好人民的勤务员,在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尽到自己应该尽的责任。

刘少奇同志讲到力争上游,我们一定要力争上游。

我们要在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方面,力争上游!

我们要在加强和正确执行民主集中制方面,力争上游!

我们要在学会当好“班长”,学会当乐队指挥,学会“弹钢琴”方面,力争上游!

我们要在我们这一代为下一代树立良好榜样方面,力争上游!

我的话完了。

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

中央财经小组的报告〔195〕,周总理对这几天议论的问题的讲话,我没有不同的意见。这次决定的东西,我看只能这样办。当前工作中的问题我们还认识得很不够,有一些问题还要研究,但是就已经认识的,下这样一个决心很必要。现在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这次各方面的问题都摆出来了,要做的事情很多,恐怕中心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减少两千万城市人口,一个是加强农村生产队的工作。这两件事都不能够抓迟了。有些事情还可以慢一点,但是这两件事越抓迟了越不利。比如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钞票投放和粮食供应,也影响生产的调整,各方面都受影响。加强生产队的工作如果抓迟了,就影响农业生产。我们有了粮食、棉花和其他东西,才翻得了身,这些东西要靠生产队拿出来。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涉及生产队的问题,安置城市人口就要靠生产队。所以,生产队工作做不好,农业生产也搞不好,减少城市人口的工作也会遇到困难。现在先定方针,然后要做一系列的工作。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二,最近中央发了一个关于甄别平反工作的文件^[196],请大家注意。干部的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干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调动县以下农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很重要。所谓甄别平反,主要对象是干部,可是每一个干部都联系着群众,实际上影响到大量的群众。这个工作军队搞得最早,也安定得最早。对地方来说,有些地方也搞得比较好。谭震林^[101]同志在山东看到干部的生产积极性、人民的精神面貌比河南好一些。经过研究,原因很多,其中一条就是后期伤害的人比较少,并且对他们采取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所以工作比较主动。四川也是采取这个办法。现在,大家都赞成这个办法,就是全国县以下,首先是农村,来个一揽子解决。就是说,过去搞错了的,或者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掉帽子,不留尾巴,一次解决。因为县以下都是一些基层干部,问题只有那么多,右倾也只是右倾到那个程度,“左”倾也只是“左”倾到那个程度。他们又是直接联系群众的,亲戚朋友、各方面的人听到这些事,人心不安。大家情绪不安定,是不利的。现在我们不是要抓生产队吗?为了把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甄别平反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不要轻视这个工作。上面的领导同志,要下去帮助承担责任,这样搞可以快一些。这件工作,请各中央局告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凡是开始做了的,继续做,没有做的,迅速做。其结果一定要向群众当面公布。这实际上是我们承认一个错误,承认我们过去搞得不对。

第三,树立和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特别是县以下和企业党委的领导核心。为了把农业搞好,首先要解决地方县以下党委的问题。当然,地委以上也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看来,

我们有些问题处理得迟了一点。我们可能遇到的障碍,主要来自县,存在所谓争不争上游,有没有干劲,情况看得对不对,决心大不大、信心够不够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危险,就是缺乏信心,就是看见困难不想办法,不当机立断。见事迟的情况难免,因为认识不到。但是迟一点认识到了,仍然不采取措施,这样慢慢拖下去,势必拖垮。现在看来,许多思想问题主要出在县这一级。当然,也有基层企业、事业单位的问题。

加强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7]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重视得还不够。我们在一九五三年为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从地方党委抽调了一批干部去企业工作,那一次对地方党委的领导是有相当大的削弱。企业就是靠那一批干部壮大起来的。现在除了一部分地方党委有比较老的骨干以外,相当一部分地方党委的骨干,当“班长”、“副班长”的时间是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八年刮“五风”^[198],这些干部的错误是比较严重的。我们的干部,过去绝大多数都是办的好事,这几年,他们主观上也并不是想做坏事,他们还是好干部,还是要信任他们。但是既要看到他们的优点,也要看到他们的弱点。

树立各级党委的领导核心,主要的办法是从现有的各级党委的干部中挑选作风好的来培养。所谓作风好,主要是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主观主义少一点。这几年主观主义多得很。搞命令主义还有什么群众路线?不因地制宜叫什么联系实际?解决领导核心问题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我们正在精简大批企业,这些企业中有好多干部是过去从农村来的,他们比现在的地方党委的干部资格都老一些,中央和省、市、自治区党委完全

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层层下放一批干部,加强地方党委,加强县委,加强公社党委。每一个县,每一个公社,至少要有两三个人当“班长”、“副班长”。调去的人不一定就是当第一书记,也可以当书记或委员。要通过这个措施,把农业搞好,把县、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核心搞好。不管党也好,政也好,根本的问题是选举。拿大队来说,你有什么办法派人去当一个大队的脱离生产的干部?派少数人去加强加强,了解了解情况,当一个时候是可以的,根本的办法还是要用当地的人,本乡的人,本大队的人,根本的办法是搞民主。但是公社和县这两级,是有个加强领导核心的问题。县社两级,不管现在有无核心,即使有了核心,也应该加点人进去,换一换空气。老面孔,大家熟悉,太久了,有好处,也有缺点。天天在一起,都习惯了,有些事情不容易察觉,有些事情就麻痹了,该提的问题、该批评的问题也就马虎了,新的感觉也就比较少了。如果调剂一下,对于转变作风,树立新的气象,都有好处。中央组织部最近要认真抓这件事。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组织部门也要认真做这件事。反正一个省就是那么多县,最多的一百几十个县,省委的同志,大概对每一个县的领导干部都认得的,大体上可以排一排队,加一点新的人进去,把空气改变一下。这对于干部的培养,对于工作,都是有利的。

怎样恢复农业生产^{*}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

这个时期 ,我们在经济上采取了一些措施 ,应该说总的情况比前一个时期好一些。所谓好一些 ,并不是说我们的生产有什么发展 ,而是说我们的调整工作开始见效了。至于吃、穿、用的问题 ,一下子还不能够很快地得到解决。但是只要根据我们现在的调整方针搞下去 ,就有可能缩短一点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时间。

我们要克服困难 ,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要从恢复农业着手。农业搞不好 ,工业就没有希望 ,吃、穿、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农业要恢复 ,要有一系列的政策 ,主要是两个方面的政策。一个方面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使农民能够积极发展农业生产 ,多搞点粮食 ,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另一个方面是工业支援农业。

一九五七年时 ,粮食产量是三千九百亿斤 ,去年是二千九百亿斤 ,今年不晓得能不能搞到三千亿斤。气候也是问题 ,今年有些地方遭受水灾 ,也还有些地方干旱。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出席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讲话的一部分。

总的看来,今年的粮食产量不会比去年差,但就是达到了三千亿斤,还要再增加九百亿斤,才能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我们要研究用什么办法,要多长时间,才能把粮食生产恢复起来,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再把经济作物恢复起来。

农业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现在全国也还有个别的农村人民公社实行公社所有制,群众不愿意拆散,能够保持的就让它保持好啦,也有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的,比较多的是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如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199]等等。以各种形式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是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怎么解答这个问题,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200]。现在“百家争鸣”。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16]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现在看来,不论工业还是农业,非退一步不能前进。你不

承认这个退？农业不是在退？公社不是在退？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目前，要注意充分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潜力。第一步恢复粮食，第二步恢复经济作物，同时把农具和牲畜慢慢地恢复起来。这是一个生产关系的调整，是对我们的考验。当然，我们全党应该有一个统一的主意，应该有一个主见。比如说，要尽量保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就得说服群众，加强干部。这是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这都是些想法，究竟采取什么措施，我们全党在考虑，中央在考虑。现在要冷静地考虑这些问题。过去就是对这些问题考虑得不够，轻易地实行全国统一。有些做法应该充分地照顾不同地区的不同条件和特殊情况，我们没有照顾，太轻易下决心，太轻易普及。过去我也讲过，我们的运动太多，统统是运动，而且统统是全国性的，看来这是搞不通的。有的应该搞运动，比如土改运动，但是也有个阶段的不同和方法的不同啊。

上面所说的都是在农村方面要采取的一些政策，目的就是要多打一点粮食，多种植一点树，耕牛繁殖起来，农民比较满意，一面自己能够多吃一点，一面多给国家一点。总的来说，在全国，要巩固集体经济，也就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根本方向。当然，也要解决工作中领导中的具体问题。在农村，还得要调整基层的生产关系，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照我个人的想法，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形式比较好。

要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好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城市人口多了，就要挤农民的口粮，就要从农民手上拿出更多的粮食

来,这样,农业恢复起来就困难。比如城市里多一千万人,就要增加粮食四十亿斤,多二千万人,就是八十亿斤,多三千万人,就是一百二十亿斤。一百二十亿斤,看起来平均一个人每个月只有三十几斤,实际上却是个了不起的数字,因为出粮食比较多的地方全国只有那么三百多个县啊!

挤农民口粮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城市人口。这要从减少城市人口方面打主意,要在去年减少城市人口一千多万人的基础上,今年、明年再减少两千万人,甚至于更多一点。如果这样的要求真正能够实现,城市人口就相当于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再一个挤农民口粮的是公社以下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这部分人数量也不小。如果我们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把这部分人减少一大批,那末挤占农民口粮的人就可以大大减少。农民的口粮一增加,饲料就有保证,就可以养猪,大牲畜就可以不再死亡,而慢慢地发展起来。当然,这里面也还有生产关系问题,如耕畜怎么养法,是私养为主,还是公养为主。

所谓从体制问题上来解决,就是改变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现有关系。用什么方法解决,中央考虑过多次,现在省委的同志也还有不同的意见。多数同志主张,实际上是把大队一级取消。公社和大队两级,除了领导领导、计划计划、检查检查、推动推动以外,不管钱,不管粮;将来把供销社搞起来了,商业也不管。现在一个公社有几百人吃公粮,这个问题很大。公社实际上是一个大乡,人员编制、工作范围、工作性质、工作任务,都可以恢复到大乡那个程度,公社委员会也就是乡人民委员会。大队一级我们设想只要一个人,他可以参加生产,不要从农民手上拿东西,国家补贴一点,这是一个办法。或者是

采取老办法,规定一个补贴的数目,从村里出,也可以。将来有些大队可以合并一下,几个大队变成一个村,有一个村长、一个支部书记、一个文书就可以了,文书的工分由国家补贴。这样不但可以把挤占农民的口粮大大减少,而且可以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这是最大的好处。

总之,要从这两个方面着手解决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一个是减少城市人口,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是调整公社、大队、生产队的体制,这也是一个大政策。我们要一步步地使农民缓过气来。农民缓过气来了,生产积极性就提高了,农业的恢复和发展就有希望了。

恢复农业的另一方面的政策是工业要加强支援农业。第一,为农业需要服务的工业生产不能减弱,还要改善。要解决这些工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比如农业机械,过去搞了这么多年,但如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采用适合的农业机具,长期以来没有很好解决。又如水利建设,这几年国家花钱不少,但是灌溉效益却不高。现在要考虑对原来的水利工程进行修补,有的地方要打一点井。又如肥料生产,哪个地方适用哪种化肥,也要搞清楚。总之,支援农业的工业不能减,而且要搞好。第二,工业要着重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减轻农业的负担。比如穿的问题,我们就可以从工业方面慢慢地加以解决。本来一九五七年我们已经决定从国外购买生产维尼纶的资料和设备,后来耽误了。如果把维尼纶厂建设起来,就可以减轻棉花供应的压力,还可以和农民搞一些交换。有了交换,就可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穿是这样,吃、用也是这样。

为了恢复农业,还要解决市场和物价问题。市场要管好。

中央已经决定把全国的供销合作社普遍搞起来。搞好供销合作社,不仅有利于交易,而且还可以组织和促进生产,增加市场供应,使农民增加收入。

总之,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首先是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同时也把城里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好好地搞,就有希望。现在看来,我们可以找到一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恢复国民经济的道路。我们要争取在五年内,就是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或者更短一点的时间,使我们的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执政党的干部问题^{*}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党要管党,一管党员,二管干部。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

干部工作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想不出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干部数量已经很大,可能多几百万到千把万,包括生产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就算是多三五百万,也是个大问题。而且干部队伍又是越来越大。每年从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出来的至少有二十万。军队每年转业的干部有几万,最近两年还要多一点,每年有十几万。地方的同志一定要支持军队干部转业,不然,军队统统是军官,没有兵,或者一个军官带两个兵、三个兵,这样军队就没有战斗力了。军官就是有个年龄的限制,年龄大了,打起仗来爬山就爬不动。特别是当个团长,上了四十岁就不行了,跑到前线去侦察,探地形,翻雪山,就困难得很,年轻一点的才跑得快。最近从军队调一些干部出来,是有意识地抽调一部分骨干加强商业方面。这些干部,各地方必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接见参加组织工作会议和全国监察工作会议的同志时讲话的一部分。

须容纳,必须分给商业部门,这是中央的决定,不能因为你们那里的干部不好安排就不接受。还有,干部总是要提拔一些新的。这几个方面加起来,每年最低限度要增加三十万左右的干部,十年就要增加三百万左右,实际上不止这个数。

多少年来,我们对干部就是包下来,能上不能下。现在看来,副作用很大。我们面前摆着这个难题,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解决。唯一的出路是要能下。这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首先,思想上要弄通。应该说,问题倒还不全是待遇问题,解决待遇问题可以保留原薪原级,问题是职位要能下。现在副职太多,一个军区的副司令员要开两桌饭,一个省的副主席、副主任、省委副书记也要开两桌饭。这个问题,多少年来,中央在考虑,地方也在考虑,但是始终解决不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说服我们的干部,造成一种能下的空气。生活待遇和政治待遇可以不降低。要劝说一批同志去担任荣誉职务,比如在一个县,当个县的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省也是这样。有一部分干部可以到下面去工作,替换一些下面的干部,让他们回到生产中去,待遇不降低。还有一部分完全不能工作的干部,索性就离开职务继续休养,或者担任一个荣誉职务。干部能上不能下的问题现在已经成为我们工作中的障碍,虽然一下子还不能解决,要慢慢来,但是总要逐步地解决。

这次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组织工作汇报时,我提出干部能上能下,是不是可以试验一下,先从基层做起。比如,支部书记当了两届后,就回到生产中去,生产队长当了两年又回去当社员。不是一级一级的总是上,要下,要能上能下。要能领导人,又能被人领导。在被领导时还可以起个帮助领导的作用,

老支部书记帮助新支部书记,老生产队长帮助新生产队长。过一两年又可以选他当支部书记或生产队长。相应地,在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这对干部是一个锻炼。这个问题,中央没有议过,我是第一次发表这个意见。在农村基层搞久了,也有缺点。当上一二十年的支部书记,又是“一帮子”,他的话差不多就是“圣旨”,这对于发扬民主,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都不利。支部书记到下面当个普通党员,生产队长到下面当个普通社员,可以看看他们当支部书记或队长的时候,工作和作风究竟怎么样,这对于发扬民主有好处。这个问题,请你们回去跟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交换一下意见,看是不是可以找些地方试一试。我个人考虑,可能是个好办法,至少没有坏处。企业里面的技术干部不能随便下放,不能让工程师去当工人,一个好的车间主任下去当普通工人也不好。首先从一部分党员行政管理干部中试行,比如厂一级干部可以下去当车间主任,当两年再说。为什么总是你领导人家,不可以被人家领导一下呀?总之,先从基层做起。要逐步从制度上,习惯上,风气上,做到能上能下。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能上能下的。苏联怎么样,我不清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大问题。

对干部的管理和监督要加强。最近,刘少奇同志批评,对干部作鉴定好多年没有搞了。组织部门应该建立这方面的工作。对干部的监督,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是党的生活的监督,党员干部要过党的生活。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97]提出,许多高级干部完全在支部里面过党的生活,监督比较困难。这是多少年的经验了。那个时候提出,一个季度

或者半年,可以在一个党委,一个党组,结合讨论工作,过一次党的生活,做点批评和自我批评,看看执行方针政策正确不正确,努力不努力,坚决不坚决。这不只是个人的修养问题,也是一种监督,是党的生活的一种形式。对这一部分干部采用这种形式比较好。这已经是肯定了的,现在就是做的问题。至于一般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经常过支部生活,过小组生活,接受党的监督。民主集中制的贯彻执行,这也是一种监督。还有党员和群众的监督,党的监察制度的监督,组织部门对干部实行鉴定制度的监督。监察工作主要是监察干部,包括比较负责的干部,即使不是同级的主要干部,至少也是一些负责干部。要把管理和监督干部的经常工作好好地建立起来,把监察工作好好地加强起来,把干部的鉴定制度恢复起来,这样做极有好处。对干部中存在的问题,经常抓就容易解决,搞一次运动费力得很。

干部工作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干部交流问题。这是中央作了决定的,现在也是执行的问题。干部交流,是自上而下的工作。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中央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中央批准。省委管理的干部的交流,由省委组织部提出意见,经过省委批准。干部交流不是由下面提出什么比例、数字,而是根据需要。少奇同志讲,有的不到百分之五,有的可以超过百分之五,有的可以不动。中央提出第一批干部交流的比例是不超过同等干部的百分之五。规定这个比例的意思是,不要一下子调动很多,来一个调动风,要慎重一点。干部交流,并不完全是因为犯了错误才调动,有的是这个原因,有的不是这个原因,就是交流一下对干部有好处。相熟的人搞到一块太久

了,语言听习惯了,对事物的感觉就迟钝了,考虑问题就马虎了。有点新的语言,新的感觉,比较好。干部在这里呆一呆,那里呆一呆,接触的面广一些,知识也多一点。还有一种情况,不是哪一个人不合格,或者犯了错误,而是因为合作不好,形成“几套马车”。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党委,都有这样的问题。有了这样的问题,何不把他调动一下?还是担任原来的职务,换个地方就可能合得来了。有的人这里合不来,那里也合不来,多换几个地方就清楚了,总是他的毛病啦。干部交流,是为了锻炼干部,便利工作,给各个单位、各级党委创造一个好的工作条件。

干部的学习空气要加强。这一次军队首先提倡干部学习,我看军委的规定是正确的。地方干部也要读点书,造成一种学习的空气。要学的东西很多。学习什么,我这里不讲了,总是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内容多极了。

党校和轮训的问题,最近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都在考虑。宣传工作会议提出党校和轮训分开,恐怕这个意见是对的。党校,带有经常的性质,学习时间长一点。党校还要培养理论干部,要求学员系统地读些书。轮训,则时间很短。或者把党校分成两部,一部搞经常的党校教育,一部搞轮训,教员也分开。中央党校也提出恢复过去的两部,中央还没有正式考虑,我是同意这个意见的。各地方也可以研究这个问题,注意这个问题。看来,党校不经常办会受到损失。一个时期我们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变过去变过来。轮训有的地方已经完成了,有的没有完成。没有完成的继续进行,已经完成的可以考虑搞第二轮。第二轮不一定搞一个半月,不一定还是那些内容。比

如八届十中全会^[201]的内容,也可以搞个第二轮,用十天半月或者一个星期,脱离工作,去议论一番。也可以读一读书,或者在一个时期集中议论一个什么问题。这些,中央可以考虑,地方也可以考虑。

轮训中,“三不”还要不要?三不”就是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这个问题,“三不”还是要。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202]中提出的“三不”原则,要继续贯彻执行。过去执行“三不”有一定的缺点,就是只有那个过去挨过批评要出气的人才能出气,而过去批评过别人的人,甚至他的意见是正确的,或者有正确的、有不正确的,他也不敢讲,也不能讲。只能讲这一方面的,不能讲那一方面的。既然要“三不”,就大家都来个“三不”嘛。总的来说,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203]。要造成这种空气。“三不”只是反映了“言者无罪”,四句话里面的一句,是根据一个时候的需要提出来的。完备的提法,还是毛主席的四句话。这四句话,在中央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里头是有的。轮训决定中不只是“三不”,还有好多个“不”,比如小组讨论不作记录。我们还是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老实话,说错了纠正。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内不怕公开的反对派,怕搞鬼,搞阴谋。反对派总是有的,只要是公开的,就不怕。大家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样就正常了。执行当中有了片面性,就改嘛。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贯彻执行今年一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讲的民主集中制。

立足现实 ,瞻望前途^{*}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日)

关于工业的发展问题 ,我主要考虑的是如何立足现实 ,瞻望前途。现在我们的基础如何 ,要有清醒的估计 ,估计得过高或过低都不好。摸清了现在的基础 ,从现实出发 ,总结本国的经验 ,吸取外国的经验 ,工业发展就可以做到多快好省 ,实现总路线^[204]的要求。

摸清现实 ,不仅是工业基础 ,还有个农业基础。这里牵涉到人口问题 ,去年净增一千三百多万人 ,今年可能净增二千万人 ,到一九七 一年将有八亿人口。人多 ,一是好办事 ,二是不好办事 ,要吃、要穿、要用。解决吃、穿、用的问题还要费劲好多年。再有一个是技术人才的基础。过去十三年在培养技术人才方面进展很快 ,但是技术人员不足仍是各部门存在的尖锐问题。这方面要做的事还不少 ,如教育制度要作适当改革 ,师资不足需要补充等等。管理水平不高也是问题。

工业水平和技术水平应当区别。我们的技术水平还不高 ,技术种类也还不全。一些重要的军工产品现在还有许多技术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工业决定起草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发言要点。

问题不能解决。这些是“硬东西”,如果没有外国资料 and 材料,一下子搞不上去,想跨过去不是容易的。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也不算高,如机床只有近六十万台,精密的、大型的、特种的都很缺乏。再如铁路只有三万四千多公里,近三分之一的钢轨要换,许多桥梁也要修补。

国家工业建设的道路,毛主席早就确定了,他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提出要工农业并举,轻重工业并举。这是各国经验的总结。美国早先工业发展快,靠农业有一个强大的基础。日本二次大战后也因为先解决了农业问题,工业发展得很快。现在我们的弱点基本在农业。每年增加一两千万人,要吃、穿、用,压力很大。

工业本身,首先是基础工业本身就存在不少问题。钢铁两头,采矿和轧钢,都差得很多。有色金属工业很薄弱。机械工业的力量也很差。石油产量只有几百万吨,燃料就靠煤,而煤要上去得多投资、花时间。许多国家工业发展得快,尖端工业能够较快地上去,都是因为有着强大的基础工业。现在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国家,基础工业很差,而尖端工业发展很快的。

总之,制定发展工业的方针和规划,要考虑农业基础,工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加上管理水平。按照农、轻、重的次序^[205]安排,从长远看会发展得快一些、好一些。我考虑,在一定时期内,我们工作的重点,必须按照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适当解决吃、穿、用的问题(当然是低水平);工业本身必须着力解决基础工业薄弱的问题。

我们的奋斗目标怎样提?经过四十年努力走到世界前列。怎么解释?就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几个工业强国之一,而不是

赶上所有国家。说赶上所有国家,现在没有把握,因为基础不同,而且人家也在前进。当然,成为世界几大强国之一,可能不一定要用四十年。

我设想,是否先提一个近期的目标,如再经过五年至七年的努力,初步或基本建立一个全国范围的独立的工业体系。我们好好精打细算,合理规划,争取在一九七一年达到这个目标。如果不行,加一年两年。我们基本建成或者说是初步建成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也就是为工业、为农业、为国防建设的更快发展打下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第一要抓吃、穿、用的问题。农业除开化肥、农药以外,要着重解决水利问题,包括排涝在内。要想办法多搞点轻工业,增加积累,重要的是要发展经济作物。今后几年宁肯继续进口粮食,也要加快发展经济作物。第二要抓基础工业。要建设新的铁路。第三要抓国防尖端技术。常规武器的问题仍然需要注意解决。这就是我们的纲。是否如此,不妨提出几个方案,几种做法,大家来讨论。总的提法还是四个现代化。

今后建设新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建必要的大企业。搞中小企业,管理水平也提高得快。

改变管理体制,搞托拉斯^[206],大工业市直属中央,是否如此,请各大区^[207]同志考虑,要推敲一下矛盾在哪里。

文件中要讲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问题,即投资比重问题。这个问题非解决不可。

要提一下干部政策。总的是又红又专,红专结合,管工业的一定要专。一个令人高兴的情况是确有一批司局长和一些

副部长比较强 ,并且懂得业务。省、市也有一批这样的干部。要把这些人放到企业(中小企业 ,不一定大企业)中去当两年厂长 ,然后再上来当部长、副部长。这样 ,我们就会有一批又红又专的强的领导骨干 ,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前途 ,在组织上要采取这个政策。

建设一个成熟的 有战斗力的党^{*}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二月)

—

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68]一直到一九四五年七大这十年中间处理党内问题的一点经验。

从一九三一年一月我们党的六届四中全会^[208]起,到一九三四年底,差不多四年的时间犯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67],我们的革命力量曾遭受很大损失,到最后在蒋介石统治区损失几乎百分之百,在红军苏维埃区损失百分之九十。“左”倾路线统治时期,不仅完全拒绝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而且把毛泽东同志调离党和军队的领导岗位,一直到长征。长征的前一段,因为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挥,所以就犯错误,使红一方面军由八万人减少到三万人。到了遵义,王明^[209]、博古^[210]路线不能继续下去了,怎么办?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亚洲一位共产党领导人两次谈话的节录。第一次谈话时间是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二次谈话时间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会议,即遵义会议,才开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只是提出军事路线的错误,还不提政治路线错误。毛泽东同志在那时候没有当总书记,博古的总书记当然当不成了,但还是由曾经站在王明路线一边的洛甫^[12]当总书记。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要把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党内问题的政策,使大家团结起来了,渡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完成了长征。长征结束以后,毛泽东同志还没有当总书记。当然,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在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采取总结经验的方法,用整风的方法,把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搞清楚了,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26],才得出最后的结论,并在组织上把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那时候改变了形式,不叫总书记了)。这就是说,毛泽东同志对于犯错误的同志是采取团结的态度。“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个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这项工作花了十年的时间,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了解他们的错误,他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党更加团结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争取了抗战的胜利,迎来了全国的解放。所以,处理党内的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比较快比较急地解决问题,一种是耐心地花较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当然不是说任何时候,对任何性质的问题,都一定要花上十年时间去解决,主要是看采取这个方法的效果怎么样,这个效果就是教育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使全党对于党内的是非问题、两条路线的是非问题弄得更清楚,并受到教育。简单地从组织上解

决问题是不是牢靠呢？还是从思想上解决问题牢靠。当然，我们的经验不一定适合你们党内斗争的情况，但是这也算作是一种方法，供你们参考，因为任何一个党都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们历来对兄弟党讲，制定自己的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战略和策略，纲领和要求，只能由各国党自己搞。自己搞，可以取得经验，正确的是自己的，错误的也是自己的，自己去总结。错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不断地总结经验，总是能够不断地前进的。我们党对兄弟党只是介绍我们的经验，这些经验哪些可以借鉴，哪些不能借鉴，完全由各个党自己去选择。但是我们相信毛泽东同志总结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这就是每一个党都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革命实践、本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才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才能够赢得革命的胜利。

如果说我们的经验，那就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战略和策略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特别是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情况，要作深入的了解。我们这个党，建立不久就确定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根据这个社会性质来确定我们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和革命动力，规定反帝反封建是我们第一阶段的革命任务。但是，提出了反帝反封建这个任务就等于真正懂得什么叫反帝反封建吗？不！因为制定和执行反帝反封建的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革命阶段当中，应当如何反帝反封建，依靠什么力量，团结什么力量，打击什么力量，这些问题，我们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解

决,没有搞清楚。

比如对于农民问题,我们党历来就明确,农民占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要发动农民。从我们党成立到大革命的时候,农民运动有很大的发展。但是,是不是农民运动发展了,就等于我们党了解了农民呢?没有。毛泽东同志说,他从一九二五年起,差不多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才开始真正了解农民。以后他才提出对于农民和工农联盟的正确纲领和政策,才根据中国的实际正确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在土地革命中,我们根据农村的阶级状况提出了正确的阶级政策。只有“土地归农民”这么一个口号是不够的,土地怎么分配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提出,农村里边包括地主在内,都要同等地分配一份土地。当时在我们党内“左”倾机会主义占统治地位,他们反对这个主张,说这不是阶级路线。他们提出富农分坏田,地主不分田,说毛泽东同志是机会主义。他们说,富农是剥削阶级,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为什么要同贫农一样地分一份土地呢?地主压在农民头上好多年了,为什么还要同等地分一份土地呢?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多么的革命!他们就是不懂得农村。他们不懂得地主不分田,地主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富农分坏田,富农的嘴巴要不要吃饭?如果地主、富农要吃饭,他们又没有田,怎么办?这实际上是把所有地主、富农逼得同蒋介石联合起来反对农民,结果是对于贫农、中农不利,对于工农政权不利,对于生产也不利。如果给地主、富农分了田,使他们逐步由剥削者变成劳动者,就可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嘛。我只是举个例子,这样的问题很多。在农村不做充分的调查研究,不仔细地研究农村的阶级状况,也就不可能真正了

解贫农和一般农民的要求,不了解什么政策才适合于农民阶级的利益。一些形式上很革命的“左”的东西,并不适合农民的利益,所以单单一个“土地归农民”的口号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又如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这是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題,处理不恰当,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民族资产阶级是动摇的,它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党在这个问題上既犯过“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比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时间还长,损害还大。大革命的前一个阶段,我们党正确地对待了这个问題,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合作,实行国共合作,发展革命,也同蒋介石进行合作。在这个合作当中,如果我们只是同资产阶级打交道,那是错误的。我们同资产阶级建立同盟来搞民主革命,有个最重要的问題,就是要在形式下来发展进步力量,发展工人的力量,发展农民的力量。大革命后期,我们党犯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65]的错误,就是怕同资产阶级作政治上的斗争,怕触动它,不敢发动群众,等到蒋介石一背叛就使大革命失败了。大革命失败之后,我们党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74]的错误,就是要打倒一切。当时主要打击的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样做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孤立起来了。城市里的许多人,包括知识分子和青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脱离我们。工人运动也搞不起来,那时不区别对象,就是罢工,而且条件也提得很高,结果工人运动也垮了。我们在城市中的力量一

步步地丧失,一直到最后差不多搞光了。但是在农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地区,实行了正确的政策。当时红军保护工商业。有些工商业资本家也进行封建剥削,我们只取消他们的封建剥削部分,对他们的商店和工厂不去触动,所有的东西都不没收,而且加以保护。实行这样的政策,对于我们的根据地有很大的好处,能够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后来“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人到了中央苏区^[17],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打击民族工商业。结果在蒋介石封锁下,根据地连盐都没得吃。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哪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所以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方面,我们党有“左”的经验也有右的经验。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什么情况下以团结为主,什么情况下以斗争为主,这是不能硬性规定的,是一个灵活运用的问题,要根据对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来确定。

我举这么两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制定正确的纲领和政策,要对本国的具体实际作深入的了解。这个工作很不容易,特别是对农民问题的了解很不容易。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经验。策略是为战略服务的。抗日战争以前,我们叫土地革命时期。那个时候,我们对于地主阶级的政策是没收土地的政策。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后,民族矛盾变成主要的矛盾了,主要的打击对象是日本

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国际上一切间接的同盟者我们都要联合,比如美国,我们那时同它就有来往。对于官僚资产阶级,它由过去的主要打击对象变成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它的代表就是蒋介石。我们同他合作抗日,在合作抗日中间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另一个主要的打击对象地主阶级也变成又团结又斗争的对象了。这就是说,对于地主阶级,不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但又要适当满足农民的要求,所以采取减租减息^[50]的政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继续同国民党打仗,不把日本帝国主义作为主要的打击对象,抗日就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又是国民党,抗日也搞不起来。如果主要的打击对象还是地主阶级,不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而是采取没收土地的政策,那就会把地主阶级赶到日本侵略者那边去。所以,不能混淆主要打击对象,一混淆就把自己孤立起来了。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不是主要打击对象。但是在又团结又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党内也有右倾机会主义,这就是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211]错误。

二

要使一个党逐步成为成熟的党,同群众有联系的党,是不容易的。从我们党的历史来看,我们全党成熟的标志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那是在一九四五年。我们从一九二一年建党,经过了二十四年,才成为一个成熟的党。当然,这是从全党来说。作为中央领导,可以说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时,就成熟了,这也用了十三

年半的时间。

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还不断有斗争。在抗日战争初期,还有第二次王明路线,王明由“左”倾机会主义变为右倾机会主义。全党干部包括一些主要干部,对党的历史、两条路线的斗争,怎样把党建设成为一个正确的党、联系群众的党,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来武装党等问题的认识,都还不很清楚。

一九三五年十月,红一方面军胜利结束长征^[18],中央到达陕北,那时还不是在延安,而是在延安以北的一个地方。三个方面军会合后,毛泽东同志看到,红军只剩下三万人,而在这三万人中,负责干部无非是两三千人,怎样研究党的历史,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党员,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时候,毛泽东同志的主要精力就放在怎样统一党的思想方面。接着就爆发抗日战争。毛泽东同志一方面领导抗战,使党实行正确的抗战路线;另一方面总结党的经验教训,写出了包括哲学、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一系列的文章。在这个基础上,又搞了整风运动^[63]。整风可以说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一年就开始了,经过五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经过从一九四二年开始的全党范围的整风,彻底地清算了“左”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最后统一了全党的思想。犯过错误的人,也承认过去犯了错误。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党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讲了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但是王明一直坚持错误,他现在仍住在莫斯科,还写文章骂我们。

我们整个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是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212]是一九二八年开

的,到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隔了十七年。这次代表大会是正面讲问题,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大会结束不久,日本就投降了。这时,全党已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这样大的一个党,面临美国支持的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就有办法了。

所谓全党成熟,首先是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了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从遵义会议以后,党内虽然有过的错误的路线,但是毛泽东同志总是用正确的路线去克服错误的路线,因此,从那以后党的方针和政策都是正确的。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和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动,得到了群众的拥护,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党员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军队也从三万人发展到一百万人,解放区人口达一亿多。如果不是党的路线正确,方针政策正确,这是不可能的。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了一个正确的党风。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同志把党风概括为三条:第一,这个党必须是理论同实际相结合的党;第二,这个党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党;第三,这个党必须是建立在自我批评基础上的党。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这样,就可以不使小错误发展为大错误,发展为路线性的错误;就可以使党员和干部从正确经验中受到

教育,也可以把错误变成肥料,将坏事变成好事。

在党的组织方面,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相结合,把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精神发挥了。一个党不集中不行,如果没有中央的和各级党委的集中领导,这个党就没有战斗力。这种集中,如果没有高度的民主作基础,集中也是假的。全党提倡民主、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能真正把全党的意志集中起来,真正做到万众一心。毛泽东同志提倡军队也要搞民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连里开会,战士可以批评连长,这种民主妨碍不妨碍连长统一指挥呢?不妨碍。连长发现错误就改,这样就能更好地指挥,部队的战斗力更强。这不仅是在一个连里,就是在我们一个大的作战区,有了错误,指挥员也要受批评。比如哪一个战役没有打好,军长、团长就对这个作战区的指挥员提出批评意见嘛!有什么办法呢?搞得不好,只好承认错误。这样,对下一仗怎么打,就有办法了。有了党内民主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有问题就不是在下面乱讲,而是摆到桌面上来。毛泽东同志还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犯了错误的人应当允许人家革命。例如我们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73]选出的中央委员中还有王明,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否选他还要考虑,就是要给他革命的机会。总之,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要耐心地帮,叫做一看二帮。所谓“看”,无非是看他能改不能改。不管他能改不能改,总是要帮够,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

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好的党风要继承下来,要由接班人传下来。我们特别注意宣传毛泽东思想,使它在群众中扎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这不仅是我们这一代的问题,也是下一代、再下一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革命,核心问题是党。有了一个好党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

以上讲了那么多,介绍了我们党的历史。总之,党要能团结全党干部和党员,在必要的斗争中去团结。有了党的团结,才能有力量去团结广大群众。如果有了这样的党,哪怕党员少,也可以发挥很大作用。一个人数少但有战斗力的党比一个人数多而缺乏战斗力的党要强得多。党有战斗力,就可以发展起来。

注 释

- 1 大革命 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革命运动。——第 2、87 页。
- 2 托派 这里指中国的托派。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投降主义者,采取了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托陈取消派”。一九二九年十一月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一九三一年五月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九三五年改称“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被推为书记处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托派与帝国主义国家间谍组织有关、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所造成的。——第 2 页。
- 3 三三制 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第 8、70、89、119 页。
- 4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第 10 页。

- 5 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 ,山东乐陵人。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河北省政府主席。——第 10 页。
- 6 党团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 ,党团改称党组。——第 13、73 页。
- 7 联办 是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的简称 ,一九四 年八月一日成立。当时是晋冀豫边区的最高政权机关 ,并担负边区根据地的立法任务。一九四一年八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时 ,联办撤销。——第 13、35 页。
- 8 救亡室 是抗日战争初期晋、冀、豫等地抗日军民开展群众性政治、军事和文化活动的组织形式。其名称各地区、各部门有所不同 ,山西一些地方通常称民革室(即民族革命室) ,有的地方称救国堂。——第 19、26 页。
- 9 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 ,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提议 ,邀请党政军民各界组织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委会 ,在管辖范围内进行选举参议员的活动。同年七月七日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开幕 ,参加会议的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和冀鲁豫四个地区的参议员。七月九日 ,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它是边区最高权力机关。——第 21、37、83 页。
- 10 布尔什维克 是俄文 *Большевик* 的音译 ,意即多数派。一九 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制定党纲、党章时 ,以列宁为首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尔托夫等机会主义者展开激烈的斗争。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 ,拥护列宁的人获得了多数票 ,称为布尔什维克。此后 ,马克思主义者曾被称为布尔什维克 ,马克思列宁主义曾被称为布尔什维主义。——第 21、87 页。
- 11 “东亚新秩序”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在《帝国政府声明》中提出的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提携” ,即日本、伪满洲国(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制造的傀儡政权)和国民党政府“合作” ,共同反共 ,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中国。——第 23 页。
- 12 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 ——一九七六) ,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县)人。一九三四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

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负总责。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24、339页。

- 13 见张闻天《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与性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第24页。
- 14 这里的《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是指八路军政治部制定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这个草案是对一九三八年颁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的修订,全文载于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第二卷第四期、第五期。后来,在一九四二年正式颁发。——第25页。
- 15 《新华日报》华北版是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机关报,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创刊,一九四三年十月一日改为《新华日报》太行版。——第26页。
- 16 伯承,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0、135、154、323页。
- 17 中央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为中心的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范

- 围最大时辖有二十一个县,约二百五十万人口。——第30、65、97、343页。
- 18 长征,这里指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即中央红军,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恢复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及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直属部队编成的两个纵队,从江西南部的瑞金等地出发的战略性的大转移。红军经过福建、江西、广东、湖南、广西、贵州、四川、云南、西康(现在分属四川省和西藏自治区)、甘肃、陕西等十一个省,翻过终年积雪的高山,越过人迹罕至的沼泽草地,历尽艰苦,击溃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多次围追堵截,行程两万余里,一九三五年十月胜利地到达陕西北部的革命根据地。——第30、97、163、185、345页。
- 19 三民主义 是孙中山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个问题的原则和纲领。随着时代的不同,三民主义的内容有新旧的区别。这里指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的建议,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包含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第31页。
- 20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会上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内容包括抗战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对人民作了某些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后来由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纲领中对人民的某些让步没有兑现。——第31页。
- 21 阳明堡火烧飞机 指八路军在山西代县阳明堡袭击日本侵略军飞机场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夜,八路军一二九师七六九团第三营,在第一、第二营的配合和当地群众的协助下,秘密渡过滹沱河进入阳明堡日军飞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一小时激战,焚毁敌机二十四架,歼灭日军百余人。——第33页。
- 22 正太线 是石太铁路的旧称。筹建时拟从河北正定柳林堡筑至山西太原,开工时改为从河北石家庄筑至太原。——第33页。
- 23 指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至十一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先后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黄崖底、广阳地区伏击日军的战斗。一九三七年十月下

旬,日军的两个师团沿正太路西进,企图与同蒲路的日军会攻太原。三八六旅一部于二十六日和二十八日两次在七亘村设伏,袭击日军第二十师团的辎重部队,歼敌四百余人;随后于十一月二日在黄崖底伏击日军第一九师团的一个大队,歼敌三百余人;十一月七日,第三八六旅在七六九团配合下,继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广阳地区伏击歼灭近千名日军后,再次在广阳以东地区设伏,歼敌二百五十余人。——第34页。

- 24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本侵略军为保障其后方和交通线的安全,调集步骑兵五千余人,由山西太谷、榆次、寿阳、阳泉、平定、昔阳等地出动,分六路围攻在寿阳东南地区活动的八路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二团在内线与敌周旋,第七六九团等部在外线袭击敌人。在八路军内、外线部队的打击下,日军被迫于二十六日撤退。此役毙伤敌七百余人,为建立晋冀豫边根据地创造了条件。——第34页。
- 25 一九三八年四月初,日本侵略军为解除其后方的威胁,集中三万余人的兵力,自同蒲铁路线上的榆次、太谷、洪洞,平汉铁路线上的邢台,正太铁路线上的平定,邯长大道上的涉县、长治和临屯公路上的屯留等地分九路向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及其他抗日武装进行围攻。八路军总指挥部决定采取集中主要兵力击破日军一路,以一部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的作战方针。经过十几天的战斗,除三路日军深入晋东南根据地外,其余各路均被阻止。四月十六日,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抓住战机,转入内线,在武乡以东长乐村地区歼灭日军两千二百余人,各路日军闻讯后纷纷回撤。至四月二十七日,八路军彻底粉碎了日军围攻,共歼敌四千余人,收复县城十八座,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第34页。
- 26 一九三八年三月上旬,日军第一八师团沿邯(郸)长(治)公路西犯,企图配合沿同蒲路南下之第二十师团消灭退至晋南的国民党军。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奉中共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进至襄垣东南地区,伺机破袭邯长路,打击西犯之敌。十六日,先以一部袭击敌重要兵站基地黎城,吸引潞城之敌来援,然后在黎城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地区伏击援敌,共歼日军一千五百余人。三十一日,又在涉县西南的响堂铺伏击日军辎重车队,歼灭日军四百余人,毁敌汽车一百八十辆,缴获大批军用物资。邯长大道上的这两次伏击战的胜利,

- 有力打击和钳制了日军,支援了晋西、晋南地区的国民党军。——第34页。
- 27 道清路 指从河南滑县道口镇至博爱县清化镇的铁路线。——第34页。
- 28 徐州会战 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潍(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旬,中国军队在取得台儿庄战斗的胜利后,继续向鲁南增兵,在徐州附近集结了约六十万的兵力;而日军在台儿庄遭到挫败以后,从四月上旬开始调集南北两线兵力二十多万人,对徐州进行迂回包围。中国军队在日军夹击和包围下,分路向豫皖边突围。五月十九日,徐州被日军占领。武汉会战是中国军队同日本侵略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徐州会战后,日军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自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起开始会攻武汉。八月,日军沿长江两岸从东、北、东南三面逼进武汉,先后共投入兵力三十五万人。中国军队先后共投入兵力一百一十万人,并在武汉外围的若干战略要地,对日军的进攻作了比较顽强的抵抗,但未能阻住日军前进,武汉被日军包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二十七日,武汉失陷。——第34页。
- 29 维持会 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傀儡政权组织。——第34页。
- 30 会门 是旧中国的民间结社,有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在理会、洪门等。这些组织的成分主要是破产农民、失业手工业者、流氓无产者等。他们以宗教迷信为联系纽带,有的还拥有武装。一些会门曾进行过反抗官僚、地主压迫的斗争。这类组织由于普遍存在着封建性、落后性,往往容易被反动统治阶级甚至日伪所利用。——第34、55页。
- 31 这里的自卫团、联庄会 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维持占领区的“治安”在各乡镇组织的武装,有的地区称民团。——第34、55页。
- 32 抗日战争期间,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将一部分降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其任务是协助日本侵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第34页。
- 33 “治安肃正”计划 是日本侵略军在一九三九年初至一九四一年三月为强化对

- 华北的占领而实行的残暴计划。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第35页。
- 34 参见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35页。
- 35 “囚笼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武装和摧毁抗日根据地的一种残酷政策。它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以防锁沟、墙,对抗日根据地军民实行网状压缩包围。——第35页。
- 36 白晋战役指一九四一年五月上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根据地人民群众配合下对日本侵略军抢修的白(圭)晋(城)铁路实施的破击战。此役破坏铁路五十余公里,摧毁大小桥梁五十余座,歼敌三百五十余名,打破了敌人的修路计划和分割根据地的企图。——第35页。
- 37 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大规模的战役。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八路军出动了一百多个团四十万兵力,在广大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向华北敌后主要的交通线发动攻击,并配合各根据地军民进行反“扫荡”作战。这次战役持续三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一千八百多次,攻克敌人据点二千九百多个,歼灭日、伪军四万六千多人。——第35页。
- 38 冀南钞票(简称冀钞)是晋冀豫边区冀南银行发行的法定货币。一九三九年十月开始在冀南、太行地区发行。后在整个华北地区流通,对保障和促进华北地区生产、贸易的发展和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发行全国统一使用的人民币,冀钞停止发行和流通。——第36、84页。
- 39 指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八路军为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而实行的自卫反击作战。从一九三九年冬至一九四一年春,八路军连续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鹿钟麟、朱怀冰等部对冀南、太行等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第36页。
- 40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日,山西军阀阎锡山调集四个军又一个师、一个旅的兵

力围攻驻守在晋西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及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惨杀隰县等六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和牺盟会的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数十人。十二月八日至二十六日,阎锡山所属孙楚部联合蒋介石的中央军向活动在晋东南的抗敌决死队第一、三纵队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七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团体,屠杀共产党员和群众五百余人,逮捕千余人,并策动决死三纵队部分反动军官叛乱。这些反共事件统称为十二月事变。——第36页。

- 41 黎城会议 指一九四一年四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山西黎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第36页。
- 42 所谓“治安强化”,是日本侵略者在“治安肃正”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力战”的措施。自一九四一年春至一九四二年冬,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对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在游击区建立伪军,加强控制,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保甲制度,调查户口,扩组伪军,以镇压抗日力量。——第37、56页。
- 43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占领区,摧毁、缩小抗日根据地,大量修筑据点、碉堡、公路、沟墙等,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切断联系,严加封锁。这些公路、沟墙等纵横交错,形如网状,被称作格子网。——第37页。
- 44 这里的军分会 指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北分会。——第37页。
- 45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九日,侵华日军第十二军集中独立混成第一、第七、第八旅团及伪军各一部,共一万二千余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冀南抗日根据地被严重分割,大部分变为游击区或敌占区。这里说的冀南根据地变质,即指此。——第37、69页。
- 46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参见本书注〔7〕。——第37页。
- 47 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山西黎城封建迷信组织离卦道的数百名道徒,在汉奸、特务的操纵、控制下,发动武装叛乱,企图占领县城,推翻抗日政府,组织伪政权,投靠日本侵略者。中共黎城县委、黎城县政府当即领导抗日军民平定了这一叛乱。——第38页。
- 48 一九四二年春,平汉铁路线上的日本侵略军策划对冀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

荡,破坏当地的春耕生产。为了配合日本侵略军的行动,少数潜入根据地的汉奸、特务暗中活动,预谋于四月十一日在沙河县柴关村集合,并裹挟受骗群众发动武装暴动。当地的抗日政府迅速破获此案,将首犯就地正法,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残抗日根据地的阴谋。——第38页。

- 49 太平洋战争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与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战争。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晨,日本未经宣战,以强大的海、空军突然袭击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珍珠港,使美国太平洋舰队遭到惨重损失。十二月八日,美、英对日宣战。同日,德、意对美宣战。日本军队先后侵占了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后来在太平洋地区各反法西斯国家武装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不断遭到失败。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战争结束。——第39页。
- 50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改善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员人民支持抗战及解决财政困难,曾陆续颁发过有关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法令。减租减息法令的要点是: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即不论何种租佃形式,均按原租额减去百分之二十五,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一分半。合理负担法令的要点是:按资产及收入多少规定纳税的比例,除少数最贫困者得免征外,其余的人均须按照比例纳税,但最高不超过每人全年收入的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在新解放的地区也曾实行过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在一些地方也实行过合理负担政策。——第41、57、57、68、74、79、109、109、127、149、169、172、186、189、344页。
- 51 所谓总力战,是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实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以控制占领区、进攻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第43页。
- 52 指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发出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各级委员会成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领导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取消各地党政军委员会;强调要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注意纠正和防止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决定”对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各组织的行动步调,加强对敌斗争和根据地

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第43页。

- 53 八股文是中国明、清封建王朝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它内容空洞，专讲形式，玩弄文字。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党八股是指革命队伍中某些人在写文章、发表演说或者做其他宣传工作的时候，对事物不加分析，只是搬用一些革命的名词和术语，言之无物，空话连篇，同上述的八股文一样。——第48、88页。
- 54 “灌仓计划”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在华北地区实施的一种抢粮计划。所谓“灌仓”，即打着代为保管的幌子，强迫占领区和游击区的群众将自己收获的粮食放进设置在日军据点附近的仓库里。其目的是解决侵华日军的粮食需求和防止粮食流入抗日根据地。——第56页。
- 55 指彭德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太行区军队营级、地方党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的报告，题为《怎样继续坚持与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刊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五日出版的《党的生活》。——第64页。
- 56 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错误地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他们先是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继而又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错误。结果，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苦战一年未能打破“围剿”。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65、97页。
- 57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扩大的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全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批评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立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会议强调全党必须自上而下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第68页。
- 58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发展战时生产、提高劳动

热情、保护工人与增进劳资双方利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曾颁发过有关雇工增资内容的法令。其中规定:雇工的工资依照各地生活状况,一般以除工人本身外再供一个人至一个半人的最低生活费用为标准。延长工时必须按钟点增发工资,假日继续工作,除发原工资外,应按标准增发工资。——第 69 页。

- 59 吴满有,陕西横山人,一九二八年逃荒到延安务农。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绩显著,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一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全区农民开展“吴满有运动”,掀起了学习吴满有、大力开荒生产的热潮。——第 80 页。
- 60 统一累进税 是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民主政府实行的税收制度。这种税制把对农村同时征收的几种资产税与收入税统一于一种税中。税率按纳税富力分等累进。这里的“统一累进税”办法指《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税则》,一九四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颁布。——第 83 页。
- 61 国民党政府为了控制全国金融,禁止银元流通,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实行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为法定的全国统流通的货币,简称法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法币急剧贬值,自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金圆券代替崩溃的法币。——第 84 页。
- 62 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五日致彭德怀的电报。原文是:“敌后各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战争、经济与教育三项。”——第 85 页。
- 63 整风 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第 86、151、345 页。
- 64 三次大的革命战争 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一九三七年开始的抗日战争。——第 87 页。

- 65 陈独秀机会主义 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时陈独秀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至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第 87、342 页。
- 66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领导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同年九月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李立三本人在会上也承认了错误,随即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岗位。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证明他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 87 页。
- 67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 87、338 页。

- 68 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 88、153、263、298、338 页。
- 69 这里指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太原失陷前后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前后。在此期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实行正面进攻,国民党军不断南退。为了坚持华北敌后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在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大量发展党员和建立健全党组织,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政权、开辟抗日根据地。——第 89 页。
- 70 湖西地区 即微山湖以西江苏、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又称苏鲁豫边区。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一月间,边区内错误地开展肃托斗争,许多党、政、军干部被诬为“托派分子”,先后被逮捕,受审查,有的被错杀,整个边区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给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湖西“肃托事件”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五年,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曾先后作过多次处理。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第 90 页。
- 71 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一九四二年八月至一九四三年九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第 90 页。
- 72 学委 是当时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学习委员会的简称。中共中央有总学习委员会(简称总学委),党政军直属系统有分区学习委员会,以下各级有学习委员会,其任务是领导整风学习。这里指北方局党校学习委员会。——第 93 页。
- 73 陈指陈赓(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谢指谢富治(一九一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这里所说的陈谢兵团指向中原挺进时,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组成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下辖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第九纵队及第三十八军、第二十二旅。——第 94 页。
- 74 山东大军 指当时在山东同国民党军作战的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主

力。该部受命挺进豫皖苏,与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和陈赓、谢富治领导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谢集团实施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以河南为中心的江、淮、河、汉地区,进行一系列重大战役。——第94页。

- 75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行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95、119、162页。
- 76 指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的六个纵队,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指挥的八个纵队,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指挥的陈谢集团。这三路大军自一九四七年六月起先后挺进大别山、豫皖苏边区和豫陕鄂边区,实行战略展开,在中原战场上形成“品”字形的有利态势。——第96页。
- 77 十年苏维埃时期的内战 指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保卫工农苏维埃民主政权而进行的革命战争,通常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或土地革命战争。——第97页。
- 78 任弼时(一九〇四——一九五〇),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今属汨罗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这里所说的报告,指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二日他在西北野战军前线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题为《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这个讲话已收入《任弼时选集》。——第100页。
- 79 全国土地会议 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反对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中

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推动了各解放区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会议对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第 101 页。

- 80 苏维埃后期 指一九三一年底至一九三四年底,即自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至遵义会议的时期。这一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苏区占据了统治地位。——第 102 页。
- 81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期间,曾开展错误的“大肃反”,杀害了许多革命干部和群众。——第 103 页。
- 82 见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195 页)。——第 104 页。
- 83 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泽东在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私人工商业的自由营业”政策。会议作出决议,通过了毛泽东的报告。——第 104 页。
- 84 《新区土改要点》即《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04 页。
- 85 见毛泽东《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763 页)。——第 105、111 页。
- 86 这个指示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108、127 页。
- 87 桂系 指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广西地方军阀。一九三八年后,桂系将领李宗仁、廖磊、李品仙曾先后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 111 页。
- 88 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豫鲁苏皖边区总司令等职,所部驻守河南。——第 111 页。
- 89 “不但如此……我们的辛苦并不是白费的。”这是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加写的。——第 115 页。
- 90 “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于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那就是右倾机会

主义的观点”,这是毛泽东审阅这个文件时加写的。——第116页。

- 91 “总体战”是国民党为挽救败局,在一九四七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推行的所谓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在军事上重新划分绥靖区,实行分区防御;在政治上加强“轮训民众,扩大地方武装”;在经济上对解放区实行封锁。国民党的总体战略在各战场实行不久,即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略进攻所打破。——第117页。
- 92 襄樊作战 指襄樊战役。一九四八年六月中旬至七月上旬,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进行豫东战役,国民党军抽调兵力北援豫东后,汉水流域中段襄阳、樊城等地守备薄弱。七月二日,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主力在江汉军区部队配合下,采取远距离奔袭战术,发起襄樊战役,经过十四天激战,歼敌二万余人,生俘国民党军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解放了光化、老河口、谷城、南漳、宜城、襄阳、樊城等地。——第126页。
- 93 中原局六月六日指示 即本书《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与整党工作的指示》一文。——第127页。
- 94 一九四八年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攻克国民党军据守的河南省省会开封。为保持战场主动权,人民解放军于二十六日撤出开封。在攻占开封期间,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城市的正常秩序,对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的官兵一律予以宽待;对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和属于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文化机关人员,都要求他们安心照常供职,并负责保护各机关的资产和文件,凡不持枪抵抗者,一律不加俘虏、逮捕,有功者一律优待。对其他学校、教堂、医院和一切私人工厂、商店、住宅一律给予保护。这些政策措施受到中共中央的通报肯定。——第127页。
- 95 双减 即减租减息。参见本书注〔50〕。——第128页。
- 96 京沪杭战役 又称渡江战役。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从江西湖口至江苏江阴段横渡长江,发起京沪杭战役。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亦进至武汉正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至六月二日,战役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及白崇禧集团四十三万余人,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广大地区和江西、福建、湖北

- 部分地区及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重要城市,宣告了国民党政府二十二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继续向福建、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战役经过参见本书《从渡江到占领上海》一文。——第130页。
- 97 一九四九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当时,中共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已开始进行谈判,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完成渡江作战的一切准备之后,为争取这次谈判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曾数度推迟渡江的时间。四月二十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双方代表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当夜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作战。——第130页。
- 98 粟裕(一九一七——一九八四),湖南会同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第132页。
- 99 张震,一九一四年生,湖南平江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参谋长。——第132页。
- 100 两浦指浦口、浦镇。——第132页。
- 101 谭震林(一九一二——一九八三),湖南攸县人。一九四九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一九五六年任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八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务院副总理。——第132、319页。
- 102 京沪杭战役第一阶段中关于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的使用方向,总前委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七日曾提议以第四兵团东进芜湖地区接替第三野战军第九兵团留置部队的任务,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加入攻取南京的作战,第三、第五兵团主力挺进浙赣线。中央军委同意了上述建议。在战役实施过程中,由于敌情变化,第二野战军三个兵团的主力全部进至浙赣铁路及以南地区。——第133页。
- 103 总前委指中共中央在淮海战役前线的代表机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为常委,邓小平任书记。总前委负责领导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的行动,统筹淮海前线一切事宜。淮海战役结束后,奉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二月的指示,继续行

使领导中原和华东地区的军事和作战的职权,率领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行渡江战役。——第133页。

- 104 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依据历史经验和当时的形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阐述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这就是倒向社会主义国家。这里的外交政策一面倒,即外交政策一边倒。——第134页。
- 105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发动内战遭到失败的形势下,向中国共产党提议举行和平谈判。一月十四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声明,同意谈判,并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双方谈判的基础。这八项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四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经过谈判,以八项条件为基础,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协定全文共八条二十四款,四月二十日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第135页。
- 106 陈毅(一九一——一九七二),四川乐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35页。
- 107 辽沈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第138页。
- 108 淮海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一部,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

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第 138 页。

- 109 平津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驻守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 138 页。
- 110 司徒雷登(一八七六——一九六二),美国人,出生于中国杭州。一九四六年七月出任美国驻中国国民党政府大使。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解放后,仍然留在那里观望。同年八月离开中国。——第 139 页。
- 111 “四面八方”的政策 是毛泽东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这个政策照顾到四对矛盾的八个方面,所以有这个称呼。——第 140 页。
- 112 中央系,这里指蒋介石在贵州省安插和培植的势力。——第 141 页。
- 113 共同纲领 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第 142、156、162 页。
- 114 王家烈(一八九三——一九六六),贵州桐梓人。曾任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主席,是贵州地方势力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五年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进入贵州后,他被调离贵州。一九四九年七月被委任为国民党政府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未到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副主席。——第 142 页。
- 115 宋任穷,一九 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政治委员。——第 142 页。

- 116 各界代表会议 即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是解放初期人民参政的一种形式。其代表由推选、邀请、商定及选举等方式产生。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它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协议机关,后曾代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在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休会期间,设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协助人民政府实行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以及负责筹备下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 142、173 页。
- 117 中央局,这里指中共中央西南局,一九四九年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组成,十一月二十三日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第 143 页。
- 118 这里的《新华日报》,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机关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在重庆创刊,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停刊。——第 146 页。
- 119 公债 即国家举借的债务。这里指一九五一年一月中央人民政府为取得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迅速恢复经济和安定人民生活而发行的人民币胜利折实(即以实物为计算标准)公债。——第 147 页。
- 120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发出的号召,原文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第 148 页。
- 121 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新人民币一元等于旧人民币一万元。——第 148、194 页。
- 122 土地法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施行。——第 149 页。
- 123 土改 即土地改革,这里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改革运动。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 149、169、172、186、189、288、295 页。

- 124 见《礼记·大学》。原文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第149页。
- 125 这里指一九五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内进行的整风运动。这年五月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全国胜利后新党员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在老党员中，也有很多人滋长了骄傲自满、命令主义作风，少数人甚至贪污腐化，违法乱纪。指示要求全党在各项工作任务密切结合而不是相分离的条件，用阅读若干指定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进行一次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干部的作风。——第151页。
- 126 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及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151、212、258、263、339页。
- 127 三查三整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结合土地改革所进行的整党整军运动。三查在地方上是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在部队中是指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第151页。
- 128 把头制又称把持制，是旧中国雇佣关系中具有封建垄断性的一种中间剥削制度。封建把头多为帮会头子或地痞流氓，他们与地方官府勾结，在某些行业中把持一方，垄断劳动力的雇佣，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国民党特务势力亦曾操纵和利用封建把头为其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镇压反革命和民主改革运动逐步废除了把头制。——第153页。
- 129 供给制是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人员以及军队的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一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

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金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159页。

- 130 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大都分为若干支系,各支系又都有自己的称谓。这里的数字包括了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目前云南省内经过识别归系后国家确认的少数民族,共有二十五个。——第161页。
- 131 西康,旧省名。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一年十月解放,随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第162、189页。
- 132 一九五五年五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和西藏的具体情况,提出了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十条政策。后经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条件,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军政委员会、西南军区的布告中公布。其主要内容是: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实行藏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第162页。
- 133 指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成立内蒙古自治区的经验。——第165页。
- 134 一九四二年四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定边县的四、五两区和城关镇的两个自然村曾建立回民自治区。同年九月在曲子县三岔镇曾建立过回民自治区。这里是指这些地方的经验。——第165页。
- 135 “波巴”,又译为“博巴”,在藏语里是藏族的意思。“波巴政府”即藏族政府。中

- 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西康时,当地藏族人民曾建立“波巴政府”。——第 165 页。
- 136 一九 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赵尔丰任川滇边务大臣后,废土司制,设县治理。辛亥革命后,康东地区部分土司复辟,虽保留县制,但形同虚设。一九三九年正式建立西康省,实行设县治理。——第 165 页。
- 137 东藏民主青年同盟 是中国共产党康藏边工委(“巴唐地下党”)领导的进步青年组织。建立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该地区的过程中,它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一九五 年四月,东藏民主青年同盟盟员转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第 166 页。
- 1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了保障少数民族在地方政权中的平等权利,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民族政策的基本精神,在一些民族杂居地区曾建立民族民主联合政府。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周恩来总理签发《国务院关于改变地方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指示》,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县和乡改建为自治县、民族乡或一般的县和乡,将民族民主联合政府的专区和区改建为自治州和自治县或专员公署、区公所。——第 166 页。
- 139 这里的中央民族访问团 指中央人民政府于一九五 年七月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向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派出的中央民族访问团。——第 170 页。
- 140 段君毅,一九一 年生,山东范县(今属河南)人。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蔡树藩(一九 五——一九五八),湖北汉阳人。当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部长、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主任。张霖之(一九 八——一九六七),河北南宫人。当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全国总工会西南办事处副主任。于江震(一九一二——一九六七),四川西充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组织部副部长。——第 172 页。
- 141 党的二中全会 指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分析了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

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第172页。

- 142 退押 即退还押租。押租是旧时在土地、房屋或其他财物的租佃时租用者所支付的一种保证金。按租佃惯例,押租在解除租佃关系时应归还给租用者,但是地主阶级依仗权势,往往以种种借口不肯退还押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中,农民纷纷要求地主退押,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规定地主应将过去所收押租退还给农民。但在实行中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全退、分期退、缓退、少退或者不退等办法。——第172、186、189页。
- 143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第173页。
- 144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1428页)。——第174页。
- 145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第174页。
- 146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页)。——第175页。
- 147 这里的镇压反革命 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182、189、288、295页。
- 148 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指示”分析了当时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空前扩大、发展和深入的形势,号

召全党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更加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同时提出了一九五一年统战工作的主要任务,批评了部分党员干部对统一战线工作采取的不积极的态度。——第184页。

- 149 “双十二”事变 指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185页。

- 150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然后越过朝鲜南北两方原来的临时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抗美援朝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持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帝国主义连连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停战实现,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第185、189、195页。

- 151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人民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于一九五 年十一月四日联合发表的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言。“宣言”谴责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揭露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中国的阴谋。呼吁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用积极行动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重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从朝鲜撤军的主张。郑重声明:中国各民主党派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第 185 页。
- 152 三大因素 指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正确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通常被称为三大法宝。——第 186 页。
- 153 周兴(一九 五——一九七五),江西永丰人。当时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南公署检察长、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第 191 页。
- 154 财委即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它负责指导财政部、贸易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部、纺织工业部、食品工业部、轻工业部、铁道部、邮电部、交通部、农业部、林垦部、水利部、劳动部、人民银行和海关总署的工作。这里的四办、三办、二办、一办,是它下设的办事机构,即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办公厅的简称。——第 194 页。
- 155 大区 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行政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 194 页。
- 156 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制发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向全党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

- 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 197、199、201 页。
- 157 三中全会 指一九五一年六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第 201 页。
- 158 《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是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起草的,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对党的内部情况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甚至某些高级干部对于团结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和夸大个人作用的倾向。“决议”强调加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党的团结,工人阶级的团结,劳动人民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是革命胜利的基本保证。“决议”认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以及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并为此作出了党的高级干部应遵守的六条规定。“决议”强调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加强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第 201 页。
- 159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日至五月七日,刘少奇到天津巡视,其间作了多次讲话,详细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强调要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内外(贸易)关系、城乡关系,组织好工人阶级队伍,转变农村工作方式,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些讲话批评了当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某些“左”倾情绪,指出在当时中国的具体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的意义。——第 205 页。
- 160 从一九四八年起,华北、东北的中共党组织陆续提出关于党员发展成为富农者如何处理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当时提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主张暂缓解决,以利于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第 206 页。
- 161 关于工人阶级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历来是明确的。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只在建国前后的个别文件中出现过。一九四八年二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时曾使用过这一提法,说“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刘少奇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共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党员条件部分,曾讲到“以前的

革命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里面的半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把蒋介石打倒了,把土地改革完成了”。同年五月五日正式印发的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删去了讲党员条件的部分,这段话也就随之删去了。根据刘少奇这个报告起草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保留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提法。一九五一年七月《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后中共河北省委党校阴一刚、罗云路致书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同意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毛泽东与刘少奇、安子文经过商讨,同意改正这一提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第206页。

- 162 这里的文委 是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的简称。——第210页。
- 163 郭老 指郭沫若(一八九二——一九七八),四川乐山人。当时任政务院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职。——第211页。
- 164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第215页。
- 165 见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第217页。
- 166 农业生产合作社 是当时我国劳动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自愿联合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集体化程度的不同,分为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土地入股、统一经营,收益按土地和劳力比例分配,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入股,也取得合理的代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取消了报酬,归集体所有,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作价入社,完全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第220页。
- 167 肃反运动 指一九五五年七月至一九五七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第220页。

- 168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肯定了七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工作中的成绩,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关于召开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有关问题。会议揭发批判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通过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维护和加强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第 227 页。
- 169 见毛泽东《关于健全党委制》(《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40—1341)。——第 230 页。
- 170 关于在企业中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或经理负责制问题,一九八一年八月,中共中央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时,邓小平提出要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规定,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企业中党的组织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保证和监督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企业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对企业工会、共青团组织的领导,做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同时要求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和各项民主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和职工代表在审议企业重大决策、监督行政领导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的权力和作用。——第 231 页。
- 171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1 页)。——第 234 页。
- 172 高岗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原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他们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对他们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这一重大斗争,通过决议开除他们的党籍。——第 237 页。

- 17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 257、261、270、300、347 页。
- 174 一次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三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 263、342 页。
- 175 “骨头”和“肉”是计划部门在分配基本建设投资时划分项目类别的一种形象化的说法。“骨头”一般指工业、交通建设项目。“肉”一般指配合生产和适应职工生活需要的各种设施,如科研、文教、卫生、商业服务网点、职工住宅和城市公用事业等。——第 266 页。
- 176 见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33、789 页)。——第 272 页。
- 177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3 页)。——第 272 页。
- 178 “大民主”、“小民主”是一种讽刺性的用语,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曾加以援引和解释。他批评了一种人主张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要在中国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的错误观点。同时讲话中也用大民主来表示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或闹事。这里所说的“大民主”,是指大规模的风潮和闹事。下面所说的“要有小民主”,是指认真执行我国宪法所规定的民主制度,使人民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和其他民主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第 273 页。

- 179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政治事件。——第 273 页。
- 180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发生的事件。——第 273 页。
- 181 见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15 页)。——第 278 页。
- 182 指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对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的提法问题请示的批复。批复指出:在青年中组织毛泽东著作学习运动,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提法较为妥当。不要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并列起来提,以避免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误解为是两回事。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发展。——第 283 页。
- 183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第 285 页。
- 184 “共产风”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错误。主要内容是:不承认生产队之间的差别,贫富队拉平,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均分配;公共积累过多,义务劳动过多;破坏等价交换原则,无偿调拨生产队和社员个人的某些财产。——第 285 页。
- 185 一九五七年八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中国妇女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时,邓小平提出把“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妇女工作的长期方针。他的建议,得到中央书记处的一致同意和中央政治局的批准。——第 294 页。
- 186 三反 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 295 页。
- 187 五反 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 295 页。
- 188 指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书面报告。这个报告已收入《刘少奇选集》下卷。——第 297 页。
- 189 指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

个讲话在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公开发表。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节选了讲话的第一、二、四、六点。——第 297 页。

- 190 一九三五年六月,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当时中共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张国焘不承认在北方建立根据地的可能,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地区退却,并干扰北上方针的实施。南下、北上两种方针,关系革命全局和红军命运,所以红军指战员十分关注。——第 300 页。
- 191 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 306 页。
- 192 见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 4 卷,1991 年版,第 1442 页)。——第 311 页。
- 193 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八月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一九五八年钢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会后立即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在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中,也都开展了“全民大办”运动。这种由大炼钢铁带起来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推向高潮,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的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遭到重大损失。——第 312 页。
- 194 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第 315 页。
- 195 财经小组的报告指中央财经小组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当时国民经济的基本形势,如实地指明了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提出三项重要决策:(一)整个国民经济需要进行大幅度的调整;(二)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要争取快,准备慢;(三)坚决缩短工业生产建设战线,继续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大力加强农业生产战线。报告还提出了实现这三项决策的具体措施。一九六二年五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批发全党贯彻执行。——第 318 页。
- 196 指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通知”指出:“凡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

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方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甄别平反”。这次甄别平反,对于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团结全党全民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克服暂时困难起了积极作用。——第319页。

- 197 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所以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阐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要求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还提出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320、330页。
- 198 “五风”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发生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第320页。
- 199 “五统一”是六十年代初在我国一些地区农村出现的生产管理的一种形式。主要内容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劳力、耕牛统一调配,生产统一计划安排,肥料统一使用,庄稼统一收打,统一分配,在这个前提下,实行主要农活集体操作,一般农活责任到人。——第323页。
- 200 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当时在某些地区农村出现的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包产到户等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作了错误的批判。——第323页。
- 201 八届十中全会 指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全会指出全党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继续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议》等文件。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

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同时,他也指出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会上还错误地批判了所谓“黑暗风”(指对当时严重困难形势作充分估计的观点)、“单干风”(指包产到户)和“翻案风”(指为一九五八年以后历次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和彭德怀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申诉信)。——第333页。

- 202 指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指出:“当前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为此,中央决定对全党各级各方面的领导干部,采取短期训练班的方式普遍地进行一次集训。其目的是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 and 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自觉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作风,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违反政策、违反纪律的错误。——第333页。
- 203 见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第333页。
- 204 这里指一九五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倡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第334页。
- 205 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曾经以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指出:“过去安排是重、轻、农,重、轻、农的关系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并说:“农、轻、重问题,把重放到第三位”,“重工业要为轻、农服务”。——第335页。
- 206 托拉斯是英文Trust的音译。它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高级形式。它由许多生产同类商品和与产品经营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在社会主义国家,托拉斯是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之一。我国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

- 中央工业交通部门先后试办了烟草、盐业、医药、橡胶、铝业、汽车、纺织机械、地质机械仪器等十二个托拉斯企业。——第 336 页。
- 207 这里指一九六一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的东北、华北、西北、中南、西南、华东六个中央局。——第 336 页。
- 208 六届四中全会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 338 页。
- 209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〇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起,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此后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是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会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在此期间,犯有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第 338 页。
- 210 博古即秦邦宪(一九〇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曾是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遵义会议后,被撤销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权。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工作。一九四一年以后,在延安创办和主持《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一九四五年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自己过去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四六年四月因飞机失事遇难。——第 338 页。
- 211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了许多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随后在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又发表了一些包括错误意见的宣言、决议和文章。他相信国民党超过相信共产党,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斗争,不敢放手发展人民军队,不敢在日本占领地区扩大解放区,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将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送给国民党。由于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已经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王明的这些错误只在局部地区一度产生过影响。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全党独立自主地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第 344 页。

- 212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召开。会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政治、军事、组织等问题的决议案,肯定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时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指出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会议在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特别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也有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第 345 页。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

第二卷

目 录

军队要整顿	1—3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全党讲大局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4—7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当前钢铁工业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8—11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加强党的领导 ,整顿党的作风.....	12—14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	
军队整顿的任务	15—24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	25—27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28—31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32—34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各方面都要整顿	35—37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	

“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38—39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40—41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42—47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48—58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	59—65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66—71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72—84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85—100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101—102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03—110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实现四化,永不称霸	111—112
(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13—125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126—128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	129—131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实行开放政策,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132—133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	
工人阶级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134—139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40—153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 日程	154—155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156—157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58—184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	185—188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189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	190—193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194—202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 力量	203—206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 祝词	207—214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215—230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231—236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	237—238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239—273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274—283
（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	284—290
（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二日）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 决议》的意见.....	291—310
（一九八三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311—314
（一九八四年四月——五月）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315—317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处理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	318—319
（一九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320—343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八日）	

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344—353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	354—374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375—378
(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379—382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383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选拔中青年干部	384—388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	389—393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394—395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396—401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402—404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405—407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408—412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 过渡办法	413—414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中国的对外政策	415—417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注释	418—446

军队要整顿^{*}

(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经过长期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军队内部很团结,联系群众也很好。可是从一九五九年林彪^[1]主管军队工作起,特别是在他主管的后期,军队被搞得相当乱。现在,好多优良传统丢掉了,军队臃肿不堪。军队的人数增加很多,军费开支占国家预算的比重增大,把很多钱花费在人员的穿衣吃饭上面。更主要的是,军队膨胀起来,不精干,打起仗来就不行。我想军队绝大多数同志是不满意这种现状的。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军队要整顿。军队的总人数要减少,编外干部太多要处理,优良传统要恢复。这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的责任更大,三个总部本身首先要整顿。

我们要遵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整顿军队。这些年来,我们军队出现了一个新的大问题,就是闹派性,有的单位派性还很严重。这个问题主要在干部。我们军队的干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机关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七五年一月五日邓小平同志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部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确有少数人热衷于搞派性。他们在军队内部搞,到地方去也搞。要安定团结,就必须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我们军队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许多山头,那是由于长期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而自然形成的。长征到了陕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全军提出要克服山头主义倾向。经过延安整风,反对宗派主义,全党达到了新的团结。这是我们打胜抗日战争、打胜解放战争的根本保证。最近这个时期,又钻出了一个派性,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不消除派性,安定团结不起来,军队战斗力也一定会削弱。每个干部都要把党性放在第一位。原来喜欢搞派性的,要觉悟,要改正,改正了就好。今后军队干部的使用、提升,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不能重用派性严重的人,不能重用坚持派性不肯改正的人。

再一个问题是军队的纪律很差。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而且专门唱那一条,叫做“一切行动听指挥”呢?就是强调纪律嘛。军队要像军队的样子。现在提出加强纪律性,首先要从我们北京的机关、部队做起。不抓怎么行?所以,军队的整顿,一个是要提高党性,消除派性;一个是要加强纪律性。

还有一些问题也要解决,如落实政策。现在有好多政策没有落实。各个单位要认真研究,把政策落实好,这样才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安定团结。

我们总参谋部,顾名思义,就是要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当好参谋,给我们军队的统帅毛主席当好参谋。毛泽东同志过去批评总参不参,这个状况要改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现在是问题成堆。我们总参谋部一定要按照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军事

路线、建军原则 ,好好地清理一下 ,使我们真正起到参谋的作用。

今天就是同大家见个面。军队究竟怎么搞法 ,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议。但是我想 ,刚才说的军队要整顿 ,要安定团结 ,要落实政策 ,这些原则是不会错的。为了做到这些 ,我们要增强党性 ,消除派性 ,加强纪律性 ,提高工作效率。希望我们总参谋部所有的干部 ,本着这样的精神团结起来 ,把工作做好。

全党讲大局， 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一九八一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二十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二十五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毛主席讲，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目前生产的形势怎么样？农业还比较好一点，但是，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只有六百零九斤，储备粮也不多，农民的收入就那么一点。工业方面，那就确实值得引起严重注意。现有的生产能力没有发挥出来。去年一年，工业生产情况是不好的。今年是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最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后一年 ,生产再搞不好 ,势必影响第五个五年计划的实行。我们必须预见到这种形势 ,认真抓这个问题。

怎样才能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分析的结果 ,当前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的问题不解决 ,生产部署统统打乱 ,整个计划都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 ,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

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 ,还是要加强集中统一。对铁路工作 ,中央从来是强调集中统一的 ,但是近几年这方面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这些年铁路职工和机车、车辆、线路等装备都有增加 ,可是由于削弱了集中统一领导 ,铁路运输总是上不去。现在每天只装四万多车。据有的同志讲 ,按现有的实际能力装五万五千车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中央的决定是根据铁路的特性 ,重申集中统一。当然 ,地方的责任并没有减轻。铁道部门的工作没有各地的支持是做不好的。因此铁道部门与地方之间应当加强协作 ,采取一致的步调。

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增强组织性纪律性 ,这也是中央的决定上讲的。现在铁路事故惊人 ,去年一年发生行车重大事故和大事故七百五十五件 ,比事故最少的一九六四年的八十八件增加好多倍。这中间有许多是责任事故 ,包括机车车辆维修方面的责任事故。这说明没有章程了 ,也没有纪律了。现在有些规章制度要重申。火车司机不能下车吃饭 ,要带饭盒在车上吃 ,这是老章程 ,是有道理的。现在随便下车吃饭 ,经常误点。值班不准喝酒 ,这是历来的规矩 ,现在也不严格执行了。喝醉了酒扳错道岔 ,就会造成火车相撞的重大事故。所以必要的规章制度一定要恢复和健全 ,组织性纪律性一定要加强。这个问

题不光是铁道部门存在,其他地方和部门也同样存在。

中央的决定还讲到反对派性。现在闹派性已经严重地妨害我们的大局。要把这个问题摆到全体职工面前,要讲清楚这是大是大非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光解决具体问题不行。对闹派性的人要再教育,要反对闹派性的头头。大概有这样两种情况:一种是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打几年派仗打昏了头,马克思主义不见了,毛泽东思想不见了,共产党也不见了。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过来,既往不咎,再不转变,严肃处理。另外一种少数坏人,各行各业、各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些,他们利用派性混水摸鱼,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破坏国家经济建设,在混乱中搞投机倒把,升官发财。对这样的人,不处理不行。比如,徐州那个闹事的头头“本事”可大啦,实际上是他在那个地方专政。对这种人及时处理,等到哪一年呀?我说,只等他一个月,等到三月底。如果再不转变,顽固地同无产阶级对立,那样性质就变了。

铁路系统里闹派性的人同地方上闹派性的人是有联系的,反对派性,要把他们之间的联系切断。他们这些人懂得抓要害,把铁路一堵,事情就闹到北京来了。南昌铁路局的问题,省里就有人支持。一定要把铁路上搞派性活动的里外联系割断。这次确定,铁道部门的人事调动,还是由铁道部统一管理。铁道部有这个权。铁路上的派性问题,地方解决不了的,由铁道部解决。要把闹派性的人从原单位调开。当然是调头头。调动后又钻出个新的头头怎么办?钻出来再调。调两次、三次,总可以解决了吧。我们也不捉人,当然反革命的除外。闹派性的头头不服从调动怎么办?不服从调动不发工资。你的“行

业”是闹派性 ,何必到我们这里来拿工资 ?总之 ,解决问题要有一点办法。

对中央的决定是赞成的多还是反对的多 ?请大家估计一下。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拥护 ,中央的决定就能行得通。我想绝大多数人是拥护这个决定的。中国铁路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组织的一部分。集中统一赞成不赞成 ?组织性纪律性赞成不赞成 ?必要的规章制度赞成不赞成 ?闹派性要不要反对 ?对闹派性的头头要不要调开 ?把这些问题讲清楚 ,理所当然地会得到绝大多数铁路职工的拥护。所以 ,三月份的动员要很深入 ,包括对职工家属、铁路沿线农民 ,都要做到家喻户晓。

解决铁路问题的经验 ,对其他工业部门会有帮助。对于当前存在的问题 ,要有明确的政策。要从大局出发 ,解决问题不能拖。拖到哪一年呢 ?搞社会主义怎么能等呢 ?

当前钢铁工业 必须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九七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冶金部前几天给毛主席、党中央的报告,中央写了批示,准备转发下去。我看,大家只要按照中央批示的方针、要求去做,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是完全有希望的。

当前,钢铁工业重点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必须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班子。

现在钢铁生产上不去,主要是包钢、武钢、鞍钢、太钢等大钢厂的生产上不去。特别是鞍钢,它的产量要是上不去,一天掉下来两三千吨,别的厂是没有办法补起来的。当然,中小钢厂也有一些差的。钢铁生产搞不好,关键是领导班子问题,是领导班子软、懒、散。冶金部的领导班子就是软的,当然还不能说是懒的、散的。软,就要加强一下。各个工厂企业领导班子的情况不完全相同。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散,与闹派性有关。现在,在干部中有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怕,不敢摸老虎屁股。一个部门、一个企业的领导,不能怕这怕那。要找一些不怕打倒的人进领导班子,条件是中央支持他们,省委支持他们。没有这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条,扭转不过来。领导班子就是作战指挥部。搞生产也好,搞科研也好,反派性也好,都是作战。指挥部不强,作战就没有力量。冶金部作战就没有力量嘛。有些公司、钢厂的领导班子作战也没有力量。领导班子问题,是关系到党的路线能不能贯彻执行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不要说带领群众前进,就是开步走都困难。因此,我们首先强调要把领导班子的问题解决好。不光是冶金部,各个公司、厂矿、车间的领导班子,包括职能机构,都要加强。要使领导班子一不软,二不懒,三不散,说了话大家都能听,都能指挥得动,都能领导起来。

第二,必须坚决同派性作斗争。

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下达以后,对各行各业都很大的影响和推动。煤炭工业生产上得很快,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的经验,就是敢于同派性进行坚决的斗争。太钢也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生产才上去的。铁道部门在这方面做得就更突出了。徐州的经验比较典型。这些经验都值得大家很好学习。

对于派性,领导上要有个明确的态度,就是要坚决反对。有的人把党的事业闹得乌天黑地,你还等他觉悟,你能等得及吗?要敢字当头。对坚持闹派性的人,该调的就调,该批的就批,该斗的就斗,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对于派性,还要号召群众、发动群众起来共同反对。那种坚持闹派性的人,中央他怕吗?省委他怕吗?市委以及公司、厂矿的领导,对他来说就更不在话下。可是他最怕群众,怕群众起来。所以治那种人的办法,就是发动群众同他斗,寸步不让,而且要有个声势,不能冷冷清清。我们要相信群众,拿中央文件跟群众直接见

面,使中央精神真正做到家喻户晓,婆姨娃娃都知道,把广大群众同派性作斗争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各地经验证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是拥护中央精神的。当然,并不是说没有人反对。今年三月我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就有人说是“复辟纲领”。这种人是有,你不要怕。只要我们有了明确的态度,有了正确的方针,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还在那里闹派性的是少数人。其中,有的是敌人,他们利用派性来闹事;有的是为了争个人名利而打派仗;有的是打了几年派仗,被派性迷住了心窍。根据铁道部门的经验,徐州和其他地区的经验,在同派性作斗争中,所要打击的也就是那么少数几个人。徐州闹得那么厉害,最后被打击的只有三个人。绝大多数人,包括被派性迷了心窍的人,都可以挽救过来。所以,实际搞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我们一定要下决心搞好反派性的斗争。

第三,必须认真落实政策。

从解决铁路问题、徐州问题的经验来看,落实政策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清查“五一六”,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这是很吓人的数字。搞了那么多人,不给他们落实政策,能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吗?

我们讲落实政策,不仅要解决戴上帽子的那些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他们周围受到牵连的人的问题。徐州市搞了六千多人,如果按五口之家来算,再加上他们的亲戚朋友等社会关系,波及的面就有好几万人。必须使他们很快把包袱放下来。

在落实政策时,还要注意这样的情况:有些人虽然没有戴帽子,但是批评或者斗争过他们,伤了感情;有的地区虽然没

有清查“五一六”，但是也干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这些问题都要妥善解决。

在落实政策时，还要特别注意那些老工人、技术骨干、老劳模，要把这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有些该回领导岗位的要调回来，摆到适当位置上。当然不是说统统都回到原来的岗位。

第四，必须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

上面几件事情认真做好以后，紧接着就要发动群众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起来。这也是加强组织性纪律性的问题。过去一个时期，根本谈不上什么规章制度，出了不少问题。最近武钢就发生了一天跑两次钢水的大事故。有些事故发生了，还分不清是谁的责任。因此，一定要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有的工厂纪律很松弛，职工可以上班，也可以不上班，制度可以执行，也可以不执行。要讲清楚，对这些现象，过去的还可以原谅，现在就不许可再存在了。哪能随便不上班，马马虎虎呢？不上班就不发工资，不干工作就叫他离开嘛！你既然不愿意工作，国家为什么还要照发工资呢？执行规章制度宁可要求严一些，不严就建立不起来。过去有些规章制度比较繁琐，应该改革。我们要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把必要的规章制度恢复或建立起来。

总之，把钢铁生产搞上去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看，抓住以上这四条最重要。

加强党的领导 ,整顿党的作风^{*}

(一九七五年七月四日)

今天见个面 ,我讲几句话。

前一个时期 ,毛泽东同志有三条重要指示 :第一 ,要学习理论 ,反修防修 ;第二 ,要安定团结 ;第三 ,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指示互相联系 ,是个整体 ,不能丢掉任何一条。这是我们这一时期工作的纲。毛泽东同志去年就讲过 ,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了 ,以安定为好。现在加一年 ,九年了 ,要团结起来 ,安定起来。我们有好多事要办。国际方面的斗争 ,事情很多。国内也有许多事情要做 ,特别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搞好安定团结 ,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需要加强党的领导 ,把我们党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 ,坚持下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讲军队要整顿 ,整个党也有这个问题 ,特别是在党的领导和党的作风方面。

现在 ,相当一部分地方党的领导没有建立起来 ,党的领导削弱了。各级都有这个问题。没有党的领导怎么行 ?党讲话不大灵怎么行 ?解决这个问题 ,关键是建立省委一级的领导 ,许多事情都拿到中央来解决是不行的。在座的许多同志参加

^{*} 这是邓小平同志对中央读书班第四期学员的讲话。

省里的工作,希望你们经过学习,通过自己的工作,把省委的领导建立起来,使省委说话有人听,能够担负起领导责任,做到一不是软,二不是懒,三不是散。省委领导会不会犯错误,那是可能的,甚至肯定会犯。这个同志那个同志都可能犯错误。要求省委每一件事都做得完全对,都那么正确,是不可能的。要允许他们犯错误,改正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他们。中央批评他们也是为了帮助。要维护省委的领导,帮助省委建立威信,使省委对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各项工作都能够领导起来。省委坚强了,敢于领导,就能帮助地委、县委。这样,我们党就能够实现自己的领导了。最近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和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生产计划的批示,都讲了加强党的领导问题。我们全党都要做这个工作。

讲到党的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要三不要”^[2],这是党的原则,也是党的作风。大家读了好多书,要好好地读延安整风时的文件,七大的报告。毛泽东同志在七大的政治报告里,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三大作风。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同志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等报告。那时是整顿三风:一是整顿学风,反对主观主义;二是整顿党风,反对宗派主义;三是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这是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来的。在这一系列党的原则中,反对宗派主义,也就是反对派性,增强党性,是很重要的一条。“三要三不要”中讲团结,反对分裂,与延安整风时反对宗派主义是一个精神。党员要按照党的章程办事,遵守党的纪律,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

力了。延安整风就是解决这些问题,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没有那次整风,打败日本侵略者,打败蒋介石,是不可能的。现在解决各地区、各部门的问题,都要从反对派性、增强党性入手。过去在革命战争年代,各方面的红军,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干部,形成各个山头,那是自然形成的。如果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两派也是自然形成的话,那末,现在还搞两派,性质就不同了。毛泽东同志讲,要安定团结。让少数人继续在那里闹,能安定团结吗?徐州有那么几个人,就把共产党的市委打入“地下”,这是什么专政?是派性专政。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安定团结。实际上,那些坚持搞派性的只是少数几个人,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包括跟着闹派性的群众,是厌恶派性的。只要把问题讲清楚,群众觉悟了,看清了那些坚持闹派性的人的真面目,就不会跟他们走了。闹派性的人大部分是可以教育过来的。我们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群众中的派性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当然,这中间要有必要的斗争。

我就讲这些,主要是讲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派性,把毛泽东同志树立的优良作风发扬起来。这个问题,全党同志要注意,特别是中央委员、高级干部,更要注意。

军队整顿的任务^{*}

(一九七五年七月十四日)

一 我们军队的状况

首先应当肯定,我们的军队不管是建国以前,还是建国以后到现在,总的状况是好的,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不讲抗美援朝^[3]这些大仗,就讲珍宝岛、西沙群岛和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4]这些不大的仗,在战斗中,不管派一个团、一个连也好,一个班也好,都能完成任务。这说明我们军队的传统是好的,是英勇善战的。有的同志告诉我,现在军队团以下情况除个别的以外都不错。这一点我们是高兴的。

今天,我想着重讲一讲军队还有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因为军队受的赞扬太多了,所以不能只报喜不报忧。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军队建设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在座的许多同志也有这个感觉。我想了一下,有五个字:肿、散、骄、奢、惰。当然,全军总的面貌不是这样,但是从部分单位来说,从部分同志来说,是存在这五个字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是有点肿。这次会议研究精简整编,就是解决肿的问题。不能说每一个师的部队都是肿的,但整个军队确实有点肿。

二是有点散。主要表现在有派性和组织纪律性差这两个方面。我们的军队历史上是由各个山头、五湖四海集中起来的。过去,有三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又是由好多山头结合起来的,这就自然地不同程度地产生了山头主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时,号召反对宗派主义,解决全党和各个地区特别是军队里的山头主义。经过整风,从一九四一年算起,差不多三四年时间就解决了。整风后,不管是军队干部,还是地方干部,拧成一股劲,力量多大呀!所以把仗打胜了。以后,军队里就再没有提出反对宗派主义的问题。那末,现在为什么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这是军队在支左^[5]当中出现的新问题。军队支左,许多人也卷到派性里面去了。一些人卷到这一派里,另一些人卷到那一派里。军队的权力大得很,变成了派的后台,以后把派性带回到军队,在军队内部不少单位也分成了两派。现在,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了,军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摆脱派性,这一点影响了我们军队本身的团结。派性在军队里存在是很危险的,说严重一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也不应该容忍的。现在,军队里总有少数人喜欢垒点山头,喜欢搞那么一个小圈子,喜欢那些吹捧自己的人、听自己话的人,任人唯亲。其实,那些常常吹捧人的人是特别值得打个问号的。但是,我们有的同志就喜欢别人吹自己、捧自己,不善于搞五湖四海,不善于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山头就是这样不自觉地垒起来了。在北京,有的单位就有这样的同志,有的甚至还是高级领

导干部,他们就喜欢这样搞,经过“艰苦奋斗”,把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弄走,找一些听他话的人,搞这样的班子。这不是垒山头吗?这不是搞宗派吗?讲落实政策,讲了多少年,好多政策不能落实,闹派性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有些部队的派性回过来又影响到地方,使地方的派性问题也不能解决。支左部队撤出地方,人走了,影响还在。所以我们说,地方的问题与军队有关。

有许多同志感到,现在军队组织纪律性差,什么下级服从上级呀,个人服从组织呀,都不管了。过去军队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命令一下,二话不说就行动嘛。现在不行,不只是个人,甚至有的单位也违抗命令。组织纪律性差同派性有关。他们考虑的不是革命整体的利益,而是他们那一派的利益,个人利益、小宗派利益高于一切,要名,要利,要地位,不满足就不高兴,甚至不服从调动。现在,要调动一个人可不容易。许多人都喜欢留在大城市,特别是喜欢在北京,要调到别的地方去,很困难,说什么身体不好,调到外地心脏病肯定要复发,可是在北京,心脏病就好了。总之,理由多得很。

现在不只是组织纪律差,政治纪律也差。比如,中央说要落实政策,他就是不干。这是什么问题?这就是政治纪律问题。又如,要军队同志帮助地方消除派性,使群众团结起来,可是有些同志就是不执行这个方针。这是组织纪律问题,又是政治纪律问题。

最近,中央连续发了几个文件,都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领导班子软懒散的问题,地方有,军队也有。军队有相当多的散班子,也有相当多的懒班子,恐怕软班子占得更多。这

段时间,地方上对这些问题解决得比较好,比较快,军队慢了一点。

三是有点骄。骄的问题我们军队历来就有。战争年代军队出力大,牌子硬,名誉好,就容易骄。这种情况,经过多年纠正,比较好了。但是应当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军队支左,权力大得很。大权在握,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在军队一部分人中,滋长了骄气。有的甚至不只是骄气,而是骄横。有的人喜欢指手画脚,把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也丢掉了。现在,军队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都存在不少问题。有的部队内部相互之间的关系相当紧张,军政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也相当紧张。过去军队同志坐公共汽车,向来是给老人、带娃娃的妇女让座位的,现在有的不让了。有个战士坐车,一位妇女抱着娃娃,他不让座,娃娃哭了他也不理。旁边有位老人说,雷锋叔叔不在了。从这个事情上是可以看出问题的。我们军队在这方面本来有很好的传统。现在,不讲团结,不讲纪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6]至少有某种程度的丧失。有的人发展到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丢掉了。这方面的例子多得很。如果认为这些都无关重要,没有警觉,那是很危险的。

四是有点奢。上面讲到有的人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他们有的闹享受,闹待遇,一切都向高级发展,住房子越多越好。有的甚至公私不分,没有什么界限了。有的部队请客送礼,修建楼堂馆所。这些现象相当厉害,而且还在发展,并没有刹住。军队搞奢侈,有好多的事是违反政策的。有些人从地方上随便拿东西,或者低价购买。有的拿了东西连个手续都没有。军队

执行毛泽东同志的五七指示^{〔7〕},办了不少农场、企业,这是好事。但要提醒同志们注意,必须真正执行五七指示的精神。现在有的农场、企业赚了钱,随便开支,有的领导干部还互相争批条子的权力。这种情况要整顿。地方的房屋、土地,军队占得太多,地方很有意见,该还的就应该还嘛。有的房屋、土地,因为过去地方没有用,军队就拿过来了,但也有是霸占的。关于奢的例子,我想哪一位同志的脑子里都装了一大堆,我就不多讲了。

五是有点惰。惰性,不只是在一些人身上存在,甚至有些机关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些高级干部革命意志衰退,追求个人利益,不注意保持革命晚节。有的人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官僚主义,工作不努力,不踏实,不深入基层,不亲自动手,不动脑筋,靠秘书办事,讲五分钟话都要人家写成稿子照着念,有时还念错了。这是思想懒惰。有的人怕字当头,不敢办事,不敢讲话,怕讲错了挨批。共产党员为什么怕?为什么不敢讲话?为什么不敢负责任?这样,难道自己就没有责任?写出来照着稿子念就没有错误?我看起码是文风不好。写的稿子都是照着报纸抄的,那不是八股?这些问题的产生,除了个人的思想原因之外,组织上支持帮助不够也是一个原因。所谓帮助,也包括批评,批评也是帮助。中央有责任帮助各省,军委有责任帮助各军区、各军兵种。要敢于负责,不要怕。错误难免,有错误应该批评,改了就好。

总之,军队总的形势是好的。现在是有点肿、散、骄、奢、惰。尽管是部分的,但是不可忽略。

二 军队要整顿

军队整顿什么？就是整上面讲的那五个字。这次会议我们搞编制，就是整肿字。但不只是整肿，同时还要注意散、骄、奢、惰，要联系起来解决。解决肿的问题，搞好军队的编制整顿、体制整顿，可以适当解决军队的其他问题。比如，这次整编，要配备、健全各级领导班子，就要同时注意克服散字、惰字，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这一次编制要严格搞，要切实遵守编制。可以说编制就是法律。总不能像过去那样随便要战士为自己服务吧！规定配一个秘书，就不要用多了嘛。秘书少一点有好处，自己亲自动手，勤恳一点，多动一点脑子，对自己好处多啊！加强各级领导班子，选人要选得对，要好好地了解。这次整编，一直到连的干部都要选得比较好，更不用说营团以上的干部了。军队整顿当中，还要加强干部学习，增强党性，反对派性，加强纪律性，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作风。

三 军委的工作

军委常委的同志已经商量过，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这两件事都是毛泽东同志讲的，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我们抓了编制，接着就抓装备，装备也要抓好。国家正在考虑下一个五年计划、十年计划，军队装备也要有规划。科研要走在前面。不单是尖端武器、常规武器有科研问题，就是减轻战士身上带的东西的重量，同样有科研问题。现在一个战士要背几十公

斤,怎么打仗呀?到时候,非战斗减员不知有多少呢!这不是小事,也是装备问题,也要研究、定型。总后勤部要订出规划,要有一些人专门管这个事情。

抓编制,抓装备,还要抓战略,要按次序来抓。我们作战,有个战场问题,还有遇到什么情况怎么打法的问题,这些都要设想到。战略要研究的问题,不仅是作战问题,还包括训练。要把训练放在战略问题的一个重要位置上。现在是合成军队作战,空中也有,地面也有,水里也有,不是过去的小米加步枪了。现在当个连长,同过去的连长可不一样了。过去的连长,驳壳枪一举,就是“冲啊”!现在连长的知识要求比过去多得多,更不用说连以上的干部了。打起仗来,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一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你怎么指挥啊?这就要求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对我们指挥作战的水平不能估计高了。如果不注意军队训练,至少在战争初期要相当倒霉就是了。还要提高干部的管理水平。现在我们的干部不大会管理部队。比如,连队的伙食普遍不好,花钱很多,吃得很差,这就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还多得很。为了提高干部的指挥水平、管理水平,增加他们的知识,要好好办学校,包括各总部、各军兵种、各级的学校,都要办好。不打仗,除了搞演习以外,办一点学校,这总是一个办法。

很多同志提出,希望开一个政治工作会议,我看这个意见很好,是需要开一个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研究加强军队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要加强军队党委的集体领导,要加强政治机关,提高政治机关的威信。在配备政治工作干部时要注意质量,政治干部要能起模范作用。现在军队里的干部问题很值得

注意。怎样按照选拔干部的条件去做,这很重要。加强政治机关,特别要注意加强管干部的部门。政治机关的干部,特别是管干部的干部,要很公道,很正派,不信邪,不怕得罪人;也要有耐心,能熟悉干部,联系干部。我们的传统历来是政治机关管干部,首长总要经过政治机关去考核、审查干部,这才符合组织原则。要把这个好的传统继承起来。要特别注意加强连队政治工作。连队干部,尤其是指导员要会做工作。可以考虑连队指导员的年龄稍微大一点,任职时间稍微长一点。如果只干两三年就换了,经验就积累不起来,就不会做思想工作。另外,军队内部的团结问题,军队和地方的团结问题,军民关系问题,都要研究。

四 整编中的干部问题

现在整编中的干部问题是两个:一是在军队内部的处理问题,一是在地方的安置问题。有几十万干部转到地方,地方要承担起来,把他们安置好。这也是我们军队自己的事情,所以军队对地方要支持,要帮忙。现在地方上干部也多,安排不容易,有些同志遇到问题可能回军队告状。这个问题大家都要注意,军队要采取支持地方的态度。在军队内部的问题,就是谁留谁去,谁在职谁不在职。支左回来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初期靠边站的干部,现在都有一个分配工作的问题,应该通盘考虑。留在军队的师以上干部,谁在职,谁不在职,谁当顾问,解决好这些问题不容易,工作量很大,要妥善处理。刚才我讲的要连带解决的那几个字,跟安排干部问题有关,也要很好考

虑。还有一个干部调整、交流问题。毛泽东同志讲了,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外,省军区和有些部门的干部也要交流一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有的在地方卷入了派性,妨碍地方的工作,总要调换一下嘛。如果有了山头,一定要去掉,要把山头平一平,把干部交流一下,不要挤到一堆。有些人适当调动一下地方有好处,主要是换一个地方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遇事也会谨慎一些。总之,在一个地方呆久了不好。对干部要教育,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

在步骤上,我建议首先自上而下地调整好各级领导班子。我们解决地方问题,包括企业单位的问题,就是首先解决领导班子。领导班子要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地工作。否则有些工作没有人去做,都要中央派人,或省、市、自治区派人,那怎么行啊?军队也一样。配备班子的时候,首先要把一、二把手选准,要选党性好、作风好、团结好的。现在强调一下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重要,有了这一点,好多事情都会变化,都会好起来。所以现在选干部,特别是选高级干部,要选艰苦奋斗或者比较艰苦奋斗的。

讲一讲顾问问题。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谁去谁留的问题,不可能统得那么公道。毛泽东同志说,当了中央委员,不一定就比别人强,没有当中央委员也不一定就比有的中央委员差。所有的同志,特别是当顾问的同志,都要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的安排。对顾问,组织上要关怀,这个关怀有物质待遇问题,但是特别要注意对他们政治思想方面的关怀。要使他们能够看到文件,听到报告,

同级党委里面有些事要让他们知道。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这要讲清楚,因为工作不需要,并不是降格了。当顾问的同志也要自觉。下去检查工作的时候,不要人家请客,不要办酒席。下去到处跑,到处请客,而且都是老上级,不请客就说不尊重,就不高兴,那还得了!下去检查工作要有计划,不然下面受不了。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

五 高级干部的责任

搞好军队的责任首先在我们到会的同志,扩大一点,到军以上的主要成员。我们这些人把军队带好了,我们党的一套优良传统就能保持好,军队就会非常团结、非常有战斗力。如果我们这些人搞得不好,就会把军队带得很不好,存在的一些问题就会发展。现在确实有些值得注意的现象,我们都担忧啊!过去几十年,军队总的是很好的,我们是出了力的,功劳是有份的。现在军队一些不好的现象能不能克服,几十年的优良传统能不能继承和发扬,主要靠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传帮带。只要大家带头努力,做到毛泽东同志说的八个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我看,军队的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可以贯彻好的。

以上几点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8〕

关于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

(一九七五年八月三日)

几个月来,中央连续发了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生产问题等几个文件,方针政策都明确了。要我讲几句,还是些老话。

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现在看起来,这个问题多数工厂企业已经解决了,还有少数没有解决。“老大难”单位,无非是这么个问题。你要斗派性,没有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就根本不可能;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落实政策,没有这样的领导班子也搞不成。有的人就是一个怕字。过去怕,还有点道理,不能说过去怕的人都不好。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怕也不对,但是还可以原谅,因为有当时的情况。现在中央支持地方,上级支持下级,再怕就只能怪自己,怪自己革命意志衰退,怪自己革命干劲差。只能得出这个结论。怕字当头,不干工作,小病大养,无病呻吟,这样的领导干部,索性请他好好休息,不然占着茅坑不拉屎怎么行。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这件事不要拖,特别是省里管工业的书记要注意。解决领导班子的问题,主要是配备好一、二把手,一、二把手敢字当头,就可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

以把队伍带起来。要选一些比较有实际经验的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进领导班子,五十岁的、四十岁的,能有更年轻一点的就更好。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本厂可以找,本厂有困难,外厂也可以找,本地区也可以找,哪里会找不到人!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这个问题很重要,特别是军工产品。在战场上关键时刻有几发炮弹打不响,就可能影响整个战斗。现在的军工产品是现代化的武器,更要注意这个问题。我最近看到一些材料,说有多少国防工厂完成产值多少,产品质量好的和比较好的达到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你们切不可满足于这些数目字,这个话以后少讲为好。说产品质量大多数是好的,这不解决问题,有时恰恰在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面,关键产品、关键零件出了问题。国防工办要注意这个问题。现在飞行事故多,当然这里面有部队训练不好、飞行员素质差、地面指挥水平低等问题,但是也要研究飞机质量方面的问题。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于那个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里头的零部件出了问题。在检查的时候,就是那个百分之零点五没有检查到。我们几次科学试验没有成功,经过检查,并不是技术没有过关,而是那百分之一甚至百分之零点五的零部件质量没有过关,就是那么一点点没有达到要求。质量问题与建立规章制度有关。没有必要的责任制度,质量难于保证,这方面要很好地整顿。同时,也要请管国防工业的同志把科研工作抓紧,因为现在确实有好多军工产品,由于技术没有过关而不能正常生产。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搞三结合^[9],科技人员不要灰溜溜的。不是把科技人员叫“老九”吗?

毛主席说,“老九不能走”^[10]。这就是说,科技人员应当受到重视。他们有缺点,要帮助他们,鼓励他们。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这对于我们事业的发展将会是很有意义的。

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踏实实的工作。比如钢铁工人劳动那样重,而蔬菜少、肉类缺,基本条件都保证不了,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具体地去研究解决。这一点在工业多的城市要特别注意。有些干部不是喜欢养鸡、养兔、养鸭吗?如果把自己关心自己的这个积极性转到关心群众生活方面来,我想问题就容易解决了。还有在山区的三线^[11]工厂,那里的商业工作也要改进。我是四川人,经常听到家乡的工人反映,蔬菜少,肉类缺。不仅是四川,还有好多地方都有这个缺乏副食品的问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重庆附近,可以专门划出一部分地种菜,生产的蔬菜首先供应工厂,还可以供应市民。工人有点菜吃,有点肉吃,农民也可以增加一些收入,这对于改善工农关系也有好处。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调点粮食给一些城市的郊区养点猪,比如调五亿斤粮食,养五百万头猪。这些粮食不是全国到处分配,而是搞几个点,专粮专用。甚至还可以考虑用现代化的办法搞些养鸡场。这个问题要研究。最主要的是养猪。发展养猪,既可以使农民增加经济收入,又可以增加肥料,增产粮食。现在搞重体力劳动还很艰苦,不搞好职工生活不行。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现在应该提出这个问题了。

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

(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八日)

计委起草的文件提出了相当多的问题。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毛泽东同志历来主张要有章程。有章程才能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过去的工业七十条^[12],基本上是好的,是修改的问题,不是要废除。文件修改后,可以先拿出来讨论。现在,我对工业发展的有关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工业支援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是工业的重大任务。工业区、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业,搞好农业生产,并且把这一点纳入自己的计划。许多三线^[11]的工厂,分散在农村,也应当帮助附近的社队搞好农业生产。一个大厂就可以带动周围一片。这样还有一个好处,附近的社员就会爱护工厂,不去厂里随便拿东西。农业现代化不单单是机械化,还包括应用和发展科学技术等。城市可以帮助农村搞一些机械化的养鸡场、养猪场,这一方面能增加农民的收入,另一方面能改善城市的副食品供应。要是工人没有菜吃,没有肉吃,工业怎么能搞得不好?工业支援农业,农业反过来又支援工业,这是个加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国务院讨论国家计委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时的谈话。

强工农联盟的问题。我给四川的同志写过信,告诉他们工业越发展,越要把农业放在第一位。

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外国都很重视引进国外的新技术、新设备。把他们的产品拆开一看,好多零部件也是别的国家制造的。有一些原材料,我们一时解决不了、必须进口的,还是要进口一些。如化纤厂搞起来了,缺少某些化工原料就不能生产,不进口怎么行?要进口,就要多出口点东西。这里有一个出口政策问题。出口什么?要大力开采石油,尽可能出口一些。工艺美术品等传统出口产品,要千方百计地增加出口。化工产品要考虑出口。煤炭也要考虑出口,还可以考虑同外国签订长期合同,引进他们的技术装备开采煤矿,用煤炭偿付。这样做好处很多:一可增加出口,二可带动煤炭工业技术改造,三可容纳劳动力。这是一个大政策,等中央批准了再办。总之,要争取多出口一点东西,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加强企业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工业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工业的发展,企业的科技人员数量应当越来越多,在全部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应当越来越大。大厂要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小厂的科研可以由市里综合办,也可以由几个厂联合在一起搞。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用非所学,原来学的技能没有发挥出来,要改进这方面的工作。科研的课题很多,不说别的,光是出口商品的包装问题,我看就要好好研究一下。部队装备如何减轻重量,也很值得研究。有些装备光靠总后勤部自己搞不行,要有几个研究机构配合来搞。

四、整顿企业管理秩序。看来企业里面问题不少,其中带

普遍性的问题是企业管理秩序不好,设备完好率差。特别是重工业,问题更突出。要考虑今年十一、十二两个月集中整顿一下企业管理秩序,加强设备维修,为明年的生产打好基础。设备失修严重的企业,重点应放在维修上面。宁可少生产一些,也一定要把设备维修好。不然欲速则不达,越催生产越上不去。企业里浪费惊人,也是普遍现象,要好好整顿,争取利润多上缴一点。企业管理是一件大事,一定要认真搞好。

五、抓好产品质量。质量第一是个重大政策。这也包括品种、规格在内。提高产品质量是最大的节约。在一定意义上说,质量好就等于数量多。质量好了,才能打开出口渠道或者扩大出口。要想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必须在产品质量上狠下功夫。

六、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现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无人负责的现象,积重难返,非突出地抓一下不可。执行规章制度要严一点。要有一点精神,不要怕挨批判,不要怕犯错误。你不严,规章制度就恢复不起来,企业的混乱情况就无法改变。南京无线电厂有一位老工人讲了严格执行规章制度的必要,这个材料可发给大家看看。

七、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要动脑筋想一想。所谓物质鼓励,过去并不多。人的贡献不同,在待遇上是否应当有差别?同样是工人,但有的技术水平比别人高,要不要提高他的级别、待遇?技术人员的待遇是否也要提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

动人们的积极性？我看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工资政策是个很复杂的问题，要研究。

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我在大赛会^[13]上说,农业搞不好就要拖工业的后腿。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现在科研队伍大大削弱了,接不上了。搞科研要靠老人,也要靠年轻人,年轻人脑子灵活,记忆力强。大学毕业二十多岁,经过十年三十多岁,应该是出成果的年龄。这一段时间一些科研人员打派仗,不务正业,少务正业,搞科研的很少。少数人秘密搞,像犯罪一样。陈景润^[14]就是秘密搞的。这些人还有点成绩,这究竟算是红专还是白专?像这样一些世界上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了不得。说什么“白专”,只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比闹派性、拉后腿的人好得多。现在连红专也不敢讲,实际上是不敢讲“专”字。中央表扬了这样的人,对他们应该爱护和赞扬。

有位老科学家,搞半导体的,北京大学叫他改行教别的,他不会,科学院半导体所请他作学术报告,反映很好。他说这是业余研究的。这种用非所学的人是大量的,应当发挥他们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汇报《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汇报提纲)时的插话。

作用,不然对国家是最大的浪费。他是学部委员、全国知名的人,就这么个遭遇。为什么不叫他搞本行?北大不用他,可以调到半导体所当所长,给他配党委书记,配后勤人员。

广大的科研人员实在是想搞研究啊!闹派性的是少数,现在这个状况是能够改变过来的。

科研工作能不能搞起来,归根到底是领导班子问题,不把领导班子弄好,谁来执行政策?领导班子,特别要注意提拔有发展前途的人。对于那些一不懂行、二不热心、三有派性的人,为什么还让他们留在领导班子里?科研人员中有水平有知识的为什么不可以当所长?现在的工作,主要是依靠四十多岁的人来搞。好的可以管党务工作,管后勤工作。后勤工作很重要,它要为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保护和管理好资料、材料、仪器、机器。不是忠心耿耿的人,不懂科学知识的人,是搞不起来的。这也是科研工作中的政治工作。党的、科研的、后勤的工作,三个部分,没有后勤,科研搞不起来。不能叫科研人员还去搞后勤,整天东跑西跑。要让党性好的组织能力强的人搞后勤。

我们还要把那些比较好的、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记下来,建立科技人员档案,帮助他们创造条件,不管他们资格老不老。一九五七年我去苏联,尤金^[15]说,苏联的原子弹,是三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搞出来的。这样的人我们就没有啊?总之,要给有培养前途的科技人员创造条件,关心他们,支持他们,包括一些有怪脾气的人。首先要解决这些人的房子问题,家庭有困难的也要帮助解决。

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学校水平,何必

办成大学。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这样做要是犯错误,我首先检讨。这不是复旧!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比如我们提高工厂自动化水平,要增加科技人员,这就要靠教育。提高自动化水平,减少体力劳动,世界上发达国家不管是什么社会制度都是走这个道路。科技人员是不是劳动者?科学技术叫生产力,科技人员就是劳动者!

要解决教师地位问题。几百万教员,只是挨骂,怎么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毛主席讲消极因素还要转化为积极因素嘛。教育战线也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各方面都要整顿^{*}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四日）

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我在政治局讲了几个方面的整顿,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毛泽东同志赞成。

现在问题相当多,要解决,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这半年来,我讲了多次话,中心是讲敢字当头。有个“老大难”单位,过去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后来下了决心,管你是谁,六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四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二三十岁的老虎屁股也好,都得摸。一摸,就见效了。

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这次座谈会要议整党这个题目,这是毛泽东同志同意的。整党怎么搞?办法肯定应当不同于过去。请各省根据自己的特点,搞出个规划来。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农村包括公社、大队一级的,工厂包括车间一级的,科研机构包括研究室一级的,这样解决问题比较快。领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的插话。

导班子整顿好了,党员的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要在整党的基础上挑选干部。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县,选好了一、二把手,整个领导班子就带起来了。特别要抓好县委一级,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县委可是重要啊!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并不容易,要有全面的领导经验,对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来。这跟当个厂长只管一个工厂情况不同。县委书记当好了,到地委、省委工作就比较容易,比较顺手。现在有些省提拔个省委书记都感到困难,我看不会那样难吧。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一大堆,为什么连个省委书记都找不出来?我想问题恐怕是没有注意或者注意不够。当然,这些人有的不是没有错误,犯了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就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嘛。对这些人不能忽略,忽略了是个损失。挑选领导干部,不管老中青,都要看他是不是肯干,是不是能带头吃大苦耐大劳。这是第一条。当然还要有头脑。老中青,现在要着重注意中。这里所说的中,就是现在四十岁多一点的干部。这些人至少有一二十年的工作经验,有些还有上十年的领导工作经验。发现一个好苗子,要让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来,每个台阶可以快一点,比如搞个年把子再上来。这种培养方法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

我总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16]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林彪主张就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17],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

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反对的是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并不是不要读书,而是要读得更好。毛泽东同志给少年儿童的题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嘛。还有,毛泽东同志讲了四个现代化,还讲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三项基本社会实践,现在却把科学实验割裂出来了,而且讲都怕讲,讲了就是罪,这怎么行呢?恐怕在相当多的领域里,都存在怎样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

“两个凡是” 不符合马克思主义^{*}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我,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18]不行。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19]。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毛泽东同志自己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有些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他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20]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21]。我对那两位同志说:今年四月十日我给中央写信,提出“我们必须世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16]同志曾经同林彪^[1]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

我们要实现现代化 ,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 ,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 ,有人才。没有知识 ,没有人才 ,怎么上得去 ? 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 ? 要承认落后 ,承认落后就有希望了。现在看来 ,同发达国家相比 ,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 ,苏联九十万 ,我们只有二十多万 ,还包括老弱病残 ,真正顶用的不很多。日本人从明治维新^[22]就开始注意科技 ,注意教育 ,花了很大力量。明治维新是新兴资产阶级干的现代化 ,我们是无产阶级 ,应该也可能干得比他们好。

抓科技必须同时抓教育。从小学抓起 ,一直到中学、大学。我希望从现在开始做起 ,五年小见成效 ,十年中见成效 ,十五年二十年大见成效。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 ,既注意普及 ,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要经过严格考试 ,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

要从科技系统中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这些人挑选出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来之后 ,就为他们创造条件 ,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做研究工作。生活有困难的 ,可以给津贴补助。现在有的人家里有老人孩子 ,一个月工资几十元 ,很多时间用于料理生活 ,晚上找个安静地方读书都办不到 ,这怎么行呢 对这些人的政治要求要适当。他们在政治上要爱国 ,爱社会主义 ,接受党的领导。他们做好研究工作 ,出了成果 ,就对政治有利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处。

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 :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不论脑力劳动 ,体力劳动 ,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许多工人的工作就是按电钮 ,一站好几小时 ,这既是紧张的、聚精会神的脑力劳动 ,也是辛苦的体力劳动。要重视知识 ,重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 ,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

在军队中 ,科研和教育也要一起抓 ,进行现代战争没有现代战争知识怎么行 ? 要使军队领导干部自己有知识而且尊重知识。要办各级学校 ,经过训练 ,使军队领导干部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战争知识 ;同时使我们的部队干部年轻化。六十岁的人当军长是不行的。

科技和教育 ,各行各业都要抓。大的企业都要有科学技术研究机构 ,有科学技术研究人员。每个部门都要进行科学研究。

完整地准确地 理解毛泽东思想^{*}

(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林彪^[1]否定毛泽东思想,说“老三篇”^[17]就代表了毛泽东思想。林彪还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歪曲,极不利于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极不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23]同志、叶剑英^[24]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作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的话是正确的,在另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25],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我们要真正地领会毛泽东思想。就一个领域、一个方面的问题来说,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比如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一个领域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非常注意知识分子要好好地改造世界观。这是从爱护出发,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能够好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四人帮”把知识分子一概称为“臭老九”,并且还说这是毛主席说的。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曾经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样的话我们现在不能继续讲。但是从整个革命和建设过程来看,毛泽东同志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他在一九七五年,还针对“四人帮”的诬蔑,提出“老九不能走”^[10]。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思想和政策。又比如说,关于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思想历来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人民。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多次反对对他本人的一些不适当不科学的评价,经常教育我们正确理解人民与领导人或领袖的关系。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

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简单地谈一谈毛泽东思想里面的党的学说问题。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即红军创建时期,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26]就可以了解。他的完整的建党学说,是经过实践在延安整风时期建立起来的。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中建立了完整的建党学说,并且用这个学说来教育我们全党、全军和人民,使我们建立了这么一个好的党,所以才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建国以后,党内生气勃勃,生动活泼。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以后又有新的发展。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同志概括地讲了一个目标:“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27]当然,毛泽东同志这里讲的政治局面不只是讲党,而且是讲整个国家,整个军队,整个人民,就是说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要有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我们回想一下,正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才建立了这样一个好的党。从延安整风以后,无论前方后方的人,真是生气勃勃,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团结一致。毛泽东同志建立的这个党,既能够充分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下面遵守纪律的自觉性,又能够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高度的集中。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得多的敌人吗?我们能够在建国以后,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吗?

“四人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给党的建设、党的作风带来了很大的损害。详细情形我就不讲了。怎样才能达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呢?就是要好好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建设这个领域里的思想。这里面内容很多。比如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相结合。比如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比如“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比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法。比如充分发扬民主,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比如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比如,在延安中央党校,毛泽东同志亲笔题的四个大字,叫“实事求是”。我看大庆讲“三老”,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当然民主与集中的关系,自由和纪律的关系,都是很重要的。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毛泽东同志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充分信任群众,历来反对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对群众的议论,毛泽东同志是非常注意的。同志们总记得,在延安的时候,生产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为什么提倡生产运动

呢？原因之一就是当时征粮征多了，群众有怨言。我们好多共产党员听了心里非常不舒服。毛泽东同志看法不同，他说，讲得有道理，群众的呼声嘛！毛泽东同志就是伟大，就是同我们不同，他善于从群众这样的议论当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毛泽东同志一向非常注意群众的议论，群众的思想，群众的问题。

我为什么说实事求是目前在重要呢，要搞好我们的党风、军风、民风，关键是要搞好党风。现在，“四人帮”确实把我们的风气搞坏了。“四人帮”的破坏实际上是十年，或者说是十年以上，开始是同林彪结合在一起。他们弄得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甚至于我们有些老同志也沾染了这些坏习气，这是不应该原谅的啊！我们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毛泽东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

整党整风，这是很必要的。我们这些老同志也得整一整风，当然不是人人过关喽。我们现在不搞那个方法，自觉地整一整风也需要吧！给青年党员、干部做个榜样嘛，传帮带嘛，把毛泽东同志建立的党的学说，党的作风，传帮带，带好嘛！那样，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怕，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定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

现在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觉悟水平,对是非的识别能力,大大地提高了。人们动脑筋,想问题,关心国家,关心党。“四人帮”在那里危害党的时候,绝大多数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干部、党员和人民,都是十分担心,忧心忡忡。我们有这样好的干部,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他们觉悟程度很高,对党的事业无限信任,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可靠的保障,是非常可贵的。所以我和同志们一样,相信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把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力争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兴旺起来,使我们党的事业兴旺起来,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能够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关于科学和 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七七年八月八日)

这次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主要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向大家学习。外行管内行,总得要学才行。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虽然这次会议因为时间匆促没有邀请社会科学家。通过这次座谈会,我了解了一些情况,也开始了解了当前应该首先解决的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大家可能没有全讲出来,或者没有时间完全讲清楚,好在以后还有机会讲。下面我讲几点个人的意见。

第一,关于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

对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怎样估计,这是大家很关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科研方面基本上得到了解答,大家不满意的是在教育方面。这是一个应当回答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对科学研究工作、文化教育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基本精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神是鼓励,是提倡,是估计到我们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好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或者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在一九五七年以后讲过一些过头话,但在六十年代初期,他还是支持科学十四条^[28]、高等学校六十条^[29]这些的。我们要把毛泽东同志在教育方面的主导思想,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导思想讲清楚。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领域的指导思想,应当从总体方面完整地准确地表达出来。这是很重要的。对全国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应当肯定,十七年中,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管是科学工作者还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辛勤劳动,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教育工作者,他们的劳动更辛苦。现在差不多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大都是建国以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特别是前十几年培养出来的。如果对十七年不作这样的估计,就无法解释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了。

就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改造方面来说,应该怎样估计呢?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我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反对社会主义的是极少数,对社会主义不那么热心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当然,历史不断前进,人们的思想也要不断改造。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改造,就是建国以后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也要继续改造。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思想要继续改造,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员的思想也要继续改造。这是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了的。

第二,关于调动积极性问题。

解决了对十七年的估计问题,恐怕至少在精神上可以使大家放下包袱。就今天的现状来说,要特别注意调动教育工作

者的积极性,要强调尊重教师。我国科学研究的希望,在于它的队伍有来源。科研是靠教育输送人才的,一定要把教育办好。我们要把从事教育工作的与从事科研工作的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使他们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的重视。一个小学教师,把全部精力放到教育事业上,就是很可贵的。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付出的劳动并不比一个大学教师少,因此小学教师同大学教师一样光荣。对于终身为教育事业服务的人,应当鼓励。我建议,明年开个全国教育大会,总结交流办学经验,奖励有成就的大学、中学、小学教师。这样的会多年没有开了。

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不是讲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吗?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是脑力劳动,脑力劳动也是劳动嘛。有位科学家反映,现在在农业科学院种庄稼不算劳动,要到农村种庄稼才算劳动。这真是怪事。好多农业院校自己培育品种,自己种田,怎么不是劳动?科学实验也是劳动。一定要用锄头才算劳动?一定要开车床才算劳动?自动化的生产,就是整天站在那里看仪表。这也是劳动。这种劳动同样是费力的,而且不能出一点差错。要把这类问题讲清楚,因为它同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有关。

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毛泽东同志不赞成“天才论”,但不是反对尊重人才。他对我评价时就讲过“人才难得”。扪心自问,这个评价过高。但这句话也说明人才是重要的,毛泽东同志是尊重人才的。你们讲科研机构要出成果、出人才,教育战线也应该这样。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人才,好的教师就是人才。要珍视劳动,珍视人才,人才难得呀!要发挥知识分子的专长,用非所学不好。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

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是好的。“四人帮”创造了一个名词叫“臭老九”。“老九”并不坏,《智取威虎山》里的“老九”杨子荣是好人嘛!错就错在那个“臭”字上。毛泽东同志说,“老九”不能走^[10]。这就对了。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有的同志提出,应当有奖惩制度,这个意见也对。但是要补充一点,就是重在鼓励,重点在奖。有的人在科学研究上很有成就,为我们国家作出了贡献,这样的人要不要鼓励?我看要。有的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埋头苦干,应当鼓励。如果这也成了一条罪状,那怎么行?他们可能有些缺点,领导工作者要经常同他们谈谈心,政治上思想上帮助帮助。不要求全责备。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需要有适当的惩处。但不要强调惩处,要强调帮助,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帮助他们进步。

对知识分子除了精神上的鼓励,还要采取其他一些鼓励措施,包括改善他们的物质待遇。教育工作者的待遇应当同科研人员相同。假如科研人员兼任教师,待遇还应当提高一点,因为付出的劳动更多嘛。讲按劳分配,无非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个问题从理论到实践,有好多具体问题要研究解决。这不仅是科学界、教育界的问题,而且是整个国家的重大政策问题。

第三,关于体制、机构问题。

座谈中反映比较强烈的,是要求有一个统管科学工作的

机构。教育有教育部管,科学方面大家提出要恢复国家科委。应当肯定,过去国家科委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是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听了聂荣臻^[30]同志的汇报后批准了的。就在那次汇报会上,毛泽东同志讲到要打科学技术这一仗,不打好这一仗,生产力无法提高。过去国家科委搞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的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这个规划到一九六二年就基本完成了,后来只搞了十年规划。我总觉得科学、教育目前的状况不行,需要有一个机构,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安排,统一指导协作。重建国家科委,这个意见我个人比较赞成。什么时机合适?怎样组成?是否把军队方面的科研也统一管起来?这些问题要经过中央、国务院研究,暂时不作结论。但不管采取什么组织形式,都要搞统一规划。规划中,不单是确定研究项目,对研究机构的调整,哪些该合,哪些该分,也都要考虑。高等学校的专业,哪些要合,哪些要分,哪些要增加,哪些要减少,哪些要取消,也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军事方面的科学研究也要纳入规划。我国现在科研人员少,队伍小,比不上那些发达的大国,这点我们要承认。美国科研队伍有一百二十万人,苏联前年的资料是九十万人,现在又增加了。我们是二十多万人。但是,正像有的同志说的,只要我们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力量统一地合理地组织起来,人数少,也可以比资本主义国家同等数量的人办更多的事,取得更大的成就。这次科学院起草了一个发展科学技术的八年规划,也许还要按照大家意见补充,但是有总比没有好。这个规划中央打算先不批发,由科学院发下去试行。

科研部门、教育部门都有一个调整问题。希望这个调整搞

得快一些,哪怕不完善也可以,以后逐步改进。调整当中,具体问题很多,第一位的是配备好领导班子。我提出一个单位有三个人要选得好。党委统一领导,书记很重要,一定要选好,这是第一个人。第二个是领导科研或教学的人,要内行,至少是接近内行或者比较接近内行的外行。还有一个管后勤的,应当是勤勤恳恳、扎扎实实、甘当无名英雄的人。有了这样的三把手,事情就比较好办了,下面单位的调整,计划的执行等等,就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了。

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高等院校,应当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31],这一点要定下来。它们有这个能力,有这方面的人才。事实上,高等院校过去也承担了不少科研任务。随着高等院校的整顿,学生质量的提高,学校的科研能力会逐步增强,科研的任务还要加重。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我们现在还不能让所有的高等院校普遍加重科研的分量,但是重点大学都要逐步加重科研的分量,逐步增加科研的任务。从科研队伍的数量来说,若干年后,学校的科研机构也许同专业研究机构大致相等。生产部门的科研队伍恐怕是最大的。科学不是划分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吗?生产部门也会有搞基础科学的,但要着重搞应用科学,科学院和大学可以多搞一些基础科学,但也要搞应用科学,特别是工科院校。

要保证科研时间,使科研工作者能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研上去。会上提出一周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我加了

“至少”两个字,你们又加上“必须”两个字。好!科学院文件下发时就加上这四个字。我看,有人一头钻到科研里面,应当允许。有人七天七夜搞科研,为什么不可以?

体制搞得合理,就可以调动积极性。要争取时间,快一点调整好。

第四,关于教育制度和教育质量问题。

教育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就高等教育来说,大专院校是一条腿,各种半工半读的和业余的大学是一条腿,两条腿走路。在大专院校中先集中力量办好一批重点院校。重点院校除了教育部要有以外,各省、市、自治区和各个业务部门也要有一点。

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学,中学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重视中小学教育。要树立好的风气。讲风气,无非是党风、军风、民风、学风,最重要的是党风。好的党风也要体现在教育中,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学风。现在我们的青少年中,有些人有些坏的风气。改变这种风气,要从小学教育开始。建国以后相当一段时间,整个社会的风气、秩序和纪律是好的。学生自觉地遵守纪律,可以经常看到红领巾拿着喇叭,维持交通秩序。后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风气不好了。要数罪状,把一些青少年带坏,是“四人帮”的一条很大的罪状。我们现在要把风气扭转过来,这就要求学校培养好的风气。要有爱劳动、守纪律、求进步等好风气、好习惯。教师有责任把这些好风气带动起来。教师要成为学生的朋友,与学生的家庭联系,互相配合,共同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全面发展。毛泽东同志主张要

德、智、体全面发展嘛。中小学都要这样做。

要研究如何提高教师的水平。前几年教师不敢教,责任不在他们。现在要敢于教,还要善于教。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加强师资培训工作。要请一些好的教师当教师的教师,大学教师要帮助中学教师提高水平。在座的好几位同志就这样做过,效果很好。要把师资培训列入规划,列入任务。只有老师教得好,学生才能学得好。当然教与学有相互作用。现在学生中出现的某些问题,有多种原因,有社会原因、家庭原因,其中也与老师善于不善于教学生、带学生有关。要提高教师的水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

教育制度中有很多具体问题。一个是学制问题。是否先恢复小学五年,中学五年^[32],以后再进一步研究。现在意见还不一致,这关系不算太大。关键是教材^[33]。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一个是恢复放假制度。在假期,要把学生的活动搞得生动活泼,多样化。有的学生还可以补补课。要让教师休假,给教师以恢复疲劳、思考问题、总结经验的时间,给他们以休整的时间,不能把他们的假期时间都给占用了。搞好劳逸结合,不仅不会降低而且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一个是高等院校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的问题。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还有个跳级、留级问题。这涉及的只是少数人。我个人倾向于允许跳级。这样,人才出得更快嘛。可以先找点学校试试。留级的问题要慎重。要尽可能把全班的学生教好,一次考得不好,还可以补考,不要轻易留

级。必须留级的,也要做好工作。对于表现太坏又屡教不改的,要开除学籍。流氓、阿飞根本不好好学习,你不开除,他就会把整个学校的风气搞坏。学校要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做到家。对表现不好的要多做工作,对屡教不改的处理也要慎重。要找出各种方式,多做转化工作,把不好的转变为好的或者比较好的。

第五,关于后勤工作问题。

后勤工作的任务,就是要为科研工作、教育工作服务,要为科研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教育工作。后勤工作包括提供资料,搞好图书馆,购置和供应器材、实验设备,建设中间工厂,也包括办好食堂、托儿所等等。搞后勤的要学会管家,学会少花钱多办事。有些问题的解决本来是轻而易举的,但是“四人帮”横行时一直无人去解决。一些科研人员到处去跑器材,耽误事情,浪费时间,是一种很大的损失。现在一定要有一批人搞后勤工作。这些人要甘当无名英雄,勤勤恳恳,热心为大家服务。后勤工作也是一门学问,也需要学习,也能出人才,不钻进去是搞不好的。

要调动科学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光空讲不行,还要给他们创造条件,切切实实地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当然,一谈到这方面,就会遇到许多困难。对于这些困难,要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加以解决。比如说,在科研队伍中,可以先解决一些比较有成就、有培养前途的人的困难。这些人不限于是老同志,还有中年、青年同志。“长江后浪推前浪”,在科学研究上,也往往是青年人赶过老年人,我们的老同志应当高兴地帮助青年人赶上来。对于那些与爱人分居两地的业务骨干,要优

先把他们的家搬来。当然,不是说所有两地分居的人都能马上解决,这要修建许多宿舍,还得分别轻重缓急。

外交部反映,有一批华裔学者要求回国。周恩来同志过去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要创造条件,盖些房子,做好安置他们回国的准备工作。他们回国总要有个家,总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吧!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我们还要请外国著名学者来我国讲学。同中国友好的学者中著名的学者多得很,请人家来讲学,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为什么不干?

现在国家还有困难,有些实际问题一下子还解决不了。我个人认为,科研、教育经费应该增加。但不能希望马上增加很多。要在困难条件下,尽力把工作做好。原来条件比较好的,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尽快把工作搞上去;原来条件比较差的,要逐步改善。那些必须解决而且也能够解决的困难,要抓紧解决。

第六,关于学风问题。

培养好的风气,最主要的是走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特别是科学,它本身就是实事求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是不允许弄虚作假的。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在学风方面出了不少问题,例如压制讨论、互相封锁等。我们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论、讨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讨论当中可能会出来一些错误的意见,也不可怕。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任何一项科研成果,都不可能是一个人努力的结果,都是吸收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

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凡是搞封锁的,就说明他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有的产品制造技术,国外早就有了,在国内还自己封锁自己,这种现象要坚决克服。

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现在纸张很紧张,而浪费纸张的现象又很严重,有些不必印的东西印得过多,该印的东西却不给印。合理安排很重要。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各级党委领导机关少发文件,多到下面跑跑。如果实行这一点,可以省出很多纸张。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现在有的著作按目前的出版情况,要许多年才能印出来,这样就把自己捆死了。

学风里面问题很多,不可能都讲到。所以要提出这个问题,是想培养一种好的学风,形成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国的科学教育事业兴旺发达起来。

军队要把教育训练 提高到战略地位^{*}

(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四个现代化,有个国防现代化。军队目前存在着相当多的问题。很多同志担心,军队能不能顺利地实现现代化?还有同志担心,军队经过林彪、“四人帮”这样久的破坏,如果不很快整顿,遇到敌人进攻还能不能打仗?这些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这就提出一些问题:军队怎样整顿,怎样准备打仗,怎样把军队搞好。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到国防现代化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从何着手呢?

当然,调整各级领导班子,包括毛泽东同志讲的交流干部,是首先要做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九七五年那一次的调整,陷进帮派活动中去的人会更多,受害的干部也会更多。那次调整,保护了一部分干部。但是那次调整的面太窄,还有些应该调整的没有调整,应该交流的没有交流。调整、交流是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倡、多次指示的,本来是应该接着做下去的,我们没有来得及做,就停下来了。

我这里讲的从何着手,是讲除了调整领导班子以外,还有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哪些问题需要考虑解决呢？一九七五年开军委扩大会议的时候，在我的讲话中提出一个原则，就是在没有战争的条件下，要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我们的军队过去是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锻炼成长的，那时提升干部主要靠战场上考验。现在不打仗，你根据什么来考验干部，用什么来提高干部，提高军队的素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还不是要从教育训练着手？要把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这个方针具体化。要从两个方面去做。

一个方面是部队本身要提倡苦学苦练。军队由于过去一段时期的混乱，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纪律废弛，作风不好，在人民中威信下降。现在地方上不大欢迎军队的干部，当然不是对所有干部都不欢迎。我们解放军要有自知之明，要靠自己恢复名誉。部队要加强政治教育，加强纪律性，要从勤学苦练当中学本领。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也要从苦练当中恢复和培养起来。军队要能打仗，靠提高政治觉悟，靠勤学苦练。不苦练不仅不能提高本领，还会出事故。从战士到干部都要苦练。干部，包括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在苦练中增长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比如连队指导员，要在苦练中学会当好指导员。好多事故都要防患于未然。否则问题明明出来了，连长不懂得怎么搞，指导员不懂得怎么搞，甚至还会使矛盾激化。一个连长、一个指导员，不知道每一个兵的情况，当什么连长、指导员！一个军长，不懂得连队，怎么指挥你这个军！更不要说师、团干部了。所以军、师、团的干部，要下连队当兵，懂得自己的连队。部队训练还包括现代化战争知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的内容。通过学习、拉练、演习，可以提高各级干部的素质。对连队来说，学

硬骨头六连是对的,因为硬骨头六连的作风不只是一个连队的作风,所有的连队以至各级干部都应该像他们那样勤学苦练,有他们那种政治思想。但是,单单学习硬骨头六连还不够,还要努力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和其他许多必要的政治文化科技知识。以上是谈部队的训练。部队训练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大家可以议一下。

另一方面是通过办学校来解决干部问题。要看到我们各级干部指挥现代化战争的能力都很不够,不要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承认我们哪些方面有点,哪些方面还不足,这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克服弱点、克服缺点的起点。比如我们的国家,承认自己哪些方面落后,这就有希望。我们有一段时间不承认这一点,吃了亏。现在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差很长的一截。要承认我们军队打现代化战争的能力不够。要承认我们军队的人数虽然多,但是素质比较差。我们军队的素质在战争年代是很好的,在抗美援朝^[3]时也是很好的。老实说,有那样的素质,就是用现有的武器,也可以打仗,也可以学会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条件,打败强大的帝国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由于遭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我们军队的素质确实不如以前了。特别是各级干部的指挥、管理能力弱。指挥现代化战争,包括我们老同志在内,能力都不够。要承认这个现实。

要把原有的学校,除个别的外,基本上恢复起来。把更多的干部放到学校去训练。现在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很少,要增加。从抗日战争开始,我们就感到政治干部缺,解放战争也感到政治干部缺。选军事指挥员比较容易,选政治干部就比较

难,至少过去第二野战军是这样。我相信这是一个全军的情况。抗日战争时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现在合格的连指导员有多少?合格的营教导员有多少?合格的团政治委员、师政治委员、军政治委员有多少?有同志反映: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政治干部上当受骗甚至陷进去的,从数量上说,比其他干部多。这如果是事实,就很值得我们警惕。部队连以上政治干部的数量同军事干部的数量几乎相等,所以,训练政治干部的学校要增加。增加的方法,也可以一个学校既训练军事干部又训练政治干部,也可以专门办政治学校。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还有,各军兵种的技术专业学校,都要恢复起来,如果不够,可以增加,有些也可以合并。

学校怎么办?我想对学校提出三个要求。第一,训练干部,选拔干部,推荐干部。用形象化的语言说,就是各级学校的本身要起到集体政治部的作用,或者说起到集体干部部的作用。第二,认真学习现代化战争知识,学习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不但高级干部要学,连排干部也要学,都要懂得现代化战争。我曾经讲过,现在当个连长,不是拿着驳壳枪喊个“冲”就行了,给你配几辆坦克,配个炮兵连,还要进行对空联络、通信联系,你怎么指挥?一个连是这样,更不用说营、团、师、军了。第三,恢复我们军队的传统作风。概括地说,这种作风就是艰苦奋斗的作风,实事求是的作风,群众路线的作风。要在学校里培养这种作风,并把它带到部队,发扬光大。不能像前些年办学校的办法,要讲一点有用的东西。提出这三个要求,够不够?大家研究一下。

学校有各级的：高级、中级、初级。高级的有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现在的军政大学要分开。海军、空军也有高级的学校，各特种兵、技术兵种也有高级的学校，还有中级的、初级的。一个师有教导队，训练班长和排干部。大军区训练营连干部。高级学校训练团以上的干部。大体上这样区分是适当的。

办学校要达到上面讲的三个要求。我个人设想，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要达到一个目的：使干部队伍水平提高，能力加强，比较年轻化，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更要年轻些，使我们的干部能够掌握一些现代化战争知识，并且有好的作风。通过学校推荐的干部，一是要有现代化战争的军事知识和指挥、管理能力，二是要有好的思想和作风。基本上按这个要求，更新我们的干部，特别是战斗部队的干部。

办学校需要有准备。什么准备呢？首先，是办什么学校，办在什么地方。没有校址怎么办？校址问题，既然延安窑洞都可以办，为什么我们不能搭起帐篷来办呢？或者用简陋一点的房子来办呢？其次，还要选好办学校的干部，包括教师，这个很重要。这些干部比现职干部还重要，要选最优秀的，特别是能深入实际、努力工作、艰苦奋斗、以身作则的干部。办学校的人要了解学员，否则他怎么推荐干部呢？怎么起到集体政治部、干部部的作用呢？办学校的干部要精选，凡是适合办学校的干部，宁肯从现有工作岗位上调出来。第三，是教材问题。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我跟军事科学院、军政大学的同志谈过，请他们主持把教材编出来。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化战争的知

识,坦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第四,要选好学员。招收什么样的人,调什么干部来学?要调好干部来学。高级学校的训练对象要稍微改动一下。现在军政大学训练的基本上是军师干部,团的干部只占百分之二十。以后团的干部的比重要增加。我建议高级学校的学员应该以团的干部为主,加上一部分优秀的营的干部,同时训练军师干部。现在有不少的团的干部打过仗,抗美援朝时当过班长,也有当过连排长的。营的干部打过仗的恐怕就少了,但营一级有优秀的干部。特种部队打过仗的营的干部还不少。

为什么提出学员要以团的干部为主呢?就是为了能使作战部队指挥员年轻化或比较年轻化。我设想,到五年以后尽最大可能达到这一点。政治干部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但也不能太大,大三四岁可以。前年我就讲过,连指导员的年龄可以稍大一点,多积累些经验,可以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由此类推,各级政治干部的年龄比军事干部的可稍微大一点。军事指挥员要年轻一点,但不排除个别身体好的人年龄也可以大一点。各级军事学校,教学时间的比例,可以三七开,军七政三。要认真学习军事知识,如飞机、坦克的型号、性能,怎么样对付,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怎样指挥等等。政治学校,四六开,政六军四。政治干部要学军事。教师很重要,要选好,要有一个好的教学队伍。学校领导干部可以兼课,大军区和所属部门的领导同志也都可以兼课。

对于在学校学习得好的,指挥、管理能力比较强的,现代化战争知识学得比较好的,而且思想作风又好的干部,学校可

以推荐,营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团,团的干部可以提拔到师。当然,大量的干部还要回到原工作岗位,因为我们只有那么多军、那么多师。在部队搞两年,再把这一批优秀的师干部、团干部“回炉”一年,调回来再学习,主要是加深现代化战争知识,然后把好的师的干部提拔到军,好的团的干部提拔到师。这样就可以在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实现作战部队干部的年轻化。海军和空军的指挥员也应该这样。

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九日)

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34]修改、张春桥^[25]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纪要》里讲了所谓“两个估计”,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35];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问题究竟怎么看?建国后的十七年,各条战线,包括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战线,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路线占主导地位,唯独你们教育战线不是这样,能说得通吗?《纪要》是毛泽东同志画了圈的。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36]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

了。《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大家知道,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对毛泽东思想就不这样?也应该如此嘛,否则非犯错误不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怎么能把几百万、上千万知识分子一棍子打死呢?我们现在的人才,大部分还不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原子弹是一九六四年搞成功的。氢弹虽然是一九六七年爆炸的,但也不是一下子就搞出来的。这些都是聂荣臻^[30]同志抓那个一九五六年制订的十二年科学规划打下的基础。你们的思想没有解放出来。你们管教育的不为广大知识分子说话,还背着“两个估计”的包袱,将来要摔筋斗的。现在教育工作者对你们教育部有议论,你们要心中有数。要敢于大胆讲话^[37]。我在八月八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那篇讲话,是个大胆的讲话,当然也照顾了一点现实。对我的讲话,有人反对,这不要紧。一个方针政策,总会有人反对和不同意的。他们敢讲出来就好,可以开展辩论嘛!

一九七一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一九七二年,他和一位美籍中国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这是要教育部门转弯子,但是教育部门没有转过来。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

性。十八岁到二十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过去我和外宾也讲过,中学毕业后劳动两年如何如何好。实践证明,劳动两年以后,原来学的东西丢掉了一半,浪费了时间。采取直接招生的办法,并不是不要劳动,劳动可以在中小学就注意。从青少年起教育他们热爱劳动有好处。到大学以后,重点是结合学习搞对口劳动。到农村劳动也可以搞一点,但不能太多。

毛泽东同志的七二一指示^[38]要正确地去理解。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各省自己去搞,办法由他们自己定,毕业生不属国家统一分配范围。但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恐怕不能这样办,并不是所有大学都要走上海机床厂的道路。毛泽东同志一贯强调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来没有讲过大学不要保证教育质量,不要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不要出人才。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我知道科学、教育是难搞的,但是我自告奋勇来抓。不抓科学、教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成为一句空话。抓,要有具体政策、具体措施,解决具体的思想问题和实际问题。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

要健全教育部的机构。要找一些四十岁左右的人,天天到学校里去跑。搞四十个人,至少搞二十个人专门下去跑。要像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

督计划、政策等的执行,然后回来报告。这样才能使情况反映得快,问题解决得快。可以首先跑重点大学,跑重点中学、小学。这些就是具体措施,不能只讲空话。

工宣队^[39]问题要解决,他们留在学校也不安心。军队支左^[5]的,无例外地都要撤出来。学校里这些问题不解决,扯皮就扯得没完没了。

重点大学搞多少,谁管,体制怎么定,我看,重点大学教育部要管起来。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双重领导,以教育部为主。教育部要直接抓好几个学校,搞点示范。学校每周学习时间多少,政治活动时间不能超过多少等等,这些都要具体化,教育部要干预。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师范大学要办好。省、市管的师范院校,教育部也要经常派人去检查。不办好师范教育,教师就没有来源。

大学学制本科一般定为四年,这个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了。医科不同,可以长一些。还有个别专业也可以长些。所谓四年,基础课恐怕要两三年。基础打得不好,搞科研是有困难的。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情况。

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科学研究机构已经确定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并决定恢复科研人员的职称。这是很大的决策,解决了很多重要的问题,会引起震动,会影响到教育、工业等方面。教育部门要紧紧跟上。大专院校也应该恢复教授、讲师、助教等职称。多年来,许多同志考虑恢复职称的问题,这次中央在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科研、教育的后勤部门,工作量大,政策性强,十分重要。大学里应当有一批热爱本职工作、勤勤恳恳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人,把这方面的工作管起来,使教学和科研人员能够集中精力做好业务工作,不要让他们为了设备和工作条件问题到处奔跑。

要加强学校的教师队伍,科研系统有的人可以调出来搞教育,支援教育。搞教育是很光荣的,要鼓励大家热心教育事业。对科研系统抽出来支援教育的那些同志,教育部要在政治上、物质上安排好。今后我们要很好地研究科研和教育如何协调、人员如何经常交流的问题。人员不流动,思想就会僵化。外国科研机构很注意更新科研队伍,经常补充年轻的、思想灵活的人进来。我们也要逐步实行科研人员流动、更新的制度。要注意发现人才。现在有些人的成就外国人都公认,我们反而不了解,说明我们的一些制度有缺陷,不能发现人才,要认真改进。

教育要狠狠地抓一下,一直抓它十年八年。我是要一直抓下去的。我的抓法就是抓头头,抓方针。重要的政策、措施,也是方针性的东西,这些我是要管的。教育方面有好多问题,归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

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在中央军委 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这次军委会议,充分肯定了一九七五年的军委扩大会议,认为那次会议是正确的,是一次重要的会议。那次会议,涉及的内容很多,主题是讲整顿。当时设想,从整顿着手,也就是先从调整配备领导班子着手,把军队整顿好。这个问题解决了,然后再解决装备问题,因为装备问题不抓不行。再就是战略问题,没有明确的战略方针,好多事情都不好办。

这次军委会议,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40],还要通过九个决定、条例^[41]。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会议,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坏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

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作决定,大家举手赞成容易,可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有的事情原则上赞成,一遇到具体问题,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高级干部办到了,全军就容易办到。高级干部办

不到 ,就会一风吹 ,一切照旧。

下面我讲五点。

一、关于揭批“四人帮”和整顿领导班子的问题。

军队的揭批“四人帮”运动 ,总的情况是好的。多数单位的运动正在逐步深入 ,发展是健康的。但是有些单位的运动没有深入下去 ,有的刚刚开始揭问题 ,有的问题不少 ,拖着不解决 ,有的还在捂盖子。总之 ,发展是不平衡的。运动没有搞开的单位 ,首先是要领导带头 ,放手发动群众 ,不要用框框来束缚。因为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 ,你晓得有什么问题呢 ?运动搞得比较深入的单位 ,领导就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特别注意掌握政策。对人的处理 ,要取慎重态度 ,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要扩大教育面 ,缩小打击面。对于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 ,一定要彻底查清。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工具。军队不搞好 ,军队干部不纯 ,祸害很大。所以 ,这一点对于军队极为重要。对犯了错误特别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 ,一定要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 ,并给他们创造条件 ,改正错误。要帮助他们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 ,把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讲清楚 ,取得群众的谅解 ,然后给以适当的处理。不能因为是人民内部矛盾就不揭不批 ,让他们滑过去。如果这样 ,会留下后患 ,以后还会闹“地震”的。而且这也不是真正爱护干部 ,是害了干部 ,因为他自己得不到教训。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些人 ,滑过来 ,滑过去 ,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误 ,就是没有得到教训嘛。对“四人帮”的死党中死不改悔的人 ,毫无疑问要坚决打击。“四人帮”的死党和他们帮派体系里的人 ,有的愿意改悔 ,而又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罪行 ,并且证明说的是真话 ,

对这种人应该实行从宽处理的政策。对那些错误严重、态度又坏的人,不能重用,也不应该保留他原有的级别和待遇。

在调配领导班子时,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人,当然不能让他们进来。那些风派、溜派以及搞“地震”的人,那些错误严重而又态度很坏的人,那些有问题没有查清的人,也不能让他们进领导班子。还有些人也不能进领导班子或者不能重用,例如,搞法西斯专政、称王称霸的;搞打砸抢的(当然不一定是大干部,“四人帮”用了那么一些“小螃蟹”,专门搞打砸抢,还搞特务活动,安“钉子”);投机钻营、招摇撞骗的;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好搞宗派活动的;玩弄权术,专门整人的;耍小聪明,搞小动作,不老老实实的;革命意志严重衰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等等。就是说,我们配备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配备一、二把手的时候,只注意同“四人帮”阴谋活动有没有牵连的问题还不够。还有另外一种人,同“四人帮”没有什么牵连,或者有点牵连也并不大,但是政治品质不好,思想体系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其中有些人干了很多坏事,民愤很大,实际上是坏分子。这种人不仅不能进领导班子,也不能留在军队。现在有些领导同志对这类人认识不够,要引起重视。这里不单是指选老干部,选年轻人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可得要选准,因为将来是他们当家啦。选得不准,教训不少啊。

我们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干部。对于那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表现很好,只是在一段时间做了一些错事、讲了一些错话的同志,应该通过适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所谓历史地看干部,不仅要看他过去的历史,也要看他同林彪、“四人帮”斗争中的表现。有的人先是跟着林彪,后来又跟

着“四人帮”干坏事、犯错误,这也是历史嘛!我们军队的老同志很多,总的讲,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非常朴实、正派。当然现在也有少数人有点变罗。所以,看人是不容易的啊!一定要在斗争中观察、识别干部,选择得当。

我们今后配备领导班子的时候,要选用什么人呢?要选那些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经得起考验的人;要选那些党性强,能团结人,不信邪的人;要选那些艰苦朴素,实事求是,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作风正派的人;要选那些努力工作,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有魄力,有实际经验,能够办事的人。现在我们的领导干部年龄都比较大了,五年以后,五十岁以下的人,打过仗的就很少了。所以,我们这些老同志,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抓紧搞好传帮带。

一九七五年我提出整顿领导班子的软、懒、散。经过两年的实践,特别是从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看,软,就是怕字当头,丧失原则,顶不住,跟着别人跑;懒,就是意志衰退,不读书,不看报,不动脑筋,不下部队,好吃懒做;散,就是争权夺利,搞不团结,捏不到一起。有的人老以为自己一贯正确,闹新的山头主义,任人唯亲,用自己的好恶作标准来看干部,对自己好的就拉过来,不好的就排挤,总想自己搞一帮人,总以为不搞一帮人就办不成事情。这些年,有的人就学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套。领导班子要抓紧整顿,迅速改变软、懒、散的状况。

这里我还要讲一个肿字。过去不是讲五个字吗,肿、散、骄、奢、惰,第一个字就是肿。这个肿,我们还没有很好解决;我们新的编制也没有很好解决;在执行规定的编制时,更没有要求大家注意精简,不许超编。尽管我们部队这样大,但连队并

不充实,而各级机关却十分庞大,臃肿的情况很严重。现在一提出要解决什么问题,就要增加机构,增加人,这不行。还有的从下面抽人,搞这样那样的办公室。为什么原来的机构不用呢?当然也有的原来的机构不能用,要抓紧调整。这次按确定的编制定额精简,以后还有没有精简的问题,还有。以后精简,主要是精简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机关,首先是总部和军兵种、大军区、省军区的机关。当然,这次精简以后,定额确定以后,就要稳定一个时期。

现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干部,已经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交流,除个别人外,也要稳定一个时期。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调整军师级干部。在总政治部领导下,各大军区、军兵种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办好。这里讲的军师级干部,不单是战斗部队的军师级干部,还有总部、军兵种、各大军区的军师级干部。调整这两级班子时,要特别注意政治机关的干部部门,要选一些好同志,选作风正派、不信邪的人,敢于想问题、讲问题的人。调整时,还要注意选配好这些部门的领导骨干,发挥职能机构的作用。

二、关于形势问题。

国内形势确实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大意,还要看到困难,看到问题,看到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的地方问题成堆。有了正确的方针,还要有有力的措施,有效的政策,继续解决存在的问题。军队也是这样。当然,我们是有信心的,只要我们认真对待,一定可以搞好。在小组讨论中,有的同志说,如果搞得好,也可以争取早一点把军队整顿好。我也相信这一点。军队有一个长处,它是很集中的一个组织,行动起来快。

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42〕}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就是要抢时间。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我们要防备别人早打、大打。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件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是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来怎么办?应该说,现在我们能打。首先,要抓紧把工事检查一下。要准备弹药。打仗没有弹药毫无办法。过去我们的弹药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现在要是打起来从哪里缴?所以自己要搞后勤。不管现在打也好,将来打也好,都要有工事,有弹药。还要抓紧部队训练,提高战斗力,提高士气。现在世界上有人说,什么都是技术决定,不要完全迷信这个。当然,我们也要讲究技术,不讲究技术是要吃亏的。但是,把电子计算机看成能代替全部指挥职能,那不可能,那样人的能动性也就没有了。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我们有这样多人口,军民团结一致,敌人要消灭我们的人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一定要争取有更多的时间,把装备搞上去,把部队的教育训练搞好,这样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我们能够争取比较长一点时间不打仗,对我们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对我们

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对我们的备战工作,都是有利的。这里我想说一下,即使能够争取十年二十年时间实现我军装备的现代化,那时我们同敌人比较起来,武器装备也仍将处于劣势。我们在前进,敌人也没有睡觉嘛。因此,到那个时候,如果打起来,我们还是要以弱胜强,这种基本状况还不能够完全改变。我们历来的经验,就是用劣势装备打败优势的敌人,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战争,是人民战争。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总之,仗总可能有一天要打起来。我们绝不能浪费时间,要加紧备战工作,特别是要训练干部学会指挥现代战争。这一点我们可要有自知之明。指挥现代战争,随着我们装备的现代化,我们的干部包括在座的老同志,指挥能力够不够?不要以为我们过去打了很多漂亮仗,立了很多战功,就觉得自己行。新的武器装备一来,行不行呀?懂不懂呀?指挥能力够不够呀?就是自己行,下面的人行不行呀?你不训练,就是不行。所以要努力提高干部指挥现代战争的能力。这是一点。再一点是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但这里有个条件,请大家注意,就是要根据可能。国家只能拿出那么多钱,用于军事方面多少,还要进行综合平衡。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弄得好一些,就可以在现有的国力下加速改进军队的装备。

三、关于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的问题。

军队的教育训练,有两个决定,一个是对学校的,一个是对部队的。在这里我不多讲了。现在的问题是,军队本身要加强教育,加强干部训练。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军队有些干部

到地方不大受欢迎,也确实不像过去那样顶用。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过,军队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在新的条件下,我们重新强调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显得特别重要。当前有几十万干部要转业。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工作中断了两年。今后每年也将有大批干部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从军事战线转到社会主义建设各条战线。如何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的任务呢?办法就是为他们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在教育训练上要增加这方面的内容。我们说,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就包括把军队办成一个大学校,使干部既学到现代战争知识,又学到现代科学知识和生产知识,还要学会做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这样,我们的军队干部既能在军队建设中发挥作用,到地方上也能发挥作用,打起仗来,又可以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就成为军队和地方都合用的干部。

对干部的教育训练,要使他们学好马列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懂得现代战争知识,有好的思想作风,有强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还要使他们学点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和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学点历史、地理、外语;有条件的,还要使他们学点专业技术,比如开汽车、开拖拉机,并且懂点原理。我们军队里具有多种知识和一定专业技术的人以后会慢慢多起来。这些问题,主管教育训练的部门要作出规划,提出落实的具体措施。毛泽东同志提倡干部学多种知识。这些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使得一些干部知识很简单,有些还学坏了,到地方不太受欢迎。我们在教育训练中给干部创造到地方工作的条件,这对国家建设有利,对军队建设和战备也有

利。

当前,有一大批干部要转业到地方。对这些干部,需要办训练班,组织参观,请地方同志介绍经验,让他们接触工业、财贸、政法、文教等方面的知识。凡是要转业到地方的干部,都可以这样做。

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对战士的教育训练要做到一兵多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还要学点数理化,学点工农业知识,学点外语。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是要求每一个战士都要学到。如能调配适当,组织得好,学到那么一点知识,就很有用处。毛泽东同志曾要八三四一部队的战士学文化,做社会调查。现在的战士,中学生占的比例是很大的,如果在服兵役期间,经过训练,水平提高了,作风又好,到地方就会发挥很大作用,地方上也就比较欢迎。

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现在一个团的干部到工厂,不要说大工厂,就说中小工厂吧,当个厂的领导行不行?看来有些人可能不行。按资历来说,能指挥一个团,如果好好学点知识,学点本领,锻炼一下,当个中小工厂的领导,大厂的车间领导,应该说是可以的。要创造这样的学习条件。当然,到地方也可以学,也可以做政治工作,做管理工作,但不能都做政治工作、管理工作,容不下嘛。总要有一些做技术工作的,所以要学会多种知识。要使我们的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以后,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现在有不少干部,不会管理部队。连队干部不会管连队。好多

事故都是因为不会管理,不会做工作,不会做人的工作,不会做思想工作,使矛盾激化而发生的。这个问题我们多次讲过。团的干部、师的干部怎么样?不少人也不大会管理部队。要把部队管理好,就要提高管理能力。所谓管理得好,主要是做好人的工作。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好多北方的干部到了南方,我们有些连级干部去当县委书记,当得不错嘛。那时有个条件,就是艰苦奋斗,联系群众,作风好,不浮夸,听指挥,能执行上面的指示、命令,即使文化水平不高,工作也能胜任。现在不同了,军队有些干部相当老大,自己觉得了不起。一九七五年我讲过“雷锋叔叔不在了”,“四人帮”对此大肆攻击、诬蔑,其实这不是我的话,是老百姓的话。政治工作本来是我们军队最擅长的,现在有些人到了地方却不会做政治工作。所以,军队的教育训练要为干部到地方工作创造条件。你不在军队里创造条件,到地方上就不受欢迎。当然,地方上也有安置不当的事,地方的同志也要注意这个问题。

四、关于纪律问题。

这个问题有个专门决定。我想再强调一下。

军队非讲纪律不可,纪律松弛是不行的。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最后几年,特别强调这个问题,亲自领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是好多同志都知道的。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八大军区司令调动时,十天都到了职。毛泽东同志是相当了解这几年军队的状况的。纪律问题一九七五年提过,并没有解决,又耽误下来了。要重申这个问题,这是传帮带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这个军队,历来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强调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不这样,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

的敌人吗？能够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吗？能够加速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吗？现在有些干部对上面的指示不执行，命令不服从。这就是不守纪律！有的单位，个别人长期闹派性，有恃无恐，老虎屁股摸不得。为什么摸不得呢？有些干部调动工作，不合乎自己的要求就不服从命令。有个单位一九七五年要调一批人出去，这些人就是不走，还有个理由：你要我走，先把是非弄清楚。不服从命令，他还“理直气壮”，还像很有“道理”。对这种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他先执行命令，先走了再说。有意见可以提，可以保留。对不执行命令的，不走的，赶！有的开除军籍，有的降级，要执行纪律。如果军队连这一条都办不到，还叫什么军队！当然，决定一项事情，领导上要慎重，要注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命令是要执行的，指挥是要服从的。过去有好多派，闹派性，处理当然要慎重。以后不能以这个问题为借口，要严格军队的纪律。还有一些住大城市的，特别是在北京的干部，工作调动了，三令五申，家就是不搬。这怎么行呢？一般地讲，到哪里工作，家就应该搬到哪里嘛。

整顿军队必须严格整顿纪律。对这次会议的精神，对会议作出的各项决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要提倡顾全大局。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到底要顾全大局。军队干部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首先要从老干部开始，带头遵守纪律。前面讲了，一个是一切行动听指挥，一个是自觉遵守纪律。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当然，我们军队也要有民主，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

纪律。毛泽东同志历来提倡我们军队要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我们是党委领导,党委本身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是委员会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好好讨论。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有这种风气。我们高级干部应该参加党的小组生活。尽管党委本身有党的生活,可以起到互相监督、互相勉励的作用,但是,党委要很好注意高级干部参加党小组生活的问题。在连队,支部要发挥很好的作用,三大民主要坚持。政治民主当然要搞好。军事民主,教育训练方面,要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学习现代化科学知识,确实有好多要兵教官。兵里面有些人,科学知识比连长、指导员多,就得请他当教员,特别是技术部门。经济民主很值得注意。现在有些干部侵占战士的利益,这是不允许的。部队有经济委员会,要把这个组织好好健全起来,发挥作用。政治工作就要管这个事,要组织人查帐,要每月公布帐目。搞好三大民主,要从连队搞起,从各级党委搞起。

五、关于团结问题。

毛泽东同志说过,要团结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我们不要因为过去谁整过自己就记仇。对同志不要记仇,要不念旧恶。我们这些人不会没有缺点,有缺点要允许人家批评。我们这些老干部应该在这方面做出好样子来。当然这是说批评,不是说造谣诬蔑,攻击谩骂,那是不许可的。我们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共同揭批“四人帮”。只有这样,才能贯彻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团结犯错误的好同志。我们要反对那些搞帮派、搞宗派主义的行为,要反对任人唯亲。现在确实有那么一些人喜欢搞小圈子,很值得注意。有些人调

走了,还干预原来单位的工作,还去插手。为什么要这样干呢?有什么必要呢?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讲团结,必须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有的人口头上讲团结,而把党委内部一些不同的意见捅出去,加以歪曲,散布流言蜚语,拉一部分人支持自己。还有一些人喜欢搞挑拨离间。这些都是破坏团结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

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团结是胜利的保证。为了贯彻党的路线,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要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这是大局,我们要有这个大局观念。

这次会议赋予我们的任务很重,时间紧迫,要加强领导,做好规划,狠抓落实。首先要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好。这样,才能保证全军各项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全国科学大会 开幕式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八日)

同志们：

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我们大家感到非常高兴，全国人民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能够举行这样一个在我国科学史上空前的盛会，就清楚地说明：王洪文^[43]、张春桥^[25]、江青^[44]、姚文元^[34]“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科学技术工作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关怀。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和工农兵群众，积极开展科学实验活动。青少年中，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光明灿烂的前景。

出席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的，有来自各条战线的优秀科学技术工作者，技术革新的能手，科学种田的模范，忠诚于党的科学事业的干部。你们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科学技术的进步，辛勤劳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代表中共中央向你们表示感谢和敬意。

同志们！

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

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围绕着要不要四个现代化,我们曾经同“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激烈的斗争。“四人帮”胡说什么“四个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疯狂进行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他们真是要搞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吗?不,完全相反,正是在他们势力最猖狂的一些地方,社会主义遭到严重破坏。“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从反面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末,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

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就不可能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党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全国科学大会,目的就是动员全党全国重视科学技术,制订规划,表彰先进,研究加速发展科学技术的措施。今天,我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讲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对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认识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四人帮”曾经喧嚣一时,颠倒是非,搞乱了人们的思想。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45〕。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与生产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

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近三十年来,现代科学技术不只是在个别的科学理论上、个别的生产技术上获得了发展,也不只是有了一般意义上的进步和改革,而是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产生了并且正在继续产生一系列新兴科学技术。现代科学为生产技术的进步开辟道路,决定它的发展方向。许多新的生产工具,新的工艺,首先在科学实验室里被创造出来。一系列新兴的工业,如高分子合成工业、原子能工业、电子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宇航工业、激光工业等,都是建立在新兴科学基础上的。当然,不论是现在或者今后,还会有许多理论研究,暂时人们还看不到它的应用前景。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说明:理论研究一旦获得重大突破,迟早会给生产和技术带来极其巨大的进步。当代的自然科学正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应用于生产,使社会物质生产的各个领域面貌一新。特别是由于电子计算机、控制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正在迅速提高生产自动化的程度。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呢?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

大家知道,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科学

技术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是什么关系呢？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人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掌握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都大不相同。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我们的社会里，广大劳动者有高度的政治觉悟，他们自觉地刻苦钻研，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从而必将在生产中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承认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连带要答复一个问题：怎么看待科学研究这种脑力劳动？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末，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是不是劳动者呢？

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46]。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

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47]。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了。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有一个依附在哪张“皮”上的问题^[48]。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中,只要还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知识分子就需要注意解决是否坚持工人阶级立场的问题。但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四个现代化的进展,大量繁重的体力劳动将逐步被机器所代替,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体力劳动会不断减少,脑力劳动会不断增加,并且,越来越要求有更多的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造就更宏大的科学技术队伍。“四人帮”把今天我们社会里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歪曲成为阶级对立,正是为了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联盟,破坏社会生产力,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正确认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对于迅速发展我们的科学事业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我们既然承认了这两个前提,那末,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

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科学技术力量还很薄弱,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耽误了我们很多时间。

我们现在的生产技术水平是什么状况?十几亿人口搞饭吃,粮食问题还没有真正过关。我们钢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国外先进水平的几十分之一。新兴工业的差距就更大了。在这方面不用说落后一二十年,即使落后八年十年,甚至三年五年,都是很大的差距。

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49]在科学技术方面,我国古代曾经创造过辉煌的成就,四大发明对世界文明的进步起了伟大作用。但是我们祖先的成就,只能用来坚定我们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信心,而不能用来安慰我们现实的落后。我们现在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同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如实地指明这种落后状况,会不会使人们失去信心呢?这种人也可能有。这种人是连半点马克思主义气味也没有的。对于我们无产阶级革命者来说,实事求是地说明情况,认真地去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才能够正确制订我们的战略规划,部署我们的力量;才能够更加激励我们奋发

图强,尽快改变这种情况;也才能动员人们虚心学习,迅速掌握世界最新的科学技术。

认识落后,才能去改变落后。学习先进,才有可能赶超先进。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

中国的革命,吸引着世界各国革命人民,与之共呼吸。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已得到并且必将进一步更广泛地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们要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加强同世界各国科学界的友好往来和合作关系。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建设宏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要有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大军,要有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造就这样的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重任务。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又红又专要有正确的理解,合理的要求。

“四人帮”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把既无知又反动的交白卷的小丑捧为“红专”典型，把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为祖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作出贡献的好同志诬蔑为“白专”典型。这种是非关系、敌我关系的颠倒，一度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很大的混乱。

毛泽东同志提倡知识分子又红又专，鼓励大家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世界观的重要表现是为谁服务。一个人，如果爱我们社会主义祖国，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应该说这表示他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按政治标准来说，就不能说他是白，而应该说是红了。我们的科学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致力于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作出贡献，这固然是专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红的表现。

二十八年来，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确有很大的进步。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努力同工农兵相结合，满腔热情地对待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做出了成绩。甚至在林彪、“四人帮”那样迫害和摧残知识分子的时候，广大科学技术人员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科学技术工作。许多人在同“四人帮”斗争中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四人帮”被粉碎后，他们迸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衷心拥护党中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更加奋发努力工作。这样的队伍，多么难能可贵！这样的队伍，就整个说来，不愧是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

我们作这样一个估计，当然并不是说，科学技术人员政治

思想觉悟都很高了,在思想上、作风上、工作上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了。而是说,从政治立场这个基本方面来看,绝大多数科学技术人员应该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的。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是我们党的一支依靠的力量。当然,他们不应该自满,不能就此停步不前,而要继续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不断求得新的进步。至于他们身上还存在着缺点错误,那是教育、帮助的问题,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没有缺点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政治工作干部,我们参加党几十年的老干部,不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吗?为什么对这些业务干部、技术专家却要特别苛求呢!对于科学技术人员中出身不好、历史上犯过错误或家庭、社会关系有些问题的人,我们应当着重看他们自己的基本政治态度,看他们自己的现实表现,看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贡献。

在科学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人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或者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较深,在尖锐、激烈、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常常摇摆不定。对于他们,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也要团结教育,发挥他们的专长,尊重他们的劳动,关心和热情帮助他们进步。毛泽东同志向来主张革命队伍的人越多越好,向来主张尊重那些有知识、有专长、有贡献的人,向来主张对犯过错误的人要一看、二帮,而不是嫌弃他们。我们一定要认真地实行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

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不断改造,研究新问题,接受新事物,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

思想的侵袭,更好地担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

科学技术人员应当把最大的精力放到科学技术工作上。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搞业务,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能有更多的时间更好。如果为了科学上和生产上的需要,有人连续奋战七天七晚,那正是他们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忘我精神的崇高表现,我们对于他们只能够学习、表扬和鼓励。无数的事实说明,只有把全副身心投入进去,专心致志,精益求精,不畏劳苦,百折不回,才有可能攀登科学高峰。我们不能要求科学技术工作者,至少是绝大多数科学技术工作者,读很多政治理论书籍,参加很多社会活动,开很多与业务无关的会议。林彪、“四人帮”动不动就用“脱离政治”的罪名来打击科学技术人员,谁要是努力钻研业务,就会被扣上“白专”帽子。白是一个政治概念。只有政治上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才能说是白。怎么能把努力钻研业务和白扯到一起呢?即使是思想上作风上有这样那样毛病的科学技术人员,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不能称为白。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为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辛勤劳动,怎么是脱离政治呢?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分工的。各行各业的同志在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的条件下,努力做好自己的岗位工作,这不但不是脱离政治,而且正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前几年,林彪、“四人帮”搞得工人不能做工,农民不能种地,解放军不能练兵,学生不能学习,科学技术人员不能钻研业务,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多么重大的损失!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我们还要在努力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的水平,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的同时,大力培养新的科学技术人才。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科学技术队伍发生了青黄不接的现象,这就使加速培养年轻一代的科学技术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了。

我们培养、选拔人才,有广阔的源泉,有巨大的潜力。最近,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发现了一批勤奋努力的、有才华的优秀青少年。看到他们的优异成绩,我们都感到高兴。尽管“四人帮”猖獗一时,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扑灭广大青少年的学习热情,没有能够扼杀广大教师为党为人民精心培育下一代的革命积极性。今天,党中央这样关注科学和教育事业,这样着力于培养选拔人才,我们可以预见,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科学的未来在于青年。青年一代的成长,正是我们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大的提高。教育事业,决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各级党委要认真地作为大事来抓。各行各业都要来支持教育事业,大力兴办教育事业。人民教师是培养革命后代的园丁。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应该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要确实保证教师的教学活动时间,要关心他们的政治生活、工作条件和业务学习。对于在教学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教师,应该给以表扬和奖励。

在人才的问题上,要特别强调一下,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和培养杰出的人才。这是被“四人帮”搞乱了一个重大问题。他们把有贡献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诬蔑为资产阶

级学术权威,把我们党和国家培养成长的优秀中年青年科学技术人员,诬蔑为修正主义苗子。我们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流毒,把尽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家,作为我们科学、教育战线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说过: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50〕}。革命事业需要有一批杰出的革命家,科学事业同样需要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我们工人阶级的杰出人才,是来自人民的,又是为人民服务的。在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才能不断涌现出杰出人才。也只有有了成批的杰出人才,才能带动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我们的科学家、教师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在科学史上可以看到,发现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对科学事业可以起多么大的作用!世界上有的科学家,把发现和培养新的人才,看作是自己毕生科学工作中的最大成就。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国家现在一些杰出的数学家,也是在他们年轻的时候,被老一辈数学家发现和帮助他们成长起来的。尽管有些新人在科学成就上超过了老师,他们老师的功绩还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问题,讲讲在科学技术部门的各个研究所中,怎样实现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

能不能把我国的科学技术尽快地搞上去,关键在于我们党是不是善于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工作作风都应该有相应的转变。

各级党委要真正做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一起抓。要广泛开展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做到在技术上、生产上不断有新创造和新纪录。全国有几十万个企业、几十万个生产大队,只有每个企业和生产大队都来大搞技术改造,大搞科学实验,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广泛地在工农业中得到应用,才能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同时,又要大力抓好专业科学研究机构的工作。专业的科学研究队伍,是科学工作的骨干力量。没有一支强大的高水平专业科学研究队伍,就难以攀登现代科学技术的高峰,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也难以持久深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发展。我们一定要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

中央规定,科学研究机构要建立技术责任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负责制。这是重要的组织措施。它既有利于加强党委的领导,又有利于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

科学研究机构的基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要出又多又好的科学技术成果,出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人才。衡量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党委的工作好坏的主要标准,也应当是看它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只有很好地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才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真正尽了自己的责任。

要完成这个基本任务,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做。不可能所有这些事情都由党委去抓,都由党委去解决。应当老实地承认,在科学技术工作中,我们有许多东西还不懂。即使懂得,也不能事事都由党委来办。要有分工负责,要从上到下建立岗位责任制。这样,工作才能有秩序,有效率,才能职责分清,赏

罚分明,不致拖延推诿,互相妨碍。

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的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要抓好科学研究计划,要知人善任,把力量组织好。为了实现科学研究计划,为了把科学研究工作搞上去,还必须做好后勤保证工作,为科学技术人员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这也是党委的工作内容。我愿意当大家的后勤部长,愿意同各级党委的领导同志一起,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科学技术的业务领导工作,应当放手让所长、副所长分工去做。不论是党内的还是党外的专家,担负了行政职务,党委就应当支持他们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他们真正做到有职有权有责。他们同样也是党和国家的干部,决不应该见外。党委应该了解和检查他们的工作,但是不能包办代替。

许多事情,比如对学术论文的评价,科学技术人员业务水平的考核,研究计划的制订,研究成果的鉴定,等等,都应该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广泛倾听有关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必须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展开自由的讨论。在科学技术工作中,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使我们少犯错误、做好工作所必需的。这是我们科学研究机构党委实行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们强调科学技术人员集中精力搞好科学技术工作,是不是减轻了政治工作的任务,降低了政治工作的要求呢?不是的。这是要求我们提高政治工作的水平,改进政治工作的方法,抛弃形式主义的东西,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认真

学习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凡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要求和倡议,就应该给以支持。对于那些追求个人私利,互相封锁,不搞协作,甚至垄断、剽窃等等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科学事业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应该进行批评教育。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应该是使每个科学技术人员都了解他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工作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的关系,鼓舞和动员他们以革命的精神,和衷共济,大力协同,努力攻克科学堡垒,攀登科学高峰。

二十多年来,我们党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虽然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应该承认,怎样科学地组织管理和领导好社会主义的科学技术事业,我们面前还有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取得大的成就,就不会有主动权。毛泽东同志曾教导我们,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51]。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不能长期安于当外行,要钻进去,逐渐成为内行。我们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政治水平,又要努力学习科学知识,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研究和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客观规律,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我们党能够领导人民推翻剥削制度,改造社会,也一定能够掌握科学技术工作规律,领导我国人民攀登世界科学高峰。

路线是非基本澄清了,规划制订了,措施提出来了,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现在,摆在我们各级党组织面前的事情,就是要鼓实劲,要切实解决问题,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一句话,就是要落在实处。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

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同志们！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52]、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相继召开，充分显示了全党的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我们这次全国科学大会也是一次团结的大会。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党中央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祝科学兴旺发达！祝大会圆满成功！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这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说明了按劳分配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有些地方还要改一下,同当前按劳分配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

我们实行的是低工资政策,这是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政策。现在八级工的工资最高额是一百零几元,将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工资要逐步提高,各级工资数额要有所增加。现在小学教员的工资太低。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资。将来,有些教得很好的小学教员,工资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可以评为特级。各行各业都要设立特级,以鼓励人们终身从事自己的职业。

要实行考核制度。考核必须是严格的、全面的,而且是经常的。各行各业都要这样做。今后职工提级要根据考核的成绩,合格的就提,而且允许跳级,不合格的就不提。

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我们实行精神鼓励为主、物质鼓励为辅的方针。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是一种政治上的荣誉。这是必要的。但物质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对发明创造者要给奖金,对有特殊贡献的也要给奖金。搞科学研究出了重大成果的人,除了对他的发明创造给予奖励外,还可以提高他的工资级别。如果他干了几年,干不出成绩来,就应该让他改行。最近罗马尼亚作了个决定,干得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可多得一点报酬;干得不好的工厂,干部、工人就要少得一点报酬。这也是奖罚分明。稿费制度也要恢复,并根据新的情况加以修订。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有好多事情要做。有些问题要经过调查研究,逐步解决。有些制度要恢复起来,建立起来。总的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鼓励大家上进。

在全国教育工作 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同志们：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批判“两个估计”之后，教育战线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成绩应当充分肯定。但是，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在社会上，大家都希望教育工作有更快的进展。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事情要做。今天，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四人帮”反对严格要求学生学习科学文化，反对学生以学习科学文化为主，胡说这是“智育第一”，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胡说“知识越多越反动”，并把今天掌握了文化的劳动者及其子弟诬蔑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这些谬论的流毒，现在仍然需要大力肃清。

列宁多次强调指出:工人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没有知识,工人就无法自卫;有了知识,工人就有了力量。这个真理在今天更加显出它的重要性。我们要掌握和发展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各行各业的新技术新工艺,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在上层建筑领域最终战胜资产阶级的影响,就必须培养具有高度科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必须造就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这些要求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治的要求。

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因此,“四人帮”把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水平,说成是什么“智育第一”,加以反对,这不但是彻底的荒谬,而且对于无产阶级政治的实际上的取消和背叛。

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严”^[53]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有严格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教学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

检验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当然也不能迷信考试,把它当作检查学习效果的唯一方法。要认真研究、试验,改进考试的内容和形式,使它完善起来。对于没有考好的学生,要鼓励和帮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因此造成不必要的精神负担。

第二点,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

“四人帮”对教育事业的破坏,不仅造成科学文化的教育质量惊人下降,而且严重地损害了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败坏了学校纪律,腐蚀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风气。“四人帮”在口头上政治喊得响,实际上搞的是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是用剥削阶级最腐朽最反动的思想来毒害青少年,制造“文盲加流氓”式的人物。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这种恶果,是关系到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项极其严重的政治任务。

革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品德,要从小开始培养。我们党的教育事业历来有这样的优良传统。革命战争年代,儿童团员、共青团员创造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教育工作,我们的青年团、少先队的工作,发扬光大了过去的优良传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广大青少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英勇机智地同敌人、坏分子作斗争,树立了一代新风。学校风气的革命化促进了社会风气的革命化。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我们希望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各个有关部门的同志,整个社会的家家户户,都来关心青少年思想政治的进步,把被“四人帮”破坏了的

优良革命传统恢复和发扬起来。毛泽东同志说：“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54〕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和幼儿教育工作者，负有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幼苗的重任。我们要大力在青少年中提倡勤奋学习、遵守纪律、热爱劳动、助人为乐、艰苦奋斗、英勇对敌的革命风尚，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忠于社会主义祖国、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优秀人才，将来走上工作岗位，成为有很高的政治责任心和集体主义精神，有坚定的革命思想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严守纪律，专心致志地为人民积极工作的劳动者。

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努力上进，但毕竟还要看各个人自己是否努力。集体的努力也是各个人努力的综合表现。这种个人努力程度的差别，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会存在。毛泽东同志说过，一万年以后也会有先进和落后的差别。因此，我们在鼓励帮助每个人勤奋努力的同时，仍然不能不承认各个人在成长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才能和品德的差异，并且按照这种差异给以区别对待，尽可能使每个人按不同的条件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总目标前进。同时，对于严重破坏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又屡教不改的人，也要采取严格措施加以认真的教养改造，不能让这极少数人为害学校和社会。

今后，不仅大中学校招生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而且各部门招工用人也要逐步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的办法，择优尽先录用。这也就是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

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这样做,对于提高整个职工队伍的政治质量和科学文化素养,对于满足不同工种、职业的特殊要求,对于在青少年中以至在整个社会上造成人人向上、奋发有为、不甘落后的革命风气,都将发挥巨大的促进作用。

第三点,关于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早在八十年前,列宁就说过:“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55〕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

要做到这一点,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的劳动,怎样下厂下乡,花多少时间,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都要有恰当的安排。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求?

我们的国民经济是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我们培养训练专门家和劳动后备军,也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周密的计划。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国家计委、教育部和各部门,要共同努力,使教育事业的计划成为国民经济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计划,应该考虑各级各类学校发展的比例,特别是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要研究发展什么样的高等学校,怎样调整专业设置、安排基础理论课程和进行教材改革。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必须引起充分的重视。生产劳动、科学试验和科学研究在学校教育中怎样组织得更有计划,使之更符合于经济计划和教育计划的需要,应该加以深入的研究。为了加速造就人才和带动整个教育水平的提高,必须考虑集中力量加强重点大学和重点中小学的建设,尽快提高它们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今后国家将努力开辟新的途径,增加新的行业,以便更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制订教育规划应该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切实考虑劳动就业发展的需要。

最后,讲讲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问题。

一个学校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键在教师。

二十多年来,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人民教师队伍。全国有

教师九百万人。绝大多数教职员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勤勤恳恳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为民族、为国家、为无产阶级立了很大功劳。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工作者是崇高的革命的劳动者。我们对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表示慰问和敬意。特别是对广大的小学教育工作者,他们在更为艰苦的条件下,为培育革命后代不辞劳累,作出贡献,我们更要表示慰问和敬意。

我们要提高人民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不但学生应该尊重教师,整个社会都应该尊重教师。我们提倡学生尊敬师长,同时也提倡师长爱护学生。尊师爱生,教学相长,这是师生之间革命的同志式的关系。对于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应该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和奖励。

要研究教师首先是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制度。要采取适当的措施,鼓励人们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特别优秀的教师,可以定为特级教师。限于国家的经济力量,我们一时还难以较大地改善教职员工的物质生活待遇,但是必须为此积极创造条件。各级党委和教育行政部门,首先要在可能范围内,尽力办好集体福利事业。

各级党委和学校的党组织,应该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教师思想政治上的进步,帮助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更多的人牢固地树立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要积极地优秀的教师中发展党员。教育战线任务愈来愈重,各级教育部门不能不努力提高现有教师队伍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质量。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

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我们希望广大教师努力在政治上、业务上不断提高,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前进。

同志们,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对教育工作中一些重大问题,充分展开讨论。要提倡敢想敢说的革命精神。有不同意见不要紧,各种方案可以比较。办什么事也得走群众路线。人民内部要有充分的民主,这样才能拿出好的主意来。当然,任何好主意不会自动实现。美好的前景如果没有切实的措施和工作去实现它,就有成为空话的危险。为了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需要大力提倡能把崇高理想逐步变为现实的脚踏实地的革命作风。

我相信,在党中央领导下,依靠教育战线上广大师生员工的努力,坚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踏踏实实地进行工作,我们的教育事业一定能够同其他战线一样,新人辈出,捷报频传,蒸蒸日上!

实现四化 ,永不称霸^{*}

(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

粉碎“四人帮”,全国人民都高兴。现在的情况比较好,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清醒地看到这是一件艰巨的事情,但是是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我们有全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团结。我们的人民是勤劳的人民,有着艰苦奋斗的传统。其次是我们已经建立了相当的物质基础。还有就是我们制定了明确的方针,要利用世界上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在“四人帮”时期要这样做是不允许的,他们说这是洋奴哲学。科学技术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资本家拿来为资本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拿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世界各国后来不是也利用了嘛!现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先进成果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利用呢?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再加一条,那就是我们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总起来说,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又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有丰富的资源,加上利用世界的先进技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当然也不那么容易。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很快,发展速度不是用年来计算,而是用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月、用日来计算的,叫做“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现在我们的方针政策已经明确,我们的口号是少说空话,多做工作。

我们现在还很穷,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方面,还不可能做得很多,贡献还很小。到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国民经济发展了,我们对人类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贡献可能会多一点。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这个思想现在人们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现在还很穷,是不折不扣的第三世界国家。问题是将来我们发展了,搞不搞霸权主义。朋友们,你们都比我年轻,你们是可以看到的,到那个时候,如果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就不能实行霸权主义,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如果那时中国翘起尾巴来了,在世界上称王称霸,指手画脚,那就会把自己开除出第三世界的“国籍”,肯定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大特别会议上作了一篇讲话^[56],讲的就是这个内容。这是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制定的对外政策,我们要用来教育子孙后代。

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日)

同志们：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继军委会议之后军队召开的又一次重要的历史性会议。

会议讨论和修改了加强政治工作的决议、政治工作条例、干部服役条例三个草案。这些文件经过军委审定之后，军队政治工作也就有了章程。

这次会议着重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思想，针对部队的实际，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很好，很必要。这次会议，中心突出，主题明确，精力集中，越开越好。会议的风气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对原则问题又不含糊，给下边作了好样子。总之，会议开得很圆满，很成功。

我讲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讲讲实事求是。

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只有这样做了,才有可能正确地或者比较正确地解决问题,而这样地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地解决。

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转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不然,我们开会就只能讲空话,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毛泽东同志从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缔造我们党的最初年代开始,就一直提倡和实行对于社会客观情况的调查研究,就一直同理论脱离实际、一切只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切只从本本

和上级指示出发而不联系具体实际的错误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九年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26〕中就尖锐地反对主观主义的指导,认为这种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一九三一年,毛泽东同志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这篇文章,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他坚决反对在共产党内讨论问题的时候,开口闭口拿本本来,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这种错误的心理。毛泽东同志说:“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又说:“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

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57〕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58〕“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

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59〕毛泽东同志在谈到战争的指导原则的时候指出：“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60〕我们过去打仗，都懂得不研究我情敌情，做不到知己知彼，就要打败仗。

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发起了伟大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同志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就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主要文献。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态度。他说：“‘实事求是’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61〕而与此相反的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则“是共产党的最大敌人，是工人阶级的最大敌人，是人民的最大敌人，是民族的最大敌人，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62〕。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同志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看成是死的教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63〕。如果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

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64〕。他指出:“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65〕。根据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规定为我们党的三大作风〔66〕的第一项。

在这以后,毛泽东同志继续反复多次地讲了这种观点,这种作风。例如,一九五三年,毛泽东同志说:“中央领导机关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够制造出产品?”〔67〕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同志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68〕,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同志说:“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69〕一九六三年,毛泽东同志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又指出,由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只有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才能证明它“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

毛泽东同志历来坚持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历来是按照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讲问题的。毛泽东同志讲过:我写文章,不大引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报纸老引我的话,引来引去,我就不舒服。应该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当然不是说不不要引人家的话,是说不不要处处都引。主要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没有生命力了。我们领导干部的责任,就是要把中央的指示、上级的指示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能当“收发室”,简单地照抄照转。

同志们请想一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是不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观点呢?这种根本观点有没有过时,会不会过时呢?如果反对实事求是,反对从实际出发,反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那还说得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呢?那会把我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很明显,那只能引导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只能引导到工作的损失和革命的失败。

全军的政治工作会议多年没有开了,现在开这样一次会议,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呢?很明显,我们应该也只能采取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总结过去的经验,分析新的历史条件,提出新的问题、新的任务、新的方针。这样,我们的会议才能够解决问题,才能够解决得正确。韦国清^[70]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反之,如果我们只把过去的一些

文件逐字逐句照抄一通,那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更谈不到正确地解决什么问题。那样,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也只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确实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任务。

第二个问题,讲讲新的历史条件。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要着重解决什么问题呢?从部队存在的问题和实际情况来看,最重要的,就是要研究和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的问题。这就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研究分析实际问题,解决实际问题。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战争,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和平环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对军队来说,由长期的战争环境转入和平环境,这是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政治工作的根本的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同志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6],就曾根据不同的情况,在具体内容上提出不同要求。开始规定了三项纪律,接着又提出了六项注意。三项纪律的内容后来也有变化,把“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把“打土豪要归公”改为“筹款要归公”,后来又改为“一切缴获要归公”。六项注意增加了“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两项内

容。到一九四七年重新颁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内容上也有修改,“上门板”、“捆铺草”,改为“不打人骂人”、“不损坏庄稼”、“洗澡避女人”、“不搜俘虏腰包”,改为“不调戏妇女”、“不虐待俘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基本精神不能变,也没有变,但怎样贯彻执行,如果不研究不结合新的情况,就贯彻不好。例如“一切缴获要归公”,现在没有打仗,就没有缴获要归公的问题,就要研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执行这个原则。

军民一致,这个原则不能变。但现在我们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有了不同的内容。在农村,过去是个体经济,现在是集体经济,部队过去在农村,现在不少部队进了城市,住了营房,这就是新的情况。现在搞好军民关系,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帮助集体经济的发展。一个军要研究是不是可以帮助一两个公社,附近有工厂的也可以研究如何帮助工厂。我们就是要按照新的情况,从各方面搞好军民关系,正确地解决军民关系问题。

军队内部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韦国清同志的报告中对部队的组织状况、思想状况等方面的问题已经作了分析。现在,干部有很多新的情况,战士也有新的特点,教育对象不一样了,教育没有新的内容不行。忆苦思甜当然要搞,但只搞忆苦思甜就不够了,要研究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就官兵关系来说,现在同战争时期就不同,怎样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要很好地研究。

后勤现在也在开会,也要着重研究后勤工作方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比如,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我军装备的逐步改善,后勤工作也出现了很多

新情况。过去我们是小米加步枪,对后勤依赖还不算很大。现在不同了,无论是军需给养、武器弹药、装备器材,都得靠强大的后方供应。战争物资的储备,也在不断变化。这些都需要认真具体地研究。另外,过去我们家当比较小,现在家当大了,怎么把整个后勤工作管好,也是个新问题,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同破坏财务制度、铺张浪费的现象作斗争。

以上讲的,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是分析了政治工作的实际情况,提出和解决政治工作的具体工作路线和政策,这正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完全体现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既要有总路线、总政策,又要有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指示精神。如果我们不去分析和解决新的历史条件下存在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够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就不能够在没有打仗的情况下提高部队战斗力。

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

第三个问题,讲讲破和立。

我们讲实事求是,讲新的发展时期,讲新的历史条件,就要讲破和立。破,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就是要深入揭批“四人帮”,要联系揭批林彪^[1],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立,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

复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军队揭批“四人帮”总的情况是好的,我不多说了。但是运动的发展不平衡。我们一定要把这场斗争搞深搞透,进行到底,决不能捂盖子。

揭批“四人帮”,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抓不好这个纲,是非就不明,阵线就不清,班子就配不好,作风就不能转变,团结就没有良好的基础,工作也搞不上去。总而言之,不破掉这些坏东西,就不能立新东西。

要把“四人帮”揭深批透,非联系揭批林彪不可。林彪、“四人帮”早就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夺权。林彪对军队毒害很大,过去没有怎么批,被“四人帮”包下来了。他们不批林,假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同志、叶剑英^[24]同志。揭批“四人帮”联系揭批林彪,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不存在什么“纠缠历史旧帐”的问题。

要增强团结,必须深入揭批“四人帮”,必须联系揭批林彪。这正是为了分清是非,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搞好团结。这样才能真正团结绝大多数。跟林彪一伙犯了错误,检查得好,真正改了,一直表现不错的,我们就应该充分信任,坚持不改,又跟“四人帮”干坏事的,当然要从严处理。不这样做,就分不清是非,就搞不好团结,就无法实现整顿的任务。

揭批林彪、“四人帮”,必须联系实际,搞好各方面的整顿。整顿就要有破有立。整顿,主要是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

当前调整好整顿好领导班子是个关键。有的单位问题成堆,老是解决不了,主要是领导班子没有真正调整好。要坚决执行军委会议关于哪些人可以进领导班子,哪些人不能进领

导班子、不能重用的规定,抓紧把各级领导班子选配好,整顿好。一九七五年我们讲过软、懒、散三种情况,现在有些领导班子还是这个问题。要放手发动群众,揭露矛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体系。还必须把派性整掉、搞臭。

培养接班人,这件事关系到军队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大局,非解决不可。年轻干部只要选得准,搞好对他们的传帮带,加强学校的培养,是能够接好班的。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眼光要放得远一些,要积极发挥骨干作用,选好接班人,带好接班人。这件事做好了,我们才有资格去见马克思,见毛主席,见周总理。

整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把作风整顿好。各级领导人的作风要转变,要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深入实际的问题。我们办事情,做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联系本单位的实际解决问题。

军队的作风要做个好样子,就要解决一个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要雷厉风行,艰苦奋斗,紧张快干。不能慢慢吞吞,拖拖拉拉,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军队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整顿,还有一个恢复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的问题。我们多次讲过,要在三几年内,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水平。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破林彪、“四人帮”的那一套,立毛泽东同志关于政治工作的理论和传统作风,并在新的条件下发展提高。这次会议之前,我又讲过,通过这次会议,要把政治机关的职能、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起码要起这个作用。

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政治机关是党的工作机关。上级政治机关对下级党委、政治委员、政治机关的工作,应该进行指导,督促检查。这是我们的老传统。

整顿,一定要从严。不论整顿领导班子,整顿作风,整顿政治机关,没有一股子劲头不行。在整顿过程中,要严格考核干部,并且把它作为一项制度坚持下去。

第四个问题,讲讲以身作则。

这个问题很重要。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以身作则非常重要。群众对干部总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的。连长指导员不以身作则,就带不出好兵来;领导干部不做出好样子,就带不出部队的好风气,就出不了战斗力。

现在,强调以身作则这个问题很必要。比如,调动了工作,就要搬房子,高级干部不带头怎么行?下了命令,要立即到职,高级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也要高级干部带头。

能不能深入下去,工作能不能落实,关键在于领导干部是不是以身作则,深入部队,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近,不少单位领导干部开始下部队了,这是好现象。

我们说治军要严,首先对领导班子要严,对高级干部要严。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做执行“三要三不要”^{〔2〕}原则的榜样,做艰苦奋斗的榜样,做实事求是的榜样。总之,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榜样。

政治干部更要强调以身作则,我们过去在战争年代就是这样。那时,你打仗不勇敢,怕死,你不同战士心连心,不联系实际,不联系群众,做政治工作就没有人听。政治干部不能说

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条例就规定:“政治指导员进行政治工作全凭本身直接接近群众和熟识红军战士”;“政治指导员不论在执行自己的职务上和个人行动上,均须做全体军人的模范,并且要在言论和事实上来表现”。我们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也要靠政治干部以身作则。

今天,后勤会议的同志也在。我要讲一下,后勤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也要以身作则,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一定要廉洁奉公,当好红管家。要严格遵守财经纪律,同违反财经纪律的现象作斗争,要同假公济私、开后门的现象作斗争。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高级干部能不能以身作则,影响是很大的。现在,不正之风很突出,要先从领导干部纠正起。群众的眼睛都在盯着他们,他们改了,下面就好办。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我党我军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化身。他们的感人事迹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发生了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不仅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而且影响到子孙后代。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老干部,要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为榜样,用实际行动搞好传帮带。

这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胜利的会议。要贯彻落实好这次会议精神,在座的同志是责无旁贷的,但更重要的是各级党委、政治委员要加强领导,亲自动手,狠抓落实。我相信,经过这次会议,全军的政治工作一定会有新的起色,毛泽东同志亲自培育的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定会发扬光大。

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 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六日）

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18〕}，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在帝国主义世界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谈话的一部分。

的薄弱环节搞革命,我们也是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但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用农村包围城市。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能提出和解决这样的问题吗?能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同志运用实事求是这一真理领导我们继续前进。当然,有好多东西当时还不具备提出来的条件。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我们现在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好多条件,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没有,现在有了。中央如果不根据现在的条件思考问题、下决心,很多问题就提不出来、解决不了。比如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我们也想扩大中外经济技术交流,包括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甚至引进外资、合资经营等等。但是那时候没有条件,人家封锁我们。后来“四人帮”搞得什么都是“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把我们同世界隔绝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42]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71]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国际条件,使我们能够吸收国际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这是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所没有的条件。外国人也可能骗我们,也可能欺负我们落后。比如,一套设备,给你涨点价,或者以次充好,都是可能的。但是总的说来,我们有了过去没有的好条件。如果毛泽东同志没有说过的我们都不能干,现在就不能下这个决心。在这样的问题

上,什么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就是从现在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实现毛泽东同志提出、周恩来同志宣布的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

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还是我前边讲的那个问题,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现在在世界上我们算贫困的国家,就是在第三世界,我们也属于比较不发达的那部分。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

什么叫高举?这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是真正的高举。下这样大的决心,切实加速前进的步伐,是最好的高举。离开这些,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

用先进技术和 管理方法改造企业^{*}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问题,是鞍钢如何改造。引进技术改造企业,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许多工作从现在起就要着手,如培训工人,培训干部,现在不着手,外国的先进技术就不能掌握。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现在抢时间很重要,全国准备引进上千个项目。凡是引进的技术设备都应该是现代化的,必须是七十年代的,配套也要是七十年代的。世界在发展,我们不在技术上前进,不要说超过,赶都赶不上去,那才真正是爬行主义。我们要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鞍钢减人、减机构的设想,我看是好的。划出去的单位,领导班子和机构不要搞很多人。现代化、自动化,人多了不行,人多了管理不好。日本年产六百万吨钢的企业,行政人员只有六百人。鞍钢现在的年产量是六百多万吨,行政人员有两万三千人,这肯定不合理。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共鞍山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时讲话的一部分。

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

我们改造企业,为了保证应有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要有合格的管理人员和合格的工人。应该设想,经过技术改造,文化和技术操作水平较高的工人应当是大量的,否则不能操作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干部和工人都要经过考核,不合格的作编外处理,要保证他们的生活,当然不在职的人不能享受在职的待遇。要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培训,开辟新的就业领域。要下这个决心。

合格的管理人员、合格的工人,应该享受比较高的待遇,真正做到按劳分配。这个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一百元二百元的工资,变不成资本家。这会不会打击其他人的积极性?讲怪话的会有,但可以刺激大家努力向上。发展经济工人要增加收入,这样反过来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农业也是一样,增加农民收入,反过来也会刺激农业发展,巩固工农联盟。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我们要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来个革命,发展生产,增加职工收入。

你们除了考虑改造钢铁企业,也要综合考虑鞍山市的社会结构。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服务行业很多,如种子公司、建筑、修理等,这说明可以有很多办法安置劳动力。你们要注意,编制里面一定要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美国和日本的大企业,都有相当规模的科学研究机构。我们也要把科研队伍加强和扩大起来。

要加大大地方的权力,特别是企业的权力。企业要有主动权、机动权,如用人多少,要增加点什么,减少点什么,应该有权处理。企业应该有点外汇,自己可以订货,可以同国外交流技术。有些事情,办起来老是转圈,要经过省、部、国家计委,就太慢了。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做工作,只听上边讲了一些什么话,自己不敢开动脑筋。还是毛主席说的,要放下包袱,开动机器。要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没有一点创造性不行,企业没有自己的权力和机动性不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要开动机器,不要当懒汉,头脑僵化。当然这个懒汉主要是过去制度形成的。以后既要考虑给企业的干部权力,也要对他们进行考核,要讲责任制,迫使大家想问题。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非改不行。

实行开放政策， 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日）

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先进国家学习的时候了。

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向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叫作“崇洋媚外”。现在大家明白了，这是一种蠢话。我们派了不少人出去看看，使更多的人知道世界是什么面貌。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

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六十年代前期我们同国际上科学技术水平有差距，但不很大，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水平就更难了。所以，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 ,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

你们问我们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我们的作法是 ,好的传统必须保留 ,但要根据新的情况来确定新的政策。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 ,我们必须坚持 ,特别是根本制度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公有制 ,那是不能动摇的。我们不能允许产生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我们引进先进技术 ,是为了发展生产力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至于怎么能发展得多一点、好一点、快一点、省一点 ,这更不违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工人阶级要为实现 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贡献^{*}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一日)

同志们：

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对我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到会的代表同志们,向战斗在各条战线上的全体职工同志们,致以亲切的慰问。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72]和工会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73]所规定的工人运动的路线、方针、任务是正确的。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很好的工作,对全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党的领导和工会的帮助下,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各工业部门的职工群众中都涌现了一批劳动模范和革命骨干,他们至今还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团结的核心。

但是,近些年来,林彪、“四人帮”使工会工作完全瘫痪。他们扶植一批坏人,把持一部分工人团体,使它们成为自己篡党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致词。

夺权的工具。他们在工人中煽动派性,煽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反对各厂矿企业的革命干部、劳动模范和工会积极分子,并加以野蛮的迫害和摧残。他们制造各企业和整个工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反对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反对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反对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破坏劳动纪律。他们的这一切反革命罪行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同时,也在全国工人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革命义愤。各地都有大批先进分子不怕他们的白色恐怖,同他们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斗争的实践证明,我国工人阶级不愧是久经考验的立场坚定的革命领导阶级。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揭批“四人帮”,拨乱反正,形势越来越好。很明显,林彪、“四人帮”在工人队伍中所散布的流毒和造成的恶果,还要下很大的功夫去肃清,整顿队伍的工作还要在每个企业中完全落实。我们一定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但是同样很明显,这个斗争在全国广大范围内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已经能够在这一胜利的基础上开始新的战斗任务。

党的十一大^[52]和五届人大已经向全国人民提出在本世纪末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

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大大加强企业的专业化,大大提高全体职工的技术水平并且认真实行培训和考核,大大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金利润率。因此,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中央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为了四个现代化的利益,全国工人阶级一定会在这些改革中起大公无私的模范先锋作用,各工会组织一定会用深入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积极协助各企业顺利地实现这些改革,为革命和建设的事业作出新的杰出贡献。工人阶级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因此它的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我们希望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能对当前的形势进行深入的讨论,以便团结全体会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基础上,为迎接这一伟大任务而斗争。

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认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意义,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管理、技术、文化水平。工人阶级要发扬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的光荣传统,团结一致,克服“四人帮”所煽动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残余。工人阶级要用最大的努力来掌握现代化的技术知识和现代化的管理知识,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优异的贡献。任何人对四个现代化贡献得越多,国家和社会给他的荣誉和奖励就越多,这是理所当然的。党中央和国务院已经决定,为了表彰先进,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准备在明年召开工

交、基建、农林、财贸、文教、科技战线的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希望全国职工群众用丰硕的成果来迎接新长征中第一次盛大的群英会。

我们的企业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或经理负责制,要建立强有力的生产指挥系统。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维护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领导,维护生产指挥系统的高度权威。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克服现在普遍存在的无人负责现象,才能正常地、有序地组织生产。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扩大再生产,增加利润,同时不断地改善职工生活,从而确实保证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工会要教育全体会员积极参加企业的管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所有的企业必须毫无例外地实行民主管理,使集中领导和民主管理结合起来。今后企业的车间主任、工段长、班组长要由本车间、工段和班组的工人选举产生。企业的重大问题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讨论。企业的领导干部要在大会上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的批评和监督。对某些严重失职或作风恶劣的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大会有权向上级建议给以处分或撤换。各企业的工会,将成为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大会的工作机构。因此,工会再不是有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可有可无的组织了。工会工作的好坏怎么样,影响着工人当家作主的权利行使得怎么样,也影响着企业管理的好坏怎么样,影响着集中领导能否顺利进行。这就是说,一个企业管理得好,不仅是企业党政干部的成绩,也是全企业工人群众的成绩,也是工会工作的成绩。

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

别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在目前的条件下,企业领导在这方面还是有大量的工作应该做,工会组织有更大量的工作应该做。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

无论要做好以上哪一项工作,工会组织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都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工会要为工人的民主权利奋斗,反对形形色色的官僚主义,它本身就必须是民主的模范。工会要教育工人艰苦奋斗、大公无私、严守纪律、服从调动、爱厂如家,工会干部自己就必须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成为模范。只要工会这样做了,工会就会在工人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可以为四个现代化作出重大的贡献。凡是在揭批运动已经进行得比较彻底的地方,我们的党、行政、青年团就都有责任使工作干出显著的成绩来,我们的工会就同样有责任使工作干出显著的成绩来。粉碎“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我们不能老是把工作中的问题归之于“四人帮”的流毒。如果“四人帮”的流毒老是没有肃清,那末,这个老是没有肃清的状况,责任还是在我们自己。只要我们大家都这样来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我们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理想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

同志们 我国工人阶级在建设自己国家的同时,一定要时

时刻刻记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同全世界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团结,支持他们反帝、反殖、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以及争取社会进步的斗争,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解放和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我国工人阶级也要虚心学习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学习他们的先进科学技术,来加快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

同志们!我们的事业无比壮丽,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在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同德,一往无前,为实现中国工人阶级新的伟大历史使命——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现代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努力奋斗!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 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同志们：

这次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了 ,就要结束了。中央提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心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的根本指导方针 ,解决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必将使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斗志 ,增强信心 ,加强团结。现在 ,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 ,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 ,在新的长征中 ,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很成功 ,在党的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我们党多年以来没有开过这样的会了 ,这一次恢复和发扬了党的民主传统 ,开得生动活泼。我们要把这种风气扩大到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去。

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许多有关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大家敞开思想 ,畅所欲言 ,敢于讲心里话 ,讲实在话。大家能够积极开展批评 ,包括对中央工作的批评 ,把意见摆在桌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面上。一些同志也程度不同地进行了自我批评。这些都是党内生活的伟大进步,对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将起巨大的促进作用。

今天,我主要讲一个问题,就是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一 解放思想是当前的 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在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解放思想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不少同志的思想还很不解放,脑筋还没有开动起来,也可以说,还处在僵化或半僵化的状态。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是好同志。这种状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

一是因为十多年来,林彪、“四人帮”大搞禁区、禁令,制造迷信,把人们的思想封闭在他们假马克思主义的禁锢圈内,不准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追查,就要扣帽子、打棍子。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只好不去开动脑筋,不去想问题了。

二是因为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

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

三是因为是非功过不清,赏罚不明,干和不干一个样,甚至干得好的反而受打击,什么事不干的,四平八稳的,却成了“不倒翁”。在这种不成文法底下,人们就不愿意去动脑筋了。

四是因为小生产的习惯势力还在影响着人们。这种习惯势力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因循守旧,安于现状,不求发展,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励、支持党员和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

思想、开动脑筋的工作。

二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我们需要集中统一的领导,但是必须有充分的民主,才能做到正确的集中。

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现在敢出来说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不是很敢讲话。好的意见不那么敢讲,对坏人坏事不那么敢反对,这种状况不改变,怎么能叫大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四个现代化怎么化法?

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前几天对天安门事件^[36]进行了平反,全国各族人民欢欣鼓舞,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群众提了些意见应该允许,即使有个别心怀不满的人,想利用民主闹一点事,也没有什么可怕。要处理得当,要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有判断是非的能力。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现在党内外小道消息很多,真真假假,这是

对长期缺乏政治民主的一种惩罚。有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小道消息就少了,无政府主义就比较容易克服。我们相信,我们的人民是顾大局、识大体、守纪律的。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也要注意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不要搞那些小道消息和手抄本之类的东西。

人民群众提出的意见,当然有对的,也有不对的,要进行分析。党的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适当解释。对于思想问题,无论如何不能用压服的办法,要真正实行“双百”方针^[74]。一听到群众有一点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要追查所谓“政治背景”、所谓“政治谣言”,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恶劣作风必须坚决制止。毛泽东同志历来说,这种状况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我们的各级领导,无论如何不要造成同群众对立的局面。这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我们的国家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当然不能对他们丧失警惕。

我想着重讲讲发扬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我国有这么多省、市、自治区,一个中等的省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大国,有必要在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之下,在经济计划和财政、外贸等方面给予更多的自主权。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同样,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不但应该使每个车间主任、生产队长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而且一定要使每个工人农民都对生产负责任、想办法。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例如工厂法、人民公社法、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劳动法、外国人投资法等等,经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讨论通过,并且加强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家和企业、企

业和企业、企业和个人等等之间的关系,也要用法律的形式来确定,它们之间的矛盾,也有不少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地方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此外,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对国际法的研究。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组织部门的任务不只是处理案件,更重要的是维护党规党法,切实把我们的党风搞好。对于违反党纪的,不管是什么人,都要执行纪律,做到功过分明,赏罚分明,伸张正气,打击邪气。

三 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向前看

这次会议,解决了一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分清了一些人的功过,纠正了一批重大的冤案、错案、假案。这是解放思想的需要,也是安定团结的需要。目的正是为了向前看,正是为了顺利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转变。

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应该改正。有的问题不能够一下子解决,要放到会后去继续解决。但是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对过去遗留的问题,应当解决好。不解决好,犯错误的同志不做自我批评不好,对他们不作适当的处理不好。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

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

安定团结十分重要。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首先要加强全党的团结,特别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的团结。我们党的团结,是建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党内要分清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促进他们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认识和改正错误。要给他们考虑思索的时间。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有了认识,检讨了,就要表示欢迎。对于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对过去的错误,处理可宽可严的,可以从宽;对今后发生的问题,要严些。对一般党员处理要宽些,对领导干部要严些,特别是对高级干部要更严些。

今后选拔干部要严格。对于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决不能重用。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要警惕,要教育,要促使他们改造世界观。

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那样,中国各族人民就还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之下,我们党就还在黑暗中苦斗。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

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

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四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

在管理方法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克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是小生产的产物,同社会化的大生产是根本不

相容的。要搞四个现代化,把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转到大生产的技术基础上来,非克服官僚主义这个祸害不可。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

今后,政治路线已经解决了,看一个经济部门的党委善不善于领导,领导得好不好,应该主要看这个经济部门实行了先进的管理方法没有,技术革新进行得怎么样,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多少,利润增长了多少,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集体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条战线的各级党委的领导,也都要用类似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离开这个主要的内容,政治就变成空头政治,就离开了党和人民的最大利益。

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

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列宁说过:“借口

集体领导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这种祸害无论如何要不顾一切地尽量迅速地予以根除”〔75〕。

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例如,引进技术设备,引进什么项目,从哪里引进,引进到什么地方,什么人参加工作,都要具体定下来。引进项目要有几定,原有企业也要有几定。现在打屁股只能打计委、党委,这不解决问题,还必须打到具体人的身上才行。同样,奖励也必须奖到具体的集体和个人才行。我们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时候,要切实做到职责分明。

要使责任制真正发挥作用,必须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

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当厂长的、当工程师的、当技术员的、当会计出纳的,各有各的责任,也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只交责任,不交权力,责任制非落空不可。

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专家,培养专家,重用专家,提高各种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用人的政治标准是什么?为人民造福,为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积极贡献,这就是主要的政治标准。

三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

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严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

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

当然,在西北、西南和其他一些地区,那里的生产和群众生活还很困难,国家应当从各方面给以帮助,特别要从物质上给以有力的支持。

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建议同志们认真加以考虑和研究。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例如,企业的改组,就会发生人员的去留问题;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分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有些人就会有意见,等等。这些问题很快就要出现,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我们应当充满信心。只要我们信任群众,走群众路线,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随着经济的发展,路子会越走越宽,人们会各得其所。这是毫无疑义的。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全

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

全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重新学习。那一次我们学得不坏,进城以后,很快恢复了经济,成功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年来,应当承认学得不好。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运动上去了,建设的本领没有学好,建设没有上去,政治也发生了严重的曲折。现在要搞现代化建设,就更加不懂了。所以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习。

学习什么?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当前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的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学习好,才可能领导好高速度、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自己和人家的经验教训中学。要克服保守主义和本本主义。几百个中央委员,几千个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要带头钻研现代化经济建设。

只要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学会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就一定能够加快新长征的步伐。让我们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为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勇前进!

解决台湾问题 ,完成 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

(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 ,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说它不平凡 ,不同于过去的元旦 ,有三个特点 :第一 ,是我们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 ;第二 ,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第三 ,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因此 ,今年这个元旦是值得特别高兴的日子。这三个特点 ,反映了在粉碎“四人帮”之后 ,我们在国内工作和国际事务中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去年我国的生产形势很好 ,比我们原来预计的情况要好得多。这是与我们认真揭批林彪、“四人帮” ,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不开的。更值得高兴的是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 ,出现了举国上下心情舒畅、团结一致的局面。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就提出的那种又有集中又有民主 ,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在去年逐渐地形成了。这个情况 ,特别集中地体现在我们党刚刚开过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种风气和局面概括起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座谈讨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告台湾同胞书》的会议上的讲话。

来就叫作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我们要把这种风气和局面在全国发扬开来、坚持下去,在党、政、军、民各方面发扬开来、坚持下去。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政治基础。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四个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在民主和集中的关系上搞得不好,民主少了一些,因此,我们更要发扬民主。

过去的一年里,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集中反映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76]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事情能提到具体日程上来,也是由于在国内和国际的工作中取得重大成就的结果。在这个不平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认识,缺乏经验,需要好好学习,加倍努力。我们还要看到,在有些事情上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某些方面还会有困难。但是,只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善于学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民主集中制,我们的事业就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去年在国际事务中我们遵循的根本政策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制定的,但他们来不及实现就去世了。我们实现了他们遗愿的一部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和中美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和稳定,有利于国际反霸事业的发展。当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我们还要继续努力。我们要在国际事务中继续巩固和扩大已经取得的大好局面。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员对当前形势是高兴的和乐观的,也是乐意做出自己的贡献的。

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 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

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

现在经济建设的摊子铺得大了,感到知识不够,资金也不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一九五八年的错误^[77],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方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当然,利用外资一定要考虑偿还能力。

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较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是国内的人,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领导人谈话的摘要。

还有在国外的人,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78]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赚取外汇,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荣毅仁^[79]同志,你主持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否则就不签。应该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是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

同志们：

党的理论务虚会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在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我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向大家讲几点意见。

一 形势和任务

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以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肯定了党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所进行的巨大工作，认为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就全国范围来说已经可以胜利结束，决定把全党的工作的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三中全会解决了党的历史上所遗留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以便团结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这两次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重大意义的。在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

来开得是有成绩的。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过,我们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

对于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形势,必须有足够的、全面的估计。粉碎“四人帮”两年半以来,我们已经基本上摧毁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势力,调整和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党、政、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人民可以信赖的干部手中,党、政、军的工作也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秩序。这是一个非常重大和来之不易的成就。我们已经摆脱了林彪、“四人帮”所造成的十年混乱,获得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全党的党员,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党员,都要十分注意珍惜和维护这个政治局面。安定团结当然是有原则的。经过对林彪、“四人帮”的揭发批判,特别是经过去年冬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关于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可以说,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国民经济状况已经好转,各部门的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上述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使全党有可能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虽然过去我们已经进行了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说,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三个多月形势的发展,充分证明三中全会的方针是正确的,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拥护的。就全国

范围来说,安定团结的局面正在继续巩固,党内外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正在继续发展,党的优良传统有了很大恢复,党内外思想有了很大解放,实事求是的作风日益深入人心;党的各项政策的落实调动了党内外千百万人的积极性;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80]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我国对越南自卫还击战^[81]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中的威望,也大大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经过这次自卫还击战,说明我们的军队仍然不愧是英勇善战的人民解放军,不愧是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长城。

还必须着重指出,两年多来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外交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争取到了一个很好的国际环境。从这次自卫还击战的国际反应来看,绝大多数人是从心里同情我们的。现在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他晚年为我们制定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42]的战略,关于中国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第二世界国家共同反霸,并且同美国、日本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总之,从各方面看,我们国家的面貌比之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对于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重新充满了希望和信心。谁要是不充分估计这一切,谁就

要犯极大的错误。

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困难,而且有些困难是比较严重的。不看到这一点,也会犯大错误。首先,我们对于被林彪、“四人帮”长期破坏的我国的经济状况,要有个清醒的估计,要有个统一的看法。过去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而没有按比例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定的、确实可靠的高速度。看来,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农业、工业、基建、交通、内外贸易、财政金融,在总的前进的过程中都还需要有一段调整的时间,才能由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这次调整同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不同。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但是局部的后退是必要的,有些不切实际的和对整个经济害多利少的高指标要坚决降下来,有些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停下来整顿。退一步才能进两步。同时,为了有效地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认真解决各种经济体制问题,这也是一种很大规模的很复杂的调整。我们今年能把第一年的调整工作做好,就是一个巨大的前进,就是为工作着重点转移创造良好的开端。

在经济比例失调的条件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是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的、稳定的发展的前提。这在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82]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因此,我们要告诉全国人民,必须这样做才能更好地前进;在调整的过程中,要坚决相信和服从党和政府的安排。我们要看到,这次调整工作同六十年代初期那一次相比,既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也有一些困难。那次调整,各级领导力量和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都比现在好,不像现在这样还存在着

某些政治上、思想上的不安定因素。现在,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捣乱所欠下的帐和留下的毒,各地的负担很重。林彪、“四人帮”的流毒,特别是派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流毒,同一些怀疑社会主义、怀疑无产阶级专政、怀疑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潮相结合,开始在一小部分人中间蔓延。我们有些干部,面对着崭新的历史任务,思想还不够解放,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此外,小生产的习惯势力和官僚主义的习惯势力,还顽强地纠缠着我们。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涉及面很广的调整工作,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集中领导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如果不大力加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的工作和教育,如果不坚决搞好党风,进一步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就可能出现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大大小小的乱子,使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刚刚迈出第一步的时候就遇到严重的障碍。现在中央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陈云^[83]、李先念^[84]两同志挂帅,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中央、国务院和各地领导机构已经采取了并将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坚决发扬民主的同时,大力稳定社会秩序,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确保安定团结。中央和各地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已经陆续成立,它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中央和各地党委搞好党风。我们完全有信心克服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去夺取现代化建设的胜利。

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国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

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 ,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 ,不从这个实际出发 ,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 ,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 ,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 ,每一个党员、团员 ,每一个爱国的公民 ,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 ,克服一切困难 ,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

二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要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过去搞民主革命 ,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 ,也要适合中国情况 ,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 ,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 :

一个是底子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长时期的破坏 ,使中国成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建国后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有伟大成绩的 ,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我国工农业从解放以来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长速度 ,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 ,现在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 ,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

过去三十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年对国民经济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现在我们要调整,也就是为了进一步消除这个严重的后果。

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现在全国人口有九亿多,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我们地大物博,这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但有很多资源还没有勘探清楚,没有开采和使用,所以还不是现实的生产资料。土地面积广大,但是耕地很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不是很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

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比方说,现代化的生产只需要较少的人就够了,而我们人口这样多,怎样两方面兼顾?不统筹兼顾,我们就会长期面对着一个就业不充分的社会问题。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我们也一定能找出适当的办法来妥善解决。我今天不说这方面的问题。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们粉碎了“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主义,平反了大量冤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系列问题,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恢复和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毛泽东同志生前多年盼望实现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我们恢复了遭到破坏的党的三大作风^[66],健全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增强了全党的团结、党和群众的团结,从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党对国家和社会生活的领导。

我们破除了林彪和“四人帮”所制造的精神枷锁,坚持领袖是人不是神,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维护了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在中国革命史和世界革命史上应当享有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中央认为今天还是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现在一方面,党内有一部分同志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有极少数人甚至散布流言蜚

语,攻击中央在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是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我们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坚定地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帮助一部分还在中毒的同志觉悟过来,并且对极少数人所散布的诽谤党中央的反动言论给予痛击;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怀疑上面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这两种思潮都是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都是妨碍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前进的。关于林彪、“四人帮”所散布的极左思潮(毫无疑问,这种思潮也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只是从“左”面来反对),我们过去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批判,今后还需要继续开展这种批判,不能放松。现在,我想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

第一条,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现在有一些人散布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一定要彻底驳倒这种言论。首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其次,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事实。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

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我们的经济建设曾经有过较快的发展速度。现在我们总结了经验,纠正了错误,毫无疑问将来会比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得都快,并且比较稳定而持久。至于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数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那当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在某些情况下也犯严重错误,甚至出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这种严重曲折,固然有主观的原因,根本上还是旧社会长时期历史遗留的影响造成的,这种影响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用扫帚扫光。有长期封建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法、德、日、意的发展,也都有过重大的曲折和反复(英、法出现过反革命复辟,德、日、意出现过法西斯统治)。但是,我们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力量比较顺利地战胜了林彪、“四人帮”,使国家很快又走上了安定团结、健康发展的道路。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这些特点,我国人民能有共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理想,共同的道德标准。以上这些,资本主义社会永远不可能有。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资本主义已经有了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

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 and 经验,都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学习的。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如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摆脱了资本主义制度,它们的经济文化肯定还会有更大的进步。所以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在民主的实践方面,我们过去作得不够,并且犯过错误。林彪、“四人帮”宣传什么“全面专政”,对人民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我们已彻底粉碎了这个专政。这与无产阶级专政毫无共同之点,而且完全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坚决纠正了过去的错误,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继续努力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敌特分子,有各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新剥削分子,并且这种现象在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消灭。同他们的斗争不同于过去历史上的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他们不可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完整的阶级),但仍然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或者说是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式的遗留。对于这一切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仍然必须实行专政。不对他们专政,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民主。这种专政是国内斗争,有些同时也是国际斗争,两者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因此,在阶级斗争存在的条件下,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设想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消亡,不可能设想常备军、公安机关、法庭、监狱等等的消亡。它们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事实上,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

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85〕列宁所说的这个真理,现在仍然有效。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所以不但引起全党而且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抗,正是因为他们踢开了久经考验并与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而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威信在全国人民中所以普遍提高,正是因为全国人民把他们对于前途的一切希望寄托在党的领导下。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的群众运动〔36〕,尽管不是党有组织地领导的运动,仍然是一个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而反对“四人帮”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群众的革命觉悟同党多年来的教育是不可分的,而且他们中间的主要积极分子正是党团员。因此,决不能把天安门广场那个群众运动看成为与党的领导无关的像五四运动那样纯粹自发的运动。事实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我们党经历过多次错误,但是我们每一次都依靠党而不是离开党纠正了自己的错误。今天的党中央坚持发扬党的民主和人民民主,并且坚决纠正过去所犯的错误。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要求削弱甚至取消党的领导,更是广大群众所不能容许的。这事实上

只能导致无政府主义,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瓦解和覆灭。林彪、“四人帮”踢开党委闹革命,闹出一场什么“革命”,大家都很清楚。今天如果踢开党委闹民主,会闹出一场什么“民主”,难道同样清楚吗?一九六六年本来是中国经济经过几年调整得到迅速发展的一年,但是林彪、“四人帮”一闹,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现在中国经济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如果再让有些人到处踢开党委去闹,那就只能把四个现代化吹得精光。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大量实践所证明了的客观真理。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同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中心内容之一,就是反对他们伪造、篡改、割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粉碎了“四人帮”,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了它的科学面目,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胜利。但是有极少数人不这样想。他们或者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口头上拥护马列主义,但是反对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反对所有这些错误的思潮。有些同志说,我们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现在我着重谈谈毛泽东思想。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经历

过无数次悲惨的失败。难道不是毛泽东思想才使约占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吗?这一系列伟大的胜利不但根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改变了世界的形势。毛泽东思想在世界上是同反霸权主义的斗争分不开的,而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正是取得了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我们在前面说,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如果谁在对待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那末,他就会受到党和群众的责难。这有什么奇怪呢?

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

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这难道是说个人创造了历史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是这丝毫不排斥人民对于杰出的个人的尊敬;而尊敬,当然不是迷信,不是把他当作神。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中央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是小题大作?不是的。情况的发展使党不能不这样提出问题。

最近一段时间内,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的闹事现象。有些坏分子不但不接受党和政府的负责人的引导、劝告、解释,并且提出种种在目前不可能实现的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煽动、诱骗一部分群众冲击党政机关,占领办公室,实行静坐绝食,阻断交通,严重破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

不但如此,他们还耸人听闻地提出什么“反饥饿”、“要人权”等口号,在这些口号下煽动一部分人游行示威,蓄谋让外国人把他们的言论行动拿到世界上去广为宣传。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

允许的吗？有个所谓“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

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他们公开声言，他们的任务就是要解决“四人帮”没有解决的那些“走资派”。他们中间有的人要求到外国去“政治避难”，有的人甚至秘密同蒋特机构发生联系，策划破坏活动。

很明显，这些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我们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那我们的各级党政机关都只有被他们困扰得无法进行工作，还有什么可能考虑四个现代化？

这些事件诚然是极少数，并且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抵制，但是值得严重注意。第一，这些人一般都打着所谓民主的幌子，很容易淆惑视听。第二，这些人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很容易蒙蔽一部分目前有困难而政府一时还不能完全予以解决的群众。第三，这些人开始结成各种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组织，一面在全国范围内互相串联，一面同台湾以及国外的政治力量相勾结。第四，这些人中还有一部分人同社会上的一些流氓组织以及“四人帮”的一些党羽相勾结，以扩大他们的破坏活动的范围。第五，这些人力图利用我们某些同志的这样或那样的不慎重的言论，作为他们的借

口或护身符。以上的情况说明,同这些人的斗争不是很简单的、短时间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努力做好工作,把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其中许多是天真的青年)同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分离开来,要按照法律,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进行严肃的处理。同时,我们也必须教育全党同志务必注意提高警惕,照顾大局,在中央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既要继续解放思想,坚决发扬民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又要努力克服一小部分群众特别是一小部分青年中间的思想混乱。

我们一定要向人民和青年着重讲清楚民主问题。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都同民主问题有关。什么是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呢?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而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人民的民主同对敌人的专政分不开,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分不开。我们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

利益,那末,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归根结底,就是以上所说的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表现。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才说,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局面,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今后所要努力实现的政治局面。

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但是我们在宣传民主的时候,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别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只有党内党外上上下下人人都注意照顾大局,我们才能够顺利地克服困难,争取四个现代化的光明前途。反之,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地空谈民主,那就必然会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四个现代化的彻底失败。那样,我们同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斗争就等于白费,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希望。这不但是全国各族人民所极为关心的问题,也是全世界一切愿意中国强大的人们,甚至仅仅愿意同中国发展贸易的人们所极为关心的问题。

这里还要提出一个社会风气问题。我们建国以后的十多年中,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社会风气是健康的。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绝大多数怀抱崇高理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捍卫人民利益,维护社会秩序,处处表现良好的献身精神和守纪律精神。青少年的这种风气和整个社会的风气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受到全国人民和各国人士的赞许。但是过去的十来年中,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党和政府搞乱了,把我们的社会搞乱了,也把不少青少年毒害了,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受到了严重的损害。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是他们的流毒在某些范围内还不能低估。这种情况,同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的需要极端不相适应。我们提倡中国人和外国人发展正常交往,这对于加强我国和各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是必要的,对于引进国外技术和资金也是必要的,今后这种交往还会日益增多。但是由于对少数青少年的教育和管理不够,也出现了一些不健康的现象。一些青年男女盲目地羡慕资本主义国家,有些人在同外国人交往中甚至不顾自己的国格和人格。这种情况必须引起我们的认真注意。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后一代,一定要从各方面采取有效的措施,搞好我们的社会风气,打击那些严重败坏社会风气的恶劣行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党是整个社会的表率,党的各级领导同志又是全党的表率。如果党的组织把群众的意见和利害放在一边,不闻不问,怎么能要求群众信任和爱戴这样的党组织的领导呢?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

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在目前的历史转变时期,问题堆积成山,工作百端待举,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具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同志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86〕只有搞好党风,才能转变社会风气,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以上所说的,同全会精神的精神有没有不一致的地方,没有。这里所说的一切,都是为贯彻执行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再说一遍,不采取这些措施,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就要落空,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就要落空,四个现代化建设就要落空,党内外民主生活的发展也要落空。因此,有人把中央的方针说成是“收”了,说中央把发扬民主的方针改变了,这是完全错误的。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

三 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

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提出的问题很多,我现在不能一一解答。我今天想就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讲下面两个问题。我了解的情况不多,尤其对于地方的情况了

解更少,讲得是否完全恰当,请同志们考虑。

第一,对当前思想理论工作的一些要求。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我这里说的政治,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如果那样,我们在去年用大半年时间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问题,还有什么意义呢?科学社会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当然这决不是说,凡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的研究,这些研究是理论工作的任何巨大前进所不可缺少的。

我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虽然我已经说过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但是这

些原则在目前的新形势下却都有新的意义,都需要根据新的丰富的事实作出新的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这样才能够教育全国人民,全国青年,全国工人,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也才能够说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国寻求真理的人们。这是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又是重大的理论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这不是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过错。现在这些同志十分苦恼,许多家长、老工人、老战士也都十分苦恼。这也是目前极少数敌对分子所以能够兴风作浪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我提议中央宣传部把对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担当起来,并且提议,对于确实写得好的著作,经过评审,应该由党和国家发给奖金,以便给这项看来似乎平凡实则很艰苦的工作以应有的荣誉。

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思想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当然不能限于讨论它的一些基本原则。我们面前有大量的经济理论问题,包括基本理论问题、工业理论问题、农业理论问题、商业理论问题、管理理论问题等等。列宁号召多谈些经济,少谈些政治。我想,对于这两方面理论工作的比例来说,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不过我并不认为政治方面已经没有问题需要研究,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

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我们绝大多数思想理论工作者都应该钻研一门到几门专业,凡是能学外国语的都要学外国语,要学到能毫无困难地阅读外国的重要社会科学著作。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就可比的方面说)比外国落后了。我们的水平很低,好多年连统计数字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当然使认真的社会科学的研究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必须下定决心,急起直追,一定要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毛病,我们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同样要竭力避免。承认落后才能克服落后。应该指出,所以形成这种落后状况,责任首先在于中央和各级党委对于思想理论工作的领导方法不对,禁区太多,关心和支持太少。今天我代表中央向大家作自我批评。今后要求从中央起,各级党委一定要把思想理论工作放在正确轨道和重要地位上。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我们自己不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不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我们的工作还能够做得好吗?我们讲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不就成了说空话吗?

第二,对几个理论问题的看法。

在近几个月理论工作者的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很多。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现在我只就几个比较迫切的问题说一点看法。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关于基本矛盾,我想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

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毛泽东同志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他在这里说了很长的一段话，现在不重复。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但是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至于什么是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由于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实际上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

（二）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我在前面讲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已经说到一些。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实践证明，无论缩小或者夸大，两者都要犯严重的错误。至于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是否始终存在某种阶级斗争，这里包括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复杂和困难的问题，不是只靠引证前人的书本所能够解决的，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总之，社会主义社会目前和今后的阶级斗争，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这也是客观的事实，我们不能否认，否认了也要犯严重的错误。

（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这个提法，如果按照提出的当时的解释，即所谓“向走资派夺权”，也就是撇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那么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至于作出新的解

释,可以在党内继续研究。

(四)涉及党的十一大^[52]路线一些提法的问题是否可以讨论?党的路线同党的一切决议一样,总是要在实践中受检验的,这是毛泽东同志讲过多次的道理。不能说一种提法一经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就不能对它的正确性作任何讨论,否则下次代表大会怎么会提出新的提法呢?党的历届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下届代表大会之前,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不得不作出必要的修改,是常有的事。党的十一大制定的路线,也由于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对于实际情况认识的变化,由历届中央全会特别是三中全会作了一些必要的调整,今后也还可能作某些必要的调整。这是完全正常的。但是按照党的纪律,对于涉及十一大路线一些提法的讨论,除了中央已经正式决定的以外,应该限于党的适当的会议,不应该超出这个范围。

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这些都是三中全会决定了的,现在重申一遍,不允许有丝毫动摇。

同志们!目前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我们党已经领导全国人民胜利地渡过了“四人帮”给我们设下的重重难关,把一个混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有秩序的、进步很快的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前景激动着、鼓舞着、引导着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广大干部、群众都在争着为这个光明前途贡献力量。在这个时期,思想理论工作战线的任务特别重大。我们党的思想理论队伍

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已经作出了巨大的成绩,在三中全会以后也作出了重要的成绩,对这些成绩的任何估计不足都是错误的。但是形势在迅速发展,我们的工作也需要迅速发展。我希望这次重要的会议能使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对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和自己的工作的认识提高一步,更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并且通过你们的卓有成效的工作,把全国各族人民更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让我们同心同德,为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方针,实现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胜利而奋斗!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 人民政协的任务^{*}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

各位委员,各位同志: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幕。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中共中央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以后召开的。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动员、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力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今年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三十周年。我们的国家进入了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心任务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在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社会阶级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国工人阶级的地位已经大大加强,我国农民已经有二十多年历史的集体农民。工农联盟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我国广大的知识分子,包括从旧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开幕词。

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正在努力自觉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国各兄弟民族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早已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结成了社会主义的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型民族关系。各民族的不同宗教的爱国人士有了很大的进步。在实现四个现代化进程中,各民族的社会主义一致性将更加发展,各民族的大团结将更加巩固。

我国的资本家阶级原来占有的生产资料早已转到国家手中,定息^[78]也已停止十三年之久。他们中有劳动能力的绝大多数人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最光辉的胜利之一。这个胜利的取得,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工人阶级执行了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情况制定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同时,资本家阶级中的进步分子和大多数人在接受改造方面也起了有益的配合作用。现在,他们作为劳动者,正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中有过光荣的历史,在社会主义改造中也作了重要的贡献。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所不会忘记的。现在它们都已经成为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心向祖国,爱国主义觉悟不断提高,他们在实现统一祖国大业、支援祖国现代化建设和加强国际反霸斗争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上述各个方面的变化表明,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

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人民政协是发扬人民民主、联系各方面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组织。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需要政协就有关国家的大政方针、政治生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各项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协商、讨论,实行互相监督,发挥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作用。我们要广开言路,广开才路,坚持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让各方面的意见、要求、批评和建议充分反映出来,以利于政府集中正确的意见,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把我们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

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在坚持对极少数反社会主义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需要在人民内部广泛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政协在这一工作中无疑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要发扬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传统,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的工作,帮助各方面的人士和群众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共同基础上不断增强团结,取得新的进步。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十分有利,我国政府已经明确宣布了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人民政协

应当积极开展工作,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促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同时,要积极开展人民外交活动,加强同国际朋友的友好往来,为发展国际反侵略扩张的统一战线作出自己的努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任务是十分光荣的,工作是大有可为的。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团结前进!

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我们吃够了动乱的苦头。前一段时间上海发生冲击领导机关的事,那是不能允许的。这实际上是属于“四人帮”打砸抢、武斗的思想体系。

我们好多年实际上没有法,没有可遵循的东西。这次全国人大开会制定了七个法律。有的实际上部分地修改了我们的宪法,比如取消革命委员会^[87],恢复原来的行政体制。这是建立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必要保障。没有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这次会议以后,要接着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经济方面的很多法律,比如工厂法等等,也要制定。我们的法律是太少了,成百个法律总要有,这方面有很多工作要做,现在只是开端。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

^{*} 摘自邓小平同志会见以竹入义胜委员长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八次访华团时的谈话。

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 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九日)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18〕}的争论,已经比较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这是很重要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光明日报》登了一篇文章^{〔88〕},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说是“砍旗”,这倒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最早是林彪^{〔1〕}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们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我是不赞成“两个凡是”的。“两个凡是”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因此,我提出要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以后又解释什么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点,开始的时候反对的人不少,但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还是逐步接受了的。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海军现在考虑补课,这很

^{*} 这是邓小平同志接见中共海军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重要。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我们的政治路线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人帮”提出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我们在国际阶级斗争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就要表现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优越于其他的思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不解放思想,不实事求是,不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不相结合,不可能有现在的一套方针、政策,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昨天,山东的同志说,有一个原来很落后的县,就是因为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才由老大难变为先进。思想路线不是小问题,这是确定政治路线的基础。正确的政治路线不能贯彻实行,关键是思想路线对不对头。所以,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论的意义太大了,它的实质就在于是不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尽管有人不通,但总是已经确立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是组织路线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政治路线确立了,要由人来具体地贯彻执行。由什么样的人来执行,是由赞成党的政治路线的人,还是由不赞成的人,或者是由持中间态度的人来执行,结果不一样。这就提出了一个要什么人来接班的问题。

粉碎林彪、“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来,我们把许多冤案、假案、错案处理了,好多老同志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或担负相当原来职务的工作,这在前一段是必要的。但现在

各级领导班子岁数太大,精力不够。军队也存在这个问题。现在摆在老同志面前的任务,就是要有意识地选拔年轻人,选一些年轻的身体好的同志来接班。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不在了,将来很难解决。我们现在对于人们的思想状况、政治状况比较清楚,能够看出来哪些人是拥护党的路线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讲党性的。党性也包括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实事求是等等。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的。他们感到现在的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如果让转不过来的人掌权,这些人能听党的话吗?他们一遇机会就会出来翻腾的。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43]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远一点。一定要趁着我们在的时候挑选好接班人,把那些表现好的同志用起来,培养几年,亲自看他们成长起来。选不准的,还可以换嘛。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当然,组织路线方面还有其他的问题,如机关臃肿怎样解决,退休制度问题

怎样解决等等。庙只有那么大,菩萨只能要那么多,老的不退出来,新的进不去,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此,老同志要有意识地退让。要从大处着眼,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不要一涉及到自己的具体问题就不通了。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但是,最重要的还是选拔培养接班人,现在有些地方对选进领导班子的年轻人,还是论资排辈,发挥不了他们的作用。我们的人才有的,关键是要解放思想,打破框框。只要我们敢于把他们提起来,让他们在其位,谋其政,经过一两年就能干起来了。我经常讲,进军西南的时候,地方干部少,有排长当县委书记的,有连指导员当县委书记的,也有营团干部当县委书记的。那些连排干部(当然都是挑选好的)经过几年锻炼,和营团干部一样胜任,都是很好的县委书记。

组织路线是保证政治路线贯彻落实的。解决组织路线问题已经提到我们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见不了马克思。老同志在,问题比较好解决,如果我们不在了问题还没有解决,就要天下大乱。你们不要以为中国乱不起来,林彪、“四人帮”帮派体系的人,就是不听党的指挥,他们唯恐天下不乱。中国的稳定,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要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要有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性强的人来接班才能保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这次座谈会,重点谈经济工作。我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各级党委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但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比如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过去搞的一些运动,比如学理论,学来学去,就是不结合实际,结果大家厌烦了。当然,不是说政治工作不做了。现在有人认为取消政治部就是不做政治工作了。党是搞什么的?工会是搞什么的?共青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还不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

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还是以前的老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二、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方毅^[89]同志告诉我,冶金部有些司局长很不错,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都是六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很有干劲,而且业务非常熟悉,对外谈判也是能手。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提起来?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要消除障碍。当然,这样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有步骤的。但是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

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与此相关联的,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

真正鼓实劲,不鼓虚劲,还要求我们的干劲是对头的。比如完成的指标是没有水分的指标,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产品。不对路的产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原材料,你搞什么?材料不合格,你怎么干?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一九七五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三、讲一讲调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

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这就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因此,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现在不着手,到时候就形成不了新的生产能力。一个矿井的建设要五六年,一个电站也要五年左右。有些项目真正用钱不是在开头,是在两三年以后,如果现在不着手,那个时候急也没有用。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企业的改造革新,新技术的采用,包括技术骨干的培养,现在不着手,到时来不及。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只考虑到一九八二年还不行。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们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这不是临时能够办到的,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

四、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83]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

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但是,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还有,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引进的项目里有好多东西我们能自己干的,都用我们自己的,有些则用它的图纸,用它的规格,由我们来制造。这样,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引进的技术我们掌握了,就能够用到其他方面。

五、体制问题。究竟我们现在是集中多了,还是分散多了?我看,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

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有集中不够的。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比如,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现在对财政、银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卡得死死的,动都动不了,怎么行呢?当然也有成千万元的项目,那就必须慎重一点了,但是成千万元的项目也有很快见效的,财政、银行应该支持,这样就活起来了。这不是个简单的财政集中分散的问题。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有些情况下面可能不大了解。我想,地方同志提出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有一条,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全国的企业,包

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业收入很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一提就是中央集中过多下放太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

总之,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所以,这次会议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摆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论出来的。有同志已提出这个意见,希望能够把中央各部门的设想,各省市同志的设想都摆出来,这次会议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要以为我们原来脑子里考虑的就是完全对的。地方同志对中央部门提了不少意见,也有很尖锐的,但毕竟是从一个角度,从那个省,那个市,那件事,那个问题考虑的,就那个问题的本身来说,无可厚非,可能是很对的,但是从全局来说,有可能办不到。现在我们需要统一的是全局怎么办。这次会议放开把问题摆出来,然后由中央,特别是财经委员会,再来梳辫子,得出比较好的办法。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办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还要看以后的实践。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但是,现在不拿出个统一的东西不行,那样更难办,结果就是画圈圈过日子,等待过日子,你等过去,我等过来,应该快办的事情办慢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我们需要把思想

认识统一一下。思想认识统一了,大家就一致行动。

六、抓紧增产节约。抓紧这一条,我们的速度可能不只是百分之六。文章要经常做在这上面。增产节约不只是今年的事,也不只是明年的事。这两年来,基本建设增加了生产能力,但更主要的是,要把原有的生产能力用好。要讲实在的,真正扎扎实实把品种质量抓上去,特别是抓质量。抓质量,这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我们将来得到的益处大,基础就更扎实了。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 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九日)

在我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它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新时期统一战线的任务,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共同奋斗,还要为促进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而共同努力。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是我国革命的爱的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同我们党有过长期合作、共同战斗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亲密朋友。在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各民主党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推动和帮助各自的成员以及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代表时讲话的节录。

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参加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也都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在万恶的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里,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被迫停止活动,很多成员遭到了残酷迫害,绝大多数人经受住了这场严峻的政治考验,仍然坚信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动摇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这是难能可贵的。现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已经成为各自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和人民团体,成为进一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我们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不容忽视的作用。我们相信,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一定能够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扬民主,加强法制,进行自我教育和促进祖国统一等方面,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的成员以及他们所联系的人们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其中不少同志有较高的文化科学水平,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同志是学有专长的专门家,他们都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原工商业者中不少人有比较丰富的管理、经营企业和做经济工作的经验,在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现代化建设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也能够利用自己的专长和社会关系,在现代化建设事业和统一祖国的大业中作出自己的有益贡献。目前,在调动和发挥各方面的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其他人士的积极作用上,还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需要经过调查研究,采取有效措施,逐步予以解决。希望

各民主党派协同党和政府 ,共同努力 ,把这项工作做好。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实行多党派的合作^{〔90〕} ,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 ,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一九五六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又进一步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这是一项长期不变的方针。在当前新的长征中 ,在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下 ,实行互相监督 ,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对于增强和维护安定团结 ,共同搞好国家大事 ,是十分重要的。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各项事业中 ,由于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的地位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确与否 ,工作做得好坏 ,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 ;同时 ,由于我们党的执政党的地位 ,我们的一些同志很容易沾染上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习气。因此 ,对于我们党来说 ,更加需要听取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各民主党派的不同意见 ,需要接受各个方面的批评和监督 ,以利于集思广益 ,取长补短 ,克服缺点 ,减少错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都以主人翁的态度 ,关心国家大事 ,热心社会主义事业 ,就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各方面的工作 ,勇敢地、负责地发表意见 ,提出建议和批评 ,做我们党的诤友 ,共同把国家的事情办好。

实现台湾回归祖国 ,完成统一大业 ,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广大骨肉同胞在内的共同愿望 ,也是我们革命的祖国的统一战线所面临的一项光荣的神圣的任务。我国政府公布的对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 ,充分考虑了台湾当局和台湾人民的处境、利益和前途 ,是完全公平合理的。爱国一家 ,走祖国统

一的道路,就有功于民族,有益于人民。我们和国民党曾有过两次合作的历史。现在,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我们希望同台湾当局共同为祖国的统一携手迈进。台湾同胞富有爱国传统,一定能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宝贵贡献。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国外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和影响,希望你们在促进台湾回归祖国的事业中,积极贡献力量。

我们正处在承前启后的伟大时代,正在做我们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伟大事业。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还会遇到困难和阻力,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统一战线,任何困难都挡不住我们前进,任何阻力都将被我们打破。我们的事业一定要胜利,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让我们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努力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做安定团结的促进派,做实现四化的促进派,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促进派,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共同奋斗!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 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今天,我国各民族的文学家、戏剧家、美术家、音乐家、表演艺术家、电影工作者和其他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欢聚一堂,共同总结三十年来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商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艺事业,这是一件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事情。我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表示热烈的祝贺!

参加这次大会的,有“五四”时期就投入新文化运动的老一辈文艺家;有“五四”以后,在我国革命的不同阶段,为人民解放事业做出贡献的文艺家;有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文艺家;也有在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文艺家。参加这次大会的,还有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中的文艺家。这次大会,标志着全国文艺工作者的空前团结。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35],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

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亲切的慰问。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已经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起了积极的作用。回顾三年来的工作,我认为,文艺界是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来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

代表们,同志们!

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

业。各条战线上的群众和干部,都要做解放思想的促进派,安定团结的促进派,维护祖国统一的促进派,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促进派。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文艺工作者,要同教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政治工作者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相互合作,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

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

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我们的人民勤劳勇敢,坚韧不拔,有智慧,有理想,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顾大局,守纪律。几千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来,他们满怀信心,艰苦奋斗,排除一切阻力,一次又一次地写下了我国历史上光辉灿烂的篇章。任何强大的敌人没有把他们压倒。任何严重的困难都没有把他们挡住。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

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要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反映人们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本质,表现时代前进的要求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

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传统文化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

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91]。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

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林彪、“四人帮”过去用反动的、腐朽的剥削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灵魂,毒化社会空气,使我们的革命传统和优良风尚遭到极大的破坏。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继续同林彪、“四人帮”的恶劣影响进行坚决斗争。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

文艺工作者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认识生活、分析生活、透过现象抓住事物本质的能力。我们希望,文艺工作者中间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成为名副其实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要教育人民,必须自己先受教育。要给人民以营养,必须自己先吸收营养。由谁来教育文艺工作者,给他们以营养呢?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只能是: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

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会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不断前进。

文艺工作者还要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所有文艺工作者,都应当认真钻研、吸收、融化和发展古今中外艺术技巧中一切好的东西,创造出具有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的完美的艺术形式。只有不畏艰难、勤学苦练、勇于探索的文艺工作者,才能攀登上艺术的高峰。

我们衷心祝愿文艺队伍更加团结壮大。不论是专业的或是业余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社会主义的和爱国的文艺工作者,一切维护祖国统一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更好地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把全部精力集中于文艺的创作、研究或评论。作品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应当由人民来评定。虚心倾听各方面的批评,接受有益的意见,常常是艺术家不断进步、不断提高的动力。在文艺队伍内部,在各种类、各流派的文艺工作者之间,在从事创作与从事文艺批评的同志之间,在文艺家与广大读者之间,都要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在发现和培养青年文艺工作者方面负有重要的责任。青年文艺工作者年富力强,思想敏锐,是我们文艺事业的未来。应当热情帮助并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既不脱离生活,又能在思想上、艺术上不断进步。中年文艺工作者是我们文艺队伍的骨干力量,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必须十分重视文艺人才的培养。在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里,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

相称。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而且要从工作制度上创造有利于杰出人才涌现和成长的必要条件。

各级党委都要领导好文艺工作。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当前,要着重帮助文艺工作者继续解放思想,打破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精神枷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从各个方面,包括物质条件方面,保证文艺工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我们提倡领导者同文艺工作者平等地交换意见;党员作家应当以自己的创作成就起模范作用,团结和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一道前进。衙门作风必须抛弃。在文艺创作、文艺批评领域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如果把这类东西看作是坚持党的领导,其结果,只能走向事情的反面。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三十年来文艺发展的历史中,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摆脱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根据我国历史新时期的特点,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各位代表,各位同志!

毛泽东同志早在开国的时候就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92〕

经过艰苦的斗争,克服重重困难,我们粉碎了“四人帮”,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说,这种形势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条件,也在日益成熟。我国文学艺术蓬勃繁荣、争奇斗艳的新阶段,必将通过广大文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次大会,是全国文艺工作者在新长征中的第一次盛会。同志们是带着自己的丰硕成果来出席大会的。我们相信,大会以后,同志们一定会拿出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艺术成果,向祖国和人民汇报。

谨祝大会圆满成功!

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 党的优良传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日)

今天我想对我们高级干部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

中央和国务院准备下发的《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这个文件,是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主,由有关方面参加起草的,还准备根据在座同志讨论的意见作必要的修改。我看了大家讨论的意见很高兴,因为大家都赞成作这样的规定,而且要求规定得更严格一点,更具体一点。这反映了我们高级干部的绝大多数是关心我们党和国家的全局的,对全局的情况是有所了解的。这个文件经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准备先在内部发下去试行,然后再正式公布。这个规定基本上是重申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些有关规定,没有很多的新章程,有的比那个时候还放宽了一点。如房子问题,就比那个时候放宽了一点。文件规定每人只能有一处房子,但这个一处就有大有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

小。现在有极少数人有两三处啊！不只是在高级干部中有这种情况，下面的干部也有啊！文件规定，不管你占的房子面积有多大，除了办公的、会客的公用部分外，都要交房租。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这样办的，我们都交了。其他好多规定，如坐小汽车办私事要交费，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是交费的。现在，基本上还是把我们的老章程恢复起来，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所以我说这个规定可以行得通，因为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实行了嘛。

看来，作出这个规定稍迟了些，实在是因为顾不上。但现在再不作这样的规定，我们就无法向人民交代了。大家知道，最近一个时期，人民群众当中主要议论之一，就是反对干部特殊化。要讲特殊化，恐怕首先表现在高级干部身上。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高级干部都是这样，我们的许多高级干部是很艰苦朴素的，但确实有些人特殊化比较厉害。这种情况，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如某些公社党委书记，某些县委书记，某些厂矿企业的同志，他们那个特殊化也比较厉害。应该看到，这不但是一个党风问题，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成了一个社会问题。现在，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克服特殊化。只要高级干部带头，这个事情就好办了。人民群众反对特殊化，下面干部反对特殊化，首先是对着我们这些高级干部的。但是，不只是对着高级干部，还有中下层干部。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现在，广大群众最为关切的有三大问题：一个是物价涨，一个是干部特殊化，还有一个是房子紧张。人民群众（包括党

员、干部)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包括走后门)不满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西单墙”^[93]和混在上访人员中的少数坏人就是利用这个东西。我们确实要冷静地想一想,有些现象是不像话呀!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房子越住越宽敞,越漂亮,越高级。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这使我们脱离群众,脱离干部,把风气搞坏了。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

我们必须恢复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我们大家都是从苦里过来的,经历过不少困难的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3]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啊!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另外,那个时候整个风气也不同,我们的干部比较接近群众,所以能够很快渡过困难。应该说,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候好一些,人民的生活除了住房以外,都比那个时候好一些。既然这样,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同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也同我们的工作,包括宣传

工作、教育工作都做得不够有关系。我们没有把问题摆到群众面前,取得共同的认识,同群众一起商量解决问题。

我们脱离群众,干部特殊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现在有少数人就是做官当老爷,有些事情实在不像话。脱离群众,脱离干部,上行下效,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过去我们一个党委书记,比如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有现在这么大的权力吗?没有啊。现在有极少数人拿着这个权力侵占群众利益,搞生活特殊化,甚至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还好像是理所当然。近来上访人员很多,其中确实有少数坏人;也有一部分人反映的问题有道理或有一定道理,但由于当前条件的限制,一时难以解决;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反映的许多问题,按照党和政府的现行政策,是应该和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有少数同志对于这些应该而又能够解决的问题,却采取官僚主义态度,漠不关心,久拖不决,个别人甚至违法乱纪,搞打击报复。这就是非常错误和不能允许的了。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上面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没有讲话的权利,人们会问,你们自己怎样呢?总之,搞这个生活待遇的规定现在是时候了。

我还要说一说,我们有些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响到自己的亲属和子女,把他们都带坏了。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

事,家长背了黑锅。比如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的、国家的机密保守得比较好,很少泄露出去。现在有些干部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出去随意扩散,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送情报。这是我们现在许多事情保不了密的一个重要原因。顺便说一下,我们现行的有些做法非改不行。过去规定,机密文件不能出办公室,保密员带文件出差要两个人同行,不能一个人出去。现在却有人把机密文件随便放在自己皮包里,随便带到什么地方去。文件个人保管,喜欢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这样不行!应该有章程嘛。现在没有办公制度,有些高级干部习惯于在家里办公。我不是说少数年老体弱的同志不可以在家里办公,但是一般的不应该这样做。好多事情,集体办公一下就解决了,为什么非把文件传过来传过去,尽画圈,这不是官僚主义?有的事画圈画了半年还解决不了,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也不知道。

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实行《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会带来很多好处,首先官僚主义自然而然会减少一些。当然,我们的生活会没有过去那么舒服,但比一般干部和人民群众还是不知要好多少。有时也会有些不方便,比如坐小汽车去看电影,就要出点钱。你不愿意花那个钱,不看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就要当作法律一样,坚决执行,通也要执行,不通也要执行。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

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考虑到高级干部在工作上的某些需要,今后他们的工资标准不再降低,但也不能同一般干部和职工差距太大,不能同群众的生活差距太大。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的待遇往往比工资还多。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这样就要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所以,对于实行这个规定,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有困难要忍耐一下。只有这样,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

这个文件中央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通过,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是知道要得罪人的。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一般来讲,大家原则上都会赞成,具体执行起来思想就可能有些不通了,一接触到每一个人的具体事情就可能有些不通了。要想通这个问题。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大家应该想想过去,现在比过去好得多了嘛。

第二个问题 认真选拔接班人

解决干部生活待遇方面存在的问题首先要从高级干部着手,选拔接班人更和高级干部有直接的关系。

现在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不是四个现代化的路线、方针对不对,而是缺少一大批实现这个路线、方针的人

才。道理很简单,任何事情都是人干的,没有大批的人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成功。所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六十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八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八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我想同志们都会听到和看到这方面很多事实的。

我们老干部的责任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我前不久出去,一路上都谈这个问题。这次叶剑英^[24]同志的国庆讲话里面也讲了。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级干部亲自来做,搞调查研究,找人谈话,听群众意见,准备交班。现在任何一个老同志和高级干部,合乎不合乎党员标准和干部标准,就看他能不能认真选好合格的接班人。我们要求三几年内调整、安排好各级领

导班子(包括党支部)的一、二、三把手。高级一点的机关,可以考虑先解决选拔较年轻的同志当二、三把手的问题,老同志继续坐镇一段时间,还当第一把手;下面的机关能够选到好的青年人当第一把手,就直接选。如果我们不能在三几年内从上到下解决这个问题,将来就更难办了。对青年人我们要具体分析,有少数青年人受“四人帮”的思想体系的毒害很深,至今还不悔悟,我们决不能选这种人当接班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这个问题,将来我们都不在了,或者管不了事了,会有大批这样的人上来接班,会给我们党、我们国家带来灾难。现在我们不是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的好多案都翻过来了吗?如果让那些人来接班、掌权,他们还是要翻了回去的。

现在我们提出选拔接班人,有个好的条件,就是人们的政治面貌清楚了。叶剑英同志在国庆讲话里,提出了三条标准:一是坚决拥护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是大公无私,严守法纪,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三是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心,有胜任工作的业务能力。另外,从精力上说,能够顶着干八小时工作,这一点切不要忽略。做四个现代化的闯将,没有专业知识是不行的,没有干劲是不行的,没有精力是不行的。不管你的见解多么高明,如果没有精力,要做好工作是很困难的。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有正确的政治路线,如果组织问题不解决好,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实行就无法保证,我们向党和人民就交

不了帐。

我们的高级干部一定要亲自负责去选合乎上面讲的三个条件的干部做接班人。首先我们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积极主动去做,不能只靠中央组织部,因为他们不懂各行各业,也不会熟悉所有的干部。选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现在我们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三十岁左右的骨干还很少,我们应该把这层骨干大胆地提拔起来。在座的同志过去负重要责任的时候年龄都不大,当团长、当师长的,有的当军长的,也只是二十几岁,难道现在的年轻人比那个时候的年轻人蠢?不是。是因为被我们这些人盖住了,是论资排辈的习惯势力使得这些年轻人起不来。好多同志在他们没有到领导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实把他们一提起来,帮助他们一下,很快就行了嘛。

我们军队的高级机关,比如大军区,也要选一点比较年轻的干部。军队有它的特殊性,干部还是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来提,但是也要打破老框框才行。地方和军队不同,企业单位和军队也不同,学校、科研单位和军队更不同,选拔人才可以破格。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也提了一两个稍微年轻一点的干部,但所谓年轻,也是四十多、五十岁左右了,而且名字总是排在尾巴上,这也说明没有完全打破框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领导班子的成员太多,一个省委常委往往有十五六个,十七八个,甚至更多。现在,我们就是要认真选拔比较年轻的、年富力强的同志,当中下级领导机关的一、二把手,当高级领导机关的二、三把手。并且准备再过两三年、四五年由他们来接替一把手。如果选错了,那就换嘛,也来得及。

关于学校和科学研究单位培养、选拔人才的问题,我昨天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三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要建立学位制度,也要搞学术和技术职称。现在有几个年轻的科学家国内国际都出了名了,为什么不能够提为教授,提为研究员。在学术上,只要有创造,有贡献,就应该评给相应的学术职称,不能论资排辈。在工厂,总要选业务能力和管理水平比较高的人当厂长,不管他年龄大小,辈数高低,不能讲这个。告诉大家一个情况,我们搞的那个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制度,在有些单位试行的效果很好,重要的一条是把办好企业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了。凡是工人民主选举的人,都是他们认定可以把企业办好的人,因为办好企业工人有奖金,对国家的贡献也大。现在只解决了选举车间主任和班组长的问题,将来厂长、经理怎么选拔,很值得研究。

总之,要抓紧培养、选拔专业人才,才能搞好四个现代化。在学校里面,应该有教授(一级教授、二级教授、三级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这样的职称。在科学研究单位,应该有研究员(一级研究员、二级研究员、三级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研究实习员这样的职称。在企业单位,应该有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总会计师、会计师等职称。凡是合乎这些标准的人,就应该授予他相应的职称,享受相应的工资待遇。现在工资规定低一点也可以,但不能太低,不能搞平均主义,不能吃大锅饭。在一个研究所里,好的研究员的工资可以比所长高。在一个学校里,好的教授的工资可以比校长高。这样才能鼓励上进,才能出人才。我们就是要建立这样一套制度,使那些有专业知识的、年富力强的的人,被选拔到能够发挥他们才干的工作岗位上

来。这里我还要说一下 ,对科学家一般不要用行政事务干扰他们 ,要尽量使他们能够集中主要精力去钻研业务 ,搞好科研工作。

我们要特别注意选拔中年干部。也许再过五年 ,大学毕业生里会出现一批人才 ,他们的年龄都在三十岁以下 ,对这些人我们要注意提拔。但是从现在的状况来说 ,重点应该放在选拔中年干部 ,要选拔他们当中合乎三个条件的人接班 ,老同志要让路。我们要破格选拔人才 ,不要按老规矩办事 ,要想到这是百年大计。先不说百年大计 ,十年大计首先要想嘛。一九七五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 ,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 ,王洪文^[43]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 ,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84]同志谈过这个事情 ,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 ?从年龄来说 ,我们斗不过他们呀 ,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如果坚持“四人帮”思想体系的人将来掌权 ,你们也斗不过他们 ,你们能活多久啊 !即使生命还在 ,脑袋也不管用了 ,这是自然规律。

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 ,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个特点 ,不论资排辈 ,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 ,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 ,我们选拔干部的制度是落后的。论资排辈是一种习惯势力 ,是一种落后的习惯势力。

选拔干部 ,选拔人才 ,只要选得好 ,选得准 ,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道理很明显 ,只是确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 ,确定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还不够 ,还需要有人干。谁来干 ?反正靠我们坐在办公室画圈圈不行 ,没有希望。现在真

正干实际工作的还是那些年轻人。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提到领导岗位上来?有人说他们压不住台,帮他们压嘛。现在庙也太多了,我们最近考虑,国务院的部委分得那样多好不好?部委下面有没有必要设那么多司局?军队是不是需要搞那么多兵种?可不可以适当改革一下?我认为,把我们地方的领导机关和军队的指挥机关搞得这样庞大、这样臃肿是不行啊。现在到处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官僚主义、官僚机构、官僚制度的害处极大。现在的庙很多,每个庙里的菩萨也很多,老同志盖住了,年轻人上不来。所以,我们要改革现行的干部工作制度,建立有利于提拔年轻干部的制度。

前几年,我提出搞顾问制度,但并没有完全行通,许多人不愿意当顾问。现在看来,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这个问题,同我们每个人都有密切关系,请同志们好好地考虑一下。不建立这个制度,我们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以及青年人上不来的问题,都无法解决。有了退休制度,对各个部门、各级职务的干部的退休年龄有了明白规定,就可以使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一年该退休。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考虑过建立干部退休制度,但当时感到不那么迫切,当时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四十七八岁。一九六六年到现在十三年,在座的同志大多是六十岁左右了,这个问题迫切了,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实行退休制度是不是看不起哪个同志?不是看得起看不起哪个人的问题。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朝气蓬勃的一个大问题。看来,顾问制度还是一个出路,应该保留,但更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不少同志提出这个意见,我们还没有正式讨论,今天我先

发个议论吧。

老同志现在的责任很多,第一位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认真选拔好接班人。选得合格,选得好,我们就交了帐了,这一辈子的事情就差不多了。其他的日常工作,是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第六位的事情。第一位的事情是要认真选拔好接班人。

我今天讲的话,对高级干部来说不是那么愉快的。你看,现在老干部倒了霉了,对生活待遇作了规定,要受到一些限制,特殊化基本上是不能搞了,又提到退休的问题,提到庙里的菩萨让出来、新的菩萨去坐位的问题,等等。这不是矛头都对着老家伙了?我看,不能这样认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自觉。我自己就有这个想法,如果党允许我今天退休,我马上就退休。这是真话,不是假话。从整个事业看,我现在还不可能退休,我想大家也不会赞成。但是,就我个人的心情来说,确实感到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我们要向前看,我们这个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啊。我们现在提出的、面临的是十年内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如果再想远一点,二十年后,还可能遇到什么问题,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二十年后,在座的同志还能有几个人在?当然,希望大家长寿,但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

第三个问题 切实关心群众生活

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过去是很好的。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林彪、“四人帮”极大地破坏了我们党的这个优良传统。但是,把脱离群众这个问题统统归到林彪、“四人帮”身上也不合乎实际,我们自己也有责任。一些脱离群众的制度,包括那些特殊待遇在内,文化大革命前有的已经有了,但远没有现在这样厉害。当时大家都能自我约束,对群众比较关心,现在不同了。过去领导同志到一个单位去,首先到厨房去看看,还要看看厕所,看看洗澡的地方。现在这样做的人还有,但是不多了。很多同志根本不去同群众接触,一个学校的负责人,不去跟学生谈话,甚至于跟教员都不大接触。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顺便说一说宣传教育工作。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是很重要的,也有很大的成绩。但是,最近在有些问题的宣传上,确有考虑不周和片面性的地方,使我们下面工作的同志遇到一些困难。举例来说,《人民日报》对上访问题发表过两篇文章^[94],时间相隔不久。第一篇是九月十七日,文章一出去,上访人员呼噜呼噜地都上来了;第二篇是十月二十二日,文章把道理讲清楚了,上访人员很快就减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单单是报纸的舆论就可以发生这样大的影响。如果我们各个单位真正把国家面临的问题给群众讲清楚,甚至把今天的困

难同一九六二年的困难^[95]做个比较,还把我们现在采取了什么办法来克服困难,都向群众讲清楚,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反映肯定不同。只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地做工作,把道理向群众讲清楚,就能得到群众的同情和谅解,再大的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

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反映我们较长时间以来相当地脱离群众。我们要向群众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包括对那些经常在“西单墙”贴大字报、发表演讲的人,也要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当然,对极少数坏人也要打击一下。对他们要有两手,不能只有一手,应该把教育分化当作主要的一手。我们提出经济工作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调整经济越看越必要。但是由于我们工作没跟上,有相当一些人把八字方针错误地看作“泄气”方针。再加上提高物价,他们就感到四个现代化没希望了。所以,我们的工作一定要跟上,包括我们的舆论工具也要跟上。每个地方、每个单位遇到任何问题,都应该主动向群众宣传和解释,做好工作。要注意听取群众的呼声,同群众商量办事,共同克服困难。有的学校学生提出生活问题,说厨房没有人管,菠菜就切这么一下,连沙子都煮到锅里面去了。你切细一点,把沙子淘干净,这总可以办得到吧,这并不增加经费。可是,工作不深入,不跟群众接近,不跟下面干部接近,就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在发生的许多问题,有许多群众上访,往往是由于我们工作跟不上,没有做好工作引起的。当然,上访人员里边的一些坏人搞违法乱纪的事,那就不能说是我们的工作问题了。

现在需要全国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

把我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很好地恢复起来,坚持下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因为经验不足,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例如管理人员缺乏,技术人员缺乏,就是困难。又如改造一个企业就要减人,减下的人怎么安置,这也是困难。又如我们要建立退休制度,这是很正确的,但是也会有很多人思想抵触,这也是很大的困难。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要靠我们老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培养、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老干部对我们要传帮带,要给他们树立一个好的作风,要使他们能够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等优良作风。要使他们懂得,不只是年轻就能解决问题,不只是有了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是最根本的一条。不要“做官当老爷”,要反对“衙门作风”,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些根本的思想观点,现在我们还是应该按照这些思想观点去办事。

同志们 我们的高级干部都是长期受党的培养教育、久经考验的老同志,绝大多数都是坚决听党的话、按党的指示办事的,是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和斗争的,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的,是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我们相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实现四化的新长征道路上,大家一定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模范地带头发扬党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自觉地遵守有关规定,坚决反对特殊化,纠正一切不正之风,一定会认真选拔、培养好接班人,逐步地做好交班工作,完成自己的光荣使命。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吉布尼 :我们想 ,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多少年来 ,对美国来说是关闭的 ,现在要这样高速度实现现代化 ,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挑战 ,确实像重新开展一场革命似的。

邓小平 :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 ,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反对旧社会、旧制度 ,就是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 ,是束缚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问题现在是比较清楚了。过去“四人帮”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 ,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 ,那是荒谬的。

当然我们不要资本主义 ,但是我们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 ,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 ,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 ,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 ,特别是耽误了十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 ,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年 ,我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谈话的一部分。

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技的进步,不是按年来计算,甚至于不是按月来计算,而是按天来计算。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

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定了这个目标,要靠我们的努力,靠我们的方针政策对头,靠具体的措施有力,才能实现。现在人们怀疑,中国能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问我们提出这个目标有什么根据。我们的根据可以讲有四条。

第一条,我们有丰富的资源。中国地方大,在能源方面,在矿藏方面,无论是黑色金属、有色金属还是稀有金属,中国没有的很少。这些资源要是开发出来,就是了不起的力量。

第二条,三十年来,不管我们做了多少蠢事,我们毕竟在工农业和科学技术方面打下了一个初步的基础,也就是说,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我们现在有二百多万台机床,石油年产量超过一亿吨,煤炭超过六亿吨,只有钢才三千多万吨。总之,我们还是建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第三条,我们相信中国人不笨。有十来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充分发挥智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提倡解放思想,重申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调动全民的积极性,使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现在加强

民主、发展民主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发展民主,有人误解是提倡无政府主义。实际上林彪、“四人帮”的时候才是搞无政府主义。在无政府主义状况下不可能搞建设。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一九五九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林彪、“四人帮”把这种社会风气彻底破坏了。现在北京有个“西单墙”^{〔93〕},就是那些不劳动的人,经常闹事的人,“四人帮”思想体系中毒很深的人在那里活动,有的还搞特务活动。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尽管有错误,还是好意的,但是,里面实际上是“四人帮”思想体系统治着。他们搞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这种青年是极少数,但是能量比较大。我们对这些人采取严肃的态度,是为了教育年青一代。所以我们提出在加强民主的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解放思想,也要恢复我们长期已有的好的社会风尚。我们说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来实现四个现代化,也有个条件,就是要实现安定团结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局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培养人才的问题。多年来我们放松了科学研究和教育,这方面损失是很大的。我们要加强科学教育事业,要发现人才,很好地使用人才。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第四条,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

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这个条件过去没有,后来有了,但一段时期没有利用,现在应该利用起来。

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方针和目标是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生前提出的,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实际上没有真正地做起来。粉碎“四人帮”之后,要花很大的精力处理“四人帮”干扰造成的许多问题。去年开始我们才真正地把重点转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就我们国内来说,什么是中国最大的政治?四个现代化就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一定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还会不断地遇到困难。比如,我们现在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比如,我们要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可是人才不够。比如,我们需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我们现在基本上有了,但还存在不少的问题。比如,我们参加国际合作,在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方面,也还要摸索经验。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现在走的路是正确的。这些障碍,这些困难,这些不足,我们相信是可以逐步解决,逐步克服的。这三两年内可能看不出突出的成绩,过几年面貌会看得更清楚。现在尽管人们还有怀疑,但是中国的领导人、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是有信心的,是相信这个事业能够成功的。

吉:美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看社会主义中国的时候,把它看成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是一模一样的。那末中国开始的时候是否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思想混乱,即完全模仿和学习了苏联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不是采取一种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邓：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对资本家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采取赎买的政策，不是剥夺的政策。所以中国消灭资产阶级，搞社会主义改造，非常顺利，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受任何影响。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中国要形成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也与苏联不同。但是，我们有些经济制度，特别是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组织这些方面，受苏联影响比较大。这些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营方法、管理方法、发展科学的方法，我们社会主义应该继承。在这些方面我们改革起来还有许多困难。

吉：我看到中国人民的积极性正在被调动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不是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虽然中国仍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范围之内，在继续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同时，也发展某种形式的市场经济？

邓：这个只能是表现在外资这一方面。就我们国内来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国内还是全民所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也还可能包括一部分华侨的投资，这部分也可能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形式，但是绝大多数华侨都是带着爱护和发展社会主义祖国这个愿望来的，与纯粹的外国投资不同。人们有这样的怀疑，中国这样搞四化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肯定地说，不会。现在，我们国内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了。过去的资本家还有，他们的成分已经改变了。外资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占有它的地位。但是外资所占的份额也是有限的，改变不了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

剥削阶级。

林达光 :您是不是认为过去中国犯了一个错误 ,过早地限制了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方面限制得太快 ,现在就需要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指引之下 ,扩大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作用 ?

邓 :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 ,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 ,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 ,也结合市场经济 ,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虽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似 ,但也有不同 ,是全民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当然也有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关系 ,也有同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但是归根到底是社会主义的 ,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 ,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地 ,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好东西 ,包括经营管理方法 ,也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把这当作方法 ,不会影响整个社会主义 ,不会重新回到资本主义。

中国本世纪的目标 是实现小康^{*}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

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所谓四个现代化,就是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不但使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有所提高,也要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能够恢复符合自己情况的地位,对人类作出比较多一点的贡献。落后是要受人欺负的。

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当然,比现在毕竟要好得多了。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有可能对第三世界的贫穷国家提供更多一点的帮助。那个时候,中国国内市场比较大了,相应的,与国外的经济交往,包括发展贸易,前景就更加宽广了。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谈话的节录。

有人担心,如果中国那时候稍微富一点了,会不会在国际的竞争中起很大的作用。既然中国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坦率地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我们发展到台湾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不会对国际市场产生什么威胁,因为自己的需要多了。

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

同志们,元旦我在政协讲了大概一刻钟的话,胡耀邦〔96〕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要我向更多的同志谈一谈,作为对大家一年工作的希望。现在在党内和人民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当然,今天的讲话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谈到,有些问题也不一定能谈得很好。既然大家希望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我想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一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和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主要是讲国内形势。第二部分,讲一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第三部分,讲一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第一部分,讲讲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进入八十年代的国内形势。

先从我们八十年代究竟主要要做什么事说起。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平。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事件^[97],还有伊朗问题^[98],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99]、中东问题^[100]。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第二件事,是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

设搞好。

今天是一九八一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形势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提出来了,任务提出来了,需要把我们的形势观察一下,估计一下。有些群众,有些党员,甚至有些干部,对于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做了多少事情,不大清楚。他们感到进度太慢,

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对我们所制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觉得把握不大。当然,对现在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抱有敌视态度的人还有,我不讲那些人的问题。我想主要针对一些觉得我们的前途还不够明朗,心里还不够踏实的同志,讲一些意见。

应该说,我们的形势是很有利的。这里首先要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三年零三个月,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一年多来,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超过了全党的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问题当然还很多,都要解决,现在也正在逐步地解决,以后还要继续解决。总之,决不能怀疑这种根本转变。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首先,我们清查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三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政治保证。其次,

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第三,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36],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101]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

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10]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第五,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2]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24]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第六,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74]、“三不主义”^[103],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第七,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第八,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

了正轨。我并没有举全,就举这么一些事情。这么多的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确实不容易,在三年以前是难于想象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改变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转入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这样我们才能够转移工作着重点,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就根本不可能。事实证明,我们三年来在政治方面确是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在经济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绩。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破坏,而且这十年以前也存在着许多混乱。经过三年的努力,恢复到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成绩。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现在有人议论、责怪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好多事情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已经取得的好经验也没有条理化、制度化,还有很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因此,说句公道话,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没有搞好,首先不能责怪经济部门,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责任首先在中央。当然,经济部门的工作也有缺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大家都要着重向前看,提出积极的建议,不要埋怨、责备。这三年中,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从上到下,在经济部门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有不少同志过去靠边站,一靠边就是好多年,对情况的了解中断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还不久,就是原来在岗位上的同志,也面临新的问题,一下子还不熟悉,摸不透,对于国内外的情况不很了解,工作中有这样那

样的缺点是难免的。只要大家都虚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工作就会不断改进。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我们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提出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出了两个决议^[80],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三中全会以后,提了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去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七百万人以上,今年还要继续安排。同时,加强了轻纺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了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财政体制在逐步改变,其他体制也决定了逐步改变的试行办法。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今后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改革。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看看农村。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农村。现在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城市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物价方面有些混乱,但是大多数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

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04],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就外交方面来说,这三年期间,我们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76],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23]同志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84]同志和我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对越自卫还击战^[81],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应该看到我们的成

绩。应该看到,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各个领域,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国际事务方面,为进入八十年代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总之,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是好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我们是满怀信心进入八十年代的。对于国内的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当然,因为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一部分群众受害中毒,也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教育不够,他们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有耐心、有信心,逐步去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充分的觉悟,在根本问题上毫不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团结、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大家都充满信心地进入八十年代。

第二部分,讲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

这个讲法是在政协提出来的,大家觉得这样讲法还可以。这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当然,这四条不能包括一切,但是它大体概括了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指出了当前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

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近二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77],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拿钢来说,平平稳稳地发展,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而且合用。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

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今年的计划好了一些,但要根本扭转这种状况,还要经过很大努力。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首先照顾到重点,但是,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

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

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去年一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了、或者说基本上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点混乱,好像把我们吃过的苦头忘记了。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

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93]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当然,他们也并不了解什么

是资本主义,台湾的真情实况如何,不少人是误入歧途的,需要教育挽救。但是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容忍这些人,容忍这些“四人帮”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人民对我们很不满意。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了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效,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

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总之,在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各级党组织直到每个支部的态度都要十分坚定,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现。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不是又在“收”了?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放”,当然也谈不上“收”。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容忍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什么时候我们说过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老实说,对于这样一些活动,现在应该从重处理,不是从轻,乱得太不像话了。国家不管是不行的。对这类分子的法律措施要从严,从严了才可以教育过来一批青年。要讲法制,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现在我们严肃处理这样一批人,不但对绝大多数犯罪分子是一种教育,对全党、全国人民也是一种教育。我们要在全国坚决实行这样一些原则: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真正要巩固安定团结,主要地当然还是要依靠积极的、根本的措施,还是要依靠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同时也要依靠完

备法制。经济搞好了,教育搞好了,同时法制完备起来,司法工作完善起来,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障整个社会有秩序地前进。但是法制要在执行中间逐步完备起来,不能等。现在这样一大批犯罪分子不严肃处理,那还说什么法制。对于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人,都要分别情况,严肃对待。

为了实现安定团结,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们,要从各方面来共同努力。毫无疑问,这些方面的工作搞好了,可以在保障、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方面起非常大的作用。但是如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我们希望报刊上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这就是说,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总之,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报刊、广播、电视都要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作为自己的一项经常性的、基本的任务。报刊、广播、电视三年来都有很大的成绩,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在这些部门工作的同志,也需要经常倾听来自各方面的不同意见,分析和改进自己的工作。文艺界刚开了文代会,我们讲,对写什么,怎么写,不要横加干涉,这就加重了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和对自己工作的要求。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

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社会主义新人当然要努力去实现人民的利益,捍卫社会主义祖国的荣誉,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前途而英勇献身。文艺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我们衷心地希望,文艺界所有的同志,以及从事教育、新闻,理论工作和其他意识形态工作的同志,都经常地、自觉地以大局为重,为提高人民和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奋斗不懈。

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有人说,三中全会是放,四项基本原则是收。这完全是歪曲。共产党员决不能够容忍这种歪曲,而且必须坚决反对这种歪曲。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决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

我们坚持发展民主和法制,这是我们党的坚定不移的方

针。但是实现民主和法制,同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样,不能用大跃进的做法,不能用“大鸣大放”的做法。就是说,一定要有步骤,有领导。否则,只能助长动乱,只能妨碍四个现代化,也只能妨碍民主和法制。“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载在宪法上的。现在把历史的经验总结一下,不能不承认,这个“四大”的做法,作为一个整体来看,从来没有产生积极的作用。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但是“大鸣大放”这些做法显然不适宜于达到这个目的。因此,宪法有关“四大”的条文,根据长期实践,根据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党中央准备提请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审议,把它取消。

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过去,一些比较小的工资很低的国家和地区,由于有些发达的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了它们,它们的廉价产品在一定时期的国际市场上也比较容易钻空子。资本家把高额利润分一点给这些地方的劳动者,劳动者的生活就显得改善很快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不可能走“捷径”。我们要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也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但是必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林彪、“四人帮”提倡什么穷社会主义、穷过渡、穷革命,我们反对那些荒谬反动的观点。但是,我们也反对现在要在中国实现所谓福利国家的观点,因为这不可能。我们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生活。发展生产,而不改善生活,是不对的;同样,不发展生产,

要改善生活,也是不对的,而且是不可能的。

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左邻右舍,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和纪律。比如去年我们疏忽了一点,出了一股滥发奖金风,奖金一项发了约五十亿。其中大部分是发得对的,也有相当部分发得不对,不是小数。有些生产、利润都没有完成计划的单位也发了奖。有些商品乱涨价,也与一些企业追求多得奖金有关。好多地方工人的实际收入成倍地增长,就是由于滥发奖金长上去的。另一方面,好多行业得不到奖金,特别是教育、科学研究机构、政府机关和军队,这就造成不合理的苦乐不均,造成新的社会问题。如果去年少发二十亿奖金,今年大家的日子要好过得多,基本建设的好多项目就可以不下马。这股滥发奖金风,“改善”了少数人的生活,但是增加了全国人民很多的困难。顺便说,我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措施是非常正确的,确实起了刺激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但是如果进一步总结经验,也许分两步走,对财政、物价的影响要小一点。在我们的工作中,今后还可能出现类似的问题。因此,必须再一次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我们是个穷国、大国,一定要艰苦创业。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提高人民的收入,必须建立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多劳多得,也要照顾整个国家和左邻右舍。解决这类问题,步子一定要稳,要对群众很好地进行引导,千万不能不负责任地许愿鼓动。比如最近有个简报,讲到北京一个电视机厂,去年年产九英寸黑白电视机二万台,平

均日产五十多台 ;后来搞了一条日本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生产线 ,设计能力日产六百台 ,现在已经日产四百多台。因此人们就议论要多得奖金。如果按照它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倍数来发奖金 ,那个奖金就发不起。当家作主的劳动人民 ,不能不给国家创造更多的利润 ,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来用之于其他方面 ,用之于扩大再生产 ,用之于基本建设 ,进一步加快我们发展经济的速度。多劳应该多得 ,但是必须照顾整个社会。就这个厂的例子说 ,只是一条生产线 ,在本厂也要考虑别的车间。这样的现实问题 ,越来越多地摆在我们面前 ,是任何人都不能不考虑的。

我们对于艰苦创业 ,要有清醒的认识。中国这样的底子 ,人口这样多 ,耕地这样少 ,劳动生产率、财政收支、外贸进出口都不可能一下子大幅度提高 ,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不可能很快。所以 ,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 ,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 ,他问 ,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跟他讲 ,到本世纪末 ,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 ,算个小康水平。这个回答当然不准确 ,但也不是随意说的。现在我们只有二百几十美元 ,如果达到一千美元 ,就要增加三倍。新加坡、香港都是三千多。我们达到那样的水平不容易 ,因为地广人多 ,条件很不一样。但是应该说 ,如果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真正达到每人平均一千美元 ,那我们的日子比他们要好过得多 ,比他们两千美元的还要好过。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剥削阶级 ,没有剥削制度 ,国民总收入完全用之于整个社会 ,相当大一部分直接分配给人民。他们那里贫富悬殊很大 ,大多数财富是在资本家手上。

我们要经常记住,我们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只有长期奋斗才能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例如煤产量,一九七八年,美国商品煤五亿九千九百多万吨,苏联原煤七亿二千四百万吨。我们去年的原煤也达到六亿三千多万吨,似乎不算少。但是,按每人平均占有量计算,我们就少多了。又如钢,日本差不多一个人一吨钢,美国和苏联是两个人一吨钢。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比如法国、英国、西德,大体上也是两个人一吨钢。如果我们要达到两个人一吨钢,到本世纪末,就算只有十二亿至十三亿人口,也要六亿吨钢。这不可能,也不必要。如果我们达到一亿或两亿吨钢,那我们也是十二个人或六个人一吨钢。总之,我们拥有各种有利条件,一定能够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但是也要认识到,为了缩短和消除两三个世纪至少一个多世纪所造成的差距,必须下长期奋斗的决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不能不提倡和实行艰苦创业。

艰苦创业,首先要我们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带头。我们不是反对特殊化吗?这是一场严肃的斗争。特殊化不只是部分高级干部,各级都有,各个部门都有。总之,我们一些干部成了老爷就是了。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一定要努力恢复延安的光荣传统,努力学习周恩来等同志的榜样,在艰苦创业方面起模范作用。中央已经作了一些规定,今后还要作更多更严的规定。对于违反中央规定的党员干部,一定要进行认真的教育,教育无效的就要实行组织措施以至纪律处分。

反对特殊化只是艰苦创业中的一个问题。最大的问题还是要杜绝各种浪费,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不合社会需要的产

品和不合格质量要求的废品,降低各种成本,提高资金利用率。要使大家懂得,我们的资金来之不易,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来之不易,任何浪费都是犯罪。生产有了发展,还要照顾到以后的发展,要搞基本建设,要实现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补偿多年来的欠帐。比如,我们的城市需要建设,搞下水道、房屋、交通,办学校。我们的教师、科学工作者的生活有许多困难迫切需要解决;只有几十块钱收入的知识分子,很多很得力的人,能够有稍微好点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可以为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多的问题,创造大量的财富。如此等等。所以无论是在生产建设以前,生产建设过程中间,还是在生产建设得到了产品以后,都不允许有丝毫的大手大脚。去年增产节约有了很大成绩,这很好,但是浪费还是不少。这方面的责任主要在干部,包括刚才说的滥发奖金在内。前不久,国务院有关部门拟定了一个关于奖金问题的新章程,正式下达以后,要严格按照章程办事。现在这样各行其是不行,这样干,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我们要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四个现代化,理所当然的,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有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要遵守党的纪律和国家的纪律。应该说,我们党内、国内本来就有一些非社会主义思想,由于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和其他种种原因,加上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外交关系、外贸关系,并且还在发展这些方面的关系,所以,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渗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有必要反复强

调,我们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今天重申这一点,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最近有一位华裔学者说,希望中国无论如何不要走台湾的道路,不要像台湾那样搞现代化,那里的经济实际上是美国控制的经济。我们选拔干部,必须要注意了解他是不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干部,要加强教育,必要时调动。我们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提高民族自尊心,还要进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本主义腐蚀的革命品质教育。现在有一部分青年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全党必须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定要分析原因,找出办法,认真有效地加以解决。

但是,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实在不能学、不愿学的要调整。我们要按照专业的要求组织整个领导班子,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并且领导广大群众,按照专业的要求,去学习和工作。

这里要说一说红与专的关系。专并不等于红,但是红一定要专。不管你搞哪一行,你不专,你不懂,你去瞎指挥,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耽误了生产建设的发展,就谈不上是红。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现在国际国内普遍都感觉到我们人浮于事,官僚主义,办事拖拉,到处靠开会画圈过日子。

子,许多问题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拖到半年解决不了。这样还搞什么四个现代化。所以好多外国人说,中国这样搞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国内的人民也有这个议论。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要改变干部缺少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状态。现在我们的干部是不是多,像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各行各业,一千八百万干部,就绝对数字来说,并不算多。问题是干部构成不合理,缺乏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多,具有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干部太少。比如现在我们能担任司法工作的干部,包括法官、律师、审判官、检察官、专业警察,起码缺一百万。可以当律师的,当法官的,学过法律、懂得法律,而且执法公正、品德合格的专业干部很少。又如我们的教师,合格的大中小学教师,全国如果增加二百万、三百万,不算多。我们的学生,中小学生多,大学生很少,在校的不过一百万。拿美国来说,在校大学生一千万,它是二亿二千万人口,二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个。如果我们有二百万到三百万在校大学生,我们培养的专门人才就会比较多。这就要求增加办学校的人才,增加教师。我们中小学教师也不够,很多教师负担太重,影响到教学水平。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是专业人员。比如学校党委的领导同志,应不应该是专业人员呢?应该是。他可以不是教学人员,但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专业人员,会管某一类学校。总之,目前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干部太多,而是不对路,懂得各行各业的专业的人太少。办法就是学。一个是办学校、办训练班进行教学,一个是自学。要下苦功夫学。在哪一行的,不管年龄多大,必须力求使自己学会本行。学不会的或者不愿学的,只能调整,

没有别的办法,你耽误事业嘛。今后的干部选择,特别要重视专业知识。我们长期都没有重视,现在再不特别重视,就不可能进行现代化建设。没有专业知识,又不认真学习,尽管你抱了很大的热心建设社会主义,结果做不出应有的贡献,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还起相反的作用。现在的事情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我们相当一个时期常搬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其实我们真正好好研究一下战争年代军队的经验,还是红与专的统一。在座的好多战争年代参加革命的同志,哪一个不专于军事?你不懂打仗就不行。当然,打仗有多种手段,包括后勤,搞后勤也是为了打仗。那个时候,红与专是统一的,也比较容易统一。现在就不同了,搞建设,行业非常多,每一项都需要有专门知识,还要不断增加新知识。就是现在的军队也不同了。过去的军队是小米加步枪,懂得射击、刺杀、扔手榴弹就可以上阵了。现在海军就得有海军的专业知识,空军就得有空军的专业知识。参谋业务也同那个时候不同,知识面要宽得多。现在军队沿用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而这正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至于搞经济建设、搞教育、搞科学、搞政法等等,应该说,我们的专业人才太缺乏了。所以,我们需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而且是一支宏大的队伍。

我们需要有越来越多的专门人才,但是,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就没有人才呢?不是,是我们的各级党委,特别是一些老同志,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没有去有意识地发现、选拔、培养、帮助一批专业的人才。前几天,在广州开了个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有个消息很值得高兴,我们的粒子物理理论的水平,大

体上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就是说,我们已经有相当先进的水平,而且有一批由我国自己培养出来的取得了成就的年轻人,只是人数比一些先进国家少得多。这就说明,我们并不是没有人。好多人才没有被发现,他们的工作条件太差,待遇太低,他们的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们一些老同志要有这样的觉悟,不要看不起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不如我们行。其实,我们过去干工作多大岁数?还不是二十几岁就做大工作了。现在的人就比我们蠢一些呀?我看还是要开明一点,要从大局着眼,要从我们事业的前途着眼。有能干的人,我们要积极地去发现,发现了就认真帮。我们要逐渐做到,包括各级党委在内,各级业务机构,都要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来担任领导。现在特别要注意从四十岁左右的人中间选拔。四十岁左右是一个什么含义?大体上是五十年代进大学的人。建国三十年了,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毕业,那个时候是二十五岁左右,现在就是四十岁左右到四十五岁左右。当然,选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岁内外的。这批人是我们的重要财富。在座的恐怕这样年龄的不算多,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在座听报告的同志中,四十岁左右的占了主导地位,那是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的标志。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还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来安慰自己。我们要看到我们事业的前途。我们的人才本来就少,决不能再浪费人才,我们经不起这个浪费。老同志的最主要的任务,第一位的任务,是提拔年纪比较轻的干部。别的事情搞差一点,这件事情搞好了,我们见马克思还可以交得了帐,否则是交不了帐的。

第三部分,讲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上面说的八十年代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任务都是很繁重的。但是,我认为,只要坚持并且改善党的领导,由此带动其他工作,我们的任务就能够完成。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这个党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力量,是无产阶级的、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觉悟的、有革命纪律的先进队伍。我们党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是六十年的斗争历史形成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也很有些思想混乱。有些青年,迷信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民主。一九五七年就有个“轮流坐庄”的说法,现在那些所谓“民主派”、“西单墙”那批人,也在做这个文章。所以,现在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从根本上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当然也就没有刚才我们说的三件大事和四个前提。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的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那些对此暂时抱有某些怀疑态度的纯洁的青年,只要多经历一些时间,最后还是会同意的。

可以回顾一下我们走过的道路。中国革命,没有中国共产

党,能够成功吗?不可能的。不要小视我们的党。最近我看到一个材料,党的四大^[105]时只有九百多个党员,就那么九百多人的一个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推进了北伐战争。以后革命失败了,只有我们的党才能够经得住十年的血腥恐怖,百万大军的“围剿”,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因为有党的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千难万苦的奋斗,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党也犯过严重错误,但是错误总还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的,不是别的力量来纠正的。就是粉碎“四人帮”,也是由我们党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来实现的。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但是自从我们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全国团结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只要我们党的领导是正确的,那就不仅能够把全党的力量,而且能够把全国人民的力量集合起来,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有什么好处?那种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互相倾轧的竞争状态所决定的,它们谁也不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在资本主义国家,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的理想,许多人就没有理想。这种状况是它们的弱点而不是强点,这使它们每个国家的力量不可能完全集中起来,很大一部分力量互相牵制和抵消。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在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我们全国人民有共同的根本利益和崇高理想,即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并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所以我们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我们党同其他几个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要坚持下来。但是,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

不可能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要看到,为了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努力改善党的领导。林彪、“四人帮”对我们党损害极大,现在应该说,我们党在人民当中的威信不如过去了。过去,我们克服困难,党的一个号召,党中央的一句话,全国照办,非常顶事。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那样的严重困难,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很快就克服了。那是很值得回忆的。两千多万职工下放,走群众路线,讲清楚道理,大家并不埋怨。现在就不那么容易了。为什么呢?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踢开党委闹“革命”,党被打乱了;“四人帮”实行的是帮领导、帮统治。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问题,是要恢复党的战斗力。党应该是一个战斗的队伍,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该是统一的、有高度觉悟的、有纪律的队伍。只有恢复到这种状态,党才能有战斗力。

这里有几个问题。首先,我们的党员现在有一部分不合格。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入党的新党员中,有一些因为一直没有受到党的教育,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合格。我们有些老党员长时期很合格,现在也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不那么合格了。我们提倡党性,反对派性。有些人就是死抱着那个派。派性高于党性的大有人在,包括我们某些老党员在内,这还怎么合格?过去我们党的威力为什么那么大?打仗的时候我们总是说,一个连队有百分之三十的党员,这个连队一定好,战斗力强。为什么?就是党员打仗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生活上吃苦在先,享受在后。这样他们就成了群众的模范,群众的核心。就是这么个简单的道理。那个时候当个共产党员不容易。当个共产党的干部,比如当个连长、当个排长,行军时候一个人

要背两三支长枪。现在有些共产党员不同了,他们入党是为了享受在先,吃苦在后。我们反对特殊化,其实就是反对一部分共产党员、一部分党员干部特殊化。所以现在我们提出,我们这个党要恢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有一个党员要合格的问题。合不合乎党员的资格,合不合乎党员的条件,这个问题不只是提到新党员面前,也提到一部分老党员面前了。所以,我们党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党员有了三千八百万。如果这三千八百万都合格,那将是一支多么伟大的力量!问题是有一部分党员不合格,要在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整顿。中央正在考虑修改党章。九大、十大^[106]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些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对党员的要求一定要严格。我们需要通过讨论党章草案,对全党进行教育,然后在十二大正式通过党章。

我们要改善党的领导,除了改善党的组织状况以外,还要改善党的领导工作状况,改善党的领导制度。这是个复杂的问题。大家知道,刚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讲过,我们过去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现在面临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东西。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认真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更迫切更严重了。现在领导一个地区、一个部门,领导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支部队,工作都比过去复杂多了,困难多了。比如经济工作,我们当然总还是做了不少好事,但是,我们真正有系统地学会了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呢?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和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很不同。现在的经济工作,问题比五十年代又复杂得多。条件不同,面临的

任务也不同。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了,国际交流发展了,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要拿国际水平的尺度来衡量一下。在不断出现的新问题面前,我们党总是要学,我们共产党人总是要学,我们中国人民总是要学。谁也不能安于落后,落后就不能生存。但是共产党员中具有专业知识的人究竟有多少?特别是我们的领导干部中具有专业知识的有多少?目前的状况不改变行吗?当然,党员就是具有了专业知识,党也不能够代替一切,包办一切,现在尤其不能这样。党应该居于领导的地位,但是,上面说的这些问题必须认真研究解决。我想,我们党的下次代表大会必须着重地研究这些问题,现在就要做准备,大家来讨论,要系统地、切实地解决这些问题。

关于改善党的领导,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比如,我们历来说,工厂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军队是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如果今后继续实行这个制度,那末,工厂的车间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班组里边是否也要由党支部或者党小组领导?同样,大学的系是否也要由党总支领导?这样是不是有利于工厂和大学的工作?能不能体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这个问题解决得不好,可能损害党的领导,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是加强党的领导。共产党实现领导应该通过什么手段?是用这种组织形式,还是用别的办法,比如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包括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成为各种专业的内行,并且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比一般人负担更多的工作。一个工厂的党委,总必须保证在产品的数量、质量和成本方面完成计划;保证技术先进、管理先进、管理民主;保证所有管理人员有职有权,能够有效率、

有纪律地工作 ;保证全体职工享受民主权利和合理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学习条件 ;保证能够培养、选拔和选举优秀人才 ,不管是党员非党员 ,凡是能干的人就要使他们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能够保证这些 ,就是党的领导有效 ,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 ,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

总之 ,怎样改善党的领导 ,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 ,不解决这个问题 ,坚持不了党的领导 ,提高不了党的威信。

为了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加强党的纪律。文化大革命期间 ,党的纪律废弛了 ,至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这也是党不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纪律相当废弛 ,许多党员可以自行其是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党的决定 ,党规定的任务 ,可以不执行或不完全执行。一个党如果允许它的党员完全按个人的意愿自由发表言论 ,自由行动 ,这个党当然就不可能有统一的意志 ,不可能有战斗力 ,党的任务就不可能顺利实现。所以 ,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必须严格地维护党的纪律 ,极大地加强纪律性。个人必须服从组织 ,少数必须服从多数 ,下级必须服从上级 ,全党必须服从中央。必须严格执行这几条。否则 ,形成不了一个战斗的集体 ,也就没有资格当先锋队。

这里我要说 ,这几条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全党服从中央。中央犯过错误 ,这早已由中央自己纠正了 ,任何人都不允许以此为借口来抵制中央的领导。只有全党严格服从中央 ,党才能够领导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为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任务而战

斗。任何人如果严重破坏这一条,各级党组织和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必须对他严格执行纪律处分,因为这是党的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所在。我们要坚决发扬党的民主,保障党的民主。党员对于党的决定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发表,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可以通过组织也可以直接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意见。从中央起,各级党组织都要认真考虑这些意见。但是,中央决定了的东西,党的组织决定了的东西,在没有改变以前,必须服从,必须按照党的决定发表意见,不允许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布不信任、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对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党员当然有权利进行批评,但是这种批评应该是建设性的批评,应该提出积极的改进意见。现在不是讲什么这样那样的问题可以讨论吗?可以讨论,但是,在什么范围讨论,用什么形式讨论,要合乎党的原则,遵守党的决定。否则,如果人人自行其是,不在行动上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决定,党就要涣散,就不可能统一,不可能有战斗力。因此,必须坚决肃清由“四人帮”带到党内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以及在党内新出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只有坚决保证党的统一和战斗力,才能完成我们今天所提出的各项任务。

上面所说的几件大事,几个必须实行的原则,归根到底,是说要有一个好的党来领导。我们历来说,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由于历史上的曲折,产生了一些差距。但是经过三年来的奋斗,这些差距已经基本上消除了,或者正在努力消除。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力求做得比较正确,或者说力求少犯错误,避免大的曲折,大的错误,有了错误尽快纠

正。我完全相信,我们党,我们党的中央,一定能够做到这一步,我们是充满信心的。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我们的党,中国在国际反霸权主义斗争和争取人类进步事业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我们党。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能够胜任对于整个国家和各族人民的巨大领导责任。

坚持党的路线 ,改进工作方法^{*}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我今天讲三点 :一、讲这次会议 ;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 ,这次全会很重要 ,开得很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全会 ,都是开得好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 ,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这次全会 ,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欲言 ,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 ,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发扬下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 ,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 ,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 ,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 ,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 ,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 ,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 ,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 ,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刘少奇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都解决得很好。

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上,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想多说几句。

我们从党的十一大^[52]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

作大大地前进了。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反映,党章修改草案是有特色的,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也许还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完善。修改草案中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还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

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比如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101],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77],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

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107〕}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已经实际上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

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18〕}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93〕}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

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一九七五年王洪文^[43]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84]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五年以后再開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

子就给卡住了。如果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对那些拒绝接受教育、不愿改变立场的分子手软,仍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地方有的是。因此,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

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

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精简军队 ,提高战斗力^{*}

(一九八 年三月十二日)

军队的问题 ,最近我和一些同志谈过 ,主要有四个问题 :
第一是“消肿” ,第二是改革体制 ,第三是训练 ,第四是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第一 ,讲“消肿”。

这次会议主要是研究军队“消肿”这个老问题。我们军队有没有战斗力 ?一旦有事行不行 ?我讲的不是像对越自卫还击战^[81]这样的事 ,这样的事好应付。如果从我们面临的更强大的对手来说 ,衡量一下我们的战斗力 ,可靠性怎么样 ?当然 ,我们还有很多不利的因素 ,比如有好多干部没有打过仗 ,缺乏指挥作战的经验 ,装备又比较落后 ,等等。但是经过对越作战可以看出 ,勇敢这两个字我们还是有的。军队勇敢 ,这很好。仗打起来 ,开始可能吃些亏 ,经过一段时间情况就会变化 ,有勇敢这一条 ,我们就能学会打仗。这一点我们是有信心的。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们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 ,就是军队很臃肿。真正打起仗来 ,不要说指挥作战 ,就是疏散也不容易。现在提出“消肿” ,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 ,以及由此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这件事在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提出过,做了一些工作,也见效,后来由于遇到曲折,停了下来。经过这几年,军队的各级机构又加大了,随之官僚主义现象也发展了起来。现在解决问题很难,好多问题一拖就是好长时间。因此,军队要提高战斗力,提高工作效率,不“消肿”不行。还有,我们国家现在支付的军费相当大,这不利于国家建设;军队人员过多,也妨碍军队装备的现代化。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如果能够节省出一点用到经济建设上就更好了。冷静地判断国际形势,多争取一点时间不打仗还是可能的。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军费开支来加强国家建设。总之,搞四个现代化也好,把军队搞精干、提高战斗力也好,都需要“消肿”。

我们这次精简,主要是减少不必要的非战斗人员,减少统率机构、指挥机构人员。最主要的是减少干部。这次的措施比一九七五年更进了一步。比如,各级指挥员人数,过去保留得多一点,这次要力求少一点。很多同志提议,一个团两个副团长、一个副政委就可以了,这个意见好。师也可以这样做嘛。现在领导班子实在太太。这个问题如果不果断处理,再过几年,不晓得问题会变成什么样子!请大家对比下一九七五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情况。一九七五年时,军队要包起来的干部已经相当多了,现在,相隔四年之后,要养起来、要退休的人就更多了。如果我们现在还不下决心解决,再过几年,问题会更多、更大,处理起来会更困难。所以不下这个决心不行了。特别还要看到这样一个情况:军区一级、军一级、师一级干部,年龄大体差不多,都相当大了。过几年,统统老了,不但不能到军、师工

作,到军区、总部工作也不好办。这是自然规律。在座的同志再过五年怎么样?恐怕到那时不说所有的人,就说大部分人,要坚持工作也困难了。再过七年八年,都七十岁出头了,你还能在战场上见分晓啊?真正打起仗来,三天三夜不睡觉行不行啊?所以,现在的“消肿”也有利于我们干部的更新。我们下面的干部之所以上不来,就是因为上面盖住了。这不只是军队,地方也一样。今天,主要的岗位还只能由老同志来搞,再过几年总不行了嘛。所以,这次精简要把盖子揭一层,包括团级的、营级的、连级的都要揭,为提拔新生力量创造一个条件。

对减下来的干部,我建议组织各种训练班进行训练。训练什么呢?就是准备到哪个行业就专门学习哪一行的业务。地方上没有房子,可以利用军队的营房,教员请地方出。这些干部往哪里安置,可以同国务院有关各部门商量。地方上也有可以容纳的行业。比如,与军队干部的特长比较接近的政法工作,就需要大批干部。现在,警察不够,警官更不够,法院院长、法官、律师、检察官、审判员都缺乏。一般资本主义国家考法官、考警察,条件很严格,我们更应该严格,除了必须通晓各项法律、政策、条例、程序、案例和有关的社会知识以外,特别要求大公无私、作风正派。按道理,军队的干部应该比较合格。这方面军队可输送一大批干部。又比如,我们现在缺乏教员,可以安排一批军队转业干部去教书。当然,转业干部中能当大学教员的,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但是,能当中学、小学教员的还有的是。要说服这些同志去当教员。大家提到,大专学校设军体教员,这方面名额有限。全国大专学校只有几百所,每所学校假定平均用十个人,顶多能容纳几千人、万把人。但对中小

学教员的需要是大量的。如果我们培训一批合格的教员,地方上可以容纳。还有,各行各业缺乏管理人员,只要经过训练,条件相宜,也可以安排一批。军队干部指挥部队,也是管理,总有管理知识嘛。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各行各业都愿意接纳军队的人呢?因为军队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文化水平比较高,还有管理方面的知识。我们军队转业干部中会管企业的人不多,但是总有管理军队的经验嘛。问题就是需要培训,转到哪一行就学哪一行。训练时间,有的半年,有的一年,有的一年半。经过训练,再转到地方,地方就比较容易安置。过去从军队转业到地方,无非去当政治部主任,搞政治工作或一般工作。现在这些人不缺,还有多余的。所以,要根据地方需要,按专业办训练班、速成学校等培训干部,解决“消肿”后的干部安排问题。

第二,讲改革体制。

体制问题,实际上同“消肿”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要“消肿”,不改革体制不行。现在我们的体制有很多问题。比如,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大总部为什么机构这样大?过去,每提出一个新的任务都要增加机构,增加人员,从来没有说减少人员。大家对公文旅行、解决问题慢,意见很多,这些也都和体制问题有关。

体制、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五十年代搞了个军官服役条例,一直没有行通,后来放下了。其实那个条例基本上是个好设想、好办法。如果那个东西执行了,就不会有现在的困难。这次会议后,就要着手研究这个问题。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国务院也要办这件事。军队干部的退休年龄要比地方干部小一些,因为军

队要打仗。当然规定要切实可行。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军队不建立退休制度,也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气。有了退休制度,人人都知道自己到哪年该怎么样,这就比较好办。否则一个人一个人地处理问题,处理不下去。军队老同志退休,办法是军队把房子盖好,再转给地方。现在只能这样做,因为地方一下子接管还很难。还有,军队有些方面的工作人员可以改成文职人员、雇佣人员,不穿军服。军事院校的好多教员,也可以用文职人员,不一定用军人。教数理化为什么一定要军人呢?该当教授就当教授,该当讲师就当讲师。军队医院也可以实行医务人员的制度,定技术职称,搞那么多行政职务干什么?这些问题都要制度化。制度化以后,编制就不会臃肿,该用一个人就是一个人,该用几个人就是几个人。总之,这一套制度要建立起来,要好好地找些人来专门研究。

这次精简,有了一个编制方案。但是还要进一步研究我们的编制、体制。有些同志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有的同志提出,根据各战区特点,根据军队装备不断改进的情况,搞些合成军、合成师。这样便于平时合成训练,便于指挥员熟悉特种兵的指挥,就能把平时训练和战时使用结合起来,免得临时配属不习惯。这些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研究时可能还要接触到别的体制问题。

第三,讲训练。

一九七五年我们就提出要把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因为不打仗,部队军事素质的提高就得靠训练。这一段时间做了许

多工作,但是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好,现在重新提出来,并作为一个制度问题加以解决。

现在打仗,我们的军官没有现代化战争的知识不行。当个连长,不是过去的连长,当个团长,不是过去的团长,要有知识,天上、地下,陆上、水下,包括通信联络都要懂得。要从制度上考虑,从排长起,各级军官都必须经过军官学校的训练。排连干部要初级步兵学校毕业。毕业后,一般的当排长,好的当连长。营团干部要进过中级军官学校。从排长、连长里选好的来学,经过一定时间学习才去当营长、团长。军和师的领导干部也要进过高级军官学校的才能当。这个要制度化。我们现在有条件这样做。过去是在战争中训练,从战争中学习,而且那个学习是最过硬的。但是现在,即使有战争,不经过学校学习也不行,因为装备不同了,指挥现代化战争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如果连地图都不认识,那怎么行啊!现在还不是会不会识图的问题,那个还容易解决。现代化战争非常复杂,连通信联络都不容易。一个连作战,配属你几辆坦克、几门火炮,你怎么指挥?你连长没有这个知识是不行的呀!所以非学习不行。军官的晋升也要制度化。每个阶段的晋升都必须经过学习,掌握现代化战争的知识。特种兵也应该如此。徐向前^[108]同志每次都讲要多办学校,这个意见很好、很对。宁肯少几个兵,少几个机关人员,也要把学校办好,让多一点人进学校。

平时部队的训练,大家也还是在抓,确实也需要抓紧。但是不能总是停留在练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的水平上,现在单练这些就不够了。怎样对付坦克、飞机等等,每个战士都得学会。怎样把天上地下协同起来,我们也要学会。刚才我说要编

组合成军,就是要逐步地把部队合成起来,通过平时训练,使大家熟悉这方面的知识,学会这方面的本领。

最后,讲一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同志们在发言中也接触到了这个问题。有人反映现在兵难带,特别是城市兵难带。城市里有的把一些不大守规矩的青年往军队里塞,这个问题以后征兵的时候要注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军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需要加强。现在这方面的工作有相当的削弱,政治工作人员不懂得做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军队所有的军事人员、政治人员都要做。今天上午我看了清华大学一个报告。清华大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学生从到学校第一天起,就要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学校的党团组织和所有的教员都要做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这样做很见效,现在学校风气很好。清华大学的经验,应当引起全国注意。又红又专,那个红是绝对不能丢的。一个学校都如此,我们军队就更应当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要从战士入伍第一天起就注意这个问题。

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 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一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

—

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

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间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同志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

^{*}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同志主持进行的。起草小组主要由胡乔木同志负责。从一九八一年三月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多次谈过对决议稿的起草和修改的意见。这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节录。

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不但全党同志,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

要写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延安时期那一段,可以说是毛泽东思想比较完整地形成起来的一段。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党的建设的理论和处理党内关系的原则,在延安整风前后,都比较完整地形成了。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109],对照着讲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全部内容。现在这一次,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在讲到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时候,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第二,对建国三十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

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当然,议论过去,将来也难以完全避免,但只是在讨论当前工作的时候,联系着谈谈过去有关的事情。现在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团结一致向前看。做到这点不那么容易。决议要力求做好,能使大家的认识一致,不再发生大的分歧。这样,即使谈到

历史,大家也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可说了,要说也只是谈对决议内容、对过去经验教训的体会。

总的要求,或者说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这么三条。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还是第一条。

过去常说十次路线斗争,现在应该怎么看?

彭德怀同志那一次^[110]不能算了。刘少奇同志这一次^[111]也不能算了。这就减去了两次。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团。陈独秀^[112],还有瞿秋白^[107]同志、李立三^[113]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罗章龙^[114]另立中央,分裂党。张国焘^[115]是搞阴谋诡计的。高岗^[116]是搞阴谋诡计的。林彪、江青更不用说了。

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至于是不是叫路线斗争,还可以研究。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1]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117]。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83]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总之,高饶问题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你们再斟酌一下。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101〕}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118〕}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你们提纲中最后的几条经验写得不错,还可以考虑再加一两条。

总起来说,对历史问题,还是要粗一点、概括一点,不要搞得太细。对有些同志在有些问题上的错误意见,要硬着头皮顶住。重要的问题要加以论证。要尽快搞出个稿子来。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九日同
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

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两次郑州会议^[119]也开得及时。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120]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接着就是困难时期。一九六一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12],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121],人民公社六十条^[122]。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123]上的讲话也是好的。可是到一九六二年七、八月北戴河会议^[124],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

清”〔125〕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批示〔126〕,江青〔44〕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总之,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77〕,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

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十七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党外、国内国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一九八一年四月一日同

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三

决议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一九五七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以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个基础。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段时间他的一些重要文章,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中间还要批评“两个凡是”^[18]的观

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两个凡是”的观点就是想原封不动地把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思想坚持下去。所谓按既定方针办^[127],就是按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方针办。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问题要讲一讲,也要讲得恰当。毛泽东同志多次不赞成歌功颂德,提出不以个人名字给地方、企业命名,不祝寿、不送礼。我们现在的中央所坚持的这一套,就是毛泽东思想,当然我们也有具体化的内容。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
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四

这次党内四千人参加的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决议讨论稿的篇幅还是太长,要压缩。可以不说的去掉,该说的就可以更突出。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势必要写。

关于毛泽东同志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写不写、怎么写,的确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找警卫局的同志谈了一下,他们说,把我前些日子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向战士们宣读了,还组织了讨论,干部、战士都觉得这样讲好,能接受。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总的来说,我们党的历史

还是光辉的历史。虽然我们党在历史上,包括建国以后的三十年中,犯过一些大错误,甚至犯过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错误,但是我们党终究把革命搞成功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还是毛泽东同志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国内的人民也罢,国外的华侨也罢,对这点都有亲身感受。也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真正实现了全国(除台湾外)的统一。旧中国军阀混战时期不必说了,就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家也没有真正统一过,像对山西、两广、四川等地,都不能算真正统一。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许多青年缺乏了解。

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当然,究竟怎么个写法好,还要认真研究大家的意见。

不说毛泽东思想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这些都对。但是应该承认,毛泽东思

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发展。这是客观的存在,历史的事实。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七大^{〔128〕}规定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一个大错误。但是我们党还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一直发展到今天。这些事情,还不是毛泽东思想教育的一代人干的。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总之,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的大错误。

现在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品质上。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

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129],打AB团的人品质都不好?开始打AB团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只是他比别人觉悟早,很快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到延安时候就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130]。在那种异常紧张的战争环境中,内部发现坏人,提高警惕是必要的。但是,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了,这样就难于避免犯错误。从客观上说,环境的确紧张。从主观上说,当然也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是想把所有老干部都整倒。如对贺龙^[131]同志,林彪从一开始就是要整的,毛泽东同志确实想过要保。虽然谁不听他的话,他就想整一下,但是整到什么程度,他还是有考虑的。至于后来愈整愈厉害,不能说他没有责任,不过也不能由他一个人负责。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

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五日同
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五

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

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今天我们也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阐述。当然缺点也有。从工作来看,有时候在有的问题上着急了一些。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经济上发生过问题,但总的说还是有发展。充分肯定成绩,同时也要讲到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庐山会议的错误。总的说来,我们还是经验不够,自然也有胜利之后不谨慎。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他曾经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这些事情写清楚了,再写“左”的思想的发展,以至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胡乔木^[132]同志的意见,我是赞成的。“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说“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一代人,其实还不止

一代。它使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泛滥,严重地败坏了社会风气。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有健康的方面。所谓“二月逆流”〔133〕,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胡耀邦〔96〕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134〕、李维汉〔135〕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

(一九八一年三月十八日同《历史决议》
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六

前天我去看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陈云同志说,他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受益很大。毛泽东同志亲自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他在延安的时候,把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认真读了一遍,这对他后来的工作关系极大。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总之,很需要学习马克思

主义哲学就是了。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意见，请你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同《历史决议》
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七

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106]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不管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好，九大也好，按照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对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和以后由临时中央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是否合法这个问题的决策^[136]（那个决策是英明的），说它们是非法的不好。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文化大革命”中间，我们还是有个党存在。如果现在否定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的合

法性,就等于说我们有一段时间党都没有了。这不符合实际。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一九七一年七月基辛格^[137]访华。同年十月,联合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投票赞成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美国很难堪。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松^[138]访华,上海公报签字。九月恢复中日外交关系。一九七四年四月,我去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代表我国政府发表讲话^[56],受到热烈欢迎,讲完以后,许多国家的代表前来热情握手。这都是事实。

(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同《历史决议》
起草小组负责同志的谈话)

八

这个文件差不多起草了一年多了,经过不晓得多少稿。一九八一年十月四千人讨论,提了很多好的重要的意见;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修改,反复多次。起草的有二十几位同志,下了苦功夫,现在拿出这么一个稿子来。

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想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当然,需要一个好的稿子。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

为了要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定了以后,提到六中全会。设想就在党的六十周年发表。纪念党的六十周年,不需要另外做什么更多的文章了。也还需要有些纪念性质的东西,但主要是公布这个文件。

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一点。我们总是想把它缩短到两万字以内,最后要求两万五千字,现在是两万八千字。现在看来,多三五千字没有关系,勉强缩短也不必要。当然,如果大家讨论当中能够在一些地方压缩点篇幅,那更好了。

这个文件是在四千人讨论和最近四十多位同志讨论的基础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见这里面吸收了。比如陈云同志提出,前面要加建国以前的二十八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见,现在前言有了。还有其他许多重要的意见,大家一看就晓得哪些是根据大家提的意见修改的。当然,也有些意见没有接受。

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

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第四,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九日在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九

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这个决议写了一年多了。中间经过四千人的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这次六中全会预备会的讨论是第四轮了。我看是相当认真、严肃,也相当仔细了。

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过去我们讲党的历史上多少次路线斗争,现在看,明显地不能成立,应该根本推翻的,就有刘少奇、彭、罗、陆、杨^[139]这一次和彭、黄、张、周^[140]这一次,一共两次。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是维持了,但也不好说是路线斗争。说罗章龙是路线错误,老实说也没

有说中。罗章龙是搞派别斗争,是分裂党,另立中央。高饶事件也是类似那么一个性质,当然还不是另立中央。瞿秋白的错误不到半年,李立三只三个月。过去评价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并不准确,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对十一大^[52],不要说什么路线错误。对“文化大革命”,我们也不说是路线错误,按它的实质分析就是了,是什么就是什么。实际上,现在这次决议对“文化大革命”错误性质的分析,超过了过去所谓路线错误的概念。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比如三中全会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这样的提法以后还可以用。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现在我们就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新时期的总路线。这次决议也用了路线这两个字,不是没有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

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当然,在那个条件下,真实情况是难于反对。但是,不能回避“我们”,我们承担一下责任没有坏处,还有好处,就是取得教训。这是从中央领导角度上说的,地方上没有责任。我和陈云同志那时是政治局常委,起码我们两个负有责任。其他的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合不合乎实际?也合乎实际。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要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要恰如其分,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23]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这次决议应该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会议的通报^[141]相衔接。现在这个决议稿子里面的许多措辞比通报要温和得多,更柔和一些,分量也减轻一些,我看这样比较好。为什么?因为这是叫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那个是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这是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一个文件。当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历史里面去的,但是这个历史决议是更庄重的一个文件,我想,分量更恰当一些,没有坏处。但是,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在这里需要点,因为合乎实际。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首先是这个问题。政治局决议正确不正确,华国锋同志的工作应该不应该变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时,按现在的政治动态来说,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四人帮”的残余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谁的旗帜?过去是打“四人帮”的旗帜,现在打谁的旗帜,就是打华国锋的旗帜,就是拥护华国锋。所以,这种动态很值得注意。当然,我们应该说,我跟好多同志也说

过,这些事华国锋同志本人没有责任,他自己并没有搞什么活动。但是,这种社会动态值得注意。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对于全党、对于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

另外有些问题,比如“文化大革命”原因中提不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决议中不涉及没有坏处。如果有必要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将来搞其他文件再说,来得及。这里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要批判的是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列宁关于小生产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一段话的误解或教条化,搬错了。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不涉及小资产阶级,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的讲话)

社会主义首先要发展生产力^{*}

(一九八 年四月——五月)

一

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 ,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 ,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 ,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

(一九八 年四月一日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二

中国建国三十年来 ,不论农业方面、工业方面 ,还是其他方面 ,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我们耽误了时间 ,生产力的发展太慢。任何革命都是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主义总要比资本主义优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 ,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 ,国家也就相应地更加强盛一些。在这一方面我们经过了几次曲折。

我们现在讲的四个现代化 ,实际上是毛主席提出来的 ,是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 年四月至五月四次谈话的节录。

周总理在他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出来的。而“四人帮”怎么说呢？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所以，林彪、“四人帮”完全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则。

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所以，从去年起，我们就把工作着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我们要把这条路线一直贯彻下去，决不动摇。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的谈话）

三

要充分研究如何搞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现在我们正在总结建国三十年的经验。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

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我们在这一方面吃的亏太大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

(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一日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的谈话)

四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也要考虑到国内各个不同地区的特点才行。例如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有些地区过去粮食能够自给,后来却不行了。当然,城市人口增加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脱离了当地的客观经济现实,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样制订出来的政策就不能调动积极性。最近一二年来,我们强调因地制宜,在农村加强了生产组的与家庭的生产责任制,取得明显效果,生产成倍增加。

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那时,在改造农业方面我们提倡建立互助组 and 小型合作社,规模比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粮食

生产得到增长,农民积极性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采取赎买政策,一方面把它们改造成公有制,另一方面也没有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我们长期允许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存在,根据自愿的原则,其中大部分组织成合作社,实行集体所有制。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乎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后来,在一九五八年,我们犯了错误,搞大跃进^[77],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了,这就使生产下降了。以后经过三年的调整,发生了变化,又较好地发展起来。但接着又搞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的调整。总之,我们现在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

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

(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的谈话)

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有发展变化。这种转变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

有人说,过去搞社会主义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这个意见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比如农业合作化,一两年一个高潮,一种组织形式还没有来得及巩固,很快又变了。从初级合作化到普遍办高级社就是如此。如果稳步前进,巩固一段时间再发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一九五八年大跃进^[77]时,高级社还不巩固,又普遍搞人民公社,结果六十年代初期不得不退回去,退到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些地方把原来规模比较合适的生产队,硬分成几个规模很小的生产队。而另一些地方搞并队,又把生产队的规模搞得过大。实践证明这样并不好。

总的说来,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所谓因地制宜,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的就不要去硬搞。像西北的不少地方,应该下决心以种牧草为主,发展畜牧业。现在有些干部,对于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还是考虑不多,仍然是按老框框办事,思想很不解放。所以,政策放宽以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当地具体条件和群众意愿出发,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宣传上不要只讲一种办法,要求各地都照着去做。宣传好的典型时,一定要讲清楚他们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根据自己的情

况搞起来的,不能把他们说得什么都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更不能要求别的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生搬硬套。

处理兄弟党关系的 一条重要原则^{*}

(一九八 年五月三十一日)

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

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但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的一部分。

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欧洲共产主义是对还是错,也不应该由别人来判断,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者否定,而只能由那里的党、那里的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践做出回答。人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这不能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嘛!

我们在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时,总的来说是清醒的。但是回过头看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不久前我同意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贝林格同志谈话时说,过去我们对意共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他也说,正确的并不都在他们方面。我说,我们两党之间过去的争论一风吹了。

总之,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一九八 年八月十八日)

同志们：

这次扩大会议，主要是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

—

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这次变动，包括华国锋^[23]同志不兼任总理，由赵紫阳^[142]同志接替；李先念^[84]、陈云^[83]、徐向前^[108]、王震^[143]同志和我不兼任副总理，由精力较强的同志担任；王任重^[144]同志因任党内重要职务，也不再兼任副总理。陈永贵^[145]同志请求解除他的副总理职务，中央决定同意。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席的人选，经过与有关各方协商，也准备建议做一些变动。以上这些变动，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反复研究过的。这次作为中央的正式建议，提交人大会议和政协会议讨论、决定。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八 年八月三十一日政治局讨论通过。

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原因是什么呢？

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权力过分集中，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行，妨碍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妨碍集体智慧的发挥，容易造成个人专断，破坏集体领导，也是在新的条件下产生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一个人的知识、经验、精力有限，左右上下兼职过多，工作难以深入，特别是妨碍选拔更多更适当的同志来担任领导工作。副职过多，效率难以提高，容易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

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中央一部分主要领导同志不兼任政府职务，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这样做，有利于加强和改善中央的统一领导，有利于建立各级政府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管好政府职权范围的工作。

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老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责任重大，而他们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帮助党组织正确地选择接班人。这是一个庄严的职责。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

中央的这些考虑，是为了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进行必要的改革。五中全会决定成立书记处，中央已经迈出第一步。书记处成立以来，工作很有成效。这次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是改善政府领导制度的第一步。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继续进行改革。

二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现、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

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这里着重讲一下从组织上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自觉地更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逐步实现领导人员年轻化、专业化的问题。

多年来，我们没有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大胆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大批干部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干部工作遭到严重破坏。这就造成了现在各级领导人员普遍老化的状况。人才问题，主要是个组织路线问题。很多新的人才需要培养，但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善于发现、提拔以至大胆破格提拔中青年优秀干部。这是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客观存在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来潮提出的问题。

有些同志担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时候，也许会把一些帮派分子甚至打砸抢分子选上来。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区、一些部门的领导班子没有整顿好，一些帮派分子可能利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名义，把他们的党羽提拔上来。我在今年一月十六日的讲话中说过，对“四人帮”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残余不可低估。我们在这点上一定要头脑清醒。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绝对不能提上来，一个也不能提上来，已经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坚决撤下去。如果不提高警惕，让他们占据领导岗位，重新要两面派，扎根串连，隐蔽下来，即使是少数人，也可能给我们带来无法预料的祸害。

有些同志说，干部还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好。一九七五年，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错误做法，我说过这个话。用坐火箭、坐直升飞机的办法提拔干部，我们再也不能这么干了。干部要顺着台阶上，一般的意义是说，干部要有深入群众、熟悉专业、积累经验和经受考验锻炼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能老守着关于台阶的旧观念。干部的提升，不能只限于现行党政干部中区、县、地、省一类台阶，各行各业应当有不同的台阶，不同的职务和职称。随着建设事业的发展，还要制定各个行业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将来很多职务、职称，只要考试合格，就应当录用或者授予。打破那些关于台阶的过时的观念，创造一些适合新形势新任务的台阶，这样才能大胆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阶，总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说。一定要真正把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来，快点提拔上来。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误现代化建设的大事。现在就已经误了不少啊！特别优秀的，要给他们搭个比较轻便的梯子，使他们越级上来。这次我们提出减少兼职过多、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目的之一，也是为了给中青年同志腾出台阶。台阶挤得满满的，他们怎么上来？台阶有了空位又不给他们，他们怎么上来？

有些同志担心，年轻人经验不够，不能胜任。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经验够不够，只是比较而言。老实说，老干部对于现代化建设中的新问题，不是也没有什么经验，也要犯一些错误吗？一般说来，年轻人经验少一些，这是事实。但是，同志们回想一下，我们中间许多人当大干部、做大事，开始的时候还不是二三十岁？应该承认，现在一些中青年同

志的知识，比我们那个时候并不少。经过的斗争考验少一点，领导经验少一点，这是客观条件造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嘛。放在那个位置上，他们就会逐步得到提高。解放后大专、中专毕业的学生七八百万，其中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家庭，经过了十年以上的锻炼。没有受过大专、中专教育的中青年干部有实践经验，缺点是文化知识水平低一点，只要有计划地训练和培养，很多人一定可以成为又红又专的干部。此外还有一大批刻苦自学的中青年优秀人才。上山下乡的青年中，也有不少深入群众、用功学习、很有才干的人。实际上，现在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经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同那些高高在上、不深入下层的干部来比，他们更了解群众，更了解实际。很多工作主要是依靠他们，只是因为缺乏提拔，他们没有决定问题的权力，遇事只好不住地请示报告。这就成为我们的官僚主义现象的一大来源。总之，我们绝不要低估这一大批中青年干部。很多中青年干部政治本质很好，不是帮派分子，思想路子对，又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为什么不去选拔和破格使用？有些企业和单位，群众自己选举出的干部，一些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担任负责工作的干部，很快就作出了成绩，比单是从上面指定的干部合适得多。这样的事实，难道还不能使我们猛省吗？好的中青年干部到处都有。“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做法不满，进行积极或消极抵制，政治表现好，又肯干，有专业知识的中青年干部，各行各业、各地区、各单位都有，问题是我们没有发现和提拔他们。就是一度受过林彪、江青一伙的欺骗，犯过一些错误，后来确已觉悟转变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人，我们也不能抛开

不用。不少同志只是看到周围熟悉的一点人，总在原来的一些人中打圈子，不会深入到群众中去选拔人才，这也是一种官僚主义。

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我们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只要大胆而谨慎地工作，只要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就完全有把握把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起来，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后来居上。

陈云同志提出，我们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这些意见讲得好。许多同志除了不注意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外，对干部队伍的知识化、专业化也很不重视。这也是过去在知识分子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左”倾思想的一种恶果。

目前的问题是，现行的组织制度和为数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于选拔和使用四个现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级党委和组织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来个大转变，坚决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碍，打破老框框，勇于改革不合时宜的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发现和破格使用优秀人才，坚决同一切压制和摧残人才的现象作斗争。经过十多年的考验，中青年同志的政治面貌，领导和群众基本上都是清楚的。老

同志还在，采取从上看和从下看互相结合的办法，是应当可以选好选准的。这项工作，当然要有步骤地进行，但是太慢了不行。错过时机，老同志都不在了，再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晚了，要比现在难得多，对于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说，就是犯了历史性的大错误。

三

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陈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诿，以至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这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在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我们现在的官僚主义现象，除了同历史上的官僚主义有共同点以外，

还有自己的特点，既不同于旧中国的官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它同我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密切关系。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下面，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官僚主义的另一病根是，我们的党政机构以及各种企业、事业领导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绝大多数人往往不能独立负责地处理他所应当处理的问题，只好成天忙于请示报告，批转文件。有些本位主义严重的人，甚至遇到责任互相推诿，遇到权利互相争夺，扯不完的皮。还有，干部缺少正常的录用、奖惩、退休、退职、淘汰办法，反正工作好坏都是铁饭碗，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这些情况，必然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副职多，闲职多，而机构臃肿又必然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些制度。当然，官僚主义还有思想作风问题的一面，但是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所以，过去我们虽也多次反过官僚主义，但是收效甚微。解决以上所说的制度问题，要进行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教育和思想斗争，但是非做不可，否则，我们的经济事业和各项

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进。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全国各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必然造成官僚主义，必然要犯各种错误，必然要损害各级党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个人分工负责制等等。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我们历史上多次过分强调党的集中统一，过分强调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很少反对个人过分集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得很清楚。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革命队伍内的家长制作风,除了使个人高度集权以外,还使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组织成为个人的工具。家长制是历史非常悠久的一种陈旧社会现象,它的影响在党的历史上产生过很大危害。陈独秀^[112]、王明^[146]、张国焘^[115]等人都是搞家长制的。从遵义会议到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比较注意实行集体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生活比较正常。可惜,这些好的传统没有坚持下来,也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例如,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数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147]、一九五九年“反右倾”^[110]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这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林彪^[1]鼓吹“顶峰”论,说毛主席的话是最高指示,这种说法在全党全军全国广为流传。粉碎“四人帮”后,还把个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时间。对其他领导人的纪念,有时也带有个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发出了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指出这些不适当的纪念方法不但造成铺张浪费,脱离群众,而且本身就带有个人创造历史的色彩,不利于在党内外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不利于扫除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个指示还为纠正这一类缺点,作出了若干规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文件。还要说到,一九五八年以后,到处给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盖房子,“四人帮”垮台后,还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大的浪费。此

外，至今还有一些高级干部，所到之处，或则迎送吃喝，或则封锁交通，或则大肆宣扬，很不妥当。以上种种严重脱离群众的事情，从中央到各级不许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力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的组织原则中有一条，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不论是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或者是普通党员，都应以平等态度互相对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应当享有的权利，履行一切应当履行的义务。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应当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地服从，“尽忠”。不当把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帮派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

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革命战争时期大家年纪都还轻，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强，不存在退休问题，但是后来没有及时解决，是一个失策。应当承认，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或无法完全解决。五中全会讨论的党章草案，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在看来，还需要进一步修改、补充。关键是

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以及离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况，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大搞特权，给群众造成很大灾难。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损害党的威信，如不坚决改正，势必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发生腐化。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不管谁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机关依法侦查，司法机关依法办理，任何人都不许干扰法律的实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遥法外。谁也不能违反党章党纪，不管谁违反，都要受到纪律处分，也不许任何人干扰党纪的执行，不许任何违反党纪的人逍遥于纪律制裁之外。只有真正坚决地做到了这些，才能彻底解决搞特权 and 违法乱纪的问题。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

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对各级干部的职权范围和政治、生活待遇，要制定各种条例，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中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希望。

我们在讲到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方面的弊端的时候，不能

不涉及到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正在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阐述，也将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进行比较全面的评价，其中包括批评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

四

现在说一下肃清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问题。

上面讲到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当然不止这些。还有，如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在身份上的某些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以至画地为牢，以

邻为壑，有时两个社会主义企业、社会主义地区办起交涉来会发生完全不应有的困难；文化领域中的专制主义作风；不承认科学和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的极大重要性，不承认没有科学和教育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中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等等。拿宗法观念来说，“文化大革命”中，一人当官，鸡犬升天，一人倒霉，株连九族，这类情况曾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甚至现在，任人唯亲、任人唯派的恶劣作风，在有些地区、有些部门、有些单位，还没有得到纠正。一些干部利用职权，非法安排家属亲友进城、就业、提干等现象还很多。可见宗法观念的余毒决不能轻视。要彻底解决上述这些问题，还需要我们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

对待这一任务，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

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说来，是一种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是为了从封建主义遗毒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提高觉悟，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努力为人民作贡献，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必须明确，不要搞什么反封建主义的政治运动和宣传运动，不要对什么人搞过去那种政治批判，更不能把斗争矛头对着干部和群众。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而不是用扎扎实实、稳步前进的办法，去解决现行制度的改革和新制度的建立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解决群众思想问题和具体的组织制度、工作制度问题，同革命时期对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和对反动制度的破坏，本来是原则上根本不同的两回事。

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是封建主义残余比较严重，还是资产阶级影响比较严重，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在不同问题上，在不同年龄、经历和教养的人身上，情况可以

很不同，千万不可一概而论。此外，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这是必须认真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中国在经济上文化上落后，并不是一切都落后。一些外国在技术上管理上先进，并不是一切都先进。我们的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是资本主义所绝对不可能做到的。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上犯过错误，就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绝对不能让它们流行。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但是这决不是提倡各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决不是提倡各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

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国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近一两年内，通过不同渠道运进了一些黄色、下流、淫秽、丑恶的照片、影片、书刊等，败坏我们社会的风气，腐蚀我们的一些青年和干部。如果听任这种瘟疫传布，将诱使许多意志不坚定的人道德败坏，精神堕落。各级组织都要严肃地注意这个问题，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予以查禁、销毁，坚决不允许继续流入。在国内经济工作中，歪曲现行经济政策，利用经济管理工作中的漏洞而进行各种违法活动的个人、小集团甚至企业、单位，也有所增加。对于这种反社会主义的违法活动和犯罪分子，也必须严重警惕，坚决斗争。

总之，必须把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工作，同对于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思想和其他腐化思想的批判结合起来。

对于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也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前些时候有的地方为了进行革命思想的教育，重提“兴无灭资”的口号。有关文件我是看过的，当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问题。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中需要坚决批判和

防止蔓延的东西，什么是经济生活中需要坚决克服和抵制的资本主义倾向，如何正确地进行批判，还有必要继续进行研究并作出妥善的规定，以防重犯过去的错误。

五

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央经过多次酝酿，有一些已经在五中全会以后开始实施，有一些即将在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提出，其他也将在条件成熟时陆续采取具体步骤。除了前面已经说过的以外，现在正在考虑逐步进行的还有如下重大改革：

第一，中央将向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要使我们的宪法更加完备、周密、准确，能够切实保证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国家各级组织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利，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要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

第二，中央已经设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

第三，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

有力的工作系统。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政治领导下进行的，政府工作加强了，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第四，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经过试点，逐步推广、分别实行工厂管理委员会、公司董事会、经济联合体的联合委员会领导和监督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还有党委领导下的校长、院长、所长负责制等等，也考虑有准备有步骤地加以改革。过去的工厂管理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既不利于工厂管理的现代化，不利于工业管理体制的现代化，也不利于工厂里党的工作的健全。实行这些改革，是为了使党委摆脱日常事务，集中力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监督工作。这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而是更好地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这些单位的行政负责人要努力学习各种有关管理和技术专业，再不能长期泡在各种会议里，老是当外行，那样我们就永远实现不了现代化。这些同志大多数是党员，管理制度改变了，他们除了要受上级行政部门的行政领导以外，还要受上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和同级党组织的监督。同级党组织的任务也没有减轻，而是真正加强了党的工作。工厂、公司、院、校、所的各级党组织，要管好所有的党员，做好群众工作，使党员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使党的组织真正成为各个企业事业的骨干，真正成为教育和监督所有党员的组织，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和各项工作任务地完成。考虑到这个改革对全国广大的基层组织影响很大，现在还要广泛征求意

见，到时机成熟时再作决定。〔148〕

第五，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这是早已决定了的，现在的问题是推广和完善化。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有权对本单位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有权向上级建议罢免本单位的不称职的行政领导人员，并且逐步实行选举适当范围的领导人。

第六，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要明确哪些问题应当由集体讨论，哪些问题应当由个人负责。重大问题一定要由集体讨论和决定。决定时，要严格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一人一票，每个书记只有一票的权利，不能由第一书记说了算。集体决定了的事情，就要分头去办，各负其责，决不能互相推诿。失职者要追究责任。集体领导也要有个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对日常工作要负起第一位的责任。在党委的其他成员中，都要强调个人分工负责。要提倡领导干部勇于负责，这同改变个人专断制度是两回事，不能混淆。

上述六条，都请同志们进行认真的讨论和研究，充分发表意见，包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些问题，中央在原则上决定以后，还要经过试点，取得经验，集中集体智慧，成熟一个，解决一个，由中央分别作出正式决定，并制定周密的、切实可行的、能够在较长时期发挥作用的制度和条例，有步骤地实施。在中央制定并正式公布新的制度和条例以前，有关各方面的工作，仍照现行制度办事。

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

的纪律。在中国这样的大国，要把几亿人口的思想和力量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个由具有高度觉悟性、纪律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党员组成的能够真正代表和团结人民群众的党，没有这样一个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能设想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我们人民的团结，社会的安定，民主的发展，国家的统一，都要靠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旧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任务。现在群众中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很多，党内需要解决的思想问题也很多。我们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实认真做好，不能放松。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做，各级领导干部要做，每个党员都要做。要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凡是需要动员群众做的，每个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党员，必须首先从自己做起。因此，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也要求改善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制度。

同志们！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

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担子已经落在我们的肩上。全党同志,特别是老同志,要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解决了很多问题,取得了很多成绩。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前进阵地。现在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时机和条件都已成熟。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我相信,这一点是一定可以做到的。

答意大利记者 奥琳埃娜·法拉奇问^{*}

(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两次谈话的国内问题部分。

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奥: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

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大跃进^[77]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至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邓: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都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奥: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1],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的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奥：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所以，我们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远挂在天安门前，作为我们国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而且还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149]对待毛主席。

奥：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奥：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

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奥:在中国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碰到过,这就是周恩来总理。这个情况如何解释?

邓: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我们差不多同时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奥:我看不出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

邓: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奥: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

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仍然存在。我说的“毛主义分子”是指“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

邓:不能低估“四人帮”的影响。但要看到,百分之九十七、九十八的广大人民对“四人帮”的罪行是痛恨的。这表现在“四人帮”横行、毛主席病重、周总理去世时,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天安门广场爆发的反抗“四人帮”的群众运动^[36]。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要求。我们正在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已经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四化建设,这是得人心的。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所以我们可以确信,只要我们现在走的路子是对的,人民是拥护的,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情况就不会重复。

奥:很显然,只有在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到底是谁组织的,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这是集体的力量。我认为首先有四五运动的群众基础。“四人帮”这个词是毛主席在逝世前一两年提出来的。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我们同“四人帮”进行了两年的斗争。“四人帮”的面貌,人们已看得很清楚。尽管毛主席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帮”是不服的。毛主席去世以后,“四人帮”利用这个时机拼命抢权,形势逼人。“四人帮”那时很厉害,要打倒新的领导。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局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要对付“四人帮”。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提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奥:那末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邓:我不赞成把它改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奥: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邓: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华国锋^[23]主席也不兼国务院总理的职务了,党中央委员会推荐赵紫阳^[142]同志为候选人。我们这些老同志摆在那里,他们也不好工作。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过去没有规定,但实际上存在领导职务终身制。这不利于领导层更新,不利于年轻人上来,这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个缺陷在六十年代还看不出来,那时我们还年轻。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更多地是关系到我们的方针、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问题。所以我们说,老同志带个头,开明一点好。

奥:我看到中国有其他的画像。在天安门我看到有马、恩、列,特别还有斯大林的画像。这些像,你们是否还要保留?

邓:要保留。“文化大革命”以前,只在重要的节日才挂出

来。“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改变了做法,经常挂起。现在我们恢复过去的做法。

奥:四个现代化将使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这样不可避免地引起私人投资问题。这是否会在中国形成小资本主义?

邓: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当然,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奥:那末,你是否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都是坏的?

邓: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奥:我记得几年前,你谈到农村自留地时说过,人是需要一些个人利益来从事生产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主义本身也要讨论呢?

邓:按照马克思说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奥：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说，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作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

奥：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邓：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奥：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邓：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奥：是否毛主席对江青^[44]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150]一样的人？

邓：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奥：我们不知道。

邓：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奥：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

邓：零分以下。

奥 :你自己怎么评价 ?

邓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 ,我一生问心无愧。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 ,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 ,我也有份 ,只是可以说 ,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 ,第一他是有功的 ,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 ,我们要继承下来 ,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贯彻调整方针 ,保证安定团结^{*}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我完全同意陈云^[83]同志的讲话。这个讲话在一系列问题上正确地总结了我国三十一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 ,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

我也完全同意中央财经小组通过的关于一九八一年计划的安排。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陈云同志负责财经工作 ,提出了调整方针 ,去年四月中央工作会议对此作出了决定。但因全党认识很不一致 ,也很不深刻 ,所以执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现在 ,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这次调整 ,就是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

我们这次调整 ,正如陈云同志说的 ,是健康的、清醒的调整。这次调整 ,在某些方面要后退 ,而且要退够。其他方面 ,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有关人民生活的日用品的生产 ,能源、交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通的建设,以及科学、教育、卫生、文化事业,还要尽可能地继续发展。这些继续发展的企业、事业和建设单位,都要认真进行整顿,提高管理水平,提高职工的业务技术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尽力减少各种浪费。

为什么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会出现调整或部分后退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由于解放以前的历史状况,也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由于过去两年执行调整方针不得力,这就造成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物价继续上涨。如果再不认真调整,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只有某些方面退够,才能取得全局的稳定和主动,才能使整个经济转上健全发展的轨道。

所谓某些方面要退够,主要是说,基本建设要退够,一些生产条件不足的企业要关、停、并、转或减少生产,行政费用(包括国防开支和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费用)要紧缩,使财政收支、信贷收支达到平衡。生产建设、行政设施、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这就是实事求是。下决心这样做,表明我们真正解放了思想,摆脱了多年来“左”的错误指导方针的束缚。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内的思想在过去两年内尚且不容易统一,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起来,显然要做大量的工作。我们要向人民说清楚,不进一步调整为什么不行,调整中可能出现什么问题,调整好了会带来什么效果。这样,人民才会理解进一步调整的必要,才会相信党和政府确实是为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着想,是为稳步实现现代化的利益着想,才会支持我们。做好这一步工作非常重要,决不能希望用三言两语的命令解决问题。

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它改变了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九八一年的计划和预算,影响全国人民的工作和生活。所以,请国务院考虑最近向人大常委会作一次报告。报告发表了,可以作为向全国人民进行宣传解释的基础。

这次对经济作进一步调整,是为了站稳脚跟,稳步前进,更有把握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更有利于达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然后着手编制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只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地、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我们就能够更有信心经过二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现代化经济建设的发展达到小康水平,然后继续前进,逐步达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

建国三十一年来,我们确实犯过不少错误,包括严重的错误,其间几经折腾,使人民受到了不少损失,也延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但是,经过三十年的努力,我们的全部工交

企业单位已经发展到近四十万个,国营企业固定资产比解放初期增长近二十倍,培养了大批熟练工人和上千万专业人才,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全国人民的生活比解放前好得多了。同一些比较大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比它们大,建设的速度也比它们快。这几年来,特别是这次会议上,我们着重于检查过去的缺点、错误,正确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建设的部署,安排在切实可靠的基础上。依靠上述物质条件和经济工作方针,继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合理地利用我们的丰富资源,不断地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切合实际情况,并经常总结新的经验,努力避免和随时检查新的缺点、错误,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一定能够稳步地达到目的,我们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的调整不是后退,而是前进。

二

党的三中全会要求全党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两年来,我们按照这个指导思想,确定了一系列的政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去年四月提出了调整,同时也提出了改革、整顿、提高。广大群众和干部一方面衷心拥护党的这些正确的决策,另一方面也担心政策什么时候会变。他们这种怕反复、怕折腾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末,这次调整,是不是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呢?决不是。前面已经说了,这次调整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各项正确方针、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是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纠正“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改掉我们工作中还存在的不符合三中全会精神的毛病,那就是下决心去掉不切实际的设想,去掉主观主义的高指标,而这正是三中全会的路线要求我们必须做到的。

为了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进行,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

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我们多次讲过,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对于党内外任何企图削弱、摆脱、取消、反对党的领导,必须进行批评、教育以至必要的斗争。这是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的关键,也是决定这次调整成功或失败的关键。

要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改进党的作风。现在,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工作,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是有些减弱,工作方法也有一些粗糙的地方,这些都妨碍党与群众的联系。只有大力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深入到群众中去做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中的许多困难才容易克服。极少数党员、干部的不正之风,非常不利于恢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赞成陈云同志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要严格执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坚持不懈地纠正各种不正之风,特别要坚决反对对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错误态度。

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方法要周密,步骤要稳妥。总之,不能使一切确实还能对党做工作的同志不工作。基层单位领导制度的改革,要先在少数单位进行试点。在制定和颁布完善的条例以前,一切非试点的基层单位,一律执行原来的制度。中央原来提出的就是这个方针。各个基层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在经济调整中的思想、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的工作都很繁重,很艰苦。为了使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逐步协调,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某些建设项目要下马,某些企业要关、停、并、转,或者减少生产任务。对这三类单位所有人员需要有计划地进行培训,生活也要安排好。做好这些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希望各级组织的同志,特别是在基层工作的同志,发扬光荣传统,同心同德,任劳任怨,为党和国家分忧,为群众分忧,不能有任何松劲的情绪。在困难面前,正是我们各级组织中的党员、干部,特别是老党员、老干部,忠心耿耿,坚守岗位,鞠躬尽瘁,又一次经受考验的时候。中央相信,各级组织的干部和党员,一定不会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要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

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在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要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一言堂、个人说了算,集体做了决定少数人不执行等等毛病,都要坚决纠正。在目前情况下,尤其需要重申和强调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在党内、军内和政府系统,要坚决反对一切不遵守党纪、军纪、政纪的现象。

在党政机关、军队、企业、学校和全体人民中,都必须加强纪律教育和法制教育。没有规定纪律或规定得不完善不合理的,要迅速规定和改善。大中小学的学生从入学起,工人从入厂起,战士从入伍起,工作人员从到职起,就要学习和服从各自所必须遵守的纪律。对一切无纪律、无政府、违反法制的现象,都必须坚决反对和纠正。否则我们就决不能建设社会主义,也决不能实现现代化。合理的纪律同社会主义民主不但不是互相对立的,而且是互相保证的。

要继续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退休、离休的干部,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等各方面,都要逐个做出妥善安排。

中央在最近一年中多次强调,老干部要把选拔和培养中青年干部,作为第一位的、庄严的职责。别的工作做不好,固然要做自我批评,这项工作做不好,就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这项工作做好了,我们的事业完全有把握继续下去,我们的老干部就再一次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希望所有的老同

志在这个问题上都有高度的自觉性。

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使我们的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来加以保证。提出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三个条件,当然首先是要革命化,所以说要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前提。其次,这并不是说,不具备这三个条件或不合其中某一两个条件的德才兼备、善于学习、身体也好的同志就要调离。年龄的条件不能说得过死。如果离开了现在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一切任务都不能完成,也就不可能实现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等等。但是要看到,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我们的干部队伍总要变得比较年轻些,比较有知识,比较懂得业务。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的重大意义至今还认识不足,这有历史原因和实际原因,需要耐心细致地进行全面的准确的宣传解释工作。同时,在执行中还要定出妥善的步骤。

现在很多单位人浮于事。在这次经济调整中,有些企业或者会全部停工,或者会半停工。有关地方、有关部门对这些单位的干部和工人,除了安排他们轮流从事一些生产劳动,例如植树造林、修路、修水利、搞市政建设和卫生设施之外,主要应该有计划地、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正规培训,提高所有受训干部、工人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经过考核,从中发现和选拔优秀人才。调整是实现现代化所必须采取的一项积极措施,培训就是这种积极措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家常说,要增加智力投资,利用这次机会,有计划地对大批干部、工人进行正规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文化水平、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就是一种能够收到很好效果的智力投资。要使全体干

部、工人充分理解这种培训的重大意义,逐步把这种培训变为适用于全体干部和工人的经常制度。

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要巩固已有的成绩,总结已有的经验,分析和解决在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我完全同意陈云同志的意见,今后一段时间内,重点是要抓调整,改革要服从于调整,有利于调整,不能妨碍调整。改革的步骤需要放慢一点,但不是在方向上有任何改变。

三中全会关于农业的决定和今年中央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已经充分证明行之有效,要继续贯彻执行,大力落实,并注意随时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农业现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国家或苏联一类国家的办法,要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合乎中国情况的道路。

今年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单位,已经达到六千多个。这些单位的产值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左右。怎样把国家利益、企业利益、职工利益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我们开始找到了门路。试点的面明年不再扩大,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巩固提高方面。

在调整中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已经从各方面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要继续实行,不能走回头路。仍然要继续把经济搞活,发挥地方、企业、职工的积极性。当然要防止盲目性,特别要防止只顾本位利益、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坏性的自发倾向。在这方面,要规定比较详细的法令,以防止对自主权的曲解和滥用。

继续广开门路,主要通过集体经济和个体劳动的多种形

式,尽可能多地安排待业人员。要切实保障集体劳动者和个体劳动者的合理利益,同时加强工商业管理工作,防止非法活动。

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几个特区的决定^[151],要继续实行下去。但步骤和办法要服从调整,步子可以走慢一点。

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在这方面由于多年闭关自守,没有经验,我们确实付出了重大的代价。责任主要在中央。我个人也要负责。

要继续执行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执行得好,我们就有可能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建设环境。

正是因为我们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实施了上述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为这次经济调整创造了比较好的条件。只要把这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就一定可以在这次经济调整中达到预期的目的。

三

陈云同志说,经济工作搞得好不好,宣传工作搞得好不好,对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能否稳定发展,关系很大。他所以同时提出宣传工作的问題,一方面是要我们对宣传工作的成绩和缺点做出清醒的估计,另一方面是要我们今后的宣传工作能够适应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的要求,能够有助于而不是有碍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这里说的宣传工作,实际上包括党的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经济调整是一个很艰巨、很复杂的任务。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还会遇到许多现在预料不到的问题。为了完成这个任务,为了保证全党思想上行动上的一致,必须有效地加强和改善我们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理论工作者、宣传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同党的各级干部一起,在这几年的富有成效的工作中,共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总的说来,思想战线上各方面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

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认为解放思想已经到头了,甚至过头了,显然是不对的。

但是也必须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在一些同志的思想中也确实存在着混乱,例如有人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会妨碍解放思想,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会妨碍社会主义民主,对错误意见进行正确的批评是违反“双百”方针^[74],等等。

当然,产生这类思想混乱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来对待。但是这并不是说,对这种思想混乱

状况可以听其自然,不需要切实有效地加以纠正。不能否认,这种混乱状况确实给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的活动,提供了一方面的有利条件。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内生活中,都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最近一些与非法组织有关的人物特别活跃,他们假借种种名义放肆地发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

我们说改善党的领导,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中央认为,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工作。如果一时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至少也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地位上,否则党的领导既不可能改善,也不可能加强。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工作的评价,一定要充分肯定三十一年来来的巨大成绩,缺点、错误要进行严肃的批评,但决不能说得一团漆黑。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它的确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但也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整个历史事件说成

是“反革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

同样,毛泽东同志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很明显,感情用事地把他的错误说过头,只能损害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只能损害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只能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

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同志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

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确有极少数领导干部搞特殊化。中央已经下定决心,并且已经在陆续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报纸上的正确批评的作用应该肯定,但是应当注意不要把个别的现象当作普遍的现象,不要把局部的东西夸大为整体。决不是所有党员或多数党员都有不正之风,决不是所有领导干部或多数领导干部都搞特殊化。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阶级”。我们的宣传,要防止在群众中造成各种不符合实际的印象。

要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全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各级组织、每个党员都要按照党章的规定,一切行动服从上级组织的决定,尤其是必须同党中央保持政治上的一致。这一点在现在特别重要。谁要违反这一点,谁就要受到党的纪律的处分。

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要把这一点作为当前的重点。

要教育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大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精神,坚持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学习和培养这些革命精神,并不需要多么好的物质条件,也不需要多么高的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上述的革命精神参加革命到现在吗?从延安到新中国,除了靠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外,不是靠这些宝贵的革命精神吸引了全国人民和国外友好人士吗?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否则,我们自己在精神上解除了武装,还怎么能教育青年,还怎么能领导国家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经坚持用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指导整个工作;用共产主义道德约束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的言行;提倡和表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服从组织”、“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现在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有人居然对这些庄严的革命口号进行“批判”,而这种荒唐的“批判”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抵制,居然还得到我们队伍中一些人的同情和支持。每一个有党性、有革命性的共产党员,难道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吗?

毛泽东同志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拚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如果一个共产党员没有这些精神,就决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不但如此,我们还要大声疾呼和以身作则地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文明的主要支柱,为世界上一切要求革命、要求进步的人们所向往,也为世界上许多精神空虚、思想苦闷的人们所羡慕。

要大力加强党的组织、党员同群众的联系,要把国家的形势和困难、党的工作和政策经常真实地告诉群众。要坚决批评和纠正各种脱离群众、对群众疾苦不闻不问的错误。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全党同志,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经常记住这一点,经常用这个标准检查自己的一切言行。

一定要努力帮助群众解决一切能够解决的困难。暂时无法解决的困难,要耐心恳切地向群众解释清楚。

要继续批判和反对封建主义在党内外思想政治方面的种种残余影响,并继续制定和完善各种符合于社会主义原则的

制度和法律来清除这些影响。同时,要批判和反对崇拜资本主义、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们继续坚持同对我们友好的西方国家交往,继续坚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对我们有用的东西,但是必须在思想政治领域把上述的斗争进行到底。必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就会被种种资本主义势力所侵蚀腐化。

要加强各级学校的政治教育、形势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观教育、道德教育。

要大力加强工会工作和妇联工作,大力加强共青团工作、少先队工作和学生会工作。要努力使我们的青少年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使他们立志为人民作贡献,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作贡献,从小养成守纪律、讲礼貌、维护公共利益的良好习惯。

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解放初期的精神,以及六十年代初期克服困难的精神。我们首先要自己坚定信心,然后才能教育和团结群众提高信心。

四

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

调整成败的关键。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如果遭到破坏,调整工作就根本无法进行。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有些人甚至叫嚷什么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个别地方在坏人煽动下少数支边青年的闹事,极少数坏头头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的公开发表,反动传单散发,政治谣言的传播,“四人帮”残余势力的活动,杀人放火、制造爆炸、抢劫偷窃、强奸轮奸等各种恶性案件的发生,走私漏税、投机倒把、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犯罪活动的滋长泛滥,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违反规定滥发奖金、抬高物价、扰乱市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的不断出现,对这一切现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这种种情况,有的属于反革命分子的活动,有的属于林彪、“四人帮”残余势力的反扑,有的属于唯恐天下不乱者的破坏,有的属于剥削阶级残余分子的故态复萌,有的是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作风的严重腐蚀。按性质来说,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阶级斗争在人民内部的不同程度上的反映。这说明,阶级斗争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社会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确实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时地、有区别地给以坚决处理,而听任上述各种不同性质的问题蔓延汇合起来,就会对安定团结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对于这种种活动的严重性,我们有些同志还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打击不力,有时甚至放纵不管。

因此,必须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上述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坚决打击和分化瓦解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余势力,坚决打击和防范制止各种刑事犯罪活动。

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需要向广大人民群众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动员和组织他们自觉地、积极地行动起来,同各种破坏安定团结的势力进行有效的斗争。进行这种斗争,不能采取过去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而要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为此,除党内要发布有关的指示以外,建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有关的条例、法令。必要的法律设施,加上全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报刊宣传和学校教育的配合,就可以形成全党全军全民的共同行动准则。这样,当前的一些混乱状态一定可以逐步改变。

为了保证安定团结,建议国家机关通过适当的法律法规,规定罢工罢课事前要经过调处;游行示威事前要经过允许;指定时间地点;禁止不同单位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串连;禁止非法组织的活动和非法刊物的印行。

这场斗争是政治斗争,但是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要有声势,但准备必须充分,步骤必须稳妥,分寸必须适当。对于一些严重的破坏活动,不仅要打击一次,而且要打击多次。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包括罚款、重税一类经济武器)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这是现在和今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要求我们必须尽快学会处理的新课题。

要大力加强政法、公安部门的建设和工作,提高这些部门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

要从基本建设队伍和转业军人中挑选一批好的职工、干部和战士,经过训练,扩大和加强政法公安干警队伍。

有些地方闹事严重的,如果确有必要,经过慎重考虑和周密安排,可以按照一定的批准程序宣布戒严,调动经过训练的部队,恢复和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对全军指战员都要进行必要的法制教育。

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组织有关部门做出统一部署,采取得力措施,实行各条战线的总动员,坚决而又稳妥地把保证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工作做好。

有人会说,我们这样做,是要“收”,不再“放”了,是只讲专政,不讲民主了,三中全会的方针变了。完全不对。中央早就讲过,对各种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刑事犯罪分子的活动,从来都没有什么“放”的问题,从来主张不能放纵他们,不能听任他们胡作非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直到最近这几年来,除了十年动乱不算以外,我们一直坚持对各种敌对势力、反革命分子、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实行专政,决不对他们心慈手软。

这里涉及到如何理解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的互相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实质上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提法更适合于我们的国情。人民的民主权利,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遭到践踏。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我们一直在努力发扬民主。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要继续努力做。前面说过,我们各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坚定地、有步骤地继续

进行。这些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

现在,我们在坚定不移地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工作继续做下去的同时,要求全党同志、全国人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和刑事犯罪活动。这是因为,如果不对这类活动进行打击,不但经济调整很难进行,而且人民的民主权利甚至生存权利,都要遭到危害。如果放纵他们,让他们泛滥开来,到处制造混乱,有些地方、有些部门、有些单位中,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又会像在“文化大革命”中那样,重新受到践踏;全国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局面就不可能维持,更谈不上巩固和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形成的开国以来少有的很好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就又会受到挫折;人民生活已经得到的改善,又会重新丧失。全国绝大多数干部、绝大多数党员、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苦难,都是记忆犹新的。我们怎么能够容忍那些一直紧跟林彪、“四人帮”的“造反派”以及继承他们那一套的少数坏头头,再来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呢?不用说全国,就是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不能允许他们得逞。可是在个别单位、个别地方,他们已经在猖狂地捣乱了,那里的群众,已经对这种状况非常愤怒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不坚决地起来保卫人民的利益吗?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际生活反复教育我们,只有绝大多数人民享有高度的民主,才能够对极少数敌人实行有效的专政;只有对极少数敌人实行专政,才能够充分保障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权利。所以,在当前条件下,使用国家的镇压力量,来

打击和瓦解各种反革命破坏分子、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便维护社会安定,是完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的,是完全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的。

总之,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的安定,这都是为了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一贯方针,我们的事业一定胜利。

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

(一九八一年一月四日)

我们希望里根^[152]先生就任总统后能为中美关系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中美关系打开新的一页是从共和党开始的,那是尼克松^[138]先生、基辛格^[137]先生执政的时候。我们总是记住,是尼克松先生在任总统期间下决心改善中美关系的。在卡特^[153]总统任内,中美关系有了新的发展,但在他任期的后一阶段,有一个《与台湾关系法》^[154]。就中国方面来说,我们希望中美关系继续发展。坦率地说,里根先生在竞选纲领中说的有些话确实使我们有所不安。布什^[155]先生来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理解在你们国家竞选中的语言执政后不一定付诸实施,我们重视的是里根先生就任后将采取什么行动。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主要是解决了台湾问题,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取得了中美新关系的建立,并使之继续得到发展。台湾问题本来是过去的问题,现在又重新提起来了。我们请布什先生向里根先生转达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很清楚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报刊和一些人的言论大概有这么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时谈话的一部分。

四种观点,这些观点如果不加澄清,很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很弱很穷,装备又落后,所以中国是无足轻重的,是一个不值得重视的国家。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对世界力量对比的判断问题。至于说我们穷呀弱呀,我们历来不回避,我们向来这样讲。中国有它的长处,就是地方大、人多,但确实是穷,装备也确实是落后。可是我们对自己也有一个清醒的估计,我们有“块头大”这个好处,还有就是不信邪。中国人向来是根据自己的见解行事的。过去的事大家都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依靠自力更生建立起来的。在非常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敢于正视现实,用弱小的力量去面对强大的力量。中国尽管穷和弱,但需要中国自己做的事情,中国是敢于面对现实的。所以,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

第二种观点,说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美国报刊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过这样的议论。这两年我们也做了一些蠢事,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有不少这样的代表团和那样的代表团往美国跑,我们没有控制住,而一些代表团的言论行动又不谨慎。本来去访问不是坏事,是好事,但却引起了一些人的错觉,以为中国现在有求于人。不但在美国,在欧洲也可能有这样的反映。今后我们派代表团要控制一下,当然不是说正常的来往不需要发展。最近我们正在进行经济调整。我们敢于公布财政赤字,表明我们还有某种自信。通过调整,今年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基本达到平衡。日本朋友说,他们从来不相信用控制的方法能够达到财政收支平衡。我们可以办到,

而且我们还进一步确定,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延安时期,吃饭穿衣都困难。包括那时我们的各个抗日根据地,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能够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即使现在世界发生大的动乱和各种难测的变化,中国自己也能够活下去。以为中国有求于人的判断,会产生错误的决策。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吞不下去,不会吞下去的。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台湾问题迫使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不会吞下去。中国肯定要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说中美关系停滞不好,倒退更不好,但是一旦发生某种事情迫使我们的关系倒退的话,我们也只能正视现实。至于倒退到什么程度,那要看导致倒退的来势如何。这种话说多了并不好,但要明确一点,即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需要中美关系倒退的话,中国只能面对现实,不会像美国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中国出于反对苏联的战略会把台湾问题吞下去,这不可能。

最近荷兰发生了一件事,说是荷兰的公司搞的,准备同台湾签订合同,为台湾制造两艘潜艇。荷兰政府当然干预了这件事。其实荷兰政府搞这笔交易是得到某些人支持的。我们正在严肃地处理这个问题。如果荷兰不改变这个决定,中国同荷兰的关系肯定要倒退。当然,我们还做一点工作,希望荷兰改变它的立场,因为我们看到它的议会是以微弱多数通过这个决定的,因此,改变这笔交易不是完全不可能。如果做了工作

以后不行,那我们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希望在中美之间不要出现类似的事情。既然中美和中日关系正常化都是在解决了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个问题后实现的,那末,以后能否继续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以及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这个问题是焦点。

我们注意到,有的议论说,里根先生可能采取向台湾派总统私人代表的形式。今天我坦率地说,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认为这是什么私人代表,而是一种正式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这样或类似的事情,我们肯定会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已经改变了中美建交公报和上海公报的原则。它的性质不仅是使中美关系停顿,而且是使它倒退。

第四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信奉的意识形态旨在摧毁类似美国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观点至少不是八十年代的观点,也不是七十年代的观点,而是恢复了六十年代以前的观点。

我重复说,我们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但不要停滞,而且要发展。我们对竞选期间和总统就任以前的言论是很注意的,但我们可以对这些言论作某种理解。我们重视的是美国新政府上任后采取的行动。我刚才说的都是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我认为,使美国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

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

(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一,当前还是以贯彻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为中心,要以中央四位常委^[156]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中央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等文件为准进行工作。

第二,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18]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把这些都讲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要更多地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左”的错误思想不能忽略,它的根子很深。重点是纠正指导思想上“左”的倾向,但只是这样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也要纠正右的倾向。

黄克诚^[134]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解放军报》办得比较好,要继续努力。要多写些从思想上、理论上论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文章。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有来自“左”的,有来自右的,写文章要注意到这两个方面。

第三,我们总是讲,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

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101],我多次讲过,那个时候确实有人杀气腾腾,但是我们处理得过了,扩大化了。当然,不能把当时所有被批判的人都说成什么问题、什么错误都没有。我看对反右派斗争,还是两句话:一句是必要的,一句是扩大化了。大跃进^[77]开始时,有哪个人反对过?后来有些同志发觉有问题,毛泽东同志也发觉有问题。他召集的两次郑州会议^[119],就是纠正大跃进中“左”的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基本上是做得对的,但是有曲折,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解决部队的思想问题,也要实事求是。要针对每个单位、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去做思想工作。

第四,对军队中“左”的影响不能忽视。有些三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受“左”的影响,从“左”的角度看问题的比较多。部队一些干部包括有的老干部,对三中全会以来的政策不理解,有的以为是搞资本主义,这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但也不是没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比如对靡靡之音和社会上一些坏风气,有些人就喜欢。

关于“三支两军”^[157]问题,你们研究一下。只讲一句话不好,光戴高帽子不好,一定要讲两句话。第一句话:当时军队不出面不能维持局面,出面是正确的,“三支两军”是起了积极作用的。第二句话:“三支两军”给军队造成的危害是很大的,带来了许多坏的东西,对军队的威信损害很大。比如派性,还有一些“左”的东西,相当大的成分是从那里来的。

军队这几年做了许多工作,抓了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干部的思想情况有了变化。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只要做了教育工作,干部的思想情况就会起变化。所以,我们还是要多做工作,多进行教育。

第五,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人人都去作检查,那就会变成运动。当然,不搞运动不等于政治工作没有方向,也不是不要声势。

在以后一个适当时间,还要进行整风。不搞整风,恐怕解决不了问题。

第六,陈云^[83]同志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哲学,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例如《实践论》、《矛盾论》,还有《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个意见很好。我看应当搞学习运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个学习必须联系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样就能了解党是怎样领导革命的,了解毛泽东同志有哪些功绩,使大家知道中国革命是怎样成功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要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然后要引导大家认真读点书。

陈云同志讲过,抗战初期他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给他谈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是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很大。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真正纠正错误,包括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就是从根本上而不是从枝节上解决问题。

第七,最近有一件事做得好,就是大讲精神文明。这方面已有成效,要继续抓好。总政治部提出的“四有、三讲、两不怕”^[158]的口号很好,军队就这样办,要好好宣传。

第八,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 闭幕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确信,我们这次全会解决的两个问题,解决得非常好。

第一个,就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当然,胡耀邦^[96]同志说,统一思想还要一年的工作。但是,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思想不通,组织服从。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

第二个,就是人事问题。我们这次把胡耀邦同志选作党的主席,刚才他作了一个简短的讲话,我想,这一段话也证明,我们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当然,赵紫阳^[142]同志也提到比较更重要的地位。

我们这次全会对这么两个重大问题采取重大的决策,作出重大的选择,我们相信,这个重大的决策,重大的选择,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这次全会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公报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我们这次会议真正是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同志们还有什么话没有?如果没有,我们就宣布第六次中央全会胜利闭幕。

老干部第一位的任务是 选拔中青年干部^{*}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

本来今天是来听会的,但是选拔培养中青年干部这个问题太大了,还是讲几句。我们历来讲,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是十分迫切了,再过三五年,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要来一次灾难。对我们这次六中全会,外国人反映说,是用和平方式解决交接班问题,解决中央人事的大问题,称赞我们很稳定、很顺利地解决了这样的问题。但是,全国范围的干部接替问题,如果再过三五年还不解决,那就可能造成一种混乱。老的不在,或者根本不能工作了,新的又上不来,每一个新的上来,就有这个意见、那个意见。好像我们党内有一种风气,就是在老干部里头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谁拥护自己谁就是好干部。不客气地讲,任人唯贤还是任人唯亲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好。我不是说所有的人,但是有相当一部分老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今天讲到一个刘澜波^[159]同志,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为什么全会之后又专门把在座的诸位留下来开两天会,讨论陈云^[83]同志关于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和老干部离休退休这两条建议?就是因为这个问题十分迫切,十分重要。我们军队的同志可以回想得起来,一九六四年开政治工作会议,我就提出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160]。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相隔了十七八年。当时年轻化问题并不算很迫切,但是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我在那次会议上讲,年龄大一岁,开明增一分。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现在的情况同那个时候完全不同了。总之,这个问题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十分迫切就是了。所以,在前一段时间,中央曾经设想,将来除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以外,再设两个委员会,一个是顾问委员会,一个是纪律检查委员会,容纳一批老同志。中央委员会成员比较年轻一点,这是为后事着想。解决干部年轻化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老同志要开明,要带头。不这样,解决不了问题。如果不是老同志带头,选人也不会积极,你就是勉强下命令选了,也不一定选得那么准,其中有一些同志还是考虑,看哪一些人是拥护自己的。我们可要谨慎,“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他们的能耐之一就是吹呀,捧呀,实用主义呀,有利的事情就干哪,可相当灵活哩!老同志很容易上当。所以,问题的关键是老同志带头,真正要开明,真正要从大局着眼。

去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陈云同志更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他提得非常好,我赞成。原来我们还是手脚小了一点,陈云同志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不是几十、几百,是成千上万。成千是个形容词,上万是实质,实际上是一万、两万、几万。现在我们选择的人中间,有些看得不准的,经过考验之后,还

会淘汰下去的。比如说现在先定他五万。这五万,是准备三五年之后,七八年之后,到领导机构的,就是到省、市、部这一级(大的工矿企业也相当这一级)准备将来接替的,其中突出表现好的要到中央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七八年之后四十七八岁了,也并不年轻了。如果现在五十岁左右,七八年之后就接近六十岁了。现在我们在座的,恐怕只有极少数人比较年轻,一般都是六十岁左右了,六十岁以上的占大多数。七八年之后,大家都接近七十岁或者七十多了,还行哪?所以这件事要认真地严肃地来议一下。

有没有人?我看找十万、二十万都有。问题是我们下不下这个决心,大家是不是好好地去工作,去了解,去发现。有什么标准呢?就是六十年代的(主要是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以前,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一年十万,就是六十万。如果加上中专,近二百万。这些人是比较有专业知识的。很多材料反映,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以前几年大学毕业的,绝大多数是表现比较好的。这些人大体上年龄四十岁左右。我到第二汽车制造厂发现的那个副厂长,是“文化大革命”前一两年毕业的,今年三十九岁。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不好的有,但大量是“逍遥派”。比如我刚才讲的那个同志,他是不赞成“文化大革命”的,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是受打击的。“文化大革命”时受打击,这是一个政治标准。像这样的人,是不是人才呢?他现在已到大厂副厂长这样的岗位,再加以培养,进进党校,或者放到另外的工作岗位再锻炼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像这样的人,只要我们注意,就很容易发现。一般都觉得这样的人太嫩了,或者还有一个说

法叫“骄傲”。“骄傲”两个字我有点怀疑。凡是有点干劲的,有点能力的,他总是相信自己,是有点主见的人。越有主见的人,越有自信。这个并不坏。真是有点骄傲,如果放到适当岗位,他自己就会谦虚起来的,要不然他就混不下去。我说有人才,不只是五万,甚至是十五万。有专业知识的,我刚才只说了大学、中专毕业生,还有自学的,也是大量的。对象是有,问题是我们去不去选。陈云同志讲的有一条,组织部要专门设一个管理中青年干部的机构。这是很重要的。

最重要的问题是,提出选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务以后,要着手去做。做,要有个目标。我建议,请同志们议一下,我们提出五年计划好不好?最好是四年,到一九八五年为期。干部问题,我建议订两个计划:一个五年计划,一个十年计划。头五年要选到比如五万人,把他们放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锻炼。这五年,我们部的领导成员,司局一级的成员,省、市、自治区一级的成员,五十岁左右的,四十岁左右的,逐步做到各占多大的比重,提出一个要求。到第二个五年,我们又要做到哪一级领导成员(比如省、市、自治区级,部长级),除特殊情况以外,不超过多少年龄。大家研究一下,可不可能?这是讲具体化。军队曾经有这样的规定,现在也正在向这方面走,就是团级三十岁左右,师级四十岁左右,军级五十岁左右。现在有些单位执行得比较好,有些单位执行得差一些。将来地方的干部制度,比如退休制度,也应该有个年龄规定。世界各国都有自己的退休制度。比如军官,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是到六十岁退休。不过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民间就业。文官,比如日本的外交官员,就是六十五岁退休,有的年龄更小。看来,我们也需要有个年龄

的限制。这个事情,在前五年我们可能办不到,是不是可以当作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目标?不仅年龄有限制,干部的名额也有限制。比如一个部,三五个部长够不够?其他尽是业务机构,为什么要一桌两桌的领导干部呀?这是一大改革。我们的官僚主义与此有关,好多事情行不通与此有关。一个部,顶多四个副部长就够了嘛,更不要说司局了。司局为什么还要那么多副司长、副局长呀?顶多两个够了嘛。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现在机构的臃肿是分不开的。当然,前五年有个交替问题,有五年到十年的过渡时间。中心就是头五年真正能够选到五万左右五十岁以下的、四十岁左右的、四十岁以下的干部。这几种年龄的干部也应该有个比例。然后设想干部制度、机构怎样才比较合理,在后五年通盘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是这个前五年。前五年,那就要在座的各位负责了,到后五年在座的有几个在呀?有几个还能顶着上班?很难讲。现在六十五岁的人,过五年就七十岁了。时间过得很快。所以,陈云同志这个建议我是双手拥护。现在就是要大家来讨论怎样具体化。不开明可不行呀,我和陈云同志交过心的,老实说,就我们自己来说,现在叫我们退,我们实在是心里非常愉快的。当然,现在还不行。我们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国家的政策,党的方针,我们当然要过问一下,但是最大的事情是选拔中青年干部。我们两个人的主要任务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我希望在座的同志,凡是超过六十岁的同志,都把这个问题当作第一位的任务来解决。这个事情太大了。我就讲这些。

关于思想战线上的 问题的谈话^{*}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七日)

前些时候我同胡耀邦^[96]同志说了,要找宣传部门谈谈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特别是文艺问题。党对思想战线和文艺战线的领导是有显著成绩的,这要肯定。工作中也存在着某些简单化和粗暴的倾向,这也不能否认和忽视。但是,当前更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是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党的三大作风^[66]有一条讲的是自我批评,这是我们区别于其他政党的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现在对不少人来说,这一条很难做到。

六中全会以前,总政提出了批评《苦恋》的问题。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惊。有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放肆地讲了一篇话。有的学生反映:党组织在学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讲话就把它吹了。学校党委注意了这件事,但是没有采取措施。倒是一个女学生给校党委写了一封信,批评了我们思想战线上软弱无力的现象。还有新疆乌鲁木齐市有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共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个文联筹备组召集人,前些日子大鸣大放了一通,有许多话大大超过了一九五七年的一些反社会主义言论的错误程度。像这一类的事还有不少。一句话,就是要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脱离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回忆一下历史的经验:一九五七年反右派^[101]是扩大化了,扩大化是错误的,但当时反右派的确有必要。大家都还记得当时有些右派分子那种杀气腾腾的气氛吧,现在有些人就是这样杀气腾腾的。我们今后不搞反右派运动,但是对于各种错误倾向决不能不进行严肃的批评。不仅文艺界,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问题。有些人思想路线不对头,同党唱反调,作风不正派,但是有人很欣赏他们,热心发表他们的文章,这是不正确的。有的党员就是不讲党性,坚持搞派性。对这种人,决不能扩散他们的影响,更不能让他们当领导。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是英雄。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一定要认真扭转。当然,这种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是十年动乱的后遗症,同时也是由于外来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对各种人的情况需要作具体分析。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有这些现象,而在于我们对待这些现象处置无力,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当然,对待当前出现的问题,要接受过去的教训,不能搞运动。对于这些犯错误的人,每个人错误的性质如何,程度如何,如何认识,如何处理,都要有所区别,恰如其分。批评的方法要讲究,分寸要适当,不要搞围攻、搞运动。但是不做思想工作,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那个青年诗人在北京师范大学讲话以后,有一部分学生说,这样下去要亡国的。他和我们是

站在对立的立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以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有人说这部电影艺术水平比较高,但是正因为这样,它的毒害也就会更大。这样的作品和那些所谓“民主派”的言论,实际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

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得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一部分青年人对社会的某些现状不满,这不奇怪也不可怕,但是一定要注意引导,不好好引导就会害了他们。近几年出现很多青年作家,他们写了不少好作品,这是好现象。但是应该承认,在一些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中间,确实存在着一种不好的倾向,这种倾向又在影响着一批青年读者、观众和听众。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老作家有责任团结一致,带好新一代,否则就会带坏一代人。弄不好会使矛盾激化,会出大乱子。总之,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

和社会主义制度都需要改善,但是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无政府状态。试想一下,《太阳和人》要是公开放映,那会产生什么影响?有人说不爱社会主义不等于不爱国。难道祖国是抽象的吗?不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爱什么呢?港澳、台湾、海外的爱国同胞,不能要求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至少也不能反对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否则怎么叫爱祖国呢?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下的每一个公民,每一个青年,我们的要求当然要更高一些。对我们党员中的作家、艺术家、思想理论工作者,那就首先要求他们必须遵守党的纪律,而现在的许多问题正出在我们党内。党如果对党员不执行纪律,还怎么能领导群众呢?我们坚持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在思想文化的指导工作中还存在着“左”的倾向,这也必须坚决纠正和防止。但是,这丝毫不是说可以不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坚持“双百”方针也离不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态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这个问题一定要弄清楚,这关系到培养下一代人的问题。我刚才提出的需要进行批评的作品、观点,只是一些例子,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文章,理论界也有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不一一列举了。《苦恋》和那个青年诗人的讲话,为什么还有那么一些人支持?这值得我们思想战线上的同志深思。

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我们的思想界比较清醒了一些,再加上对非法组织、非法刊物采取了坚决取缔的措施,

所以情况有了好转。但是我们现在仍然要保持警惕。现在有些人打起拥护华国锋^[23]同志的旗帜,要打倒谁和谁,要注意。这反映出当前斗争情况的复杂性,促使我们提高警惕。

关于对《苦恋》的批评,《解放军报》现在可以不必再批了,《文艺报》要写出质量高的好文章,对《苦恋》进行批评。你们写好了,在《文艺报》上发表,并且由《人民日报》转载。

总之,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 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九日)

演习部队的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你们胜利地完成了这次演习任务。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同志们致以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

这次演习，检验了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成果，较好地体现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摸索了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经验，提高了部队军政素质和实战水平。这对全军的建设、战备和训练是一个有力的推动。演习达到了预期目的，是成功的。这充分表明，我们党缔造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军政素质是好的，是有优良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的，是有战斗力的。我们完全相信，有这样一支好的军队，又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任何侵略者。

当前，我国正处在继往开来的重要历史时期。由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有力贯彻，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政治上更加安定团结，各条战线出现了越来越好的形势。国际上，反霸斗争更加发展，霸权主义更加孤立。但必须看到，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华北某地检阅军事演习部队时的讲话。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超级大国的争夺日益加剧,苏联霸权主义加速推进全球战略部署,严重地威胁着世界的和平和我国的安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我军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肩负着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保卫四化建设的光荣使命。因此,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

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努力使部队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

我们一定要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

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增强军队内部团结,加强民兵建设,继承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进一步增强部队的军政素质,努力提高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进一步开展“四有、三讲、两不怕”〔158〕活动,加强作风培养,使部队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

我们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

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三日)

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点,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精简这个事情可大啊!如果不搞这场革命,让党和国家的组织继续目前这样机构臃肿重叠、职责不清,许多人员不称职、不负责,工作缺乏精力、知识和效率的状况,这是不可能得到人民赞同的,包括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干部。这确是难以为继的状态,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要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能够容忍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所有老干部都要认识,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是革命和建设的战略需要,也是我们老干部的最光荣最神圣的职责;是我们对党的最后一次历史性贡献,也是对我们每个人党性的一次严重考验。所以,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且早就应该解决。但是,早了没有条件。现在,我们经过粉碎“四人帮”,又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到六中全会,创造了这个条件。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再晚些解决行不行呢?晚解决更困难,问题的本身会更严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重,牵扯的问题也更多,牵扯的人肯定一年比一年多。还有一点,这个问题涉及很多老同志。现在确实也有个好的条件,因为许多觉悟比较高的老同志还在,能够带头,也能够克服阻力,只要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容易。所以,时间不能再拖了。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如果不进行这场革命,不论党和政府的整个方针、政策怎样正确,工作怎样有成绩,我们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党和政府的机构这样地缺少朝气、缺少效率,正确的方针、政策不能充分贯彻,工作不能得到更大的成绩,我们怎么能得到人民的谅解,我们自己又怎样能安心?不要只看到我们的工作确实有成绩,天天暴露的问题不晓得有多少啊!

第二点,这个问题要涉及到几百万人。精简不是百万,是几百万。按中央这一级来说,要精简三分之一。就下面来说,我看不止三分之一。就是四分之一,也有五百万人。当然,不完全是干部,还有一般服务人员、工作人员,也可以减少。所谓精简,是说各部门各单位都要确定编制,一部分人在岗位上工作,其他的人抽出来轮训,学习考试合格以后,到岗位上工作,再让现在岗位上的人去接受轮训。总之,这是涉及几百万大、中、小干部的问题。如果企业、事业单位整顿起来,涉及的人就更多了。单单机关就涉及大约四五百万人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很大。正是因为大,工作就要做细。但是,第一条决心要大,第二条才是工作要细。再细,也难免有照顾不周到的地方,

这个话要说到前面。特别是时间这么紧,我们说用两年来的时间完成这场革命,是很紧的。所以,决心要大。我们政治局确定之后,要坚定不移,不能受干扰。现在一些外国人也在议论,说我们搞这件事情看起来要失败。我们下面的干部都觉得困难得很。我还是那个话,困难确实困难,但是只要我们下了决心,坚定不移,我不相信搞不成。不是要抱必胜的信心吗?我看这样的事应该抱必胜的信心。因为没有别的选择,这件事不能犹豫,不能妥协,也不能半途而废。发生问题,其中包括示威,都要预料到。不要原则赞成,一涉及到本身的利害,问题就来了。在精简中如果发生什么游行示威呀,贴大字报呀,都不要怕。在处理精简问题的时候,又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一部分人中间的派性,处理的人牵扯着这派那派,是很复杂的问题。但是,不管怎样,对这场革命要坚定不移。下了决心,就要顽强,不动摇,出点乱子不要紧,吓不住我们。

第三点,我建议政治局原则上批准中央国家机关的精简方案。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不够具体,可能减的人还少了。我这里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可能革命精神不够。中央直属机关不是拆大庙,但小庙多得很嘛。还有每个庙的菩萨也太多,很有文章可作的,不要以为没有好多油水。比如群众团体,工青妇现在趁这个机会搞一个精简的方案,搞一个精简的机构,造成一个好传统。过去,工青妇的人也不多的,本来机构并不大,现在相当大。事业单位也不是没有油水。国务院系统精简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中央党群系统只精简百分之几恐怕太少了。对中央直属机关的方案也原则批准,但是,应该再去摸一摸,不要以为没有油水。总之,这个方案的革命性还不够。

军队正在考虑,坚决减少军队的人数。

精简方案批准以后就开始着手实行,首先找一两个部门研究编制、定额。如国务院,副总理究竟几个适当?这次会议有的同志提出两个,两个也可以考虑,可能不够一点,如果两个能够行得通,我也赞成。再加几个国务委员。这些国务委员相当于副总理,将来可以出访。国务委员的任务可以比较机动,总理可以分配他做这样那样的事。如果有国务委员,副总理少几个也可以,这个问题也研究一下。部委的精简现在就可以着手。最好先搞一两个部门,有些什么典型经验,有些什么反应,有些什么问题,跟大家见面,这样别的部门进行起来就心中有数,事情好办。总之,中央这一级的精简规定半年时间。要理个头绪出来,半年的时间应该够了。人员的处理是另一件事,但是机构要理出眉目。人员完全处理妥当可能要比较长的时间。把一个一个部门的编制搞出来,我看半年时间应该够了。如果实在不够,顶多三个季度,不能再迟了。当然,省、市、自治区待中央机关进行一段时间以后也可以着手,不必等到中央处理完毕再开始。我们的方案确定了,又有了几个典型经验,各地方就可以开始搞。中央一级先找一两个单位,比如说首先从外贸系统开始,试试看。还找一个什么单位?可否找合并简便一点的水利部、电力部?看看究竟有些什么问题。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会从各种各样角度提出问题。精简方案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备,大体上差不多就行了。原则上是从紧,要放宽很容易。这一次我们紧了之后,硬着头皮不放宽。比如规定定额,副部长是几个人,以后人员可以动,但是名额不能动,这样有利于进进出出。要不然不得了。要做到进一个人真不容

易。这样做了,才能给我们起用比较年轻的干部创造一个条件。定了额,每个同志都要实实在在顶一个人做事,不能挂名和半挂名。有些同志说自己还行,到真正需要顶着干的时候,究竟行不行?那就要经得起考验了。要我做八小时工作,我就肯定不行。

总之,今天原则批准这两个方案,就着手干。经过个把月,抓一两个典型,制定编制,规定定额,规定各单位和各个人的职责界限,包括具体的人事安排,看有什么问题。

最后,第四点,这一次革命,不但要注意出的问题,还特别要注意进的问题。刚才说,有几百万人要出,应该注意解决好;但第一位应该着眼于进。部长也好,司局长也好,选什么人,什么人进,这最重要。包括军队也是这个问题最重要。进和出,进摆在第一位。选人要选好,要选贤任能。选贤任能这个话就有德才资的问题。贤就是德,能无非是专业化、知识化,有实际经验,身体能够顶得住。这次我们让多余的或者身体不好的老同志退休、离休,或者换到适当的位置(我说的适当位置就是荣誉职务了),什么人来接替?人一定要选好。还是老话,要坚决贯彻陈云同志讲的几条^[161],几种人不能放进去啊!人有的是。进,最关键的问题是选比较年轻的。当然,可能有个过渡,一两年内,部长还要岁数大一点的同志当,特别是刚精简以后。这是很明白的一个道理。国务院机构缩小,部委的权力就要加大,部委又要加大企业、事业单位的权力。这也是拨乱反正。副部长、司局长要选年轻的,尽量选年轻的。开国时的部长都是年轻的,那个时候差不多都是三四十岁嘛。现在我们好多骨干,就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比那个时

候我们部长的知识多得多。精简是革命,选贤任能也是革命。出要解决好,更重要的是解决进。这是一道手脚,不要以后再来搞运动解决这个事情。这次也算是一个小运动。我们说大运动不搞了,这次搞个小运动,但不是用过去搞运动的方法。

我就讲这么四点意见。

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一九八二年四月十日)

这个文件,我看是一个重要的文件。这是讲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实际上我们要看得更深一点。

现在是什么形势呢?我们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162]、“五反”^[163]那个时候能比的。那个时候,贪污一千元以上的是“小老虎”,一万元以上的是“大老虎”,现在一抓就往往是很大的“老虎”。报上登的一个从宽处理的,贪污六千元;一个判十五年徒刑的,贪污五六万元。现在的大案子很多,性质都很恶劣,贪污的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的,都不止是什么“万字号”。有些是个人犯罪,有些是集体犯罪。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材料说明,也是在这一两年白银黄金大量走私到香港,单单这一笔,就使国家损失大量外汇。好多钱落到了私人或者某些集体的腰包。如果把盗窃公家的财产等等都算在内,那就更要多得多。要足够估计到这样的形势。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的会议上的讲话。

坚决刹住这股风,那末,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

应该提得更高一点,看得更深一点,这样来认识同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现在对这个问题,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完全统一。有一部分同志遇事手软,下不了手。为什么下不了手?思想上没有认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只当作一般性质的问题来对待。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讲,至少讲了两年了,还是有些同志下不了手。现在我们不但要发这个文件,而且要坚决地去做。四月五月每一个省里要抓几个大案。这跟反右倾不同。反右倾容易混淆,容易搞错。哪样叫右倾,哪样叫“左”倾,往往搞不大清楚。盗窃国家财产,贪污受贿,这是现钱买卖,清清楚楚,不容易搞错。所以,现在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现在看起来,太重也不行,但是对有一些情节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给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啊!这个问题要认真地搞,而且在近期要抓紧,处理要及时,一般地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

再讲一点,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我们说不搞运动,但是我们一定要说,这是一个长期的经常的斗争。我看,至少是伴随到实现四个现代化那一天。如果到本世纪末,还有十八年,每一天都会在斗争。我想,有四个方面的事情,四个方面的工作和斗争,要伴随着我们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走。这四个方面的工作,或者叫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必要保证,即:第一,体制改革;第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第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第四,整顿党的作风和党的组织,包括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前面三件事已经放到日程上了,后面

一件事还没有放到日程上。但是,前面三件事也联系到党风问题。对有严重问题的党员,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不就是整党吗?贪污分子,贪污数量很大的,就是坦白从宽,再宽大,党籍总要开除吧;如果在军队,军籍总要开除吧。再宽,也不能宽到连党籍、军籍也保留,甚至于还升一级吧。这说不过去嘛!党籍、军籍、公职都应该开除。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的斗争,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保证。这是一个经常的斗争,经常的工作。否则,社会主义道路怎么坚持呀!如果不搞这个斗争,四个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就要失败。所以,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不但对外开放政策肯定要失败,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也肯定要失败。有了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这一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就可以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当然,毛病还是会出的,其他方面也可能犯错误的,但是不会很大。打击经济犯罪活动,不仅是今年一年的事情,现在是开个头。开头要有点声势,这样至少可以挽救一些人,包括那些自首投案的人。如果我们没有点声势,拖拖拉拉,下不了手,还会有大批的人变坏,包括一些老干部。

顺便讲一讲整顿党的队伍。最近肥乡发生的事件^[164]可要抓住。请书记处好好议一下,拿这作一种典型来整党。这个县的县委领导班子要解散,要重建。这类事情,我们好多地方都要注意。

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

(一九八二年五月六日)

中国对第三世界朋友尽的力量还不多,这是因为中国地方虽大,但很穷,还有许多困难。建国以来,我们做了一些事情,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粮食达到自给。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旧中国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尽管还很落后,但比过去好多了。我们现在正在一心一意地搞建设,力争经济有较快的发展。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对第三世界的朋友们多尽点力量。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只有二百五十到二百六十美元,你们也不高。但是我国人口多,如果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每人增加一百美元,国民生产总值就要增加一千万美元。人多有人多的麻烦,很多问题不容易解决。国家小有小的好处,人少有少的好处。你们人口少、资源丰富,你们的事情比我们好办。

目前,我国实行经济开放政策,争取利用国际上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经济。这一政策已开始有些效果。但是,从发达国家取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不是容易的事情。有那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的谈话。

么一些人还是老殖民主义者的头脑,他们企图卡住我们穷国的脖子,不愿意我们得到发展。所以,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

你们想了解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我们很多东西是靠自己搞出来的。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对我们有些帮助,赫鲁晓夫^[165]上台后,不仅不帮助我们,反而对我们采取敌视的态度,以后苏联又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威胁我们。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美国也敌视我们,直到一九七二年以后才有些变化。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即在建国三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大体有二十几年,我们完全或基本上处于没有外援的状况,主要靠自力更生。没有外援也有好处,迫使我们奋发努力。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在这个期间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发射了人造卫星等等。所以,我们向第三世界朋友介绍的首要经验就是自力更生。当然,这并不是说不要争取外援,而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这样,就可以振奋起整个国家奋发图强的精神,把人民团结起来,就比较容易克服面临的各种困难。

再就是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

搞工业,规模也不要太大,可搞些中、小项目。贵国与我国情况不同。我国国家大、人口多,没有一点大的骨干工业是不行的。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太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

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现在要发展经济,还是要靠自力更生、量力而行这个原则。我国正在制订第六个五年计划,第七个五年计划也有了个设想。今后十年经济发展不会太快,因为过去遗留下来的问题太多,各种比例失调。五年至十年以内,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每年增长百分之四,达到百分之五就了不起了。我们希望下一个十年也就是本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更高些。

以上就是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建设经验,仅仅是一个简要介绍。

在军委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七月四日)

军队的问题 ,这次会上谈得不错。这些问题的处理 ,我都赞成。虽然有些问题处理得并不是完全令人满意的 ,但是现在也只能这样。

体制改革的问题 ,杨尚昆^[166]同志已经讲了 ,我不想多讲了。只讲一点 ,就是体制改革要提到怎样一个高度来看。最近我有两次讲话 ,讲了对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第一是体制改革 ,目前进行机构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当然还有“五讲四美”^[167] ,军队叫“四有、三讲、两不怕”^[158]。精神都一样 ,都是对的。军队有军队的特点。我跟理论界同志谈了为什么要强调守纪律。他们赞成提这个要求。没有纪律可不行啦。同心同德 ,一心一意 ,没有纪律不行。我们过去革命 ,就是靠纪律 ,而且是自觉的纪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最好的风气就是这个。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 ,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 ,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所谓四个保证 ,就是指这四件事情。只要四个现代化没有完成 ,每走一步 ,这四个保证都是伴随着的。比如为什么要提打击经济犯罪活动 ? 因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

政策。对外开放,资本主义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就会钻进来的;对内搞活经济,活到什么程度,也是有问题的。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这一手。但是为了保证这个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能够真正有利于四化建设,能够不脱离社会主义方向,就必须同时还有另外一手,这就是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没有这一手,就没有制约。现在我们看到的问题就已经不少,经济犯罪很严重,好多案子又处理不下去。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政治、文化领域,都有严重的犯罪活动和犯罪分子。总之,四个保证这四件事情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长期搞下去。我们不搞运动,但是,随着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就要坚持四个保证,一天也不要丢掉,要把它变成一种经常性的工作和斗争。这四件事情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有阶级斗争。

机构改革,我们走了第一步,开了个头。党政先行了一点,军队后了一点。总的来说,搞得比较顺利。军队经过这个会议,在座的同志思想认识一致了,大家都同意了,这就好办了。现在看,可能第一步目标的完成,军队还会快一些。因为军队的特点是,一行动起来就快。当前,所有党政军机构改革,都叫做第一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包括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领导方法,那就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要建立很多规章制度。比如讲责任制,什么责任,归哪个部,归哪个人承担,都要明确。国务院合并这么多部,如果照老的方法可不行啦!副总理减到两个,这就要随着机构改革,加强部委的工作,加强部委处理问题的责任和能力,部里要加强司局的责任和工作能力。相应地,也要加强厂矿企业、一些公司的责任。不改

革,不行。

军队也有这个问题。将来军委和各个总部,不简化看来不行。怎么简化,现在还不成熟。军队目前的体制、领导方法、制度,不是那么好的,很繁琐。军委、常委、办公会议,然后几个总部。真正来说,就是加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三总部的工作责任,上面有一个小的协调机构就行了。领导太繁杂,不但下边不好办,就是我们处理问题画圈圈都难,都是些麻烦事情。过去打仗的时候,负领导责任的,一个野战军几个人,一个兵团几个人,一个军几个人,一个师几个人,有的师还是师长兼政委,有个把副政委,搞得蛮好。一野^[168]、三野^[169]的司令员和政委都是一个人,彭老总、陈老总,其他野战军都是两个,方便得很嘛!现在是一大堆人。机构改革,算第一步,以后还要继续做的。成熟一件做一件,不成熟宁肯慢一点。这次机构改革,军队是后了一步,但也有必要,酝酿得更成熟些,大家思想更一致,更容易解决问题。

尚昆同志讲了军队体制改革的四点内容。我今天着重讲两点。一是提高工作效率。军队就是提高战斗力,也有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另外一点,体制改革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有利于选拔人才。过去那样臃肿,根本无法培养人才、选拔人才。干部年轻化,军队提了多年,要求选拔比较优秀的、年轻的,台阶可以上快一点。但应该说这件事情这几年做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我们这些人就交不了帐。我看在座的,没有六十岁以下的人了吧?这个问题推一年,欠的债就更多。如果拖五年,怎么办?干部年轻化,要当作体制改革的一个中心目标,军队、地方一样,党政军一样。选拔一些政治上好

又比较年轻的干部,把他们一步步地提升上来。发现人才,可不容易呀。我们一般老同志,脑筋里的框子还是局限在我们同等年龄的人,一谈干部问题,都还是这个圈圈里的。拿我们军队来说,“三八式”上来都不容易。军队确实有一个传统的习惯,还有“老上司”这些问题在里面。一大堆老红军压在上面,其中包括我在内。这个问题不解决不行。聂荣臻^[30]同志提出步子要稳当,我赞成。他有一个好意见,就是要结合,老的一下丢手不行。老的要结合中、青。从全军来说,现在团以下干部还比较年轻,师以上就不年轻了。这次办公会议准备了一个《军官服役条例》,发给大家征求意见,大家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必须搞,不搞不行。

人才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平常同下边接触太少,还有些习惯的想法,所以不容易发现。前年,我同陈丕显^[170]同志到第二汽车制造厂,有个副厂长陪着我们参观,我发现这个人不错。我说他不错指什么?一个那么大的汽车厂,他是技术骨干,工作胜任,这是讲能力。他的年龄那个时候是三十八岁,现在四十岁。更重要的一点,他是“文化大革命”中受打击的,他是反对打砸抢的,以后一直是表现好的,包括对待所谓“反右倾翻案风”^[36]这些问题在内。这样的人才特别可喜。这样的人有的是,而且容易鉴别。选拔人,第一个是政治条件。我们军队有这个问题。尚昆同志讲了,有的团的干部、有的营连干部,那种思想状态、政治观点是不好的,应该看得清楚。相应地,好的也应该鉴别出来。我曾经建议,军委、各总部领导同志,现在还请各路“诸侯”,每一位选十个人,搞出一个名单。光在座的六十几个人,就可以提出近千把人的名单。政治条件的标准,

必须不是跟随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那“三种人”。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大多数还是比较好的。这些人应该好好地培养。一步一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快一点。

总之,体制改革,除了反对官僚主义,克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工作效率低这些毛病外,重要的是选拔人才。要使好的比较年轻的干部早点上来,好接班。这件事要放在我们经常的日程中间。我们讲了几年了。大家一致认为是一件大事,但是做起来很不容易。不解决选拔人才的问题,我们交不了班,历史会给我们写下一笔。我们有好多事情就是做得比较晚,现在耽误不得。关于体制改革问题,我就讲这点意见。

设顾问委员会是废除 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日)

我本来没有什么话讲了。现在准备把两个文件〔171〕提到全会审议。这两个文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我看都是比较成熟的。当然,其中有一些地方还要推敲,做不到的,不仅是胡乔木〔132〕同志刚才讲的党章第十八条中规定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要提前一个月发到全党讨论,做不到,类似的还会找到一些,如开代表大会要在三个月之前通知代表。总之,办不到的事情就不要写,本来也不需要规定得那么细。总的来说,这两个文件是比较成熟的文件。

这次的党章有些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比如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已经接触到了,但没有完全解决,退休制度的问题也没有完全解决,设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鉴于我们党的状况,我们干部老化,但老同志是骨干,处理不能太急,太急了也行不通。还有,我们多年来对中青年干部的提拔就是少,就是没有注意这方面的工作嘛。而且还得承认,确实是障碍重重,这个障碍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是无意识的,两种情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况都有。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顾问委员会来过渡。顾问委员会,应该说是我们干部领导职务从终身制走向退休制的一种过渡。我们有意识地采取这个办法,使得过渡比较顺利。也许经过三届代表大会以后,顾问委员会就可以取消了。如果两届能够实现,就要十年,那时我们在座的有几个还在?要是两届的话,现在六十岁的就是七十岁,七十岁的就是八十岁,八十岁的就是九十岁。所以,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中青年干部有的是,问题是过去我们老同志眼睛长期不是向着他们,不从他们中间去选拔接班人,总是在老的圈子里面转过去转过来,总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军队特别严重,解决起来难度更大,现在地方上还好一点。这个问题关系到军队建设的前途。体制调整,国务院、党中央机关都做得不错,军队就比较差。当我们真正找人的时候,人还是可以找到的。当然,总要想办法。反正我们这一代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要欠帐的。最近组织了个小组,摸索将来新的中央委员会里边多吸收一些中青年干部参加,经过几次研究,现在大体上维持了上一届开始时的年龄。过去我们年轻,八大^[102]的时候我和陈云^[83]同志都是五十二岁,当时中央委员平均年龄并不算大。现在比九大、十大^[106]、十一大^[52]中央委员的平均年龄大。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正常,造反起家的人,那是年轻的。我们现在采取过渡形式是适当的,但是在过渡时期当中,比如说过渡时期是两届,十年,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中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中国理解自己的责任。有两条大家是信得过的,一条是坚持原则,一条是讲话算数。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不仅今天如此,建国以后,在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领导我们国家的时候就是如此。所以,国际上许多朋友都信任我们。我们对许多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境遇也是理解的。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霸权主义的受害者是谁?难道是美国、苏联?美国和苏联是搞霸权主义的,他们不是受害者。欧洲、日本、大洋洲、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受害者。东欧有一点受害。如果世界和平被破坏,首先受害的是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大战没有打,但小战不断。小战在哪里打?在第三世界。根源还不是超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级大国霸权主义在那里挑拨,在那里插手!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就是利用第三世界的冲突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尽管第三世界本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直接受害的还是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这不是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由第三世界所处的地位和切身利益关系决定的。

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从联合国的角度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中积极的因素是第三世界的兴起。在联合国中,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了。对这个变化的价值要给予充分的估量。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但是,他们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第三世界国家尽管穷,但在国际政治中的分量已经大大增加,这是任何人不能忽视的。当然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目前协调得不理想,这个问题复杂得很,在这方面要做工作。至于中国,我们的力量有限,作用也有限。人们说,中国在第三世界处于特殊的地位。我们说,中国只是第三世界的一员,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要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很多朋友说,中国是第三世界的头头。我们说,头头可不能当,头头一当就坏了。搞霸权主义的名誉很坏,当第三世界的头头名誉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

我们历来不大相信裁军谈判会有什么效果,但是我们是赞成谈判的。有人说中国好战,其实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希望至少二十年不打仗。我们面临发展和摆脱落后的任务。我们摆在第一位的任务是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一个初步目

标,这就是达到小康的水平。如果能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情况就比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取得了一个新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不是说赶上,更不是超过,而是接近。所以我们希望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一打仗,这个计划就吹了,只好拖延。从现在到本世纪末是一个阶段,再加三十至五十年,就是说我们希望至少有五十年到七十年和平时间。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当然也符合世界人民的需要,特别是第三世界人民的需要。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世界上有人怀疑一旦现在中国这些领导人不在了,中国的政策是不是会变。我刚才回答了这个问题,不会变,变不了!如果中国想自己发展起来就需要这样做,谁也变不了。但这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如果国际上有人把战争强加于我们,我们也不害怕,无非拖延若干年,打完仗再搞建设。现在,我们国内的情况不错,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我们的对外政策是符合我们这个宏伟目标的,尽管这个目标人家看起来微不足道,但我们自己仍然称之为宏伟目标。

注 释

- 1 林彪（一九二七——一九七一年），湖北黄冈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 1、39、42、121、190、293、330、346 页。
- 2 “三要三不要”即“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毛泽东一九七一年八月月中旬至九月十二日在南方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谈话中针对林彪等人的阴谋活动而提出的。——第 13、124 页。
- 3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 15、61、217 页。
- 4 珍宝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九年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击退苏联军队侵犯中国黑龙江省珍宝岛地区的战斗。西沙群岛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渔民对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西贡当局军队进行的自卫还击

战。中印边界自卫还击战是一九六二年十月中国边防部队为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对印度入侵军进行的自卫还击战。——第 15 页。

- 5 参见本书注 157。——第 16、69 页。
- 6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候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第 18、119 页。
- 7 五七指示指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审阅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的信。信中讲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第 19 页。
- 8 这是毛泽东给老革命根据地人民的题词，见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 24 页。
- 9 三结合这里指在企业管理和科学技术工作中实行的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第 26 页。
- 10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把知识分子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诬蔑为“臭老九”。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召集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谈话时借用了京剧《智取威虎山》中的一句台词“老九不能走”，以此批评“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诬蔑，说明革命和建设事业是需要知识分子的。——第 27、43、51、244 页。
- 11 三线指三线地区。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第 27、28 页。

- 12 工业七十条即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有七十条。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由于许多企业没有实行严格的责任制，不讲经济核算，工资、奖励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以及党委包揽企业的日常行政事务等等，相当普遍地出现了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损坏严重，经济效果很差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国营工业企业的性质和基本任务，重新肯定了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要求建立和健全必要的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强调计划管理、按劳分配、企业经济效果和职工物质利益等项原则。这个条例草案的讨论和试行，对于总结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的经验，贯彻执行当时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促进我国工业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第 28、295 页。
- 13 指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五日至十月十九日国务院在山西省昔阳县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在开幕式的讲话中着重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他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现代化，如果农业搞得不好，很可能拖国家建设的后腿。——第 32 页。
- 14 陈景润，一九三三年生，福建福州人。当时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他对解析数论领域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居世界领先地位，研究结果被誉为“陈氏定理”。——第 32 页。
- 15 尤金（一八九九——一九六八），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第 33 页。
- 16 罗荣桓（一九二——一九六三），湖南衡山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 36、39 页。
- 17 “老三篇”指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三篇文章，因为林彪等主张就学这三篇文章，要反复背诵，所以形成这个说法。后来又加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自由主义》两篇文章，称“老五篇”。——第 36、42 页。
- 18 “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

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 38、126、190、279、297、379 页。

- 19 这是针对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一九七七年三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而提出的批评。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国内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在这一年年底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清明节（四月四日）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是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广大群众强烈要求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一九七七年三月，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认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认为“确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但是，他又不得不说，“在适当的时机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这里，邓小平指出了华国锋讲话中的矛盾，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了邓小平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郑重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 38 页。
- 20 “三七开”在这里是指对一个人一生功过的总估计，七分是成绩，三分是缺点错误。——第 38 页。
- 21 这句话的意思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没有说过凡是他们说的做的都绝对正确、不能改变这一类的话。——第 39 页。
- 22 明治是日本天皇睦仁的年号。明治维新是从一八六八年起在日本明治年间

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废除了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且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使日本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第40页。

- 23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一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42、247、309、320、350、393页。
- 24 叶剑英(一九八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一九七三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五年任国防部部长。一九七八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42、122、221、244页。
- 25 张春桥,一九一七年生,山东巨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等职,与江青组织、领导“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第43、66、85页。
- 26 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举行。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又称古田会议决议,是毛泽东根据一九二九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的精神,结合红四军的实际情况,总结红军创建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写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题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第44、115页。

- 27 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九五七年七月）。——第44页。
- 28 科学十四条即一九六一年六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提出、同年七月中共中央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中央批准这个草案的批语中指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很关紧要。”“近几年来，有不少的同志，在对待知识、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有一些片面的认识，简单粗暴的现象也有所滋长，必须引起严重的注意，以端正方向，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草案就正确理解对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红与专的要求，正确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明确科学研究机构的根本任务（出成果，出人才），保持科学研究工作的相对稳定，保证科学研究工作的时间，改进研究机构中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作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规定。中央认为，这个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都是适用的。——第49页。
- 29 高等学校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后三年来高等教育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针对当时学校教学质量降低，忽视知识分子作用以及劳动过多等的主要问题，规定了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努力提高教学质量；积极参加科学研究；正确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做好总务工作，保证教学和生活的物质条件；以及改进党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第49页。
- 30 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一九五六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第52、67、411页。
- 31 关于高等院校应当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军问题，邓小平曾多次指出过。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对教育工作的一次谈话中说：“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又是办科研的中心。”同年九月十四日，他在审定《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时，在《通知》中加写了一段话，指出：“小学、中学、大专学校是培养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基础，而大专学校又是

科学研究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第 53 页。

- 32 这是针对当时中小学学制偏短的情况提出的建议。一九七七年普通中小学的学习年限，一般地小学为五年，中学为四年。——第 55 页。
- 33 一九七八年二月五日，教育部党组为尽快增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力量，以适应编写教材的迫切需要，报请中央批准从各省、市抽调一批编辑出版干部。二月十日邓小平在这份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加以保障。所提要求拟同意。”——第 55 页。
- 34 姚文元，一九三二年生，浙江诸暨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第 66、85 页。
- 35 “黑线专政”最先是林彪、江青一伙用来诬蔑建国后十七年文艺工作的用语。一九六六年二月，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作出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断言：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后来，林彪、江青一伙又把“黑线专政”论扩展到教育、出版、体育、卫生、公安工作和党的组织、宣传、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他党政工作。这种颠倒是非的荒谬估计，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之一，给各条战线的工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第 66、207 页。
- 36 参见本书注 19。——第 66、144、170、243、349、411 页。
- 37 邓小平这次谈话以后，教育部即以大批判组名义，发表题为《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的文章，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批判。这篇文章载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红旗》杂志、十一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第 67 页。
- 38 七二一指示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

段话，即：“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第 68 页。

- 39 工宣队即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派往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领导学校工作的工作队。——第 69 页。
- 40 十项战斗任务是：（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速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第 72 页。
- 41 九个决定、条例指《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第 72 页。
- 42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按照这个观点，第一世界，指美国和苏联两个拥有最强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在世界范围推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第三世界，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第二世界，指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第 77、127、160 页。
- 43 王洪文（一九三四——一九九二），吉林长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

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第 85、192、225、280 页。

- 44 江青（一九一四——一九九一），山东诸城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为首组织、领导“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一九七七年七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开除她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八一年一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第 85、296、352 页。
- 45 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 年草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211 页）。——第 87 页。
- 46 参见列宁《关于党纲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51—152 页）。——第 88 页。
- 47 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第 1 册，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44 页）。——第 89 页。
- 48 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在讲到知识分子问题时，曾多次引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参见《左传·僖公十四年》）这个成语作比喻，来说明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那几张旧“皮”已经不存在了，因此他们不能不依附在公有制这张新“皮”上，即站在无产阶级方面。——第 89 页。
- 49 见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55 页）。——第 90 页。
- 50 参见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33 页）。——第 96 页。
- 51 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在一个批示中曾指出，工厂管理人员“不学会技术，长期当外行，管理也搞不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一语，见《孟子·尽心下》。——第 99 页。

- 5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在揭批江青反革命集团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因而又起了阻挠拨乱反正的消极作用。邓小平作这篇讲话的时候,由于时机还不成熟,还没有可能对十一大的作用作这样两个方面的分析。——第 100、135、183、275、308、414 页。
- 53 “三老四严”是大庆油田职工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口号。“三老”指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四严”指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第 104 页。
- 54 见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80 页)。——第 106 页。
- 55 见列宁《民粹主义空想计划的典型》(《列宁全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61 页)。——第 107 页。
- 56 一九七四年四月六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十日,他在大会发言,全面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说明了中国的对外政策。这篇讲话载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 112、305 页。
- 57 王明“左”倾路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教条主义者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见者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第115页。

- 58 见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第115页。
- 59 见毛泽东《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第116页。
- 60 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页）。——第116页。
- 61 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第116页。
- 62 见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第116页。
- 63 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第117页。
- 64 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第117页。
- 65 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7页）。——第117页。
- 66 党的三大作风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第117、165、389页。
- 67 见毛泽东《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二日）。——第117页。
- 68 见毛泽东《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第117页。
- 69 引自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第117页。

- 70 韦国清（一九一三——一九八九），广西东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 118 页。
- 7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 127 页。
- 72 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在哈尔滨举行。大会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全国人民，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迅速实现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任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职工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并决定恢复中国工人阶级统一的全国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以前的五次全国劳动大会，先后举行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一九二六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一九五三年四月三十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把即将召开的“中国第七次全国劳动大会”改称“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第 134 页。
- 73 中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总结了全国第六次劳动大会以后，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全国工会工作的经验，确定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的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积极地完成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为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日至十二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总结了全国工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勤劳节俭，为实现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第 134 页。

- 74 “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145、244、364页。
- 75 见列宁《大家都去同邓尼金作斗争》。新的译文是:“借口集体管理而无人负责,是最危险的祸害”,“应不顾一切尽快根除这一祸害。”(《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41页)。——第151页。
- 76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确定彼此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继续为开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双方确认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同年十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副总理在日本东京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条约正式生效。——第155、247页。
- 77 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这一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并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会后,在全国很快形成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第156、249、277、296、314、316、346、380页。
- 78 定息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私股股额付给资本家固定的股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定息从一九五六年起支付,后来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157、186页。
- 79 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第157页。

- 80 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后发到各省、市、自治区讨论和试行。第一个文件在一九七九年九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后公布实行。第二个文件由于考虑到人民公社制度可能需要改变,没有提交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和公布。——第160、246页。
- 81 对越南自卫还击战是一九七九年二、三月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侵略者进行的自卫还击、保卫边疆的作战。——第160、247、284页。
- 82 全国解放初期和六十年代初期两次调整指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和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五年的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全国解放初期的调整,是为了恢复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破坏了的国民经济。一九五一年上半年,通过统一全国财政收支、物资调度和现金管理,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领导,使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得到稳定。从一九五一年六月起,开始调整私营工商业。通过国家计划领导,加工订货,发放贷款,调整税收、工资、价格等措施,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六十年代初期的调整,是在“大跃进”以后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经过大力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压缩重工业生产、增加日用工业品生产、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等措施,初步调整了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和有关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力地推动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第161页。
- 83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162、198、293、320、354、381、385、414页。

- 84 李先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九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162、225、247、280、320页。
- 85 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4页）。——第170页。
- 86 见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2页）。——第178页。
- 87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改为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它修正了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关于设立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的有关条文。——第189页。
- 88 指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190页。
- 89 方毅，一九一六年生，福建厦门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第196页。
- 90 关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问题，邓小平于一九八九年一月二日在民主党派成员所提建议上批示：“可组织一个专门小组（成员要有民主党派的），专门拟定民主党派参政和履行监督职责的方案，并在一年内完成，明年开始实行。”根据邓小平的批示，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于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下发。——第205页。
- 91 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第211页。
- 92 见毛泽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2页）。——第214页。

- 93 “西单墙”指当时北京西单街头人们贴大字报的地方。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它来破坏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并进行违法活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六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宣布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第 217、233、252、279 页。
- 94 指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七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切实解决上访问题》和同年十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对待上访问题》。——第 228 页。
- 95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后,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一九六一年冬,中共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随后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但是,农业减产、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通货膨胀以及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等困难,在一九六二年初仍然很严重。同年二月,中共中央同意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对当时财政经济情况的分析和克服困难的意见,决定全面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大幅度调整,采取果断措施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大量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贯彻落实这些措施需要进行艰巨的思想、组织工作,这在当时也是一种很大的困难。五月二十一日、六月五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向职工和农民进行宣传教育的宣传要点,要求各级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宣讲,动员群众克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经过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到一九六二年底,我国国民经济史上的这个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第 229 页。
- 96 胡耀邦(一九一五——一九八九),湖南浏阳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八二年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第 239、303、383、389 页。
- 97 阿富汗事件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下旬开始的苏联军队对阿富汗的大规模入侵。——第 240 页。
- 98 伊朗问题指一九七九年十月美国同意前伊朗国王巴列维去美,伊朗学生于同年十一月扣押美国驻伊朗使馆人员作人质,要求美国将巴列维送回伊朗受审和归还伊朗在美资产而引起的伊美关系危机。——第 240 页。

- 99 越南问题指七十年代末期越南当局的反华、排华和对民主柬埔寨的大规模军事侵略。——第240页。
- 100 中东问题指以色列在中东地区推行侵略扩张政策所引起的中东复杂的矛盾，以及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这个战略要地的角逐。——第240页。
- 101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指这一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243、277、294、380、390页。
- 10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244、414页。
- 103 “三不主义”指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参见本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第144页）。——第244页。
- 104 “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一句，本书第一版为“在计划经济指导下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现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二月出版的《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单行本排印，恢复作者当时的提法。——第247页。
- 105 党的四大即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指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初步总结了国共合作一年来的

经验教训,通过了关于民族革命运动、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决议案,为群众斗争的新高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第 267 页。

- 106 九大即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十大即一九七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第 269、304、414 页。
- 107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〇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 278、293 页。
- 108 徐向前(一九〇一——一九九〇),山西五台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第 289、320 页。
- 109 三次“左”倾路线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 292 页。
- 110 指一九五九年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的斗争。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17)。——第 293、330 页。
- 111 指“文化大革命”中对刘少奇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展开的斗争。参

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20)。——第293页。

- 112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293、330页。
- 113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担负中共中央领导工作期间,于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293页。
- 114 罗章龙,一八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第293页。
- 115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93、330页。

- 116 高岗（一九 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中央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积极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一九五四年被揭露。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 293 页。
- 117 饶漱石（一九 三——一九七五），江西临川人。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行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三年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与高岗一起，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他的党籍。——第 293 页。
- 118 三大改造指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的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294 页。
- 119 两次郑州会议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纠正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觉察到的一些错误。毛泽东在会上批评了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废除商品生产等错误主张。第二次郑州会议的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规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人民公社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队（这里的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为基础的体制；在公社内部承认队与队、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行按劳分配、等价交换的原则等。会议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第 295、380 页。
- 120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至八月一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这两次会议接连在庐山召开，通称庐山会议。——第 295 页。
- 121 农业十二条指一九六 一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共十二条。指示信指出，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严重地破坏农业生产力，必须坚决反对，彻底纠正。指示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里的队是指当时的生产队，一九六一年起改称生产大队，原来的生产小队改称生产队；一九六二年二月十

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和认真执行劳逸结合等。指示信对纠正“共产风”,扭转农村局势,起了积极作用。——第 295 页。

- 122 人民公社六十条指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文共六十条。条例草案针对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队与队、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纠正社、队规模偏大,公社对下级管得太多太死,民主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不健全等方面,作了比较系统的规定。同年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又对这个草案作了修改,制定了供讨论和试行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进一步规定取消分配上的供给制部分,停办公共食堂。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人民公社六十条的贯彻执行,对恢复农村经济起了重要的作用。——第 295 页。
- 123 七千人大会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党委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分析了几年来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指出全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做好调整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着重指出要健全民主集中制,在党内、党外充分发扬民主;要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对前几年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毛泽东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第 295 页。
- 124 北戴河会议指一九六二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为八届十中全会的召开做了准备。会议期间,毛泽东着重讲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一再强调我们国家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企图复辟,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作了扩大化和绝对化的论述。——第 295 页。
- 125 “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五月先后在部分农村和少数城市工矿企业和学校等单位开展的一次清政治、清经济、清组

织、清思想的运动。这次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共二十三条。这个文件虽然对“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又错误地提出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 295 页。

- 126 两个文艺批示指毛泽东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关于艺术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给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彭真、刘仁的批示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的批示。批示说：在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各种艺术形式中问题不少；文艺界各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这两个批示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第 296 页。
- 127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有计划、有预谋地编造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写进九月十六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中，并广为宣扬。他们的按既定方针办，就是按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方针办。——第 298 页。
- 128 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 300 页。

- 129 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一九二七年四月初该组织被革命群众冲垮,存在时间不长。一九三年上半年,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在肃反工作中首先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一九三一年后,这一斗争扩展到鄂豫皖、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反AB团的斗争混淆了敌我矛盾,使肃反扩大化,造成了严重后果。——第301页。
- 130 这是毛泽东一九四三年十月九日针对当时审查干部工作中的错误在一份材料上的批语中提出的一项重要政策。——第301页。
- 131 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一九七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为贺龙恢复名誉。一九八二年十月,中共中央给予彻底平反。——第301页。
- 132 胡乔木(一九一二——一九九二),江苏盐城人。一九八一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一年,他在邓小平主持下负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302、413页。
- 133 一九六七年二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和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同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借机掀起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的浪潮,更大规模地打击迫害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干部。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说过,再不要讲“二月逆流”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第303页。
- 134 黄克诚(一九二二——一九八六),湖南永兴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第303、379页。
- 135 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顾

问。——第 303 页。

- 136 参见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939 页）。——第 304 页。
- 137 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当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举行会谈。——第 305、375 页。
- 138 尼克松（一九一三——一九九四），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 305、375 页。
- 139 彭指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北京市市长；罗指罗瑞卿，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陆指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杨指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中共中央分别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一九八一年五月、一九七九年六月、一九八一年十月专门发出文件给他们彻底平反。——第 307 页。
- 140 彭指彭德怀，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黄指黄克诚，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张指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外交部副部长；周指周小舟，当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一九五九年八月，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他们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宣布：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第 307 页。
- 141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九次会议，一致通过《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向全党通报了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所犯的“左”的错误和其他错误，并决定向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选

- 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309页。
- 142 赵紫阳，一九一九年生，河南滑县人。一九八一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一年六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320、350、383页。
- 143 王震（一九一八——一九九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 144 王任重（一九一七——一九九二），河北景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 145 陈永贵（一九一四——一九八六），山西昔阳人。曾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320页。
- 146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一四——一九七四），安徽六安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他是一九二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抗日战争初期，又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他长期拒绝党的批评和帮助。一九五六年后一直滞留苏联。一九七四年去世。参见本书注57。——第330页。
- 147 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过实际可能的急躁冒进现象。根据这个精神，各地着重纠正这方面的问题。到了一九五七年秋天举行的扩大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讲话开始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出批评。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和三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对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提出严厉的批评。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使党内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第330页。
- 148 这一段，在本书出第一版时未收入，一九八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此文时，按照原记录补全。现根据《人民日报》重新发表的版本排印。——第340页。
- 149 指赫鲁晓夫在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全盘否定和恶意诋毁斯大

林。——第 347 页。

- 150 慈禧即叶赫那拉氏（一八三五——一九〇八），清咸丰皇帝的妃子，其子载淳（同治皇帝）即位后，被尊为慈禧太后。她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清末顽固势力的总代表，对内实行残酷统治，对外妥协投降，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第 352 页。
- 151 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和一九八〇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的批示》，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第 363 页。
- 152 里根，一九一一年生，美国共和党人。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九年任美国总统。——第 375 页。
- 153 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第 375 页。
- 154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第 375 页。
- 155 布什，一九二四年生，美国共和党人。一九七四年至一九七五年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任美国总统。——第 375 页。

- 156 中央四位常委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第 379 页。
- 151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第 381 页。
- 158 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号召和军队的特点，在《关于加强部队青年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口号，即“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讲军容、讲礼貌、讲纪律，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一九八三年一月，又根据中共十二大文件中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有关提法，将“四有、三讲、两不怕”的内容调整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讲军容、讲礼貌、讲卫生，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第 382、395、408 页。
- 159 刘澜波（一九四——一九八二），辽宁凤城人。当时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第 384 页。
- 160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一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作的《关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的报告》中，提出了军队干部年轻化的问题。他指出，干部年轻化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带有方针性质的问题。干部中经常要有新的血液，要有新的接班人，要让比较年轻一点的、政治思想好的共产主义者来接班。——第 385 页。
- 161 这里指陈云在《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一九八一年五月八日）和《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一九八一年七月二日）两文中提出的关于选拔中青年干部的几条意见，其主要精神是：从现在起，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他们的年龄应该在五十岁左右、四十岁左右，而且多数应该是四十岁左右的人、四十岁以内的人；他们必须德才兼备，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的分子一个也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第 400 页。
- 162 “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底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中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 402

页。

- 163 “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 402 页。
- 164 肥乡发生的事件指一九八二年一月河北省肥乡县一些帮派思想严重和怀有个人野心的人纠合在一起，利用县党代会选举县委领导班子的时机，进行秘密串连活动，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套手法，把坚持中央路线的县委书记搞下台，另选一个帮派班子担任领导的事件。后来中共河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这个事件作了严肃处理。——第 404 页。
- 165 赫鲁晓夫（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一九五三年九月起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九五八年三月起同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一九六四年十月被解除领导职务。——第 406 页。
- 166 杨尚昆，一九 七年生，四川潼南人。当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第 408 页。
- 167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第 408 页。
- 168 一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由西北野战军整编而成，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 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第一野战军所属部队划归西北军区建制。——第 410 页。
- 169 三野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华东野战军整编而成，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九五 年四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划归华东军区建制。——第 410 页。

- 170 陈丕显,一九一六年生,福建上杭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第 411 页。
- 171 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向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和《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第 413 页。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4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8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一心一意搞建设	9—11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2—15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16—18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9—20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植树造林	21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23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24—26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27—28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路子走对了,政策不会变	29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	
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	30—31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	32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33—34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为景山学校题词	35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36—48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49—50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51—52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53—55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	56—57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58—61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62—66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	67—68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 的讲话	69—71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72—76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77—80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81—82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83—93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94—95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和平共处原则具有强大生命力	96—97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98—100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101—103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104—106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107—109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才能团结起来	110—112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13—114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	115—118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119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	
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120—122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123—125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26—129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130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抓住时机,推进改革	131—132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133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134—135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136—140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141—147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	148—151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152—154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	
拿事实来说话	155—156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平政策.....	157—158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	
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159—160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161—162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163—164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165—166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167—175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176—180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181—182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	183—184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悼伯承	185—189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4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8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一心一意搞建设	9—11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2—15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16—18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9—20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植树造林	21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23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24—26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目 录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1—4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5—8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一心一意搞建设	9—11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12—15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16—18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增进中印友谊,加强南南合作.....	19—20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植树造林	21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2—23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视察江苏等地回北京后的谈话	24—26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266—267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	268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	
形势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	269—270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271—273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274—276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中央要有权威	277—278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279—280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281—283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284—285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不允许乱	286—287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288—290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291—295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296—301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302—308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309—314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315—321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322—323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324—327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社会主义的中国谁也动摇不了	328—329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330—333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334—335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336—343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坚持社会主义，防止和平演变	344—346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347—349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350—351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352
（一九九 年二月十七日）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353—356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	
振兴中华民族	357—358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359—361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	
共同努力,实现祖国统一	362
(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五日)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363—365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366—367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	
总结经验,使用人才	368—369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370—383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注释.....	385—418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 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

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审议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确定党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纲领；(二)审议和通过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三)按照新的党章的规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完成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党的建设就能够更加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党的最高领导层就能够实现新老合作和交替，成为更加朝气蓬勃的战斗指挥部。

回顾党的历史，这次代表大会将是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¹⁾以来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

一九四五年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党以后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那次大会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二十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

想,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全党的空前团结。那次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一九五六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2],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八大以后,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成就,同时也遭到了严重挫折。

现在这次代表大会和八大时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正如七大以前,民主革命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教育全党掌握了我国民主革命的规律一样,八大以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多年的曲折发展也深刻地教育了全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中恢复了正确的政策,并且研究新情况、新经验,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政策。和八大的时候比较,现在我们党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深刻得多了,经验丰富得多了,贯彻执行我们的正确方针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大大加强了。我们有充分的根据相信,这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正确的纲领,一定能够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使我们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使我们的国家和各民族兴旺发达。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

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

八十年代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上的重要年代。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领域和其他领域内破坏社会主义的犯罪活动;在认真学习新党章的基础上,整顿党的作风和组织。这是我们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最重要的保证。

我们党现在已经是一个拥有三千九百万党员、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但在全国人民中,共产党员始终只占少数。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辛勤劳动的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保卫祖国安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钢铁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我国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党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党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的建设中,我们党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长期合作。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党的事业得到了全世界进步人士和友好国家的支持和援助。在这里,我代表我们党,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三日)

中央顾问委员会是个新东西,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实际情况建立的,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组织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

^{*}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十二届一中全会选举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他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当选为主任。

总之,中央顾问委员会怎么做工作,怎么起作用,是个新问题。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会处理得很好。

一心一意搞建设^{*}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日)

我们刚刚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5]。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

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翻两番^[6]。二十年是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本世纪末。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这是关键。没有人才不行,没有知识不行,“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十二大对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做了比较审慎的处理。粉碎“四人帮”后,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7]。我说过,如果毛主席在世,他也不会承认“两个凡是”,因为那不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按照“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更不用谈别的问题了。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

* 这是邓小平同志陪同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的一部分。

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8]。当时有一些人抵制这个讨论。一九七八年六月我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了一篇文章。以后我从你们那里访问回来,在东北三省沿途又讲这个思想路线问题。经过差不多一年的讨论,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9],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有解决好思想路线问题,才能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还有农村政策、对外关系政策,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政策。

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到了第二阶段,即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经济高度发展了,物资极大丰富了,才能做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

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从以后的实践看,这条路线是对的,全国面貌大不相同了。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我们对香港问题^[10]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一九九七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

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一九九七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11]。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一九九七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八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12]!我们等待了三十二年,再加上十五年,就是四十八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十五年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

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所以,现在,当然不是今天,但也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这个决策。我们可以再等一、二年宣布,但肯定不能拖延更长的时间了。

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公论面前会得到好评。所以英国政府应该赞成中国的这个决策。中英两国应该合作,共同来处理香港问题。

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香港现行的政治、经济制度,甚至大部分法律都可以保留,当然,有些要加以改革。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我们要同香港各界人士广泛交换意见,制定我们在十五年中的方针政策以及十五年后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应该不仅是香港人民可以接受的,而且在香港的其他投资者首先是英国也能够接受,因为对他们也有好处。我们希望中英两国政府就此进行友好的磋商,我们将非常高兴地听取英国政府对我们提出的建议。这些都需要时间。为什么还要等一、二年才正式宣布收回香港呢?就是希望在这段时间里同各方面进行磋商。

现在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就会影响中国的四化建设。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

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末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所以,我们在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的同时,还要宣布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所实行的制度和政策。

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一九九七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希望从夫人这次访问开始,两国政府官员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很好的磋商,讨论如何避免这种灾难。我相信我们会制定出收回香港后应该实行的、能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政策。我不担心这一点。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两国政府,而且包括政府要约束厂商及各行各业,不要做妨碍香港繁荣的事。不仅在这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不要发生大的波动,一九九七年中国接管以后还要管理得更好。

我们建议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

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一九九七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十五年怎样过渡得好以及十五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

到本世纪末二十年的奋斗目标定了 ,这就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 ,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靠不靠得住 ?党的十二大说靠得住 ,我也相信是靠得住的 ,但究竟靠不靠得住 ,还要看今后的工作。

“六五”计划已经过去了两年 ,今后三年要有很好的安排。现在要聚精会神把长远规划搞好 ,长远规划的关键 ,是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

准备有个抢时间的问题 ,不能不认真对待。哪些项目早上 ,哪些晚上 ,要有个安排 ,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 ,早一年早得利一年 ,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真想搞建设 ,就要搞点骨干项目 ,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 ,也要下决心搞。资金、材料不够 ,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 ,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小项目上得再多 ,也顶不了事。

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 ,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做到全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整理时吸收了七月二十六日同这些同志谈话的部分内容。

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

你们提出一批重大的勘察设计项目,准备提前做好建设的前期工作,这件事要认真落实。要列出进度表,什么时间勘探清楚,什么时间拿出设计,由专人负责包干。煤、电、油这些能源项目,还有交通项目,前期工作要抓紧,晚了不行。能源不够,不仅是“六五”期间的问题,也是今后相当长时间的问题。火电上不去,要在水电上打主意。水电大项目上去了,能顶事。

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作用是无穷无尽的。

你们还提出把科学技术工作和人才培养使用工作做好,我看最难的是这一条。没有一套办法,怎么能把几百万知识分子骨干用起来?“文化大革命”前大专学校毕业的和自学成才达到同等水平的知识分子,总有几百万吧。用好这些人,是很顶事的。我们不是没有人才,问题是能不能很好地把他们组织和使用起来,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发挥他们的专长。现在科技人员一方面很缺,另一方面又有很大的窝工浪费,用非所学、用非所长的现象很严重。这样的管理形式不行。怎样打破军民界限、部门地方界限,合理使用,把全国的科技人员使用起来,并且使用得当,是个很大的问题。过去聂荣臻^[13]同志管过,那时管得好,人员可以按需要调动,集中使用。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第一位的就是科技队伍的管理使用问题。人才,只有大胆使用,才能培养出来。对那些真正有本事的人,要放

手提拔 ,在工资级别上破格提高。招聘也是个办法。我们要开一条路出来 ,让有才能的人很快成长 ,不要老是把人才卡住。人才不断涌出 ,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这条路还没有开出来 ,各行各业 ,包括企业 ,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年规划能否实现 ,关键就在这里。

增进中印友谊 ,加强南南合作^{*}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 ,但在世界上都不是无足轻重的国家。中印两国人口最多 ,加起来有十七亿 ,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以上。我们两国又是近邻 ,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在五十年代中期我们合作得很好。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为世界所公认。

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 ,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 ,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 ,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五十年代的友谊。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 ,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一九七九年我见到你们的前外长时就讲过“一揽子解决” ,你们让一点 ,我们让一点 ,就解决了嘛。因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 ,你们有人民感情的问题 ,我们也有人民感情的问题。只有采取“一揽子解决”的办法 ,才有可能各自说服自己的人民。我们和好多国家解决了边界问题 ,解决的办法无非是双方相互让步。我相信 ,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 ,可以先放一放 ,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可以做很多事情,发展往来,增进了解和友谊,双方合作仍然有广阔的前景。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

我们很高兴第三世界的国家提出南南合作^[15]问题。当然,南北问题^[16]也应解决。南北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负债那么多,日子怎么过啊!如果发达国家不拿出钱来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发达国家在第三世界的市场也就没有了。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吝啬。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所以,第三世界仅寄希望于南北问题的解决是不够的,南南之间还要进行合作。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这种合作总能解决一些问题。这些年来第三世界有一些发展,各国都有一些好的东西,可以相互交流和合作。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植 树 造 林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二月)

一

植树造林 ,绿化祖国 ,造福后代。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为全军植树造林总结
经验表彰先进大会的题词)

二

这件事 ,要坚持二十年 ,一年比一年好 ,一年比一年扎实。
为了保证实效 ,应有切实可行的检查和奖惩制度。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对林业部关于
开展全民义务植树运动情况报告的批语)

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二日)

根据最近的统计,一九八二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八左右,大大地超过了原定的增长百分之四的计划。前两年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一九八二年是头一次出现。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年度计划定低了,而实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会产生什么影响?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现在不是说要改变原定的“六五”计划,长期计划留的余地应该大一些,年度计划可以打得积极一点,当然也要留有余地,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量的增长。总结历史经验,计划定得过高,冒了,教训是很深刻的,这方面的问題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今后还要注意。现在我们要注意另外一个方面的问题。总之,制定计划遵循的原则,应该是积极的、留有余地的、经过努力才能达到的。

农业要有全面规划,首先要增产粮食。二〇〇〇年要生产多少粮食,人均粮食达到多少斤才算基本过关,这要好好计算。二〇〇〇年总要做到粮食基本过关,这是一项重要的战略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人同志谈话的要点。

部署。中国每人平均每年总要吃四五百斤粮食,还要有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做到粮食基本过关不容易,要从各方面努力,在规划中要确定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这个目标。比如,从增加肥料上,从改良种子上,从搞好农田基本建设上,从防治病虫害上,从改进管理上,以及其他手段上,能够做些什么,增产多少,都要有计算。农业翻番不能只靠粮食,主要靠多种经营。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农业科学家提出了很多好意见。要大力加强农业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切实组织农业科学重点项目的攻关。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

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总之,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

视察江苏等地 回北京后的谈话^{*}

(一九八三年三月二日)

这次 ,我经江苏到浙江 ,再从浙江到上海 ,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 ,人们喜气洋洋 ,新房子盖得很多 ,市场物资丰富 ,干部信心很足。看来 ,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 ,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 ,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 ,做到心中有数。落后的地区 ,如宁夏、青海、甘肃如何搞法 ,也要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要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解决各自突出的问题 ,帮他们创造条件 ,使他们的具体规划能够落到实处。

现在 ,苏州市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接近八百美元。我问江苏的同志 ,达到这样的水平 ,社会上是一个什么面貌 ?发展前景是什么样子 ?他们说 ,在这样的水平上 ,下面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

第一 ,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 ,基本生活有了保障 ;

第二 ,住房问题解决了 ,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 ,因为土地不足 ,向空中发展 ,小城镇和农村盖二三层楼房的已经不少 ;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

第四,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

第五,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

第六,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

江苏从一九七七年到去年六年时间,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照这样下去,再过六年,到一九八八年可以再翻一番。我问江苏的同志,你们的路子是怎么走的?他们说,主要是两条。一条是依靠了上海的技术力量,还有一条是发展了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发展了中小企业。江苏吸收了不少上海的退休老工人。这些老工人有本事,请来工作所费不多,只是给点工资,解决点房子,就很乐意干,在生产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江苏多年来是比较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的,对知识分子使用得比较得当。现在江苏几个城市有些技术不低于上海。

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大战打不起来,不要怕,不存在什么冒险的问题。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

搞经济协作区,这个路子是很对的。我主张不只是搞上海和山西两个经济协作区,也不要老是试点。老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试点,几年解决不了几个问题,这就太慢了。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主张第二野战军⁽¹⁷⁾和第三野战军⁽¹⁸⁾联合起来作战。他说,两个野战军联合在一起,就不是增加一倍力量,而是增加好几倍的力量。经济协作也是这个道理。经济协作有许多思想问题要统一,但现在要开步走。

总之,一是要心中有数,现在不是完全有数。一是现在议论得多,行动不快。

智力开发是很重要的。我说的是包括职工教育在内的智力开发,要更好地注意这个问题。大专院校要发展,近期不说发展一倍,也可发展半倍。现在我们是这个能力的。重点院校增加一倍学生没有多少问题,师资不缺,主要是房子不够。再拿出一点钱建校舍和宿舍,我看也可以拿得出来。这方面用多少钱,要算个帐。

我们现在一方面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

建设社会主义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别国的人对情况不熟悉,指手划脚,是要犯错误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在斯大林时期,中国党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听他的话,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我不是说不应该吸取别国的经验教训。一个党犯错误是难免的,就是犯了错误,也要由自己去总结,自己去解决问题,这样才靠得住。

我们现在执行的这条路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⁹⁾制定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的,也是经过党的十二大^[5]肯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四年多的实践证明,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当然,还需要继续通过实践来加以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

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路子走对了 ,政策不会变^{*}

(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八日)

我们搞的现代化 ,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 ,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 ,以自力更生为主。

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 ,人民高兴 ,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 ,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 ,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 ,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 ,会回到哪里 ? 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

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 ,农业有农业的特点 ,具体经验不能搬用 ,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 ,这点是肯定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参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大陆和台湾 和平统一的设想^{*}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

问题的核心是祖国统一。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

我们不赞成台湾“完全自治”的提法。自治不能没有限度,既有限度就不能“完全”。“完全自治”就是“两个中国”,而不是一个中国。制度可以不同,但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承认台湾地方政府在对内政策上可以搞自己的一套。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虽是地方政府,但同其他省、市以至自治区的地方政府不同,可以有其他省、市、自治区所没有而为自己所独有的某些权力,条件是不能损害统一的国家的利益。

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谈话的要点。

和平统一不是大陆把台湾吃掉,当然也不能是台湾把大陆吃掉。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不现实。

要实现统一,就要有个适当方式,所以我们建议举行两党平等会谈,实行第三次合作,而不提中央与地方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后,可以正式宣布。但万万不可让外国插手,那样只能意味着中国还未独立,后患无穷。

我们希望台湾方面仔细研究一下一九八一年九月叶剑英提出的九条方针政策^[19]的内容和一九八三年六月邓颖超在政协六届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20],消除误解。

你们今年三月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做了一件很好的事。

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如果国共两党能共同完成这件事,蒋氏父子^[21]他们的历史都会写得好一些。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要多接触,增进了解。我们随时可以派人去台湾,可以只看不谈。也欢迎他们派人来,保证安全、保密。我们讲话算数,不搞小动作。

我们已经实现了安定团结。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制定的,有关政策是逐渐完备起来的,我们将坚持不变。

中美关系最近略有好转,但是,美国的当权人士从未放弃搞“两个中国”或“一个半中国”。美国把它的制度吹得那么好,可是总统竞选时一个说法,刚上任一个说法,中期选举一个说法,临近下一届大选时又是一个说法。美国还说我们的政策不稳定,同美国比起来,我们的政策稳定得多。

利用外国智力和 扩大对外开放^{*}

(一九八三年七月八日)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

要扩大对外开放,现在开放得不够。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些搞上去。同东欧国家合作,也有文章可做,他们有一些技术比我们好,我们的一些东西他们也需要。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九日)

刑事案件、恶性案件大幅度增加,这种情况很不得人心。几年了,这股风不但没有压下去,反而发展了。原因在哪里?主要是下不了手,对犯罪分子打击不严、不快,判得很轻。对经济犯罪活动是这样,对抢劫、杀人等犯罪活动也是这样。

为什么不可以组织一次、二次、三次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战役?每个大、中城市,都要在三年内组织几次战役。比如说北京市,流氓犯罪集团到底有多少,有哪些人,是不难搞清楚的。像彭真^[22]同志讲的,找老民警当顾问,调查调查,情况就清楚了,就可以组织战役了。一次战役打击他一大批,就这么干下去。我们说过不搞运动,但集中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还必须发动群众。动员全市人民参加,这本身对人民是教育,同时能挽救很多人,挽救很多青年。发动群众,声势大,有的罪犯会闻风跑掉,那也不要紧,还有第二次战役可以追回来。

最近有的城市抓了一批犯罪分子,形势有好转。当然,这还只是一时的现象。那些犯罪分子在看风向,看你下一步怎么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公安部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办。如果还是软弱无力,处理不严,坏人的气势还会长上来。

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包括杀人犯、抢劫犯、流氓犯罪团伙分子、教唆犯、在劳改劳教中继续传授犯罪技术的惯犯,以及人贩子、老鸨儿等,必须坚决逮捕、判刑,组织劳动改造,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必须依法杀一批,有些要长期关起来。还要不断地打击,冒出一批抓一批。不然的话,犯罪的人无所畏惧,十年二十年也解决不了问题。一九七五年处理铁路问题时,对帮派分子,我说现在不抓人,把他们调开。“四人帮”说不行。我说凡是帮派头子,有一个调开一个,再出一个再调开,一天调一个,一年调三百六十五个。这个话传下去以后,铁路上的秩序马上就好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采取这样的办法不行。

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是长期的斗争,需要从各方面做工作。现在是非常状态,必须依法从重从快集中打击,严才能治住。搞得不疼不痒,不得人心。我们说加强人民民主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要讲人道主义,我们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安全,这就是最大的人道主义。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从北京开始,然后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坚持这么干,情况一定能好转。

为景山学校题词

(一九八三年十月一日)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

党在组织战线和 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

(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二日)

这次中央全会的主要议题是整党。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23],大家讨论通过了。这是一个好的文件,我完全同意。会后还要讨论一下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我想就整党不能走过场和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这两个问题说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整党不能走过场。

我们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制定了各方面的适合情况的正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各项工作的新局面正在逐步打开。广大群众拥护我们党的路线和领导。在实现伟大历史转变的过程中,经过多次重大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党的主流是好的,是有战斗力的,是有能力、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但是,我们党现在的状况还远不是都令人满意。党内还存在着不少没有来得及清理和解决的严重问题。这里有十年内乱遗留下来的消极东西,也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起来的消极东西。决定列举了“三种人”^[24],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以权谋私、严重损害党和群众的关系的人,长期在政治上不同中央保持一致、或者表面上保持一致实际上另搞一套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党内的危险因素,腐败因素,是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的严重表现。

其中最危险的是“三种人”。这些人已经清查和处理了一批,有些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已经有所改正。但是确有相当一批立场没有改变而在党内隐藏了下来。说他们最危险,是因为:一、他们坚持原来的帮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颠覆性的政治主张;二、他们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时会伪装自己,骗取信任,时机到来,又会煽风点火,制造新的动乱;三、他们转移、散布和隐蔽在全国许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联系还没有完全消灭;四、他们比较年轻,也比较有文化。他们当中有些人早就扬言十年、二十年后见。总之,他们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势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党中解决,就会留下祸根,成为定时炸弹。

当然,其他几类人的问题,不解决也很危险,也是祸根。

对于这些情况,我们好多老共产党员很感忧虑,广大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也感到担心和不满。十二大决定进行全面整党,全党上下、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拥护,对整党寄予极大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党下定决心,用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进行这次整党,切实解决上述那些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绝对不能走过场,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失望。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花了很大气力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一些政治运动和思想斗争中的“左”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类“左”的错误决不允许重犯。但是,不少同志片面

地总结历史教训,认为一讲思想斗争和严肃处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这就走到软弱涣散的另一个极端。在对错误倾向、坏人坏事作思想斗争和组织处理的问题上,这些年来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依法实行从重从快的集中打击,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非常得人心。群众只担心将来处理太宽,放虎归山,罪犯又来报仇。群众还认为早就应当从严打击,批评我们搞晚了。这些反映和批评值得高度重视。前两年我们曾指出各级领导上存在着软弱涣散的状况,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下不了手也是一种表现。由此应当得出教训,必须坚决克服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在整党中,对于上述的“三种人”和其他各种错误严重、危害严重的人,必须严肃地作出组织处理。该开除党籍的就开除党籍,该给撤职或其他处分的就给这些处分,犯罪的还得法办。对于情节较轻的,要进行严肃的批评,并要他们作出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检讨,作出改正错误的切实保证。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整党中需要作组织处理的,在全党,只是极少数。对大多数党员来说,是通过思想教育,增强党性。要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精神状态上有显著的进步,党员为人民服务而不谋私利的觉悟有显著的提高,党和群众的关系有显著的改善。要通过整党,使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经常开展。党内不论什么人,不论职务高低,都要能接受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要通过整党,加强党的建设,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每个党员、每个

党员干部、每个党组织,都要对照党章进行检查,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作出达到和坚持党章规定的合格标准的努力计划,并保证其实现。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更应该严格遵守党章、遵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5],起模范作用。这是整党不走过场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总之,我们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全党都下这个决心,事情就一定能办好。

第二个问题: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思想战线范围很广,我现在主要说理论和文艺战线。几年来这两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8],关于党的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的科学总结^[26],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加强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围绕这些,理论界做了许多研究、论证和宣传工作,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理论和学术的各个领域,许多同志辛勤劳动,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文艺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在艺术的表现力上,都有显著的进步。小说、报告文学、电影、电视剧、话剧、戏曲、诗歌、音乐、美术、舞蹈、曲艺等各个方面,都出了一批优秀作品。成绩是主要的,要充分肯定,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理论界文艺界还有不少的问题,还存在相当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存在精神污染的现象。今天想着重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思想战线上的战士,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在当前这个转变时期,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他们在思想教育方面的责任尤其重大。十年内乱的消极后果和历史遗留的种种因素,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复杂问题,在人们的思想上引起各种反映,包括一部分模糊和错误的认识。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大多数人正是在不同程度上这样做的。但是,一些人却同时代和人民对他们的要求背道而驰,用他们的不健康思想、不健康作品、不健康表演,来污染人们的灵魂。精神污染的实质是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和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不信任情绪。前年党中央召开了思想战线问题的座谈会,批评了某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和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现象,那个会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领导上的软弱涣散状态仍然存在;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有的有所克服,有的没有克服,有的发展得更严重了。

有相当一部分理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缺乏兴趣,不愿意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和研究,表示要同现实保持距离,免得犯错误,或者认为没有学术价值。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

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常常标榜他们如何讲人道主义,攻击社会主义是反人道主义。我没有想到,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也抽象地宣传起人道主义、人的价值等等来了。他们不了解,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还不高,这也不能靠谈论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来解决,主要地只能靠积极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解决。离开了这些具体情况和具体任务而谈人,这就不是谈现实的人而是谈抽象的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就会把青年引入歧途。至于“异化”,马克思在发现剩余价值规律以后,曾经继续用这个说法来描写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雇佣劳动,意思是说工人的这种劳动是异己的,反对工人自己的,结果只是使资本家发财,使自己受穷。现在有些同志却超出资本主义的范围,甚至也不只是针对资本主义劳动异化的残余及其后果,而是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都存在异化,认为社会主义在自己的发展中,由于社会主体自身的活动,不断产生异己的力量。他们还用克服这种所谓异化的观点来解释改革。这样讲,不但不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 and 解决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

种种问题,也不可能帮助人们正确地认识和进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为技术进步、社会进步而需要不断进行的改革。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批评、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地没有希望。既然如此,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呢!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但是,上面这样的观点,不是向前发展,而是向后倒退,倒退到马克思主义以前去了。人道主义和异化论,是目前思想界比较突出的问题。其他类似的问题还不少。比如宣传抽象民主,直至主张反革命言论也应当有发表的自由;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等等。有些同志至今对党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有一个时期,有少数同志认为,我们这个社会是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该不该或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以至我们党是不是无产阶级政党,都还是问题。有些同志又认为,既然现在是社会主义阶段,“一切向钱看”就是必然的,正确的。这些错误的观点大都写成文章公然在报刊上发表,有些一直没有得到澄清。可见理论界的一部分同志思想混乱到什么程度。

文艺方面,近年来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新生活的文学作品多了一些,这是值得欢迎的。但是,能够振奋人民和青年的革命精神,推动他们勇敢献身于祖国各个领域的建设和斗争,具有强大鼓舞力量的作品,除了报告文学方面比较多以外,其他方面也有,可是不能说多。一些人对党中央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口号表示淡漠,对文艺的社会主义方

向表示淡漠,对党和人民的革命历史和他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英雄业绩,缺少加以表现和歌颂的热忱,对社会主义事业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少站在党的积极的革命的立场上提高群众的认识,激发他们的热情,坚定他们的信心。相反,他们却热心于写阴暗的、灰色的、以至胡编乱造、歪曲革命的历史和现实的东西。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认为所谓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应当成为创作的主题,个别的作品还宣传色情。这类作品虽然也不多,但是它们在一部分青年中产生的影响却不容忽视。许多文艺工作者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不深入群众建设新生活的斗争,有的党员也不积极参加党的生活,这是产生上述各种消极现象的重要原因。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有些解放军的文艺战士,也被卷到里边去了。对于那些只顾迎合一部分观众的低级趣味,而不惜败坏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光荣称号的人,广大群众表示愤慨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经济方面我们采取两手政策,既要

开放,又不能盲目地无计划无选择地引进,更不能不对资本主义的腐蚀性影响进行坚决的抵制和斗争。为什么在文化范围的交流,反倒可以让资本主义文化中对我们有害的东西畅行无阻呢?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对它们的思想内容和表现方法进行分析、鉴别和批判。西方如今仍然有不少正直进步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各种严肃的有价值的著作和创作,他们的作品我们当然要着重介绍。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

必须指出,无论在理论界或文艺界,主流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搞精神污染的人只是少数。问题是对这少数人的错误言行缺乏有力的批评和必要的制止措施。精神污染的危害很大,足以祸国误民。它在人民中混淆是非界限,造成消极涣散、离心离德的情绪,腐蚀人们的灵魂和意志,助长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助长一部分人当中怀疑以至否定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这是我们立国和团结全国人民奋斗的根本。目前社会上的种种消极现象、歪风邪气、犯罪行为,以及一些人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它们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当然不能都

归咎于思想战线的混乱。但是,确实不能低估思想战线混乱造成的影响。不是都拥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一些同志应当看看他们的错误言论、有害作品、低级表演在人民、在青年中间产生了什么影响、什么后果嘛。一些正直的、友好的外国人士为此而替我们担心。当然也有人叫好。在大陆有人叫好,在台湾、香港和某些外国也有人叫好。奉劝这些同志在有人叫好的时候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人站在什么立场上叫好,为了什么目的叫好,也用实践检验一下嘛。不要以为有一点精神污染不算什么,值不得大惊小怪。有的现象可能短期内看不出多大坏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必须大力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二大,对于思想战线的指导方针是正确的、鲜明的,问题在于贯彻执行不力。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一定要重视理论界文艺界以及整个思想战线的情况、问题和工作。首先要认识目前问题的严重性,认识改变思想战线的领导软弱涣散状况的迫切必要性。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27]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如同在整党中对于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一样,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也必须采取坚

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解决思想战线混乱问题的主要方法,仍然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是进行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的,只是效果不够显著。一则批评本身的质量和分量不够,二则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的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在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此,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如果自己有错误,就要进行认真的自我批评,并且切实改正。谁要是坚持错误不肯改正,就不能担负思想工作的领导责任。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不管是什么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不允许自视特殊,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比党高明,可以自行其是。解决这些问题,是这次整党对思想战线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最重要要求。只要我们党真正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决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和自由主义态度,认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思想战线的上述种种问题都可以解决,也不难解决。

我们这样做,有人会说,党的方针是不是变了,还要不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的方针没有变,“双百”方针还是要。但是把开展批评同“双百”方针对立起来,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或曲解。“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毛泽东同志说过：“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28〕}有些人把“双百”方针理解为鸣放绝对自由，甚至只让错误的东西放，不让马克思主义争。这还叫什么百家争鸣？这就把“双百”方针这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方针了。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好文章。建议各级领导同志，特别是思想战线的同志认真学习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办事。

我们在强调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的时候，仍然要注意防止“左”的错误。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决不能重复。无论是开会发言、写文章，都要进行充分的说理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参加讨论和批评的人，首先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对有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与人为善的态度，给他们时间认真考虑，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辩，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批评或自我批评都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对于思想理论方面“左”的错误观点，仍然需要进行批评和纠正。但是，应当明确指出，当前思想战线首先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是纠正右的、软弱涣散的倾向。

总之，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的任务。不仅理论界文艺界，还有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群众文化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等

各个方面,都有类似的或其他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整个思想战线的工作都需要加强。我们要把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各级党委,首先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密切注视和深入研究思想战线的形势和问题,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改进这条战线的工作。我建议中央政治局或中央书记处就党的思想战线的工作进行专门的讨论,系统地解决有关的方针、任务、措施、步骤等等问题。我相信,只要全党上下重视这项工作,抓紧这项工作,加上全面整党的展开,这方面的现状就一定会大大改观,社会主义思想文化更加繁荣昌盛的新局面就一定会出现。

稳定世界局势的新办法^{*}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问题也是这样,一个中国,两种制度。香港与台湾还有不同,香港是自由港。世界上的许多争端用类似这样的办法解决,我认为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力冲突。如果不要战争,只能采取我上面讲的这类的方式。这样能向人民交代,局势可以稳定,并且是长期稳定,也不伤害哪一方。各位是研究国际问题的,请好好了解和研究一下我们对台湾、香港问题提出的解决方式。总要从死胡同里找个出路。

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

^{*} 摘自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的谈话。

这是随便谈谈脑子里转的问题。有好多问题不能用老办法去解决,能否找个新办法?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有些话不一定准确,可能考虑不周到,但是要把世界局势稳定下来,总要想些主意。我多次讲过,中国人不比世界上任何人更少关心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

办好经济特区， 增加对外开放城市^{*}

（一九八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最近，我专门到广东、福建，跑了三个经济特区^[29]，还到上海，看了看宝钢，有了点感性认识。今天找你们来谈谈办好经济特区和增加对外开放城市的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这次我到深圳一看，给我的印象是一片兴旺发达。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盖房子几天就是一层，一幢大楼没有多少天就盖起来了。那里的施工队伍还是内地去的，效率高的一个原因是搞了承包制，赏罚分明。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五百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作主。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他在视察期间写了一些题词。在深圳的题词是：“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在珠海的题词是：“珠海经济特区好。”在厦门的题词是：“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在宝钢的题词是：“掌握新技术，要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

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听说深圳治安比过去好了,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

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30],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只要资金可以自由出入,外商就会来投资。我看这不会失败,肯定益处很大。

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我们还要开发海南岛,如果能把海南岛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

中国发展经济从何着手?有位日本朋友提了两点建议。第一点,先把交通、通讯搞起来,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第二点,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后面这一点,我们国家情况有所不同,现在全国没有条件实行高收入高消费的政策。但如果将来沿海地区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有了条件,收入就可以高一点,消费就可以增加一点,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发展中日关系要看得远些^{*}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去年我们两国领导人在东京作出了一个具有卓识远见的决策,就是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纪,还要发展到二十二世纪、二十三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

看得远些广些,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不是只对一方有利,而是对双方、对两国、对两国人民都有利。中日关系发展到现在的水平,我们是满意的,我想我们双方都是满意的。我相信阁下也会同意,我们双方关系发展得还不足,两国的民间经济技术合作还很薄弱。我们欢迎贵国的大中小企业加强同我们的合作。我们希望日本政府对他们做一点工作,劝他们看得远一点。中国现在缺乏资金,有很多好的东西开发不出来。如果开发出来,可以更多地提供日本需要的东西。现在到中国来投资,对日本的将来最有利。

中国现在的情况总是好的。这几年一直摆在我们脑子里的问题是,我们提出的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空?从提出到现在,五年过去了。从这五年看起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的一部分。

来,这个目标不会落空。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

翻两番,分成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这种准备包括四个方面,一个是能源,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原材料,一个是智力。这需要大量的资金,我们很缺乏,所以必须坚持开放政策,欢迎国际资金的合作。

谈到我个人的经历,你在毛主席纪念堂的展览室里看到的那张有我在里面的照片是在巴黎照的,那时只有十九岁。我自从十八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任何别的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我一九二七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二十三岁,谈不上能力,谈不上知识,但也可以干下去。二十五岁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31],建立了红七军。从那时开始干军事这一行,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建国以后我的情况你们就清楚了,也做了大官,也住了“牛棚”。你问我觉得最高兴的是什么?最痛苦的是什么?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前,工作搞对的有我的份,搞错的也有我的份,不能把那时候的失误都归于毛主席。至于“文化大革命”,那是另外一回事。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

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所以,我现在身体还可以。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出来工作,从一九七七年到现在是七年,我相信没有犯大错误。但究竟怎样,让历史去评价吧!

维护世界和平 ,搞好国内建设^{*}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中国的对外政策 ,主要是两句话。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 ,维护世界和平 ,另一句话是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 ,将来发展富强起来 ,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 ,永远不会欺负别人 ,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

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 ,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 ,一旦发生战争 ,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 ,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16]。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 ,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 ,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 ,我们主张南北对话。不过 ,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 ,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 ,也就是南南合作^[15]。第三世界国家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相互合作 ,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前景是很好的。发达国家应该清楚地看到 ,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不发展 ,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可能得到较大的发展。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谈话的一部分。

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 ,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 ,也不打苏联牌 ,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 ,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 ,发展自己的国家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中国还很穷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三百美元。我们的目标是 ,到本世纪末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八百美元对经济发达国家来说不算什么 ,但对中国来说 ,这是雄心壮志。它意味着到本世纪末 ,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到那个时候 ,中国就会对人类有大一点的贡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 ,日子就会比较好过。更重要的是 ,在这样一个基础上 ,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 ,我们就可以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总之 ,我们诚心诚意地希望不发生战争 ,争取长时间的和平 ,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四化建设。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中国政府为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方针、政策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多次讲过 ,我国政府在一九九七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后 ,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 ,法律基本不变 ,生活方式不变 ,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变 ,香港可以继续同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我们还多次讲过 ,北京除了派军队以外 ,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 ,这也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 ,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 ,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 ,具体说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近几年来 ,中国一直在克服“左”的错误 ,坚持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 ,来制定各方面工作的政策。经过五年半 ,现在已经见效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提出用“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香港和台湾问

^{*} 这是邓小平同志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的谈话要点。

题。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这个政策。有人担心这个政策会不会变,我说不会变。核心的问题,决定的因素,是这个政策对不对。如果不对,就可能变。如果是对的,就变不了。进一步说,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人民赞成,就变不了。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中国有香港、台湾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何在呢?是社会主义吞掉台湾,还是台湾宣扬的“三民主义”吞掉大陆?谁也不好吞掉谁。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只有用武力解决,这对各方都是不利的。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世界上一系列争端都面临着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还是用非和平方式来解决的问题。总得找出个办法来,新问题就得用新办法来解决。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

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从世界历史来看,有哪个政府制定过我们这么开明的政策?从资本主义历史看,从西方国家看,有哪一个国家这么做过?我们采取“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玩弄手法,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充分照顾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

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不相信中国人有能力管好香港,这是老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思想状态。鸦片战争^[32]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蒋氏父子^[21]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凡是中华儿女,不管穿什么服装,不管是什么立场,起码都有中华民族的自豪感。香港人也是有这种民族自豪感的。香港人是能治理好香港的,要有这个自信心。香港过去的繁荣,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中国人的智力不比外国人差,中国人不是低能的,不要总以为只有外国人才干得好。要相信我们中国人自己是能干得好的。所谓香港人没有信心,这不是香港人的真正意见。目前中英谈判的内容还没有公布,很多香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政策不了解,他们一旦真正了解了,是会完全有信心的。我们对解决香港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国务院总理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是经大会通过的,是很严肃的事。如果现在还有人谈信心问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国政府没有信任感,那末,其他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们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继续

让外国人统治,否则香港人也是决不会答应的。

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未来香港特区政府的主要成分是爱国者,当然也要容纳别的人,还可以聘请外国人当顾问。什么叫爱国者?爱国者的标准是,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只要具备这些条件,不管他们相信资本主义,还是相信封建主义,甚至相信奴隶主义,都是爱国者。我们不要求他们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他们爱祖国,爱香港。

到一九九七年还有十三年,从现在起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顺利地接管政府。香港各界人士要为此作出努力。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九八四年六月三十日)

我们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思想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坚持毛泽东同志说的实事求是,坚持毛泽东同志的基本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十分重要,坚持社会主义对中国也十分重要。中国自鸦片战争^[32]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内,处于被侵略、受屈辱的状态,是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的革命取得了胜利。

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中国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是不是也能站起来,中国是不是也能翻身?让我们看看历史吧。国民党搞了二十几年,中国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不能成功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毛泽东思想,走自己的道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或者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自己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会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也没有统一。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建国以后,我们从旧中国接受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工业几乎等于零,粮食也不够吃,通货恶性膨胀,经济十分混乱。我们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稳定物价和财经统一问题,国民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经济建设。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人们说,你们搞什么社会主义,我们说,中国搞资本主义不行,必须搞社会主义。如果不搞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混乱状态就不能结束,贫困落后的状态就不能改变。所以,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如果说我们建国以后有缺点,那就是对发展生产力有某种忽略。社会主义要消

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在中国现在落后的状态下,走什么道路才能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善人民生活?这就又回到是坚持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来了。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

我们的政治路线,是把四个现代化建设作为重点,坚持发展生产力,始终扭住这个根本环节不放松,除非打起世界战争。即使打世界战争,打完了还搞建设。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最低目标,是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来访时我同他首次谈到的。所谓小康,从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就是年人均达到八百美元。这同你们相比还是低水平的,但对我们来说是雄心壮志。中国现在有十亿人口,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绝大多数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的道理。不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小康社会形成不了。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关起门有两种,一种是对国外,还有一

种是对国内,就是一个地区对另外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对另外一个部门。两种关门都不行。我们提出要发展得快一点,太快不切合实际,要尽可能快一点,这就要求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实行开放政策。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所以,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积极性。我们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制定这个方针的,几年功夫就见效了。不久前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决定,改革要从农村转到城市。城市改革不仅包括工业、商业,还有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都在内。总之,我们内部要继续改革,对外进一步开放。

我们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33],都是大中城市。我们欢迎外资,也欢迎国外先进技术,管理也是一种技术。这些会不会冲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呢?我看不会的。因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当然,这会带来一些问题,但是带来的消极因素比起利用外资加速发展的积极效果,毕竟要小得多。危险有一点,不大。

如果说构想,这就是我们的构想。我们还要积累新经验,还会遇到新问题,然后提出新办法。总的来说,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

行的,是走对了。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我们非常关注 香港的过渡时期^{*}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几年以前,主要是在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这个构想是从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和香港问题出发的。十亿人口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但是,根据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和实际情况,不保证香港和台湾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就不能保持它们的繁荣和稳定,也不能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因此,我们在香港问题上,首先提出要保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不变。

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十三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一九九七年后的事情。我们希望香港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谈话的一部分。

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

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

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中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走资金。

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今后中英两国要更好地合作。

现在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达成一致了。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这件事情会在国际上引起很好的反应,而且为世界各国提供国家间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一个范例。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也考虑到解决国际争端应该采取什么办法。因为世界上这里那里有很多疙瘩,很难解开。我认为有些国际争端用这种办法解决是可能的。我们就是要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使问题得到解决。过去,好多争端爆发了,引起武力冲突。假如能够采取合情合理的办法,就可以消除爆发点,稳定国际局势。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三十五周年庆祝典礼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同志们！

全国同胞们，同志们和朋友们！

在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这个光荣时刻，我向为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保卫祖国安全而奋斗的同志们、同胞们、朋友们，致以最热烈的节日祝贺！

三十五年前，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庄严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三十五年来，我国不但完全结束了旧时代的黑暗历史，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也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彻底纠正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全国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在全国实现安定团结、民主法制的基础上，我们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我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蓬勃发展，其他工作也都得到了公认的成就。今天，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兴奋和自豪。

党的十二大^[5]提出,到二〇年,我国的工农业年总产值,要比一九八〇年翻两番。最近几年的情况,表明这个宏伟目标是能够达到的。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现行经济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同时,要对全国现有的企业,进行有计划的技术改造。要大大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大大加强各级教育工作,以及全体职工和干部的教育工作。全党和全社会都要真正尊重知识,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样,我们就一定会逐步实现现代化。

我国的对外政策是众所周知和持久不变的。我们坚决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裁减军备,首先是裁减超级大国的核军备和其他军备,反对一切侵略和霸权主义。我国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的基础上,同世界一切国家建立、发展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如同我国和英国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一样。现在国际局势并不太平,我们必须巩固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战员,务必时刻保持警惕,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事政治素质,努力掌握应付现代战争的知识 and 能力。

我们主张对我国神圣领土台湾实行和平统一,有关的政策,也是众所周知和不会改变的,并且正在深入全中华民族的心坎。大势所趋,祖国迟早总是要和平统一的。希望全国各族同胞,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共同促进这一天早日到来。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

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日)

你们这么多人回来观礼,我非常高兴,我看香港一定有望。这次回来观礼的,各行各业各界人士都有,各种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也都来了。这说明大家都赞成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赞成中英两国政府所达成的协议^[34]的内容。这就是说,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大前提,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爱祖国,爱香港,在今后十三年和十三年以后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大家共同努力,这个目标肯定可以实现。一九九七年以后,在座的六七十岁的人,那时精力就差些了,但在座的有很多年轻人,年轻人有优势。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活到一九九七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现在有些人就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不在了,政策会变。感谢大家对我们这些老头子的信任。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联合声明确定的内容肯定是不变的。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我们在协议中说五十年不变,就是五十年不变。我们这一代不会变,下一代也不会变。到了五十年以后,大陆发展起来了,那时还会小里小气地处理这些问题吗?所以不要担心变,变不了。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有人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过几天我们要开中央全会,讨论城市改革,城市改革也是变,是翻天覆地的变化。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

再一个是有些人担心干预。不能笼统地担心干预,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现在看起来,香港从现在到一九九七年会有秩序地度过十三年,十三年之后,会有秩序地度过五十年。这我是有信心的。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这种破坏力量可能来自这

个方面,也可能来自那个方面。如果发生动乱,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由乱变治,这样的干预应该欢迎还是应该拒绝?应该欢迎。所以事物都要加以具体分析。我还讲过十三年的过渡时期参与的问题,参与也是一种干预,当然这个参与不是北京方面参与,而是香港人参与,中央政府支持香港人参与。不能设想,到了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一夜之间换一套人马。如果那样,新班子换上来,什么都不熟悉,不就会造成动乱吗?即使不造成动乱,也会造成混乱。在过渡时期后半段的六七年内,要由各行各业推荐一批年轻能干的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甚至包括金融方面。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有机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一九九七年后在香港执政的人还是搞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不做损害祖国利益的事,也不做损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所以不能笼统地反对参与,也不能笼统地反对干预。港人治港不会变。由香港人推选出来管理香港的人,由中央政府委任,而不是由北京派出。选择这种人,左翼的当然要有,尽量少些,也要有点右的人,最好多选些中间的人。这样,各方面人的心情会舒畅一些。处理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从大处着眼,不会拘泥于小节。

一个是怕变,一个是怕干预,还怕什么?有人说怕乱。乱就得干预,不只中央政府要干预,香港人也要干预。总会有人捣乱的,但决不要使他们成气候。

我跟英国人谈的时候,也讲了在过渡时期希望不要出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英资带头往外撤,一个是港币发生大的波

动。如果储备金用尽,港币贬值,就会发生动乱。过渡时期我们不过问储备金行吗?还有一个土地问题,如果把土地卖光用于行政开支,把负担转嫁给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政府,不干预行吗?我给英国人讲了五条,他们表示愿意采取合作的态度。

我讲过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我说,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行使主权呢?在香港驻军还有一个作用,可以防止动乱。那些想搞动乱的人,知道香港有中国军队,他就要考虑。即使有了动乱,也能及时解决。

对于中英联合声明,我们不仅相信我们自己会遵守,也相信英国人会遵守,更相信香港同胞会遵守。但是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国际上对联合声明反应还是好的。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只要香港同胞团结起来,选择好的政治人物来管理香港,就不怕变,就可以防止乱。即使发生乱,也不会大,也容易解决。

一九九七年以后,台湾在香港的机构仍然可以存在,他们可以宣传“三民主义”,也可以骂共产党,我们不怕他们骂,共产党是骂不倒的。但是在行动上要注意不能在香港制造混乱,不能搞“两个中国”。他们都是中国人,我们相信,他们会站在我们民族的立场,维护民族的大局,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他们的活动,进行他们的宣传,在香港这种情况下是允许的。

总之,协议签订后会遇到很多新情况。我们过去讲过,要了解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新情况、新问题。坦率地讲,将来会出现什么问题,我们也不清楚,但问题出现了我们会合情合理地处理。上面讲的这些意见,请大家回去后,向香港各行各业五百万人做点解释工作。

我希望港澳同胞多到全国各地走一走,看看国家的面貌,看看国家的变化。我们不是有个口号叫“中华民族大团结万岁”吗?只要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维护民族的大局,不管抱什么政治观点,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都要大团结。希望香港同胞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一九九七年政权顺利移交作出贡献。

我们的宏伟目标和根本政策^{*}

(一九八四年十月六日)

在经济问题上,我是个外行,也讲了一些话,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这是我提出来的,但是如何搞开放,一些细节,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

我们确定了一个政治目标:发展经济,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达到八百美元,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再发展三十年到五十年,力争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我们的目标,不是很容易的。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正确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确定了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的政策,没有这样的政策不可能成功。

对内经济搞活,首先从农村着手。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中国经济能不能发展,首先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

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翻两番,重要的是这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能不能达到。现在看,一系列新的农村政策是成功的。过去农村很困难,现在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吃饱,能够穿得比较好,居住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农村政策见效很快,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对我们确定翻两番的目标是一个鼓励。

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与此同时,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的试验。当然,农村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为城市比农村复杂得多,它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还包括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35]的主题,就是城市和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意味着中国将出现全面改革的局面。农村改革经过三年就见成效。城市改革大体上也要三年至五年才能够看到显著的变化。农村改革的经验使我们相信城市改革能够搞好。同时,我们也意识到,由于城市改革的复杂性,可能会出些差错。但这影响不了大局,我们是走一步看一步,有不妥当的地方,改过来就是了。总之,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实事求是。我们相信,城市改革也会成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将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写上很重要的一笔。

我们在制定对内经济搞活这个方针的同时,还提出对外经济开放。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

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做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

对内经济搞活,对外经济开放,这不是短期的政策,是个长期的政策,最少五十年到七十年不会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两步加起来,正好五十年至七十年。到那时,更不会改变了。即使是变,也只能变得更加开放。否则,我们自己的人民也不会同意。

我们希望所有的外国企业家、专家进一步认识到,帮助中国的发展,对世界有利。现在中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例很小。如果我们能够实现翻两番,对外贸易额就会增加许多,中国同外国的经济关系就发展起来了,市场也发展了。所以,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上的开放,不只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恐怕也是发达国家的问题。现在世界上占总人口四分之三的地区是发展中国家,还谈不上是重要市场。世界市场的扩大,如果只在发达国家中间兜圈子,那是很有限度的。

我们希望国际工商界人士,从世界角度来考虑同中国的合作。这几年的合作是不错的,需要的是发展这种合作。为了便于广泛接触,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可以作为中国在实行对外开放中的一个窗口。请大家相信,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

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我们现在有些法律规定还不完备,因为没有经验,以后会逐渐完备的。有的朋友担心风险太大,合作中如有风险,我们共同承担。还有的提出企业的合作期限问题,如果技术确实先进,可以适当延长。总之,为了发展中外的经济合作,中国要创造条件,发达国家的经济界也要创造条件,首先的一条就是不要怕冒风险,不必担心我们的政策会变,胆子放大一些,合作的步子更快一些。历史最终会证明,帮助了我们的人,得到的利益不会小于他们对我们的帮助。至于政治上战略上的意义就更大了。

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日)

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36],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粉碎“四人帮”以后还有两年徘徊,因为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搞“两个凡是”^[7],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才真正发生变化,到现在快六年了。这六年来发生的变化,确实比预料的要好。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九七八年开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几天我们要开十二届三中全会^[35],这将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会。前一次三中全会重点在农村改革,这一次三中全会则要转到城市改革,包括工业、商业和其他行业的改革,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无论是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其基本内容和基本经验都是开放,对内把经济搞活,对外更加开放。虽然城市改革比农村复杂,但是有了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农村改革三年见效,城市改革时间要长一些,三年五载也会见效。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公布后,人们就会看到我们全面改革的雄心壮志。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

一九七四年你来访问,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个总政策下,改善同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目前在改善同美国的关系方面有实际进展。同苏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也争取发展关系。更重要的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合作,还有同欧洲、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中国是一支和平力量,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最不希望发生战争。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35],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

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33],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37]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

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

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21]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38]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39],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

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

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至于人

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住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〇〇〇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

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40]时候，郑和下西洋^[41]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42]，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32]，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

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43],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44]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

官啦 ,啥也不懂 ,也可以呀 !总之 ,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国是个大国 ,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 ,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 ,还比较穷 ,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不过三百美元。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 ,但是又可以说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大国。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中国算一个。中国这一票是第三世界的 ,是名副其实地属于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我们多次讲过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将来发展起来了 ,还是属于第三世界 ,永远不做超级大国。

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 ,同我们这样一个地多人大国的地位不相称。我们建国三十五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 ,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 。如果没有这些波折 ,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了。最近六年来 ,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政策。现在我们一心一意地搞经济建设。六年中 ,我们取得的成就超过了预想。看来 ,我们确定的在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八百美元的目标是可以实现的。为了使中国发展起来 ,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是热爱和平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时谈话的要点。

最近,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35]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现在经济体制的改革重点在城市。城市的改革比农村的改革复杂得多。改革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小毛病,但是不要紧。再过三年五年,可以证明我们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我们吃了苦头总结出来的经验。今后我们可能还会犯错误。但是,第一不能犯大错误,第二发现不对就赶快改。

和平共处原则 具有强大生命力^{*}

(一九八四年十月三十一日)

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16]。还有其他许多问题,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困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南方不发展,北方还有什么市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发展速度问题,再发展问题。所以,南南合作^[15]还有一个意义,可以推动南北合作。

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现在进一步考虑,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问题,恐怕也是一个好办法。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谈话的要点。

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我们解决香港问题,允许香港保留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解决台湾问题也是这个原则。台湾跟香港不同,还可以保留军队。台湾当局提出要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至少是太缺乏现实感了。能用一千几百万人口的台湾的现行制度来统一十亿人口的大陆吗?我们曾多次劝台湾当局,不要这样想,要搞一个你不吃掉我、我也不吃掉你的办法。十亿人口的大陆坚定不移搞社会主义,台湾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北京不派人到台湾去。这不也是和平共处吗?所以,和平共处的原则不仅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而且在一个国家处理自己内政问题上,也是一个好办法。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甚至可能发展成为两国关系中爆发性的问题。如果采用“一国两制”的办法,不仅解决了中国的统一,美国利益也不致受损害。美国目前有一股势力,继承“杜勒斯^[45]主义”,把台湾当作美国的“航空母舰”和势力范围。一旦通过和平共处办法解决了台湾问题,这个热点也就消失了,这些人不也就死心了吗?这对太平洋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军队要服从 整个国家建设大局^{*}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一日)

我想谈一谈顾全大局的问题。这个大局就是我们国家建设的大局。现在我们这个国家确实是生气勃勃,一片兴旺。外国很多人都这么看、这么说。出现这种局面是最近五年,特别是最近三年,也就是农村政策见效以后,这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为什么这次能够摸“老虎屁股”,进行城市改革?应该说改革是有点风险的,这次北京就出现抢购物资的现象。不仅北京,好多城市都有。我们预料到这点。我们为什么不怕?因为物资比较多,群众一看,又稳定下来了。我们党的十二大^[5]确定的目标是翻两番,现在看来肯定能够实现。翻两番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不算多,叫做小康水平;但是就总量来说,国民生产总值是一万亿美元哪,国家的力量大了。翻两番包含这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个对外经济开放,一个对内经济搞活。改革就是搞活,对内搞活也就是对内开放,实际上都叫开放政策。而对外开放,我们还有一些人没有弄清楚,以为只是对西方开放,其实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我们是三个方面的开放。一个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们吸收外资、引进技术等等主要从那里来。一个是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开放,这也是一个方面。国家关系即使不能够正常化,但是可以交往,如做生意呀,搞技术合作呀,甚至于合资经营呀,技术改造呀,一百五十多个项目的技术改造,他们可以出力嘛。还有一个是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这些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这里有很多文章可以做。所以,对外开放是三个方面,不是一个方面。对内经济搞活,改革经济体制,发展起来会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就是说,很有希望。中间也可能出些问题,不要紧,我们不怕,一步步走,一步步地总结经验,不对头赶快改,不是大改,大的方针不会变了。

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还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发展起来就好办了。大局好起来了,国力大大增强了,再搞一点原子弹、导弹,更新一些装备,空中的也好,海上的也好,陆上

的也好,到那个时候就容易了。

再一个是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现在军队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46]。军队培养两用人才,地方是欢迎的。这方面工作真正做好了,部队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就容易了。余秋里^[47]同志告诉我,现在军队的养猪专业人员,一到地方就有用处,司机到地方是最受欢迎的。我们军队培养了不少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把其中一些人才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

在座的同志要教育我们各级干部,关心国家大局,就是使我们国家在二十年内发展起来,实际上从现在到二〇一〇年,没有二十年,只有十六年了。我们军队要一切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

中国是信守诺言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们两国的领导人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34],为各自的国家和人民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香港问题已经有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这个问题不解决,在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总是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除了,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前景光明。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就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如果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就做不到三方面都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将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谈话的一部分。

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就香港问题而言,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其他办法。“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还不是从香港问题开始的,是从台湾问题开始的。一九八一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的九条声明^[19],虽然没有概括为“一国两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两年香港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提出“一国两制”。

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人们都觉得这是个新语言,是前人未曾说过的。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这就要拿事实来回答。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因为这两年的谈判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这是三方面都接受了构想。再过十三年,再过五十年,会更加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的。人们担心中国在签署这个协议后,是否能始终如一地执行。我们不仅要告诉阁下和在座的英国朋友,也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中国是信守自己的诺言的。

一位日本朋友问我,你们为什么还有一个“五十年”,即一九九七年后还要保持香港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你们根据的是什么,是否有什么想法?我对他说,有。这也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中国现在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在两个十年内,即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达到了这个目标,中国也不算富,还不是一个发达国家。所以这只能算是我们雄心壮志的第一个目标。中国要真正发达起来,接近而不是说超过发达国家,那还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的时间。如果说在本世纪内我们需要实行开放政

策,那末在下个世纪的前五十年内中国要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不能离开这个政策,离开了这个政策不行。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符合中国的切身利益的。所以我们讲“五十年”,不是随随便便、感情冲动而讲的,是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的需要。同样地,到本世纪末和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也需要一个稳定的台湾。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可以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行两种制度,这就是制定我们国家政策的一个想法。如果懂得了这点,知道我们的基本观点,知道我们从什么出发提出这个口号、制定这个政策,就会相信我们不会变。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二十来个城市^[48],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和平和发展 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一九八五年三月四日)

对中国的发展 ,国际上可能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们从各种角度来分析 ,中国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还是有害。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考察和回答这个问题 ,一个是政治角度 ,一个是经济角度。

从政治角度说 ,我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一个观点 ,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 ,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 ,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 ,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 ,不仅我 ,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 ,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 ,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 ,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 ,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 ,别人没有资格 ,中国没有资格 ,日本没有资格 ,欧洲也没有资格。所以 ,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粉碎“四人帮”以后 ,我们制定中国的国策 ,同样也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总起来说,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战争的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有战争。欧洲人民也不希望有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世界上的人在议论国际局势的大三角。坦率地说,我们这一角力量是很单薄的。我们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大是地多人多,地多还不如说是山多,可耕地面积并不多。另一方面实际上是个小国,是不发达国家或叫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我可以大胆地说,到本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也就是我曾经跟大平正芳^[49]先生讲的达到小康水平,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16]。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

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的。我过去跟很多日本朋友谈这个问题,跟欧洲朋友、美国朋友也谈这个问题,他们脑子里也是装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苏联,东欧(东欧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三十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当然,第三世界有一部分国家开始好起来,但还不能说已经发达了,而大部分国家仍处于极其贫困的状态,他们的经济问题不解决,第三世界的发展,发达国家的继续发展,都不容易。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外贸易额去年才刚刚达到五百亿美元。如果对外贸易额翻一番,达到一千亿美元,国际上的市场不就扩大了吗?如果翻两番,达到两千亿美元,中国同国际上交往的范围不就更大了吗?贸易总是一进一出的,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

所以,我认为日本企业界对发展中日两国经济技术合作抱积极态度,是一种有战略眼光的决策。

改革科技体制 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我们今天到这里来,是祝贺你们会议的成功,是表示对科学技术、对知识的尊重。

七年前,也是三月份,开过一次科学大会,我讲过一篇话。主要讲了两个意思,两句话。一句叫做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一句叫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时,所以要讲这两条,是因为有争论。七年过去了,争论已经解决了。结论是谁做的?是实践做的,群众做的。

我很高兴,现在连山沟里的农民都知道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他们未必读过我的讲话。他们从亲身的实践中,懂得了科学技术能够使生产发展起来,使生活富裕起来。农民把科技人员看成是帮助自己摆脱贫困的亲兄弟,称他们是“财神爷”。“财神爷”这个词,不是我的用语,是农民的发明。但是,他们的意思,同我在科学大会上讲的话是一样的。

我也很高兴,科技界的同志这几年做了很多工作。我们国家的经济搞得不错,光景一年比一年好。人民是满意的,全世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界是公认的。这里面,有你们的一份功劳。中央要求科技界面向经济建设。你们是出了大力的。同志们不仅出了很多科技成果,而且以主人翁的态度,为国家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我们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走到工厂,走到地方,到处都受欢迎,到处都请你们谈战略,谈远景,谈规划。科学技术专家这样广泛地参加经济、社会决策活动,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科技专家在我们国家里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已经同过去大大不同了。你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越有成绩,就会使全国人民越加懂得知识的可贵,推动大家都来尊重知识,学习知识,掌握知识。人们正在通过你们的工作,来评价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评价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

现在要进一步解决科技和经济结合的问题。所谓进一步,就是说,在方针问题、认识问题解决之后,还要解决体制问题。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35]。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现在,中央还要作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你们这次会议为中央作出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作了准备。这个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这个文件的方向,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双管齐下,长期存在的科技与经济脱节的问题,有可能得到比较好的解决。

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人才问题,别的不说了,今天就讲两点。第一,能不能每年给知识分子解决一点问题,要切切

实实解决,要真见效。第二,要创造一种环境,使拔尖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改革就是要创造这种环境。人才是有的。不要因为他们不是全才,不是党员,没有学历,没有资历,就把人家埋没了。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是领导者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这两点,请各单位讨论一下。

我们奋斗了几十年,就是为了消灭贫困。第一步,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就是不穷不富,日子比较好过的水平。第二步,再用三五十年时间,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使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大局。我们在国际上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在国内要排除一切干扰。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只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它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工作还是要靠大家去做。希望大家放开手脚,把经济搞上去,把生产力搞上去。

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才能团结起来^{*}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

现在我们国内形势很好。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50],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四条里面,理想和纪律特别重要。我们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年,要有理想。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点,我希望宣传方面任何时候都不要忽略。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我们采取的所有开放、搞活、改革等方面的政策,目的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作《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后,即席作的一次讲话。

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当然,决不能搞摊派,现在也不宜过多宣传这样的例子,但是应该鼓励。

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有人担心中国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这个担心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我们不能拿空话而是要拿事实来解除他们的这个忧虑,并且回答那些希望我们变成资本主义的人。我们的报刊、电视和所有的宣传工作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这些人的脑子里是有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的。要特别教育我们的下一代下两代,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一定不能让我们的青少年作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俘虏,那绝对不行。

有了理想,还要有纪律才能实现。纪律和自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两者是不可分的,缺一不可。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组织起来就有力量。没有理想,没有纪律,就会像旧中国那样一盘散沙,那我们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我们的建设怎么能够成功?现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纪律的表

现,比如说,一切向钱看。对这种现象的批评当然要准确,不要不适当,但是这种现象确实存在。有的党政机关设了许多公司,把国家拨的经费拿去做生意,以权谋私,化公为私。还有其他的种种不正之风。对于这些,群众很不满意。我们要提醒人们,尤其是共产党员们,不能这样做。不是在整党吗?应该首先把这些不正之风整一整。

当前在经济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歪门邪道。“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违反法纪和政策的种种“对策”,可多了。共产党员一定要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无论是不是党员,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纪律里就包括这一条。遵守纪律的最高标准,是真正维护和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所以,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八日)

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我们已经遇到的一些风险。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因为改革涉及人民的切身利益问题,每一步都会影响成亿的人。改革能否成功,再过几年就能看清了。农村的改革三年见效,包括城市、农村在内的全面改革更复杂了,我们设想要五年见效。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最近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什么了不起,国际上有人把它看得比较严重,我们自己心里是踏实的。两个开放,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这个政策不会变,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是两个开放政策的继续和发展。改革需要继续开放。不久前,我在全国科技工作会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谈话的一部分。

议上讲执行开放政策时 ,强调了理想和纪律 ,这是必要的。有人认为 ,中国谈理想 ,是否意味着要收了。不是这样。对于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 ,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 ,不是盲目的。我们的方针不是收 ,而是继续放 ,也许今后要放得更大。外国有的评论家说 ,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

政治上发展民主， 经济上实行改革^{*}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五日）

你一九七三年来访问时，中国社会不安定，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总的说，那个时候“左”得要命。“左”的结果是社会发展很慢。

建国后，我们在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51]和合作化^[52]，在城市进行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53]，都干得很好。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54]，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55]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后，还徘徊了两年，基本上还是因循“左”的错误，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八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一九七八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二百五十美元。这年年底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我们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现实，总结了经验，肯定了从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建国到一九七八年三十年的成绩很大,但做的事情不能说都是成功的。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过去闹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

什么建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目标确定了,从何处着手呢?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三年的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现在农村面貌一新,百分之九十的人生活改善了。还有百分之十的人生活差一些,但也不难解决。刚才你说在北京看到了很多新盖的高楼大厦,这还不是中国主要的变化,中国最大的变化在农村。

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我们经验不足。中国社会过去闭塞,造成信息不通,是一个很大的弱点。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但是有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作借鉴,加上我

们清醒地认识到有风险,可以避免犯大的错误。当然小错误、中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

我给你们介绍了我们的历史,介绍了这些年我们做的事情。社会主义究竟怎么搞?你们讲要学习、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搞社会主义走了相当曲折的道路。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

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会增加。在我们的对外贸易中,欧洲应占相应的份额。在外贸上应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技术转让,欧洲在这方面比较开放,当然,这只是比较而言。第二个是双方都应开辟贸易途径,贸易总是一来一往的,中国买欧洲产品,欧洲也要买中国产品。中国买外国产品总要有偿付能力。你们在技术上帮助我们,我们的经济发展了,对外贸易也能随着发展。现在中国的年对外贸易额是五百亿美元,翻一番是一千亿美元,到本世纪末如果外贸也翻两番,那就是两千亿美元,对发达国家来讲不算高,对我们来讲,增长不少了。现在欧洲在我们外贸中所占的比例不大,如果你们能占恰当的份额,我们是很高兴的。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考虑加强同欧洲的经济联系,这是作为一项政策来考虑的。希望欧洲的企业界为中国商品进入欧洲市场创造条件。

^{*} 摘自邓小平同志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的谈话。

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九日)

今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主要是表示对教育工作的支持,并且向你们,向全国教育工作者表示慰问。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我看是个好文件。现在,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重视,扎扎实实地抓,组织好施工。

我们多次说过,我国的经济,到建国一百周年时,可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这样说,根据之一,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培养出数以亿计的各级各类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现在小学一年级的娃娃,经过十几年的学校教育,将成为开创二十一世纪大业的生力军。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

近几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到农村党支部,有越来越多的同志,懂得知识和人才的重要,懂得教育的重要。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包括一些高级干部,对于发展和改革教育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缺乏紧迫感,或者口头上承认教育重要,到了实际问题时又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不是已经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吗?这个重点,本来就应当包括教育。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比如说,改革的决定,在你那个地区、那个部门,怎样贯彻落实?校舍和教学设备不够,怎样解决?学校经费不足,怎样筹集?师生的伙食,怎样办得好一点?师资培训,怎样组织?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怎样改进?等等。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经常深入学校,倾听广大师生的意见和呼声,为他们排忧解难。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门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各个部门和地方,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

对我国教育的发展,我是乐观的。困难是有,但要看到有利条件。不管怎么说,这几年经济发展是快的。经济是基础。

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动教育的发展。我国城乡和社会各界,蕴藏着极大的办学热情,不少爱国侨胞也热心捐资办学。现在我们又有了一个正确的纲领。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各级领导认真抓,我看教育的事情好办,悲观是没有根据的。扎扎实实抓它几年,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定会到来。

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56]。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当前,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我国的改革。希望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按照中央已经确定的目标继续前进,努力把各项改革搞成功!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

—

我们大陆坚持社会主义,不走资本主义的邪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国家拿的这一部分,也是为了人民,搞点国防,更大部分是用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和科学,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

^{*} 这两段话分别摘自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日同陈鼓应教授的谈话和一九八五年六月六日同“大陆与台湾”学术研讨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的谈话。

遗留下来的做法。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全国人大一九八一年专门做了决议,废除宪法中肯定“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条款,这个条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写进宪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的人总想搞这个“四大”。中国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再不能那样干了。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几年有,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不安定,政治动乱,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二

我们依法处理过几个人,他们的问题实际上是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在我们的国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统一不起来了。不是同台湾的统一问题,而是大陆内部的统一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们内部就成了一个乱的社会,不是一个安定的社会,什么建设都搞不成了。

对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则的问题。

你们对处理这几个人有不同的意见 ,从人权的观点提出问题。这就要问 ,什么是人权 ?首先一条 ,是多少人的人权 ?是少数人的人权 ,还是多数人的人权 ,全国人民的人权 ?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 ,本质上是两回事 ,观点不同。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六月四日)

在这么一个重要会议上,我想先就裁减军队这件事情,讲几句话。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一百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十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作出贡献。减少一百万,实际上并没有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即使国际形势恶化,这个裁减也是必要的,而且更加必要。过去我们讲过,这么臃肿的机构如果不“消肿”,不要说指挥作战,就是疏散也不容易。“消肿”,比较难的是安置退下来的几十万干部。杨尚昆^[57]同志在小组会上讲了这个问题,我们要想妥善的办法把它解决好。这次军委会议开得很好,大家想到一块儿了。在这方面,我看没有不同意见。这说明我们军队的同志是从全局着眼,从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着眼来看问题的。

今天我主要想讲一讲国际形势,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对外政策。这个问题同我们会议也有关系。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对外政策也有变化,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

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

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我们好多的决策,包括一、二、三线的建设布局^[58]、“山、散、洞”^[59]的方针在内,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同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我们中国也属于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世界很大,复杂得很,但一分析,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由此得出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第二个转变,是我们的对外政策。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

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世界上都在说苏、美、中“大三角”。我们不讲这个话,我们对自己力量的估计是清醒的,但是我们也相信中国在国际事务里面是有足够分量的。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正确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所以,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现在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要,我们实际上也要担当这个角色。根据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也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个我们说到做到。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总之,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但是我们搞开放政策,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这对加速我们的发展比较有利。

最后我再讲一点。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到那个

时候我们经济力量强了 ,就可以拿出比较多的钱来更新装备。可以从外国买 ,更要立足于自己搞科学研究 ,自己设计出好的飞机、好的海军装备和陆军装备。先把经济搞上去 ,一切都好办。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 ,就这么一个大局 ,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

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

(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搞社会主义,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一切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方法,包括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我们都采用。这是个很大的试验,是书本上没有的。

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农村见了成效,我们才有勇气进行城市的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刚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去年年底发现多发了一百亿的钞票,今年物价涨得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但是不要紧。要理顺各种经济关系需要几年时间。如果关系理顺了,到本世纪末翻两番就有把握。我们要按价值规律办事,按经济规律办事。搞得好,有可能为今后五十年以至七十年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打下基础。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压倒一切的最艰巨的任务。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党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抓住时机 ,推进改革^{*}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一日)

不是说慎重初战、务求必胜吗？十二届三中全会^[35]后已经过了一段时间，现在需要回顾一下。

我对外国人说，改革的势头不错，这话正是在北京出现一阵抢购，有半个月人心惶惶的时候说的。那时候，我心里是踏实的。现在看势头还是好的，我总是讲这么个观点。经济体制改革成不成功，成功大小，要看三年到五年。见效了才能说服人，证明第二个三中全会决议是正确的。

改革的意义，是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所以，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

物价改革是个很大的难关，但这个关非过不可。不过这个关，就得不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十二届三中全会以来九个月的实践证明，物价改革是对的。理顺生活资料价格恐怕要用三年，加上生产资料价格的改革，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用五年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谈话的一部分。

时间理顺物价关系 ,就是了不起的事。这项工作很艰巨。改革的势头好 ,要坚持搞下去 ,这个路子必须走。今后即使出现风波 ,甚至出现大的风波 ,改革也必须坚持。否则 ,下一个十年没有希望。我们要抓住时机 ,现在是改革的最好时机。

工业生产特别是出口产品的生产 ,中心是提高质量 ,把质量摆到第一位。乡镇企业也要抓质量。要提高质量 ,就必须改革。要立些法 ,要有一套质量检验标准 ,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机构来严格执行。这一关把住了 ,可以减少很多弊端 ,卡住那些弄虚作假的行为。质量问题虽然经常提 ,但现在只是一般地提不行 ,要突出地提 ,切实地抓。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

我们特区^[29]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不过,听说这方面有了一点进步。

前不久我对一位外国客人说,深圳是个试验,外面就有人议论,说什么中国的政策是不是又要改变,是不是我否定了原来关于经济特区的判断。所以,现在我要肯定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二句话是,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这两句话不矛盾。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总之,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但在开放过程中要小心谨慎。我们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一定要保持谦逊态度。

* 摘自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公明党第十三次访华代表团时的谈话。

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一日)

世界上对我国的经济改革有两种评论。有些评论家认为改革会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中国不会放弃社会主义。后一种看法比较有眼光。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那个革命搞了三十几年。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⁹⁾上决定进行改革。我们总的原则是四个坚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已经写进中国的宪法。问题是怎么坚持。是坚持那种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状态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政策,还是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

我们的经济改革,概括一点说,就是对内搞活,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也是对内开放,通过开放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一开放,八亿农民的积极性就起来了。城市经济开放,同样要调动企业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内搞活经济,是活了社会主义,没有伤害社会主义的本质。至于吸收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不用担心它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搞活开放也会带来消极影响,我们要意识到这一点,但有办法解决,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从政治上讲,我们的国家机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它有能力保障社会主义制度。从经济上讲,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工业、农业、商业和其他方面已经建立了相当坚实的基础。这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我们的原则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走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叫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改革是中国 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这段时间,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51],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一九五七年开始有一点问题了,问题出现在一个“左”字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是必要的,但是搞过分了。“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54]和人民公社^[55]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难时期,工农业减产,市场上的商品很少,人民群众吃不饱饭,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一九六二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情况比较好。但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是“左”的指导思想并没有根除。一九六五年又提出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就搞了“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从一九六五年就开始了，一九六六年正式宣布。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搞了整整十年，党内的骨干差不多都被打倒了，这场“革命”的对象就是这些老干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纠正极左思潮。同时我们提出还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一九八一年见面时谈过“四个坚持”，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四项基本原则。如果不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纠正极左就会变成“纠正”马列主义，“纠正”社会主义。

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共产主义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没有极大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任务。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一九五七年起，我们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到一九六六年的十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

少。虽然有一些地区的农民生活比较宽裕,但是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当然,同旧中国相比,还是进步了。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

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已经见效了,农村面貌发生明显变化。有了农村改革的经验,现在我们转到城市经济改革。城市经济改革就是全面的改革,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有一年时间了。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不过,要证实我们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现在占整个经济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一个三资企业⁽⁶⁰⁾办起来,工人可以拿到工资,国家可以得到税收,合资

合作的企业收入还有一部分归社会主义所有。更重要的是,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倒是觉得现在外国投资太少,还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至于不搞两极分化,我们在制定和执行政策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总之,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

我还要说,我们社会主义的国家机器是强有力的。一旦发现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开放政策是有风险的,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政策和国家机器有力量去克服这些东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

我们的同志编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61],里面是我的一些讲话,有十二大的开幕词,不知你读过没有?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62],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要特别注意我们“左”的错误。“左”的错误带来的损失,历史已经作出结论。我们都是搞革命的,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

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

在中国共产党 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

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得很好，圆满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现在，我讲四点意见。

第一点，关于形势和改革。

大家都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将近七年，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关键性的时期之一。这确实来之不易。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了极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不彻底纠正“左”的错误，坚决转移工作重点，就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同样，不认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还会把纠“左”变成“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也不会有今天的好形势。

改革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已经提出来了。改革从农

村开始,一度议论纷纷。经过三年,解决了许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取得成效,认识也就比较一致了。当然也还有新问题,还需要继续解决。十二届三中全会^[35]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逐步展开。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这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总的说来,除了个别例外,全国人民生活,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当然,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带来某些消极的东西。只要我们正视这些东西,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步骤,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我国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刚刚起步,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我们要抓住当前的有利时机,坚定不移,大胆探索,同时注意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改革搞好。我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第二点,关于“七五”计划。

这次会议通过的制定“七五”计划的建议,方针政策是正

确的,确定的目标是切合实际的,是一个好文件。

“七五”期间,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定在百分之七左右,这是政治局常委一致同意的,执行中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的速度并不低。速度过高,带来的问题不少,对改革和社会风气也有不利影响,还是稳妥一点好。一定要控制固定资产的投资规模,不要把基本建设的摊子铺大了。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七五”这五年很重要。如果经过这五年,使改革基本就绪,经济又能够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我们实现十二大^[5]提出的本世纪末的目标就有了充分的把握。

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我对一些外宾说,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第三点,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很早就提出了。中央、地方和军队都做了不少工作,特别是群众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影响很好。不过就全国来看,至今效果还不够理想。主要是全党没有认真重视。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

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么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这个真理,有些同志已经不那么清楚了。这样,也就很难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

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首先要着眼于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

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整党要遵照十二届二中全会的决定,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四者缺一不可。党章对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每个党组织应该要求每个党员逐条对照,开展自我批评和相互批评,必要的时候要采取纪律措施。每个党员都能以身作则,我们的一切事情就都好办了。

改善社会风气要从教育入手。教育一定要联系实际。对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流行的影响社会风气的重要思想问题,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简单片面武断的说法是不行的。群众关心的实际生活问题和时事政策问题,各级领导一定要经常据实讲解,告诉大家客观的情况以及党和政府所作的努力,并且对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及时纠正。群众从事实上感觉到党和社会主

义好,这样,理想纪律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才会有效。

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队伍都必须大大加强,决不能削弱。同样,对严重犯罪活动的防范和打击,也必须继续加强。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风气的腐败现象,要坚决制止和取缔。一切企业事业单位,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

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它们所属的企业也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宣传,也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宣传,一定要坚决反对。毫无疑问,我们仍然坚持“双百”方针^[27],坚持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各项自由,坚持对思想上的不正确倾向以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不搞任何运动和“大批判”。对坚持错误拒绝改正的党员要执行党纪,但是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允许重犯任何简单化、扩大化的“左”的错误。

做好以上几方面的工作,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也就有了保证。

第四点,关于干部的新老交替和理论学习。

几年来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进行得比较顺利。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都补充了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优秀干部。这次三个委员会成员的进退,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中央委员会的年轻化,前进了一大步。一批老同志以实际行动,带头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这件事在党的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这次增选的中央委员,新近上任的部长、省委书记,都比较年轻。一般是五十多岁,有的才四十出头。我们开国时的好多部长、省委书记,也就是这个年龄。中青年干部接班,最重要的是接老同志坚持革命斗争方向的英勇精神的班。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党的好传统、好作风发扬起来。我曾经说过,干部不是只要年轻,有业务知识,就能解决问题,还要有好的作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深入群众倾听他们的呼声;要敢说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要公私分明,不拿原则换人情;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

我们常说,干部的新老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究竟什么是我们党的政策的连续性呢?这里当然包括独立自主、民主法制、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内外政策,这些政策我们是不会改变的。而所有这些政策的基础,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对此我们更是不会改变,不会动摇的。不然的话,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乱的社会,就谈不上安定团结,什么建设改革、振兴中华,都将成为空话。

现在我还想提出一个新的要求,这不仅是专对新干部,对老干部也同样适用,就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会有同志问:现在我们是在建设,最需要学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什么实际意义?同志们,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俄国的十月革命和我们中国的革命,不就是这样成功的吗?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

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因此,我希望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 不存在根本矛盾^{*}

(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三日)

格隆瓦尔德(美国时代公司总编辑):中国共产党一直教育人民要大公无私,为人民服务。现在经济改革,你们教育人民要致富,出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你们准备采取什么办法解决这些问题?

邓小平: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这些问题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解决,也不可能靠几个人讲几句话就见效。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有能力逐步克服并最终消除这些消极现象。

格:这种现象是否反映了一个潜在的、很难解决的矛盾,即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矛盾?

邓: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回答提问的一部分。

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多年的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现在看得很清楚,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我们吸收外资,允许个体经济发展,不会影响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这一基本点。相反地,吸收外资也好,允许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也好,归根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当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我相信,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随着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目前社会上那些消极的现象也必然会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总之,我国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化建设。我们发挥社会主义固有的特点,也采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方法(是当作方法来用的),目的就是要加速发展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搞这些改革,走这样的路,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可喜的结果。中国不走这

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

麦克亨利(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教授、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你对现在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变动是否满意?是否认为他们会继续执行改革政策?

邓:请客人们注意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的情况。我们这次党代表会议采取了两个重要措施。一是总结过去七年的经验,为我国经济发展确定一个适宜的速度,并通过“七五”计划,为中国在本世纪内和下世纪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发展创造条件。二是从组织上解决政策连续性问题,即从中央开始逐步实现领导班子的年轻化,这次首先解决的是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

我们的政策是否有连续性,主要看两条。首先是看政策本身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政策不对,有什么必要连续呢?如果政策对,能推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使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这种政策本身就保证了它的连续性。其次要看执行政策的人。从中央到各个地方,都要有一批勇于探索、精力较好的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逐步实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当然还有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召开这次党代表会议是一九八二年十二大就决定的,因为当时党的领导机构的成员年龄偏高,所以决定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开一次党代表会议,中心目的是实现年轻化。

普拉格(美国《时代》杂志海外版编辑):我想问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问题。在你漫长的革命经历中,你多次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和方向。如果今后你不在了,你希望人民如何来怀念你?

邓：永远不要过分突出我个人。我所做的事，无非反映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党的这些政策也是由集体制定的。在“文化大革命”前，我也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那时候的一些错误我也要负责的，世界上没有完人嘛。

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七日)

抓精神文明建设,抓党风、社会风气好转,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经济犯罪的案件,在国外严重丧失国格人格的事件,还有搞特务的案件,都要抓紧处理。高级干部及其子女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现在确有个别干部子弟泄露经济情报,卷入了情报网,出卖消息,出卖文件。越是高级干部子弟,越是高级干部,越是名人,他们的违法事件越要抓紧查处,因为这些人影响大,犯罪危害大。抓住典型,处理了,效果也大,表明我们下决心克服一切阻力抓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那些小萝卜头漏掉一点关系不大,当然不是说就可以放松。我看,真正抓紧大有希望,不抓紧就没有希望。高级干部在对待家属、子女违法犯罪的问题上必须有坚决、明确、毫不含糊的态度,坚决支持查办部门。不管牵涉到谁,都要按照党纪、国法查处。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青海省杨小民那个案子^[63]拖了多年,几任省委书记没有解决,现在处理了,处理得好。就是要查处这样的案子,才会有震动。

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我最近看了一些材料,屡教屡犯的多得很,劳改几年放出来以后继续犯罪,而

且更熟练、更会对付公安司法机关了。对这样的累犯为什么不依法杀一些？还有贩卖妇女、儿童，搞反动会道门活动，屡教不改的，为什么不依法从重判处？当然，杀人要慎重，但总得要杀一些。涉及政治领域、思想领域的问题，只要不触犯刑律，就不受刑事惩处，不涉及死刑问题。但是对严重的经济罪犯、刑事罪犯，总要依法杀一些。现在总的表现是手软。判死刑也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育手段。（陈云^[44]同志：杀一儆百。杀一些可以挽救一大批干部。）现在一般只是杀那些犯杀人罪的人，其他的严重犯罪活动呢？广东卖淫罪犯那么猖獗，为什么不严惩几个最恶劣的？老鸨，抓了几次不改，一律依法从重判处。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64]，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个，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

书记处抓整顿风气抓得好，建议狠抓两年，抓出成效。这件事抓好了，就可以真正促进改革和建设。就是这样下决心抓，也要奋斗至少十年，才能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现在党中央的路线政策都好，改革和开放的方针必须坚持。但是管理工作和其他工作中的漏洞也不少，有些党员干部的作风和社会风气实在太坏了，在整顿风气中确实有些人要开除党籍，要清理一下。抓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十年的努力不行。十年育人嘛！“文化大革命”十年，青年一代中毒相当深，有些大学生闹事就是同这种遗毒有关。前两年抓整顿风气这件事，实际上在许多方面犹豫不决，明明白白的案子，

这里调查那里调查,这里批那里批,批了调查,调查了批,好几年处理不了。有些案子当断即断,抓住事件的主要问题,查清了就处理。也有个雷厉风行的问题啊!

从这次中央机关干部大会^[65]开始,要狠狠地抓。大会开了还不到十天嘛,各方面反应都很好。会上几位同志的讲话也算是中央一号文件,一九八六年一号文件嘛。

还是我们过去的想法,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为什么要有一条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人民内部的民主,而没有对破坏分子的专政,社会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把现代化建设搞成功。

今年开始,真正抓两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讲四个坚持,不能不讲专政,这个专政可以保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有力地对付那些破坏建设的人和事。

赞成书记处这么抓。

拿事实来说话^{*}

(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但发展不平衡。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农村地区还没有摆脱贫穷,主要是在西北干旱地区和西南的一部分地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

对这个政策有一些人感到不那么顺眼,我们的做法是允许不同观点存在,拿事实来说话。农村改革,开始的一两年里有些地区根本不理睬,他们不相信这条路,就是不搞。观望了一年,有的观望了两年,看到凡是执行改革政策的都好起来了,他们就跟随着走了。这里指的不是农民群众,主要是一些领导干部。所以,改革的政策,人们一开始并不是都能理解的,要通过事实的证明才能被普遍接受。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谈话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搞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全面改革,同农村改革一样,起初有些人怀疑,或者叫担心,他们要看一看。对这种怀疑态度,我们也允许存在,因为这是正常的。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即使在主张和提倡改革的人当中,保留一点怀疑态度也有好处。处理的办法也一样,就是拿事实来说话,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说服他们。

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要取得成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个是国内条件,就是坚持现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改革成功,会为中国今后几十年的持续稳定发展奠定基础。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我们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我们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改善关系,但是他们哪件事做得不对,我们就批评,就不投赞成票。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现行政策不能变,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政策都不能变。我相信,只要坚持现行政策,搞它几十年,中国会发展起来的。

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不放松,认真抓,就会有办法。对贪污、行贿、盗窃以及其他乌七八糟的东西,人民是非常反感的,我们依靠人民的力量,一定能够逐步加以克服。

坚持社会主义 ,坚持和平政策^{*}

(一九八六年四月四日)

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 ,到现在快三十七年了。这中间 ,中国走的道路很曲折 ,有顺利发展的时期 ,也有遭受挫折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 ,我们冷静地估计了形势 ,考虑今后的路怎么走。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 ,这次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和政策。

我们的改革 ,我们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 ,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 ,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 ,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 ,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过去很长一个时期 ,我们忽视了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生产力。我们总结了经验 ,就是要对外开放 ,打破闭关自守 ,对内搞活 ,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不这样 ,生产力发展不起来。搞平均主义 ,吃“大锅饭” ,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 ,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我们现在采取的措施 ,都是为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服务的。

对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 ,当时国际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主席弗拉伊科维奇时谈话的一部分。

舆论特别是西方世界的舆论,以为我们是搞资本主义,或者以为我们这样搞最终要走到资本主义。经过这几年改革的实践,他们慢慢懂得了,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

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日)

当前经济情况总的是不错的。前景如何,会遇到什么障碍,我想,是不是有两三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经济的发展。

一是农业,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上如果有一个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粗略估计一下,到二〇〇〇年,以十二亿人口每人八百斤计算,粮食年产量要达到九千六百亿斤。从现在起,每年要增产一百多亿斤才能达到这个目标。但是,现在粮食增长较慢。有位专家说,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少,农业生产水平降低,中国农业将进入新的徘徊时期。这是值得注意的。我们从宏观上管理经济,应该把农业放到一个恰当位置上,总的目标始终不要离开本世纪末达到年产九千六百亿斤粮食的盘子。要避免过几年又出现大量进口粮食的局面,如果那样,将会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

二是外汇问题。外汇短缺,外贸发生逆差,会不会拖我们的后腿?中国有很多东西可以出口。要研究多方面打开国际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的谈话。

市场,包括进一步打开香港、东南亚和日本市场。还要研究提高产品质量。我去年就说过,产品不能只讲数量,首先要讲质量。要打开出口销路,关键是提高质量。质量不高,就没有竞争能力。逐年减少外贸逆差是个战略性问题。否则,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就不可能,总有一天要萎缩下去。

三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设立许多公司,实际是官办机构,用公司的形式把放给下面的权又收了上来。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上半年经济发展速度比较低,就有这么一条原因。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一九八一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我看,改革总的进展比较顺利。通过改革,要取得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条件。现在,我们是背着大包袱前进,每年几百亿元价格补贴,越背越重。这个问题,总得有计划有步骤地妥善解决。权力不下放,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就没有责任,搞得好坏都是上面负责。全部由上面包起来,怎么能搞好工作,调动积极性?总之,改革要继续进行下去。

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八日)

从历史上讲,你们荣家^[66]在发展我国民族工业上是有功的,对中华民族做出了贡献。民族工业的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至于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次你们亲属团聚是一件喜事,是我们民族大团结的一个体现,一个演习。我们要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你们有本领、有知识,是能够为我们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现在我们有些条件还不怎么好,这不要紧,以后会逐步改善。

我们的国家是有希望的。我们的目标,第一步是到二
年建立一个小康社会。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要实事求是。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没有太富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时谈话的一部分。

人,也没有太穷的人,所以日子普遍好过。更重要的是,那时我们可以进入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以上的国家的行列,这样的国家不多。国家总的力量大了,那时办事情就不像现在这样困难了。比如,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办教育,就是五百亿美元,现在才七八十亿美元。如果拿出百分之五去搞国防,军费就可观了,但是我们不打算这样搞,因为我们不参加军备竞赛,总收入要更多地用来改善人民生活,用来办学。有了本世纪末的基础,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将更加强大,对世界和平就更加有利。我们欢迎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参与这个具有前景的事业。

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我们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我相信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是会热心支持我国的建设事业的。

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

(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中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直接管不合适。党要管党内纪律的问题,法律范围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党干预太多,不利于在全体人民中树立法制观念。这是一个党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我看明年党的十三大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把关系理顺。现在从党的工作来说,重点是端正党风,但从全局来说,是加强法制。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纠正不正之风中属于法律范围、社会范围的问题,应当靠加强法制和社会教育来解决。我们要把经验好好总结一下,使这方面工作来一个改善。

党管政府怎么管法,也需要总结经验。党政分开,从十一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

届三中全会以后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上次找几位同志谈经济工作的时候,我提到要注意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党政分开和下放权力。我想中央的领导同志,特别是书记处的同志,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允许用年把时间搞调查研究,把问题理一理,把主意拿好,然后再下手。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这半年端正党风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不要估计太高,现在还刚刚开始。我们说从今年起狠抓两年,实际上两年以后还要继续干这件事,当然不一定要设专门机构。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要贯穿在整个改革过程之中,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开放、搞活政策的正确执行。

视察天津时的谈话^{*}

(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九日——二十一日)

我这次来天津,要看看你们的开发区,看看市容,还要到港口看一看。

对外开放还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问题。天津开发区很好嘛,已经创出了牌子,投资环境有所改善,外国人到这里投资就比较放心了。

你们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点,发展快点。你们这里有些基础设施比上海好,有些事情办起来可能容易些。你们准备向外国借一百亿美元,有没有对象?可以多找一些国家。人家借给我们钱都不怕,我们怕什么?我向来不怕。十年时间,有一两个地方,借百把亿美元,只要讲效益,有什么危险,两百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上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

天津港下放两年来经济效益显著提高。人还是这些人,地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天津市负责同志的一些谈话。他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还是这块地 ,一改革 ,效益就上来了。无非是给了他们权 ,其中最重要的是用人权。

中环线搞得这么快 ,是不是搞了承包 ?就是要搞改革 ,搞承包 ,分段、分级承包 ,实行责任制。中山门蝶式立交桥的设计者干得好 ,破格批准他为工程师 ,应该 ,这是谁也不应反对的 ,这也叫改革。

改革 ,现代化科学技术 ,加上我们讲政治 ,威力就大多了。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 ,外国人就是不理解后面这一条。你们经常搞义务劳动 ,这也是政治嘛。

我的一贯主张是 ,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 ,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 ,带动大部分地区 ,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

把年轻干部放到第一线压担子 ,这个路子对 ,不能只靠人家扶着。他们受到了锻炼 ,提上来别人也会服气。

建设居民小区 ,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 ,看到了变化 ,就有信心 ,就高兴 ,事情也就好办了。

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日)

迈克·华莱士 :邓主任 ,您对戈尔巴乔夫最近在海参崴的讲话^[67]有何看法 ?

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有点新东西 ,所以我们对他的新的带积极性的东西表示了谨慎的欢迎。但戈尔巴乔夫讲话也表明 ,他的步子迈得并不大。在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后不久 ,苏联外交部官员也讲了一篇话 ,调子同戈尔巴乔夫的不一样。这就说明 ,苏联对中国政策究竟怎么样 ,我们还要观察。

迈 :您以前有没有见过戈尔巴乔夫 ?

邓 :没有。

迈 :您是否想见见他 ?因为他说过 ,他愿意同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谈任何问题。您愿意同他进行最高级会晤吗 ?

邓 :如果戈尔巴乔夫在消除中苏间三大障碍^[68] ,特别是在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和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走出扎扎实

^{*} 这是邓小平同志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电视采访时的谈话。

实实在的一步,我本人愿意跟他见面。

迈:越南人今天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中国谈判,以便结束中越之间的困难局面。

邓:越南这种表示至少有一百次了。我们也明确告诉他们,前提是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全部军队。柬埔寨问题由柬埔寨四方商量解决。

迈:所以,就邓小平和戈尔巴乔夫举行最高级会晤来说,球在戈尔巴乔夫一边。

邓:要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对这个问题,苏联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因为如果苏联不帮助越南,越南一天仗都打不了。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讲话一直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说,苏联在消除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迈的步子并不大。

迈:看来,中国同资本主义的美国的的关系比同苏联共产党人的关系更好一些,这是为什么?

邓:中国观察国家关系问题不是看社会制度。中美关系是看中国和美国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中苏关系是看中国和苏联关系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迈:邓主任,刚才我的节目制作人要我再问一下邓主任是否愿意会见戈尔巴乔夫。

邓:我刚才说了,如果苏联能够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就消除了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我再说一次,越南入侵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关系的主要障碍。越南在柬埔寨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的问题。只要这个问题消除了,我愿意跟戈尔巴乔夫见面。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年龄不小了,过了八十二了,我早已经完成了出国访问的历史任务。我是决心不出

国的了。但如果消除了这个障碍,我愿意破例地到苏联任何地方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相信这样的见面对改善中苏关系,实现中苏国家关系正常化很有意义。

迈:具体地说,哪一件事应该放在第一位做呢?

邓:三大障碍主要是越南侵柬,因为中苏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不过方式是通过越南军队同中国对峙。

迈:是指越南在柬埔寨的军队吗?

邓:是的。

迈:里根总统和夫人对我的节目很有兴趣,差不多每个星期天都看这个节目,在我的采访节目播出时,他们一定会观看。不知你有什么话对里根总统说?

邓:在里根总统和夫人访问中国时,我们认识了。我们相互间的谈话是融洽的和坦率的。我愿意通过你们的电视台,转达我对里根总统和夫人的良好祝愿。我希望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中美关系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迈:目前中美双方是否存在大的分歧问题?

邓:有。如果说中苏关系有三大障碍,中美关系也有个障碍,就是台湾问题,就是中国的海峡两岸统一的问题。美国有一种议论说,对中国的统一问题,即台湾问题,美国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这个话不真实。因为美国历来是介入的。在五十年代,麦克阿瑟^[69]、杜勒斯^[45]就把台湾看作是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所以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建交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

迈:美国在处理美台关系时是否未能按照它承担的义务去做?

邓 :我认为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明智的态度。

迈 :什么态度 ?

邓 :很遗憾地说 ,在卡特^[38]执政的后期 ,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39] ,这就变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很大的障碍。刚才我说 ,希望里根总统执政期间 ,能够使中美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其中就包括美国在中国统一问题上能有所作为。我相信 ,美国特别是里根总统 ,在这个问题上是能有所作为的。

迈 :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能有哪些作为呢 ?

邓 :可以鼓励、劝说台湾首先跟我们搞“三通” :通商、通航、通邮。通过这种接触 ,能增进海峡两岸的相互了解 ,为双方进一步商谈统一问题创造条件。

迈 :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 ?

邓 :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 ,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 ,都希望中国能统一 ,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其次 ,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 ,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 ,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第三点理由是 ,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大陆搞社会主义 ,台湾搞它的资本主义。这对台湾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改变 ,台湾人民没有损失。至于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发展程度 ,这个问题要客观地看。差距是暂时的。拿大陆来说 ,我们建国三十七年来 ,有些失误 ,耽误了 ,但根据大陆的现行政策 ,发展速度不会慢 ,距离正在缩小。我相信大陆在若干年内至少不会低于台湾的发展速度。道理很简单 ,台湾资源很缺乏 ,大陆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说台湾已发挥了自己的潜力 ,大陆的潜力还没有发

挥,肯定会很快发挥出来的。而且就整体力量来说,现在大陆比台湾强得多。所以单就台湾国民平均收入比大陆现在高一些这一点来比较,是不全面的。

迈:中国谈到,搞现代化,发展经济,需要西方的资金,但现在西方投资者抱怨同中国做生意太难,存在一些问题,房租太高,谈合同争吵不休,各种税收名目繁多,劳动力太贵,贪污、受贿,还存在着官僚主义。您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邓:我了解,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同西方做生意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新事物,有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外国投资者有这些意见,我能理解。投资不赚一点钱,那不可能,那谁愿意来?我们正在采取一些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还会有新的问题产生,还要加以解决。作为领导来说,要摸清情况,采取措施,包括教育干部。

迈:现在中国领导提出致富光荣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这个口号同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

邓:我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关于共产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种观点,宁要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时就批驳了这种观点。正因为这样,当然还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当时我告诉他们没有穷的共产主义,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社会是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因为物质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当然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不能有穷的

共产主义,同样也不能有穷的社会主义。致富不是罪过。但我们讲的致富不是你们讲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我看到现在农民生活得很好,有摩托车、彩电,自己盖新房。你们采取措施,鼓励他们致富。他们把一部分收入交给国家,其余部分归自己。这跟我们的制度差不多,我们的人交完税,其余的就归自己。

邓:我们的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还有其他经济成分。现在在农村受到赞扬的有些万元户,一万元不过二三千美元,还是一年的收入,能够算富吗?我们就算富了,那能有多少?比起发达国家来,人均国民收入还是很低的。

迈:邓主任刚才谈到“文化大革命”,在那时候您和您的家人遭遇如何?

邓: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任何公众场合挂您的照片,这是为什么?

邓：我们不提倡这个。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任何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得出来的。所以就我个人来说，我从来不赞成给我写传。我这个人，多年来做了不少好事，但也做了一些错事。“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也有一些过失，比如“大跃进”^[54]这个事情，当然我不是主要的提倡者，但我没有反对过，说明我在这个错误中有份。如果要写传，应该写自己办的好事，也应该写自己办的不好的事，甚至是错事。

迈：还有两个问题。您说过，您要活到一百岁，然后可以去见马克思，到那时候，马克思旁边可能还坐着毛泽东，他们可能对您说些什么？

邓：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词叫共产主义。我们过去干革命，打天下，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因为有这个信念，有这个理想。我们有理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以我们才能取得胜利。革命胜利以后搞建设，我们也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事。

迈：每个人都会问这样的问题：在过去几年中，邓小平干得不错，现代化搞得不错，经济在发展，人们不像以前那样担心害怕，但邓小平以后情况会怎样？是否会回到以前的状况？

邓：肯定不会。因为确定现行政策会不会发生变化的主要根据是，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改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

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

迈:毛泽东逝世已经十年,他对现在的一些事会怎么看?现在的领导人主张致富光荣,主张个人幸福,允许私人办企业,准备搞政治改革,人民有了言论自由,这一切同毛泽东的主张都不一样,毛泽东会怎么看?

邓:有些不一样,但有些原则还是一样的。现在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指导思想。我们有一个《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6],解答了这些问题。

迈:但我还是不清楚。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和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是不一样的。看来中国现在在进行一场新的革命,至少是试图进行一场新的革命。

邓:这个话是对的,我们也讲现在我们搞的实质上是一场革命。从另一个意义来说,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对我们来说,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进。既然是新事物,难免要犯错误。我们的办法是不断总结经验,有错误就赶快改,小错误不要变成大错误。

迈:最后一个问题。您是中国的第一号领导人物,您准备在主要领导人和主要顾问的位子上再留多长时间?

邓:我提倡废除终身制,而且提倡建立退休制度。你也知道,我同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谈话时说,我干到一九八五年就行了,现在超过一年了。我正在考虑什么时候退休。就我个人来说,我是希望早退休。但这个问题比较困难,在党内和人民当中很难说服。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但这件事还要做更

多的说服工作。最终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 ,要服从人民的意愿。我还是希望能够说服人民。

迈 :您当时告诉法拉奇准备一九八五年退休 ,您准备对华莱士作什么表示呢 ?

邓 :坦率地告诉你 ,我正在说服人们 ,我明年在党的十三大时就退下来。但到今天为止 ,遇到的是一片反对声。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一月)

—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一九八六年九月至十一月的四次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内容节录。

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会见日本公明党
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二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改革总要有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

一个蓝图。在改革中 ,不能照搬西方的 ,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 ,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 ,可能也有问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
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

三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 :第一 ,巩固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 ,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 ;第三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 ,还是发展生产力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 ,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 ,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 ,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 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 ? 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
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
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四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起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

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会见日本首相
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在党的十二届 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一九八一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草案)时的讲话。

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要发展 ,离不开科学^{*}

(一九八六年十月十八日)

对于科学我是外行 ,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 ,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 ,我们还比较落后。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 ,是一个重要的创举 ,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刚起步 ,也许本世纪末可以看到比较显著的进步 ,真正的进步要到下个世纪的三十至五十年。中国的特点是又大又落后 ,办起事情来不容易。对于你们的帮助 ,我非常感激。当然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从现在的状况看 ,是有希望的。

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 ,我们要共同努力。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 ,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 ,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

发展高科技 ,我们还是要花点钱 ,该花的就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 ,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夫妇和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夫妇时的谈话。

速器^[70]？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决心下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在高科技方面，我们要开步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而且要花更多的钱，所以从现在起就要开始搞。

悼 伯 承

(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一日)

伯承^[71]久病,终于不治。我和他长期共事,相知甚深。他的辞世,使我至为悲痛。

伯承早年从军,戎马一生。在辛亥革命后的护国护法战争中,他就是“手执青锋卫共和”的一员猛将。我至今保存着他赠给的一九一五年所摄的照片,那时,他二十二岁,风华正茂,雄姿英发。就在第二年讨袁战争的四川丰都之役,他率部冲锋陷阵,头部连中两弹,失去右眼。他在大半个世纪中,指挥了无数次战役战斗,九处负伤,屡建战功,以足智多谋的“独目将军”闻名于世。

我认识伯承,是一九三一年在中央苏区。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我们一起工作,是一九三八年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个师长,一个政治委员,以后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前后共事十三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伯承善于与同志团结共事的高尚风格,在今天仍是我们领导干部的表率。

伯承同志党性坚强,突出表现在考虑问题从党的全局出发,事事顾全大局,服从大局。为了党的整体利益,他总是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和局部的利益,总是主动挑起最艰巨最危险的任务,兢兢业业,排除万难去圆满完成。长征开始前,他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到五军团去当参谋长。他忍辱负重,积极工作。长征一开始,伯承率五军团担负了最艰巨的殿后任务,同数倍于我的敌人展开恶战,保护了中央机关的安全。后来他又担任先遣司令,率领部队斩关夺隘,为长征开辟前进道路。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他坚决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对张国焘^[72]另立中央、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党性坚强的高贵品质。解放战争的第二年,中央决定晋冀鲁豫十万大军挺进大别山,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当时有的干部对执行这一任务有顾虑,伯承对他们说,这个行动可以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上来,减轻兄弟野战军的压力。釜底抽薪,焉能惧怕烫手,即使作出牺牲,也义无反顾。伯承这种态度,堪称执行党的各项决议和中央战略方针的典范。

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他熟谙兵法,博采古今中外军事学术精华,运用于中国的革命战争。他用兵作战最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判断敌情准确,计划战斗周密,长于出奇制胜,就连敌人也不得不佩服他的神机妙算。作战指挥上的神机妙算,用伯承的话说,就是首先要靠弄清楚

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形。他把这五个要素比作五行,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伯承最反对军事指挥上墨守成规,粗枝大叶,大而化之。他常用“烧香找错庙门”、“蚊子叮泥菩萨,看错了对象”等四川俗话,幽默诙谐地批评那些不重视侦察和调查,指挥莽撞,办事马虎的同志。伯承善于总结经验,把军事实践上升到理论高度,又善于创造性地用理论指导军事实践。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伯承是有大贡献的。说伯承同志的军事理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恰如其分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伯承的战略眼光不仅表现在战场上面,也表现在他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高瞻远瞩。当我军还处在小米加步枪的年代,他就从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前景,来考虑我军的建设问题。一九四六年下半年,正是晋冀鲁豫解放区战事频繁的时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种情况下,他还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补译、校订《合同战术》一书。他很欣赏苏联著名话剧《前线》,多次强调不要做戈尔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欧格涅夫那样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对新形势下的作战特点,最早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我军建设战略位置的领导人之一。大陆解放不久,他从军事建设的全局出发,给中央写信,恳请辞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职务,自告奋勇去办陆军大学(后命名为军事学院)。为造就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的干部,伯承呕心沥血,在仅剩的一只左眼视力也已严重减退的情况下,还拿着放大镜,将上百万字的外国军事译著和大量的自编教材加以校订和审定。他在军事学

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伯承非常重视政治工作,不但对政治委员,而且对政治机关的工作人员都很尊重。他下部队,总要请政治机关派人一起去。不是为了替他写讲话稿,或者为他本人的活动写新闻报道,而是把他们看作政治机关的代表,遇事随时随地同他们商量;在作军事部署的时候,便于他们及时布置政治工作。当他要向部队传达中央指示或作政治动员时,往往把自己起草的讲话提纲送政治机关阅改。他这样做,不只是出于谦虚,更是出于把政治工作看成我军的生命线。他一贯关心干部战士的政治思想教育,关心政治工作建设。可以说,他是我军高级军事指挥员中重视和善于做政治工作的模范。

伯承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拯民于水火”,正是这种博大的胸襟,使伯承从旧民主主义者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许多忧国忧民之士一样,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看清楚了,要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除了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别无他途。伯承在一九二四年就接触了共产党人,但他没有马上参加共产党的组织,而是在经过了两年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之后,才确定了自己的政治选择。一旦看准了,选定了,他就为实现自己的信仰鞠躬尽瘁,万死不辞。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从民主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年代,从指挥作战到治学办校,顺境也好,逆境也好,无论何时何地,客观环境有什

么变化,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一切贡献于、服从于党的需要,把自己融合于党的事业之中,毫无个人荣辱得失的考虑,真正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一九四二年冬天,太行山区军民和延安的同志祝贺伯承五十寿辰的时候,他曾说过:离开党,像我们这些人,都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他接着还说了这样一段话:如果我去世的时候,能在我墓上立一块碑,上书中国布尔什维克刘伯承之墓,那就是我莫大的安慰。

回顾伯承为共产主义事业所走过的战斗历程,他的卓越贡献,他的坚强党性,中国布尔什维克——这个意味着真正共产党人的光荣称号,他是受之无愧的。

用坚定的信念 把人民团结起来^{*}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

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有了这样的团结，任何困难和挫折都能克服。过去我们打败国民党用美国装备武装起来的几百万现代化军队，就靠这一条。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所以我说，人的因素重要，不是指普通的人，而是指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而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对我们军队来说，有坚定的信念现在仍然是一个建军的原则，仍然不能丢掉，这是中国自己的特点。在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谈话的节录。

军队里要讲信念,在人民中间,在青年中间,也要讲信念。首先要向青年进行有理想、有纪律的教育。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许多青年崇拜西方的所谓自由,但什么叫自由他们并不懂。要使他们懂得自由和纪律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企业改革和金融改革^{*}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我们的改革到底要走几步？多长时间完成？请你们研究一下。

从长远看，粮食问题很重要，要通过改革解决农业发展后劲问题。企业改革，主要是解决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

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积极性，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个问题在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上还没有解决，主要是受老框框的束缚。其实，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手段、方法，既可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

企业下放，政企分开，是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下放总会遇到障碍。现在机构臃肿，有的部委据说有上万人，必须精简。否则，这么多人，就要当“婆婆”，揽权。这些人在中央机关工作多年，多数都有一定知识，到基层竞选厂长经理，显示自己的本领去嘛！

要搞企业联合。现在电子工业是否太分散了，为什么不可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和明年改革设想时的谈话要点。

以左邻右舍挂钩,联合起来搞。太分散,各搞各的不行,那样质量上不去。汽车工业如何组织起来,也要研究一下。汽车出口我们应该是可以做到的。形成企业集团,就形成力量,信息也就比较灵通了。

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我们过去的银行是货币发行公司,是金库,不是真正的银行。对金融问题,我们知识不足,可以聘请外国专家做顾问嘛。

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要注意这两方面的经验。借外债不可怕,但主要要用于发展生产,如果用于解决财政赤字,那就不好。

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

总之,今年的经济情况不错,比预料的还好。我们的改革是有希望的。

旗帜鲜明地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学生闹事^[73],大事出不了,但从问题的性质来看,是一个很重大的事件。凡是冲天安门的,要采取坚决措施。北京市既然公布了游行示威的规定,就是法律性质的,必须坚决执行,不能让步。我们对学生闹事,前一段主要采取疏导的方法,是必要的。疏导,也包括运用法律的手段。如果破坏社会秩序,触犯了刑律,就必须坚决处理。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这也不是一个两个地方的问题,也不是一年两年的问题,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就出在这里。这件事发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们。

我看了方励之^[74]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留在党内干什么?不是劝退的问题,要开除。有的人并没有放弃他的观点,但这次学生闹事他表示不参加,这就好嘛!你的观点可以保留,只要你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行动。上

* 这是邓小平同志关于学生闹事问题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海的王若望^[75]猖狂得很,早就说要开除,为什么一直没有办?上海的群众中传说中央有个保护层,对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否要反对自由化,也有两种意见。因此,闹起事后,上海人要看一看。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没有什么输理的。四项基本原则必须讲,人民民主专政必须讲。要争取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人民民主专政不行,不能让那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造谣诬蔑的人畅行无阻,煽动群众。前几年,我们不是对那几个搞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依法处理了吗?难道因此中国的名誉就坏了吗?中国的形象并没有因此而变坏,我们的名誉还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

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

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这个道理已经得到证明,将来还会得到证明。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

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所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没有专政手段是不行的。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要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我们的方针是首先揭露他们的阴谋,尽量避免流血,宁可我们自己人被打伤,对为首闹事触犯刑律的依法处理。不下这个决心是制止不了这场事件的。如果不采取措施,我们后退了,以后麻烦会更多。

在这次学生闹事中,民主党派表现是好的,周谷城、费孝通、钱伟长^[76]等几位著名的民主人士的态度是好的,不好的倒是我们有些共产党员。

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可能会引起波浪,那也不可怕。对方励之、刘宾雁^[77]、王若望处理要坚决,他们狂妄到极点,想改变共产党,他们有什么资格当共产党员?

在六中全会^[78]上我本来不准备讲话,后来我不得不讲了,必须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那一段话,看来也没有起什么作用,听说没有传达。

反对精神污染的观点,我至今没有放弃,我同意将我当时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全文收入我的论文集^[79]。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二十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

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党也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80],有太过火的地方,应当平反。但我们对它没有全盘否定。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国人说我们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要让外国人看到中国政局是稳定的。如果搞得乱七八糟、一盘散沙,那还有什么希望?过去帝国主义欺侮我们,还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盘散沙?

处理学生闹事是一件大事,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人民日报》三篇文章^[81]写得不错,《北京日报》社论《大字报不受法律保护》写得也不错,李瑞环在天津的讲话^[82]也不错。正因为态度鲜明了,给积极分子鼓了气,中间群众才能站过来。领导态度坚决了,就闹不起来了。

排除干扰 , 继续前进^{*}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三日)

最近 , 我们有些学生闹事^[73]。这次闹事的性质同前年“九一八”时学生上街^[83]不同。我们正在处理这个问题。我们重视的不是仅占全国大学生百分之一多一点、不到百分之二的一小部分学生的闹事。问题不在这里 , 几个学生上街影响不了大局。问题在于我们思想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混乱 , 对青年学生引导不力。这是一个重大失误。我们要改变这种引导不力的软弱状态 , 要用我们自己的历史来教育青年 , 也要揭露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 因为他们这次的口号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有些人在搞煽动 , 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 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 , 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 , 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里。共产党要有纪律。世界上不管什么党都有自己的纪律。这次主要是检查这样的问题。

学生闹点事 , 影响不大 , 搞不垮我们。我要告诉朋友们 , 这样的事情 , 我们会妥善处理的。即使再闹得大一些 , 也影响不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谈话的一部分。

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既定的政策。处理这样问题的结果,只会使我们的政治局面更加安定,更加团结;只会使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包括开放、改革、建设的方针政策,更加顺利地、稳步地、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当然,我们也会在处理这种事情的过程中,总结经验,逐步消除弊端,如消除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等等。这样做,最终会使坏事变成好事,使领导者更加清醒,使人民更加清醒。

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简单。我们从来没有自我陶醉,没有认为会一帆风顺。一定会有来自多方面的干扰,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如果说我们过去对“左”的干扰注意得多,对右的干扰注意不够,那末这次学生闹事提醒了我们,要加强注意右的干扰。我们必须排除干扰。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设,更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这些都搞不成。开放不简单,比开放更难的是改革,必须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如果没有秩序,遇到这样那样的干扰,把我们的精力都消耗在那上面,改革就搞不成了。总之,我相信我们以后做的事情将更加证明我们的现行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只要我们八年来的发展趋势继续下去,注意排除各方面的干扰,继续发展,继续前进,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问题就会逐步获得解决。

学生闹事,要向他们讲清楚危害在哪里,这就不能对他们只用拍拍肩膀的办法。要把是非讲清楚,要把利害讲清楚。是非是涉及我国根本利益的是非,利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能不能达到本世纪目标和下个世纪目标的重大利害。这才是对青年的爱护,对青年的真诚引导。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极端个人主义。而现在有些人却想把我们的社会引到无法无天的境地,这怎么行呢?连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允许无法无天,何况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诸位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要告诉朋友们,学生闹事不会出大问题,不会影响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改革、开放的政策。这件事既提醒了我们自己,也提醒了朋友们,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中国有十亿多人口,几十个民族,建国后三十多年又经历了曲折的历史,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不奇怪。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影响不了我们的政策,因为我们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正确的,人民得到了利益。“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

加强四项基本原则教育， 坚持改革开放政策^{*}

（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日）

最近我们这里发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学生闹事^[73]，二是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我们已经作了处理。为什么学生会闹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们领导上的软弱。我们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需要经常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人民。这几年来，一直存在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但反对不力。尽管我多次强调要注意这个问题，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党的领导不力。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误。所以党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辞去总书记职务的请求。学生闹事和总书记更换都不是小事，但我们党有足够的力量处理这些事情。我们对胡耀邦同志问题的处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说是处理得非常温和，问题解决得也很顺利。学生闹事，也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件事的处理，都不会影响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会影响我们对内、对外开放的政策，不会影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不会影响政治体制的改革，而只会使我们的党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们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尽管发生了这两件事，一切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谈话的一部分。

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这是我要告诉同志们的。

八年来,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顺利的贯彻,国家得到了明显的发展,人民生活确实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学生闹事也否认不了这个现实。八年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我们政策的制定立足于中国的实际情况,立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现实的,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个长期奋斗的过程。建国以来我们犯的几次错误,都是由于要求过急,目标过高,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结果发展反倒慢了。搞社会主义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国家要取得真正的政治独立,必须努力摆脱贫困。而要摆脱贫困,在经济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要立足于自己的实际,不要给自己设置障碍,不要孤立于世界之外。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中国执行开放政策是正确的,得到了很大的好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就是开放得还不够。我们要继续开放,更加开放。因为我们的承受能力比较大,加上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即使有一些消极的东西也不会影响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教育人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就为我们事业的健康发展从根本上提供了保证。

计划和市场都是 发展生产力的方法^{*}

(一九八七年二月六日)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

前一段出了点差错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那么大惊小怪。不要怕,一怕就不能搞改革了。我倒觉得,我们是否搞得过稳了。当然在目前情况下,学生闹事^[73]不久,稳一点好,但从长远来说,改革的步伐不能太慢。

十三大^[84]报告要在理论上阐述什么是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的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要申明四个坚持的必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必要,改革开放的必要,在理论上讲得更加明白。十三大报告应该是一篇好的著作。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

(一九八七年二月十八日)

大学生闹事^[73],主要责任不在学生,而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其中主要是少数党内高级知识分子。我们严肃地处理了这件事。但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还没有结束。对于中国现在干的究竟是什么事情,有些人还没有搞清楚。我们干四个现代化,人们都说好,但有些人脑子里的四化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不同。我们脑子里的四化是社会主义的四化。他们只讲四化,不讲社会主义。这就忘记了事物的本质,也就离开了中国的发展道路。这样,关系就大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这个斗争将贯穿在实现四化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本世纪内要进行,下个世纪还要继续进行。正因为斗争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不搞运动,主要是进行教育。既是斗争的过程,也是说服教育的过程,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如果我们本世纪内达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们清醒一点;到下世纪中叶我们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社会主义国家时,就会大进一步地说服他们,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才会真正认识到自己错了。现在看,实现我们确定的宏伟目标有希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时谈话的一部分。

望。

这些年总的发展不错,国家情况好,人民生活逐步提高。学生们放假回家,可以看到自己家里生活确实发生了变化,父母也要给他们上课的。所以,学生闹事这类问题对中国影响不会很大,更不会改变我们的现行方针和政策。至于我们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辞职,这与学生闹事这件事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一人事变动对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影响,就是说我们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可能执行得更好。总之,我们是一切照旧干下去,我们的决心更加强了。

学生们闹一下的好处,是提醒我们好好总结这几年的发展经验,使我们更清楚了问题在哪里。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只有消除消极因素,才能更好地实现发展。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因此,我们特别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时提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说服教育工作,同社会不良风气包括特权思想进行斗争。“文化大革命”带坏了一代人。所以,我们提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就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提出的理想与我们的不同。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他们却提倡资本主义理想。中国从鸦片战争^[32]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后来,孙中山觉得资本主义西方不行了,提出“以俄为师”^[85],学习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开始

了国共合作,导致北伐战争的胜利。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总之,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同时也认识到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能丧失警惕。斗争要求我们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注意经常总结经验。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

(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我们最近遇到的麻烦已经过去了。事实终将证明我们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符合全国人民利益的,人民也会更进一步地理解我们现在采取的方针、办法、措施是合情合理的。拿中央的人事变动来说,我们历来对待这样性质的事总是过分,鉴于过去的经验教训,我们这次用很温和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我们不搞运动,尽量缩小这个问题的范围,减轻这个问题的性质和分量。世界上有些议论,说中国会不会因此而改变既定的方针政策。不会的。搞了八年了,既然是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为什么要改变?

有两条要讲一下。第一条,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条,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谈话的一部分。

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摆脱落后状态,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建设。闹事就使我们不能安心建设,我们已经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样一闹,就会出现新的“文化大革命”。这次闹事的学生多半是大学一二年级、二十岁以下的青年,他们没有社会实践经验。今年放寒假回去后,几乎每个家庭都给学生上了课。他们看看左邻右舍,同时又跑了一些地方,看到这几年搞的事情对每个家庭都有好处。所以,很多人回校后承认他们原来的认识和行动不对。当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个长期教育的问题,同四个现代化建设将是并行的。为了刹住一个时期的势头,例如对这次学生闹事,需要采取一些比较紧迫的办法,但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长期的事。四个现代化,我们要搞五十至七十年,在整个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存在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既然是长期的事,不可能搞运动,只能靠经常性的说服教育,必要时采取一些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是要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保证有秩序地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

我们历来提倡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理想、有纪律。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很多人只讲现代化,忘了我们讲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搞四个现代化,使中国发展起来,就要有纪律、有秩序地进行建设。这些是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这样讲的,从来没有变过。我们只是坚持既定的方针、政策,坚持原来的路线。

中国的改革遇到的困难并不算多,总的比较顺利。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有领导有秩序地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一九八七年三月八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第一条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条是搞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确定了两个阶段的目标,就是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在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实现这两个阶段的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根据这一方针,我们制定了两个开放的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不行。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做到既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又能保证我们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

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时候,已经意识到将带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消极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姆维尼时谈话的一部分。

影响。西方好的东西,应该借鉴、学习。但开放也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影响人们的思想,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所以我们同时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有人说我们改变了方针政策,那是一种误解。我相信我们的方针政策将会更好更顺利地得到贯彻,包括领导人逐步年轻化的方针也要继续贯彻。今年下半年,我们要召开党的十三大^[84],大家看了十三大的结果就会清楚。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我们的改革和开放都将继续进行下去。

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至少在本世纪剩下的十几年,再加上下个世纪的头五十年,都存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去年九月召开的党的六中全会上,有的同志主张在《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中不要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胡耀邦同志实际上就持这种观点。我在那个会上讲了话。当时我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还要讲十年到二十年。今天,我又加上五十年。因为如果不讲,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而是乱哄哄的。既然这是个长期的任务,我们就不能搞运动,方法以教育、引导为主。当然,如果有人搞得我们总是不安宁,也不能排除使用某种专政手段,使用纪律、法律手段。总之,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以便进行改革和建设。

我们实行的民主不是搬用西方的民主。最近我同美国人谈话时讲过,中国只有坚持搞社会主义才有出路,搞资本主义

没有出路^[86]。中国不能乱哄哄的,只有在安定团结的局面下搞建设才有出路。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这也不是今天才讲的,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讲的,以后更要这样做。要用这个道理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这就是最近我们处理学生闹事的原则和方法。这类问题不但今天有,在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会存在。

八年来,我们取得了建设的经验和可喜的成果,这证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政策是正确的。第一个十年,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一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估计不成问题,可以提前完成。第二个十年,即从一九九一年到本世纪末,再能一番,从发展趋势看也是可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八年中人民生活确有明显改善。到本世纪末,尽管我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八百到一千美元不算多,但是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超过一万亿美元。有了这个基础,再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有希望的。

当然,对这次学生在游行中提出的我们国家中确实存在着的一些弊端,诸如官僚主义、机构臃肿、不正之风等,要重视,要注意解决。因此,经济体制要改革,政治体制也要改革。大体前景就是这样。

怎样评价 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这八年,我们在这三个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人口多,国家大,基础又很薄弱,办事困难很多,但是有希望。

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的特色。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样的思想,力求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我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没有积极性,国家就发展不起来。八年前我们提出农村搞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是很成功的。农民积极性提高,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大量农业劳动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喀麦隆总统比亚时谈话的一部分。

力转到新兴的城镇和新兴的中小企业。这恐怕是必由之路。总不能老把农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那样有什么希望？

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起草委员会委员时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四月十六日)

今天没有别的,同大家见见面,快两年时间没有见面了,应该对你们道道辛苦嘛!

你们委员会工作了一年零八个月,靠大家的辛苦、智慧,工作进展是顺利的,合作是好的,这样香港会过渡得更好。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起草工作还有三年时间,要把它搞得非常妥当。

今天我想讲讲不变的问题。就是说,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回到祖国以后五十年政策不变,包括我们写的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我还要说,五十年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对澳门的政策也不变,对台湾的政策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五十年也不变,我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政策也不变。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八百至一千美元,看来一千美元是有希望的。世界上百几十个国家,那时我们恐怕还是在五十名以下吧,

但是我们国家的力量就不同了。那时人口是十二亿至十二亿五千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一万至一万二千亿美元了。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是共同富裕,那时候我们叫小康社会,是人民生活普遍提高的小康社会。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础,再过五十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虽然还是在几十名以下,但是中国是个中等发达的国家了。那时,十五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就是六万亿美元,这是以一九八一年美元与人民币的比价计算的,这个数字肯定是居世界前列的。我们实行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国家力量不同了,人民生活也好了。

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呢?第一条,需要政局稳定。为什么我们对学生闹事问题^[73]处理得这么严肃,这么迅速呢?因为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一切要从大局出发。中国发展的条件,关键是要政局稳定。第二条,就是现行的政策不变。我刚才说,要从我们整个几十年的目标来看这个不变的意义。比如说,现在我们国内人们议论雇工问题,我和好多同志谈过,犯不着在这个问题上表现我们在“动”,可以再看几年。开始我说看两年,两年到了,我说再看看。现在雇工的大致上只是小企业和农村已经承包的农民,雇工人数同全国一亿多职工相比,数目很小。从全局看,这只不过是小小的一点。要动也容易,但是一动就好像政策又在变了。动还是要动,因为我们不搞两极分化。但是,在什么时候动,用什么方法动,要研究。动也就是制约一下。像这样的事情,我们要考虑到不要随便引起动荡甚至引起反复,这是从大局来看问题。重要的是,鼓励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发展我们的经济,有开拓的

精神,而不要去损害这种积极性,损害了对我们不利。

一个是政局稳定,一个是政策稳定,两个稳定。不变也就是稳定。如果到下一个五十年,这个政策见效,达到预期目标,就更没有理由变了。所以我说,按照“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统一问题后,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还会不变。当然,那时候我不在了,但是相信我们的接班人会懂得这个道理的。

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写在宪法上的。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没有哪个人有这个胆识,哪一个党派都不行。你们看我这个讲法对不对?没有一点胆略是不行的。这个胆略是要有基础的,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没有点勇气是不行的,这个勇气来自人民的拥护,人民拥护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忽略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带有片面性嘛!看中国的政

策变不变,也要看这方面变不变。老实说,如果这方面变了,也就没有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要保持香港五十年繁荣和稳定,五十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就要保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讲不变,应该考虑整个政策的总体、各个方面都不变,其中一个方面变了,都要影响其他方面。所以请各位向香港的朋友解释这个道理。试想,中国要是改变了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香港会是怎样?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也会吹的。要真正能做到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以后也不变,就要大陆这个社会主义制度不变。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现在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这个你们比我们更清楚,确是很不容易。这个“不变”的问题,是人们议论纷纷的问题,而且我相信,到本世纪末、到下世纪还要议论。我们要用事实证明这个“不变”。

现在有人议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收。我要说,我们的物价有点问题,对基本建设的投资也收紧了一点。但问题要

从全局看。每走一步都必定会有收，有的放，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的是要开放。我们的开放政策肯定要继续下去，现在是开放得不够。我们的开放、改革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胆子要大，要坚决。不开放不改革没有出路，国家现代化建设没有希望。但在具体事情上要小心，要及时总结经验。我们每走一步都要总结经验，有些事进度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哪些还要收一收，没有这条是不行的，不能蛮干。有些人看到我们在某些方面有些紧缩，就认为政策变了，这种看法是不妥当的。

“一国两制”也要讲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里允许一些特殊地区搞资本主义，不是搞一段时间，而是搞几十年、成百年。另一方面，也要确定整个国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否则怎么能说是“两制”呢？那就变成“一制”了。有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人希望中国大陆变成资本主义，叫做“全盘西化”。在这个问题上，思想不能片面。不讲两个方面，“一国两制”几十年不变就行不通了。

美国记者华莱士曾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台湾要同大陆统一？我回答说，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32]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等一

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

还想讲点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过去我曾经讲过,基本法不宜太细。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香港现在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这样也过了一个半世纪了。现在如果完全照搬,比如搞三权分立,搞英美的议会制度,并以此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对这个问题,请大家坐到一块深思熟虑地想一下。关于民主,我们大陆讲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我们并不反对西方国家这样搞,但是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当然,如果政策搞错了,不管你什么院制也没有用。对香港来说,普选就一定有利?我不相信。比如说,我过去也谈过,将来香港当然是香港人来管理事务,这些人用普遍投票的方式来选举行吗?我们说,这些管理香港事务的人应该是爱祖国、爱香港的香港人,普选就一定能选出这样的人来吗?最近香港总督卫奕信讲过,要循序渐进,我看这个看法比较实际。即使搞普选,也要有一个逐步的过渡,要一步一步来。我向一位外国客人讲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十亿人口,人民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

熟。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他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要切合实际,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中央确实是不干预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也不需要干预。但是,特别行政区是不是也会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呢?难道就不会出现吗?那个时候,北京过问不过问?难道香港就不会出现损害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能够设想香港就没有干扰,没有破坏力量吗?我看没有这种自我安慰的根据。如果中央把什么权力都放弃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混乱,损害香港的利益。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大家可以冷静地想想,香港有时候会不会出现非北京出头就不能解决的问题呢?过去香港遇到问题总还有个英国出头嘛!总有一些事情没有中央出头你们是难以解决的。中央的政策是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也希望香港不会出现损害国家利益和香港利益的事情。要是有的话?所以请诸位考虑,基本法要照顾到这些方面。有些事情,比如一九九七年后香港有人骂中国共产党,骂中国,我们还是允许他骂,但是如果变成行动,要把香港变成一个在“民主”的幌子下反对大陆的基地,怎么办?那就非干预不行。干预首先是香港行政机构要干预,并不一定要大陆的驻军出动。只有发生动乱、大动乱,驻军才会出动。但是总得干预嘛!

总的来说,“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

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社会主义必须摆脱贫穷^{*}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确定了现行的方针政策。这八年多,我们的事情干得比较好。过去耽误太多,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自己找麻烦,自己遭灾,不过教训总结起来很有益处。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实际。我们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相信你们是理解的。

我们过去固守成规,关起门来搞建设,搞了好多年,导致的结果不好。经济建设也在逐步发展,也搞了一些东西,比如原子弹、氢弹搞成功了,洲际导弹也搞成功了,但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结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而坚持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状态,大大发展生产力,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我们整个工作的重点转到建设四个现代化上来,把建设四个现代化作为几十年的奋斗目标。同时,鉴于过去的教训,必须改变闭关自守的状态,必须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开放是两个内容,一个对内开放,一个对外开放。我们首先开放农村,很快见效。有的地方一年翻身,有的地方两年翻身。农村取得经验之后,转到城市。现在城市改革已经搞了近三年的时间,要做的事情还多得很。对外开放,也很快收到成效。

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困难比较多,特别是人口太多,现在就有十亿五千万,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一九八四年第四季度到一九八五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但也带来一些问题。所以要调整一下,收缩一下。这也是好事情,我们取得了经验。

总的来说,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如果达到这一步,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更加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

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

所以,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搞社会主义,搞四个现代化,有“左”的干扰。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着重反对“左”,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左”。但是也有右的干扰。所谓右的干扰,就是要全盘西化,不是坚持社会主义,而是把中国引导到资本主义。我们已经解决了最近发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问题,并且作了人事调整。

总之,我们要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道路。现在走了八年多了,看来本世纪末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

吸取历史经验 ,防止错误倾向^{*}

(一九八七年四月三十日)

总的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粉碎“四人帮”以后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 ,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但毕竟我们只是开步走。我们原定的目标是 ,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一年为基数 ,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 ,翻一番 ,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 ,再翻一番 ,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 ,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 ,虽然人均数还很低 ,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 ,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 ,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做到这一步 ,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这是我们的雄心壮志。目标不高 ,但做起来可不容易。

现在我们可以说 ,第一步的原定目标可以提前在今年或者明年完成。这并不意味着第二步就很容易。看起来 ,第二步的目标也能完成 ,但第三步比前两步要困难得多。已经过去的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谈话的一部分。

八年多证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但要证明社会主义真正优越于资本主义,要看第三步,现在还吹不起这个牛。我们还需要五六十年的艰苦努力。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确实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32]以来的一个多世纪,在世界上一直处于卑下地位,人家看不起中国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打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蒋家王朝。一九四九年,中国人确实站起来了。但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到现在三十八年,这中间我们又确实有不少失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社会主义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一九四九年取得全国政权后,解放了生产力,土地改革^[51]把占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的生产力解放出来了。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一九五八年经济上搞“大跃进”^[54],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一九五九、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一九六二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要人们安于贫困

落后,说什么宁要贫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这就是“四人帮”搞的那一套。哪有什么贫困的社会主义、贫困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讲的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什么是按需分配?没有生产力的极大发达,没有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怎么搞按需分配?马克思主义讲的共产主义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生产力不断发展,最后才能达到共产主义。“四人帮”荒谬的理论导致中国处于贫困、停滞的状态。

粉碎“四人帮”之初,“左”的错误没有完全纠正。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中国还处于徘徊状态。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非常严肃和认真地总结了建国后的近三十年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现在的一系列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提出了我们的根本路线,就是把工作重点转到建设上来,不受任何干扰,一心一意、坚定不移地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需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概括地说,就是反对霸权主义和维护世界和平。

这八年多的经历证明,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不是说没有干扰。几十年的“左”的思想纠正过来不容易,我们主要是反“左”,“左”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势力。现在中国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在制定和实行具体政策的时候,总容易出现有一点留恋过去的情况,习惯的东西就起作

用,就冒出来了。同时也有右的干扰,概括起来就是全盘西化,打着拥护开放、改革的旗帜,想把中国引导到搞资本主义。这种右的倾向不是真正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是要改变我们社会的性质。一旦中国全盘西化,搞资本主义,四个现代化肯定实现不了。中国要解决十亿人的贫困问题,十亿人的发展问题。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我们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最大的危险还是“左”。习惯了,人们的思想不容易改变。对青年人来说,右的东西值得警惕,特别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因此要对他们进行教育。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以后还会遇到风险、困难,包括我们自己还会犯错误。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只能按中国的实际办事,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警惕日本极少数人 复活军国主义^{*}

(一九八七年五月五日)

发展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日本很多朋友,包括政治界、学术界、新闻界等,很多人都做了几十年的工作,做了很多事情。宇都宫德马^[87]先生就是中日友好关系的“掘井人”之一。在座的朋友都是搞了几十年中日友好工作的。就中国人民的心情来说,是希望同日本人民友好的,日本百分之九十几的人也是愿意中日友好的。

如果说中日关系有点问题,那就是中国人民担心日本有很少很少一部分人,其中可能有的有政治影响的人,存在复活军国主义的倾向。我们只担心这么一点。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地看到,日本绝大多数人是反对这种倾向的。一个多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的所作所为,受害的不仅是中国人民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我们赞赏日本舆论界、政治界的许多人士对这种倾向持批评态度,持警惕态度。对付这种军国主义倾向,不仅要加强批评、揭露,而且要扎扎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宇都宫德马等日本朋友时谈话的一部分。

实实在在地做一些发展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事情,加深我们之间的友谊,加深我们之间的了解,加深我们之间的感情。

“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口号,代表了我们的理想。应该说,这个口号三十多年前就提出来了,不是今天提出来的,更不是某一个人提出来的,是中日双方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 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

(一九八七年五月十二日)

我没有去过你们的国家,听说荷兰不少土地是填海造出来的,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了不起。中国有句话,叫做“愚公移山”,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传统,你们称得上是“愚公移海”。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世界上是比较少的,你们比我们更少,但是搞得很好,成为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欢迎你第二次到中国来。一九七三年你来访问的时候,中国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时“四人帮”当权横行,人民心情沉闷,甚至可以说是在忧虑之中,整个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还有两年徘徊。中国真正活跃起来,真正集中力量做人民所希望做的事情,还是在一九七八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到现在的八年多时间,我们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走了第一步。我们确定一心一意搞建设是正确的。为了搞建设,需要实行两个开放,一个是对内开放,一个是对外开放,这也是正确的。这八年多只是开始起步,虽然已经取得比较明显的成就,但是还没有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我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们的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就是再过十三年,达到一个小康社会的水平。我们进一步的目标是下一个世纪的五十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到那时,国家总的力量就大了,可以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在解决南北问题^[16]方面可以尽更多的力量。我们就是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一点,我们两国的观点一致。一九七八年我们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我们在制定国内搞建设这个方针的同时,调整了对外政策。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有利于和平。我们不打别人的牌,就是说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我们也不让别人打我们的牌。我们在分析国际状况时特别注意欧洲,欧洲是决定和平与战争的关键地区。在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同东欧关系不正常。现在我们根据客观的判断,认为西欧和东欧都是维护和平的力量。东欧、西欧都需要发展,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能力,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发动。而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我们希望有一个联合、强大、发展的欧洲。只要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不绑在别人的战车上,战争就打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争取比较长一点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如果下一个世纪五十年里,第三世界包括中国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整个欧洲有一个可喜的发展,我看那个时候可以真正消除战争的危险。我们感觉,欧洲比较开放一些,特别是技术上开放,我

们比较满意,当然不是完全满意。所以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对荷兰,对整个欧洲共同体的政策都是一样的。我们同东欧也在发展关系,这是我们的新方针。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你们可能不太熟悉。我们党的发展,走过了曲折道路。很长时期比较顺利,但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这个时期的后期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88],那个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被打入地下,被迫同蒋介石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三十年代前期有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89],那个错误导致我们多数革命根据地受挫折,使三十万革命军队减少到三万。我们为什么要长征?长征是被迫进行的。从一九三五年开始,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赢得了胜利,一九四九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头八年,我们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一些基础工业。从一九三五年以来二十几年都搞得很好。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我们又犯错误了,反右扩大化^[80]。一九五八年,要求过急,搞“大跃进”^[54],搞人民公社^[55],不对头了,给我们带来很大灾难。我们花了三年时间,纠正错误,才使情况又好起来。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是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一九六六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搞了整整十年。我为什么讲这个历史?因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

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有人说,我们现在有保守派、改革派,这是猜测。事实证明,改革是正确的,很见效。如果外国朋友都能看出我们的变化,看出我们搞得不错,我们自己的人民还能看不见?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最近,我们党的总书记辞职,这样的事在你们那里不算一个问题。大概由于我们过去开放不够,一有变化好像就是中国发生大问题了。其实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们很快就解决了。我们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反对全盘西化,反对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我们着重在教育。这是长期的任务,不采取运动的方式来处理。我们不搞运动,这也不是运动所能解决的问题。一切工作照常运转。我们今年秋季召开党的十三大^[84],将更加清楚地阐明我们的现行政策,而且要进一步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来适应经济的发展。我们现行的方针政策不会有任何变化,开放政策只会更加开放。不但本世纪如此,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以后还会如此,以后更是如此。中国是稳定的。过去我们多灾多难,党和国家经过许多波折,有些事情人们难以理解也不奇怪,但我们自己是有清醒估计的。

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二日)

自从我们两党关系恢复以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铁托^[90]同志打开了两党关系的新局面,是他首先到中国来访问的。那个时候我们党的主席是华国锋同志,我是以老战士身份同铁托同志见面的,我们谈得很好,达成了共同的谅解,就是过去的事情都不谈了,一切向前看。现在,我们同东欧其他各国的党和国家的关系也是采取这个态度,把今天当作新的起点,好好地发展我们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至于过去的经验,也值得总结一下。我想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划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比如法国党和意大利党,过去我们同他们谈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应该尊重他们的经验,尊重他们的选择。如果他们犯了错误,由他们自己去纠正。同样,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去纠正。因为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党都有自己的经历,情况千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谈话的一部分。

差万别。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我们也不赞成有什么“中心”。但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划脚的错误。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因此我们提出了处理这种关系的原则^[91]。我相信，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会使我们之间友谊和合作的基础更加牢固，更加持久，两党和两国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得到发展。

目前我们国内正在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54]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可以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对各种类型的国家开放。

我们的改革和开放是从经济方面开始的，首先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坦率地说，在没有改

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进行农村改革,给农民自主权,给基层自主权,这样一下子就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把基层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面貌就改变了。农业实行多种经营,因地制宜,该种粮食的地方种粮食,该种经济作物的地方种经济作物,不仅粮食大幅度增长,经济作物也大幅度增长。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这是我们原来没有预想到的。当然,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92]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还有一些省犹疑徘徊,有的观望了一年才跟上,有的观望了两年才跟上。中央的方针是等待他们,让事实教育他们。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总之,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

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

同时,我们的对外开放采取了多种方式,包括搞经济特区^[29],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33]。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当时我们决定先搞深圳经济特区,除了深圳以外,还有珠海、汕头、厦门。一共四个经济特区,广东省占了三个,福建省占了一个。我去过一次深圳,那里确实是一派兴旺气象。他们让我题词,我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最近有的同志告诉我,厦门经济特区的发展速度比深圳还理想。一九八四年我去的时候那里还是一片荒地,只有一个机场,现在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93],海南岛和台湾的面积差不多,那里有许多资源,有富铁矿,有石油天然气,还有橡胶和别的热带亚热带作物。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

总之,几年的实践证明,我们搞改革、开放的路子是走对了。虽然每一个领域都还有不少问题,但是不难逐步解决。所以,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可能放弃,甚至于不可能放慢。现在快、慢也是议论的问题之一,因为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要讲究稳妥,但稳妥变成停滞不前就坏了。最近我们中央在考虑,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加快一点改革、开放的步子。这是我讲的经济体制改革。

现在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就是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这是今年十月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主要议程之一。这个问题很复杂,政治体制改革的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主要是涉及广大干部,不仅是我们一批老人。一般讲政治体制改革都讲民主化,但民主化的含义不十分清楚。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这个范围来说,我们的效率是高的,我讲的是总的效率。这方面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保持这个优势,保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

行政体制改革,而这种改革又不能搬用西方那一套所谓的民主,不能搬用他们的三权鼎立,不能搬用他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但是,共同的一点是要保持自己的优势,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毛病和弊端。

我们的改革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有利于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做到这些,我个人考虑有三条:第一,党和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体制要增强活力,就是说不要僵化,要用新脑筋来对待新事物;第二,要真正提高效率;第三,要充分调动人民和各行各业基层的积极性。

增强活力,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中国的干部老化僵化问题比你们严重,比如,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恐怕比其他各国党的都要大,我们党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成员的平均年龄也都偏大。我们建国的时候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时领导人都比较年轻。从党的十一大开始出现这个问题。这有客观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都被打倒了,后来解放了,重新恢复领导工作,所以领导班子年龄偏大。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一般地讲,老年人习惯势力多一点,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考虑问题

凭自己的经验。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真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要坚决执行领导班子年轻化的方针,但步子要稳妥,也不是只讲年龄这一条,还要德才兼备,并且要有经验丰富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形成梯级结构。年轻化这件事障碍不小,不克服不行,还要做许多工作。

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包括精减机构,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

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我们农村改革之所以见效,就是因为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现在我们把这个经验应用到各行各业,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调动积极性是最大的民主。至于各种民主形式怎么搞法,要看实际情况。比如讲普选,现在我们在基层,就是在乡、县两级和城市区一级、不设区的市一级搞直接选举,省、自治区、设区的市和中央是间接选举。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又比如讲党派,我们也有好多个民主党派,都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对于这一点,西方许多舆论也认为,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来领导,许多事情很难办,首先吃饭问题就解决不了。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民主”不能再搞了,那实际上是无

政府主义。

总之,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步骤都已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快。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正在议论,要在十三大以前理出个头绪。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用三年时间见效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比农村复杂,至少用三至五年的时间才能取得明显的效果。政治体制改革更复杂,设想有些方面用三至五年的时间可以见效,有些方面甚至要花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见效。

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 什么事都干不成^{*}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我们党的十三大^[84]将要重申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这些政策不但要继续下去,过去搞得不够的还要搞得更大胆一些,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日程上来。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如果今天这部分人上街,明天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都会有事,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外国朋友了解得多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话的一部分。

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 ,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 ,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 ,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 ,守纪律。

立足民族平等 ,加快西藏发展^{*}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九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 ,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立足于民族平等。中国有几十个民族 ,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六 ,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 ,但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行政机构中少数民族干部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百分之六。至于说“文化大革命”使少数民族受到损害 ,这种现象不能表明我们歧视少数民族。那时不仅损害了少数民族 ,受害最大的还是汉族 ,大多数老一辈的革命家都被打倒了嘛 ,这些人几乎都是汉族嘛 ,包括我在内。粉碎“四人帮”后 ,中央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拿西藏来说 ,中央决定 ,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建设项目 ,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中国的资源很多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 ,包括西藏和新疆。如果这些地区开发起来 ,前景是很好的。我们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西藏是人口很稀少的地区 ,地方大得很 ,单靠二百万藏族同胞去建设是不够的 ,汉人去帮助他们没有什么坏处。如果以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谈话的一部分。

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的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 ,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 ,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 ,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目前西藏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 ,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 ,但总的讲还是处于落后状况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不仅西藏 ,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一样。我们的政策是着眼于把这些地区发展起来^[94]。如内蒙古自治区 ,那里有广大的草原 ,人口又不多 ,今后发展起来很可能走进前列 ,那里有不少汉人。观察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看那个地区能不能发展起来。如果在那里的汉人多一点 ,有利于当地民族经济的发展 ,这不是坏事。看待这样的问题要着重于实质 ,而不在于形式。

我国方针政策的两个基本点^{*}

(一九八七年七月四日)

我国几年来的发展情况表明,凡是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地方都搞得好。现在国际上有一种议论,说中国改革的步子放慢了,政策要变。说放慢步子还有些根据,说政策要变就没有根据了。改革总会出现一些问题,有了问题就要进行调整。去年和今年我们继续在搞改革、开放,但步子放得稳重了些。现在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步子太慢了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提出要大胆一些。改革、开放是一个新事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照搬,一切都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实践证明,步子放大些有利。当然步子大风险也就大。

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左”的干扰更多是来自习惯势力。旧的一套搞惯了,要改不容易。右的干扰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谈话的一部分。

化,包括照搬西方民主。“左”的和右的干扰,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建国后,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吃亏都在“左”。我们国家大,党的历史很长,建国也已经有三十八年,因此好多习惯势力不能低估,而右的干扰也帮了习惯势力的忙,所以我们也不能忽视右的干扰。国际上一些人在猜测我是哪一派。最近我对一位外国朋友说,说我是改革派是真的,可是我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如果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保守派,那末也可以说我是保守派。比较实际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在国际上处于落后状态,中国要发展起来,要实现四化,政治局面不稳定,没有纪律,没有秩序,什么事情都搞不成功。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中国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同社会主义法制相辅相成的。中国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主要有两个内容:第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第二,使我们领导层比较年轻化一些。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是非干不可。改革不是一两年两年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如能在十年内搞成功就很了不起了。领导层年轻化要达到比较理想的状态,恐怕要十年时间。

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希望世界和平。现在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短时期内不会打。当然战争的危險仍然存在,但是可以争取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第三世界国家应当利用这段时间发展经济,逐渐摆脱贫困落后状况。过去

我们过多地认为世界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忽视发展生产力,忽视经济建设。现在根据新的观察、新的分析,下决心一心一意搞建设。已经搞了八年,取得了初步效果,但是路还很长,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中国在本世纪末摆脱贫困状态,达到小康水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还要花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因此,我们希望至少有七十年的和平时间。我们不要放过这段时间。

一切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

(一九八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要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不改革不行,不开放不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艰苦奋斗,一心一意搞建设,发展生产力。

今年十月我们党要召开十三大。十三大归根到底是改革开放的大会。十三大要重申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相应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十三大要使领导班子更加年轻化,这样就会使党和国家的领导层更具有活力,同时保证我们政策的连续性。

你们到农村去看了一下吗?我们真正的变化还是在农村,有些变化出乎我们的预料。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后,剩下的劳动力怎么办,我们原来没有想到很好的出路。长期以来,我们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村每人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谈话的一部分。

平均只有一两亩土地,多数人连温饱都谈不上。一搞改革和开放,一搞承包责任制,经营农业的人就减少了。剩下的人怎么办?十年的经验证明,只要调动基层和农民的积极性,发展多种经营,发展新型的乡镇企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乡镇企业容纳了百分之五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我们讲社会主义民主,这就是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乡镇企业反过来对农业又有很大帮助,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们不能照搬资本主义国家那一套,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比如共产党的领导,这个丢不得,一丢就是动乱局面,或者是不稳定状态。一旦不稳定甚至动乱,什么建设也搞不成。我们有过“大民主”的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是一种灾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不能搞无政府主义。

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95]。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三日)

“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

从历史上看,我们的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才走上胜利的道路的,标志就是遵义会议^[96]。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89]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一九五七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80],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54]和人民公社^[55]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实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际上违背了八大^[2]的路线,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不过,这些事情也给我们带来经验教训。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然后深刻地检讨了我们的历史,提出解放思想,恢复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任务。毛泽东同志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正确的东西不能丢掉。在这个长时期中,毛泽东同志确实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得非常好,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采取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方式。由于充分尊重中国的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这是我们历史的正确方面。刚才我所说的二十年“左”的错误,那是另一个方面。我们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归根到底就是恢复和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这条思想路线来探索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

“四人帮”时期对共产主义的理解,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宁要贫穷的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简直荒谬得很!马克思主义又叫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

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就是说,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因为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当然分配中还会有差别,但我们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走得对。

在对社会主义作这样的理解下面,我们寻找自己应该走的道路。这涉及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所有方面的问题。我们提出要搞建设,搞改革,争取比较快的发展。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97],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帮”以后,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以发展生产力为全党全国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发动了。

这一次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怎么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改革就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然后我们又把农村改革的

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经过将近九年的努力,百分之九十的农村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前两年完成了原定十年内翻一番的任务。

成功的经验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因此,党的十三大^[84]要决定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目标已经达到了。第二个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第三个目标是在下个世纪的五十年内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现在真正要做的就是通过改革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用我们的实践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要用两代人、三代人、甚至四代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

这是我们的一些构想,现在我们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我们走的路还会有曲折,错误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力求及时总结经验,不要犯大的错误,更不要因为小的曲折而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前进。

你刚才讲的发展两党两国关系的意见,我完全同意。我们之间过去的问题一风吹,一切向前看。关键是,第一,我们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第二,我们都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我们的优越性。我们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

现在提出党政分开 ,但不管怎样还是共产党领导 ,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共产党也难免犯错误 ,但只要坚持实事求是 ,坚持改革 ,走自己的路 ,不犯大的错误 ,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利于团结人民 ,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我们做某一项决定 ,可以立即实施。又如解决民族问题 ,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 ,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 ,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 ,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势 ,不能放弃。所以 ,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十三大的两个特点^{*}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我们党的十三大^[84]报告是集体创作,集中了几千人的智慧,有许多内容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当然,其中也有我的看法和意见,但大部分是集体的意见。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帐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过分夸大一个人的作用并不有利。

党的十三大的特点,一个是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定地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另一个是更新了中央领导班子,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能够连续贯彻下去,并且加快步伐。在十三大以前,国际舆论和国内的人民还有些担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不是会连续下去,十三大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人民和国际朋友都放心了。话又说回来,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时谈话的一部分。

只能在干中学 ,在实践中摸索。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 ,就是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还需要五六十年时间 ,如果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算起要用上百年的时间。我们要坚持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 ,就是要艰苦奋斗 ,谨慎办事 ,兢兢业业。还要看到我们的路是漫长的 ,还会遇到许多困难 ,错误也是难免的。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 ,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 ,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这样就能听到更多人的意见 ,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意见。

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

我们建国三十九年 ,头八年好 ,后十年也好 ,当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扰 ,情况不大好。我们对近十年的发展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看来 ,这十年搞对头了。去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84]决定 ,不仅要继续贯彻执行我们既定的方针政策 ,而且要进一步改革 ,进一步开放。我们相信 ,按照这些方针政策搞下去 ,会获得成功。另一方面 ,也还有风险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我们必须走改革这条道路 ,有问题要及时妥善解决 ,不能停滞 ,停滞是没有出路的。

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 ,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 ,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 ,各自的经历也不同 ,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 ,政治问题也如此。

建设一个国家 ,不要把自己置于封闭状态和孤立地位。要重视广泛的国际交往 ,同什么人都可以打交道 ,在打交道的过程中趋利避害。用我们的话讲 ,叫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搞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谈话的一部分。

活,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我们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过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要讲社会主义,也只能是讲符合莫桑比克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

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

理顺物价 ,加速改革^{*}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九日)

我们党的十三大^[84]和全国人大七届一次会议 ,精神都是进一步解放思想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理顺物价 ,改革才能加快步伐。物价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过去 ,物价都由国家规定。例如粮食 ,还有各种副食品 ,收购价格长期定得很低 ,这些年提高了几次 ,还是比较低 ,而城市销售价格又不能高了 ,购销价格倒挂 ,由国家补贴。这种违反价值规律的做法 ,一方面使农民生产积极性调动不起来 ,另一方面使国家背了一个很大的包袱 ,每年用于物价补贴的开支达几百亿元。这样 ,国家财政收入真正投入经济建设的就不多了 ,用来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就更少了。所以 ,不解决物价问题就不能放下包袱 ,轻装前进。最近我们决定放开肉、蛋、菜、糖四种副食品价格 ,先走一步。中国不是有一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公的故事吗 ?我们可能比关公还要过更多的“关” ,斩更多的“将” 。过一关很不容易 ,要担很大风险。这次副食品价格一放开 ,就有人抢购 ,议论纷纷 ,不满意的话多得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部长吴振宇率领的朝鲜政府军事代表团时谈话的一部分。

很,但是广大人民群众理解中央,这个决心应该下。现在过这一关,能否成功,今天还不能讲,但我们希望成功。这就要求我们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但是物价改革非搞不可,要迎着风险、迎着困难上。要让全党和全国人民懂得,这是很艰苦的工作,十全十美的方针、十全十美的办法是没有的,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

我们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放开物价、加速改革正确不正确,也要看实践。我们现在既有顺利的情况,又有风险的情况。好在这十年来中国有了可喜的发展,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有一定的增强。我总是告诉我的同志们不要怕冒风险,胆子还要再大些。如果前怕狼后怕虎,就走不了路。

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不会太慢。一九八八年尽管有风浪,速度仍然可能超过百分之十。天天在风浪中前进,但翻两番的任务一定能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前景。

思想更解放一些， 改革的步子更快一些^{*}

(一九八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我们正在进行改革。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十年。如果加上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的“左”的错误所耽误的时间，总的算起来应该是二十年。从一九四九年建国开始，一直到一九五七年，我国的发展形势是非常好的，但往后就出问题了。在这二十年中我们并不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就，比如搞出了原子弹、氢弹、导弹等。但就整个政治局面来说，是一个混乱状态，就整个经济情况来说，实际上是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由于“两个凡是”^[7]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还经历了两年徘徊时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才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根本内容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雅克什时谈话的一部分。

强起来 ,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 ,而是富 ,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要发展生产力 ,就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行 ,不开放不行。过去二十多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 ,这一点要归“ 功 ”于十年“ 文化大革命 ” ,这个灾难的教训太深刻了。当然 ,在改革中也有不同意见 ,但这里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 ,而是改革到什么程度 ,如何改革 ,如何开放。这是很自然的 ,没有什么好奇怪的。我们中国常说一句话 ,叫做“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经过十年来的实践检验 ,证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 ,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是正确的。我们现在不是要收 ,而是要进一步改革 ,进一步开放。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 ,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不是三年、五年、十年、八年 ,也不是二十年 ,因为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 ,历史不同 ,所处的环境不同 ,左邻右舍不同 ,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 ,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 ,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

中国还有个台湾问题要解决。中国最终要统一。能否真正顺利地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 ,一要看香港实行“ 一国两制 ”的结果 ,二要看我们经济能不能真正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一九八八年六月三日)

我们是在一个贫穷的大国里进行改革的,这在世界上没有先例。我们搞建设有三十九年,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但是光凭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还解决不了问题。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耽误了二十年,而这二十年又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这是非常可惜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点好处,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9]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

改革和开放是手段,目标是分三步走发展我们的经济。第一步是达到温饱水平,已经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是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还有十二年时间,看来可以实现。第三步是下个世纪再花五十年时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很不容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谈话的一部分。

易的。关键是本世纪内的最后十年,要为下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打下基础,创造比较好的条件和环境。

改革没有万无一失的方案,问题是要搞得比较稳妥一些,选择的方式和时机要恰当。不犯错误不可能,要争取犯得小一点,遇到问题就及时调整。这是有风险的事情,但我看可以实现,可以完成。这个乐观的预言,不是没有根据的。同时,我们要把工作的基点放在出现较大的风险上,准备好对策。这样,即使出现了大的风险,天也不会塌下来。

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一九九七年以后五十年不变,这个承诺是郑重的。为什么说五十年不变?这是有根据的,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的发展战略需要的时间,除了这个世纪的十二年以外,下个世纪还要五十年,那末五十年怎么能变呢?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既然这样,怎么会改变对香港的政策呢?实际上,五十年只是一个形象的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前五十年是不能变,五十年之后是不需要变。所以,这不是信口开河。

香港要稳定。在过渡时期要稳定,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以后,香港人执政,香港也应该稳定。这是个关键。香港的稳定,除了经济的发展以外,还要有个稳定的政治制度。我说过,现在香港的政治制度就不是实行英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今后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如果硬要照搬,造成动乱,那是很不利的。这是个非常实际的严重问题。

在改革中保持 生产的较好发展^{*}

(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

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

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我总是鼓励我们的同志更大胆一些。关键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着办事,决心要坚定,步骤要稳妥,还要及时总结经验,改正不妥当的方案和步骤,不使小的错误发展成为大的错误。第二条就是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生产有较好的发展,不要勉强追求太高的速度,当然太低了也不行。过去十年的发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这些年也保持比较好的速度,我们深化改革的风险就小得多了。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时谈话的一部分。

形势迫使我们 进一步改革开放^{*}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

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关系,因为中国有占世界五分之一多的人口。坦率地说,中国近代以来没有对世界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首先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有关,也与历代反动政府的腐败有关。一九四九年,中国结束了屈辱的历史,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又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的事业。形势逼人,迫使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还需要过好几个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谈话的一部分。

关,现在碰到的最大的关是价格制度和工资制度的综合改革。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相信这十年好的形势能够继续发展下去。我们对此寄予希望。

埃塞俄比亚是非洲的重要国家。长期以来,埃塞俄比亚人民有着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光荣传统。我在青年时代就知道你们的国家,当时叫阿比西尼亚,进行了英勇的抗击意大利法西斯侵略者的正义战争。这样的民族现在面临着经济困难,相信你们会克服困难的。我衷心希望你们把发展生产力、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作为中心。现在国际形势看来会有个比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即不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环境。我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要丧失时机。

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

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老战士见面总是愉快的。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我参加共产党几十年了,如果从一九二二年算起,我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已经工作了六十多年。这期间做了不少好事,也做了一些错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从一九五四年起,我就担任党中央秘书长、军委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六年起担任党的总书记,是在领导核心之中。那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毛泽东同志从一九五七年开始犯了“左”的错误,最“左”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生前自己也承认有错误,他说过,我死后如果能够得到三分错误、七分功劳的评价就满意了。从一九二一年建党到一九五七年,三十六年内他做的好事了不起,是他领导我们取得了革命胜利。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话的主要部分。

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你看过我们十一届六中全会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26]没有?这个决议就是根据我刚才说的立场与观点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的。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

我熟悉我们党从开头到现在的历史,对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过程都比较了解。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财富。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三中全会确定将工作重点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建设四个现代化为中心,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拥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文化大革命”作比较,“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在党的十三大上,我和一些老同志退出了领导核心。这表明,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我们这个领导集体是坚持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我们相信,现行方针政策

一定会继续下去。就我个人来说 ,对这一点有信心 ,也感到愉快。很多外国记者要来采访我 ,搞我的什么传 ,我都婉拒了。我认为 ,过分夸大个人作用是不对的。人总是要死的。哪一天我不在了 ,好像中国就丢了灵魂 ,这种看法不好。我在有生之年还可以做一些事 ,但希望自己从政治舞台上慢慢地消失。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一九九七年 ,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 ,我还想去那里看看。我也想去台湾看看 ,不过看来一九九七年以前解决这个问题不容易。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十二日)

一

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过去把自己封闭起来,自我孤立,这对社会主义有什么好处呢?历史在前进,我们却停滞不前,就落后了。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们的根本问题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原则,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此就必须开放。否则,不可能很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拿中国来说,五十年代在技术方面与日本差距也不是那么大。但是我们封闭了二十年,没有把国际市场竞争摆在议事日程上,而日本却在这个期间变成了经济大国。

二

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否则,我们已经耽误

^{*} 这是邓小平同志两次谈话的节录,分别摘自一九八八年九月五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的谈话和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的谈话。

了二十年,影响了发展,还要再耽误二十年,后果不堪设想。最近,我见胡萨克时谈到,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北京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的工资从建国时候开始就是这么多,但是现在物价涨了,我的生活水平降了三分之二。”我们不论怎么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有些留学生,回来以后没有工作条件,也没有接纳他们的机构,有些学科我们还没有。可以搞个综合的科研中心,设立若干专业,或者在现有的一些科研机构 and 大学里增设一些专业,把这些人放在里面,攻一个方面,总会有些人做出重大贡献。否则,这些人不回来,实在可惜啊。科教投资的使用要改进,这也是改革的重要内容。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98]”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当然,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

为一个战略方针 ,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 ,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

中央要有权威^{*}

(一九八八年九月十二日)

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现在的局面看起来好像很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需要进行调整,这是不可少的。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是能解决的,我们有信心。小错误难免,只要不犯大错误就行了。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初步方案汇报时谈话的一部分。

事关大局的问题^[99]。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相互打架,相互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

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

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 占有一席之地^{*}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四日)

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100]。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的行列,差距越来越

^{*} 这是邓小平同志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时的讲话。

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 ,但不是一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 ,有李政道^[101]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 ,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 ,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 ,有自己的技术 ,有自己的创造。

总之 ,不仅这个工程 ,还有其他高科技领域 ,都不要失掉时机 ,都要开始接触 ,这个线不能断了 ,要不然我们很难赶上世界的发展。

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建立国际新秩序^{*}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中印两国对人类有一个共同的责任,就是要利用现在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印两国共有十八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三分之一以上。

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16]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的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来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并且越来越大。我们两国是上述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行列里的最大的队伍。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102]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谈话的一部分。

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 and 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人口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这就像巴西不发展就不是拉丁美洲世纪一样。所以,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在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末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

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是最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考虑,我们两国同邻国的关系应该做些调整。我提出这一建议,请阁下考虑。这是件了不起的事情,不赞成的人会有不少,但只要有高度的智慧和战略的胆识,就一定可以完成。我想,我们就首先在阁下来访的新闻公报中体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世界在变,人们的思想不能不变。由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中国耽误了大约二十年的建设时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国内的各种事情都在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四化建设为中心,从停滞封闭转到改革开放,还有当前所进行的各种改革工作,都是在变。我想你们也会遇到这个问题的。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压倒一切的是稳定^{*}

(一九八九年二月二十六日)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注意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谈话的一部分。

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都是用枪炮,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中国不允许乱^{*}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估计形势,要看到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大多数学生是拥护改革的。告诉同志们,遇事要沉着。

台湾集中攻我们四个坚持,恰恰证明四个坚持不能丢。没有四个坚持,中国就乱了。

当然,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违法的就要取缔。中国不能允许随便示威游行,如果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游行,什么事也不要干了,外国资金也不会进来了。我们在这方面控制得严一点,不会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恰恰相反,外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

商会更放心。我们要让国内外明白 ,加强控制是为了稳定 ,是为了更好地改革开放 ,进行现代化建设。

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 ,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 ,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 ,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

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中国过去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封闭状态,经济发展受到限制,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才把这个问题恰当地解决了。从那时到去年底的十年里,中国有了可喜的成就,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上了一个台阶。发展中也出现了新的失误,但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成就,这是我们的根本观点。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这是不容易的,是由于我们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我们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大错误没有犯,小错误没有断,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没有经验就要摔跟头,今后也难以避免。我们现在的的问题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得太快,给国家和人民都带来了困难。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用两年或更多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我们的一条经验是,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出现的新问题,发展要适度,经济过热就容易出毛病。总之,制定一切政策,要从实际出发。只要注意这一点,就不会犯大错误。如果发现错误,要赶快纠正,不要掩饰,不要回避。把错误纠正过来,就能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创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乌干达共和国总统穆塞韦尼时谈话的一部分。

造更好的条件。我看我们中国还是有希望的,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通货膨胀比我们厉害,只要全国人民思想统一,治理也不难。对到本世纪末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我们是有信心的。

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九四九年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取得了一个资格:人们不敢轻视我们。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是欺侮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常干预这些国家为摆脱控制、发展经济、争取政治独立与自主所作的努力。他们对中国也是这样。有的大国的议会今天通过这样一个决议,明天通过那样一个决议,干涉我们的内政。但是中国是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些干涉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置之不理,也可以提出抗议。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所以说,连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都还有维护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任务,可见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

我们非常关注非洲的发展与繁荣。我们高兴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都独立了,这为发展获得了最好的条件。经过多年奋斗,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世界大战可以避免,非洲国家要利用这一有利的和平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要根据本国的条件制定发展战略和政策,搞好民族团结,

通过全体人民的共同努力,使经济得到发展。我很赞成你们在革命胜利后,不是一下子就搞社会主义。我和许多非洲朋友谈到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也不要搞封闭政策,那样搞不会获得发展。在这方面,你们做对了。总之,不要关起门来,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否则就会信息不灵,睡大觉,而世界技术革命却在蓬勃发展。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坚持这个传统,才能抗住腐败现象。所以要加强对人民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艰苦奋斗。这是中国从几十年的建设中得出的经验。我们现在还不富裕,在财力上对你们帮助不大,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经验教训告诉朋友们,这也是一种帮助。

结束过去 ,开辟未来^{*}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多年来 ,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 ,到六十年代前半期 ,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 ,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 ,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世界形势日新月异 ,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谈话的一部分。

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结束一下过去,就可以不谈过去了,重点放在开辟未来的事情上。但是,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也不好,总得有个交代。我讲讲中国人、中国党的一些看法。对这些看法,不要求回答,也不要辩论,可以各讲各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更加扎实的基础上前进。我只想简单讲两点。一是讲讲历史上中国在列强的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二是讲讲近几十年,确切地说是近三十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

先谈第一个问题。从鸦片战争^[32]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

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一九三二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03]。一九三七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帐,日本欠中国的帐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104]。

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一九二九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105],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同苏联签订了新约。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

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尽管如此,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讲清这个问题可能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值得讲一讲。

第二个问题,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中国的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106],后来还有越南战争^[107]。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六十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

实质问题是不平等 ,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虽然如此 ,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我讲这么长 ,叫“ 结束过去 ”。 目的是使苏联同志们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 过去 ”的 ,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 历史帐讲了 ,这些问题一风吹 ,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 双方讲了 ,就完了 ,过去就结束了。

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 ,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 ,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 在发展交往方面 ,我有一个重要建议 :多做实事 ,少说空话。

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 ,就是台湾问题 ,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 已经做成的事情是 ,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 ,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 ,确定了收回香港 ,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 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 对国内工作的参与 ,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 ,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 ,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 ,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还没有能够实现的 ,就是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 ,这是制度上的重要问题。

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 有希望的领导集体^{*}

(一九八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国际国内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84]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能动。这个我征求了李先念^[108]、陈云^[44]同志的意见,他们赞成。

动乱^[109]平息之后,我们确实有些事情要向人民作出交代。主要有两条:

第一,要改换领导层。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无宁日。这次事情总的说还没有完啊!目前学生还没有上课,就是上了课,也还会上街。肯定的一点是,不论工人也好,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两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好,学生也好,还是希望改革的。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不过,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总之,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

第二,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本来我们就是要反对腐败的。对腐败的现象我也很不满意啊!反对腐败,几年来我一直在讲,你们也多次听到我讲过,我还经常查我家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腐败、贪污、受贿,抓个一二十件,有的是省里的,有的是全国范围的。要雷厉风行地抓,要公布于众,要按照法律办事。该受惩罚的,不管是谁,一律受惩罚。

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以香港为例,对我们就是有益处的。如果没有香港,起码我们信息就不灵通。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今天请你们来,让大家来考虑一下这个论点对不对。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几个实绩,来取信于民。要惩治腐败,并体现我们不但不会改变改革开放的政策,而且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要拿事实给人民看,这样人民的心里才会平静下来。不然就会今天一个上街,明天一个上街。如果不从更深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那末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平静都靠不住。要看到这个大局。

我们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远,着眼于大局。许多小局必须服从大局,关键是这个问题。人都有缺点,我们在座的人都有缺点,别人一样也有缺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弱点。当然缺点有大有小,有多有少。没有缺点的人是没有的。毫无疑问,就从政的经验、斗争的经验来说,我们的班子有弱点,这是事实。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88]起,一直到遵义会议^[96],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这一代的前期是好的,后期搞“文化大革命”,变成一场灾难。华国锋^[110]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7]。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这个领导要取信于民,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不是说对班子里的每个人都满意,而是对这个集体满意。人们对

班子里的每个人都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但对整个集体表示满意就行了。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

第三代的领导要取信于民,要得到人民对这个集体的信任,使人民团结在一个他们所相信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周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不能动摇。这一点我任何时候都没有让过步。中国不搞四个坚持能行吗?人民民主专政能不用吗?坚持不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不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不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不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个根本问题。

我们组成的这个新的领导机构,眼界要非常宽阔,胸襟要非常宽阔,这是对我们第三代领导人最根本的要求。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前期是胸襟宽阔的,我们第二代基本上也是胸襟宽阔的,对第三代领导以及以后的领导都应该有这样的要求。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来选。新的领导机构要坚持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证明你们起码是坚持改革开放,是真正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这样人民就可以放心了。现在我们起

用人,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择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过去毛主席就曾经长期敢于用反对过他的人。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要搞改革开放。人都是有缺点的,进了班子后还可以继续改进。

一个是现在要用人们公认的改革者,再一个是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学生不过是提出继续进行改革的要求,而我们是真干。这样就合拍了,隔阂就自然消除了。这样的隔阂,不是写文章、辩论就可以消除的。这次出这样的乱子,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腐败现象的滋生,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丧失了信心。因此,我们首先要清理自己的错误,对群众的一些行动要谅解一些,处理时要适度,涉及面不要太广。

进入中央最高层的每个成员,都要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因为责任不同了。每个人从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风等方面,都要有变化,要自觉地变化。领导这么一个国家不容易呀!责任不同啊!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

还有一个问题,党内无论如何不能形成小派、小圈子。我

们这个党,严格地说来没有形成过这一派或那一派。三十年代在江西的时候,人家说我是毛派^[111],本来没有那回事,没有什么毛派。能容忍各方面、团结各方面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自我评论,我不是完人,也犯过很多错误,不是不犯错误的人,但是我问心无愧,其中一点就是从来不搞小圈子。过去我调任这样那样的工作,就是一个人,连勤务员都不带。小圈子那个东西害死人呐!很多失误就从这里出来,错误就从这里犯起。你们是要在第一线顶着干工作的,所以我今天要讲这一点。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关键在领导核心。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代。

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 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

同志们辛苦了！

首先,我对在这场斗争中英勇牺牲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在这场斗争中负伤的几千名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所有参加这场斗争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指战员和公安干警的同志们致以亲切的问候！

我提议,大家起立,为死难的烈士们默哀！

利用这个机会,我讲几句话。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社论,把问题的性质定为动乱。“动乱”这两个字恰如其分,一些人反对的就是这两个字,要修

改的也是这两个字。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后来事态进一步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也是必然的。我们有一批老同志健在,包括军队,也有一批各个时期参加革命的骨干还在,因此,事情现在爆发,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处理这一事件的主要难点在于,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一小撮坏人混杂在那么多青年学生和围观的群众中间,阵线一时分不清楚,使我们许多应该采取的行动难以出手。如果没有我们党这么多老同志支持,甚至连事件的性质都难以确定。一些同志不了解问题的性质,认为这只是单纯的对待群众的问题,实际上,对方不只是一些是非不分的群众,还有一批造反派和大量的社会渣滓。他们是要颠覆我们的国家,颠覆我们的党,这是问题的实质。不懂得这个根本问题,就是性质不清楚。我相信,经过认真做工作,能取得党内绝大多数同志对定性和处理的拥护。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这次平息暴乱中,我们那么多同志负了伤,甚至牺牲了,武器也被抢去了,这是为什么?也是因为好人坏人混杂在一起,使我们有些应该采取的断然措施难于出手。处理这件事对我们军队是一次很严峻的政治考验,实践证明,我们的解放军考试合格。如果用坦克压过去,就会在全国造成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谢解放军指战员用这种态度来对待暴乱事件。尽管

损失是令人痛心的,但可以赢得人民,使是非不明的人改变观点。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虽然牺牲了许多同志非常令人痛心,但客观地分析事件的过程,人们就不得不承认,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也有助于人民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今后解放军遇到问题,采取措施,就都可以得到人民的支持了。这里顺便说一下,以后再不能让人把武器夺去了。总之,这是一个考验,考试是合格的。虽然军队里老同志不是很多了,战士们大都是十八九岁、二十岁出头的娃娃,但他们仍然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在生命危险面前,他们没有忘记人民,没有忘记党的教导,没有忘记国家利益,面对死亡毫不含糊。慷慨赴死,从容就义,他们当之无愧。我讲考试合格,就是指军队仍然是人民子弟兵,这个性质合格。这个军队还是我们的老红军的传统。这次过的是真正的政治关、生死关,不容易呀。这表明,人民子弟兵真正是党和国家的钢铁长城。这表明,不管我们受到多么大的损失,不管如何更新换代,我们这个军队永远是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最可爱的人。同时,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是多么凶残,对他们,连百分之一的原谅都不应有。

这次事件爆发出来,很值得我们思索,促使我们很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也许这件坏事会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稳、更好,甚至于更快,使我们的失误纠正得更快,使我们的长处发扬得更好。今天我不可能展开来讲,只是提出课题。

第一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9]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正确不正确?是不是因为发生了这次动乱,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就发生问题?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个“左”的目标?是否还要继续用它作为我们今后奋斗的目标?这些大的问题,必须作出明确、肯定的回答。我们第一个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完成了,第二个翻一番的目标计划用十二年完成,再往后五十年,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对此,我想我们做出的不是一个“左”的判断,制定的也不是一个过急的目标。因此,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应当说,我们所制定的战略目标,现在至少不能说是失败的。在六十一年后,一个十五亿人口的国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是了不起的事情。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应该是能够做到的。不能因为这次事件的发生,就说我们的战略目标错了。

第二个问题,党的十三大^[84]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一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112],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

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后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在讲艰苦创业,后来日子稍微好一点,就提倡高消费,于是,各方面的浪费现象蔓延,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法制不健全,什么违法乱纪和腐败现象等等,都出来了。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于艰苦创业,对于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将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种教育都很少,这是我们很大的失误。

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这十年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应该说我们上了一个台阶,尽管出现了通货膨胀等问题,但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要充分估计够。当然,改革开放必然会有西方的许多坏的影响进来,对此,我们从来没有估计不足。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讲这点,可能对我们以后制定方针政策有好处。还有,我们要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重要的是,切不要把中国搞成一个关闭性的国家。实行关闭政策的做法对我们极为不利,连信息都不灵通。现在不是讲信息重

要吗？确实很重要。做管理工作的人没有信息，就是鼻子不通，耳目不灵。再是绝不能重复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我提出的这个建议，请常委研究。这也是个比较急迫的问题，总要接触的问题。

这是总结我们过去十年。我们的一些基本提法，从发展战略到方针政策，包括改革开放，都是对的。要说不够，就是改革开放得还不够。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实际上，西方国家也并不都是实行三权鼎立式的制度。美国骂我们镇压学生，他们处理国内学潮和骚乱，还不是出动了警察和军队，还不是抓人、流血？他们是镇压学生和人民，而我们则是平息反革命暴乱。他们有什么资格批评我们！今后，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倒是要注意，一个动态出现，不要使它蔓延。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除了个别语言有的需要变动一下，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政策都不变。这个问题已经提出来了，请大家认真考虑一下。至于一些做法，如投资方向、资金使用方向等，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多搞一点电，多搞一点铁路、公路、航运，能办很多事情。钢，外国人判断我们将来需要一亿二千万吨，现在我们接近六千万吨，还差一半。如果在现有企

业的基础上加以改造 ,增加两千万吨 ,就可少进口钢材。借点外债用在这些方面 ,也叫改革开放。现在的问题不是改革开放政策对不对 ,搞不搞 ,而是如何搞 ,开哪方面 ,关哪方面。

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 ,要认真总结经验 ,对的要继续坚持 ,失误的要纠正 ,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 ,要总结现在 ,看到未来。

利用这个机会 ,我就讲这一点。

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96]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88]、瞿秋白^[113]、向忠发^[114]、李立三^[115]到王明^[89],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116]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44]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117]。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这个集体一建立,我就一直在安排接班的问题。虽然两个接班人都没有站住,但在当时,按斗争的经验、按工作的成就、按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况且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人是在变化的。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从这次事件看出,工人阶级靠得住,农民靠得住,解放军靠得住,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也是靠得住的,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

我在跟李鹏、姚依林同志谈话^[118]时说过,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序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我说过,这是我的政治交代。当然,你们有事要找我,我不会拒绝,但是不能像过去一样。我不希望在新的政治局、新的常委会产生以后再宣布我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为什么这样?这不是因为我谦虚或别的什么。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

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新的领导一建立,要一切负起责任,错了也好,对了也好,功劳也好,都是你们的事。这样你们可以放手工作,对于新的集体自我锻炼也有好处。何况过去那种办法并不算很成功。现在我八十五岁了,到了这个年龄,该有自觉性。主要是大局的问题,如果个人的因素影响到局势的稳定,影响到事情的健康发展,解决起来就会发生困难。如果有什么事情,我完全可以在旁边帮帮忙,但是绝不要正式再搞个什么头衔了。

这次发生的事件^[109]说明,是否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是个要害。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

但是,我们要好好地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次事件确实把我们的失误也暴露得足够了。我们确实有失误呀!而且失误不小啊!

下面谈谈最近抓什么工作的问题。不能等暴乱完全平息,现在就要一面抓彻底平息暴乱,一面清理一下我们过去究竟失误在哪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现在急迫需要解决的是些什么问题。要统统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这个时候开展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的讨论,比如对市场、计划等问题的讨论,提出这类问题,不但不利于稳定,还会误事。现在需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同时要赶快注意那些对我们前进不利的事情。

第一,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当然不要求像过去想的那么高。现在主要是我们基础工业薄弱,缺少电和原材料。而在原材料的分配中,小企业吃了大企业,结果国家损失大。这次解决经济滑坡的问题,要清理一下急需解决哪些问题。应该解决的问题要加快解决,要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不能拖。当断不断,要误事。看准了的,积极方面的,有利于发展事业的,抓着就可以干。要在今后的十一年半中争取一个比较满意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果再翻一番,没有水分的翻一番,那时候人民就会看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党中央、国务院应当是有权威的,有能力的。没有权威不行啊。我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是制定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我曾经讲过,经过这次事件,我

们只要认真总结过去,考虑未来,我们的发展也许不但更稳、更好,而且可能会更快一点。这件坏事变成好事的可能性是有的。农业问题也要研究,最终可能是科学解决问题。科学是了不起的事情,要重视科学。

第二,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腐败。

开放方面的工作主要是国务院来做。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要有点勇气。现在总的是要允许吃亏,不怕吃亏,只要对长远有益就可以干。要多做几件有利于改革开放的事情。外资合作经营要搞,各地的开发区可以搞。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税收方面可以收一些税,为外资服务的行业可以搞一些,我们自己也可以在那里搞一些有利可图的企业,这样就可以搞活。现在国际上担心我们会收,我们就要做几件事情,表明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不变,而且要进一步地改革开放。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目的是取得一个稳定的环境。我跟美国人讲,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只要有利于中国稳定的就是好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任何时候我都没有让过步。美国人骂娘,造谣,没什么了不起。消除机构臃肿,加强法制,这些都是改革。

惩治腐败,至少抓一二十件大案,透明度要高,处理不能迟。在这次事件中,没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口号,口号比较集中的是反对腐败。当然,这个口号在某些人来说是一个陪衬,其目的是用反腐败来蛊惑人心。但对我们来说,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

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你这里艰苦创业,他那里贪污腐败,怎么行?惩治腐败的问题,请你们专门议一下。

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

第三,平息暴乱抓到底。这是个好机会,一下子就把全国的非法组织取缔了,这实在是好事情。处理得好,就会取得一个很大的胜利。对于罪大恶极的不能手软。当然还是要分别是非轻重,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还是要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手段还要是多种的,以体现我们的政策。

以上我说的三点,现在要集中做好。还有一点,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改革开放政策稳定， 中国大有希望^{*}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今天主要是商量我退休的时间和方式。

退休是定了，退了很有益处。如果不退休，在工作岗位上去世，世界上会引起什么反响很难讲。如果我退休了，确实不做事，人又还在，就还能起一点作用。因为在国际上了解我这个人的不少，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影响他们同中国的关系的因素之一。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考虑到中国的安全，现在退比发生了事情退或者在职位上去世有利。退的决心我已经下了好几年了。我曾多次提出，是真心的。现在看来，想要等一个多么适当的时候再退，是等不到的，每次都总有一点因素说退不得。十三大搞了个半退⁽¹¹⁹⁾，但我一直认为那时全退最好。领导班子还是要注意年轻化，要选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政治上好的、有马列主义修养的人还是有的。选人不完全是从党的系统里面选，视野要开阔一点。总之，要有些年轻的人，否则难以为继。这次常委中有老的，有比较年轻的。当时我说，无论如何要给国际上、给人民一个改革开放的形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象,这十分重要。现在看来,对我们四中全会^[120]选出的人,对新的领导班子这一段的活动,国际国内的反映至少是很平静,感到是稳妥的,证明我们这个新的领导班子是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国际上的信任的。如果再加上我们这些人退出去,人家再看上两三个月或半年,我们的局面真正是稳定的,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中国还在继续发展,继续执行原有的路线、方针、政策,到那时,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就慢慢消失了。消失了好,这次事件^[109]一出来,我考虑马上退不行。现在过了三个月,如果到五中全会^[121]正式作出决定,差不多还要一个半月,有了四五个月,政治局面就比较平静了,这是个时机。我过去多次讲,可能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我已经慢慢练习如何过退休生活,工作了几十年,完全脱离总有个过程。下次党代表大会不搞顾问委员会了,还是搞退休制度。我退休的时间是不是就确定在五中全会。犹豫了这么几年了,已经耽误了。人老有老的长处,也有老的弱点。人一老,不知哪一天脑筋就不行了,体力到一定程度也要衰退。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退休成为一种制度,领导层变更调动也就比较容易。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吧。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退的方式。我同杨尚昆^[57]同志谈过,越简单越好。不要形成个惯例,对退的人都歌功颂德一番,那实在没有必要。你一生是什么样子,你在党内搞了几十年,人们都是看到的,有个客观评价。我反复考虑,简化可能比较有利,而且从我开始简化更有利。来个干净、利落、朴素的方式,就是中央批准我的请求,说几句话。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

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很不正常的。而利用退休又来歌功颂德一番,也没有什么好处。还有些形式,比如追悼会,开得那么多,花的人力物力不少,也可以简化一下。都是革命几十年的人,确实都有功劳,也总有一些失误,但一讲都是功劳。我多次拒绝外国人要我写自传。如果自传只讲功不讲过,本身就变成了歌功颂德,吹嘘自己,那有什么必要?至于一些同志回忆自己的历史,写一些东西,那很有益处。聂荣臻同志写的那一段亲自经历的事^[122],很真实。有人也写了自己的错误,比如李维汉^[123]同志。但有些自传还是宣扬自己的多,这种事情值不得赞扬。对我的评价,不要过分夸张,不要分量太重。有的把我的规格放在毛主席之上,这就不好了。我很怕有这样的东西,名誉太高了是个负担。我退休方式要简化,死后丧事也要简化,拜托你们了。

第三个问题,我退休时的职务交代。军委要有个主席,首先要确定党的军委主席,同时也是确定国家军委主席。党要管军队,因为军队始终是党领导的,这次动乱中看得更清楚。军队是党领导的军队,当然也是国家的军队。五中全会上我辞职后,要有新的军委主席,军委也应该有些变化。我们的传统是军队听党的话,不能搞小集团,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把权力集中在几个人身上。军队任何时候都要听中央的话,听党的话,选人也要选听党的话的人。军队不能打自己的旗帜。我提议江泽民同志当军委主席。

总之,以后中央的工作我不过问,除非特别大的问题。让新的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独立思考,独立工作。今天常委的同志都在,我希望你们给国际国内树立一个好

的形象,一个安定团结的形象,而且是一个安定团结的榜样。我们是一个大国,只要我们的领导很稳定又很坚定,那末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中国一定要有一个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领导集体,这点请你们特别注意。改革开放放弃不得。如果固守成规,照过去的老框框一模一样地搞,没有一些试验、一些尝试,包括受一些挫折、有一些失败的尝试,肯定达不到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我们在两三年内要好好地调整。过去失误的,例如通货膨胀,弥补起来。最近我看到学生的现象是可喜的,他们真正在反思,是个大教育啊。问题是很多,但能进行反思就是一个最大的教育,比读什么书都重要。我们要抓紧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搞几年风气就会变的。对文艺战线再加以整顿,整顿书刊市场照现在的部署坚持下去,会变的。我们的目标是“四有”^[124]。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我们这个军队也好啊!尽管现在换了一些年轻人,军长我一个都不认识,但是这个军队确实保持了好传统。

你们这个班子要搞好,关键是要形成集体领导。你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得很好的集体,是一个独立思考的集体。要相互容忍,相互谦让,相互帮助,相互补充,包括相互克服错误和缺点。现在很需要一个这么好的集体,比过去更加需要。这个集体要有个核心。在历史上,我们有毛主席这个核心。这几年我

们出现了两个领导人更迭以及通货膨胀这样的问题,因为有个核心,解决起来就比较容易。江泽民同志应该成为你们这个集体的核心。关于工作方法,我提一点:属于政策、方针的重大问题,国务院也好,全国人大也好,其他方面也好,都要由党员负责干部提到党中央常委会讨论,讨论决定之后再去多方商量,贯彻执行。

前一段我提出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加强。陈云^[44]同志讲,各路诸侯太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各自为政。这个批评是正确的。中央的话不听,国务院的话不听,这不行。特别是有困难的时候,没有中央、国务院这个权威,不可能解决问题。有了这个权威,困难时也能做大事。不能否定权威,该集中的要集中,否则至少要耽误时间。对于不听中央、国务院的话的,处理要坚决,可以先打招呼,不行就调人换头头。“文化大革命”后期,毛主席把八大军区司令对调,这是因为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战争年代形成过山头,当时我们靠马克思主义觉悟,靠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没有形成什么派。就是那样,山头主义也有影响,所以专门反了一次山头主义。地方也有这个问题,搞久了也可以调动一下。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美苏两家打不起来,就没有世界大战。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策没有变。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我们

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中国有抵御外敌入侵的丰富经验,打垮了侵略者,我们再来建设。

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当然我们不要吹,越发展越要谦虚。但是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认真地真正地把改革开放搞下去。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这十年的成绩哪里来的?是从改革开放得来的。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我看总的局势是这样,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别人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

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到本世纪末翻两番有没有可能,我希望活到那个时候,看到翻两番实现。三步走的关键在第二步,第二步为第三步打基础。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改革开放政策稳定,中国大有希望。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中央政治局：

我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

一九八一年我就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近年来,不少老同志已相继退出了中央领导岗位。一九八七年,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前,为了身体力行地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我提出了退休的愿望。当时,中央反复考虑我本人和党内外的意见,决定同意我辞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退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决定我留任党和国家的军委主席的职务。此后,当中央的领导集体就重大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始终尊重和支持中央领导集体多数同志的意见。但是,我坚持不再过问日常工作,并一直期待着尽早完成新老交替,实现从领导岗位完全退下来的愿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120]选出的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领导核心,现已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趁自己身体还健康的时候辞去现任职务,实现夙愿。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是有益的。恳切希望中央批准我的请求。我也

将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辞去国家军委主席的请求。

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所取得的成就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起步，任重而道远，前进中还会遇到一些曲折。但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中国人民既然有能力站起来，就一定有能力永远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邓 小 平

一九八九年九月四日

我们有信心 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一九八九年九月十六日)

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差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十三大^[84]制定的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

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头。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四个坚持的对立面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些年来每年我都讲多次,但是他们没有执行。在这次动乱中赵紫阳暴露了出来,明显地站在动乱一边,实际上在搞分裂。好在有我在,处理不难,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作用。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谈话的一部分。

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八十五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十三大的时候先搞半退,只当军委主席。有些老同志,彭真、邓大姐、徐帅、聂帅,已经全退了。我全退需要中央同意,我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股票市场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希望在较短的时间里实现。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但是动乱我要管。

现在我可以肯定,经过动乱,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和改革开放事业可以搞得更好。动乱给我们上了一堂大课。多年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埋头于具体事务,对政治动态不关心,对思想工作不重视,对腐败现象警惕不足,纠正的措施也不得力。腐败现象很严重,这同不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关系。这次动乱后,大家的头脑清醒了。如果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动乱就平息不了。这次动乱不平息,我们今天哪能在这里谈话?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人民解放军作出了牺牲,不容易,真是不容易。如果那些搞暴乱的人得逞,就要发生内战。内战要是打起来,胜利肯定是我们这一方,但不知要死多个人,伤害多少人的感情,那才是伤筋动骨呢!这次不果断处理不行。平息暴乱中尽量避免伤害人民,特别是学生,这是我们的方针。不采取坚决措施平息暴乱,后果难以设想。

西方世界确实希望中国动乱。不但希望中国动乱,也希望苏联、东欧都乱。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

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别国的事情我们管不了,中国的事情我们就得管。中国不搞社会主义不行,不坚持社会主义不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用二十多年流血斗争赢得的人民共和国,用几十年艰苦奋斗特别是十年来改革开放赢得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中国人民不会把它轻易丢掉。如果丢掉这些成果,如果搞资本主义,首先发生的就是无法解决十一亿人都有饭吃的问题。没有饭吃,中国人干吗?我们搞革命就是要解放穷人。现在可以说,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当然也还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口比较贫困,但不是绝对的贫困。总的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比过去好一些了,国家和社会正在帮助他们努力摆脱贫困。总之,我们有我们的责任,要对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负责,要发展经济,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我这里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经过动乱以后,新的领导班子将坚持过去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当然,在发展进程中不会没有曲折,没有缺点。但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第二,中国人吓不倒。我们不想得罪人,我们要扎扎实实干自己的事,但谁要干涉或吓唬我们,都会落空。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过去自卑了一个多世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站起来了。庞然大物吓唬人,中国人不怕。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抗美援朝打了三年,我们有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传统。也有人怕,方励之^[74]那些人

怕,因此做尽损害自己国家的事,但这种人不多。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我们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对年轻娃娃、青年学生教育不够。控制通货膨胀可以很快见效,而教育的失误补起来困难得多。参加过游行、绝食的许多人思想转变过来,要好多年,不是一两个月的补课就行的。不能责怪参加绝食、游行、签名的人,只追究用心不良、触犯刑律的带头的人。对学生,包括参加过绝食的学生,主要是教育。请你转告你认识的人,包括在国外参加过游行、签名的人,中国不在意这个问题,请他们放下包袱。要说失误,我们确实有失误,许多思想工作没有做,好多话没有讲清楚。有人站在动乱一方,支持他们,如赵紫阳,这更不能怪别人。我们要冷静反思,回顾过去,着眼未来,重视总结经验教训,认真处理面临的问题。这样,就能使坏事变成好事,从事件中得到益处,绝大多数的人会清醒过来,学生思想也会清醒过来。

总之,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国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当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基础上一步步改善。前一段消费过热,我们给人民打了招呼,要过几年紧日子。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

社会主义的中国 谁也动摇不了^{*}

(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六日)

我们两国的关系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典范。最近一个时期,我多次向国际上的朋友们说,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16],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我特别推荐五十年代由我们亚洲人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作为今后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准则。我们两国自七十年代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可以说真正遵循了这个原则。

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什么问题,如果说有,就是要加深合作和交往,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政治上,我们共同为世界的和平、首先是亚洲的和平而努力。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只有争取到和平的环境,才能比较顺利地发展。中国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同样认为,社会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谈话的一部分。

主义国家不能侵犯别国的利益、主权和领土。

过去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现在情况变了。但是,强权政治在升级,少数几个西方发达国家想垄断世界,这点我们看得很清楚。巴黎七国首脑会议^[125]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这个会上决定制裁中国,他们使用经济手段,也使用政治手段,如高级官员不接触。这个东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美国也好,法国也好,他们的决策人至少有两点对中国认识不清。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建立起来的,建国后又进行了三年抗美援朝战争^[106]。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不可能取得胜利。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不但国内没有人有这个本领,国际上也没有人有这个本领,超级大国、富国都没有这个本领。第二,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建国以后,我们处于被孤立、被封锁、被制裁的地位有几十年之久。但归根结底,没有损害我们多少。为什么?因为中国块头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中国共产党有志气,中国人民有志气。还可以加上一点,外国的侵略、威胁,会激发起中国人民团结、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共产党的热情,同时也使我们更清醒。所以,外国的侵略、威胁这一套,在我们看来并不高明,而且使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事实表明,那些要制裁我们的人也开始在总结经验了。总之,中国人民不怕孤立,不信邪。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这是我讲的怎样真正认识中国的话。

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 要由美国采取主动^{*}

(一九八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七二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一九七二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我们在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改变几十年不和关系的时候,总是首先肯定应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现在是否可以这样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谈话的一部分。

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坦率地说,北京不久前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首先是由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煽动起来的。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美国公众得到的情报来自“美国之音”和美国报刊,什么“天安门血流成河”,死了多少万人,连具体数字都有。“美国之音”太不像话,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如果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我们对参加游行示威和签名的学生,包括在海外的学生,都采取原谅的态度,不追究他们的责任。只对少数有野心和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人,进行必要的、程度不同的惩处。我们不能容忍动乱。以后遇到动乱的事,我们还要戒严。这不会损害别人,不会损害任何国家,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

我不说西方国家的政府,但至少西方有一些人要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这只能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感,使中国人奋发图强。人们支持人权,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权。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

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

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这是我讲的真话。

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干涉别国的内政。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会容许任何国家来干涉自己的内政。外国的干涉在某个时候可以给我们造成困难,甚至造成动乱,但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谁也不能阻挡中国的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不搞改革开放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要滑坡。走回头路,人民生活要下降。改革的趋势是改变不了的。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十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

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经济要有一个稳定的局势,中国搞建设不能乱。今天来一个示威,明天来一个大鸣大放大字报,就没有精力搞建设。

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

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 ,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全体同志时的讲话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二日)

最近一段时间,我讲的话很多了,没有新的话要讲了。但是,在我离开军委领导岗位的时候,也应该跟大家讲点话。我的话很短。

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再一点就是,军委领导更换了人。我认为,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江泽民同志是合格的军委主席,因为他是合格的党的总书记。希望大家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在以他为主席的中央军委的领导下,把我们军队建设得更好,为捍卫我们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捍卫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捍卫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做出

更多更大的贡献。

我虽然离开了军队 ,并且退休了 ,但是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 ,关注国家的事业 ,关注军队的前景。

谢谢大家。

对二野历史的回顾^{*}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这些老人啊 好多年没有机会在一块见面了 ,今天随便聊聊天吧。

回想战争年代 ,我们二野^[17] 在每一个阶段都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而且完成得比较好。这是对二野的评价。

整个解放战争 ,从头到尾 ,二野都处在同敌人针锋相对斗争的最前面。开始在晋冀鲁豫 ,用刘伯承^[71] 同志的话说 ,这里是华北解放区的大门 ,敌人要进攻首先就从这个口子来。果然 ,毛主席到重庆谈判的时候 ,敌人从两路来。一路是阎锡山^[126] ,我们就手打了个上党战役^[127] 。接着对马法五^[128] 、高树勋^[129] 一路 ,又打了个平汉战役^[130] 。还要说远一点 ,在抗日战争时 ,我们就处在一个大门的地位。那时不叫二野 ,是二野的前身。国民党同我们搞摩擦 ,几个大解放区都有 ,但最集中的是在晋冀鲁豫。抗战胜利后 ,他们进攻解放区首先攻的就是这个大门 ,而我们守这个大门的力量并不强。阎锡山进攻上党区有三万八千多人 ,我们比他们还少一点 ,也就是三万出头 ,从编制上讲 ,一个完整的、编制充实的团都没有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编写第二野战军战史的老同志时的谈话。

而且装备很差，弹药很少，可以说是一群游击队的集合。还有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那时只有李达^[131]在前线，好多将军都不在，在延安开会。我们是乘坐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运输机回太行的，同机飞回的有伯承和我，还有陈锡联^[132]、陈再道^[133]、陈赓^[134]等。那时宋任穷^[135]留在冀南。仗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我们才到，一下飞机就上前线。在那样的情况下，把阎锡山的进攻部队完全消灭可不容易啊，应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

随后就是平汉战役，国民党第十一战区两个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带的三个军，还有一个乔明礼的河北民军纵队，几个部队打过来。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拚了一次，一拚就是几百人伤亡。我们打平汉战役比打上党战役还困难。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我跟苏振华^[136]通电话，叫他坚持五天，等后续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那次他们那个一纵队的阻击战是打得不错的，完成了阻击任务。这样，后面的队伍才赶上。平汉战役应该说主要是政治仗打得好，争取了高树勋起义。如果硬斗硬，我们伤亡会很大。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他的功劳很大。没有他起义，敌人虽然不会胜利，但是也不会失败得那么干脆，退走的能力还是有的，至少可以跑出主力。他一起义，马法五的两个军就被我们消灭了，只跑掉三千人。这个政治仗，我们下的本钱也不小。高树勋在受汤恩伯^[137]指挥的时候，就同我们有联系。由于关系比较久，所以

我们是派参谋长李达亲自到马头镇他的司令部去做工作的。这件事你们好多人可能不知道。同李达一起去的还有王定南^[138],当时是我们的联络,我见过多次。我们确实知道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李达、王定南一到那里,看见所有的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撤退的。他们见面后,一谈就合拍了,高树勋决定起义,并且第二天就实行起义,把部队开向西北面的解放区。起义的第二天,伯承就到马头镇去看望高树勋。这样,马法五就惊慌了,命令他的两个军南撤。结果,我们在南面,在漳河北岸,把敌人截住了,又打了一个胜仗。

所以说,抗日战争时,全国各个解放区都有摩擦战,但集中在晋冀鲁豫地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进攻,首先也在这个地区。仗一打开,我们才开始真正形成野战军的格局,编成纵队。打完上党战役编了四个纵队,从东向西数,一纵杨得志^[139]、苏振华,在冀鲁豫;二纵陈再道、宋任穷,在冀南;三纵陈锡联、彭涛^[140],在太行;四纵陈赓、谢富治^[141],在太岳。接着,又编了六纵、七纵。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战争开始三个月后,毛主席就说,全国战场只要每个月消灭国民党八个旅,这个仗就肯定能打赢。果然,第一年就歼敌九十七个半旅,略超过一点。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解放战争开始时没有提出反攻的问题,那时反攻时间还捉摸不定。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四七年六、七月,打了一年就很

有把握地确定反攻。要说原因,一个是第一年歼灭了近百个旅的敌人,相应地我们的装备也有所改善。另一个原因是客观形势迫使我们早反攻。那时国民党重点进攻山东和延安,这好比是扁担的两头。我们晋冀鲁豫在中间,虽然不是敌人重点进攻的地区,但是是一个挑扁担的地区,伯承同志讲的是“扁担战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两头的敌人吸引到中间来,而我们的战略反攻,实现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意图。首先过黄河,一下消灭敌人四个师部、九个半旅,旗开得胜,那气势是很了不起的。过黄河实际上就是开始反攻。但是,反攻深入到什么程度?歼敌九个半旅,这只是一个声势,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进一步行动。我们打电报给军委,说趁势还能够在晋冀鲁豫地区继续歼灭一些敌人,吸引和牵制更多的敌人,形势很好啊。毛主席打了个极秘密的电报给刘邓,写的是陕北“甚为困难”。当时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半个月后行动,跃进 to 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实际上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那时搞无后方作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啊。北方人到南方,真不容易。果然一过淮河,好多人拉肚子。中国真正的南北界线是淮河,淮河以南就叫南方,不是长江以南才叫南方。一过淮河,种水稻,走山路,都是南方的生活习惯。原来我们估计不足,只知道北方人到南方有不习惯的问题,过了淮河才知道就是原来的南方人,鄂豫皖的人,在北方过了好多年,也不那么习惯了。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决地挺

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过黄泛区,真困难啊,重装备带不走了,只能丢了,所以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炮兵就很少。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还是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地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大别山这场斗争,主要是我们政策对头,包括军事政策。军事政策就是坚决地拿出三分之一的野战部队地方化,搞军区、军分区。因为大别山的斗争不决定于消灭好多敌人,而决定于能不能站住脚。这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什么叫胜利?胜利不在当时消灭多少敌人。要不要消灭敌人?要消灭,要争取打几个歼灭仗。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完成得并不好,消灭的敌人不多,除地方保安部队外,一共只消灭了几个旅。但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结果,我们站稳了。我们前进了一千里,直达长江,面对着武汉、南京、上海,扩大了四千万人口的新解放区。这是个真正的胜利,前进一千里的意义就在这里。

大别山战略机动范围不大,容不下更多的部队,特别是我们习惯于在平原地区搞大开大合的作战,到这里感到很拘束。所以,把部队分开建立军区、军分区以后,主力就逐步向北面转移。中间还有些插曲,就是部队的同志着急,总想打个把歼灭战。我们开了个会,我讲的话,提出要避战。因为那时打不得败仗,一败就不可收拾。后来刘邓分开了。伯承率领一纵和

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南下大别山的两个后续部队王宏坤^[142]、张才千^[143]的十纵和十二纵，也不在大别山，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就是我一个，先念^[108]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主力撤回北面，准备大的战斗，大的战斗还是到北面去打。大别山斗争的胜利，主要是对几个问题的判断比较准确，处置也比较正确，我们伤亡不算很大，费的劲也不算很大，但是完成了战略任务，种种艰难都克服了，站稳了脚，把战线从黄河延伸到长江。所以说，战略反攻，二野挑的是重担，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经过大别山斗争，二野受到削弱。只有秦基伟^[144]的九纵，你们那一坨，保持兴盛的旺气。主体四个纵队就削弱了，更新也困难啊，有三个纵队每个纵队仅两个旅，只有一个纵队是三个旅，就这样迎接淮海战役^[145]。当然中间还打了一些小仗，凡是有机会取得胜利的，没有丧失过机会，该干的都干了。后来，转出大别山，以后到了豫西，成立扩大的中原局和中原军区。

迎接淮海战役的时候，总的形势很好。东北战场取得了胜利，这对全国鼓舞很大，西北也稳住脚，中原三足鼎立。淮海战役是二野、三野^[18]联合作战，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

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渡江作战,部队突破江防后,我的指挥部在三野司令部,张震是参谋长。渡江战役也就是京沪杭战役的实施纲要是我起草的。

二野的内部关系是非常团结、非常协调的。上下级之间,各纵队之间,甚至于更下层一点,关系都很协调。你们可能注意到,从战争一开始,每一次的具体作战,指挥的都是各纵队的头头,刘邓没有亲自到战场上指挥过一个战斗行动。羊山集战斗就是陈再道指挥的,好几个战斗是陈锡联指挥的,双堆集战斗有一面是王近山^[146]、杜义德^[147]指挥的,也有是陈赓、杨勇^[148]、苏振华指挥的。我们没有发现过下面有什么不对的,也没有纠正过任何纵队领导同志指挥的战斗。我们如果对指挥有意见,发现有不妥的地方,有电话可以联络。这种做法对增加上下级之间的相互信任,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很有好处,还可以锻炼指挥员的主动性,讲句哲学语言叫发挥能动性。野战军的领导人相信自己的部下,下面也相信领导,这种互相团结、互相信任的关系从作战一开始就是这样的。这是个了不起的力量。二野所以能锻炼成这么样一个了不起的部队,主要靠的这一条。

淮海战役一打完,以后就没有什么大仗了。渡江作战后,除了三野在上海打了一仗以外,其他的算得了什么大仗?进军西南,同胡宗南^[149]那一仗打得很容易,同宋希濂^[150]也没有打

多少仗。真正打了一场的是剿匪战斗,打得很漂亮。到西南后,西南局规定的一九五 年的任务概括为几个数字:九十万,九十万,六千万,六十万。什么叫九十万、九十万呀?头一个九十万,就是起义、投诚、俘虏的国民党官兵有九十万,怎么消化,怎么安置,怎么教育改造,这是个大难题,需要解决。还有一个九十万,就是土匪,要把他们消灭。这个完成得很顺利。打土匪本来是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声威雄壮啊,把他们打怕了,费劲也不大。六千万就是西南地区人口中百分之九十的基本群众,要把他们发动起来,搞土改闹翻身。还有一个是要提高我们部队六十万干部战士的质量,以担当起新的繁重的工作任务。这四项任务都完成得不错。这时二野还增加了一个十八兵团,十八兵团原先也是晋冀鲁豫的部队。

这就是二野的历史。二野担了重担,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委托。苦头是吃了不少,但是困难都胜利渡过了。在整个作战过程中,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部队没有完成任务的,全部能够承担艰难的任务,一个新部队也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概括全体,情况都是这个样子。就说这么多,讲的是故事,值得回忆啊。

坚持社会主义 ,防止和平演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非洲的解放和发展不是几年能够解决的。老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强权主义 ,真不少啊 现在贫穷弱小的国家 ,环境比过去更困难一些 ,需要更多的艰苦奋斗。

美苏双方会谈 ,裁军的势头不错 ,我们表示欢迎。我希望冷战结束 ,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 ,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 ,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 ,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东欧的事情对我们说来并不感到意外 ,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西方国家对中国也是一样 ,他们不喜欢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今年的动乱^[109]也是迟早要出现的。其中也有我们内部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两个总书记都在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上栽了跟头。如果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那末肯定会有动乱 ,使我们什么事情也干不成 ,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路线、三个阶段发展战略的目标统统告吹。所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南方委员会主席、坦桑尼亚革命党主席尼雷尔时的谈话。

以,必须坚决地制止动乱。以后遇到动乱时,还要坚决制止,以保持稳定。西方国家说我们侵犯了人权,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侵犯人权。美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伤亡了多少?美国支持南朝鲜进行战争^[106],中国人民志愿军伤亡了多少?还不说一个多世纪以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包括美国在内)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有多大。所以,他们谈人权是没有资格的。

霸权主义过去是讲美苏两家,现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125]也是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贫弱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国权经常被他们侵犯。他们那一套人权、自由、民主,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我们从来就不听那一套,你们也是不听那一套的。过去我们很弱的时候就没有听,在井冈山打旗帜才几千人,一打就是二十二年,最后还是战胜了帝国主义和他们支持的力量,中国人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困难很多,内战刚结束,国内问题成堆,又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国和美国打了一仗。美国是个庞然大物,力量对比起来,中国很弱,特别是装备差得多。但是,正义取得了胜利,美国只得坐下来同我们在板门店谈判。

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十三大^[84]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我们这个党就

是在威胁中诞生的 ,在威胁中奋斗出来的 ,奋斗了二十八年才真正建立了人民共和国。现在我们总比过去好得多。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 ,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

国家的主权和安全 要始终放在第一位^{*}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一日)

在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实行制裁时,你们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我国访问,这是真正友情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虽然我们并不算处于患难之中,但你们此时来我国访问的真情是可贵的。现在同情和支持我们的人比要制裁我们的人多得多,我们没有孤立感。

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换了代,现在事情归新一代领导人管了。他们主持全局已经五个多月了,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并没有因为我退下来而有任何变化。我们一直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不但这一届领导人要坚持,下一届、再下一届都要坚持,一直坚持下去。为什么这些方针政策不能变呢?因为十年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套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根本发展战略。

在过去的工作中我们虽然有一些失误,但今年发生的事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时谈话的要点。

件^[109]的原因也来自国际上的大气候。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开动了全部宣传机器进行煽动,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他们在许多国家煽动动乱,实际上是搞强权政治、霸权主义,要控制这些国家,把过去不能控制的国家纳入他们的势力范围。看清了这一点,就有助于认清问题的本质,总结经验教训。

这次动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搞强权政治的国家根本就没有资格讲人权,他们伤害了世界上多少人的人权。从鸦片战争侵略中国开始,他们伤害了中国多少人的人权。巴黎七国首脑会议^[125]要制裁中国,这意味着他们自认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对不听他们话的国家和人民进行制裁。他们不是联合国,联合国的决议还要大多数同意才能生效,他们凭什么干涉中国的内政?谁赋予他们这个权力?任何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行动,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接受,也不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次动乱还使我们更加认识到稳定的重要性。前不久尼克松^[151]、基辛格^[152]来中国访问时,我对他们说,中国要摆脱贫困,实现四个现代化,最关键的问题是需要稳定。其实这个话早在这次事件发生前我就对美国人说过。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国什么事情也干不成。这次我们采用戒严的方式解决了动乱问题,这是非常必要的。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尽快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

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

我们总结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就是要把过去某些方面的失误认真地尽快地纠正过来。思想工作要加强。艰苦奋斗还是需要的,前一时期讲得少了,做得更少,自力更生为主也讲得少了。经济工作要整顿,使我们国家的经济建设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效。

我虽然退休了,但还是关注着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们两国毕竟是近邻,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即使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时,也有很多日本人在反对侵略。讲历史要全面,既要讲日本侵华的历史,也要讲日本人民、日本众多友好人士为中日友好奋斗的历史,这些人多得很呐。你们这么大的一个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肯定有人会不高兴的,但是你们的勇敢行动证明,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一样,是希望中日两国世代友好下去的。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才行^{*}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日)

你这次访问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和稳定的需要。尽快解决六月以来中美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使中美关系得到新的发展,取得新的前进,这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也太不合情理了。

中国在国际上有特殊的重要性,关系到国际局势的稳定与安全。如果中国动乱,问题就大得很了,肯定要影响世界。这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美国之福。

中国威胁不了美国,美国不应该把中国当作威胁自己的对手。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件伤害美国的事。一九七二年到现在的十七年中,世界局势总的比较稳定,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形成这样好的局势的一个原因,占的分量不轻。中美不能打架,我说的打架不是打仗,而是笔头上和口头上打架,不要提倡这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总统特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时谈话的节录。

些。我多次讲过,美国的制度中国不能搬,美国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国人自己说,我们不干预。两国相处,要彼此尊重对方,尽可能照顾对方,这样来解决纠葛。只照顾一方是不行的。双方都让点步,总能找到好的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恢复中美关系要双方努力,不要拖久了,拖久了对双方都不利。

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香港基本法具有 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

(一九九 年二月十七日)

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 ,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 ,不只对过去、现在 ,而且包括将来 ;说国际意义 ,不只对第三世界 ,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 !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 !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的委员时的即席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一九九 年四月四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并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实施。

国际形势和经济问题^{*}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日)

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

美苏垄断一切的情况正在变化。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

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具体的做法，还是要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对苏联对美国都要加强来往。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综观全局,不管怎么变化,我们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这十年建设,不要耽搁。这十年时间能够实现第二个翻番,就是我们最了不起的胜利。

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所以,我们要力争在治理整顿中早一点取得适度的发展。

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要按一九八一年的固定价格,没有水分的,还要把人口增长的因素计算在内。这样算,究竟每年增长速度要达到多少?我们现在的算法究竟准不准确,可不可靠?年增百分之六的速度是不是真正能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个要老老实实地计

算,要最终体现到人民生活水平上。生活水平究竟怎么样,人民对这个问题感觉敏锐得很。我们上面怎么算帐也算不过他们,他们那里的帐最真实。

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必要,但只靠这些也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的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稳如泰山。

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务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下去。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农村富起来容易,贫困下去也容易,地一耕不好农业就完了。

总之,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个大问题。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恐怕长期是这个问题,至少十

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

振兴中华民族^{*}

(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年来,已经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去年发生动乱^[109],当时我们控制了局势,这是完全必要的。我曾经请人转告布什总统,中国如果不稳定就是个国际问题,后果难以想象。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社会主义中国。

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这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

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谈话的一部分。

方七国首脑会议^[125]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零一年八国联军^[153]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现在世界上有人在讲“亚洲太平洋世纪”。亚洲有三十亿人口,中国大陆就占十一亿多。所谓“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当然没有印度的发展也形不成。中国的形象如何还是要看大陆,中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也在大陆。台湾跟大陆争正统,不自量力。大家都应该想开点。我们已经想开了,提出“一国两制”。我们相信,最终将靠“一国两制”把我们国家统一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将会成为一个经济大国,现在已经是一个政治大国了。联合国的席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我们大陆虽然人均收入水平低,但并不是样样都落后。比如钢铁,年产量已经达到六千万吨,还有太空领域和其他领域高科技的发展,中国发射卫星的成功率很高。中国人是很聪明的,虽然科学家研究条件差,生活待遇不高,但他们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中国人分散开来力量不大,集合起来力量就大了。

中国人要振作起来。大陆已经有相当的基础。我们还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希望中国兴旺发达,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也不怕制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自己也永远不称霸。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中国永远不允许 别国干涉内政^{*}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一日)

去年以来一些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我认为,第一,他们没有资格制裁中国;第二,实践证明中国有抵抗制裁的能力。中国经济发展虽然受了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事实上,制裁正在逐渐消失。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尽管东欧、苏联出了问题,尽管西方七国制裁我们,我们坚持一个方针:同苏联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同日本、欧洲国家也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这一方针,一天都没有动摇过。中国度量是够大的,这点小风波吹不倒我们。

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时的谈话。

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世界上那么多伊斯兰国家就根本不可能实行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穆斯林人口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中国人口也占了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还有非洲,非洲统一组织的强烈的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别国不要干涉他们的内政。这是世界局势的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西方发达国家坚持干涉别国内政,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那就会形成国际动乱,特别是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的动乱。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来摆脱贫困。政治不安定,谁还有精力搞饭吃?更谈不上发展了。所以现在确实需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作为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准则。现在出现的新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少数国家垄断一切,这种形式过去多少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今后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只要历史证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够了,别国的社会制度如何我们管不了。东欧事件发生后,我跟美国人说,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现在东欧的问题尚未解决,再捅别的乱子干不得!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中国动乱,那将是个什么局面?现在要是中国乱起来,就决不只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问题。那时还有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威信,说是“全面内战”,到底不是大打,真正的内战并没有出现。现在就不同了,如果再乱,乱到党不起作用了,国家权力不起作用了,这一派

抓一部分军队 ,那派抓一部分军队 ,就是个内战的局面。一些所谓民主斗士只要一拿到权力 ,他们之间就会打起来。一打内战就是血流成河 ,还谈何“人权” ? 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 ,生产衰落 ,交通中断 ,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 ,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所以 ,中国不能把自己搞乱 ,这当然是对中国自己负责 ,同时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外国的负责的政治家们也会懂得 ,不能让中国乱。什么人权、民权问题 ,都管不住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 ,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 ,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中国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为了引起大家警惕 ,是为了提醒各国决定对华政策时要谨慎。

共同努力 ,实现祖国统一^{*}

(一九九 年九月十五日)

台湾方面最近开始有些松动。但是现在台湾有人想搞“一国两府”,连联合国的局面都想改变,实际上还是搞“两个中国”。现在联合国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怎么能把台湾当局称为中国政府呢?这不行。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大陆是中国的主体,有十一亿人口。其中汉族占百分之九十二,少数民族占百分之八。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

大陆同胞,台湾、香港、澳门的同胞,还有海外华侨,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子孙。我们要共同奋斗,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

^{*} 这是邓小平同志会见马来西亚郭氏兄弟集团董事长郭鹤年谈话的一部分。

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现在国际形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有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作什么?我看要积极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4]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

对一年半以来中央的工作,我满意。对这次统一思想,制定出新的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我完全赞成。看来我们农业的潜力大得很,要一直抓下去。钢要有一亿到一亿二千万吨才够用,这是个发展战略问题。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等,都很重要。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稳扎稳打。在翻两番的基础上,再用三十年到五十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

年时间,我国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前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真正体现出来了。

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

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能力,承担风险的能力。为什么这次治理通货膨胀能够见效这么快,而且市场没有受多大影响,货币也没有受多大影响,原因就是有这十二年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我们处理问题,要完全没有风险不可能,冒点风险不怕。

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你闹资产阶级自由化,用资产阶级人权、民主那一套来搞动乱,我就坚决制止。马克思说,阶级斗争不是他的发现,他的理

论最实质的一条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本身的力量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肯定弱于资本主义,不靠专政就抵制不住资本主义的进攻。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叫人民民主专政。在四个坚持中,坚持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条不低于其他三条。理论上讲清楚这个道理是必要的。

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国际上不可能小视我们,来中国投资的人会越来越多。要善于把握时机来解决我们的发展问题。后年党代会要选一些年轻一点的精力充沛的人进政治局,进常委会更好。这一年多的成绩不可低估,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最关紧要的是有一个团结的领导核心。这样保持五十年,六十年,社会主义中国将是不可战胜的。

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十八日)

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29],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

^{*}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进行视察的过程中,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的要点。

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

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但那也是出于好意,一是不习惯,二是怕,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当然,太着急也不行,要用事实来证明。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闭关自守不行。“文化大革命”时有个“风庆轮事件”^[154],我跟“四人帮”吵过架,才一万吨的船,吹什么牛!一九二一年我到法国去留学时,坐的就是五万吨的外国邮船。现在我们开放了,十万、二十万吨的船也可以造出来了。如果不是开放,我们生产汽车还会像过去一样用锤子敲敲打打,现在大不相同了,这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反映在各个领域,不只是汽车这个行业。开放不坚决不行,现在还有好多障碍阻挡着我们。说“三资”企业^[60]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我们抓国防工业的军民结合,抓得比较早,这一条抓对了。有的国家就不行,所以搞得很困难。

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总结经验 ,使用人才^{*}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日)

现在中国局势稳定 ,一个是由于处理一九八九年那场动乱^[109]时坚持社会主义 ,一点也不动摇 ;再一个是由于坚持改革开放。如果不坚持改革开放 ,不拿实际行动证明这一点 ,也是不行的。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方面道理也要讲够。

这一段总结经济工作的经验 ,重点放在哪里 我看还是放在坚持改革开放上。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 ,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是对的 ,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现在工业发展还是两位数嘛 ,农业情况也不坏嘛。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 ,跳一个台阶 ,跳了以后 ,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 ,再前进。总结经验 ,稳这个字是需要的 ,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 ? 还得用。什么时候用 ,如何用 ,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 ,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 ,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抓住时机上台阶。

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 ,十年就

* 这是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的一部分。

跳出来了。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要讲。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还有一个问题,发现和使用人才的问题。的确是人才难得啊。你们从下面上来,左邻右舍,上上下下,接触广泛,了解的人多。你们觉得是人才的,即使有某些弱点缺点,也要放手用。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一九七五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我们现在不是人才多了,而是真正的人才没有很好地发现,发现了没有果断地起用。对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意见,不会完全一致。有缺点可以跟他谈清楚,要放手地用人。总的看,我们对使用人才的问题重视不够。我建议中央总结一下用人的问题,尊重人才,广开进贤之路。

一个总结经验,一个使用人才,这两点是我的正式建议。

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八日——二月二十一日)

(一)

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29]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

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109]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

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世界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想变也变不了。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155]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43]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的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二)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

业^[60] ,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 ,就不怕。我们有优势 ,有国营大中型企业 ,有乡镇企业 ,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有的人认为 ,多一分外资 ,就多一分资本主义 ,“三资”企业多了 ,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 ,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 ,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 ,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 ,国家还要拿回税收 ,工人还要拿回工资 ,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 ,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 ,“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 ,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要对大家讲这个道理。证券、股市 ,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 ,有没有危险 ,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 ,社会主义能不能用 ?允许看 ,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 ,搞一两年对了 ,放开 ;错了 ,纠正 ,关了就是了。关 ,也可以快关 ,也可以慢关 ,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 ,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 ,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 ,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 ,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

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对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不只是经济特区问题，更大的问题是农村改革，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废除人民公社^[55]制度。开始的时候只有三分之一的省干起来，第二年超过三分之二，第三年才差不多全部跟上，这是就全国范围讲的。开始搞并不踊跃呀，好多人在看。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看，比强制好得多。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愿意干就干，干多少是多少，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东西有,动乱就是右的!“左”的东西也有。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三)

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

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比如广东,要上几个台阶,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102]。比如江苏等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就应

该比全国平均速度快。又比如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这五年,首先是农村改革带来许多新的变化,农作物大幅度增产,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广大农民购买力增加了,不仅盖了大批新房子,而且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四大件”和一些高档消费品进入普通农民家庭。农副产品的增加,农村市场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又强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这五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六万多亿元,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一点七。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等生产资料也大幅度增长。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就是这样相互影响、相互促进。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一九八九年开始治理整顿。治理整顿,我是赞成的,而且确实需要。经济“过热”,确实带来一些问题。比如,票子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但是,怎样全面地来看那五年的加速发展,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

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54]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那五年的加速发展功劳不小,这是我的评价。治理整顿有成绩,但评价功劳,只算稳的功劳,还是那五年加速发展也算一功?或者至少算是一个方面的功?如果不是那几年跳跃一下,整个经济上了一个台阶,后来三年治理整顿不可能顺利进行。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近一二十年来,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

有希望。近十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不小,希望在九十年代,进步得更快。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我是个外行,但我要感谢科技工作者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和争得的荣誉。大家要记住那个年代,钱学森^[156]、李四光^[157]、钱三强^[158]那一批老科学家,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把两弹一星和好多高科技搞起来。应该说,现在的科学家更幸福,因此对他们的要求会更多。我说过,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老科学家、中年科学家很重要,青年科学家也很重要。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不只我们高兴,人民高兴,国家高兴。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

(四)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

好。开放以后,一些腐朽的东西也跟着进来了,中国的一些地方也出现了丑恶的现象,如吸毒、嫖娼、经济犯罪等。要注意很好地抓,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些东西就一扫而光。吸鸦片烟、吃白面,世界上谁能消灭得了?国民党办不到,资本主义办不到。事实证明,共产党能够消灭丑恶的东西。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78]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说过,阶级斗争学说不是他的发明,真正的发明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

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五)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这是眼前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已经顺利解决了,希望解决得好。“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跟头。这就不能让了。我在一九八九年五月底还说过,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

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现在中央这个班子年龄还是大了点,六十过一点的就算年轻的了。这些人过十年还可以,再过二十年,就八十多岁了,像我今天这样聊聊天还可以,做工作精力就不够了。现在中央的班子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我们这些老人关键是不管事,让新上来的人放手干,看着现在的同志成熟起来。老年人自觉让位,在旁边可以帮助一下,但不要作障碍人的事。对于办得不妥当的事,也要好心好意地帮,要注意下一代接班人的培养。我坚持退下来,就是不要在老年的时候犯错误。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这条中国的发展路线,是否能够坚持得住,要靠大家努力,特别是要教育后代。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

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练。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要求不得超过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务。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最近,有的外国人议论,马克思主义是打不倒的。打不倒,并不是因为大本子多,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颠扑不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六)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

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

注 释

- 1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至六月十一日 在延安举行。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 ,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 ,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 ,壮大人民力量 ,在我党的领导下 ,打败日本侵略者 ,解放全国人民 ,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 ,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第 1 页。
- 2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 ,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毛泽东致开幕词 ,刘少奇作政治报告 ,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 ,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 ;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重要发言。大会通过《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 ,并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 ,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 2, 254 页。
- 3 薄一波 ,一九 〇八年生 ,山西定襄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届中央委员 ,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 ,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 ,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 ,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第 6 页。

- 4 章蕴,一九〇五年生,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一九八二年九月在中共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八二年上半年,她曾代表中纪委到上海、福建等地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第7页。
- 5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八二年九月一日至十一日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开幕词,胡耀邦作《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李先念致闭幕词,叶剑英、陈云作重要发言。大会根据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和方针政策,确定了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争取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具体步骤。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9、28、70、98、143页。
- 6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确定中国经济建设翻两番的总目标时,是用工农业总产值计算的。由于国际上通常使用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生产总成果,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水平,从一九八五年起,中共中央在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时,开始正式用国民生产总值计算。——第9页。
- 7 “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第9、81、264、298页。
- 8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是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进行的一场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粉碎“四人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推行并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应该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党的工作。随后,他多次同党内同志谈话,说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同年九月十九日,他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谈话时提出,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

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际上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这篇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场讨论受到华国锋等的压制,但由于邓小平等多数中央领导人的积极领导和支持,讨论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这场讨论,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第10、39页。

- 9 指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还增选出中央领导机构的成员。这些在领导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转变,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第10、27、81、115、124、134、157、202、223、264、266、269、288、305页。
- 10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的问题。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一八四〇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一八四二年签订《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一八五六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一八六〇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一八九八年英国又乘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二百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九十九年,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期满。中国人民一直反对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人民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祖

国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三大任务而奋斗。邓小平提出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构想。同时,随着一九九七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方面不断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一九八二年九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至一九八三年六月,双方主要就原则和程序问题进行会谈。第二阶段从一九八三年七月至一九八四年九月,两国政府代表团就具体实质性问题进行了二十二轮会谈。

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四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此前,中国总理同她举行了会谈。中国领导人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七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坚持三个不平等条约仍然有效,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一九九七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针对撒切尔夫人的言论,邓小平在同她会见时作了重要谈话。通过这次谈话,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此后的半年里,由于英方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立场不变,双方的磋商没有进展。一九八三年三月撒切尔夫人写信给中国总理,作出了她准备在某个阶段向英国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主权回归中国的保证。四月中国总理复信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二日至十三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轮会谈,由于英方仍然坚持一九九七年后英国继续管治香港,直至第四轮会谈毫无进展。一九八三年九月邓小平会见访华的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十月英国首相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一九九七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

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在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英方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属于中央政府,英方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一九九七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一九八四年四月第十二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的事项。

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其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一九九七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一九八四年四月英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邓小平会见他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在此后三个多月的会谈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七月英外交大臣再次访华,中方表示如英方同意设立联合小组并以香港为常驻地,该小组进驻香港的时间以及一九九七年后是否继续存在一段时间都可以商量。最后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一九八八年七月一日进驻香港,二〇〇一年一月一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以下表述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

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的表述。

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具体问题，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进行了反复磋商。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九月二十六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至此，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圆满结束。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第12页。

- 11 香港地区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为一千零七十六平方公里，其中香港岛面积七十九点七七平方公里，九龙面积十一万七平方公里，新界面积九百八十四点五三平方公里。据一九九二年底统计，香港总人口为五百九十万。香港地区在英国占领之前，隶属中国广东新安县（后改为宝安县，今深圳市）管辖。——第12页。
- 12 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〇一），安徽合肥人。晚清军政重臣。一八七〇年起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曾代表清政府主持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及《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第12页。
- 13 聂荣臻（一八九九——一九九二），四川江津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六年起任国务院副总理，一九五八年后兼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九年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长期主管科学技术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是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17页。
- 14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正式写入双方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的许多国际性文件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

- 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第 19、70、96、283、328、353、360、363 页。
- 15 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位于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人们习惯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称为南南合作。——第 20、56、96 页。
- 16 由于发展中国家多数在发达国家的南方,因此国际上习惯把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称为南北关系,或称南北问题。——第 20、56、96、105、233、281、328 页。
- 17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称晋冀鲁豫野战军。一九四八年五月改称中原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二野战军所属部队归西南军区建制。——第 25、336 页。
- 18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主力部队之一,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华中的新四军大部和在山东的八路军一部逐步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解放战争初期,进到山东的新四军主力一部和留在山东的八路军主力一部组成山东野战军,留在华中的新四军部队组成华中野战军。一九四七年一月,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一九四九年二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全军部队组织番号的指示,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野战军和兵团番号,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归华东军区建制。——第 25、341 页。
- 19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的关于大陆和台湾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是:“(一)为了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不幸局面,我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实行第三次合作,共同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双方可先派人接触,充分交换意见。(二)海峡两岸人民迫切希望互通通讯、亲人团聚、开展贸易、增进了解。我们建议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有关协议。(三)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中央政府不干预

台湾地方事务。(四)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五)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六)台湾地方财政遇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情补助。(七)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大陆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八)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和利润。(九)统一祖国,人人有责。我们热诚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方式提供建议,共商国是。”——第31、102页。

- 20 一九八三年六月四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邓颖超在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任务。她指出,我们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我们充分考虑台湾各族人民的愿望和台湾当局的处境。我们不仅考虑到现在,也考虑到将来。祖国统一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将持久合作,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互为补充,互相支援。只有在现实基础上的真正统一,才能带来国家富强,民族兴旺。赞成祖国统一就是爱国。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我们深切希望台湾各族同胞、港澳同胞、国外侨胞同祖国大陆各族人民一道,继续为祖国和平统一献计献策,共商国是。——第31页。
- 21 指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蒋介石(一八八七——一九七五),浙江奉化人。前中国国民党主席、总裁,国民党政府总统。蒋经国(一九一——一九八八),蒋介石的长子,一九七五年蒋介石去世后继任中国国民党主席。一九七八年当选台湾国民党政府总统。——第31、60、86页。
- 22 彭真,一九二二年生,山西曲沃人。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等职。一九八一年兼任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一九八三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33页。
- 23 指一九八三年十月十一日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的思想、作风、组织严重不纯的状况,阐明了

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明确指出整党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从一九八三年冬季开始,用三年时间对党的作风和组织进行一次全面整顿,并对整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和方法作了具体规定。——第36页。

- 24 “三种人”指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第37页。
- 25 《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九八一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准则共十二条:一、坚持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二、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四、坚持党性,根绝派性;五、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六、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七、保障党员的权利不受侵犯;八、选举要充分体现选举人的意志;九、同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十、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十一、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十二、努力学习,做到又红又专。——第39页。
- 26 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三十多年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科学的总结,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我们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决议形成以前和以后,理论界围绕上述问题作了一些讨论、研究和宣传工作。——第39、174、272页。
- 27 “双百方针”即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这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从此,它成为促进我国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项基本方针。——第45、145页。
- 28 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513—514页)。——第47页。

- 29 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当年八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些经济特区相继兴建。一九八四年邓小平考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管理体制,建设上以吸收利用外资为主,经济所有制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经济活动在国家宏观经济指导调控下,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予以优惠和方便;特区拥有较大的经济管理权限。一九八五年以前,四个经济特区主要进行以创建投资环境为重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从一九八六年起,致力于发展以工业为主、工贸结合、农牧渔和旅游业并举的外向型经济。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决议,批准海南岛为海南经济特区,实行更加灵活开放的经济政策。我国现有的五个经济特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对外开放的窗口作用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作用。——第51、133、239、366、370页。
- 30 自由港又称“自由口岸”,是设在一国国境之内、海关管理关卡以外的允许外国货物、资金自由进出的港口区。进出港区的货物免征关税,准许在港区内进行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售等业务活动。只有当货物转移到自由港所在国的课税地区时,才需缴纳关税。自由工业区、自由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等都具有类似自由港的功能。——第52页。
- 31 百色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右江地区百色领导的武装起义。一九二九年七月,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十二月十一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在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前委书记、军政治委员。十二日右江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领导龙州起义,成立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李明瑞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至此,初步形成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七军和红八军一部整编为红七军,经转战桂湘粤赣边境,于一九三一年七月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序列。——第54页。
- 32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殖民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

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查禁鸦片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〇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同人民群众一道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海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第60、62、90、205、219、227、292页。

- 33 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关于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港口城市的建议。这十四个沿海城市是: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第65、84、239页。
- 34 指中英两国政府在一九八四年九月十八日就香港问题达成的协议。该协议于同年九月二十六日在北京草签,十二月十九日由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协议包括一个主体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三个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关于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和《关于土地契约》。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中英联合声明的批准书,联合声明从此生效。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给中国。中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中阐述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主要有:设立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香港现行的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的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将保持自由港和独立关税地区的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香港社会治安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中国政府的上述基本方针政策五十年内不变。协议还就香港政权顺利交接的有关事项作了具体规定。——第72、101页。
- 35 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

决定,总结了中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决定指出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决定,是指导中国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第 78、81、83、95、108、131、142 页。

- 36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主持中央党政日常工作期间,为实现“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紧迫任务,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各方面工作的严重混乱状态,对交通、工业、农业、军队以及科技、文教等方面的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整顿措施。通过整顿,铁路运输堵塞不畅的状况迅速改观;工业生产停滞下降的局面开始扭转;农村形势明显好转;军队建设得到加强;“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文教、科技领域的工作也有了起色。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于同年底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致使整顿中断,各方面工作再度陷入混乱。——第 81 页。
- 37 撒切尔夫人即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一九二五年生,英国保守党人。一九七九年至一九九一年任英国首相。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四年曾两次以首相身份访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访华时同中国政府总理正式签署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第 84 页。
- 38 卡特,一九二四年生,美国民主党人。一九七七年至一九八一年任美国总统。——第 86、170 页。
- 39 《与台湾关系法》是美国总统卡特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签署生效的一项立法。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同时美国政府宣布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出美国军队。一月二十六日卡特总统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分别于三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予以通过。《与台湾关系法》声称:“美国作出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决定是以台湾的前途将以和平方式决定这种期望为基础的;

凡是企图以和平以外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都将会威胁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引起美国的严重关注。”并提出要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使之“保持抵御会危及台湾人民的安全或社会、经济制度的任何诉诸武力的行为或其他强制形式的能力”。这个法案继续将台湾当作“国家”对待,违反了中美两国建交时双方同意的原则以及美方的承诺,是对中国内政的公然干涉。——第 86、170 页。

- 40 明成祖即朱棣(一三六——一四二四),明朝第三代皇帝。一四二二年至一四二四年在位。年号“永乐”。——第 90 页。
- 41 郑和(一三七——一四三三),云南昆阳(今晋宁)人。回族。明初入宫,后任内官监太监。一四〇五年至一四三三年间,先后七次率领庞大船队出使亚非各国,遍访东南亚、印度洋及红海沿岸的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曾达非洲东海岸及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史称郑和下西洋(明代称今文莱以西海域为西洋)。郑和的远航促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第 90 页。
- 42 康熙指清朝第二代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康熙(一六六二——一七二二),乾隆指第四代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年号乾隆(一七三六——一七九五)。清朝初年,因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领导反清武装斗争,清政府厉行海禁,严禁人民出海,严格限制对外贸易。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统一台湾后,才允许商民造船出海,并于一六八五年指定澳门(后改广州)、漳州、宁波等地为对外通商口岸,允许外商来华贸易。后因西方殖民者在中国境内进行非法活动,而日趋保守的清政府仅从消极方面采取防范措施,于一七五七年关闭广州以外各沿海口岸,并制定了许多限制外商来华贸易的禁例,继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第 90 页。
- 43 这里指安徽省芜湖市的一家个体户,他雇工经营,制作和销售瓜子,称为“傻子瓜子”,得以致富。——第 91、371 页。
- 44 陈云,一九〇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七、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 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在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随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第 92、153、296、309、319 页。
- 45 杜勒斯(一八八八——一九五九),美国共和党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代表美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一九五一年任杜鲁门政府顾问。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九年任美国国务卿。他在国际活动中,鼓吹“冷战”,推行“战争边缘”、“大规模核报复”以及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等战略。一九五一年他参与策划美国政府利用朝鲜战争的机会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一九五四年他又策划美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企图使霸占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将台湾长期作为美国的军事基地。——第 97、169 页。
- 46 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是邓小平一贯倡导的。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他指出:“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本身建设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于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一九八三年六月,邓小平又为《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展览》题词:“大力培养既能打仗又能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军地两用人才”。——第 100 页。
- 47 余秋里,一九一四年生,江西吉安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第 100 页。
- 48 这里指一九八一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四个城市设置的经济特区和一九八四年五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外开放的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行政区。一九八五年后,陆续又有一些沿海城市被划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第 103 页。
- 49 大平正芳(一九一——一九八),日本自由民主党人。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一九七九年十二月率日本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国时同邓小平进行了会谈。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初步构想。——第 105 页。

- 50 一九八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个单位,为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号召,在联合发出的《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中提出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五讲四美”,即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在开展“五讲四美”活动中,中央总结了有些地方开展的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的活动经验,从一九八三年起,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统一起来,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110页。
- 51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115、136、227页。
- 52 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建国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15页。
- 53 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国范

国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 115 页。

- 54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提出总路线的同时,党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先是在农业生产上片面追求高指标,报刊不断宣传“高产卫星”。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气氛中,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一九五八年钢的产量要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会后立即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与此同时,其他工业、交通、邮电、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也都开展“全民大办”。这种“以钢为纲”所带起的一系列大办,把“大跃进”运动推向了高潮,使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等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打乱了正常的经济建设秩序,浪费了巨大的人力和资源,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第 115、136、173、227、234、237、253、377 页。
- 55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后,农村中出现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并为大社的热潮,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并于八月被定名为人民公社。同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人民公社未经试验就迅速在全国普遍建立起来。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为特点,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一般为一乡一社,个别的一县一社。公社内部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管理,贫富拉平,平均分配,无代价上调下属生产队以至社员的个人财产,导致“共产风”严重泛滥。一九五八年冬以后,特别是一九六一年春以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曾经为人民公社制定了一系列政策界限,陆续纠正了一些错误,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的问题,农民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然受到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公社原有的体制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逐步改变。一九八三年十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设立乡政府的规定,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至一九八四年底全国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至此,农村人民公社制度已不复存在。——第 115、136、234、253、374 页。
- 56 指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一九八五年三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一九八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第 122 页。

- 57 杨尚昆,一九二七年生,四川潼南人。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六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八二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一九八八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126、316页。
- 58 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从战备需要出发,根据战略位置的不同,将我国各地区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指处在战略前方的一些省区,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二线指处于一线和三线之间的省区。——第127页。
- 59 “山、散、洞”,是“靠山、分散、进洞”的简称。六十年代中期,为防备侵略战争,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国防尖端项目要搬到三线地区,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方针进行建设,有的还要进山洞。——第127页。
- 60 “三资”企业指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和外方独资企业。——第138、367、373页。
- 61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于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出版的。该书收入了邓小平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之间的重要讲话和谈话。一九八七年三月又编辑出版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增补了邓小平一九八四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的重要讲话和谈话。——第139页。
- 62 新经济政策,是苏联在一九二一年由国内战争转变到和平经济建设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主要内容是: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农民缴税后的剩余粮食,可以自由出卖;发展商业,在一定限度内允许自由贸易和私商存在;在国营企业中实行经济核算制,并以租让、租赁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把某些国营企业租给外国资本家或私人经营。——第139页。
- 63 指杨小民故意杀人一案。杨小民是前中共青海省委办公厅某副主任之子。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蓄意将待业青年王强杀害。后因杨小民案重罪轻判,久拖不改,死者亲属不服,多次上诉,均无效果。一九八五年七月,在中央有关部门的关注下,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终于依法判处杨小民死刑。——第152页。

- 64 刘青山,一九三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一九三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初期任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他们任职期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治河款,克扣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民工供应粮,并骗取银行贷款,将这些款项以机关生产名义违法经营,获取暴利,从中大量贪污,进行贿赂,任意挥霍。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报请中央批准,依法律手续将刘青山、张子善逮捕。十二月刘、张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二年二月被河北省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死刑。——第153页。
- 65 指一九八六年一月六日和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号召中央党政军机关的全体党员、干部在端正党风中做全国的表率。——第154页。
- 66 指以荣毅仁及其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为代表的荣氏家族。荣毅仁,一九一六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席。他的父辈创业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无锡、上海等地从经营钱庄等商业活动开始,继而投资兴办面粉厂、纺织厂、机械厂等工业企业,先后建立茂新面粉公司、福新面粉公司、申新纺织公司,成为旧中国民族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企业集团之一,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一九五六年,荣家在大陆的企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第161页。
- 67 一九八六年七月二十八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大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就苏联的亚洲政策和中苏关系发表讲话。关于中苏关系,他的讲话要点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创造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苏中边界能成为和平与友好的地区;苏联愿以黑龙江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为界的正式走向;苏联正同蒙古领导人一起研究关于相当大一部分苏军撤出蒙古的问题;一九八九年底以前苏联将从阿富汗撤回六个团,理解和尊重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第167页。
- 68 六十年代中期,苏联开始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大量驻军并在中苏边境地区驻扎重兵,七十年代末,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后又出兵侵略阿富汗。这些行动给中国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是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个重大障碍。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八年中苏两国政府特使就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问

题进行磋商时,中方提出,为了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苏方必须消除上述三大障碍,即从蒙古和中苏边境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促使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并从柬撤军。——第167页。

- 69 麦克阿瑟(一八八——一九六四),美国职业军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一年任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其间,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任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一九五一年四月被撤职。——第169页。
- 70 这里指由中国自行设计、研制和建造的中国第一台高能粒子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这一高技术科研工程于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正式开工,到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基本建成,次年十月十六日首次对撞成功。——第184页。
- 71 即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早年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和护国、护法战争。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同年底去苏联学习。一九三一年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一九三四年参加长征,任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与朱德等一起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一起创建了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一九四七年六月,和邓小平一起率部挺进大别山地区,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国民党军全国性战略反攻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185、336页。
- 72 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任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同张国焘领导的红军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 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到达陕北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逃出陕甘宁边区,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随即被开除出党。——第186页。
- 73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中下旬,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度泛滥的背景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等院校的少数学生出于各种情绪和缘由上街游行,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从中进行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煽动,有的地方出现了扰乱交通秩序和违犯社会治安规定的情况。后经各地有关方面和学校当局的教育和疏导,事件逐渐平息。——第194、198、201、203、204、216页。
- 74 方励之,一九五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八四年九月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任职期间,因在各种场合公开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煽动学生闹事,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一九八九年在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犯有反革命煽动宣传罪,被开除公职。——第194、326页。
- 75 王若望,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自一九七九年起,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5页。
- 76 周谷城,一九八八年生,湖南益阳人。当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费孝通,一九一一年生,江苏吴江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钱伟长,一九一二年生,江苏无锡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第196页。
- 77 刘宾雁,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九八七年一月被开除党籍。——第196页。
- 78 六中全会指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在讨论这个决议草案时,邓小平作了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重要讲话,见本书《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第196、379页。
- 79 这个讲话即本书《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收入一九

- 八七年三月出版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 196 页。
- 80 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第 197、234、253 页。
- 81 指《人民日报》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表的社论《珍惜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发表的两篇评论员文章《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讲民主不能离开四项基本原则》。——第 197 页。
- 82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二十二日,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天津市市长李瑞环分别在天津部分高等院校团委书记、学生会干部座谈会及天津市各部门、各高等院校主要负责人会议上讲话,回答了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表明了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赞成学生闹事的立场。——第 197 页。
- 83 指一九八五年“九一八”前后,由抗议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而引起的北京、西安等地极少数大学生未经申报批准上街游行示威的事件。——第 198 页。
- 84 指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邓小平主持开幕式,赵紫阳作题为《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这次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加快和深化改革。大会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定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选举出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 203、211、235、244、256、258、260、262、296、305、324、345 页。
- 85 见孙中山《致蒋中正函》(一九二四年十月九日)(《孙中山全集》第 11 卷,中

- 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45 页)。——第 205 页。
- 86 指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的谈话。见本书《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第 212 页。
- 87 宇都宫德马,一九 六年生。当时任日本国会参议员、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第 230 页。
- 88 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一九二七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对国民党右派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以致当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同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 234、298、309 页。
- 89 王明(一九 四——一九七四),即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被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地位。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第 234、253、309 页。
- 90 铁托(一八九二——一九八),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一九七七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八日曾访问中国。——第 236 页。
- 91 一九八 年五月三十一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谈话时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

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将这一原则概括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第 237 页。

- 92 万里,一九一六年生,山东东平人。一九三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十二、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七五年任铁道部长。一九七七年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一九八一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一九八八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第 238 页。
- 93 一九八八年四月,经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批准,海南建省,海南岛为经济特区。邓小平十分关注海南岛的开发和建设,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他在中共海南省委关于设立洋浦经济开发区的汇报材料上批示:“我最近了解情况后,认为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不宜拖延,但须向党外不同意者说清楚。手续要迅速周全。”——第 239 页。
- 94 邓小平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二日,他在祝贺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时题词:“加速现代化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第 247 页。
- 95 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在报给邓小平的《关于草拟十三大报告大纲的设想》中提出,十三大报告全篇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立论的根据。“初级阶段”这个提法,在党的文件中已三次出现,但都没有发挥,十三大报告的起草工作准备循着这个思路加以展开,说明由此而来的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由此而来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务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此而来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任务和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由此而来的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任务,由此而来的在理论和思想指导下避免“左”右两种倾向的必要性。邓小平三月二十五日对这个设想作了批示:“这个设计好。”——第 252 页。
- 96 遵义会议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的错误,从组织上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

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253、298、309页。

- 97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一九七六年四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四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四月五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第255页。
- 98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识分子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称为“老九”。——第275页。
- 99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第278页。
- 100 指《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一九八六年三月五日,邓小平对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四位科学家提出的关于跟踪高技术发展的建议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四月六日,他针对选择高技术发展项目是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还是以增强军事实力为主的不同意见,作出批示:“我赞成‘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方针。”十月六日,他又在关于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报告上批示:“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并立即组织实施。如有缺点或不足,在实施中可以修改和补充。”在邓小平的支持和推动下,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简称“八六三”计划。计划中选择对中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生物技术、航天技术、信息技术、先进防御技术、自动化技术、能源技术和

新材料技术的一些领域作为突破重点,在几个重要的高技术领域跟踪世界水平。一九八七年三月,这个计划开始组织实施。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又为全国八六三计划工作会议作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第 279 页。

- 101 李政道,一九二六年生,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一九五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一九七二年后多次到中国访问、讲学。——第 280 页。
- 102 指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它们自六十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被称为亚洲“四小龙”。——第 281、375 页。
- 103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制造傀儡政权。一九三二年三月在长春成立“满洲国”,扶溥仪为“执政”。一九三四年三月称“满洲帝国”,“执政”改称“皇帝”。一九四五年八月,“满洲国”随着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被摧毁。——第 293 页。
- 104 十九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强迫中国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一八五八年,通过中俄《璦琿条约》,迫使中国割让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把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一八六一年,通过中俄《北京条约》,进一步把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划归俄国。这一条约还确定了中俄西段边界的基本走向,为沙俄掠夺中国的西部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一八六四年,沙俄依据中俄《北京条约》的有关规定,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占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四年,沙俄又通过《中俄改订条约》(亦称《伊犁条约》)及其续签的五个子约,再次侵占了西部七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这样,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总计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第 293 页。
- 105 指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一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秘密签订的《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简称《雅尔塔协定》。主要内容是,苏联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个月或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作为交换条件,美、英方面承诺维持外蒙古现状;恢复一九〇五年日俄战争后俄国丧失的领土及其在中国东北的各项权益;将千岛群岛归于苏联。苏联则表示准备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友好同盟协定。——第 293 页。

- 106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国随即出兵,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干涉,同时派军队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美军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朝鲜南北方原来的分界线“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中国人民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至此,朝鲜战争结束。——第294、329、345页。
- 107 这里指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一九五四年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后,越南北方获得解放。美国取代法国控制越南南方,阻挠越南南北方统一。一九五九年后,越南南方人民开始进行武装斗争,反抗美国扶植的独裁政权和美国的干涉。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轰炸越南北方,并于翌年三月出兵南越。在越南人民的坚决抗击下,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美国被迫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上签字,美军撤出南越。一九七五年五月一日,越南南方全部解放,越南抗美救国战争结束。——第294页。
- 108 李先念(一九〇九——一九九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第二副司令员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一九八三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一九八八年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第296、341页。
- 109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广大人民群众以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哀思。在悼念活动期间,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借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利用大小字报诬蔑、谩骂、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鼓动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由于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赵紫阳对动乱采取纵容和支持的态度,助长了动乱的发展。从五月十三日起,北京非法学生组织“高自联”煽动一些人进行绝食,长期占据天安门广场。为保证社会安定,恢复正常秩序,国务院决定自五月二十日起,在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但是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利用政府和戒严部队采取的克制态度,继续

- 占据天安门广场,组织各种非法活动,最终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六月四日,党和政府依靠人民,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反革命暴乱。——第 296、311、316、344、348、357、368、371 页。
- 110 华国锋,一九二一年生,山西交城人。一九三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七六年四月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同年十月,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粉碎“四人帮”,他和叶剑英、李先念等起了重要作用。后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一九八一年九月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鉴于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推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第 298 页。
- 111 这里说的毛派,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领导者加给邓小平等人的。毛指毛泽东,当时被“左”倾领导者排斥于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之外。一九三三年春,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地方领导工作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人,从实际出发,赞成毛泽东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形成的积极防御路线,以及在中央苏区制定的土地政策、经济政策等正确主张,抵制“左”倾错误作法,而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有关系的派别活动”,是“对革命悲观失望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逃跑路线”,遭到残酷斗争和打击。邓小平先后被撤销中共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受到党内处分。这次错误的斗争一直延续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前。——第 301 页。
- 112 这里指一九八一年元旦邓小平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新年茶话会上指出的,在八十年代里需要做好的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第 305 页。
- 113 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打击,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一九三四年

- 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二月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就义。——第309页。
- 114 向忠发(一八八——一九三一),湖北汉川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二八年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被捕叛变,二十四日被国民党枪杀。——第309页。
- 115 李立三(一八九九——一九六七),湖南醴陵人。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二八年冬至一九三一年秋,在上海中共中央工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兼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一九三一年六月至九月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来他认识和改正了错误。在中共第七次、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第309页。
- 116 任弼时(一九四——一九五),湖南湘阴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军第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军第二方面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四一年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七日病逝于北京。——第309页。
- 117 林彪(一九一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八年五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五九年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阴谋败露后,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乘飞机外逃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一九七三年八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他的党籍。——第309页。
- 118 即本书《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第310页。
- 119 这里指中共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意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职务,也不再担任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但仍留任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的职务。——第 315 页。

- 120 指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四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全会分析了五、六两个月来全国的政治形势,指出极少数人利用学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其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会认为,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中,中共中央的决策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赵紫阳同志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中所犯错误的报告》,对中央领导机构的部分成员进行了调整:撤销赵紫阳的党内一切领导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增选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改组了中央书记处。全会强调,要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坚决执行中共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 316、322 页。
- 121 指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十三届五中全会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全会高度评价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建立的卓著功勋。指出,邓小平是中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杰出领导人,在党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的时期。全会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由江泽民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第 316 页。
- 122 这里指《聂荣臻回忆录》一书,一九八三年由战士出版社出版上册,一九八四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中、下册。——第 317 页。
- 123 这里指李维汉撰写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一九八六年由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第 317 页。
- 124 “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第 318 页。
- 125 巴黎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指一九八九年七月十四日至十六日由法国、美国、

英国、联邦德国、日本、意大利、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和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主席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会议。会议在七月十五日发表的政治宣言中“谴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所谓“中国违反人权的暴力镇压”。宣称要采取中止对华高层政治接触及延缓世界银行的贷款等制裁措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七月十七日就此发表谈话,指出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横加指责,施加压力,对此,中国政府不能不表示极大的遗憾”。《人民日报》于七月十七日以《中国的内政不容干涉》为题发表社论,指出“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理所当然不能接受。”——第 329、345、348、358 页。

- 126 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 ,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 336 页。
- 127 上党战役是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冀鲁豫解放区部队在山西省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反击国民党军进犯的战役。一九四五年八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十三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九月十日起,解放区军民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展开自卫反击,进行了上党战役,歼灭国民党军十一个师及一个挺进纵队共三万五千余人,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第 336 页。
- 128 马法五,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第 336 页。
- 129 高树勋(一八九八——一九七二),河北盐山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起义后,该部改编为民主建国军,任总司令。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河北省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第 336 页。
- 130 平汉战役也称邯郸战役。一九四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队自新乡一带沿平汉路侵入晋冀鲁豫解放区。十月下旬,其先头部队三个军到达磁县、邯郸以南地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奋起自卫,经一周激战,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约万人起义,其余两个军在溃退中被军区部队围歼。全役共毙伤国民党军三千余人,俘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一万七千余人。——第 336 页。

- 131 李达(一九一五——一九九三),陕西眉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第337页。
- 132 陈锡联,一九一五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行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 133 陈再道(一九一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冀南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 134 陈赓(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湖南湘乡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后改称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第337页。
- 135 宋任穷,一九一九年生,湖南浏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所辖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后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 136 苏振华(一九一二——一九七九),湖南平江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后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第337页。
- 137 汤恩伯(一九一——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任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曾统辖高树勋任总司令的第三十九集团军。——第337页。
- 138 王定南(一九一——一九九),河南内乡人。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五月到高树勋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第338页。
- 139 杨得志,一九一一年生,湖南醴陵南阳桥(今属株洲市)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38页。
- 140 彭涛(一九一三——一九六一),江西波阳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 141 谢富治(一九一九——一九七二),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第338页。
- 142 王宏坤(一九一九——一九九三),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桐柏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 143 张才千,一九一一年生,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第341页。

- 144 秦基伟,一九一四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第341页。
- 145 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军区及华北军区所属冀鲁豫军区地方武装共六十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这次战役击毙国民党军兵团司令官黄百韬、邱清泉,俘虏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兵团司令官黄维、兵团副司令官吴绍周,共歼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损失殆尽,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第341页。
- 146 王近山(一九一五——一九七八),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 147 杜义德,一九一二年生,湖北黄陂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342页。
- 148 杨勇(一九一三——一九八三),湖南浏阳人。当时任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342页。
- 149 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县)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职务,主持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事宜。——第342页。
- 150 宋希濂(一九一七——一九九三),湖南湘乡人。当时任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不久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五九年特赦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全国政协委员、常务委员等职。——第342页。
- 151 尼克松,一九一三年生,美国前总统,共和党人。在其总统任内,曾于一九七一年七月派遣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改变了中美两国长期隔绝的局面。一九七二年二月首次访问中国并在上海同中国方面发表中美联合公报,使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一九八九年十月底至十一月初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 152 基辛格,一九二三年生,曾任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积极协助尼克松总统恢复中美两国的正常关系,一九七一年七月到北京与周恩来总理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会谈。一九八九年十一月曾访问中国。——第348页。
- 153 八国联军是一九〇〇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为镇压中国义和团运动而发动侵华战争所组成的联军。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中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〇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第358页。
- 154 “风庆轮事件”是“四人帮”借风庆号货轮挑起事端,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发难的事件。一九七四年九月底,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后返抵上海。“四人帮”借风庆轮远航成功一事歪曲事实,大造舆论,污蔑国务院、交通部不支持国内造船,热衷于买船,是“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矛头直指周恩来。随后,他们根据诬告材料捏造罪名,将交通部派到风庆轮工作的干部拒绝参与这种“批判”的正当行为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同年十月,江青等又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风庆轮问题”,遭到邓小平的抵制和批驳。——第367页。
- 155 十三届八中全会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全会充分肯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及农村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就,强调继续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不断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坚定不移地深化农村改革。全会还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第371页。
- 156 钱学森,一九一一年生。浙江杭州人。一九三五年赴美留学。一九五五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至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他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中国运载火箭、导弹、卫星的研制攻关和试验工作,为发展中国的航天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第378页。
- 157 李四光(一八八九——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人。早年留学日本、英国。曾任

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九四八年赴欧洲。一九四九年回国。一九五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古生物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毕生从事古生物学、冰川学、地震学和地质力学的研究和教学,是地质力学的创始人,为发展中国的石油勘探做出了卓越贡献。——第 378 页。

- 158 钱三强(一九一三——一九九二),原籍浙江吴兴(今湖州),生于绍兴。一九三七年赴法国留学。一九四八年回国。一九五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为中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创立和组织“两弹”研制做出了卓越贡献。——第 378 页。